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郑振铎全集

第十五卷

外国文学文论

《俄国文学史略》

《泰戈尔传》

花山文艺出版社

第十五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外国文学文论和几篇翻译小说序以及《俄国文学史略》、《太戈尔传》等两部专著。

这些文论多散见于建国前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早期刊物，也有几篇载于建国后的《文艺报》、《文学研究》等刊。

《俄国文学史略》，一九二四年二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太戈尔传》一九二五年四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卷即据以上版本。



1955年，在印尼雅加达市的欢迎宴会上，郑振铎与市长苏迪罗亲切握手。



1955年，郑振铎在印尼参观著名的“波罗浮屠”。



1955年秋，郑振铎携全家与友人同游明长陵。前排左起：许广平、王伯祥、郑振铎、高君箴；后排右一为朱早观将军。



1958 年，明定陵开棺的一瞬。左一、郑振铎，二、夏鼐。

目　　录

外国文学文论

俄国文学史略

太戈尔传

外国文学文论

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

一　写实主义的先导者鄂歌黎[①]

当俄罗斯文学史的幕复启的时候，是为写实主义文学时代，而最先发达的，乃是散文。散文时代中最先而且最主要的文学家是尼古拉斯·鄂歌黎（Nicholas Gogol 1809—1852）。他是俄罗斯写实派作家的先锋，以小说及剧本著。自他起来后，俄罗斯乃有自己出产的小说。普斯金在《鹿的女王》（The queen of Spades）里，曾有句极沉痛的话，他说："一本俄文的小说？哪里有？"现在这个时候是过去了！伟大的鄂歌黎登台了！好像劳门杜夫之承继普斯金的诗国王位，他承袭了格利薄哀杜夫（Griboyedov）的讽刺的作家的封号。讲起国民文学的创造，他又是普斯金第二。

鄂歌黎是小俄人，一八〇九年生于歌萨克乡中普尔塔洼（Poltava）附近的一个地方。他的家庭是哥萨克中的豪族。他的祖父为哥萨克的统领，他生长在他祖父的手里。到了一八二九

① 即果戈里。

年，他才离了家乡到圣彼得堡去，在政府里得一个位置。但不得志。不久即去职，做史学的教授。没有多少时候，又失业。最后遂转而致力于文学。头一次著作出版，使他与许多当代的文人结识。普斯金跟他尤为要好，做他的忠益之友，批评者，劝他做平民生活的著作。他住在圣彼得堡，自一八二九年起，至一八三六年才离开这个地方。家乡之梦，时复在心，因作两部小俄的故事以写之。一部是《狄甘格农场之夜》（Evening on a Farm on the Dikanka）①，出版于一八三二年；一部是《茉果露德》（Mirgorod）②，出版于一八三四年。

鄂歌黎的性格，本来是罗曼的。他具有极多的空想，鬼神的幻念，喜欢奇怪破空的事实，又有极深的宗教性质。但是俄罗斯的文人，都是具有奇异的混合性、矛盾性的。他们是罗曼派，又是写实派，具有幻想，又具有常识。鄂歌黎也是一样。他于神秘的气味之中，却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写实派作家。他的滑稽的性质，连两种不同的文心而为一。而其后来的著作，则极讥嘲的能事。但细察起来，写实的分子，毕竟占多数。所以批评家都奉以俄罗斯写实主义文学的先导者的徽号。自他起后，俄罗斯写实派文学，才有端倪，才能发挥光大。屠格涅甫（Turgenev）说："我们都是从鄂歌黎的《外套》传下来的。"其实岂仅《外套》一篇，他的一切著作，都足以树写实文学的模范吓!

在他的第一部书中的第一篇故事《沙罗契涅基的市场》(The Fair of Sorocoinetz）中，我们读之，觉得如身临其境一样。我们如到南方，在正午烈日之下，看见谷粒堆在车上，大麦卖于市场，而市场的嚣哗之声，熙攘之状，及一切的气味，也都活泼

① 即《狄康卡近乡夜话》。

② 即《密尔戈拉德》。

泼现于纸上，一如诺曼特（Normandy）之跳出于莫泊桑（Maupassant）的文中，苏格兰之活现于史谛芬孙（Stevenson）的书里。而其神奇的思想，同时也如线一样，贯串于各篇故事之中。滑稽之文情，也寓于《红衫》（Red Tackel）及其他的故事里。在市场里，闲谈的人，讲到《红衫》的故事。他说这件红衫，是属于一个因过失被天堂谪贬的小鬼所有的。小鬼住在邻家谷仓当中。因为思家的原故，日以醇酒自娱。饮去了他所有的一切东西。不得已以他物红衫质于犹太人，以一年为期。未到期，犹太人竟卖出之。买主察知其来源，裂之片片而抛散之。其后小鬼遂变形为猪，年年在市场里找这件衣服的碎片。大概在第一部书里，神怪的故事，总占大部分。有水仙的故事，有魔鬼偷月的故事，以及巫婆，术士及许多因为与恶魔交易而失去灵魂的人的故事。

在第二部书《茉里露特》里头，有两篇完全写实派的文学著作的故事。一篇是《古风的地主》（The old-fashioned Landowners），一篇是《两个伊凡的争论》（The Quarrel of the Two Ivans）这两篇故事，可以把鄂歌黎的写实方面的天才表现出大略和数量来。在《古风的地主》里，我们得见两个南俄古朴和善的地主的事情。菲力蒙（Philemen）和白昔斯（Baucis）是两个极要好的朋友。他们谦让和气的住在一块，极为快乐。及白昔斯死，菲力蒙过他的寂寞的生活十分凄苦。鄂歌黎用勒芬顿（Lafontaine）的艺术，把他们的愉快悲哀之情，朋友之谊，描写得真切无比，诚恳动人，极像一部狄更司（Dickens）的著作，《两个伊凡的争论》叙两个名叫伊凡的人，同是很亲密的朋友，从来没有争论过。过了许多年，忽因举出“鹅”（Goose）一个字的原故，两个人竟至起了争端。以后遂时常争论不息。在这篇故事里，鄂歌黎的滑稽的天方，充溢其中，而同时又带有悲郁之音。

在《茉果露特》中，又有两篇小说，即《塔拉斯庇尔拔》(Tarass Bulba) 和《肥依》（Uiy)，可以代表鄂歌黎别一方面——神秘方面——的著作，表现出他的幻想的天才。《塔拉斯庇尔拔》是一篇短篇的历史小说，叙哥萨克人的生活的活泼如生，无一著作可以及得他，可以算是鄂歌黎的杰作。由这篇著作，又可见鄂歌黎史诗的技能。《肥依》是叙一个巫婆的故事，在鄂歌黎的神怪故事中，算是最为幻奇不可思议的一篇著作。

不久，他又刊行两种故事集：一种是《亚拉庇司克斯》(Araesques)（1834)，一种是《杂记》（Tales)（1836)。在这些故事集中，一切巫婆，水神，术士，魔鬼，以及冒险的故事，都已不见，虽然在《鼻子》中，叙一个少佐的掉下来的鼻子，变成别一个人，在镇中周游的故事，还有些幻怪的色彩存留，然在《马车》（The Carriage）的一篇故事中，则写实的色彩极浓，这种奇想，完全无存。《外套》（The Over-Coat）一篇，尤为纯正的写实主义作品，为后来作家的模范。在《外套》中所叙的是一个小官的事情。这个小官，极为贫苦，他的欲望，就在想得一件暖和的外套。经许多年的储蓄，才能如愿以偿。在他头一天穿它赴宴的时候，就被一个贼偷去。他痛心之极，到警察总监那里去告诉。总监不但不受理，反把他威吓了一顿。他又气又怕，可惜那件外套，不到几天就死去了。他的鬼遂出现在街上，常常揭人的外衣。总监的外套，也被他拿去。这篇故事，就是后来俄罗斯许多长篇的人道、心理各种著作的始祖，他的寓意也可以说是以后托尔斯泰，屠格涅甫，杜斯退益夫斯基诸人著作的缩本。

这些故事集出版之后，鄂歌黎又转而从事于剧本的著作。这篇剧本就是《巡按》(The Revisor)[①]，是俄罗斯戏曲中的一篇有

① 即《钦差大臣》。

名的喜剧。这戏的情节，是普斯金给他讲的。中叙一个小地方的官吏，听说巡按将微行至其处考察吏治，怕得了不得。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穷极无聊的少年，自圣彼得堡到这个地方。他们误以为即巡按，恭维供张得无微不至。这个少年动身去了不久，真的巡按忽来。他们才知道他们的误认，自咎不已。这篇戏是讽刺俄国当时的吏治的，差不到把当时官僚腐败的情形，都和盘托出来。以滑稽的文笔，写龌龊的事情，可以使人笑，可以使他们愧恨，显出鄂歌黎的写实本领，到了十二分。当时文网极严，对于稍加忌讳的著作，都不能得检查员的许可发表，这篇东西，当然也不能在台上演唱的了。无意之间，乃为俄皇所见，他阅之大笑，即命排演，亲临观以为乐。因得特许，得在剧场演唱。当时极受欢迎。其活的滑稽的势力，到现在还存在。每逢圣彼得堡或墨斯歌的剧场演此戏时，坐客都是满座的。他的价值，永不堕落，而其影响于后来的作者的地方，也是极伟大的。

《巡按》一剧出现后，鄂歌黎乃永离俄罗斯而定居罗马。他在这个时候，有一篇极重要的著作，还未脱稿。这部著作就是《死灵魂》(Dead Soul)，是他的一部最精心结构的杰作。书中的情节，也是普斯金告诉他的。书叙少年契契柯夫（Chichikov）日困穷乡，不能自拔。一日，忽有一奇异的思想袭于脑中，认为是一个极好的致富术 。当时奴制未除，每一个地主，都有许多农奴，称为“灵魂”的。每十年，政府收税一回，凡在十年之内所死的“灵魂”，他们的主人，都要付一种人口税。在这十年中间，没有人去查看这种农奴的名册。契契柯夫的意思，就是去同地主商量，叫他们把所有死的“灵魂”都取去，记上他买去的事实，地主因为省了税钱的原故，当然是答应了。于是他就拿这些凭证，押在圣彼得堡或墨斯哥的银行里，当做活的“灵魂”。怎么一来，他就得了很多的钱，可以自己买真的“灵魂”了。契契

柯夫如此的游历全俄，去寻找死“灵魂”。书中记他所遇的事实，把所有各种各样的男人妇人，都形容得“栩栩如生”。这部著作，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出版于一八四二年，第二和第三部一直到了一八五二年，他死的时候还未脱稿。第二部分本来早已做好，但他把原稿两次抛在火里，而重作一过，所以现在出版的还是未完之本。第三部分则是杂记的。因此现在所有的完全的部分，仅是第一部分。他本想在第二部分记契契柯夫的道德的重生，并且给世人以他的完全消息。因为一梦所苦，遂不能完工。这个时候，他的天性的宗教感情大炽，使之自隐，不复再作。这个中途自绝其所从事之业，本是俄罗斯人的特性。他们往往正做顺利的事业时，忽中断，弃去不顾，以寻求非地上所有之物。托尔斯泰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鄂歌黎此种作为，也正是一个例。

鄂歌黎的《死灵魂》感动俄罗斯人极深。热心西欧文化的人喜欢他，因为他的真实，他的艺术和他的社会的思想；国粹派喜欢他，因为他的合于生活真际和他的俄罗斯的风味。当鄂歌黎在普斯金前念完过书的第一章时，普斯金叫道：“天吓！俄罗斯是怎样悲惨的国家吓！”鄂歌黎自己也说道，读过本书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忠实的自己反省一过的。是他自己没有契契柯夫的分子在他身上时，那个时候，他要是遇见一个朋友，必定大声的提撕他的朋友道：“那边走着契契柯夫。”“谁是，什么是契契柯夫?”这种是常有的情形。他的感人之深，由此可知了。

《死灵魂》在鄂歌黎的著作中，是最有深意的。他可以使小儿笑，少年的人思，老年的人哭。离开他的哲学，他的意思不讲，即他的艺术，对于俄罗斯文学也是有极大的影响的。普斯金使俄罗斯的诗，从贵族的，雕饰的风气底下解放出来，鄂歌黎则使俄罗斯的小说从格式巍宏底下解放出来。普斯金完成诗体的工作——在散文上，他也略略的表现些功绩——鄂歌黎则完成散文

的工作。不仅如此，他并且更进而创造俄罗斯的写实主义文学。《死灵魂》描写日常生活，以契契柯夫为主人翁，尤足表现写实派的精神。普斯金既示俄罗斯人以俄罗斯的景色——文学——鄂歌黎则更进而示俄人以平直单调的俄罗斯国中所含蓄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和神秘的威权。同时又示他们以普通人民日常生活里的性情、滑稽、怪异、权力、喜剧等的无穷的文学资料。他叙述他所见的一些也没有虚饰，一些也没有夸张。他用选择的经济的手段来著作，表现他伟大的艺术的天才。无论他同时代的人，对于他的著作，以为是好是坏，是有害是有利，是有功是无功，他总是已经遗留下永久的小说，故事，散文的模范了！总是同普斯金垂下永久的诗的格式一样，做了极伟大的功绩了！

《死灵魂》出版后，鄂歌黎不复作小说。一八四七年，他著了一书，名为《与一个朋友的通信》（Pasages from a Correspondence With a Friend）[①]。这部书出，世论大骇。因为在这本书里，鄂歌黎发表俄人无论在精神方面，政治方面都应该服从政府的意思。他虽非自由主义者，从前对于政府也曾不满意。现在一反论调，大家自然震异了。而当时的西欧派和自由主义者尤为怒之不已。其实他不过由衷发言，一些别的意思也没有。他本来是信奉宗教的，至此尤为专心致志，慕来天国，出产业为慈善之举，对于穷学生，尤极力周济之。至死始已。他死的时候是一八五二年，年四十三岁。

他的著作有时也使人读之而悲，但决不使人烦恼，也决没有苦滞，嫌恶之味存留着。他的著作固然充满了滑稽意味，但也决不使人欢笑而忘其真意。他是欧洲文学上最大的讥刺作家之一。他是俄罗斯最大的国民文学创造者之一。他的文字，充满魔力在

---

① 即《与友人书信选》。

内，他的作品，发于怜悯之情。他是一个永久被人称赏，同时又被人爱的一个作家。他的故事，是少年的恩物。许多俄罗斯的童子，读小说都自他的著作始。自有他出来，俄罗斯的罗曼主义文学始摧减，俄罗斯的写实主义文学始发生。

二　散文时代

散文时代，最先出，最主要的作者鄂歌黎。散文时代的小说，作家也以鄂歌黎为最先出，最主要。前节已将鄂歌黎的生平和著作略为叙述，本节叙鄂歌黎后的散文时代的诸作者。

在这个时代中，与小说相对峙的就是批评的著作，卡伦辛（Karamzin）所著的文学批评的诸著作，已开后代批评著作之滥觞。其后欧洲使者《European Messenger》杂志上，也常有批评普斯金著作的文章出现。至是时，文学的批评，遂大为发达。最先出者为□盛斯基亲王（Prince Uyazemsky）。他生于一八〇八年，死于一八七八年。在这些时期内，他的文学活动，很少休息的时候。除了批评家之外，他又是诗家和讽刺的作家。俄罗斯的贵族文学家，富于知识，著作极多，以冷静的头脑，聪明的眼光，微妙的智慧，为清顺明净的叙述。格利薄哀杜夫是一个例，□盛斯基也是一个例。同时又有普利怀（Polevoy）出，也是很著名的批评家。他生于贫贱，无力入学，其造就全在自修。他是俄罗斯第一个专门杂志家。在杂志常见他的批评著作，但以上诸人，还不过是真正批评家的先导，其为俄罗斯美术、文学和杂志的批评的真正创造者，乃是倍林斯基（Belinsky）[1]。倍林斯基生于一八一一年，死于一八四七年。同普利怀一般，他也是生于贫

---

① 即别林斯基。

贱之家庭的。他的学问，也完全是自修成功的。他的生活极苦，终生与贫病奋斗。以他的努力，得入于墨斯歌大学，苦修至于毕业。他的文学作品，虽多为检查员所禁阻，而其影响则传达而入人至深。他创造俄罗斯的批评文学。其学数变，初从事于里智尔的哲学中，热心于莎尔比亚，贵推（Goethe）[①] 及客观的艺术，后复为法国的文艺作品所影响，至其最终，始认定“人生较艺术尤为重要”的大前提，而执以为批评的标准。

新时代的第一流作家如郭柴洛夫（Goncharov），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赫尔岑（Herzen）等都是受他的奖进的。他又解释普斯金，劳门杜夫，鄂歌黎，格利薄哀杜夫，助加夫斯基以及其他的过去的作者。他的评判对于后世是极有势力的。但他有些批评，未免过于偏执，过于主观。他对于普斯金和劳门杜夫的批评，就是一个例。他责鄂歌黎，也同责普斯金一样，说他乃为一个艺术家，而非一个社会改造家。要之无论他的主观怎样变化，或是在黑智兰的崇拜的时候，或是在热心法国艺术的时候，他总固执的用他的主观来评判一切，杂以感情作用，加以激烈判断，绝不能用客观的批评，也不能对于反对者而下公平的意见，更不能见一个问题的两面。他是西欧文化的宣传者，因之对之国故党（Slavophiles）常尽力的攻击，极端的仇视。这种态度，虽非正当，然以此而近代的俄罗斯文学，乃深受其赐得独具一格。批评家多说他是承前起后的中枢人物，实非过誉!

自倍林斯基以这种的批评态度来评判一切美术和文学的著作后，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乃永受其影响，不能自拔。因此俄罗斯的文学的和美学的批评文学，乃与其余的欧洲诸国，迥然不同。不仅同那些在“艺术是因为艺术的要求”（Art for Art's Seek）的旗

---

① 即歌德。

下的西欧批评家绝对相异，即同那些以道德的观念为文学的要素而力驳“艺术是因为艺术的要求”的理想的西欧批评家也不相同。自俄罗斯的批评文学创始后以至于今其所以绝少有真正的客观批评文学出现，实因深受此影响的原故。而美术的批评，因亦竟成政党之争，互相水火。他们像热心的党人一样，常说“你是在我的党里么?”是则以为是一个很好的著作家，不是则立以为非，至叹息其天才的误用。

在这个时候，俄罗斯的思想潮流，渐分为二派。一派是西欧的思想，一派是斯拉夫的思想。这两个思想互相抗峙，历久不息。批评家从而推波助澜，笔战益烈。桑德辟夫（SainteBeuve）与倍林斯基，麦肃阿诺尔（Matthew Arnold）与和他同时的俄罗斯作家之间，意见均绝对相异。麦肃阿诺尔说：最高品的诗乃是人生的批评，但他也不全蔑视摆伦或不预世事的诗家，因为他们的时世，同他不同；他们的政治趋向，也是同他有异的原故。倍林斯基的意见就与此大不相同了！他不管什么时世，什么政治趋向，凡不合于他的主观，他总是不赞成，总是蔑视。使□□□或□□□□□而为俄罗斯的诗人，其被责骂，被轻蔑之程度，是可以想象而知的了！俄罗斯的批评家，与英、法的批评家，其度量相差的度数由此可知了。

西欧思想之输入俄罗斯，导源于约西夫李麦斯脱（Joseph Le Maistre）与圣彼得堡的罗马教徒的影响。一八三六年时，察阿达夫（Chaadaev）在莫斯科的《远镜》（Telescope）杂志上，发表他的“Lettre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他是退伍的禁卫军人，曾在法兰西俄国公使馆内供职多年，也曾游历过欧洲的一大部分。他除悲俄罗斯之深受□□□帝国的遗毒，而与西欧文化隔绝，常慨然欲以输入西欧文化自在。因著此书札以见其意。自此书札刊布后，影响绝巨，极有于助罗马派的流行。他

说：俄罗斯是背于时世的，人类的文化，还没有与他接触过。又说："西欧的空气，产生义务，法律，正义，秩序的理想；我们则没有贡献一些东西给世界，也没有从那里取一些东西来，……我们于人道的进化上，没有过一些的贡献，也没有从此进化里，取得了一些东西。那些仇敌的环境，使我们疏远于基督教的社会思想的大势，所以我们应当改正我们的信仰，而在另一个基础，再受教育一过。"然此书札终触文网。《远镜》的编辑者至因此被迁谪，检阅官也被免职。而察阿达夫则受宣告为癫狂者。在医生监视之下约一年。

但因此而后继者反不绝。弗尔康斯基公主（Princess Volkonsky）著说教之书，格峡林亲王（Prince Gagarin）也继之而归于罗马教之门。这是西方化的一个支派。到倍林斯基等则另为一派，没有宗教的倾向，而受无神论及社会主义的影响。在这一派中，与倍林斯基齐名的是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v Herzen）。

赫尔岑生于一八一二年，死于一八七〇年。他的真名是若柯力夫（Yakovlev），他父亲是一个有钱的贵族，他的母亲是德意志人。因为他们的结婚，没有在俄国法庭正式注册，所以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取他们母亲的名字。赫尔岑的事业，在俄罗斯的历史，较文学史上尤为炳彪。他是一个大著作家，又是当时的一个最伟大最有势力的人。他在墨斯哥大学里习数学。毕业后始从事于小说的著作。在大学的时候，他与他的同志阿加列夫（Ogaliev）等几个人创办赫尔岑学会。此学会后来日益发达，至成西欧文化提倡运动的大本营。他的小说，以《谁之罪?》为代表。《谁之罪?》（Who is Blame?）中，所叙的是关于两性恋爱的问题。一个穷苦的大学生，在一个将军家里做教师，与他的庶出女相恋爱，因娶之。迁居于外。不允。他的一个同学忽来其地，与他的夫人日渐亲热。给他晓得了，感非常的痛苦。因浪饮以消其

愁。其友觉之，心中大悔，遂别去不复来。然他与他的夫人的爱情终不复合。他遂以酒丧其生。在这书里除开他的无穷的寓意不说，他的叙事，也是极可垂为模范的。屠格涅甫时常也欢喜仿照他的那种叙述法。因演说的原故，赫尔岑被迁谪于剖姆(Perm)，继而移至甫若特加（Uyatka)。至一八四七年，他遂去国不复回。初定居于巴黎，继迁至伦敦。在此，发行一种报纸，名为《钟》（The Bell)。俄罗斯人极欢迎之。赫尔岑是社会主义者。他以社会主义为一种新宗教，为一种新的基督教。基督教属于旧时代，社会主义则属于新时代。俄罗斯的农民的责任即在扑灭旧物。一切国家的机关都应该废除，而代以俄罗斯的自治组织(Russian Communes)，以互相结约，互相同意为基础。自治组织内的一切产业，都属公有。自治组织的原理，与基督教的根本原理，十分相近。他的社会主义，大概如此。近来赤革命起于俄罗斯，此灰色的帝国，立易为光明灿烂的模范国家，虽绝对的所含宗教色彩，而其组织的原理，与赫尔岑的理想，极为相似。赫尔岑的预言有应验了！他的理想也竟实现了！使他得目见此种革命，不知其感想何如。

因为这种见解，所以他对于西欧那时的文化十分不满意。他极希望俄罗斯能够跳出有毒的西欧潮流，与西欧腐败的空气的传染。他厌恶西欧的资本的社会，他赞颂俄罗斯农民遗传的公有土地的自治组织。因此，他却与国故党表起同情来。但他与国故党实是不同。他对于西欧的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极赞同的。他意想社会革命，可以创造一切的新秩序，开辟一个新天地，斯拉夫应当去实行他。他这个学说的影响，是历史的可以说是俄罗斯虚无主义的先锋——他播下的种子，本非如此，因落在特殊的土地上，所以结果就异了——也可以说是现在的苏维埃（Soviet）政府的第一个创造人！

至于他的文学的影响。则以《谁之罪?》与《我的过去和我的思想》(My Past and my Thoughts) 二书为最。《谁之罪?》上面已讲过。《我的过去和我的思想》一书，则著于一八五二年与一八五五年之间。是他的一部回忆录，也是他的一篇自叙传。叙述日常生活，与各种人的行动言语，极为逼真。以他的事实看起来，则魁奇动人如小说，以他的格式看起来，则在俄罗斯的散文杰作的水平线上。

赫尔岑生而见他的思想的结果。俄人受他的革命思想陶冶，深为感动。自一八六六年，喀拉加速夫(Karakozov) 谋暗杀亚历山大二世后，虚无党的枪声弹影，无时或离俄国的宫廷。国中阴谋百出，深陷于流血的恐怖中。但这种恐怖残忍的果子，却是他所最不愿意收获的。他不意他的思想，竟收放如此[①]。因深为痛悼。在喀拉加速夫暗杀案发生时，他遂著文反对一切的政治的阴谋举动，骂暗杀人的为野蛮。国中的革命党见之大怒。他的声望因此锐减。《钟》的销场，也一落千丈，至于停版。他怎样的亲见他的伟大的希望的破裂，他的播下的种子的收不如意的果，他的后代的理想梦之成为泡影，他的理想之被人利用；抱憾于心，无时或息[②]。至一八七〇年的时候，遂长辞人世而留历史上、文学上的不朽之名于永续的人间。

以上所叙的都是西欧派的作家，此下略述斯拉夫派的文学家。

斯拉夫派是国故党，极力反对西欧派之输入西欧文化于国内。他们的意思以为俄罗斯本有极好的制度文物在，如正教，如皇权，如共产的组织等都是。西欧一切的文化都是由俄罗斯输去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的。他们又指出西欧的封建制度与长子承继权的法律的罪恶，而以俄罗斯妇人在法律上地位之高及遗传的农民的共产制度自豪。又以俄国的议院（Consultative National Assem bly）的同心一德为高出西欧的国会与政党制度。要而言之，他们的意见。就是一切国粹都是好的，一切西欧文化都是坏的，俄国自有其极好的文物在，不必再输入外出的不好的东西。这种见解，实在顽固幼稚得很，同中国现在的国故派差不多。

这一派的首领是霍姆若加夫（Homyakov）。他的学问是很高的。他是一个名学家，一个诗家，又是一个极热心的宗教家。他的诗意都是出于爱国的至情，与宗教的信仰，他的最高的抒情诗极能感人，能动人祖国的感情。除霍姆若加夫外，国故党的诗人还有西契夫（Tyutchev）与阿克萨加夫（Ivan Aksakov）。阿克萨加夫的父亲沙·琪·阿克萨加夫（Serge Aksakov）（1791—1859）曾于一八五六年出版《家史》（Family Chronicle）与赫尔岑的《我的过去与我的思想》合称至俄罗斯传记中的双璧。在这部书里，他描写十八世纪末亚历山大时代的生活，传之永久。批评家都视之为俄罗斯史籍中最有价值的一本书。他的观察的精审，叙事的活泼，文体的整饬，在俄罗斯散文著作中，也是一颗明星。

阿克萨加夫把他童年时在亚灵堡（Orenburg）所经过的一切事情，都清清楚楚的记载出来。他描绘他祖父和大姑的肖像。使我们看加德邻二世时的边陲林人的生活，如同目见一样。我们见看当时的贵族，他们性情朴如农夫，谨守先代的风俗道德，不敢差了一些。虽然文字没有绘出一个活的人，而这样的一个人竟好像在纸上走来走去一样。我们看见他的乡村的生活，几乎一天之中，一个小时都看得见。我们并且详详细细的闻见了他的家庭生活及一切琐事，他的儿子娶亲，他的姊姊的斗嘴，……一切的事情，都如身临其境。

这部书如小说一样的有趣味，而情节又完全都是真的。他的文笔，澄净无比，一些也没有渣滓，他的文情，也折折无穷，好像读神仙故事一样。他本无意于为史，此书乃竟成一本好的史书，并且垂纯正的散文格式于后世。真文学固非雕绘粉饰所能成功的吓!

三　屠格涅甫

自一八四八年倍林斯基死后，七年之间，文学运动，悉行停止。政府压抑无所不至。出版检阅，极为严厉，一字之疑，即为没收，至于集会自由，更无论了。其时批评文学，既已无存，国故党人，亦被禁缚，西欧文化的崇拜者则更银铛就道，斥谪无存。实在是俄国文学第二次复兴时代黎明期前的最黑暗时期。而其文网忽密的原则，则不过受一八四八年巴黎革命的恐怖而已。

在这个时期内，有一班少年的文学家，教师及官吏的同志，结为一会，每礼拜五集会一次。其首领是一个外交部的官吏辟脱拉歇夫斯基（Petrashevsky）（后人遂以其名称这些人为辟脱拉歇夫斯基党人）。他们所讨论的都是哲学上的问题，农奴解放问题，并研究 Fourier 及 Lamennais 的著作，更想创办一个秘密印刷所。平民间的宣传运动的计划，他们也曾提议过。但这些都是话谈，并未实行；他们除了谈话以外，一些事情也没有做。这会不久被警察所知，会员多被捕，处以极严厉的刑罚；受死刑宣告的至有二十一人之多。杜思退益夫斯基也在其内。他们于临刑时，忽得赦旨，改配西伯利亚。亦有编入军队的。这个事件，在俄罗斯的文学史上，算是极悲惨的疮痛之一。以谈话的会，而竟受这样残酷的待遇，当时禁网之密，可想而知了。因此文人皆钳口结舌，莫敢有言，文艺的消沉，至于极点。及一八五五年，皇帝尼古拉

死，其子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文学的一丝曙光，始复露出。而大改造时代——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新时代——的文学也即始于此时了！

此时政府大行改革，解放农奴，创立司法制度，建设地方自治，一件一件都实行出来。俄罗斯的“灵魂”，始有生气：文人学士被钳之口，始复解开，而文学之花，也始放叶开花，至于极盛难继。世界的著作，陆续而出，屠格涅甫，托尔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三个世界的大小说家也都相继登台，不惟达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峰，也达世界的文学的最高峰了。

伊凡·屠格涅甫（Ivan Turgenev）生于一八一六年，死于一八八三年。他的名字是由挞担（Tartar）字源出来的；他的祖先是一个旧族，他们在俄罗斯的文学史上夙以敢言著。屠格涅甫的急进的气象，西欧化的性情，对于奴隶的同情，人道的精神，好德意志与其文学、科学，乃至诗文的天才，都可以说是由他们遗传下来的。屠格涅甫幼年受德法的教育，很少学本国的文字。后来一个仆人，教他念俄国诗人 Kheraskov 的《罗赛特》（Rassiad），他才对于本国文学，生了兴味。十五岁时，他入墨斯哥大学，翌年，转学于圣彼得堡大学。不久又离圣彼得堡而至德都柏林，学哲学于柏林大学，深受黑智兰（Hegel）学说的影响。一八四一年回国。始从事于文学。初为诗，继觉韵文非其所长，即弃去而致力于散文。一八四五年，作史诗体的故事一篇，名《柏拉沙》（Parasha），极得当代大批评家倍林斯基的赞许。在这个时候，他出猎于国内各地，深受自然界的感情：与许多农民相交际，于农人困苦的生活，深悯其不幸。遂作一篇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名《Khor and Kalingych》，农人一切的困难，都由其笔端涌出，后来为《猎人日记》（Notes of sportsman）中的一篇。这篇东西，其初登在一八四七年的《当代》杂志上，很得大家的称

赏。自这个时候至一八五一年，他继续的作了二十四篇这类的小说。一八五二年，遂集合而成为《猎人日记》。自此书出屠格涅甫的文名始大定。

这本书，没有什么结构，止质直的写出他所闻的一切农人生活的状态。间以诙谐的词调，以讽刺的文笔而描写林间的休息，黄昏的光景，日中的炎热，夏夜之快活，三五农夫，豆架话旧，老骥伏枥，贴然不动，其文词之优美，状容之真切，尤为俄国散文著作中别来所未见。而于此优美的文笔中，充备了同情的心理，人类的感觉。轻描淡写农奴的生活，而同时又农奴的不幸，已足以引起识者的要求解放的迫切。俄罗斯的文学，至是始艺术化，始人道化。“农奴解放”的呼声，亦因此书出而立唱高调。人因比之于施都夫人（Stow）的《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至一八六一年，俄国奴制乃终废。亦犹夫人之书出，美国黑奴乃终于释放，文字感人之力怎样的伟大吓!

一八五〇年——他承受了遗产，首先把自己领地的农奴，全都解放了。自是行为，言论渐趋激烈。不见容于专制的俄国政府，一八五三年遂因他的吊鄂歌黎（Gogol）的文章登在墨斯哥的报纸上的原故，禁锢之于其乡里二年。禁锢的期间满了，他遂永离俄罗斯，而定居于巴黎。在这个地方，他结识了不少的英法文学家，如福罗培德（Flaubert）[①] 左拿（Zola）[②] 诸人。因益致力于文学的创作。世人之知重俄罗斯文学盖自屠格涅甫的著作始，而屠氏受诸人的影响，亦稍变其作风。自此以后，隔了许久的时候，他才回俄罗斯走一趟。

因他久居国外的原故，屠格涅甫的作品叙到本国的地方，未

---

① 福楼拜尔。

② 左拉。

免有些不真切。他仅知道，仅能够描写改造时代前的俄罗斯。其后所有变化的地方。他都不知道，所以常有错误的所在，这也是玉璧的微瑕，无可为讳的。因此他的著作的范围，材料，和格式都限于一个极小的时期内。

他的作品，又缺乏有力的史诗的冲动。（The Powerfulepical impulse）他所描写的是平民，是农夫，很少有官吏、军人、牧师等掺入其中，即有也是一个陪角，占极不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他的著作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是过渡时代的著作家，可以把他列为尼古拉时代的小说家。他是描写解放前的古代俄罗斯的，就是描写无为的，好心肠的人，有文化的人，消遣时光于爱情，于快活，不修边幅之中的人。而近代的自觉的要求与呼声则未尝一扰他的笔端。然于此狭隘的范围，他仍创造不可磨灭的工作来。他也如托尔斯泰与杜思退益夫斯益一样，不是一个不易警醒的人。而他的体裁之严整则更远过于托尔斯泰，与杜思退益夫斯基。他们两个人对于体裁，全不注意。屠格涅夫小说体裁之严密，一切俄罗斯的文人，没有一个能及得他的，即世界的文学家，能与之相并的也极少数。他对于散文的功绩，如普希金之于诗。他实在是俄国的“散文的普希金”，鄂歌黎不能屈之于下位于形式严整以外。我们于他的著述里，又可以看见天然的景色与爱情的变幻，由他的超卓的美文里描写出来。但他却不甚写热烈专一的情感；因为与他的性情不相同。他的厌世主义，非由读书也非由体弱而来，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他有时也常住德意志。但住在法兰西的时候，比较得更多。他的著作流传于西欧诸国，较其本国为尤甚。他又极力鼓吹，介绍俄国的文学作品给西欧诸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他介绍给法国人的。这种介绍事业，使俄罗斯的文学，见知于

世，了解于世，功绩是很大的！

屠格涅甫的著作，除《猎人日记》外，最著名的有《路丁》(Rudin)（出版于1856年），《贵族之家》（The Nest of Gentle-folk）（出版于1859年），《前夜》（On the Eve）（出版于1860年），《父与子》（Father and son）（出版于1862年），《烟》(Smoke)（出版于1867年），及《荒土》（Virgin soil）（出版于1876年）等。现在依次略述如下：

《路丁》（Dmitri Rudin）写俄罗斯少年，当黑智兰哲学流行之时，流于空谈而不能实行。路丁即其中的一人。他以大言壮语得娜泰里亚（Natalia）之爱，两人私订婚约。而娜泰里亚之母闻之，大怒，禁其往来。娜泰里亚因与路丁会于林畔，约相偕遁去。路丁不从，反劝其服从母命，二人因相绝。路丁遂浪游至法国，死于二月革命的战后。路丁这个人，是很有荣誉心的，他常牺牲了他自己的私利，不愿意在恶土上种植，而对于真理的爱护心，又非常的热烈；他的言词散播了许多好种子在少年人的灵魂里。但是屠格涅甫却以没有自信力责他；他的意志的不坚定，言词虽热烈，而心中则冷如冰块。他是一个懒惰者，不振作者。总而言之，路丁是当代一般俄罗斯少年的代表者，是一个“空人”(Empty Being)，是一个能言不能行的人。这篇小说，虽然有很多人称赞他，但还不足以见其天才。他的最大的成功，乃在《贵族之家》。这部小说是他的文学的完成。

《贵族之家》里所描写的家庭境况，乃返至十八世纪，如同亚历山大时代的家庭一样。这也因他是不大熟悉当时的俄罗斯的原故。书中有路丁的支派米克汉利未契（Mikhalevich），有忠厚无机心的拉夫莱斯基（Lavretsky），有西欧派的潘辛（Panshin）……。而女人中则有莉莎（Lisa）。她具有那些男人所缺乏的一切德性，——勇于赴义务，怕伤害别人，仁慈、忠厚、崇敬上

帝。她的内心的和平，不久忽被扰乱。她经不起那个重大的失望的打击；遁世而入于山林。而拉夫莱斯基亦兴失望之叹，大呼“人生的无益!”（Useless of life）而所叙者乃多幸福的破坏，不能实现的失望，与夫破碎的心的悲音了！然自此书成，屠格涅甫多年的悲苦的幻想，郁抑的心理，竟为之一泄，不复再扰其胸中。

《前夜》（On the eve）一名《海伦》（Helene），叙女子海伦具有奇特之志气，刚毅不屈的心胸，对于一切温文尔雅的著作家、艺术家与夫声势显赫的官吏，都不屑一顾，独垂青于保加利亚（Bulgaria）的爱国志士英沙洛夫（Insarov）。终逆父母之命，偕英沙洛夫俱遁，与他协力于国事。在这本书里，厌世主义的痕迹，已不可见，当中只备贮着“为自由而奋斗”的福音。空人的路丁，也已绝迹，而易以积极的，有胆量的，能实行的少年人。与当时俄罗斯人的心理，确相符合。这本书是由英国的伦敦自由印刷公司出版，到后来才流入俄国。他的影响极大，不知道有许多的青年男女，以海伦和英沙洛夫为模范，相偕而为自由而奋斗呢!

《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一书，是屠格涅甫最著名的著作。有永不磨灭的美的真价于当时新旧时代的思想的冲突，描写得极为详尽。虚无主义（Nihilitm）一语，亦始见于此。书中言彼得（Peter Petrovrch）尼古拉（Nikolai Petrovith）兄弟二人为崇拜旧思想者。巴黎罗夫（Bazarov）是为新思想的赞美者。两派人互相辩难，至于决斗。当时俄罗斯对于黑智兰的哲学思想，渐起怀疑，多趋于蒲克纳（Buckner）的唯物的思想，奉《力与质》一书为圣经。而怀疑之极，破坏的思想，也趋于极端，举旧时的文物制度，一切否认之，因生虚无主义。旧思想的人也出死力以相抵抗。这书里所较的话，都是当时真实的情形。然屠格涅

甫竟因这书而招很大的非难；守旧的人固恨其所言，以为是有心讥骂，维新的人也怒其过于侮蔑，以为故意嘲弄。他竟弄到两面都不相合了！他虽极力自辩，然疑终不解。但这本书在本国虽然受如此的评难，而在西欧诸国，则极为崇拜。他们以为这本书能够把俄罗斯人的思想表现出来，使世界主明白他们！实在是极有价值的！

《烟》（Smoke）写当时灰色的社会，又带有些厌世主义的色彩。书中的主人是一个女人。她利己之念极强，与《贵族之家》，《路丁》，《前夜》中所写的海伦，莉莎，娜泰里亚诸人完全不同。

《荒地》（Virgin soil）叙当时俄罗斯青年男女之去与平民为伍的运动，与《烟》之纯写悲惨黑暗的景况又不同。然此两书之叙俄国事情，因为与实际不合，很受大家的非难。

除了这些书外，他还有四十多种的短篇小说，也都是有永久的价值的。在他的晚年，又从事于久已弃去不顾的诗歌的制作。出了散文诗集一册，名《森涅利亚》（Senilia）。他的思想感情，多表现于此。自然之诗，可见其厌世的思想，阈上一篇，亦可见其革命的精神。而其辞华照耀，情性呼吸，尤极可不朽。

丹麦批评家皮兰特尔（Brander）批评屠格涅甫说：“屠格涅甫是悲观的，又是爱人的，所以他的文情尤为富美。他又多经世事，既没有法国文人之流于玩世，也没有英国学者之好言教训。他所写的都是平常的事情，不涉奇异，或龌龊。大抵以贫苦怯弱，心意不固，颓唐无聊之生活为主材，写其内心的悲剧。但与杜思退益夫斯基又不同。杜思退益夫斯基写显著的罪恶忧患，而屠格涅甫则写不幸的人的隐默的悲哀。”这几句话，实可以把屠格涅甫作品的性质，完全的表现出来！而他的艺术的天才，尤为

超越一切。克鲁把秃金（Kropotkine）[1] 说：“从小说之艺术的完密，和美丽来看，屠格涅甫恐怕要算一世纪中最大的小说家了!”

屠格涅甫于一八八三年死于巴黎。在盛大的葬仪里，他的朋友罗南（Kenan）对众演说道：“他是全人类的化身；全世界居于他的心里，藉其口以发表思想。”

祝福这个全人类的化身!

四　改造时代的诸作家

改造时代的作家最著者为屠格涅甫。与屠格涅甫同时的有龚察洛夫（Ivan Gonskarov）（1812—1891）。

龚察洛夫生于商家，与屠格涅甫之出于华门贵族者有异。其作品的材料，与著作的态度，也与屠格涅甫不同。他生活于清静的城里；板屋数椽，小园一所，沟池绕于前，古木挺于旁，栏杆曲折，修道蜿蜒，鸟声清幽，梨花自落，极闲暇自得之至。其后就学墨斯哥，为宦于京中，风尘碌碌，寝忘故乡。而作品之中，则犹存这种的风致。

与屠格涅甫丰富的著作生涯正相反的，乃是他的作品稀少。他在四十五年的文字生涯中，所做的止有三种小说。但每种都是很长的。屠格涅甫的著作多言乡村的生活，龚察洛夫则叙述都市的生活。他对于圣彼得堡的城市与职业的问题，谋解决的方法。在《日常的故事》（Every day story）里他想出一个办法；在《阿蒲乐莫夫》（oblomov）[2] 里，他又想出一个正相反对的解决，而在《山崩》（Landslip）里，他则混杂这二种办法，——简直的成

① 克鲁泡特金。

② 即《奥勃洛莫夫》。

了完全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日常的故事》(Every day story) 出版于一八四七年。叙少年安迪夫 (Aduev) 自本乡至圣彼得堡脑中满贮诗思、爱情与友谊。在这个地方, 他得了一个职位, 他著作了好些文章, 遇见了无上的爱神, 终乃与之结婚。以其勤劳, 得由州顾问, 迭升而至枢密顾问。书中叙他的日常的生活, 称为逼真。

《山崩》(The Landslip) 出版于一八六八年。这本书他在一八四九年就着手著作。因为要完成《阿蒲乐莫夫》的缘故, 致中断很久, 至一八八六年始告成书。因此他当中所叙的大半仍是四八时代的事实与社会状况, 与当时急进的社会, 很不相似。这本书所叙的, 乃非都市而为乡村, 书中的主人翁乃非官吏而为一个艺术家; 一个感情强烈, 思想明澈的艺术家。他的名字是拉斯奇 (Raisky)。他毕生致力于艺事, 然于艺术竟无一所成, 于生活尤为困苦。他试验了许多种的事情, 但没有一件能精熟的。他时常很正确的, 很谨慎的解剖他自己, 而有时则如小儿之幻想, 之柔弱, 没有意志, 没有胆量, 肩力。这本书普通又名为《艺术家》(The Artist), 是一个利己主义的小说 (ego - novel)。当拉斯奇百无聊赖的时候, 忽想起他的祖母与他的姊妹麦莎 (Martha)、弗娅 (Vera)。但她们都不大理他, 他遂失望而出走至意大利。书中陪角至少, 所叙的差不多每页都是拉斯奇。而其心理的解剖及他的写景的微妙, 使之得了永久的价值。

他的著作最著名的还是《阿蒲乐莫夫》(Oblomov)。此书的一部分曾于一八四九年刊行。至其全书, 则到了一八五八年才出现, 共有四册。书叙阿蒲乐莫夫是一个有三百五十个 "灵魂" 的遗产的人。后来到圣彼得堡做一个官厅的秘书。从大学里, 他所得的不过是各般的名字, 日期, 事实, 经济学, 数学及其他的真理, 问题, 各种学问在其脑中。做了二年的秘书, 他即厌弃而

去。不久并世事亦不预闻；以世情为危险，满怀着危惧之心理，成了一个懒人，终日躺在“沙发”上不动。好像即使天花板塌下来，他也是不肯移开一步似的。心里非常的沉闷忧郁。他有一个朋友斯多尔兹（Stolz），是一个强毅，活泼的人，见他这个样子，非常的代他忧愁，想尽种种的法子引他开心，引他活动，但终无效。末了他想以爱情来打动他，要叫他娶那个有意识的，热心的管家妇亚尔加（Olga）以改变他的生活。其初阿蒲乐莫夫亦为所动，稍易其向来举动。不久，又复沉闷坐在沙发上更加颓唐了。他们遂不得不离之而去。这种烦闷的生活俄国人是遇见的，阿蒲乐莫夫的气质，他们是总带有一些的。杜蒲洛博夫（Dobrolyubiv）因为之做《何谓阿蒲乐莫夫气质?》一文，以解释之。此后，“阿蒲乐莫夫气质”一语，遂成形容俄人特殊气质的一个名词。大家也因之十分危惧，想除去了自己身上的“阿蒲乐莫夫气质”。龚察洛夫此书，实是“新时代的兴奋剂”，使人自觉沉闷无为的生活危险，其功绩非常的伟大!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龚察洛夫随驻日公使，环游地球一周，至日本而归。作了一部《柏拉达（Pallada）游记》。其形容东方生活之真实，活泼，言论之生动有趣，即小事琐节，亦描写无遗，可以算是俄国文学上一部最好的游记。龚察洛夫的作品，可以与屠格涅甫并驾齐驱。他们都是述写日常生活的。虽然龚察洛夫不如屠格涅甫之思想高超，观察精审，而其小事之注意，描写之细腻，则为屠格涅甫所不及。

与屠格涅甫略同时，而以描写农人艰苦，与屠格涅甫并称的有格利郭罗肥契（Grigorovich）。他是富有同情心的。《村》（The Village）之一篇，与屠格涅甫《猎人日记》并名于世。这一篇东西，是俄罗斯第一阵的仁慈的春雨，第一滴忠的人类的眼泪。而农人所有的思想，亦由格利郭罗肥契轻妙的笔端表现而出，留至

深固的根柢于俄罗斯的文学和社会里。

在《村》这篇小说里，叙得是：一个地主，因为他的年轻的妻子，没有看见过农人的婚礼，就把一个孤女，强迫的叫她与一个小康的农家结婚。此不幸的人，不久即因之致死。他妻子听见了这个消息，很不好过。但他却毫不经心，反以言振作他妻子的勇气。这种没有心肠的恶剧，真是惨无人道！其后遂食其报。而农民之俯仰从人，一无自由之痛苦，乃于此曲曲绘出，陈述无余，稍有人心的人读之，没有不油然生怜悯同情心的。这篇小说出版的时候，也是一八四七年，恰与《猎人日记》同时。

与《村》的情事略同的，有一篇较长的小说《迁居者》(The Migrants)，叙一个地主迁移他的农人至百里外一个乡村之事。叙来也非常的凄惨。又有《渔人》(The Fisherman) 一篇，则与工人农夫的生活正相反映。格利郭罗肥契写景的天才，于此叹为观止。不久，他的第三篇伟大的小说又出现。这篇小说的名字就是《乡间之道路》(Country Roads)。中间不复叙农奴之事，所记的是改革时代前的小地主的生活。以机警的文笔，快活的辞调，描写那个时候的人之无忧无虑，无机也不想明日事的光景。自此文出，格利郭罗肥契搁笔不复作，直至八十时代，始有《探险家》(The Adventuner) 及《仁善的跳绳者》(Acrobats of Beneficence) 之作。所叙的都是城镇的生活；乡间之景色，地主之家庭，都不再讲到了。这几篇东西，虽然不能完成他以前的成功，然热肠善感，犹蔼然如见，终没有消灭掉一些。

对于天然的景色，没有提到，而专以忧郁凄苦的音调，描写当时圣彼得堡及他省的贵族官吏之可笑的，残忍的行为的，有著名的厌世主义的文学家辟塞姆斯基 (Pisemsky)。不幸的结婚的事实，在他著作里，很常看见。虽然他自己结了极快活的婚姻，而全人类之不快，乃时扰乱其人道的心胸。即在他的第一篇杰作

《悲惨的运命》（A Better Iot），一篇叙农家的戏曲里，也可见这个不幸的事实。一个农夫……工作后，至都城，竟弃了他的妻子在乡间。他描写他们的事实，极为真切沉痛，可称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除《悲惨的运命》外，他又著了一部《千人》（Thousand Souls），也得了很大的成功。《千人》里的主人喀林纳肥契（Kalinovish）的性情，有些像契契柯夫。他能耐极高，家里又富，常常作奸犯科，他实在是契契柯夫的超越者；不是道德高出于他，乃是他的能力比他伟大。他的谨密，他的机警，都比契契柯夫强。这个足以代表改革时代的人与改革前的人的不同的地方。一八六二年，他又出版了一部小说，名《扰乱的海》（Troubled Sea），表现出当时辟塞姆斯基趋于急进的气象。虽然当时不为急进的批评家所注意，而其价值则至高。这部书共分二部分。在第一部分，叙沙萨（Sasha）童年，少年及结婚时的事情。在家里，他的溺爱的母亲，常耳语他，说："沙胜喀，儿子，不要念书，你要病的；沙胜喀（Sashenka），儿子，食；沙胜喀，儿子，打这个圉人——他怎样敢对你粗鲁无礼！"在大学的时候，他恋爱了一个卖弄风情的女子，不久又恋爱了第二，第三个人，沙萨所有的好性情，好心肠，好头脑，至此都已沉沉的睡去。第二部分叙他一八五七年以后的事。当时天灾流行，战后又出，国内终日扰乱。及诸事都平静，而这个农业国的人民，至于不知大麦怎样长成的。这个不幸的国家具全了各种的罪恶，在辟塞姆斯基沉痛的笔下，曲曲绘出，令人读之感伤无已。除了这三部大著作以外，他又有《理财的智人》（Financial Genias），《柏哀尔》（Baal），《城市的人》（Townfolk）等诸作。

自此以后，"有主义的小说"（Novels with a purpose）盛行一时，分为二派，互相攻击。一派是急进的（Radical）一派是守旧的（Reactionary）。在前一派的著作里，最著名的要算察涅胜夫

斯基（Chernyshevsky）[①] 的《怎么样做呢?》[②]（What is to be do?）了。这部书登在一八六三年的《当代》杂志上。虽然在艺术上的价值稍差一些，而其真价实别有在。他在这部书里指示未来社会的组织方法。略言：茉拉（Vera）与洛甫克霍夫（Lopukhov）私订婚约，背父母逃去。不久，他们间的爱情忽冷。茉拉又倾心于洛甫克霍夫的友人克尔沙诺夫（Kirsanov）。他因假装自杀，买舟至新大陆。茉拉与克沙诺夫遂结婚。过了几年，洛甫克霍夫自美国归，又娶一妇。与茉拉、克尔沙诺夫仍维持朋友的关系，过往不绝，共度其理想的生活。这部书，把当时一切的家庭罪恶及伪道德，破坏无余，另谋解决的办法，实为这个时代里一部最有价值的"有主义的小说"。他又是一个当时的大批评家。主持《沙利门尼克报》（Sowremennik）的时候，做了许多关于文学上有价值的批评的论文。而当时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各方面的事情，也都经过他的清明的头脑，锋利的笔尖的批评。

与察涅胜夫斯基同为急进派的中坚，而最擅长于批评的文学的，又有杜薄罗留博夫（Dobrolyuboff）。他的《暗澹的王国》（Chomnoe Zharstwo），一部评论的文集，留不朽之名于后世，对于当代——将来——的文学界极有贡献，称倍林斯基的继起者。

除察涅胜夫斯基与杜薄罗留博夫外，俄罗斯改造时代的批评的文学家，还有辟刹利夫（Pisarev），格利加利夫（Grigoriev），斯德拉克霍夫（Strakhov），浮龙斯基（Uolynsky）及米利志加夫斯基（Merezhkovsky）诸人。格利加利夫与斯德拉克霍夫唱"有机的批评"，"□□□□□□□"之说，浮龙斯基及米利志加

① 即车尔尼雪夫斯基。

② 《怎么办?》

夫斯基树艺术的与理想主义的批评之帜，于当代都各有影响。而辟刹留夫尤为杰出。他完成了察涅胜夫斯基与杜薄罗留博夫的事业，以“艺术的破坏者”著称。他初以批评《父与子》一书得名。后来益趋急进。对于一切的旧道德，旧艺术斥摘不留余地。打破以前的理想主义的人生观，而代以现实思想的人生观。力引文学与人生相近。否认一切的艺术，而以切于人生的文学为主。时人因奉以“艺术的破坏者”之名。他的学说至托尔斯泰起，乃大畅其流，“人生的艺术”之呼声，亦日高，其影响之及于俄国文学界者至大。

急进派的文学家做“有主义的小说”的，还有美克黑洛夫(Mikhailov)，他喜欢著写少年时代的生活。他的著作，以《朽烂的沼泽》（Putrid Marshes）与《我在杜尔柏特的读书记》(When I studlied at Dorpat）为最著名。但他的艺术，终不如察涅胜夫斯基的《怎么样做呢?》的精彩。与他患同样毛病的，又有杂沙杜斯基（Zasodomsky)。他的《史美尔林村的史记》(Chronical of Smurin Village）也是著写理想生活的著作。

李斯加夫(Leskov 他常自称为 Stefnitsky)的《无路可出》(No Way Out)及《刀》(To the Knife)与克鲁陕涅加夫(Klushnikov)的《蜃楼海市》(Mirage)也是急进派文学中的杰出者。《蜃楼海市》出版于一八六四年。书中的主人是一个四十年代的女儿。因她父亲的意思，同她兄弟一同投身于革命运动中。她的兄弟为政治的原因而牺牲。她初为物质主义者，后为虚无主义，终乃转而为国家主义者，而最后则痛自忏悔，于未来抱无限的悲观，于人生兴无味之叹息。李斯加夫的第一部著作则出版于一八六五年。书中所叙的与克鲁陕涅加夫的书略相似，也是说那些社会主义的理想者，因觉悟圣彼得堡的虚无主义的道德的破产，而投身于政治革命的运动中的事实。不久，《刀》出版，则李斯加夫已完全弃了

虚无主义了。以著作的天才论，克鲁陕涅加夫与李斯加夫殊不让辟塞姆斯基。著写之真切，文彩之清新，诙谐之言间作，讥刺之意暗含，亦足以使读者神移心往。

自“人生的艺术”之说盛行，小说乃不复为艺术的作品，而为传播思想，革命运动的一种器具了。文学因受其影响，颇为不振，在这个时候，所有算为文学家的，只有芮陕特尼加夫(Reshetnikov)，波姆若罗夫斯基（Pomyalovsky），李佛托夫(Levitov)，乌斯并斯基（Gleb Uspensky）诸人。

芮陕特尼加夫（Reshetnikov）之得名，由于他的小说《波特利波夫特塞》（Podlipovtsy）。这部书在一八六四年登在《当代》杂志上。他的著作里都含有“什么地方更好?”的疑问。这个小说，也是一样。一个农人弃其田地而求更好的工作。他做了铁匠，做了铜匠，曾在金矿里作过工，也曾建筑过铁路，但“什么地方更好?”的疑问，仍继续的留在他的心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他著写这些可怜的，无依赖的，挨饿的工人，非常的惨苦动人。《一个人自己的面包》（One's Own Bread）里言：一个幼女，因想自己挣得面包，大家以为是犯了不可告诉的过差。他因此连针线也不拿了竟跑到圣彼得堡来。这是他自己妻子的实事。对于当时旧社会的无理的压迫，他写来实有无限的感伤。虽然这部小说，所叙的都是当时的实事，极能表现出这个时代的生活实际，但无谓的事实过多，人物也太混杂，在艺术上占不了什么很高的位置。

波姆若罗夫斯基（Pomyalovsky）从事于著作的生活，只有三年，即自一八六一——六三年。《倍萨（Bursa）之山光》，他幼年时代受教育的神科学校，都在他的笔下，活活泼泼的现在我们的眼里。但他所写的又与鄂歌黎不同。鄂歌黎写来使人发笑。他则使人深思，不自禁的生思乡之梦，其杰作《莫洛托夫》

（Molotov）也表现出这些色彩。

李佛托夫（Levitov）的著作，叙述乡村街市的悲苦，包含前人的所长。他是生于乡间的，所以他著作里每回叙到他少年的生活的地方；他的以后的生活，又多在城市里，所以他对于城市的贫苦罪恶，也一一的知道。《草原杂记》（Ske tches of steppe）叙他幼年的生活，极为详细，活现出一个天真烂漫的儿童在纸上；而于当时的教育情况及一切事务的改革，也记得极真实，天然界之美，尤时时现于书里。实是一部有真价的著作。他在他的著作里，常作悲苦之音，妒忌别人的快活。其后，作风忽变。易而为忘记他人的罪恶，与同情的人类怜爱的辞调。他同时又立了一个最好的俄罗斯人的理想。自此悲观之意烟消，希望之心云涌了！

在这几个人中间，最好的文学家，要算是乌斯并斯基（Uspensky）了。他是叙述农民生活的。他的《拉斯特拉夫街的道路》（Ways of Resteraev Street）写工匠、铁匠的困苦生活。他们的身血，为主人所吸干，致喜欢饮酒，丧其所得的工钱，不留一个。里头所有的话，都是从人道的心室中流出。这本书初次也登在《当代》杂志上，及《当代》杂志被封，他的续稿，改在一本妇女杂志上发表。其中富于诙谐滑稽的辞句；悲哀的讥刺尤多。这也是他的特色之一。后来出版的《国外的通信》（Letters from Abroad）（他1877年到西维亚 Servia 去）也是富有这种辞调的。但自他自国外归来后，他的思想，他的观察，全都变了。他定住于中俄，深知农人的生活与他们的性情。他竟变成了一个厌弃农人的人。他说：农民是自私自利的，是残暴的，……以前的农民作家，专从农民好处叙写，他则一易而专从不道德的方面去观察农民的生活和情性了！这也是他的特色的地方。这种意见，他全在他的《土地之力》（Power of the soil）中发表出来。

除这些人以外，兹拉托夫拉兹斯基（Zlatovratsky）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基础》（Foundations）出版于一八八四年，也是叙写农人生活的。但他的观察又与乌斯并斯基不同。他是以厌世的，定命的眼光来观察农人生活的。又有美尔涅加夫（Melnikov），他在一八六八年——七四年，出版了两部小说，一名《在森林里》，一名《在山上》（In the Hills），都是很好的。麦明（In the Forests Mamin）的《史肥特洛夫》（Svetlov）叙他自己少年时的环境与事实，与读者以很深的印象，可以说是一部自叙传。他的诗《生命之歌》（Sings of Life）也是可以在文学上占很高的地位的。又有《柏柏来金》（Boborykin）。他是小说家，戏剧家，批评家，理想家，也是一个当时的史家。他最初学化学、学医药，后来才转事文学。他是一个文化崇拜者，对于法国的文明，仰慕尤甚。他的《小说的原理》一书，也博了不少的好声。

在改造时代里从事于历史小说的著作的，有杂格斯金（Zagoskin），拉兹涅加夫（Lazhechnikov），克加尔涅克（Kukolnik）及助托夫（Zotov）诸人。而助托夫的《Myrterions Monk》尤为杰出。小俄人加斯托麦洛夫（Korsomasov）的历史小说也自可观。而邓涅利夫斯基（Danilevnky）所作尤多，文名最盛。如《新俄罗斯的逃亡者》（The Fugitves in New Russia）、《逃亡者之归来》（Return of the Fugfitive）及《自由》（Treedom）等，都是叙农民苦奴制之残虐而逃亡的历史。过了许多时候，他又出一部小说名《第九个浪》（The Ninth Wave），叙 Orthodox 教会的尼庵里的生活。到了最后，邓涅利夫斯基始从事于历史小说的制作。他的《墨斯哥之火》（The Burning of Moscow）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先驱。在这个时候，从前从事于历史的制作的莫尔杜夫特西夫（Mordovtsev）忽易而从事于小说的编纂，与邓涅利夫斯基的趋向正相反。他的小说都是写哥萨克与小俄罗斯的

故事的。最著名的有《杂黑达契涅》□□□□□□□《皇帝与哥萨克大将》（Tsar and Hetman）及《麦美依的战场》（Battle field)。而最大的成功则为沙利阿斯公爵（Count Sallias de Tournemis）的《辟格超夫兹》（Pugachovtsy）。这部书出版于一八七四年。他的文学才能本来是极高的，做这部书的时候，又非常的慎重，所以博极高的名誉。以后他又出版了许多的历史小说，如《一百万》(A Million)，《奥洛夫公爵》(The Counts Oriov)，《诗人陶泽文》(The Poet Derzhavin)，《阿拉克契夫的儿子》(A son of Arakcheev）等，虽然也很有名，但终逊《辟格超夫兹》的精彩了。在这些人外，诗人、批评家、论说家的美莱兹加夫斯基（D. Merezhkoysky）也做了两篇历史小说；一篇是《上帝的死》(Death of the Gods)，一篇是《上帝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Gods)。在这许多历史小说里，所叙的算是很别致了。而研究的湛深，时代和思想之不失原样，在文学中也是极少见的。

改造时代的文学史上，又出了好些女文学家。加德邻二世是一个很好的女文学家，达希加敷公主（Princess Dashkov）继之，得名最盛，久而不衰。当时还有孚尔孔史基公主（Princess Volkonrky）和史茱卿夫人（Mme Svechin）崛起而反抗罗马教派(Orthodaxy)，于文学上也很有贡献。关于爱情及家庭的小说，是那个时候的女著作家最常做的。第一等的是加霍孚卿史基女士(Mlle Khovshchinrky）所做的小说。她的假名是克利史托孚史基(Krestovrky)。但并不是著《彼得斯堡的幽窟》（□□□□□□□□）的克利托孚史基，也不是他的女儿克利托夫斯基夫人，她也是一个女著作家，我们要注意，不可把她们混在一块。自一八五〇年以来，加霍孚卿斯基女士，居于省城，始从事于悲惨的家庭故事的制作。所叙的多半是有情的人，为其无情的，专

制的母亲所压制，或社会的专制，她的讥嘲非议，以及男子的专制等事。其后，她的心境渐宽，进而描写现代的男女，但她总脱不了她的厌世主义。对于现代的一切的伪君子，尤为痛恶。在每字每页里，她的人道的同情，对于一切不幸的事，充满其中，使读者也不禁油然生出同样的情感来。较加霍乎卿史基著作较少的有苏克汗史基夫人（Mme Sokhanrky）。她是斯拉夫党中一个很有力量的人。茉涅兹基夫人（Mme Vinitrky）和霞披尔夫人（Mme Shapir）的小说，虽然也人物过少，思想贫乏，平容平浅，犯了女小说家的通病，然其心理或感情之描写或解剖之细密，则有其触到之处。至最近的时代，德美特丽华（Dmitrieva）的著作，独真率异常，有男子气。她是一个平民，是一个农奴的女儿。她以社会的色彩，渲染农家的实事，没有一切女著作家通行的多情多愁的毛病。介于小俄与大俄两条文学界线之间的有马加浮府雀克（Marko Vovchok）。她的原名是马丽亚·马加肥契（Maria Markovich）。世人称她为小俄的辟超施拖（Beecher Stowe）。在一八五九年的时候，她与屠格涅甫同译小俄农民杂记为大俄文。这些杂记，描写农奴时代的光景，痛恶地主之专横，而于农奴之困苦，则表深溥的同情。虽然同屠格涅甫与格利郭罗肥契的著作，有同样的性质，而当时之人，殊忽视之。因她显露她的幻想和描写的不自然的弱点，所以遂不能有十分大效力；在现在知道她的人，止有小俄的文人学士而已。她以后所作的许多小说、故事的作品，也不能有永久的价值。梭若·加乏丽斯加夫（Sonya Kovalevsky）和马丽亚·白喜克兹夫（Maria Bashkirtsev）对于俄罗斯文学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她们一个是科学家，当数学教授，一个是技术家。她们两个人的著作，都是有一半用别国的文字写的。而加乏丽斯加夫女士的《女虚无党》（Female Nihilist）尤有价值。白喜克兹夫女士所作，更多趣味，多感情，多

悲音。比较以前的一切女著作家，综而观之，斯拉夫妇人之受现代生活，现代思想之影响，而有功绩于文学，比较她们的条顿或罗马的姊妹更多。将来的发展，正未可量吓!

在这个时代的最后，还有一个最大的讽刺家出现，不可不简略的叙述一下。

这个大讽刺家就是萨尔条加夫（Michael Saltykov）。自格利薄哀杜夫（Grifocdov）、鄂歌黎后，俄罗斯的讽刺文家，久不出现。六十年代的时候，修克霍孚加蒲林（Sukhovo Kobyhin）的《三连剧》（Dramatic Trilogy），和罗辛汉（Rosenheim）的《中产阶级的抒情诗》，略树讽刺文学之帜，为萨尔条加夫的先声。萨尔条加夫当学生时代，曾努力步武普斯金，想以诗人名于世。后忽中变其志，如杜思退益夫斯奇专以描写平民的生活为事。终以此得福，遣戍于佛若特加（Vyatka）。在这个地方，他写所闻见，作《吏治杂记》（Governmental Sketches）一书，载在一八五六年——五七年的《使者》（Messenger）杂志上 。此后仿之者甚众。到了六十年代，他遂专从事于讽刺文学的著作。他的作风和态度，也变了好几回。初则为使人笑的目的，而做引人笑的文学作品，继则渐趋严重，至于悲音哀调，充塞字里行间；奴制之残虐，农民之艰苦，胥为其构成的材料。自此不复更使人笑，而使人欲哭了！他的著作极多，玉石混杂，有极好的不朽著作，也有“明日黄花”的应时文字。他的有永久价值的著作，有《俄罗斯创造记》(To Founding of Russia),《摩尔擦林第二号》(Molehalin NO. 2),《边境的横越》(Ocross the Frontier),《古昔的波札克霍尼亚》(Olddays of Poshonia),《格罗夫绿敷夫人》(Messrs Golovlov),《圣诞前夜》(Christ's Night)及《圣诞的故事》(Christmas Story)等。除最后二篇外，其余全带些悲观、失望的意念。以文学的价值论，则《古昔的波扎霍尼亚》和《格罗夫绿敷夫人》二篇为最著。他

的文学生涯，差不多有半世纪之久。社会的侧面，差不多都给他宣示出来了。他是俄罗斯的史佛勿德（Swife），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大的讽刺家。同时他的文才，也是可列在第一等的。批评家每以他与托尔斯泰与杜思退益夫斯基并称为俄罗斯七十年代的三大文豪，他的伟大，他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未完）[①]

（原载 1920 年 7 月 15 日、8 月 15 日《新中国》第 2 卷 第 7 期、第 8 期）

① 本文至此因故中止。

史蒂芬孙(R.L.Stevenson)[1]评传

继史格德(Sir Walter Scott)之正统而续新旧浪漫主义于一线者，有罗勃得·路易·史蒂芬孙(Robert Louis Stevenson)其人；虽不能数之于近代新浪漫主义诸作者之列，然而实开其前锋者也。史蒂芬孙之出也，正当浪漫主义为人厌弃，写实主义方代之而兴，如初升之日，光芒四射，举世被其照之时；其砥柱中流，存遗徽于一线，诚有所不易者！而其孤芳自赏，独起独行之慨，亦足以有称于世矣！菲尔甫(Phelps)论之曰：“史蒂芬孙度其一生有类于孤零而寂寞之小儿，自弄其游戏。”又曰：

“史蒂芬孙之以小说家自见，诚为冒险之举。其陈旧，有似退休之兵士。彼不期而栩栩然出现于近代诸小说家之中，有类于依利沙伯时之武士之出现于近代之画室中。当其置《宝岛》(Treasure Island)于文学之地图上时，正当写实主义在各处波涛汹涌，极起伏之至之时。无论何处，写实主义皆为其标准之方式，少年之作者无不争先恐后以仿效之。左拿(Zola)亦在一演说中言曰，‘史格德死矣，史格德之文体，亦随之而俱亡矣！实

---

① 即史蒂文生(1850—1894)英小说家。

验之小说正与科学之思想携手而前进。’多数之人皆信左拿此言为真理。此种事实，对于史蒂芬孙诚为可怕之挑战，而彼则以勇敢之精神受之。其第一部之小说之名称，《宝岛》，正如旗帜之飞扬。批评家见之者多微笑而摇其聪慧之头，以为如此笨事之出现，是否恰当其时乎？而史蒂芬孙则固甚自知其所为之事者；在近代之小说中，彼觉不耐，且病平易，正如一小童被围于一群之年长者，其谈话毫不足以引起其兴趣。在《宝岛》出版后不久，史蒂芬孙曾邮一函于亨利（Mr. Henley），极足以显其心意……‘余欲一冒险之书——一部传奇，而无人能得之或为余作之。……’时代正不相连接；然史蒂芬孙则出而正之。彼邮此信后不七年，近代之‘浪漫的复活运动’（Romantic Revival）遂开始。至其死之岁（一八九四年），此运动已至弓弦满张之候矣；无人不读史蒂芬孙之作，且亦无人不读《盛达之囚人》（The Prisoner of Zenda）《法国之君子》（A gentleman of France）《红袍之下》（Under the Red Robe）等书矣。此种当年流行之小说，无论我侪以其文学上之价值为何如，而此变迁之颇有益，则无疑也，而史蒂芬孙之影响，对于此变迁之负责，较他人为尤甚，则亦无有疑者。此固无人不承认者：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The Athenaeum》杂志上，一批评家言曰：‘英国今日之小说之浪漫复活运动实以史蒂芬孙为其领袖……’史蒂芬孙为一萌芽之作者，在英国散文小说史中，将常占一重要之地位。……”

菲尔甫之言，诚可为深知史蒂芬孙者。我不必再费辞以论之矣！惟欲进一步而知其著作之价值，则不得不先略述其生平：

史蒂芬孙于一千八百五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于苏格兰之都城爱丁堡（Edinburgh）。其家世为工程师。祖父名罗勃得·史蒂芬孙，父名汤麦士·史蒂芬孙，皆工程师也。父祖名誉，震于当时。三岛险恶海岸外之灯塔，多半为二人所建筑。史蒂芬孙为其父母

之独子，其父则欲其世其业，成一工程师及科学家，其母则欲其成一苏格兰之哲学家，或总长，然而史蒂芬孙之天性则殊不近于此等事业。所好者惟文学耳。

史蒂芬孙生而孱弱，颇多病，其喉与肺之疾，则遗传自其母。其生命之所以能保存而至于成立者，其母与其乳母爱俪孙·克妮旱（Alison Cunningham）慎重将扶之功也。儿时体虽弱，而脑则甚健。一可爱且具有极活泼之想象之儿童也。

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间，史蒂芬孙皆在爱丁堡学校肄业。初进预备学校，继入爱丁堡中学。此数年间在其外祖父家甚久。其嗜好小说之习惯，实于此养成。于校课，不甚下钻研之功，然其教师则皆甚悦其可爱之形貌与天才。于他事虽懒惰，而于著作之事则工作甚勤而极少间断。自入爱丁堡大学肄业，工程学校法律之实习皆无大成绩，而文学则益进而至于占领其脑筋之全部。

史蒂芬孙于文学之嗜好既深，则进而执笔自为之。自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后，身体颇健而少病，文学之作品因以颇多。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出《国内旅行记》（An Inland Voyage)。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出《乘驴之旅行》（Travels with a Donkey)。于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出诗集二卷，及《谎言之故事》（The Story of a Lie),《新天方夜谈》（New Arabian Nights）等。

在此时期，史蒂芬孙又作南欧之游。于此遇奥斯逢夫人(Mrs. Osburne)，深堕情网而不能自脱。自夫人回加利佛尼亚(Oalifornia）后，史蒂芬孙忽闻其病危。因立即航大西洋而至旧金山以探视之。以缺于资斧故，凄息于下等舱中。身体因大受其害，竟得一极危之病。然此次海行，史蒂芬孙虽因以病，而所获实多。一则增进见闻不少，文学之材料搜集极多，二则自其病愈后，奥斯逢夫人感其情，竟以身嫁之也。

史蒂芬孙自娶夫人后，即偕夫人及其前夫之子复回英伦。身体又渐弱而多病。然其文学之脑，犹不因病而枯，仍出产不稍息。于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出《宝岛》（Treasure Island）及《The Silverado Squatters》。于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出《儿童之诗的花园》（A Child' s Garden of Verses）及《新天方夜谈续编》，于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出《亲王亚图》（Prince Otto），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出《犹克尔与亨特之奇事》（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及《被拐者》（Kidnapped）。

史蒂芬孙之父死于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自其父亲死后，史蒂芬孙遂与其家族渡海而至美洲。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之冬，此家族遂定居于阿地龙达克（Adirondacks）。史蒂芬孙在此身体甚健，为《史克来纳》杂志（Sci bner' s Magazine）作论文甚多。同年之春，（按此为阳历，非中国之旧历，故一年之中岁首为冬，春则反在其后）全家皆作海游。环南方之海一周。南方之岛，皆遍历而登览。终至萨摩亚（Samoa）之弗利麦（Vailima），爱其地，遂定居焉。史蒂芬孙于此地至有兴趣，于其政治之活动，亦身预其间。萨摩亚地在热带。热带之气候，于史蒂芬孙至宜也。因此，其文学之创作力遂更强盛。自始至以至于死，岛居之作品至多。约而举之，则出版于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者有《愉快之人及其他故事及寓言》（The Merry Men and other Tales and Tables），《林下》（Underwoods），《追忆》（Memories and Portraits）等；出版于一千八百八十八年者有《黑箭》（The Black Arrow）等；出版于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者有：《误箱》（The Wrong Box），《白伦特莱之主人》（The Master of Ballantrac）等；出版于一千八百九十年者有：《民歌集》（Ballads）等；出版于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者有：《平原之横越及其他记事及论文》（Across the Plains; With other Memories and Essays），《历史之注脚》（A Footnote to Histo-

ry)，及戏曲三篇：Deacon Brodie，Beau Austin 及 Admiral Guinea 等；出版于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者有：《岛中之夜宴》（Island Night's Entertainments），《喀特利娜被拐者之续编》等；出版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者有：《自杀会与拉约之钻石》（The Suicede Club and The Rajah's Diamond）等。尚有属稿而未竟之二书：一曰《赫美斯登之水闸》（Weir of Hermiston），一曰《圣依夫斯》（St. Ives）皆小说也，与其《弗利麦之尺牍》（Vailima Letters）并于其死后始出版。

政治之变更与身体之日弱，限止史蒂芬孙著作之时间与能力，然而彼为其萨摩亚之同志之爱与评赏所鼓励，仍力疾伏案执笔不已。惜天不假年，竟使之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突然中风而卒。卒后即葬于萨摩亚。此十九世纪之英国最后小说家遂已矣!

然而史蒂芬孙虽死，其孤芳自赏，甘寂寞而自守其所信之气则不死，其以孱弱多病之身，而永久奋斗于著作旅行之间之无穷的生活力则不死！史蒂芬孙信足以传矣！

人之欲乐其生也，必先爱之；而世之爱其生者，殆莫史蒂芬孙若矣！史蒂芬孙曰："为一愚人尤胜于死。"世界之于彼，殆无处非入画之风景也。不论其在爱丁堡船樯错立之地，在台浮（Davos）白雪无涯之处，或在萨摩亚炎热极甚之天，彼皆乐之，爱之，赏玩而赞美之。一友人曾问之曰："萨摩亚何在?"史蒂芬孙答曰："出金门（Golden Gate）即向左转。"此言足以生愉快之想象于人之心中，以一见即可测知其无边无际之状也。

史蒂芬孙之肉与灵之生活，俱含冒险无畏之气概，且每作一事无不以无限之热心始之，无限之热心终之。其以一驴出而游历也，人无不爱之者。同行之人至于因羡而生妒。即在其为孱弱之身体所迫，不得不出而求健康时，其出发也，仍异常热心而有甚

高之兴致，一若出而寻求宝矿者。其所为殆无一不带冒险，其结婚即一冒险之尤之举动也。其读书也，亦以与出而飘游，或荡桨于小舟之上之同一之热心从事之。每得一新出之小说，必以探险者之精神开卷读之，以无人能先知书中之所遇者究为何等之人也。有威廉亚超者（William Archer）曾寄萧伯讷（Bernard Shaw）之小说，《喀赛尔·摆伦之职业》（Cashel Byron’s Profession）一册与之，史蒂芬孙则从沙拉那克湖（Saranac）上裁书答曰：“……余酷爱巴喜茉尔（Bashville）——余能永远读之……——世间仅一巴喜茉尔而余则其忠仆也……”文人之能服善者，以史蒂芬孙为最甚者矣！

史蒂芬孙虽卧病，而其精力仍健。尝倚枕不能起，而其注意力则不因出血而分散，其心神仍住于优美光耀之昼梦中，其脑之舞台上仍纷纷扰扰而不息。昔彭琼生（Ben Jonson）尝于其足之拇指上，见罗马与加挞基之战争，无穷无尽之军队横越而过此。史蒂芬孙之脑中亦犹是也。世间无一苦痛或一疾病足以扰之，战胜之。其心常在山水明秀，逸趣横生之地。惟其爱生之挚，斯其乐天无闷欤？其在著作之时，似有两重之心意，（Double Consciousness），一面铸造字句，以大艺术家之心，推敲不厌苛细；而同时则放心于事物之中，觉海风习习，其所描写之英雄将即下其舰上之航矣。

史蒂芬孙之遭遇颇为不幸。从事著作二十年，惟末八年来，其名始传于民间。前乎此，其所刊行者，如《国内旅行记》、《乘驴之旅行》、《新天方夜谈》乃至《宝岛》等，在文学上之位置俱甚高，而当时竟不能得人一顾。其姓字如明镜之蒙载厚尘，尚暗然无闻于世也。以如此善于交友之人，如此热心赞许当代文人作品之人，如此爱此圣愚杂处之世界之人，而所受之报酬，乃为弥漫四塞之卑视，亦一奇事也！直至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犹克尔

与亨特之奇事》一书出版后，史蒂芬孙之名始渐齿于人口。此书以深锐之刺激力，与宏大之道德之辞战胜世人之心。自此以后，其名乃蒸蒸日上矣！当时史蒂芬孙曾编戏剧数种，虽召失败，而当代歌舞于戏台上之千百人则皆受束缚于其小说所造出之近代道德。此亦足以踌躇满意矣！殆其最后数年，求睹其著作者日多，竟有不能不刊行“全集”之势。以如此短少之时间，而声望忽一涨至此，亦文人所少有也！

世之作者，有受少数爱读者之欢迎者，亦有为大多数人所喜而无甚声望者。前者如诗人铎安（Donne），散文作家白朗（Browne），甚为有贵族风味之骚人淑女所宝贵。后者之作家甚多，无须举名，其所欢迎而受之者，厥为一般俗人。惟史蒂芬孙则兼而有之。彼深入未甚受教育者之心中，同时亦使精明之批评家叹赏不置。盖悦者众矣！其故盖以史蒂芬孙之小说，情节至佳，而其艺术之精巧又与其文章以不朽之美也。

史蒂芬孙之所以得高占于英国文学史上者，盖大半以其著作之章法（Style）之至为精妙也。即史格得（Scott）与加仆（Cooper）不朽之作恐犹有不能及之者。二十年前，少数之批评家曾大胆以为史蒂芬孙如非胜于史格得、加仆诸人，亦足以与之比肩而立于文学之坛上。当时闻之者多哗然笑之，以为侮谩。今者此种意见乃甚普遍矣。史蒂芬孙于史格得所具有之勇敢的与异常丰富的创造力，诚然稍形缺乏；然彼亦显有一种专长之技能，为其伟大之前驱所未尝梦见者。自《宝岛》之叙言诗上，我人可以见史蒂芬孙之赞美加仆；且亦爱恋史格得而不护其短。“彼不仅具有丰美之浪漫的天才，且具有丰美之悲剧的天才……彼为一大梦想家，一适宜美丽而滑稽之幻像之见者，然难能称之为大艺术家。……”史蒂芬孙似如史格得之缺于章法，史格得喜著一佳小说，然彼之喜此小说尤胜于其著作之之心。史蒂芬孙则不然，其注意

于叙述之形式与注意于其叙述之本身殊无甚轩轾。其于遣辞用字之法，尤为精密宏富，诚字中之纨绔子也。时亦稍露高视阔步之概，喜自炫其美羽。史蒂芬孙之态度与其著作之风味略有似于三百年前之约翰·李勒（John Lyly）。李勒之悦其读者也，以突然而出之讥嘲与诡辩；彼表出英国散文之可能之揉性，在其前，固无人曾见及此也。史蒂芬孙之文，极藻丽之至，然非浮夸，实天然之秀美也。说者多据其自述，以为史蒂芬孙摹拟他人而著作，以“勤勉之仿效”法，死读前代之名著，因以成一成功之作者。其实不然。信史蒂芬孙之以摹拟白朗（Browne）而成大著作家，亦犹信《乌鸦》（The Raven）一作已臻爱伦·坡（Allen Poe）所描写者之完全之境也。忠实之练习，诚足以有助于人。然而史蒂芬孙则非其俦。如勤习而能之，则凡有充裕之时间与毅力者皆成为大作家矣！以史蒂芬孙为摹拟他人，固不如言其勤效一己之为愈也。

史蒂芬孙之小说显两重之统一，实为难能而可贵；一面显富美之材料与文字之极高技能之融合为一，而一面则显惊人之事实与心理分析之显著能力之统一联锁。用心之读者固皆稔知之也。在此一着，史蒂芬孙实远胜于加仆，正犹在章法一面之远胜于史格得也。《宝岛》较之《红盗》（The Red Rover）或《海贼》（The Pirate）殊为佳胜，史蒂芬孙虽后起，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矣”。置亨利·爱史摩特（Henry Esmond）于不计，史蒂芬孙实可称为英国文学中之最佳胜之传奇作手也。

然而史格得亦有一事，超越于史蒂芬孙。其事为何，即妇人之描写也。史蒂芬孙所著之小说，大半部皆不见有妇人参预于其间，正如未有夏娃以前之乐园（Paradise）。此种“性的兴趣”（Sex-interest）之缺乏，实为史蒂芬孙著作中之一特点。彼有似一小儿，见一群少女立于途中，而不欲其混入一己之游戏中。此

亦有几分真理在其内；以如以一少女参入于《宝岛》之中，即如参加于《海狼》（Sea Wolf）之中，足以损其价也。以妇人之小惊大怪及其他特点，杂之于海盗，杀人者及藏宝之中，适足以引起繁多之困难问题以恼乱作者而已。史蒂芬孙于《亲王亚图》一书之中，欲描写一真正之妇人，而其结果，则不惟不足以增其名誉，且使全书大失其神采。于《大卫巴尔芳》（David Balfour）一书中，其所表现者，较为成功矣；然而说者则同声言曰：史蒂芬孙之有妇人出现于其中之少数小说，固远不如完全无有者之动人也。其试而得完全之成功者仅一批评家公认为英国文学中最伟大之小说之一之未完成之著作，《赫美斯登之水闸》一书耳。迹史蒂芬孙之所以不善于描写，且不欲描写妇人者，其原因至简单，即以其过于文雅而已。彼不欲以其描状贪婪，冒险，怯懦，夸大，好胜诸种性情之生花妙笔，移而述性之冲动；因此彼遂为良知所束缚，至于“惧一触及言情小说之范围”；而妇人者，遂亦极少现于其著作中矣。

综观史蒂芬孙之著作，除未完成之名著《赫美斯登之水闸》外最佳胜者惟《宝岛》一书。当其下笔作此书也，史蒂芬孙殊具特别之意兴；一则欲以自娱，一则欲以窥世人之传奇欲是否可以再激起也。以后，彼之著作终未有如此随笔成文，如此天然秀美如此书者。彼之所有杰作，诚皆甚佳胜矣，然终缺乏《宝岛》之特别之光明也。此书实较《白伦特莱之主人》尤为圆融，较《被拐者》尤为繁复也。

史蒂芬孙作此书，——《宝岛》——以第一身之语气出之，然又能避免此种叙述法之难点。叙此故事者非此故事之一主要人物，而于最惊人之冒险则亦曾身预其间。因此，得所有之直接谈话之利益，与所有真实之获得（All the gain in reality）——不必指点出各主角之运命如何。史蒂芬孙于其《弗利麦之尺牍》之一

书上，曾言第一身之小说（First Person Tales）与其性情实至相宜。惟其合于性情，斯其能出之易而成功伟欤？亨利·杰姆士(Henry James) 于一论史蒂芬孙之论文上，曾言及此书，曰："我侪所见于此书中者不惟理想之寓言，而实此少年作家之一己与其心境也。我侪似倚于其肩上以一臂环其颈而读之也。"此书中之事实，足以使儿童喜悦；而亦足以使成年者百读而不厌，且每读必增其满足与有益也。人之读之者殊不必羞言或表明其对于此书之兴趣；读此书决非即表明其人之具下等之文学趣味也。庄严之人每自奇其何以能读之而移情如此，亦终不敢置此书于小说界之高位上。有人且以为《宝岛》之为书，与诸言海盗之故事等耳。其异于史莱士（Sleuths）与赫加魏（Harkaways）者仅其文笔之较胜而已。实则不然。在艺术上，题材则比较不甚重要，其绝对特别之点则为叙述之态度。史蒂芬孙之叙述之态度何如，言海盗之故事之作者，其态度又何如？比《宝岛》与诸种之廉价之"血与雷"之小说（Tales of blood-and-thunder,）诚拟不以伦也。且《宝岛》之叙述，甚具有戏剧之能力，与奇异之惬人心肺之言辞，令人一读之后，即深刻心中，永不能去。下等之小说，固永不能有此也。

于《宝岛》与《赫美斯登之水闸》外，史蒂芬孙早年所作之《国内旅行记》，《乘驴之旅行》，及《The Silverado Squatters》亦表现不俗之经验与真实之文学之庄严；其使之成名之《犹克尔与亨特之奇事》则冶道德（Norals）与轮回（Metempsyohosis）之说于一炉，虽史蒂芬孙之书之文之秀丽与魔力之动人之胜于此书者，颇多，而销售之数，至今犹以此书为最广；《被拐者》与《大卫巴尔芳》则其真价等于《宝岛》与《赫美斯登之水闸》，最足以代表史蒂芬孙之勇敢直前而饶暗示力之冒险小说也；《麦勒特罗勋爵之门》（The Sieur de Malatrait's Door）与《亲王亚图》

则绵密有趣，文雅温柔而仍带奇异；《白伦特莱之主人》则情节挠曲不平而具极多之戏剧化之力量；凡此诸种皆史蒂芬孙至佳胜小说也。以限于篇幅，不复一一详论。至如《黑箭》等作及其他诗歌戏剧，则低于史蒂芬孙著作之水平线甚远，更不需举出矣。于小说之外，史蒂芬孙所著之论文亦甚多，如《Virginibus Puarisque》，《追忆》，及《Famibliar Study of Men And Books》等，皆其论文集也。此等论文多批评正确，观察绵慎，饶生气而多奇想，颇与查理士·兰姆（Charles Lamb）类也。

关于史蒂芬孙人格之魔力，世之文人著为诗文以论之者众者！而所状之史蒂芬孙则人各不同。即其友人亦无二人能同意于史蒂芬孙之为人究为奚若者。此其故盖以史蒂芬孙之为文，多为客观之传奇，因之后来者虽遍读其书亦不能知作者之情性果何如也。幸而史蒂芬孙于传奇外尚遗有论文，颇足因而窥见其生平；又幸而彼之手札遗留甚多，更足以知其为人。有批评家以为此种手札，实为史蒂芬孙最伟大之著作，其价值且远过于其小说，其戏剧，及其诗歌论文；以其能永远表现出史蒂芬孙之人格；而此人者则较其所创造之奇异之人物尤饶有兴趣者也。

观史蒂芬孙之生平，足以大增我人对于世间之享乐与愉快；近代文人之中，无具有如此丰富而美丽之魔力如彼者。彼之乐观主义，盖由身体之孱弱与痛苦之经验中出也。彼放浪于形骸之外，又极忠实而庄严，实道德与活泼之愉快的联合之人也。吾人读其书，论其生平，盖未有不尽却愁思，顿增壮气者。

世变岌矣，“我生不辰”，沉闷而呻吟，厌其生而自放者众矣，我愿与共诵史蒂芬孙之传，以燃生命之火！

（原载1921年3月《小说月报》12卷第3期）

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文学书能够译么?

文学书应该不应该译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现在有许多人都知道文学的重要，和世界文学的介绍的必要了。但是文学书之能够不能够译，却是一个很要研究的问题。译出来的文字，其所含有的思想能与原文所含有的相切合么？文章的艺术的美不会因转译一过，而减少而至于无么？质言之，就是“同一的思想能够实实在在的表现在一种以上的文字中的第一等的文学里么?”许多人都是不免要怀疑的。而起这个怀疑的人中更有许多人主张说文学书是绝对不能翻译的。

他们之中，有二种的见解，第一是通俗的，第二是哲理的。

通俗的见解大都是这样说：翻译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文学的风格[①] 是乡土的（Native)，是固定的（Original)，虽有最好的

① “风格”二字英文为Style，极难译，有译为“文体”者，有译为“章法”者，都不甚切合。

最精巧的翻译家也不能把他重新再表现在别一种的文字里。翻译家所能为的只有二事：（一）赤裸裸的把他所译的那本文学书中的具体的思想（Substantial Meaning）翻译出来；或是（二）一段一段的，把他意译出来，无论他如何的求其不失原意，然而总与原文有很大的差别。

哲理的见解，则大概以为：文学书里的思想与其文字，实质与其文章之风格（Style）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有许多思想家且以是绝对不能分离的。他们说："思想就在于文章的风格之中，我们看见或听见文章之风格，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看见或听见其中所含的思想了。"因为文章的风格是绝不能翻译，所以同一的思想之两重或两重以上的表现是绝对不可能的；所谓翻译者，无论其如何精巧，总不过是一种意译的摹拟而已，离原本实在是极远极远；至于原文之艺术的美，那更不用说，自然是丝毫没有的了。

在于诗一方面，他们这种"翻译的绝对不可能说"更是流行；就是有些人主张散文是能够翻译的，但对于诗的翻译，也是很决心的反对。这是因为在诗的一方面，更有一种音韵存在。散文的句子，在各种的文字里有很多很多的组织法是同样的；至于诗则其主要之点在于韵律（Prosody），而每种的文字各有其一己所独有的韵律，无论哪一种，都很难与别种有共同之处。最好的诗的翻译家决不能把原文的韵律，重新再表现在译文里；只能用他自己的文字里的韵律，或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韵律来意译他而已。蒲伯（Pope）之《荷马》（Homer）大史诗的译文，与柏超与兰安（Messrs Butcher amd Lang）之同诗的译文，皆以英国的文字来译古希腊之诗；然而两者则截然不同，一则用女王安（Queen Anne）时代之韵律（如蒲伯），一则用十九世纪之散文的韵律（如柏超与兰安），不惟地域异而韵律变，即时代不同而

韵律亦因以异。由此可知韵律这个东西是如何的变动，如何的难能与二种以上的文字里有一些共同之点了。且诗的音韵，就是人的内部的情绪之表现；韵律之与情绪实有相密接，相倚傍而绝不可分之势。如果诗的韵律已完全变而为别一种，诗的情绪又如何能单独的照原样的移转过去呢？由此看来，诗实是绝对不能译的东西了——比之散文尤甚。

他们的意见，骤然听之，颇为有理；实则极为不然。我以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固然因翻译者艺术的高下而其程度大有不同——不独理想告诉我们是如此，就是许多翻译家的经验的成绩，也足以表现出这句话是很对的。下面试略说明，并举例为证：

上面所举的通俗的见解，所以主张翻译的不可能说的原故，就是误认文章的风格，是固定的乡土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文章的风格只不过是‘表白’（Expression）的代名词，而文学里的表白，其意义就是翻译思想而为文字。（The translation of thought into Language）”（见 D. W. Rannil’s “Element of Style”, pp. 2.）人们的思想是共通的，是能由一种文字中移转到别一种的文字上的，因之“翻译思想而为文字”的表白——风格，也是能够移转的；决不是什么固定的，乡土的。最好的翻译家，不惟能“赤裸裸的把他所译的那本文学书中的具体的思想翻译出来”，并且也能翻译得与原文非常接近，把所有的两种文字的差别都泯灭了。这一层自然不是“一段一段的意译”的翻译所能充分办到，并且自然也与翻译的艺术的好坏大有关系。但如果有一个艺术极好的翻译家，用一句一句的“直译”方法，来从事于文学书的翻译，则，（一）这本文学书的全体的艺术的布置法能完全的移到译文上，如史特林堡（A. Strindburg）的《爱情与面包》，

开首写法克向鲁以丝的父亲求婚，接着写他们如何的结婚，如何的新婚的日子，如何的鲁以丝怀孕生儿子，如何的为债主所迫，因破产而离婚，所有情节的先后的布置，在胡适的译文上，都能一丝一毫不变的照样的移过来。又如柴霍甫（A. Tchehoff）的《海鸥》四幕中的前后次序也是完完全全的重新再现在 Mari an Fell 的英译本里。——这一层很容易办到，就是劣等的翻译家与林琴南式的翻译家也能做到；但非所语于移改原文情节的人——（二）就是一节一段的前后布置也能同样的翻译出来，如《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诗：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花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段，Candlin 的英译本译之为：

Thus the Spring must Waste away；thus the flowers are gone；

Nature 's hues and human beauty perish one by one；

One brief morning 's dream of Spring and beauty hastens to old age；

Falling flowers and dying morals pass alike to the unknown。

与原文的排列，一点没有参差。翻译到这样，已不容易。（三）一句中的字的排置，有时也大略的能在译文里表现出来，如：

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joy，Peace，longsuffering，gentleness，goodness，faith，meekness，temperance：Against such there is no law——新约，Galatians，Chap，5.

一句中国的《圣经》译本，译之为：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又如 Dr. Aldrich 翻译下面著名之歌：

A soldier and a sailor,

A tinker and a tailor,

Once has a doubtful strife, Sir,

Whose name was buxcm Jean, &c.

而为古代语言：

Miles et navigator,

Sartor et aerator,

Jamududum litigabant,

De pulchra quam amabant,

Nomen cui est joanna, &c.

（一个兵士与一个水手，一个补锅匠与一个裁缝师父，有一次有一个可疑的竞争，要以一女子为妻子，先生，他的名字就是柔顺的约安）。

由这种的例子，可以看出原文与译文之间句中的字的排列之大概相同处了。所以字对字（Words by Words）的译法，虽是不能有——也不必有——而原文的句的组织法，却有时也可以移植于译文中。（四）更可惊奇的，就是原文中的新颖而可喜的用字法，译文中也大概能把他引渡过来，如：

Where snipes with their dancing tails stamp ting footprints upou the clean soft mud;

Where in the evening the tall grasses crested with white flowers invite the moonbeam to float upon their waves. – R. Tagore's "Prescent Moon."

竹鸡们带着他们的跳舞的尾巴，印他们的细小的足印在整齐的软泥上；

黄昏的时候，长草顶着白花邀月光浮游在他们的波浪上。

——见本报一号，原文dancing，crested，invite，float等字，用得多们新颖呀！而译文中也能照样的用“跳舞的”，“顶着”，“邀”，“浮游”等与原字相切合的字，照样的把他译出来；又如周作人译的《沙漠间的三个梦》（见《新青年》六卷六号）中，有：

“因为热得利害，沿着地平线的空气都突突的跳动”

“我看时，见几世纪以来的忍耐都藏在伊的眼里”

“突突的跳动”及“忍耐，……藏在伊的眼里”等字，也能把原文的用字法完全的表现出来，而不失其巧妙与轻颖。译文而至能把原本的全体的结构，节段中的排列，句法的组织乃至用字的精妙处都移转过去，你看原文的艺术的美，还会有什么丧失么？文章的风格，由这种实验看来，可见是非不能移植的了！那么，抱通俗的否认文学的翻译的意见的人，可以说是不能再确立他们的见解了。

试更进而释由哲理方面否认文学翻译的不可能说者之疑。他们最主要的见解，就是以文学书里的思想与文字，或实质与文章的风格，为不可分离；其以文章风格为绝对的不能再现于一种以上的文字里，则与通俗说相同。现在欲破其惑，可先攻其思想存于文章的风格中的意见。在《Element of Style》一书中，Rannie证明“大多数的‘表白’（Expression）是可以随人之意的，所以

他与思想是分离的”。譬如思想是水，“表白”是载水之器；无论载水之器的形式如何的变换，水的本质与分量总是不会减少的。既然同一的思想能由作者任意表现之于无论何种的“表白”或“风格”中，那末我们就不能有理由去疑惑说，思想是不能表现在一种以上的文字中了。我们可以承认，思想在译文里常是不能表现得如在原文里的一样的充分而且好看；也可以承认翻译就是最好最高的，也不能把原文重摹一过，而表现在译文里，如小学生之“描红”一样；无论是最精密的句对句（Sentence by sentence）的翻译，也是一种“意译”。然而思想的本身却总是不会有什么丧失的。如果翻译的艺术高了，则思想且可以把译文弄得与原文同等的美。如英国翻译的《圣经》，原文的思想，差不多是全部都能明明白白的表现在译本里，并且表现得真切，美丽而且宏伟。又如蒲伯译的荷马的诗，台林登（Dryden）译的福格尔（Vergil）的诗，梅莱（G. Murray）译的 Euripides 的戏曲，虽然都是意译，然而原本中的思想却都不曾走失，艺术的美，也可与原文相伯仲。就是中国的林琴南式的一人口译，一人笔述的翻译，原文的思想却也能表现得没有大失落——除了错的不算——由此可知“实体”（Matter）与“态度”（Manner），思想与文字，意义与文章的风格，是分离的而非融合而不可分的了。由此也可知思想是能由一种文字移转于他一种的文字上，是能有两重或两重以上的表现的了。至于文章的风格之能移植，则上面已说得很明白，不用再提了。

诗的不可译说，也不可不把他打破一下。他们主张诗的不可译的要点，就在于：诗的本质——思想与情绪——是在于音韵里面的；诗的音韵就是人的内部的情绪之表现。对于这个怀疑，仍旧可以用上面的“思想与‘表白’是分离的，同一的思想可以表现在一种以上的文字中”的话来解释他。固然诗的音韵，是绝对

不能由原文移转于译文，然而他却不一定就是人的内部的情绪的表现；有的时候固有借声音以发抒情绪的，但究是极少数。情绪的发抒决非完全依赖诗的音韵以表现。他仍旧是单独存在的。音韵虽变，而情绪却依然能在已变的音韵里面表现出来。况且音韵之有无，决不是诗的重要的问题。自 Whitman 提倡散文诗（Prose poetry）以来，韵律为诗的根本的观念已是没有再存在的余地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诗的本质与音韵是分离的；人的内部的情绪是不必靠音韵以表现出来的。因此，也可以说：诗的音韵，虽是不能移植的，而其本质却是与散文一样，也是能够充其量的转载于原文以外的某种文字上的——就是：诗也是能够翻译的。如果译者的艺术高，则不惟诗的本质能充分表现，就连诗的艺术的美——除了韵律以外——也是能够重新再现于译文中的。

总结一句话就是：文学书——无论是散文或诗歌——是能够翻译的，能够很精密的翻译的。

Moulton 教授在他的《World Literature》一书里，有一段论翻译的话，很可以与上面所说的相证明，现在把他译在下面，以为参考。

“……现在有一种广布的意见，以为读翻译的文学书是权宜之计，并且显出劣等的读书的嗜好。但是这种观念的本身就是以前流行的文学的部分研究的出产品，他们以为语言（Language）与文学是非常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很难想得到他们是能够分离的。这种观念实在是没有经过有理性的试验。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读希腊文的荷马的诗，只读他的英译本，他诚然失了一些东西。但是问题发生了，他是失掉文学么？很明白的，一大部分造成文学的东西是没有失掉；古代生活的表现，史诗叙述的雄姿，英雄性质与不测之事的观念，情节的精密，诗的想象——所有这些荷 马文学的要素都显在译本的读者之前。但是，他们又要说

了，语言自身是文学里的一个主要的要素。这是对的，但是要记着，‘语言’这一个字是含有两个不同的东西的：一大部分的语言的现象（Linguistic Phenomena）是共通于有关系的各种语言的，并且也能从一种语言里移转到别一种的语言里，至于其他的语言的要素则都是特有而且固定的。读荷 马的诗的英译本的人所失掉的不是语言，乃是希腊的语言。而他也不是失掉希腊的语言的全部；高手的翻译家也能把固有的希腊的语言移植在他的译文上写出来的是不错的英文，却不是那种平素英国人手下所写出来的英文。然而，当译者有所减削的时候，译本的译者就要受很大的损失；古学的研究者知道这个损失是如何的大。但是归结之点不是文学与语言的比较的价值，乃是文学统一的实现的可能。一个人能承受译本的应用，当有用之时，能得到文学的所有要素，除了语言以外，有时即语言也能得到一大部分。一个人如拒绝不用译本的话，他就使他自己与大部分的文学界（Literary field）断绝关系了；他的文学的研究无论是如何优美而且精密，却只是不能超过于地域的。

“还要加几句话，嫉视翻译是一个传道的性质，他能够自成其功：他所流行的地方，那翻译的性质就近于学童所用之‘译本’（“Crib”）了。反之，这是很有举出的价值的，如何第一流的古学家专诚的去翻译如最好的注释的形式一样——Jowett, Munro, Conington, Jobb, Palmer, Gilbert Murry；如何第一流的诗人使他们自己去为一种与别种的语言间的译释者——William Morris, Edwin Arnold, Chapman, Dryden, Pope；而合精密的学识与诗人的天才于一身的那些人，如 Mr. Arthur S. Way 及 Mr. B. B. Rogers 等则使 Homer, Euripides 及 Aristophanes 同样的照耀于英文中，如在希腊的诗中一样。并且，最高尚最精美的文学家对于翻译的文学也是有极强健的推许的。爱默

生（Emerson）在他的《书论》（Essay on Books）上说：‘我读我所有举出的书及一切翻译的好书，决不迟疑。一切书中的实在是最好的地方都是能够翻译的……我极少读那些希腊文，腊丁文，德文，意大利文的书——有时且不读法文的书——的原本，因为我能得到他在一个好的译本里。我要守着那如伟大的都会似的之英国语言，他是收受天底下所有地方的流泉的海洋。’在历史方面，更可以有一个辨证。路德（Luther）的《圣经》译本，与英文的公定的这个书的译本，就是这两国的文学的根本，这种的大规模的成效很可以参考一下，当高尚的语言的学问从批评的而转为创造的，且用他自己来把所有其余各国最好的文学融合在自己的那种文学里的时候。”

第二个问题 译文学书的方法如何？

由上面说来，可知文学书是能够翻译的；而其翻译的可能的程度，则完全有赖翻译者艺术的高下；于是第二个问题立刻跟着发生，就是：文学书的译法如何？用什么法子，才能使译文与原文间的差别泯灭以至于无？原文的思想如何才能完全的同样的表现在译文里？原文的艺术的美，又如何才能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总说一句话，就是“翻译的艺术”究竟如何？

这是一个很必须答复而且是很难答复的问题。在古代的时候，许多人对于此已有十分的研究，近来的人更为注意及之；然而他们大概都是自求解决，而没有特别的著一本书或一篇论文来讲他的。我所看见的只有一本 A. F. Tytler 著的《翻译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是专论译文学书的艺术的。据他序言上说，M. d'Alembert 在他的“Mélanges de Litterature, d'Histoire etc.”一书里，及 Abbé Batteux 在他的

"Principes de la Litterature" 一书里也略有一二篇论到这个问题，然而我没有看见这些书。现在姑且把 Tytler 所论的，参以己见，介绍如下：

Tytler 说：一本好的翻译必须是：原作的优点能完全移转到译文里，使读此译文的土著的人民能明白的感到，强烈的觉得，如同说原作的语言的人民一样。因此，翻译遂有三个不可逾越的法则，就是：

Ⅰ. 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意思。

Ⅱ. 著作的风格与态度（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必须与原作的性质是一样。

Ⅲ. 译文必须含有原文（Original composition）中所有的流利（Ease）。

底下逐条言其如何能合于此法则的方法，并举例以说明之。

Ⅰ. 法则第一

欲使翻译者能够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意思，第一件最必需的事，就是他必须对于原本所用的文字有完全的知识，其次就是他必须对于原文中所论的或所描写的那种事物，有充分的研究。如果他于这二件事中，有一件不好，或是不很懂原本所用的文字，或是没有研究过原文中所论所写的事物，他就永久不会完全明白原作者的意思而传达之了。试举一例：M. Folard 是一个战术大家。他翻译 Polybius 并且给一个注释，说明古代的 Tactic 及希腊人，罗马人攻城，防守之法。在这个注释里，他想用 Polybius 及其他古代作者的话表明出希腊与罗马的工程师知道并且应用近代人所应用的设备。不幸 M. Folard 希腊文的知识太浅了，只得从一个 Benedictine 的牧师的译本来研究这个作者，而这位译

者却又是完全不懂得战术的。于是乎其结果遂非常之糟。M. Guischardt，一位大军事家并且是精通希腊文的人，说，Folard的著作，于最重要的战役与围攻的事，把原作的意义弄错了许多；并且这位讲古代战术的作家作他的复杂的制度，竟没有得到什么好好的翻译出来的古代著作的帮助。由这个例，可知上面所举的两件事是决不可缺一的了。

就是十分熟于原本中之事物与原文中之文字的，于翻译之际，也常感有非常的困难。这是因为一种文字里的才能与力量只有一小部分是能从字典与文法书中得到的。有许多精妙之处，不惟存于组织与成语之中，并且也潜于文语的意义（The signification of words）里面，只有多读，多加注意，才能把他发见出来。

有一位博学而精审的批评家曾论到"各种文字所以相异的原因"，以为翻译的艺术里的一个主要的困难就是发生于这个情形，"有一类字在一种文字里，是无论用别一种文字里的哪一个字都是不能与他完全相切合的"。这一类的字大多数都是关于道德，情感，情操的事，或是内省的及内部意义的对象。譬如 temperantia（节制）一字，在腊丁文里是一切欲望的节制的意思；而英文的 temperance 普通用来，就只限于饮食的节制之意了。原文的意思如有可以令人疑惑的地方，如同样的一句，却有几个意义可以解释，那个时候，译者就应当用他的判断力，选择那个最合于全文的思想，或这个作者平素的思想的模形及表现法的意义，把他译出来。摹仿原文的含混或两可，是很不对的；如同时把一个以上的意义都给他表现在译文，那更是不对了。

于此，有一个问题发生了：译者诚然应该把原作者的意思完全达出，然而在某种情形底下，他能够不能够于原意之外再加以一种能给原文以更伟大的力量的意思上去，或是把原文中的软弱而过剩的意思给他删去呢？依 Tytler 的意思，这种自由是不妨

给与译者，不过他必须非常谨慎的使用他而已。更必要的，是所外加于原文的意思，一定是要与原意有极紧要的关连，并且是实实在在的能增加他的力量的。反之，译者对于原文的意思如有节删时，这种删去的意思必须在原意中是附属而无关紧要的，或不是一子句中或一句中的重要的字；并且是删去后是决不会减少或是把原意弄弱了的。在这种限制底下，才可以使译者有那种增减原意的自由。而这种限制之如何能完全履行，那就靠译者的天才与判断力与谨慎绵密的观察了。在诗一方面，这种自由的使用，更是可以允许。约翰·邓亨（Sir John Denham）说："我觉得译诗的一个大毛病就在于死译。让这个'谨慎'给那些从事于忠实的事的人保守着；但是无论什么人如以此为译诗的宗旨，他所做的实在不是必要的，并且他也永不能成就他的试验；因为他的事业不仅是译一种文字而为别一种文字，乃是译这首诗而为别一首诗；而诗呢，则是具有一种奥妙的精神的，由这种文字而转于那种文字上时，他就完全蒸散了；如果没有一种新的精神，加在译文里，那么，除了无用之物以外，更没有什么东西存留着呢。"

这都是 Tytler 的意见，以我看来，确是很对；死的，绝对的直译，确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必须。但这种自由使用得好时，固足以增加原文的价值，并与他以一种新的生气；如果使用得坏或是使用得太过了，那就很容易召致谬误，并损坏原文的。如 Byron 的"Giaour"一诗中有云：

Such is the aspect of this shore;
'Tis Greece, but living Greece no more!
(海岸的风光如此，这就是希腊呀，但却不是活的希腊了！)

梁启超译之为：

“葱葱猗，郁郁猗，海岸之景物猗。”

“呜呜，此希腊之山河猗！呜呜，如锦如荼之希腊今何在猗！”

“葱葱猗，郁郁猗”几个字是由Aspect(风光)这个字联想出来的，虽然原文上没有，但增之也不为害意，也总算是还好的。

如果这种增加原意的方法是很好，那末，林琴南把：

“They lived in a cave or cell, made out of a rock; it was divided into several apartments, one of which Prospero called his Study; there he kept his books, which chiefly treated of magic, a study at that time much affeeted by all learned me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is art he found very useful to him; for being thrown by a strange chance upon this island, which has been enchanted by a witch called Sycorax, who died there a short time before his arrival, Prospero, by virtue of his art, released many good spirits that Sycorax has imprisoned in the bodies of large trees, because they had refused to execute her wicked commands. ……” Lamb's Tales from Shakespeare.

一句，译成：

“居为山洞，分数区为堂室；一为翁书室，积书满之；书多言禁勒禹步之术，以当时名宿，皆以此为专家之学。翁既精是学，居是亦良宜，以是岛前为大巫昔考勒司故居，以

符篆拘群鬼，幽之树腹石窍中。翁至，则反巫所为，悉纵群鬼。”

把原文中的 being thrown by a strange chance upon this island（为一奇异之变故投置于此岛），who died there a short time before his arrival（她在他未到这里以前不久的时候死去），及 because they had refused to execute her wicked command（因为他们拒绝去执行她的恶的命令）等子句都删去了，他的这种删节的办法也是很好的了。如此，不是把原文的意思都失掉了么？所以我主张我们对于这种增减原意的自由，对于这种全凭译者的天才与判断力与谨慎绵密的观察而始能善于使用的自由，应该绝对的谨慎的用，并且应该绝对的少用——除了极必要的时候；散文的翻译，似乎可以全不必用，诗的翻译，则遇必要使用的时候才以绝对的谨慎来使用一下。我们要晓得：我们是翻译人家的东西，不是自己著作文章；译文的流利，有生气，固然是很要紧，而与原文相切合的一个条件，更是紧要中之紧要呀！“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只求译文之通达而切合于原意——这是译文学书的人最宜记着的格言。

与这个增减原意的自由相仿佛的，译书的人还有一个改正原作中偶然疏忽或不正确的语法的自由。这种疏忽或不正确，在实质上很足以影响原文的意义，或虽不至于影响原意，而于原作的优雅的叙述则背道而驰，足以使之损坏。Tytler 以为这个自由实在是应该给译者的。我的意思也与他相同；不过译者仍须非常慎重的使用他。如遇有这种疏忽或不正确在原文里发现时，他所能做的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把原文的不正确的地方照样的搬移到译文里来，另外加以附注，说明原文的不正确并给出他自己的改正；第二，把原文的不正确的地方在译文里改正了，底下附以注

释，给出原文里的不正确的原句或原字，而说明之。如跳出这两种办法以外，而贸贸然即行改正，虽是改正的不错，然而究竟不是正当的慎重的办法。不幸而其改正为谬误，则更为贻害原意，贻害读者了。

Ⅱ．法则第二

除了忠实的翻译原作的意义外，一种对于原文的著作的风格与态度的同化，在译文里也是很必要的。能够办到这一层，这个翻译，才能算是好而且完全。但这个要求虽是较完全传达原意为稍不重要，然而较之那种原意的传达却是更难得实行；因为这种摹拟原文的风格与态度，所需要的才能较之仅仅能明白原作的意思的更是少有而难见。一个良好的译者一定要能够立刻发现出原作的风格的真实的性质。他必须决定原作的风格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属于庄严（Grave）一类，属于激扬（Elevated）一类，属于轻快（Easy）一类，属于鲜艳华丽（Florid and ornamented）一类，或是属于质朴自然（Simple and unaffected）一类呢？他精审的决定了以后，就须把这种的特点，以自己的能力把他明明白白的重新再现在译文里，如同在原文里一样。如果一个译者不能有这种的决断，并且缺乏这种能力，那末就使他能够完全的明白了原作的意思，他也要从一个歪曲的媒介物里把他表现出来，或是常常的把他穿着在一套不适宜于他的性质的衣服里了。

《圣经》的特质，就在于质朴。这种特质实是属于希伯来（Hebrew）文字的本身。Dr. Campbell说，希伯来文是一种极朴实的文字，“他们的动词不像希腊文及腊丁文之有各种的‘式’（Moods）与‘时’（Tenses），也不像近代的文字一样，有许多的‘助词’与‘联接词’。其结果则在叙述的时候，他们用许多简单

的句子来表示，如同谈话时所用的一样，这种句子，在许多别种的文字里，都是常用一句含有许多子句的‘复句’来表示的。”

试举一例以证之，如《创世记》的第一章之首，叙上帝在第一日所做的事，分为十一句叙来。

> “1.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2. 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3.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4.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5.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6. And there was light. 7. And God saw the light, that it was good. 8. And God divid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9. And 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10.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 11. And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were the first day.”

> （一、太初，上帝创造天地。二、地是空虚混沌。三、渊面黑暗。四、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五、上帝说，当有光。六、就有了光。七、上帝看光是好的。八、上帝就将光暗分开了。九、上帝称光为昼。十、称暗为夜。十一、有晚有早，就是一日。）

这是英译本的译文。“正可以表现出原文的风格。更完备的构造的简单的例子，我们更不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句法非常简单，‘实字’也不附有什么形容词，动词也没有加上什么副词；没有同义字，没有最高格，也没有以勇敢，加力，或异常的态度来表现一切东西。”在英译本上，原文的这些性质都能表现出，实在是一个摹拟原文的风格与态度的最好的模范。若 Castalis 的

《圣经》翻译就与此不同了。他的译文大体虽然是忠实于原意，然而他却完全不注意于原文的风格与态度的同化。他用很复杂很雕饰的词句来译这一段最简单的朴实无华的字句。实是不足为训。

荷马的史诗的风格是强健而且朴素的。他常用想象，暗示，及明喻（Similes）的语法，但是他却极少用什么假借的（Metaphorical）词句。所以用假借的语法来翻译荷马是与原文的性质相反对的。蒲伯的译文有时，虽然不是常常的，竟有这个毛病。如他不说田里满是谷粒，而言“夏天之山谷装饰着浪形的金色”（In wavy gold the summer vales are dress'd）〔Odyssey，19，131.〕；不说这个兵士哭着，而说“从他的眼里流下柔弱的露珠”（From his eyes pour'd down the tender dew）〔Iliad 11，486.〕，与原文之质朴大不相同。这种译法也是很不好的。

最好的译法，只有如上面所举《旧约》的英译本的译文了。然而译到这种田地，实是极不容易的事；与译者的天才有关系，与他的趣味（Taste）也有关系。他也许能辨别出原作的风格与态度，但是如果他没有最正确的趣味，他还是不能摹拟他的，或是虽能勉强摹仿，而原文的精神与美感却没有了。好的著作与坏的著作，其中的差别实“微乎其微”，有的人很能够知道原作的风格的性质，但是却因天才与正确的趣味之缺乏，竟失败了：把原文的庄严的风格，变成累重而呆板了，把原作的激扬的风格，变成夸大了，把原作的活泼的风格变成卤莽粗率了，或是竟把原作的质朴自然的风格变成孩子气了。甚至于如 Arias Montanus 之译《圣经》：他用照字直译的方法，想尽力的忠实的译，把原作的意义与态度，都一丝不走的译出来。他不想到希伯来文，与腊丁文与希腊文中间有许多不同的特性，也不想到文句的组织之不同与其各种文字之各有特殊的成语，他只当这三种文字是一样

的，是没有差别的；其结果竟成一本很坏的译本，不惟不能把原作的意思表明出来，就是他的风格与态度也完全失掉；所留下的，只是粗率，背理，而且不合于文法的东西。原作的风格与态度之移植真是不容易呀!

各种文字的性质之各有不同，实是原文与译文间的风格与态度之同化的最大的阻碍；虽有非常天才，也是很难跳出这个制限以外的。如腊丁文是非常“简捷”（Brevity）的，英文决不如他；因此，腊丁文的“简捷”的地方，英文就极难把他摹拟出来了。

其他如希腊、腊丁文中常有颠倒位置（Inversion）之字句，英文里就没有，因此，也就不能摹拟他；如腊丁文中，又有省文之例，英文里虽也有之，然却没有腊丁之同样的程度，因此，这种摹似，也是很难出现了。

这不过是举一二个例来说；无论哪一种的文字与别一种的文字之间，也都如英文之与腊丁、希腊文一样，有很多的地方是不能摹拟的。这种天然的制限，实是难有法子打破。

但是无论这种天然的制限是如何的难打破，却不能有很大的影响及于原文与译文间之风格与态度之同化。因为这种制限究竟不很多；一种文字与别种文字间，其绝难相合，绝难摹拟的地方，是可以屈指以数之的。除了那些“屈指可数”的难摹拟的地方外，原文的风格的摹似，都是可以办到的。所以我们应该忠实的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把原文的风格与态度极力的重新表现在译文里；如果有移植的不可能的地方，则宜牺牲这个风格与态度的摹拟，而保存原文的意思。——不必拘于一格，以死译为尚，或以意译为高。

Ⅲ.法则第三

欲完全把原作的特质与优点一点不走失的重新表现在译文里，不仅是要译文能含有原作的所有的意义并表现出与他同样的风格与态度，并且还是要把所有原作中的“流利”（Ease）完全都具有。

当我们观察这些译者所必须拘守的制限时，我们可以看出，传达原意与摹拟原文的风格还是比较容易的事，所最难的就是最后的一件，——含有原文中的所有的流利。一个人在规行矩步之中生活的，决不容易表现出一种秀美而且自由的神气。一位画家欲在摹本里头保存原作的所有的“流利”与精神，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这位画家所用的颜料还是与原画同样的，并且除了忠实摹仿摆在他们面前的图画的情感与形状外，更不用注意什么别的事。如果原作是轻快而且秀美的，那末，那摹本只要是描摹得正确而且完全，就可以把他的这些同样的性质包含在里面了。译文学书的工作就不同了：他所用的不是与原作同样的颜料，但却要他的画图有与原作同样的力量与效果。他不许去钞袭原作的情感，但却是要用他自己的情感来产生出一个完全相似的东西。他研究摹拟之术愈工，他的摹本就反映出原作的流利与精神愈少。那末，译者怎么能完成这个流利与忠实的困难的联络呢？简单的说来，他必须采取原著者的精神，由他自己的官能里说出来。

但是当一个译者想要把原作的所有的流利表现在他的译文的时候，最紧要的就是要防止那流利的地方流入于放纵一途。反之，如果战战兢兢的忠实的翻译呢？则又须防其过于刻划，转为死译，把流利的一点忘记了。所以良好的译者贵于得其中道，忠

实而不失其流利，流利而不流于放纵。

诗的翻译较之散文，比较的容易含有原文的所有的流利。这个原故就是因为，上面曾说过，诗较之散文，可以给与译者以更多的增减原意的自由。如果没有使用一些这个增减原意的自由，那末，文中就很难含有流利了。这个翻译的自由给与愈多，则流利之含有亦愈多而且愈显；因为：翻译的自由多，则流利之取得之困难程度亦少。同样的理由，在各种的诗中，以抒情诗为尤易得原文中的流利而有之；因为抒情诗是有最大的翻译的自由的允许的；无论思想与语法，都可以有一种增减原文的自由。但是有一层流弊却要防到，就是放纵；如果我们劝我们自己以为不须多留意于原文的切合，则此层弊端，尤宜预防。并且，抒情诗的翻译，既允许有很大的自由，有一个问题，就跟着发生了；就是抒情诗的翻译者，也可以得允许去加增新的想象与新的思想于原文上，或是用原文所没有的话来说明以增加原文的情思么？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人各不同；依我的意见，则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翻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正确而且完全的传达原作的思想与风格。如果这样一来，则是把原作与自己之作合在一块了。如何还能称为翻译呢？

我们须注意：译者所应得的自由——无论是散文或是抒情诗——必须在不失原意的范围以内；如抒情诗等虽然可以因要求流利之故而稍稍增减原文，然而决不可再于此自由的范围外有所要求。——只要能达出原文的所有的流利在译文里就满够了。

成语（Idiom）或那些一种文字里所专有的语法的翻译，非常的困难，于译文中的原文所含有的所有的流利的移植，实大有影响。那些普通的成语，都是有规则可寻的，很容易互相翻译的；其最难翻译的——有时竟至于不能翻译——乃是一种特别的成语；这种成语在一种文字里成为固定的，通常都用在谈话中或

是用在近于“谈话的流利”的文章里。如果译者在他自己本国的文字里能够找得到一句成语与原作中的恰相称合的，那末他的译文，就算是很为完全了。如腊丁的成语“Qu’il s’y donnait du bon temps”一语，Cotton 恰好找到英文里的一个与之相称的成语“He there lived as mercy as the day was long”来译他，因此，他的译文的全句遂皆变成流利而且有精神了。以成语来翻译成语，实最足以引起文章的流利与精神；但亦须慎用，不然，则有流入放纵之虞。使用成语，又有一个毛病，就是译者往往忘记了原著者所处的“地”与“时”。他们把自己所在的“地方”或所处的“时代”的人所说的话硬加在“古代”或别的地方的人的嘴里说出来；希腊人而知有伦敦，英国人而会说“铜山东崩，洛钟西应”；实是一种笑话。“Theocritus”里有一句成语“βατραχω υσωρ”（希腊文）与英文中之成语“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运煤到 Newcastle 去）很相同，然而却决不能用这一句英国的成语来译他，因为 Newcastle 是英国的地方，在古希腊人嘴里决不会说出。这样的违背于“时”“地”的背景的译法，实在是极为不对的。所以一个译者如于他本国的文字里找不到一个与原文的成语极相切合的成语——意义相同，而又不违于“时”与“地”之背景的成语——他就不妨照原文直译，不必强于译文里加“似是而非”的衣饰于原意之上。如此的拘束于原作的“时”与“地”的精神里，虽然不免要于读者之耳或目稍有一些不便，然而总比加纱帽于法人之头，或请希伯来人到巴黎伊尔夫依塔上去看远景好得多了。

如果一个原文里的成语不能在翻译的那种文字找到相当的成语，又不能允许其照字直译，译者的唯一的办法惟有用平易的文字把他的意思表现出来了。但这种译成语为平易之文的办法，有时也失其效力：如在一种的原文中，其精神全在固定的语法上；

如把他译成平易之文，他的精神就要失去了。这种成语在短诗里常有遇见；有一种短诗，他的机警之处乃在于一句成语里，如果这种成语不能在译文里正确的翻译出来，那么全文的机警就要失掉了；因此，这句成语之译为平易之文乃为不可能之事。在这个地方，译者实在是没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可想了。幸而这种成语还不很多，在普通的文章里极少遇见，译者尚不至于穷于对付。

除了成语以外，使原文的所有的流利难于传达的还有几层：（一）无论用哪一种文字的诗人，总带有一种特别的逸放的性质；他们常用一种特别的语法，这种语法，与散文的语法非常相远，与普通的谈话更是隔离于三千里外。他们喜欢用古奥之字句，也喜欢发明新鲜的辞调与奇异之语法，这种特性在译文里是很难找得出有与之相似之字语来译他们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的相似，于原文的好处与精神又失掉了。这种东西的翻译实是需要译者的非常的技能的。如俄国最现代的未来派的诗人梅哀加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等，其诗的特点，就在于用新发明的特别的字眼；这种字眼就是他本国的人骤然听之，也是未易领悟的，何况翻译呢？（二）以平易，朴素，专纯之文而载正确，简单，自然之思想之文章最难翻译。比喻多而辞采丰富之作品，较之此种意义适当天然，而文辞质朴纯粹之文章实为易译。因为前者之性质强健显明，易于捉住，而后者则味淡神永，为常人所忽视，非有最正确之趣味的人不能辨别。在诗中，这种淡素之文很少，以诗中多比喻而富假借，辞必饰，句必修整，正与此种趣味相反。但如诗中而且有这种淡素之风味，则其翻译，较散文为尤难。（三）叙述之文连用分别极微之类似的形容词的，其翻译也极困难。他们的每一个字都与所形容的东西极相切合，而其中的许多字又差不多都像同义字一样，两者之意义甚为接近。如非于原著的文字有极精细的研究及于所叙述之事物非常的熟悉的人，则这种分

别，他们是决不能明白的知道的。所以于此种的翻译，普通的人极难从事。

这些都是足以使原文的所有的流利不能完全含有于译文中的；但较之成语，似易克服；如翻译的艺术高，这种的困难都是可以免掉的。

第三个问题“重译”的问题

什么叫做“重译”呢？“重译”就是把一种文学书，从一种的媒介里转译出来的意思。如有一本俄文的小说，因为译者不懂得俄文，只懂得英文，遂不得已只得由英文的这本书的译本，把他译出来。如此的辗转翻译的方法，无论哪一国都是极少看见的，但在我们中国的现在文学界里却是非常盛行。如现在我们对于俄国及北欧诸国的文学非常注重，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易卜生，安得列夫，高尔该，般生，诸人的作品，都有很多种的译本出来。然而他们的大多数却都是从英译的各家著作里转译出来，而非直接从俄文或脑威等国的文的原本上译出来的。因此，这个在无论哪一国都不成为问题的“重译”问题，在中国现在却变成是一个很重要，很需研究的问题。

“重译”的方法的盛行，确是一件很可伤心的事。因为由此可以表现出中国现在从事于文学的人之稀少，与我们的文学界的寂寞；从事于文学的翻译的只有那一部分的通英语的人，其余通各国的文字的人于文学都非常的冷淡，都甘心放弃了他们的介绍的责任。除了耿济之几个人外，中国人通俄文的也很不少了，为什么译俄国文学的名著的人却只有他们这几个人呢？除了马君武，郭开贞几个人外，中国人知道德文的人，也是极多极多的，为什么于 Schiller 的“William Tell”及 Goethe 的“Flaust”外，

竟没有别的德国文学的译本出现呢？我们之中知道史坎德那维亚的文字的也是不少，为什么又竟没有一本直接从原文里译出来的易卜生之戏曲或勃兰特（C. Brandes）的文学评论出现呢？因此，可以知道那些通外国文的大多数的人对于文学的兴趣，是如何的薄弱了。天幕碧静，山峦环抱；而纵目四顾，满是重山石岭，其点缀于此荒壤者，年年皆是那几棵盘曲之青松。万声寂绝，惟闻晨鸡偶唱，我们实不胜有凄凉，孤独之感！而介绍西洋文学已有数十年之历史，至今“犹有重译”问题，之需讨论，中国人之迟钝麻木，更应如何的浩叹呢？

重译的东西与直接由原文译出者相比较，其精切之程度，相差实是很远。无论第一次的翻译与原文如何的相近，如何的不失原意，不失其艺术之美，也无论第二次的译文与第一次的译文如何的相近，如何的不失其意，不失其艺术之美，然而，第二次译文与原文之间终究是有许多隔膜的。大体的意思固然是不会十分差，然而原文的许多艺术上的好处，已有很重大的损失了。譬如一张画，由原本上直接临下来的，与由别人的临本上重临下来的，其类似于原画之程度，无论如何，总是有一些差异的；又如有很满的一碗的水，由这个碗里倒于那个碗里，转倒之间总不免于一些水泻于桌上，若再由那个碗里再倒于别的一个碗里，则转倒之间，水又须泻漏了一些，与原来的那一碗水，比起来，少得更多了。

况且，在文学上，甲国的一种文学里的成语，在乙国的文字里找不到什么相当的成语来译他的，在丙国的文字，也许就能够有之。如果把甲国的这种成语直接译为丙国的文字，他们的意义与精神，是都能圆满的移植过来的。但如果丙国的人，译这本书，是从乙国的译本重译出来的，那末，这种的成语，一定是不能确切的翻译出来了。

同样的理由，甲国里的一种文学的风格与态度，或是所含有的“流利”（Ease）与精神，在丙国的文字里能够完全的很满意的传达出来或移转过来的，在乙国的文字里，也许就不能够像他一样的把他传达或移转在自己的里边。如果丙国译一本甲国的书，不从甲国的原本直接译出，而从乙国的译本重译出来，那末，他的那种译甲国的文学的风格与态度或是所含有的流利与精神的完全的满意的地方，都要一概牺牲了。

还有一层：一本以甲国文字写的文学书，其中的某段有一句或一个子句，或一个字，其意义是很确定而且单一的；但当这本书译为乙国的文字时，译者用一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歧义的文句，或子句，或字，来译他，如果丙国的人依据乙国的译本来重译这本书，他就容易为这个歧义所迷惑了。稍一不小心，他就要转入异途，弃与原文相合之意义，而从那个与原文完全无干的意思了。如此，岂不铸成大错么？

这还是说重译的媒介是很纯粹，很真确的话。其实，无论在哪一国的翻译的文学书里，要找到一本与原文完全相切合的，都是极不容易的。能者超越于范围之外，每任意增减原文，如蒲伯之译荷马之诗，增饰至多——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可以见之——赛勒（Shelley）之译 Euripides 之“The Cyclops”一曲也与 Woodhull 之译本不同。如根据他们的译本，把荷马之诗……重译出来，则是译蒲伯增订之荷马的史诗，不是译古希腊文的原本的荷马的著作……了。即他们的普通的译者，也常常的于原文有所移动。如格利薄哀杜夫（Griboyedov）的《智慧的悲哀》第三幕第二十二场，C. E. Bechhofer 的英译本，把“上帝吓，可怜我们有罪的人！”改为“上帝可怜我们吧！”把“朋友”添为“我的亲爱的老朋友”，又把赫勒斯拖活所说的一句话，完全删去了。又如 St. Martin's Librasry 的英译的《柴霍甫短篇小说》第二集

的《决斗》一篇，把原文的“戴着财政部的制帽”，译为“戴着财政部书记的帽子”，又把“伊文·阿特利迟·列夫斯基是一个瘦小，好看的黑头发的二十八岁的少年，”一句，译为“伊文·阿特利迟·列夫斯基是一个瘦小，好看的二十八岁的少年”，把“黑头发”这个形容词漏了不译。诸如此类之例，实处处皆可遇见，举之不可胜举。如把两个人译的同样的书对照一下，或把他与原文对看一过，就立刻可以发现出许多遗漏及移动之处了（如把Julius West英译的《邻人之爱》——他名之为“The Dear Departing”——与Thomas Selizer的英译本一对，前者把俄国的人名照样译出，如Masha；Sasha，Peter，之类，后者则都把他变成英国人的名字，如Mary，Aleck，Jimmie之类；我们立刻知道Jalius West的译文是较近于原文了）。如把他们的译本重译过来，无论是如何能合于他们的译文，而于原文总是不很对的。这些还是与原文没有什么大错谬的。如果把劣等的错误的译本来做根据，来重译一过，则一错再错，还不如不译之为愈了。

由此看来，重译的办法，是如何的不完全而且危险呀！我们译各国的文学书，实非直接从原文里译出不可。然而——

在现在文学的趣味非常薄弱，文学界的人声非常寂静的时候，又如何能够得到这些直接译原文的人才呢！如欲等他们出来，然后再译，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现在如欲不与全世界的文学界断绝关系，则只有“慰情聊胜无”，勉强用这个不完全而且危险的重译法来译书了。

重译的完全的，与危险的程度，与重译者的慎重与精审很有关系。重译者最好能（一）择译本里最可信的一本来做根据，来重译；（二）如译本有二本以上时，应该都把他们搜罗来，细细的对照一过。（三）译完后，应该叫通原本的文字的人，来把他与原本校对一下。如此，庶不至于有大错误发生了。

重译者最好也应该把他所以之为根据的译本的工作者——译者——的姓名与出版之年月，都写在他的重译本前，以明翻译的责任。如非根据一本，而系参照两种以上的同种的或异种的文字的译文时，这几个译者也都应记出；各本间如有大不同的地方时，在重译本也应特别的注出。

这种慎重的办法，希望现在从事于重译的人能实行！

（原载1921年3月《小说月报》12卷第3期）

审定文学上名辞的提议

一

什么是“文学上名辞”？“文学上名辞”就是指所有那些关于文学史上的，关于文学评论上的，及文学作品中所有的名辞而言。大概的把他分类一下，约有下面五种：

（甲）文学家的名字　包含诗人，小说家，戏曲作家，批评文学家，等等的名字，如亚利史多芬（Aristophanes），但丁（Dante），嚣俄（Hugo）[①]，巴尔萨克（Balzac），丁尼孙（Tennyson），亚诺尔特·马太（Arno Ld Matthew），勃兰特（Brandes），史德林堡（Stringberg）及莫尔顿（Moulton）等。

（乙）文学史上的地名　如俄国文学史上的基辅（Kiev），莫斯科，圣彼得堡，德国文学史上的威麦（Wirmar），柏林，法国文学史上的巴黎，英国文学史上的伦敦，爱丁堡，北欧文学史上的库平哈京，以及古代文学史上的雅典，文艺复兴史上的佛罗林

① 即雨果。

斯等一国或一时代的文艺集中之地，及托尔斯泰生地波尔若那(Polyana)，郭克里生地小俄罗斯，沙罗契尼（Sorotchinetz），霍威尔（Howells）生地奥海握（Ohio）之一小村，滋德曼生地东普鲁士之一小镇，等之文学家生地以及见于文学史中的一切地名皆是。

（丙）文学作品的名称　此亦为文学上名辞之一，如哈姆生之“Pan”，龚察洛夫之“Oblomov”，吉百龄之《三兵士》（Soldiers Three），阿且拔喜夫之“Sanine”，豪勃曼之《织工》，《沉铃》，惠德曼之《自我之歌》等皆是。

（丁）文学作品中所有的主要的人名与地名　如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札洛甫，罗曼罗兰“Jean Christophe”中的Jean Christophe，阿速特洛夫斯基《雷雨》中的加萨丽娜以及荷马史诗亚利史多芬，犹列比特戏曲中诸神名，英雄名，地名等皆是。

（戊）批评文学上诸名辞　如散文诗（Prose Poem），抒情诗(Lyric)，民歌（Ballad），理想主义，写实主义，趣味（Taste），评赏（Appriciation），喜剧（Comedv），悲剧（Tragedy），归纳批评法，判断批评法，主观批评法，讽刺文（Satire）等等皆是。

二

无论在使用哪一种言语的人们里面，这种“文学上的名辞”差不多都是非常统一的。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不用说；就是翻译别一国的，也非常的整齐一律。如英国人译俄国的文学作品，关于作者的名字，及书中的人名地名，都是用一律的英国字写出来；虽然 Andreef 也有写作 Andreyev，Gorky 也有写作 Gorki，然而所写的究竟是非常相近，人家一看，都可以知道是一个人。虽也有把原书的名字改了一些，如 把高尔该的《在底下》（Na

Dnie）改为《夜店》（Night Refuge）之类，然而究竟是极为少数。至于批评文学上的名辞，则他们更是划一不移的。

只有在中国则不然。用中国字写的书，关于文学上的名辞，向来是不注意于统一；同是一个人，在中国也许就会变成五六个乃至十多个不同的人，因为他的名字的译法，人各不同；同是一位杜斯退益夫斯基（Dostoyevsky），你把他译成陀司妥夫士忌，我把他译成杜斯脱叶福斯奇；同是个夏芝（Yeats），有人把他译为夏脱，也有人把他译为依志。D' Anunzio 则译为单南桥，段南哲，唐咴遮；Defoe 则译为达孚，德和，地佛；Goethe 则译为葛德，歌德，贵推；Zola 则译为槎拿，左拉，曹拉，左喇；Maupassant 则译为摩波商，孟伯骚，毛柏桑，莫泊三；Turgenev 则译为屠格涅夫，脱坚勒夫，都介尼夫；Tchekhoff 则译为捷苛夫，契诃夫，柴霍甫。诸如此类，实不胜枚举。大概十人之中，对于一个名辞，差不多是没有三个人是用同一之字的。他们都逞自己的意思，随意乱写。我上面所举的几个例，不过是临时就书架上所有的书寻出来的；这些书都是近一二年出版的。如果再加一番搜查的工夫，把前几年，几十年的书也检查一下，其所举的，恐怕要比此还要多出几倍来呢。

不惟几个人译同一个人名用了许多不同之字，就是一个人前后所译的，有时也会互相参差起来。梅光迪在他的《近代欧美文学趋势》一篇文章里，在前二十行把 Wordsworth 译为华特斯华斯，后二十行又把他译为华次华斯。就是我自己，有时也常是如此。在《改造》三卷四号的《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里，把 Sologub 译为苏罗葛卜，在《新学报》第二号的《俄国文学的特质与其略史》里又把他译为苏洛格蒲。有一次，在十几张纸前，译 Kuprin 为吉勃林，后十几张又把他译为库卜林。复看之下，很觉得自己好笑。

不惟文学家的名字的译法如此纷乱，不能划一，就是书名，地名，以及批评文学上的名辞，也都是同样的如此不一致。梅特林的“La Mort de Tintagile”，有人译为《丁泰琪之死》也有人译为《登台岸儿之死》；史丁芬孙的“Treasure Island”我译之为《宝岛》，有人则译为《金银岛》，或是《珠宝岛》；豪勃曼的“Before Dawn”有人译为《日出之前》，也有人译为《东方未明》。Wirmar 有人译为槐马，也有人译为威麦。Classicism 有人译为拟古主义，有人译为古典主义，也有人译为古学主义，Romanticism 有人译为浪漫主义，有人译为罗曼主义，也有人译为传奇主义，Symbolism 有人译为象征主义，也有人译为表象主义。

无论用哪一种文字的人们，对于文学名辞的使用，大概没有比中国人再杂乱无章的了！

三

如此杂乱无章的文学名辞，自由的无规律的使用，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最大的危险，就是使读者易于迷惑甚且至于误会，至于错谬，如 Howells 之译为霍威尔，或豪威尔士；Maeterlinck 之译为梅德林，梅特林克；Andreyev 之译为安得列夫，安特莱夫或安得雷夫；Dandet 之译为多德，或都德；Brièux 之译为白利安，或白利欧；Wilde 之译为淮尔特或王尔德；Macaulay 之译为麦加莱或马可黎，Carlyle 之译为加莱尔或卡莱尔；Shelley 之译为薛雷或薛利等，或者尚不至于十分费人思忖，寻求。然而不懂外国文的人看了，已觉得有一些迷糊隔膜的样子。至如 Strindberg 之或译史德林堡，或译士敦堡格；Racine 之或译纳新，或译拉兴，或译兰辛，Voltaire 之或译福特耶，或译福禄特尔；Pope 之或译

波卜，或译蒲伯；Arnold 之或译埃诺特，或译阿罗德或译亚诺尔德，Ruskin 之或译路史坚，或译纳士金，或译罗思金；Gogol 之或译戈葛尔，或译郭克里，或译歌郭里；或歌歌黎，Korolenko 之或译苛罗冷可，或译克洛林科；Herzen 之或译曷层，或译赫尔岑；Tagore 之或译台 峨尔，或译太戈尔；Galsworthy 之或译高尔史瓦塞，或译高士倭仙，或译戛尔士 威斯；Sinkiewicz 之或译显克微支，或译辛奇魏志；Longfellow 之或译长人，或译朗佛罗；则苟非下注原文，或叙述其人之事甚详的，差不多就是使很懂外国文，很知道文学的人一看，也会茫然莫辨。如果叫初攻文学，或不懂外国文的人看，其不至于误会的，恐怕是百无一二了。阿利克塞·托尔斯泰有一本历史小说，名为《银王》的；有人把他译为中文，改名为《不测之威》；我看见那书名，始终不知道就是《银王》那本书的译本；威尔斯的《时间机》也是一样，译者把他改名为《八十万年后之世界》，我也是到现在才知道他就是《时间机》的译本。这种译法，真是误人不浅。如果文学名辞统一了，又何至引起这些误会或无知呢？咳！名辞的不统一，不惟给读者以谬误的知识，还要妨碍他们的研究的心理呢！

除了这个大害以外，对于翻译或著书的人，也极有害处。如果文学名辞向来有审定过的，翻译或著书的人就可以直接用上，不必自己再去翻译，或去折衷几个译名，而去其适当的，或是把原文附在下面。这样一来，他可以省事得多了。现在因为没有把文学名辞统一过，所以翻译或著书的人，往往感受到许多苦处；不惟遇到一个名辞要细细的想过，自创一字以译之；并且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于一文前后常有用异字来译同名的；其实不惟我个人如此，很多人也往往的于前天译了这个名辞，用这个字译他；明天完了，又用另一字来译他；复看的时候，又要费许多的时候

去一个一个的改正他们了。如果要他前后不互异，则又非费许多时间时时的去检看前面的自己的译文不可了。

还有一层；文学上名辞，如不统一，将来中国的大辞书，或是百科全书，恐怕是终难出得成的。因为文学名辞如此的纷乱，简直是无从搜罗起；即使能搜罗完备，恐怕也没有那样多的篇幅把他全列进去啊!

我敢大声疾呼，以告于研究文学的同志，苟不于现时把文学上的名辞，审定过把他统一起来，欲想中国文学知识的普遍与提高，恐怕是要像“缘木求鱼”，终不可得达的了。

他们学科学的人，已都知道名辞审定的重要了。所以化学，医学，机械学等的名辞，都已详详细细讨论过；审定过。只有文学上的名辞，还是如乱丝一般，丝毫未曾抽理。现在的文学研究者实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

四

我愿意先把我的关于审定文学名辞的意见写出来和大家讨论。

文学上名辞，照上面的分类，大概有五部。其实归纳起来，只许用两种方法来翻译他们就够了。第一种是译义；第二种是译音。译意是文学作品名称的大部分，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法蓝士（A. France）之《红百合》（Red Lily）等，及批评文学上名辞的全部。译音的则凡人名，地名及一小部分的书名都是。

除了可以译意的名辞以外，有一些人主张把所有应该译音的字，都照原文直写下来，可以不必翻译，因为译出来的音，终是不可相切合的，并且音译的字，又都是非常累坠可厌的。周作人

先生就是主张此说的一人。他所著的《欧洲文学史》，也实行了这个主张，把一切应该音译的名辞都不译。

这种办法，我非常不赞成。因为第一，中国文中夹了许多外国字，看来非常吃力，不惟直行式的本子不方便，就是横行式的本子，也是不大方便。第二，不懂外国文的人，非常吃苦，他们简直没有法子看这种书。就是懂得一两国外国文的，也是不行，因为懂英文的看希腊文，也同不懂外国文的人看英文一样的吃亏，不能理会。所以我对于音译的名辞写原文的办法，认为是很不对的一个方法。

如果用原文而没有不方便的地方的话，则这种办法，确是极好，因为所有一切应该"译音"的名辞，就可以不必译出，更不必加以审查，而统一他了。惜乎这种办法不合实用，所以应该音译的名辞，有不能不加审查之势。

五

音译的名辞的审查，有三层应该注意的事：一，所译的音，应该照原文读出，不应由第三处语言中转读而得，不然，则有不正确之弊。如 Hauptmann 一字，有译为豪勃曼，有译为霍托曼；苟非知德文原文，又谁知哪一个译名是对的呢？又如 Strindberg 一字或译为史德林堡，或译为士敦堡格，苟非拿瑞典原音来译他，又谁知道哪一个译名是对的呢？又如 Louis（路易）、Flaubert（佛罗倍）诸字，如照英文的音，而不照法文原音来读他，则非把他们译成路易斯，及佛罗倍特不可了。诸如此类，随处都有遇到，审查这种名辞的人，实不可不十分注意。二，二个"名字"，有字音非常相近的，如果把他们译成相似的中文，有人就容易会误会，以为是同一个人了。如德国的诗人 Schiller 和英

国的诗人Shelly读音颇为相近；如把Schiller译席劳，把Shelly译席勒，错固然不能算为十分错，然而骤看起来就足以使人误为是一个人了。又如英国的小说家Kipling和俄国的小说家Kuprin音也有些相似，如把Kipling译为吉卜宁，把Kuprin译为吉卜林，虽然与原音没有十分大不合，然而已足以致读者的许多的误会了。这种情形，恰与前举之Sudermann之译为朱德曼，色特曼，苏德曼，或滋特门相同；彼足以使读者误一人而为数人，此则足以使读者误数人而为一人；审查的人，对于这一层实应十分的注意。如把Schiller译为席勒尔，把Shelley译为薛雷或薛利；把Kipling译为吉百龄，把Kuprin译为库卜林，之类，使他音虽相近，字形则异，使这一层的误会，不致发生。三，关于文学家的名字，普通的译法，多只译其“姓”，其“名”则因平常不多用，不惟知者甚少，就是译出者也不很多。除了作者传记，及文学史上有全用他们的姓名的地方以外，其外差不多都用一个“姓”，而不连带他们的“名”。如Francois Coppee，我们译他总只译为考贝，不把Francois这个字也译出来。就是译出来，也极少同时用他。——审定时自然要把他一块儿译出来，一块儿审查过——但也有例外的；一如，Edgar Allen Pol同时具有两“姓”，一为Allen，一为Pol，普通都把他的两个“姓”一块儿译出来；译为亚伦·坡，二，如Bernard Shaw；Shaw是“姓”，Bernard是“名”，普通都把他姓名一块儿译出来；译为萧伯讷。这种例外的办法，似乎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如果照通例只译他们的“姓”，只译为坡或萧在中文里是很为不辞的。在这一层，审定的人也应该注意，应该允许这种例外的存留。

除了这三层以外，还有二种事情，也应该要留神一下：一，著作家常有用假名字的。竟有久则以假名著，而真名反隐晦，不为人所知的。如高尔该（Madin Gorky）是假名；他的真名是

Aleksyey Maximovitch Pyeshkoy；路布岑（Ropshin）是假名，他的真名是 Savinkov；到了现在，大家都知道高尔该，和路布岑。他们的真名除了在文学史上可以看见以外，普通的，竟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了。这种假名的审定，是应该十分注意的。二，文学家常常有父子、兄弟并名于世的，他们的姓自然相同；通常，人家恐怕难以区别，往往加以“大”“小”等字，以为之别识。如法国仲马（Dumas）一家，父子二人都极有名，大家就加他父亲亚历山大·仲马（Alexandre Dumas）以大仲马的名字，以别于他儿子小仲马。这种通俗的名辞，也应留意。如没有这种通俗的称谓，则姓名应该全写出来，以为分别，如美国有二个詹姆士，是兄弟二人；一个是亨利·詹姆士；一个是威廉·詹姆士。我们不应该单举其姓，而应该称之为亨利·詹姆士，或威廉·詹姆士以为区别。

六

对于音译的文学名辞的审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讨论，就是：“音译的文学名辞，应该用汉字译呢，还是注音字母译呢?”

这个问题，别的人似乎是没有讨论过。只有在《新社会》第十二号及第十四号里，我的朋友许地山和耿济之曾经略为辩论过。当时我本想也加入讨论；不意《新社会》忽然被封，我的文章也因此搁置未做。但我想：这个问题终究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因乘现在的时候，特为重新提出讨论一下。不过他们所讨论的是包括所有的各种科学上的名辞，我现在所论的，却只限于文学上的名辞；这是要注意的。然而无论如何，结论总是一样的；如果文学上的音译名辞，研究的结果，觉得可以用注音字母译，

那末别的科学上的名辞自然也可以注音字母译了。

许地山是极端主张译名应该用注音字母译的。他所主张的理由是：

（一）离本来的音最近　要在本国的文学里头找一个和外国音相近的字本来不难，因为所有的音都离不了牙，舌，唇，齿，喉，几个声根。然而在中国字上头却不容易。中国的读音不统一，同一个字，在这个地方舌音，在那个地方就变成牙音；在这个地方是轻唇音的，在那个地方，又变成喉音了。所以在汉字上要找一个五方不变音的字是绝无仅有的。若是说以国语为标准，恐怕写的用国音，读的还是土音，结果那国音的效用也要丧失了。我想对于译名用汉字，非得将来读书统一，规定译“A”用某字，“B”用某字，“C”用某字之后才可以办，现在还早着呢。现在可以用的只有注音字母和照原文写上，注音字母以音为主，对于喉变唇，舌变牙的弊病自然不会发生什么关系……

（二）字体一律　字体不一律，就要教看书的人费好些工夫去查考，所以要教念书的人对于译名容易理会和节省注意的力量，就当用一定的字体去写。古时译书的人也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我们知道“华严四十二字母”就是中国人用来规定译名最早的字，但是其中也有许多缺点——好像“娑迦二合”和单用的“娑”字“迦”字没有分别，“沙”字和“娑”字重复等等——初看佛书的人有时将一个人做几个人看，那原故是因为所用的字不一律。念的音有一点不同，就弄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用注音字母把他写出来，对于字体一律的问题自然不会发生什么阻碍。

（三）容易忆写　大概在写字台上做工夫的人都是很忙的。有一个新名字来了，想把他翻成汉文，有时想了大半天也不曾想出一个很合适的字来，这都是因为个人所操的方言不同，既然

不敢用自己的方言写上，对于国音又很怀疑，所以写出来的译名都不能十分切当。有些人还要用中国的姓氏字去翻译外国的人名，结果就到一个“削趾适履”的地步。在学校内好些学生都说外国的地方和人名最难记，其实在记忆里头，本来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译书的人大费工夫穿凿，致有这种困难。若是用注音字，就可以除掉译者和读者时间的浪费，和记忆的不便，因为注音字母的写法简单，写的时候，一定没有困难的。

这是许地山的意见。他还说：“有人说注音字母现在不大通行，写出来恐怕人家不懂得。我也早想到这层，但是我们既然承认读音统一是当急之务，注音字母是传播文化的新器具，个个人就当快快的把他学会才是。我想一个人用两个钟头的工夫就可以明白了。”又说：“译名譬如英吉利等字，习惯常用的，可以不必改切注音字母。若旧译歧异过甚的，则必须改切注音字母，以省辩论与记忆。”

耿济之的主张与许地山不同。他是主张“以原文为主，原文附译在下面”的，他说：“因为写了原文，令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这是哪个地方；直捷了当，决不会发生别的疑团 。至于为那些看不懂外国文的人设想，那只能以中文翻译为补助。……中国异字同音的很多，虽然里头也有声的区别，但是要拿来将就外国字的译音，那是毫没有标准的。譬如‘To’音，作‘道’，有人译作‘托’有人译作‘讨’，也有人译作‘杜’。我记得我翻译外国人名的时候，每逢‘S’字母，前面翻得是‘司’字，后面不知不觉翻了个‘斯’字。……但是我以为这种弊病，要是在我的主张里，那是决不会发现出来的；因为我主张以写原音为主，那中文不过是附译在下面，便 利不懂外国文的人，一方面又可以供懂外国文的人的参考。……”

他对于许地山的主张，却不赞成。他说：“至于对于许君注

音字母译名的办法，所以觉得不妥当的缘故，因为我对于注音字母本身上，有点怀疑的 地方。我听见别人说，注音字母很 有些缺点。有许多南方音多没有加入。并且他经教育部订定的时候，是用多数表决出来的，既有可决的音，那末定有否决的音，其不完备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对于注音字母没有研究过，所以对于他的本身问题，可以不必多说。况且注音字母在外国字母里也有许多翻不出来的地方。这一层许君也已承认。他说：'外国的字音，在注音字母里头也有些翻不出来的。好像'th'的音在中国本来没有，不论如何，我们不能找出一个最合式的字来。'D'和'R'也没有切当的字和他们相合。'这个在罗马字母上是如此，再拿俄国字母来一比，那注音字就更有许多翻不出的地方了。如'P'，'M'，'M'，'O'，全是翻不出来的。"

对于许，耿二位的主张，我都有些不敢赞成。耿济之的"以原文为主，中文附译在下面"的主张，我更认为是"权宜"之计，并且是极不妥当的计划。"原文在上译文附在下面"，与译文在上面，原文附在下面，其效果是一样的。不懂原文的人，他还是看下面的所译的字。如果这个字有许多不同的译法，他看了还是不懂，还是迷惑，与看那"译文在上面，原文附在下面的办法"的排列一样。而这种办法，不惟不能便利，并且还有很大的弊病 。译文在上，原文在下面括弧中的办法，与中文的联贯是无害的。如果换了原文在上，译文在下面括弧中，不懂外国文的人，看过起实是非常吃力的。因为中文一句中忽然横插上一个外国文，殊觉碍眼而且不好念。不求译名的统一，而用这种权宜的办法来救济，实是一些没有用处的。

要之，原文在下或是在上的问题，是一个很细 小的枝叶问题，我觉得更重大的问题乃在：怎样可以除去外国文不用，而专用一个统一的名辞，来替代他，使读者一看就知道？无论在哪一

国，他们的译名是决没有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必要附“原文”在下面的。

专用一个统一的名辞，来替代原文，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把译名审定一下，就可以了，只是：译名用什么好呢？用汉字或是用注音字母？——这个本来的问题又发生了。

许地山所说的用注音字母的好处，我都赞成；现在的翻译的名辞，实是杂乱极了。用注音字母也许是能够渐渐把他统一起来。不过不用注音字母也有能够统一的希望。因为汉字如果审定而归于一律，许君对于注音字母所称许的三个好处，他也是可以条条具有的。（一）离本来之音最近。这一层不生问题。因为许君也承认：“对于译名用汉字，”在“将来读音统一，规定译‘A’用某字，‘B’用某字，‘C’用某字之后”，“可以办”。以前的时候，译名没有经审定，所以各人用他本地的口音来念；与原文相差自远；如果现在用国语来把他们审定统一过，他的自然会很准了。现在虽国语未臻十分完备，然固有此物在。也不难如以前规定用来译佛经的“华严四十二字母”一样，也把国语规定出若干字来，“规定译‘A’用某字，‘B’用某字，‘C’用某字”，这固然不能与原音十分切合，也一定有许多字母不能读出来，然而与注音字母的不完备的程度，也许是相等；因为注音字母对于罗马音也有些不能译出。“好像‘th’的音在中国本来没有，不论如何，我们不能找出一个最合式的字来。‘A’和‘R’也没有很切当的字和他们相合。”“再拿俄国字母来一比，那注音字母就更有许多翻不出来的地方了，如‘P’，‘M’，‘M’，‘O’全是翻不出来的。”大概注音字母所不能翻的，除了罗马及俄文的这几个字母以外，在别国的字母中必定是还多呢。如此，注音字母也是很不完备了。况且，用汉字来音译原文，是可以把原文几个字母合译为一个字的。注音字母则不能，非字母对字母的译出

来不可。如遇"M"，"A"等字，他就只好勉强译过，反不如用汉字译之也许可以较为切合于原 文了。

（二）字体一律。现在字音译的文学名辞，所以不能字体一律的原故，完全是因为名辞未经审定，不能统一之故。如果名辞经过审定，字体自然是会一律；决不会再有什么 D'Anunzio 译为单南桥，或唐哝遮之弊病。所以汉字之能用一律的字来译文学名辞，是不比注音字母不可能的；也许比注音字母还整齐呢。注音字母译"K"有二个音，即"ㄍ"和"ㄎ"；译"T"也有二个音，即"ㄉ"和"ㄊ"。偶一不慎，必定是要歧异的。我看见英文译俄文之"Φ"字，或为"f"，或"ff"，或为"V"，译俄文之"ih"，或为"y"，或"i"；由此可知中文的注音字母也必会有这种歧异了。如此，倒不如用一律的汉字译之反能永远整齐不变了。

（三）容易忆写。汉字译文学名辞之难于忆写，也完全是因为以前没有审定统一过的缘故。如果能够审定为一律的名辞，我想决不会比注音字母还难忆写的。

总之，注音字母所有的三个利便之点，汉字都是可以具有的——只要他一统一——汉字的译名的种种不利 便，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审定之故。如果能够审定，把他们统一起来，其利便且有更过于注音字母的地方。

况注音字母的使用，还有几层的不方便；第一：注音字母现在还不通行，懂得人太少。用他来译文学上名辞，恐怕要有许多人要望而生畏，虽然许君劝人"快快的把他学会"，然而恐怕没有许多人那样听话吧！欲统一文学上名辞，求其普及，而反故晦之而使许多人不懂，"为计之左"，莫过于此了。其不便一。第二：如用注音字母来译文学名辞，所有的旧译，是不是要完全改译过？如果要完全改译则又有许多不便了：一，"如英吉利等字，

习惯常用的”，骤然改译为注音字母，许多人是反要迷惑起来的；二，把旧译完全改译，工程之大，亦颇可惊。决不如汉字名辞，统一之仅须大部分费审定之功，小部分费自己创译之功之省力。如果不完全改译，把旧译之名辞，“如英吉利等字，习惯常用的”仍旧不动，“可不必改切注音字母”，则文学上的名辞仍是互相歧异，决不能有统一之望。那么，要费那番审查之功做什么呢？其不便二。第三：注音字母译专名，是字母对字母 译的，写起来非常的累重；如 Plato 这个字用汉字译只要“柏拉图”三个字就够了，如用注音字母，必须写作“ㄆㄌㄚㄊㄨ”。不惟费纸，而且费时间。其不便三。

因此，我很反对许地山的主张。不赞成用注音字母来译文学上的名辞，而极力主张用汉字来审定文学上的名 辞。不过这个问题很重大，也许我的意见是不很对的。很希望仁爱的读 者及耿许二兄再加以详细的辩论。

七

上面讲音译的文学名辞的审定，讲得很多了，以下应该略叙我对于义译的文学名辞审定的意见。

义译的文学名辞，其审定之不易，较音译者为尤甚。一因音译的名辞，只须译其音即已足；译音即稍差异，尚无甚关系。至于义译则不然。所译的必须与原文非常相近；稍一差异，即能失之千里。二因音译之字，前人所译者尚多；有一部分只须集合之而加以审定而已。义译的则不然。中国对于批评文学的书，一本也没有介绍来过。所以现在对于他的所有名辞，都须自己创造出名辞来译他们。而这种名辞，又都是含意广而定义难的。所以义译的名辞的审定，其难实较音译者为倍蓰。

义译的名辞的审定，须分两种：（一）是关于文学作品的名称的；（二）是关于批评文学上所用的各种名辞的。

文学作品的名称，其译名之审定，较批评文学上的名辞为易。只须切合于原意而已。如般生之《挑战的手套》，安得列夫的《七个绞死者》，易卜生之《野鸭》，柴霍甫之《海鸥》等，所译之书名与原名是极切合的。这种的切合，颇为容易，因为译这种题目，正同译书中的句法一样，一些不会感什么困难的。

惟有一层最应该注意，就是如这种书名是从第三种的语言中译出来的，必须还要与原文对照一下才好；因为第三种语言的这本书名的译文，与原名也许是不相切合的。改原书的名称，以求适合于本国人的眼睛，不惟中国人惯做此事，就是英法诸国的人也是如此的。——不过中国甚之而已——如杜思退益夫斯基的《死人之家的回忆》，英译本或译之为《死人之家的通信》，或译之为《西伯利亚的生活》，或简译之为《死人之家》，与原文都有不同。又如安得列夫的一本《爱人之爱》，英译名作为“Love of One’ s Neighbour”，又名之为《亲爱的别离》（Dear Departing）。骤看其名，没有人不以为是两本书的。如非对俄文原文，又怎么知道哪一个名称是对的呢？

批评文学上之名辞，其审定真是极难。有一部分的名辞如Romance（可译为“传奇”），Novel（小说），Opera（歌剧），Plot（情节），Imagnation（想象），Emotion（情绪），Free Criticism（自由批评法），及Act（幕）等尚容易译。如遇Novelette，Expression，Style Humor，Literature of Address等字，直是要大费思索了。Novelett一字，是比小说（Novel）短而短篇小说（Short Story）长的一种小说，在中国简直是无法译他出来。Expression或译为表白，或译为句法，或译为语 气；在英文里，用的同是这一个字，在中文里就要看他用在什么地方，然后才可用什么字

译他了。Style 这个字，我为他所苦尤甚。有人译他为体裁，或文体，有人译他为章法，我觉得都不对。体裁或文体不足以尽其意；章法更非其真义。我想来想去，想 出“风格”二个字来译他。然而也终觉得不十分好。Humor 或译为滑稽，或译为活气。“滑稽”殊不能尽其所表现的意义，活气则与原来的意思相差更远，较之“滑稽”尤坏。然而我虽知其不很对，却始终不能创一个更好的字来译他。Literature of Address 是 Oratory（演说术）的别名，然而终不能也译他为演说术。我想了二三点钟，只能直译他为“演说的文学”。然也自知其终不甚切，且病累重。由此可知批评文学上的名辞是如何的难译了。

这种字的翻译，只有靠译者的天才与深思。惟有天才高而肯深思的人，才能想出极好的字来译他——审定他。

八

以上不过是我个人对于审定文学上名辞的一点意见。我极希望在现在的时候，有一个文学名辞审定会出现，把所有文学上名辞都审定一下；排紊杂而归之于一体，编一文学大辞典，如医学辞典，化学辞典等一样。其造福于中国的文学界，我知是未可限量的。

这个事业，实非开会讨论不为功，决非个人在斗室 中所能做的。不过这个审定会的组织要非常注意，最要的是通世界各国的语言的，都要有一个人在里头。其次就是讨论得要非常精密而且周详。如此，其所审定的名辞，始能正确而且行远。

在这个会未开之前，我愿意国内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多多的讨论。以供他们的参考。

对于郑君的提议，我以为第五项（批评文学上诸名词）应得

合几个人来研究讨论；但是我很怀疑讨论结果审定了的译名能叫人人满意，处处可用。因为中西文组织的不同，往往有甲字用在甲处可采甲译，换了一处便不可通，就算勉强可通，决不能使人明了：这是留心的了解原文与译文的译者常碰到的。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科学上的专名可以审定，文学上的却未见得都能审定之后不发生流弊的！至于第一项，因为现在国语不普及，审定后也是不能行远；这缘故在中国各地的方言相差太远。第二项（地名）很可让地理专家办理，而且他们早就在着手。第三第四我以为不关紧要，因为一看内容，便可明白。这只是我一人的意见，还请大家讨论。

沈雁冰附注

（原载1921年6月《小说月报》12卷第6期）

十四年来得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家

叙　言

诺贝尔奖金，是瑞典发明家诺贝尔（Algned Nobel）所给予的。诺贝尔生于一八三三年，死于一八九六年。死后遗嘱以其财产，九百万金元的利息，创为诺贝尔奖金。其奖金之种类为（一）于物理学上有最重要的发明者，（二）于化学上有最重要的发明者，（三）于医学上有最重要的发明者，（四）著作最特出的理想化的文学作品者，（五）于世界和平运动最有力者。此五种中，每年皆有一人或二人得奖。第一次给奖在一九〇一年。此后每年皆有发表。惟自一九一四年欧战起后，各种奖金多有保留或未发表者。

文学奖金由瑞典文学会（Swedish Academy of Litt）发给。第一次得奖者为法国的 R.F.A. Sully-Pwdhomme。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六年的得奖者则为 Th.Mommsen（德），B.Bjoruson（挪威），F.Mistnal（法）和 I.Echogonay（西班牙），H.Sienkiewicg（波兰）及 G.Carducci（意大利）。此数人皆为近

代很有名的理想派作家。

至一九〇六年以后的得闻者则列于下表：

十四年来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者

1907 吉卜林（R.Kipling）（英）
1908 倭铿（R.Eucken）（德）
1909 媥格洛敷（Selma Lagerlof）[①]（瑞典）
1910 海士（P.V.Heyse）（德）
1911 梅德林（M.Maeterlinck）（比）
1912 霍夫特曼（G.Hauptmann）（德）
1913 太戈尔（R.Tagone）（印度）
1914 未发表
1915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法）
1916 海定斯顿（Verner Heidenstam）[②]（瑞典）
1917 琪理洛夫（Gjellerup）与彭托比丹 Pontoppidan（丹麦）
1918 保留
1919 史辟德拉（Carl Spitteler）[③]（瑞士）
1920 哈姆生（K.Hamsun）（挪威）

上表系参照“The world book”和“New age Encyclopadia”二书而译出者。二书的记载，很有些不同地方，如“New age Encyclopadia”于一九一四年下不注“未发表”数字，又以一九一五年的得奖者为罗曼罗兰和海定斯顿二人，皆与“The World

① 今译拉耶勒夫。
② 今译海顿斯坦。
③ 今译施皮特勒。

book”不同。我遇见这种地方多根据“The World book”写下。因“New age Encyclopadia”错字很多，不大可靠。

我本想作一篇《十四年来的文学》或是《十四年来死去的文学家》，因为时间匆促，不及搜集材料，只好作了这一篇东西。

我作这一篇东西的意思，并不是以为得诺贝尔奖金的几个文学家足以代表这十几年来的世界文学界的趋势，也并不是说，现在的最著名的文学家不过是表上的这几个人。我们要晓得，诺贝尔奖金是只给那些理想主义的文学家。凡是实写派作家无论他的著作如何有影响，都是不能得奖者。所以这篇文章不过是一篇介绍一部分的现代的思想派作家的文字而已。

在这篇文章里我本想把上面表上所列的十三位作家都介绍一下，但倭铿（Eucker）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文学作品，我尚未见过，自然不便在此说他。还有得一九一七年文学奖金的琪里洛夫(Gjellerup)，因为他的生平，我还没有知道，——关于他的参考书，还没有找到——所以也略去未讲。底下所讲的只有十一个人。把这种残缺不全的文章，贸贸然发表出来，自己实在是很觉得惭愧。

一　吉卜林

吉卜林（Rudyand Kipling），年纪不老，然而已享受了二十多年的荣誉。他从 Mcgill 大学，Qurnam 大学，Oxfond 大学及 Cambridge 大学那里都得了荣誉学位。一九〇七年又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他生于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他的生地是印度。少时在一个英国学校里读书。很早的时候，他就在印度报纸上做论文了。一八八〇年后，他渐渐从事于诗的制作，起初他的诗登在本

地报纸上，后来竟很流行。许多人钞了很热心的歌咏着。

《早熟》的成功，使他更热心于文学的努力。他的作品，诗的、散文的，一册一册的，非常迅速的产生出来。他的名誉扬溢于四方。一八八八年一个伦敦出版的杂志叫道："一粒新的光明的文学星在东方升起了!"

他的出产力的丰富，使读者诧异不已。而其"质"又是很精美的。如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六年的三年中，他所发表的"Depantmental Ditties"，"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Soldiers three"，On"Black and white"，"The story of the Gadstys"，"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The Phantom Richshaw"，"Wee Willie Winkie"等作品，其叙述之新颖有力，使全欧洲为之惊喜。到处都批评这个新的作家。吉卜林三字如春笋一样的，时时出现于各国杂志报章之上。也有些人不喜欢他，以为"比他为恒星，不如比他为彗星之适当"。

也有些人说道，吉卜林之著作只是在一时的热诚中作成的；他的著作热如风中之萤火，只是间时而亮，不能持久。不以他能作长篇小说。

但是这个批评，吉卜林已使他的作品"The Light that Failed"答复他。这部书虽不大好，但却表现出吉卜林的灯还有十分充足的油在里边。

一八九五年，《林童》（"The brusnwood boy"）出现，吉卜林的位置大定。一八九六年，"The Seven Sea"出版，第二年"The Recessional"出版，他的名誉益高。

一八九七年，吉卜林第二回从事于长篇小说的努力，出版一部《勇船主》（"Captains Counageous"）；可算是成功的作品。第二年又出了一部重要的著作，"The Day's Work"。

正在吉卜林名誉极高的时候，他一病几死。他那个时候在纽

约。他患的是肺炎。他所常常刺讽的美国人民，一闻他生病消息，非常焦急而且惋惜，希望他病好的心理极为热切；比之他们在一个将死的总统的床边还要感动些。

这一年是一八九九年。自此以后，他的病虽好，但文学作品的气味竟与前划一鸿沟。

我们读吉卜林早年的著作，因为我们喜欢读；我们读他的二十世纪的作品，只因为是吉卜林做的。幸喜他以后的作品，不在早年出版。如果这种著作不写上吉卜林三字，书店里能否代他出版还是一个疑问呢!

吉卜林的早年的名誉所以能如此突然而遍传各处，大半是因为他在一个文学的新土中工作的原故，近三四十年来，执笔以谋生者日多。文学家，小说家亦成为职业。笔就是他们的生活的器具。杂志上满篇累牍的小说，除了文字精工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没有什么话说，就是因为他们的作者本没有什么话可说。正如玻璃柜中的蜡人，只见具形而毫无生气。一般读者所缺乏，所日夜要求者就是“生气”。吉卜林在此淆浊无聊的空气中，挺然以生花之笔，写出“生气虎虎”的作品，自然会使读者惊喜欲狂了!

但是在他晚年呢？他已不是一个文学家，却变成一个帝国主义者了。他在二十世纪中做了许多帝国主义的诗文。这种东西与其说是文学，倒不如说是“怒目疾呼”的粗暴的政论。只不过以吉卜林三字迫得读者不得不读而已。只有近来出版的一部小说集“Action and Reaction”尚有十九世纪吉卜林的风味，足以使人欢迎。

但在大体上讲，吉卜林的著作至少有五分之四是很好的，很成功的。

在吉卜林的作品中，到处鼓吹着“工作”主义。他的福音就

是“工作”二字。他以为人间最不可恕的罪恶就是“懒惰”。这种福音我们以懒惰著称的中国，应该细心的领受!

(本段根据 Phelps 的“Essay on modern noverlists”)

二 娅格洛敷

自得了一九〇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后，娅格洛敷女士(Selma Lagerlof)的名字才为她本国以外的人常常的称道。其实在许多年以前，她在她的本国瑞典，就很为一般人民所崇拜了。

她于一八五八年，生于万兰(Varmland)地方。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脑筋中已储蓄了许许多多的斯坎德那维亚古代的传说、故事。她后来进了学堂，当初级班的教师。到了三十岁以后，她又继续的作这个工作。她更搜集了许多故事和传说，计划着做小说，一到了闲的时候，就下笔去写。

一八九一年的时候，娅格洛敷在经济上受了很大的恐慌，迫着她立刻卖掉她的住屋，以应此需要。在这个时候，瑞典的一个杂志，“The Odun”，悬了一千三百元的奖金征求最好的限定长短的小说。在征文截止期的八天前，娅格洛敷女士把她历年所写下来的《北欧故事》选出五章来，把他扩充开来，重新写过，增加了四十页的材料。恰好在征文截止日的早晨完工，立刻把他送到“The Odun”编辑部去。到了十一月征文揭晓，娅格洛敷竟得了这个奖金。不惟在经济上得了很大帮忙，即她的名誉，也因此渐渐的兴起。这本有幸的小说，她后来把他重写定为“The Saga of Gosta Berling”一书。自此以后，她不再教书，只是一心一意的致全力于著作。后来又出了许多短篇小说集，在本国非常的受人欢迎。有许多人要求她做一本给瑞典学校当课本用的书。她答应了。结果产了“The Wonderful Aduantuus of Nils”，这是

一本愉快而易读的神话的地理书。不久又出了一本与此同样的书。

一九〇七年五月，“Upsala”大学赠妣格洛敷女士以名誉哲学博士的学位。第二年是她的五十岁生辰，也举行得非常热闹。一九〇九年，她得了诺贝尔奖金。

她所代表的是理想主义的复归运动。虽然有许多小说，她的叙述是写实的，但却都是具有理想派的精神的。

（本段根据 Ashmun's Modern Short Stories）

三　海　士

海士（Paul Johaun Ludwig Heyse）是德国现代的一个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他于一八三〇年三月五日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学者克尔海士（Karl Heyse）。少时在柏林读书。一八四九年进彭尼大学（Boun Unversity）学罗马文。一八五二年得了博士的学位。在这个时候已前，他已经得了很大的名誉了。

一八五〇年，他的“Der Jungtmnnen machen tines fahrenden Schuters”和悲剧“Fnancesca van Rimini”出版，显出他的非常的文学天才。

他在意大利住了一年。一八五四年，Maximiliam 二世召他到 Munich。在那个地方，他注意于小说的著作。一八八五年他在 Muich 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内有四篇小说；有一篇是极好的作品。

自此以后他继续著作不倦。出了许多书。别的著作家极少像他那样能生产的。

海士写他的著作，正像雕刻家雕刻画像一样，他偶然得到了一块石头，把他用全副力量，细细的雕刻起来，到了非常活泼精

致的地位。

他的大部的小说著作，也有好些本，都得了很大的成功，引起很多的辩论。最重要的是“Kinder der Welt”（1873）“vm Paradiese”（1875）“Der Raman der stigtsdame”（1888）及“Merlin”（1892）四本。“Kinder der welt”是讲当时的宗教的与社会的问题的。“vm Paradiese”是叙述Munrch的艺术家生活。“Merlin”则直接与近代的写实派运动挑战。

海士在德国实是反对写实运动的领袖。

他也做了许多戏剧，也多是成功的。但因他太不注意于剧场的布置，所以他的剧本在剧场上多失败，很少有人演唱他们。最好的剧本就是下列几种：

1、Die Salinerinnen（1859）；

2、Hans Lange（1866）；

3、Kollerg（1868）；

4、Die Weisheit Salomos（1886）；

5、Haria Von Hagdala（1903）；

在一八八九年——一八九〇年之间，他又译了许多Leopardi，Giusti，及其他意大利诗人的著作，成了四大册。他的翻译才能也是非常好的。以他的不断的努力，他在一九一〇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本段根据“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t，13.）

四　梅德林

一九一一年诺贝尔奖金取得者梅德林，(MauriceMatelinck)，在中国已有许多人知道，并且已有好几篇文字介绍过他，所以我在这里只把他生平略略的说一说。

梅德林于一八六二年生于比利时之Ghent。少时他服从父母的意思，去学法律，毕业后在他的本乡实习了几年，一八八六年，梅德林离了比利时，到巴黎去。在巴黎结识了几个著作家，于他后来的著作，影响很大。于中有 Villiers do L' Vsle Adam，梅德林自称曾指导他“趋向于物的精神的，诗的，神秘的方面的”。

一八八九年，梅德林因为父亲死了，又匆匆的回到比利时去。在本乡出版了第一部的著作——一部诗集，名，“Sevres chandes”——又出版了第一篇戏剧，“Princesse Maleine”，立得当时批评家意外的赞扬，竟称之为“比利时的莎士比亚”自此至一八六九年，他大都住在比利时努力于戏剧的著作，有时也做做，译些英国的著作。

在一八九六年，他又回到巴黎；自此永远离开比利时不再去了；在此，他专心做了许多论文，最著名的有：《智慧与命运》、《谦恭之宝》、《埋没的寺院》与《蜂之一生》等。

梅德林虽然是用法文来写他的著作，但是他却并不属于所谓法国派的戏剧作家之列的。他是一个独立而自成一家的作者。然他也很受些爱伦·坡（Allen Pol）和爱默生（Emerson）的影响。从他有几种著作看来，梅德林可称为象征派。但是统观他的作品，却很明白的看出他是不拘一派的。——是没有派别的。他是一个戏剧作家，一个神秘派作家，象征派作家，并且是一个哲学家。他在近代的戏剧上与文学上的地位是没有什么人可以比得上的。

他的重要的戏剧作品有：

1、The Blind（1890）

2、The Vntruder（1890）

3、The Seven Princesse（1891）

4、Pelleas and Melisande (1892)

5、Alladine and Palomides (1894)

6、Vnterion (1894)

7、The Death of Tintagilos (1894)

8、Aglavine and Selysetto (1896)

9、Ardiane and Barle-flocce (1901)

10、Sster Beatrice (1901)

11、Monna Vanna (1903)

12、Joyzelle (1903)

13、The Blue Bird (1908)

14、Mary Magdalene (1913)

(本段根据 Clanks The continental Drama of today)

五 霍夫特曼

霍夫特曼的名字在中国，也比较的知道的人多些。他于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五号生于德意志的 Salgliivnn。他的父亲是一个旅馆的主人。

他早年的教育是在他本地与 Breslan 学校领受的。出了学校以后，他就在他叔父的农场里做工。但是霍夫特曼的意思却不大喜欢农务。他那时的志愿是想去学雕刻。初到 Breslan 学校里去学，后来改入 Veua 的一个学校。最后到了意大利。

一八八五年霍夫特曼结了婚，住在柏林很久。霍夫特曼少时很受摆伦（Byron）的影响，做诗摹仿摆伦，海倍尔（Hebbel），席勒（Schiller）诸人。到了后来又极受“北方明星”易卜生的感化。对于左拉（Zola），他也应当感谢。他所得于左拉，正如左拉之受赐于嚣俄，庐骚。

他的第一部戏剧《日出之前》于一八八九年在"自由剧场"开演，得了极大的成功，批评家以为这是德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霍夫特曼的朋友 Meltzen 说《日出之前》之写出正是这位诗人心中充满着赞美托尔斯泰《黑暗的努力》的意念，并且是在他与社会主义者有了许多的谈话以后。所以我们看这本戏还可以看出些痕迹。《和平之宴》（Friedensfest）出版于一八九〇年。有些批评家以为这部剧中的女英雄，Anna Mahr 是易卜生《大匠》（"Masten Buildor"（1892））里的 Hilda Wangel 的先驱者。第二年，他又产生了《寂寞之生涯》（"Lonely Lives"）。这些都是带有别的作家的影响的。直到了一八九二年《织工》出版以后，霍夫特曼才以"霍夫特曼"出与读者相见。左拉与易卜生都已不复留存了。

《织工》之开演在于一八九三年二月。这是第一本近代的戏剧叙述无产阶级的生活的。他的英雄是"群众"mol 而不是什么特出的人物。这实是《织工》的最特奇的地方

自此以后，陆续出了许多本的戏剧，"Colliague Crampton"出版于（1892），"The Beduen coat"出版于（1893），"The Sun Bell Bell"出版于（1897），到了现在，几于每年都有新的作品出现。

他是近代最优美的诗人。除了许多剧本以外，他还有许多诗，几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因为他的努力，他于一九一二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Huneken 论霍夫特曼道："他以'诗人的雕刻家'开始他的艺术生涯；他范人类的心灵为模。正如刻他们在石上一样，历万劫而不磨灭。"其实石像倒不经久，远不如霍夫特曼之叙述之不磨灭呢!

（本段根据 Clank's，The Continental Drama of To - day 及

Huneker's Vconoclasts)

六 太戈尔

太戈尔（R. Tagone）的名字，这几年在中国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著作并且有许多种已译成中文。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只略略的说一说。

太戈尔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生于印度的彭加利（Bangal）。少时已沉浸于自然的美与诗的美，不受有规则的课程的规束。所以他家里的人，都以他是个不成才的孩子。最初他在家塾里读书，后来到学校里去，不久又出来。十五岁到英国去学法律，又不久就跑回印度。

在这个时候，他的天才已扬溢而不可压止。他作了许多诗歌，剧本，小说。他的剧本都有在彭加利开演的。

他少年时代的，都是“情诗”，三十以后的诗，是“颂歌”。他的诗歌，戏剧大半由他自己译成英文。最初即得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诗人戏剧家 W. B. Yeats 的极崇慕的介绍。西方的人骤然迎接到这位东方新颖的明星，没有一个不颠倒崇拜，赞颂不已的。太戈尔的名字向来是限于印度的，到这个时候突然如大炮弹之爆发，几乎布满于全世界。

以清新的，活泼的，神秘的诗，投入于现代的沉闷于物质生活的人手中，使他们的灵魂另外开了一扇极明净极美丽的窗子；这实是太戈尔对于世界的大贡献。大家对于他这个大贡献，只以赞尝酬答之。

到了一九一三年，瑞典文学会又以诺贝尔奖金酬答之。但是这些物质的报酬，又岂足以酬答他？

太戈尔五十四岁的时候，到日本去过一趟，后来又到美国去

过一趟。今年夏天在柏林游历。现在又在美国。

他虽是一个人类的爱者，但也不忍见印度民族之呻吟于英国人治下。所以对于印度的自治，鼓吹极力。他的诗歌，有许多是示唆印度青年的独立思想的。凡是一个人类的爱者，同时必是一个民族解放的鼓吹者，这是一定的道理，并不是什么矛盾。因为各民族如不同立于绝对平等的地位上，人类和平是决不能实现的。

（本段根据 Roy's R. Jagase：The Man and Hisipoetry）

七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于一八六六年生于法国中部。他在小孩子的时代，爱他的祖国，但也爱德国的音乐。最初在巴黎罗马求学，后来到了德国。他少年时所崇拜的是莎士比亚，斯宾诺沙和华格纳（Wagner），他想成一个诗人，成一个音乐家。但是他父母却叫他学别种学问。起初教他学科学，后来又进高等师范。但是他的艺术崇慕，总时时在念，并且在这些时期，乘机搜集了许多材料，为后来的应用。

他读了托尔斯泰的论文《我等将何为乎?》受了很大的影响，竟把他作音乐家的热忱摇动了。他写信问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答道：世间最有价值的，可以作为各种使命的根基的，不是对艺术的爱，是对人类的爱。他自此成人道的作家了!

他此后做了许多篇戏曲，又做了一篇论文，《近代抒情剧场的超源》。他又做了好几篇描写法国革命时代的剧本，如《七月十四》，《但东》（“Danton”），《罗伯士比》（“Rotosespierie”）《理性之胜利》，《群狼》等都是。

他的最成功的作品，一本是“Jean Christophe”，一本是《人

物传》（“Lives of great Men”）。他的《人物传》所叙的有音乐家比莎芬（Beethoven），画家朱谢尼（Mizzini），及Michael Angelo，L. Tolstoi，等人。在量上讲来，每一个人似乎都叙述得太简略些，但是里边却各各充满着热烈的情感，活泼的影像，与高阔的理想。

“Jean-christophe”是一部极大的著作，共有十大本，凡是知道罗曼罗兰这个名字的，没有不知道“Jean-Christophe”① 这本书。

罗曼罗兰在现代的悲剧生活中，心里充塞着要说的话，满想把他心中要说的千言万语，说向同时代的人听；他的心沸了，燃了。于是他创造出一个伟大的人Jean-christophe，表现在他们的面前。在艺术上讲来，有许多人很訾议罗曼罗兰的“Jean-christophe”太混乱，太没有布置，但是我们决不能仅仅以一本小说看他，他实是近代的欧洲的批评大书呢！

在欧洲大战的时候，他的努力很可感人。大战以后，他又同Russell，Anatole France，Tagore，诸人共发起“光明运动”。他的最近出版的作品里，多充满着“人道之爱”。在Liluli（剧本）里，用笑乐来逃出怨恨的束缚；在Picueet Luce（小说）里，爱把仇怨克服住；在Cleramfauet（小说）里，信仰把仇怨消去。

他在现代只是一个人道的作家。

〔本段根据：（1）Madame Deudaux's Trientieth dentury Frahcn Writers.（2）Anna Nussfaum's Romain Rolland，（in Lwing Age.）〕

① 《约翰·克里斯朵夫》。

八 海定斯顿

在生存的瑞典诗人中，海定斯顿（Verner Von Heidenstam）可算是最重要的一个。

批评家如Edmund Gosse诸人都说，近百五十年来的瑞典的叙事诗与抒情诗，无论在实质上与在形式上都有胜于同时期的各国诗坛。如白尔尼（Burns），摆伦（Byron），席勒（Shelley），白朗宁（Browning）和爱伦·坡（Allen Pol）一流的诗家，他们在这个时期至少有九个。现时的诗人也不少。除了海定斯顿外，还有E. A. Kautfeldt，Daniel Fallstorm，K. G. Ossiamrilsson，Oscar Stjeme，Berial Gripenterg，也都是很重要的。不过在世界文学界里知道他们的却比海定斯顿少。

海定斯顿于一八五九年七月六日生于瑞典南部一个贵族家庭里。那个地方，地势大部分是平原，只是多湖，多森林。由他家里可以看见有名的“伐特斯丁那”炮台（The castle of Vadstena），有许多古代传说，流传在这个地方。海定斯顿过去三十年间都住在这个地方。

海定斯顿少时胆子很小，而读书至勤，于诗歌及战事小说尤为喜欢。他是Jopelius的崇拜者，对于叙事诗人Jegner和Runelerg，抒情诗作家Lielur也极热心。在学校里的时候，他最喜欢研究腊丁文和地理学。十六岁时，他得了神经系的病症，受医生的劝告，移居到欧洲南方，往来于意大利，希腊，及近来各地。如此旅行了许多年，偶然也回国去了几次。在有一次回国的时候，他结了婚。后来，他大大的为他所住的地方的风景所沉醉。立志想成一个画家。不管家庭的劝告，立往巴黎学画。过了不久，他很想家，要回到本国去；但家庭与他关系已很冷淡，不得

不勉强过旅居的生活。他自己很忧郁的遁世隐居于瑞士的Burnegg的古堡中。在这个地方，除了他夫人外，简直没有一个外人来。只有史德林堡（Strindteng）时时的到他家里。于这沉静荒凉的环境中，他的天才渐渐的脱颖而出。他做了许多剧诗（Dramatic Poems）与短句（Peetic Sketches），带着许多巴黎，意大利和东方的热情和色彩。一八八七年，他父亲死了，他不得不舍此明媚的山光，回到他的故乡，料理一切事务。一八八八年，他的诗集出版，定名为《旅居集》（Pilgrimages and Wandering Years）[①]。

这本海定斯顿的第一部书，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因此自信他的天才，定居于本乡，专心一致以从事他的文学著作。在此继续出了许多本的诗歌小说。

海定斯顿的第二次出版的重要著作是一部小说，名为“Hags Alienus”，也是记述他旅行的事情的。他是天然的美的赞叹者，描述者，但是他的人生观却是消极的，以为人生不过是知识的要求的牺牲者而已。

在海定斯顿一八九五年出版的“诗集”上，他已更亲切的发现了他自己。这集里的诗篇，有的是叙述的，有的是描写的，有的是感想的，而差不多都是讲到瑞典的。诗中乡土的风味极重。

他的重述瑞典历史与传说“故事集”也充满着这种气味。这些故事集的风格活泼而且有力，使作者在散文上所站得地位与他的诗的地位差不多。在这些故事集中，最流行的是“Karolinerna”，里边所讲的是瑞典人民在查理第十二时代的义侠的风气中所留传的故事。

他的第三本的诗歌集，名为《新诗集》，出版于一九一五年。

---

① 今译作《朝圣和漫游年代》。

这一集中大部分是抒情诗。凡是瑞典的人没有不喜欢读海定斯顿的抒情诗的。自《新诗集》出现后，海定斯顿的名字，深深的印在他同国的五百五十万人心中，正同“瑞典”的国名一样。这些诗篇大声疾呼，把国人的颓唐的心灵叫醒；在现在沉郁之时代把过去的光荣重燃。

在这个时候，海定斯顿以前的消极与疑虑与混乱都消灭了。他沉浸他自己在瑞典的伟大的国魂中，把他的烦闷忘了！他在一首诗中有说：

“啊，你，我们的故国，我们的伟大的家，把你的光荣，把你的祝福，织入我们的生命里呀！”

这种狂热的绝叫，在在都流露于这个爱国诗人的《新诗集》中。在这个时候不知有多少瑞典的烦闷青年，受他的心灵的炽火的照耀，使忧郁的心灵，因织入祖国的光荣与祝福而重复光明呢！正像他自己所说的：

“送来如电的心灵之刀光
以照耀我们前面的道路。”

虽然他同国的人如此的崇拜他，“海定斯顿”的名字，在世界文学界里，还没有什么人知道。自得了一九一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他在欧洲和美洲才有人注意；他的书才有人翻译。

但在中国仍是没有人知道他。我希望这一段介绍他的短篇能够引起大家对于这个爱国诗人的注意，使他

“送来如电的心灵之刀光，

以照耀我们前面的道路。”

（本文根据“Stork’s Ontroduction of Swednn’s Laureate”）

九　彭托比丹

这是很奇怪的，彭托比丹（Heurik Pontoppidan）虽然得了一九一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但是知道他的人却不大多。我们看了好些英国美国出版的杂志，也没有一篇详细的论文讲到他。现在只好就所知道的写出一点来。

彭托比丹于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生于丹麦之 Fredericia。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少的时候，他在库平哈金大学研究物理学与数学。当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徒步旅行过德国和瑞士各地。他的小说在叙述农民的生活与性情的地方非常细腻而真切。早年的作品很显出受 Kjelland 的影响的痕迹。他的最初的小说是一部三连的小说（Jrilagy），叙一个牧师嫁一个农妇之事。这三连的小说，第一部名“Muld”《土》，出版于一八九一年，第二部名“Det Frigaetlede Land”《允许之地》，出版于一八九二年，第三部名，“Dommen Dag”，出版于一八九五年。这部书的叙述是非常有力量的。

除了这本三连小说以外，还有“Jra Hytlerne”（1887），“FolpeliufsRildringeu”2 Parts（1888－1890）及“Spyer”（1890）等书。

（本段根据“The Encyelopaedia Britanuica”）

十 史辟德拉

诺贝尔奖金到一九一九年才赠给史辟德拉（Canl Spittelen）似乎是太晚些! 因为这位诗人的成绩早已显着很久了。

史辟德拉于一八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瑞士之Liestal的一个小镇。那时他父亲正在那个地方做事。他的祖父也住在一起。他的祖母常常在冬天火炉旁边讲了许多奇异的故事给他听。在他五岁的时候，他家庭迁住于Berne。自此以后，他在Berne及Basle受初级教育；在Basle，Zunrch及Heidellerg研究神学及法律。文学天才的种子在史辟德拉童时，少年时，还深深的隐伏在他的心里未放绿叶呢。他的最初的艺术的冲动，在于学习图画。在他十七岁的时候，他的志向在于学习音乐。他与I. V. Widmaun的交好，使他以后得了不少的益处。不久的时候，他又开始对于诗歌的创作发生兴趣。在三年之中，他又忙于做一篇戏剧，但是结果则始终未写下一行。后来得了希腊的神话与希伯莱的传说，非常喜欢，决定应其使命，成一个史诗的作家。

一八六九年以后，史辟德拉因毕业离开Heidellerg学校，去应Liestal的神学试验，竟遭主试者的摈斥。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一切，专心去研究神学。到了一八七一年，他竟在Basle很荣誉的通过了神学试验。他们派他当Arosa地方的牧师，他拒绝了。自此离开瑞士，到俄罗斯去，在俄国一个将军家里当家庭教师。

他在国外，经过了八年的时间。一八七九年，因为他父亲死了，才回国来同他母亲住在一起。

他带回国的作品，有“Prometheus and Epimetheus, a Paralle”的前半部。出版于一八八〇年的冬天。其第二部则于第二年出现。

这部书的价值，在瑞士知道的人极少。只有史辟德拉的至友Widmaun深为推许。在德国也没有注意到他。只有尼采曾读一过，叹为“德国人中最特出的唯美的作家”。除了这两三个人以外，便没有什么人去记住史辟德拉的名字了。

这种失败，竟使史辟德拉搁下笔尖，而改途为教师。最初在Berne地方，Widmaun做校长的一个女学校里当教师，后来又在Neurerille地方一个高等学校里教希腊文，腊丁文，及法文。

渐渐的他又从事于著作。但因职务过多之故，不能常常作诗。后几年又在Basle及Lurich从事于杂志事业，也未能特别注意于韵文之制作。因此，这许多年来，他的诗的天才未能十分表现出来，只成了三小册的诗集。

一八九一年，他受了遗产。自此以后，他的经济才能独立，不必为饥驱而工作。不久即辞退职务，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移居于Lucerne。风景至佳，他有一所花园在可爱的湖滨。自此，他始完全投身于诗神的怀中了！在那个时代，他所作的，有几篇散文小说，一篇长小说，Omago到了二十世纪之初，他的史诗之星出现了！他的全部的天才，本来伏流于地下的，现在已集注于美丽之诗，《亚灵配之春》（“Olympain Sprin”）之中。这是一个很壮大的成功。第一版出现于一九〇〇——一九〇四年。增订版出现于一九〇九年。

自此诗出，史辟德拉立即高立于现代生存诗人的前面。崇拜他的人立刻增多起来。

一九一四年欧战起后，瑞士的地位极为困难。史辟德拉做了一篇论文《我们瑞士的立足点》(our Swiss Stand Point)，以告诫于其国人。在国内国外都引起很大的影响。并且这篇论文，在文学上也极有价值。有许多多人，以前不知道他是诗人的，现在却都知道他是一个爱国者了！

史辟德拉的七十生辰，举行得非常热闹。

(本段根据“The North American Reirew”本年九月号)

十一 哈姆生

哈姆生（Kunt Hamsun）的文学活动，到现在已有三十四年之久；他所作的小说，戏剧，论文共有二十五种以上。在未得一九二〇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以前，他的名字已深深的印入于欧洲人的心中。但美洲和亚洲人则自闻他得到诺贝尔奖金后，才开始注意到。

哈姆生于一八六〇年八月四日生于挪威中部一个小镇，Gudlnandsdalem。他的父亲是一个穷苦的农人。四岁时，他父亲把他送到欧洲极北的 Lofoten 岛，同他叔父住在一起。这个农家的孩子，很不喜欢渔人的生活。后来就改在一间鞋铺里当学徒。他的早年的生活就如此的过去了。

但他的文学嗜好，却不能抑制。在鞋店中，他秘密的作了许多首诗，和一篇小说；秘密的储蓄了金钱，预备为印刷他的著作之用。只有十七岁的光景，他的著作之花已灿烂的开放了。这些花是一篇长诗，一篇小说，“Biorger”。小说里所说的是一个穷苦的农人孩子的故事。可以说是哈姆生早年生活的写照。

自离了鞋匠的职业，哈姆生就在 Bodo 埠头当一个运煤的脚夫。他是自修成功的人，本很想在私立学校里当一个教员，但是始终不能如愿。只得再从于粗重的工作，如采伐石料，和木材之类。后来又进学校念了一会书。但是总不能有当教师的希望。最后他遂决定到新大陆去找他的幸福。最初在支加哥（Chicago）当马车夫，后来又在 North Dapota 被雇为耕佣。最后在 Himreapolis 当讲师。到处都不如意，哈姆生只好自投于文明未到，

荒芜寂寞之 Neufaunaland。那个地方人烟很少，住民都是渔夫，在他们当中，他只有几个朋友，静悄悄的经过了三年的生活。批评家 Carl Movfurger 以为这个荒凉的地方，对于哈姆生以后的文学成绩是很有影响的。

他的作品，最近出版的有《土之所生》（“Grouth of the Soit”）一书。“Hunger”出版于一八九〇年。“Myeterien”出版于一八九三年。继此而出者：有“New Ground”（NY ford）和“Redaktou Lynge”二书。“Hoths”（Svaermere）出版于一九〇四年；“Segelfoss By”出版于一九一五年。在这些年中间，还有好些重要的作品出版。

批评家往往把他的作品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的作品为“Hunger”，“Vntellectual Life in Modern Amtrica”，“Mystertis”，“Pan”，“Vicatoria”（以上小说），“Attho Ate of the kingdom”，“The Play of Lifo ”，“On the cloaming”，（以上戏剧）及其他。第二时期的主要作品为“Under the Harrest Star”（1906）及“A Wander Plays On Muted Spring”（1919）。至其第三时期的作品则为“Children of the Jimes ”，“The Gronth of Soil ”，“Segel foss Jown”等。

在哈姆生看来，小说不过是“真实”的更细的描写工具而已。在“Hunger”中，有许多地方，是别的作家不能描写，不敢描写的。哈姆生却能活活泼泼的应用他艺术的手段把生活的真确的色彩细细描绘出来。

哈姆生是极富同情心的；有许多批评家以他为社会主义者。他的“Myster”出版后，有许多守旧党至以他为一个恐怖的人物。其实他是人道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社会改造的必要。但他对于现代的黑暗和罪恶的存在并不灰心失望。许多批评家都相信哈姆生与俄国的各个写实主义者——尤其杜思退以夫斯基——有极

相似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人疑惑。其实，在斯拉夫民族中，没有一个外国的作家比这个挪威作家更有势力。在欧战以前，哈姆生的戏剧，在莫斯科几乎有占了全部剧场的势力。

说哈姆生是一个杜思退以夫斯基的崇拜者，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受摆伦的影响，实在比杜思退以夫斯基还大。

（本段根据：1 “the lookmen” Jan 1921，2 “Yhe Fortnightly Review” Dec，1920）

附言，因为时间匆促的原故，不及多所参考。所以每一个作家只根据了一二本书来写。

（原载 1921 年 12 月 10 日《时事新报》五千号纪念增刊）

一九二一年的得诺贝尔奖金者

前几年得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家的名字，差不多都是不大给国外的人知道的，或是仅只有一部分的人知道的，像哈如生（一九二〇年的得奖者）于他的本国与俄国方面知道他的人很多，而英美则很少人知道他，就是一个例。今年的得奖的阿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全世界的文学家，无论什么地方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他的“Thais”一书，几乎无人不知道，他的“The Red Lily”的译本在英国也是一本永久的作品，其余的许多作品，也都有许多译本。

法朗士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是Jacdues Anatole Thil-ault。他最初跑进文坛，引起少数人的注意，是在一八六八年的时候；所发表的是一篇论法国诗人 Alfred de Vigny 的论文。一八七六年，他发表了“Les Noces carintlennes”一书，三年后又发表了“Jocaste et le chat Maigu”一书。但仍旧不能得多数的读者。一直到了一八八一年他的《彭乃特之罪》一书出现后，他的名字才在文学界里高高飞扬着 。他也作很好的诗。但不独他的诗，音节极高吭，就是他的散文也非常和谐优美，有的时候，大可以拿来高声朗诵；如果用他的原文来读，更足以见其精密铿锵。

法朗士的文字不惟“真”而且是极美丽。他是一个艺术家。有一个批评家说：“与其以法朗士为一个思想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有思想的艺术家好。”

但他实在不是囿于艺术的园林中的，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自由的拥护者。凡是政治上的一切压迫与不平，他总是应自由的呼声，大无畏地出来为自由而战。许多人传说，这次所得来的诺贝尔奖金，他并不拿来给自己，而决定把他送到俄国，为救济饥荒之用。以他的素来的主义与行为观之，这种传说，想必是确实的。

（原载 1922 年 1 月 23 日《时事新报·学灯》）

歌德的死辰纪念

今天是德意志的诗人与戏剧作家小说家歌德的死辰纪念。他死的时候是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离今已将九十年了。但他的作品的影响还普及于德国乃至世界的一班文士的心里。趁此时候，我们且把歌德的生平及作品，大略的介绍给不大知道他的中国人。

德国在七年战争以后，国力大疲。同时国民的知识欲也大为引起。莎士比亚的戏剧与北欧的神话及其他世界作品又相继输入。于是向来沉寂的德国文坛，骤然发生新气象。成为“飔飚运动”（Storm And Stress）。歌德就是这个运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于一千七百四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德意志之Frankfort-on-The-Main 地方。十六岁时，家庭送其至Leipsic大学读书。两年以后转至Strasbusg大学，完成其法律学的研究。到了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他到Wetzlar地方的一个小镇里去，在法庭上练习。

歌德的第一部使他著名的小说《威曹的忧愁》，出版于一千七百七十四年。这部书不惟使德意志全国的读者赞赏不已，而且

传布至于全欧洲，到处使读者发生同情；而且使歌德与威麦的伯爵奥古斯德认识。奥古斯德十分为歌德的天才所感动，请他到他的宫里住几个礼拜（这是一七七五年的事)。结果则歌德竟成为他的首相。

歌德在威麦住得很久。中间到意大利旅行了两年。到了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他随同普鲁士 军队到法国去。

有天才的歌德，他不仅是个诗人，是个戏剧作家，并且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在一千七百七十五年至一千七百九十五年的二十载中，他关于科学的著作，也成功了不少种，他对于光学，对于颜色的原理，对于比较解剖学及对于植物的变化的研究，到现在还是有很高的价值。

他的文学作品，最初极为努力。至一七七五年到了威麦以后，就不大从事散文的著作。至于他的晚年，则多量的精力都耗在通信与作日记上了。

他的主要的作品约有下列各种：

1 Goetz von Berrlichingen (1773)

2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sther（即威曹之忧愁）(1774)

3 Clavigo (1774)

4 Iphigenia auf Tamis (1779)

5 Jery unl Baetely (1786)

6 Torquats Tasso (1780)

7 Die Italiaenische Reise (1788)

8 Egmont (1788)

9 Reinecke Fuehs (1793)

10 Farbenlehre (1794)

11 Wilhelm Meister (Part I 1795)

12 Hermann und Dorothea (1797)

13　The Aehillcis（1797）

14　Faust（Part I 1805）

15　Wilhelm Meister（Part II 1808）

16　Wahlvelwandschaften（1809）

17　Dichtung und Wahrheit（1812）

18　Faust（Part II 1832）

还有许多歌德与当时各文人通信的稿子，也集了好些本。其中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就是他与 Schl gel 与 Hunbeldt 兄弟的通信。

歌德的全集，在德国最初出版的本子，共有四十册。到了他死后，又增加了十五册的遗稿。

（原载 1922 年 3 月 2 日《时事新报·学灯》）

俄国的诗歌(一)

诗歌是一切文学的最初的方式，在各国文学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的第一部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必是用诗歌的形式来写的，俄国自然也免不了这个常例。

她的第一部书是一篇史诗，名为《依鄂太子远征记》（Story of the Raid of Prince Igor），大约产生于十二世纪。所叙的是诺夫格洛王斯佛托斯勒夫（Sviatoslav）的儿子伊鄂，同了好些别的王子，在一一八五年，带兵去征伐一个游牧的民族，波绿夫塞（Polovtsy）的事实。他记载王子们出发与远征敌国的情况，记载他们如何初次得胜，后来又为大队人马袭击而失败，记载伊鄂如何被囚，又如何脱逃回家，所有一切事实，征之同时产生的史书《克辅编年史》，都可以征其为实在的，不过中间加了许多点缀的神异的事迹罢了。

在这篇诗中，自然界（Nature）也参入其中，当伊鄂脱逃的时候，涉水而水神与之共话，当追者寻踪而至的时候，伊鄂入林而山鸟示以途径，其余类此之处尚多。

他的艺术也极高，以史诗而带有极多的抒情诗的情绪。试举一段以为例：

“呵，风呀，小小的风呀，
为什么，先生，
为什么你吹得这样猛烈？
为什么，在你轻逸的羽翼上，
你把匪徒的箭，吹到我丈夫的战士的身上？
你高高的在云下吹，
你摇荡船只在碧绿的海上，还不以为满足么？
为什么，先生，你必要把我的快乐吹散在绿草平铺的大地上？”

这是依鄂的妻子在 Putivl 城墙上唱的歌，是多么幽婉而悲伤呀！

此诗初次刊行于一千八百年。欧洲各国皆有译本；不惟在俄国，就是在欧洲文学史上，也算是极著名的一部古代的著作。

十三世纪时，挞担族以疾风骤雨之势，侵入俄国，俄罗斯文化的时钟被其拨回三百余年。自此以后，不惟诗人噤声，就是别的文学作品也毫无成绩。有之惟宗教文学而已。

直至十七世纪之时，普罗斯基（Simon Polotsky）崛起于文学的墟墓中，“诗神”方复降临于俄罗斯。普罗斯基作了许多著作，以宗教剧与宗教史为其主要之作品，他的诗也不少，虽不能臻于完备之境，而诗界之“筚路蓝缕”之功，却非此“第一诗人”莫属。

大彼得末年，俄国文学渐盛，且不以本国之旧境界为满足，更进而汲引西欧的“诗魂”。当时的文坛，约分两派，一派是倾向于法国文学的，一派是倾向于日尔曼文学的。在日尔曼派中，罗门诺索夫（Lomonosov 1714—1765）和萨米洛加夫

(Sumarokov 1717—1777) 都是诗家。罗门诺索夫是一个农人的儿子，少时极苦。后来被俄国政府派到德国留学，因极受日尔曼文学的影响。他的诗是摹仿 Gottsched 派的。他又改订国语、作俄罗斯文法以示其准的。批评家以他为“俄国文学的彼得大帝”。萨米洛加夫善作讽刺诗，亦工为剧本，世人称之为俄国的蓝森(Racine)。在日尔曼派中，尚有脱里狄加夫斯基（Trediakovski 1703—1769）于诗韵研究极深，对于俄国的未来的诗坛也是很有功的。法兰西派的诗人则为康特马亲王（Prince Kantemir1708—1744)。他是俄国第一个做讽刺诗的人，他的诗风是摹仿博埃留(Boileau) 的。

自此以后，作者辈出。辟格达诺契（D. Begdanoitch）的寓意诗，显轻妙之文才；辟特洛夫（Petrov）之抒情诗，则缠绵而蕴藉；美加夫则以写国民之性格见长，引文学与日常生活相近，而陶泽文（Derzhavin 1743—1816）为尤著。他是俄国伪拟古主义的最后主义的最后作家，也是伪拟古主义中的最秀出的作家。但他虽中伪拟古主义之毒，而诗的真美仍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不为格律所掩。他的《神》一诗，可谓“前无古人”；且即后来居上之普斯金（Poushkin）之作品，亦仅足与之颉颃。

在亚历山大一世之时，有第一个重要的国民诗人出现，即克鲁洛夫（Krylov 1769—1844）是。他是小官吏的儿子；起始在省里当一个书记官，做了许多剧本。直到一八〇五年，他方下笔为寓言。第一篇寓言出现于一八〇六年，登于莫司科杂志上。起初，他的寓言都是翻译 La Fontaine① 和□□□② 的，后来才自己创作。他的寓言都是长短句的诗体来写的。辞句质朴而秀美，

---

① 即拉丰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② 原刊物字迹不清。

寓意极深，且多讥讽之意；易感动而固著于土地；对于后来的诗界，影响极大。

一八二五年，亚历山大一世死，“十二月党”乘机起事。不久即平。党人有一百二十五人受严重之刑罚。受缳首之宣告者五人。中有一人，即为诗人李里夫（Ryleev 1795—1826）。李里夫之作以悲欢著，虽不免仍受旧格律的束缚，与摹仿法国的文学，然而浓厚的诗的情感终时时照耀于他的作品中，他尝说：“我不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国民。”但在实际上，他的诗篇已足以使他成一个不朽的诗人。

与李里夫同时，而不受“十二月党”的牵连的诗人，有格里博哀独甫（Griboyedov）与助加夫斯基（B. Zhykovsky 1783—1852）二人。格里博哀独甫是一个外交部的官吏，在一八二九年为他谋害。他以喜剧《智慧之悲哀》（Gore ot Uma）著名。此剧初仅朗诵于圣彼得堡之宴会中，后乃传钞于各处。钞本至于几千。此剧以诗体写出，与克鲁洛夫的寓言一样，也是用长短句的诗。是一本讽刺的作品。文辞强健而畅达，明媚而洁净，如冰之清，如刀之明，幽婉而且聪明，在艺术上讲，是难能有人及得到他的。

助加夫斯基终身忠于诗，不问外事，于俄国文学，影响极大，他开了俄国的文学之窗，引德国与英国的美丽的诗园，入于沉浸于法国格律中的俄人的视线中。一千八百零二年，他的第一篇诗出现，这是翻译格雷（Gray）的“Elegy”的。此诗一出，当时即生影响，他的名誉也因此雀起。以后他又译了□□□□□□□□□□□□□□[1] 及其他许多外国诗人的诗。他后来做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教师，著作暂时中止。及解职后，又从事

---

① 原刊物字迹不清。

于荷马史诗“Odyssy”[①] 的翻译。以前，俄国文人，对于法国极为迷信，以为法国的文学，就是唯一的文学。迨助加夫斯基出而介绍英德的文学，他们的思想才为一变，这个变迁，于近代俄国文学极有影响。

于此时，俄国最重要的国民诗人普斯金遂挺然而出。普斯金（Poushkin）于一千七百九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生于莫司科。他是俄国的第一个诗人，能够完全脱离外来的影响，而用本土的朴质而正确的文字来叙述、描写俄国的灵魂的。屠格涅夫说：“他的诗中的本质同俄国的本质相和谐。”所以许多批评家都以为俄国自他出来后，才有真正的国民文学产生。他离学校不久就作了一卷诗，名为“Ruslan & Ludmila”[②]。他在助加夫斯基家里，把“Ruslan & Ludmila”的头几段高声朗读给大家听，助加夫斯基立赠他以自己的相片，下面写了几个字：“赠给我的学生，从他的失败了的先生。”自此以后，他继续产生了许多作品，最著的诗的作品——他并且是一个散文作家——是：抒情诗集《阿尼征》（Evgeny Onegin），《波尔塔瓦》（Poltava），“Boris Godounov”等等。

普斯金不仅是一个抒情诗人，但是他的作品中，到处都充满著抒情的气韵。他是一个爱人生者。生之快乐时时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来：

“我的路途是黑暗的。‘将来’躺在那里等着，
一个聚集‘忧虑’的海洋。
但是，不，我的朋友呀，忍受，创造，

---

① 《奥德赛》。

②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那是我的祷词；去活不是去死！”

这是他的一首挽歌中的一段：虽是死，但是生之念还存在着，他决不畏死，决不悲观；虽是死，他却还以为“爱”正带着离别的微笑，照耀在天空上。

“普斯金的诗是一种要光明，要忠实的感情，要自由的高超的理想的历史。”这句话是 A. N. Pypin 说的。我们拿来批评他的诗，正是确切而无可更易。

一八三七年，普斯金突然死于决斗。他的死几乎使全俄国哀悼。

继普斯金而起者颇多，其著者有 Baron Delvig，Yazkov，Prince Bariatinsky，Venevitinov 及 Polezhaev 诸人，他们都是抒情诗人，其作品的精神与形式都不能脱离普斯金的范围，至于诗的力量，则逊于普斯金远甚，举不足以嗣普斯金。其真能嗣普斯金而登于俄国诗坛的王位而无愧者则为劳门托夫（Lermontov）[①]。劳门托夫于一八一四年生于莫司科。二十岁时至高加索为军官，一八四一年他由圣彼得堡复回高加索。因细故与一个朋友决斗，被杀。他的生涯可为极短。但在此短生涯中，他的作品却如春笋之崛生，如甘泉之流涌，多而且美丽，丰富。他的诗质朴，如日常谈话，而婉转饶丰姿，秀丽动人：

“我愿意独与你在一起，
只要在一起一会儿。
我在世的时间很少了。
他们说，我就要走了。

① 俄诗人莱蒙托夫。

而你也要离别回家了，
他们说……但是为什么？我不相信，
他们说……但是为什么？我不相信，
没有一个灵魂，他要十分注意的，
在那里听我的话。
………"

这是一首写一个受伤的军官，同他告假回家的朋友说的话的一段，还有许多话，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钞进，即此已可见他的作品的一斑了。

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也相信人生的美丽。他不过看不惯世俗的汶汶，因而遂生悲感耳!

自普斯金、劳门托夫后，俄罗斯的诗人，久藏不出。诗本为抒情之具，本为极自由的不可拘束的心的声音。而自倍林斯基后，"人生的艺术"一语，为文人学士的金科玉律。凡为文必须切于人生，有关于社会；一切抒情写意，自畅怀抱，留流光景，描述天然的词句，厌弃之惟恐不及。在此环境之中，诗人自难产生。故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之时，诗人几于绝迹，即有二三空谷足音，亦未能尽其天才，以鸣于当世。

然世运转移，情势亦异，七十年代后，诗人终接踵而出，制作极高的艺术作品，为诗的第二时期。

在这个时代以前，有加尔沙夫（Koltsov1808—1842）的民谣诗人出现。他生长于农家，故极善描写农人的情性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世人称之为俄罗斯的葆士（Busus）。而此时代中最老的诗人则为杜特契夫（Tyutchev），他和美加夫（Maikov）、福依史（Foeth）、波龙斯基（Polonsky）都是纯艺术派的诗人的杰出者。他本来是前于这个时代很久的。同加尔沙夫本都不应在这地方讲

他，但因为性质相同的缘故，特为一处叙之。且他的诗虽都作于一八五九年以前，而在一八五四年以后，才有人知道他的真价。他的祖先，源出于意大利，他的生涯，多半消遣于国外。所以这个暗澹灰色的俄罗斯很少与他的笔尖有缘。他既超越于时代与空间之外，遂得自闭于自己的世界，美的，善的，天然的世界以内了。他的诗，都是抒情的，间亦免不了受厌世主义的支配。他的诗格极高，且极纯正。写景的艺术，也达于极峰，而其深入人类的心中，取生人的秘密而一一宣泄之，其天才尤为不可及。自然界的秘密，也由他的艺术里历历的显露出来。高山戴雪，光景无穷；黑夜的恐怕之毡，盖白日于无底深渊之中；大雷雨之下，雨水滔滔，天色昏暗，忽而雨霁，夕照衔山，碧紫满天；电光闪烁，聋哑的恶魔，似相问答；大自然之间，好像是没有一些秘密。他有时也咏叹人间之歌，人类之同情泪，也如晚秋深夜的雨点一样，萧萧滴滴的疏疏落下。

与杜特契夫正相反对的有尼克拉沙夫（Nekrasov），他不描写自然界，不从人的性情内部观察。他止讨论社会问题与人类的需要，止以尖利的笔锋，攻击，批评，讥嘲人间的现象。他以杂志的，讽刺的，及攻讦的诗见称于世。但他虽做有主义的诗，而其艺术正自不可及，他的艺术，恰好为他这个辩论家——的手里的危险的武器。他的诗的作品，悲哀而带复仇之音，如诗神（Muse）之“从她怒容的眼里、骤然滴下的急泪”。他幼时对于这个悲惨的社会，即十分动心，无价值的命运，不幸的人生，除了陶然醉眠以外，他没有一个时候不想到。他有一首诗，言秋夜之中，薄雾四塞，铁路列车里边，有父子二人旅行，小王若（Vanya）问他父亲，一个将军，铁路是谁造的。他回说，是工程师造的。作者于此深悲造物之无情，人类之残忍，为造路的工人流了许多的怜悯的同情的泪。他说：许多工人在此，不过是在

醒的墟墓之间而已。是时死灵集于列车四周，窥视窗内，唱他们的悲惨的歌：

“我们很喜欢的察看我们的工作。
我们冬天，夏天，不息的竭力于此，
我们背也做的弯了，
只住在坏破的小屋里、饥饿相战，
受冷，受百样的疾苦侵伤。”

末了他们唱了一句最伤心的话：“你们还怜悯的想到我们苦人么？或者早就忘记了么?”咳！月明夜静，三峡猿啼，稍有人心的人，哪一个不为泪下？这种凄苦的音调，他在四十年代时，即已唱过。诗神有灵，必为之大呼曰：“咳！我现在怎样的为忧惧所惊吓！”他的《赤鼻霜》（Red Nosed Frost）一诗，叙一农夫在林中为霜雪冻死，将死的时候，他看见霜王，与他问答。写来更非常的可痛。他的诗，音节天然。具有一切抒情诗的长处，而专叙农人生活，则与一切抒情诗人完全不同，天地间的最悲惨的景况，最恐怖的现象，都为他创造的手下宣泄无余了。他从事于一篇史诗《那一个人在俄罗斯找到好的生活?》（Who finds life good in Russira）的制作至十年之久（1866—76 年）到一八七七年他死的时候，这篇诗还未完工。后人没有续他的，也没有敢去续他的。尼克拉沙夫的诗才，于此登峰造极了！他的讽刺诗，差不多都在杂志上发表，也极深刻，可以不朽。在有主义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东西，算是最优美，最真切，最恳挚的了。

爱波伦美加夫（Apollon Maikov）则继杜特契夫而起。树纯艺术之诗风，与尼克拉沙夫之“有主义的诗”异其趣。他家世四代，在文学，艺术上，都极有声闻。他兄弟四人，除了一个早死

的外，其余都是蜚声当代的。滑李连（Valerian）以批评家名，李奥涅特（Leonid）以文学家著。他自己则初欲继父志，成一艺术家。继以诗的成功，不复更事丹青。一八四一年的时候，他出了一部诗集，即得名甚盛。当时的作风是宗希腊的阿挪克利翁（Anacreon）的。后渐变，而有意大利之风，而从事于古代民歌之制作，然他的最初的诗风，终时时流露不自觉。他的最大的著作《两世界》（Two Worlds）或名《两个罗马》（The Two Romans），惨淡经营至三十年之久，始行告成，这部著作是抒情的悲剧 Iyrical tragedy。中叙加萨连的 Caesaran 与基督教的罗马的对抗，道德的堕落，及最粗的物质主义与玄之又玄的理想主义，极为详细，而配以许多适当的人物。除这出戏外，他的诗，也是极多的。他不像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之畏怕“死”之侵袭。他视“死”为无足轻重，且进而当他为一个人道的老朋友（The old friend of Humanity），带些基督教的理想，他说：“人生是一个梦，是一个梦的实现，也是一个大沙漠中的蜃楼；死的时候不过是上帝胸中一切这样虚幻的梦，完全忘记，完全没有而已。”又说：“人生不是梦，或是一个梦的实现，乃是一种神洁的光，在这个时候，为我把宇宙照耀出来，而我也是没有一刻死灭的，不过是一层一层的升上到新的更高的人类世界而已。”这些话很可以见他的人生观。

福依史（Foeth，一名善辛 Shenshin）和波龙斯基（Polonsky）与美加夫同为纯艺术派的诗人，而见解不同，福依史的诗品纯为俄罗斯作风，波龙斯基的，则多外国的，——意大利与东方的——作风了。以诗的形式艺术论，福依史较波龙斯基尤为精进。如他的《夜影》（Shadows of the Night）一诗，全篇都用实字，没有一个动词，而形容得活泼自然，深入人心，最容易引人美感，移人性情。波龙斯基则诗境多变，多作关于社会之诗，以

思想胜。我们看福依史之诗，每为他的诗的感情，新鲜的感情所引动，好像是亲在七十年代，过他的生活一样，他有阿拿克利翁（Anacreon）之风，以将就木之年（1888 年，他生于1820 年）犹咏爱情之歌，至为风趣。

波龙斯基之诗富于思想与实质。在他的诗里，常露出一个朴实忠诚的声吐。咏日与月（Sun and Moon）的儿歌 Child's poem 则“自然”跃然而出，唱欢愉之音。状物亦至为真切。他又做了好些希腊及其他历史的民歌，最著者有《喀山德拉》（Cassandra）[①] 及《波罗米谢奥斯》（Prometheus）[②]，复转笔而为叙述之作，《婀娜加尔地娜》（Anna Galdina）最为有名，情文旖旎，写景如绘，也是一部杰作。

赫尔岑少年之友奥格若夫（Ogaryov）也是当时一个天才的诗家。他助赫尔岑编辑《钟》报。他的诗带极沉厚的摆伦的色彩，而又为厌世之音。辟梨喜契夫 Pleshcheev 也是一个厌世主义者，他有尼克拉沙夫的斥责的态度，又有朵思退益夫斯基的人道的精神。他除以诗著名外，又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家。美依（Mey）也以译诗著。他是阿拿克利翁、谢亚克利讨史（Theocritus）诸诗人的最好的翻译家，他摹拟《旧约》里的诗，极有成功。《辟史加夫的妇人》（The Woman of Pskov）与《伊文第四》（Ivan IV）二作尤为著名，在抒情诗里占很高的位置。

当时又出两个平民的诗人（Polts of the people）。一个是尼吉丁（Nikitin）、一个是球利加夫（Gurikov）。他们都是出于贫贱，缺乏教育的。球利加夫幼于尼吉丁，环境尤艰苦，终生屈于农家小屋之中。但他的抒情诗与民歌，则殊有永久的价值。尼吉丁之

---

① 又作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

② 今通译作“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间的神。

作，则为上承加尔沙夫（Koltsov）之风者，他的最著的著作是《吉拉克》（Kulak），所叙的是鲁克契（Lukich）逼他女儿嫁一个她所不爱的人的事实。除了这篇著作外，他的自然界的描写才能，也是很高的。荒村孤冢，凄凉冬夜，绿林碧野，绚烂朝阳，以至乡间一切的自然景色，莫不被他捉入诗中，使人读之，如身临其境，或凄惨彷徨，或心旷神怡，不能自已。他所叙的平民生活，至今尚有兴趣，尚活泼如生。当克里米战役起时，他做了许多爱国之诗，声闻从此雀噪。及《吉拉克》之诗出，世人尤极热诚欢迎之。然不久此诗人乃永远沉寂，不复再歌了！

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两个诗人连翩而出，即史鲁契夫斯基（Sluchevky）与爱辟克丁（Apukhtin）二人是。但二人乃生非其时，正当物质主义潮流（Materialistic flood）正盛之候，他们在世间乃不为人所注意。直至后来，才渐渐的有人重视。爱辟克丁的诗格律严整，而甚冷淡，不如其故事小说之有趣味，是以名较次于史鲁契夫斯基。诗人哲学家（□□□□□□□□）[①] 史鲁契夫斯基则与他不同，他是抒情诗第一流的作家，又是描写诗 De Criptive poetry 的极伟大的能手。他的诗的色彩浓冶，活泼有生趣，正和爱辟克丁成一反比例。九十年代（他死于 1904 年）的时候，他的令闻，如日方升，没有一个俄国人不知道他的诗的，且群奉以“现代诗王”（King of contemporary Poetry）的徽号。可谓极诗人之光荣了！但本国虽如此热心的赞颂他，国外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不似杜特契夫，福依史，尼克拉沙夫诸人之译本传遍各国，研究文学的人无不知之。

在诸诗人中最为杰出的，是拿德生（Nadson）。他死的时候，虽然年纪很轻，只有二十四岁，但他的作品则光芒四射，高出一

---

①　此处外文模糊不清（原刊物如此）。

切老宿。他的诗，带厌世的悲音，富新声而多感情，是自然的叫声，是心泉的流渍，也是同情，怜爱，忠实诸情的表现。实具普遍的永久的不灭的真价。他心中充满了失望，充满了悲思，充满了厌恶之念，所以心弦上弹出的新声，也自悲哽不禁。他以为世界上强食弱肉，你争我夺，竞争何时得休？欲得和平，惟有万有皆摧灭时耳！厌世之念，强烈如斯，殷忧内含，肺痨遂侵，这个多愁多病的诗人遂不得不短命以死了！当他死的时候，他的诗集，才出版不数年，已至十版了。

明斯奇（Minsky），他的真名是肥林金（Vilenkin），与拿德生同时。七十年代时，诗名极盛，他是纯美派的诗人，同杜特契夫一样，也是高出于时与地的。他又以批评家著。他的批评文学，在当时也是极有影响的。此外还有弗鲁琪（Frug），是犹太人的儿子，他的学问，都由自修得来，在当年诗名也很藉藉。君士坦丁大公爵（Grand Duck of Constantin）是科学院的院长，他的抒情诗，雍容而愉快。德骚提李夫亲王（Prince Tsertelev）的诗也很有声誉，但他的哲学，比诗名尤著。加林涅契夫克狄沙夫公爵（Count Golenishchevkutuzov）则唱刚强描述之诗，《薄明》（Twilight）一篇尤为著名。这些都是较次于拿德生与明斯奇的。皮罗沙夫（Brusov），沙罗格蒲（Sologub）及巴尔蒙德（Balmont）也是这个时代的诗人。美列兹加夫斯基（Merezhkovsky）的诗，尤为优美，但他的所长乃在小说与评论，他主张由平民化的诗，而复归于普希金之模范。时人也很受其影响。阿利克赛托尔斯泰（Alexy Tostoy）的诗，也是很有价值的。但他的小说与戏剧在俄国文学上，更为著名，所以这里不讲他。

俄国的女诗人不能与女小说家比美，人数既少，其诗亦不甚著名。现在略举其较著者，罗丝托把金公爵夫人（Guntess Rostopchin）擅长于民歌，杂托夫斯基夫人（Madame Zhadovsky）

善以和婉之音，描写自然界，其诗才俱非现代女诗人所可及。而现代女诗人中，则以皮克托夫夫人（Mme. Beketov）及沙罗肥奥夫夫人（Mme. Soloviov）最著。她们两个人都是生长于墨斯歌文学及科学的家庭里的。除这几个人外，其余的女诗人都是没有举名价值与必要的。所以俱略过不讲。

在本文的最后，几个以翻译各国诗词著称的诗人，也不可不一述。福依史译《霍拉士（Horace）全集》，美依（Mey）介绍席勒（Schiller）及其他诗人之作，其完美过于自作之诗。但这两个还是以创造的诗著名。其专以译诗为生涯的，有格庇尔（Gerbel），美克海洛夫（M. Mikhailov），文保尔（Weinberg）诸人。格庇尔所译的有席勒，贵推[①]（Goethe），沙尔比亚，摆伦诸名家的著作。美克海洛夫所译的是海痕（Heine）[②]及其他作者的诗。文保尔所译的则为沙尔比亚的悲剧，及摆伦，赛莱（Schelley）[③]，吉兹哥（Gutzkow）之诗，最后则从事于贵推，海痕之诗的翻译。他们中除了美克海洛夫以小说《候鸟》（Birds of Passage）一书著名外，生平都是没有别的著作的。然其灌输外国的文学入国中，使本国的文学，取材益宏，格式益精，其功正自不可没。

（原载1922年2月1日《民铎杂志》第3卷第2期）

① 即歌德。

② 德国诗人海涅。

③ 英国诗人雪莱。

文学的统一观

一

研究文学的人，现在到处都有；但是他们却都不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他们有专门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如勃兰特（G. Brandes）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史宾格（Spingarn）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批评文学》等等；有专门研究一国的文学的，如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的理想与实质》，泰尼（H. A. Taine）的《英国文学史》等等；有专门研究一种文学的，如圣次堡莱（G. Saintsbury）的《批评文学史》，李维生（Liweison）的《近代戏曲》等等；有研究一个人的文学的，如莫尔顿（R. Moulton）的《戏曲艺曲家的莎士比亚》，《戏曲思想家的莎士比亚》，等等；也有专门研究文学中的一种运动，及文学中的一个问题，一种思想的，如西莫士（Symons）的《文学里的象征运动》，皮奥士（Peers）的《十九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蒲格（L. Berg）的《近代文学中的超人思想》，等等。但他们却没有——绝对的没有——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

立的研究的对象，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的。

不惟个人的研究是如此，就是大学的分科里，也只看见有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希腊文学门，腊丁文学门等等，却没有——绝对的没有——专设立一个“文学科”，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为彻底的全部的研究的。

当我们讲到哲学的研究时，我们心里就立刻知道，我们所谓哲学研究，并不是因个人对于希腊的研究有兴趣而去读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或是因个人对于德国的研究有兴趣而去读德国哲学家的著作，等等，乃是：离了所有这一切，我们承认有哲学的这一件东西存在，他有他自己的独立的兴趣与历史，他是一个整体，而非各部分的总合物。换一句话，就是我们承认哲学是统一的；是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我们研究他，应该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而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

于历史，于艺术，于生物学，于社会学，于经济学，也都是如此。我们研究他们也都同研究哲学一样，以他们为一个整体，而承认他们是统一的，是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而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而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

为什么文学独不然呢？为什么文学只有局部的人的，时的，地的，种类的研究，而却不能有全体的，一贯的研究呢？为什么大学中，只有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等等，而独没有专门研究“文学”的一科呢？哲学，历史，经济学，生物学他们也不是没有局部的研究，如他们也有希腊哲学，印度政治史等等，但他们总是同时有超于局部的研究的全体的统一的研究，为什么文学独不然呢？

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很不可解的事。

有的人说，现在各大学里不也是有“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这一科么？我们不也是有“文学的哲学”（The Phylosophy of Literature）这个名词么？难道这些不是文学的统一的全体的研究么？

这句话是不对的。比较文学诚然是向文学的统一研究的较近的路，但决非就是文学的统一的研究。因为：他不过取一片一段的文学而比较研究之，不能认为全部的研究。并且他的名字也很奇怪；谁又曾听见人说过“比较哲学”，“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生物学”等名辞呢？同样的，文学的哲学也决不能认为文学的统一的研究。因为文学的哲学，不过是文学的全部研究中的一个元素，以为他就是文学的研究，正好比是说经济学他自己是一个好的做生意人一样。

文学的统一观，现在研究文学的人理会到他的还极少呢。

我们不明白这个理由，只可以说现在文学研究的程度还不深。莫尔顿（R. Moulton）以为文学研究正在开始，这句话实是非常的对。

二

文学的统一观为什么是必要的呢？因为第一在文学研究的自身上说来，实是有统一研究的必要。

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片段的，局部的；知道一个人的文学，却不知道他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学，却不知道他的前面的来源与后来的结果；知道一个地方的文学，却不知道他与别的地方的关系，他所影响于人的，或是他所受于人的影响；知道一种的文学却不知道别的文学的详细。如此，研究文学的人，对于文学不能有全体的统一的观念。不惟于文学这个东西

永远没有具体的见解，就是局部的研究的自身也不能得完满的成功。譬如讲到文学的起源，如非综合世界各国的最初文学的方式而研究之，又怎么知道他是从哪一种形式起的呢？又如讲文学的进化，如非综合世界全体的文学界的进化的历程，又怎么会明白文学的进化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至于论文学的原理，论文学的艺术，也是非把全部的世界文学界会于一处而研究之不能得最确真的观念的。总之，如非把文学为统一的全部的研究，我们对于文学是很难得真确的完全的知识的。

又如讲英国的文学，如不知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希腊，腊丁文学的究竟，又怎么知道他们对于他的影响呢？但丁的《神曲》，荷马的《依利亚特》和《亚狄赛》，贵推的《法乌斯特》，我们都知道他们于英国文学界里极有影响。但但丁在意大利文学史的地位，如何呢？《神曲》的内容如何呢？荷马，贵推的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与其在本国文学史里的地位又是如何呢？如此研究英国文学，又非同时研究希腊德国等文学不可了。同样的，在法国文学里，也有英国的影响，德国及希腊等等的影响；只专门研究英国或法国的文学是并不能彻底的知道英国或法国的文学的。又如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不知道希腊与希伯莱的文学，又怎么知道他的来源，怎么知道他的复兴的原因呢？或是不知道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各国的文学的起源，又怎么知道文艺复兴的结果与影响是如何呢？诸如此类之例，举之实不胜枚举。总括一句话：就是文学的时与地与人与种类，都是互相关连的；不于全体文学界有统一的研究，则于局部的研究也不能有十分的精确与完备的见解。

超于文学研究的自身的关系，还有第二种更重要的原因，使得文学研究者乃至一般的人必须具有文学的统一观。

“一国的文学，就是一国的历史的反映，这是人所共认的。

文学是超出于个人的一种出产品。”这是莫尔顿的话，（见《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第四百二十九页。）我却以为世界的文学就是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虽因地域的差别，其派别，其色彩，略有浓淡与疏密之不同。然其不同之程度，固远不如其相同之程度。因为人类虽相隔至远，虽面色不同，而其精神与情绪究竟是几乎完全无异的。无论人类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如何，终是人类，终是同样的人类；虽文化至高之人类，其喜怒与食饮与居住的本能——原始的本能——终是不能有一点消减的。高尔该说：“我们没有一种‘世界的文学’（Universal Literature）。因为现在还没有全世界通用的文字，但是所有的文学的创作品，散文或诗体的，却满注着一切人类所共有的感情，所共有的思想，理想的分子，人类的对于精神自由的快乐之神圣的热望的分子，人类的生活痛苦之厌恶的分子，他的更高的生活方式之可能的希望的分子，并且还满注着那些不能用文字或思想定义，又难能以感情理会得的，我们所谓‘美’的神秘的东西，他们能回复一朵永久的更光明，更快乐的花在世界上，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又说：“他告诉我们说，中国人 Hen-Toy 对于妇人爱情之苦闷的不满足同西班牙人 Don Juan 是一样的；Abyssinian 也唱同一的爱情的苦乐之歌，如法兰西人所唱的；一个日本的 Geisha 的爱情是与 Manon Lescant 的爱情有同等的情热的。人类寻求妇人，他的灵魂的，他的欲望所放出来的火焰，一切地方，一切年代都是同样的。谋杀者之为人憎恨，在亚洲与在欧洲是一样的；俄国的可怜虫 Plushkin 之使人怜悯与法国的 Grandet 是一样的；所有国家里的伪善者 Tartubes 是一样的，无论什么地方里的愤世者 Misathropes 也都是一样的可悲悯的；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的为精神的武士 Don Quixote 的可爱的幻象所愉悦的。要之，一切的人，说一切的语言的，都常常的讲到关

于他们自己的及他们的命运的同样的事情。”（见《新青年》八卷二号，我译的《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

由这个人类本能的同一观，我们可以知道表现这个人类的同样的本能——精神与情绪——的文学，也是必须，“一视同仁”，决不容有什么地域的人种的见解了。

莎士比亚的文学，在英国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在德国也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决不因为他是英国的，就不去理会他。安得列夫的《红笑》，在俄国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在日本也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决不因为他是他们的敌国俄国的文学，就不去理会他。同样的，克洛林科（Korolenko）的《玛加尔的梦》，虽然叙的是西伯利亚的民间的事，我们中国人读他时，心弦也总为他抽紧了。《在战火下》与《光明》（此二篇小说皆法国比尔塞在欧战时所作,）虽然是德国或奥国人看了，他们的眼泪也要为流出了。

所以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类全体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决不宜为地域或时代的见解所限，而应当视他们为一个整体，为一面反映全体人类的忧闷与痛苦与喜悦与微笑的镜子。

由文学的统一，为许多不同颜色的圈子所圈住的不幸的分割开的人类，也许可以重复统一。

人们是一体的；既由文学中看出一切人的情绪，呼号的，痛苦的情绪，谁复忍互相践踏。

三

有许多人看到这个地方，也许会发生疑问：文学的统一观固然是必要的；但文学究竟可以有统一的研究的可能么？在这个问题中，他们的疑问大概可以有二点：

（一）文学的统一研究是有特别的困难的。因为文学虽包含同一的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然而现在世界还没有统一的言语与文字；各国都用各国自己的文字来写下他们的作品。在这种情形底下，文学怎么会有文学统一研究的可能呢？一个人总不会是万能的，决不能把所有的世界各国的文字都能理会得；——现在世界的文字的种类是如何的复杂繁多呀！——都能读得，研究得一切的世界的文学。而普通人要得世界文学的兴趣，更是绝对的不可能；他们除了本国的文字外，别的国家的文字是都是不懂得的。如此，文学的统一研究，又怎么是可能的呢？即使研究文学乃至看文学书的人，可以自由使用本国的文学译本，然而文学书的译本，果就是原书么？原书的价值与兴趣不会因一转移间而至消减至最少程度么？进一步说，文学书是能够译得来的么？文学是作者的情绪与灵感的表现，在他们情绪忽生之际，或当脑中灵光一闪之际，他们的作品自然会潇潇洒洒的写了下来，使作者自己以后再写，恐怕也不能与以前所写的一样，何况是别一个人译他呢？况且文学差不多总是带有地方的色彩的，这种色彩往往是在他们本地看来，是活泼泼的，移了一个地方就不能把他表现出来了。——就是勉强表现出，也是要减色不少的——还有一层，情绪与想象，乃至思想表现于文学中的，往往与“文字”是结合在一块的。文字一变换，这种情绪与想象与思想就也要跟他们一块变了。

况且，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文学书勉强能够译，译出来的文学书又足以供给研究文学者乃至具有世界兴趣的读者的需要么？现在的无论哪一个国家，就是最能包含别国文学的英德二国，都不能把世界各国的文学包括一个大体。

在这种情形底下，文学的统一观又怎么会有构成的可能呢？

（二）文学与哲学及其他各种科学不同；他是一种艺术。文

字的单位是一个字或是一个习语，文学最小单位是一首诗，或是一篇短小说。在哲学，生物学，经济学乃至历史里，我们所记载，所讨论的只是事实，只是报告，只是报告的分类。至于关于文学的报告就不然了。他的报告差不多是最贫瘠的。这种研究所需要的是想象的知识，及文学的东西在读者趣味上，在他的艺术的与精神的变动性上所起的反响。在这么多的单位，在这样深藏莫测的赏鉴的基础上，文学怎么能包括一切而为一个统一的研究呢？

四

对于这两个疑问，我可以答复如下：

（一）现在我们人类还没有统一的文字，文学统一观的成立自然不免有些困难。但却决不是绝对的不能成立。因为我们“可以自由使用本国的文学译本”，以研究别国的文学。虽然是连一国的外国语都不懂的人，也可以藉本国的译本，来为文学的统一研究，或得到世界文学的兴趣的。

至于讲到文学书的译本是不是就是原书？原书的价值与兴趣能不能因文字的转移而消减至最少程度？那末，就要讨论入文学书能够译不能够译的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本报十二卷三号上，曾有一篇《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讨论到。在本报十二卷五号上，沈泽民君又有一篇《译文学书三问题的讨论》，专来和我讨论这个文学书究竟能够译否的问题。我本想再做一篇论文来答复沈君，现在既在这个地方，又发生了这个问题，我就在此再讨论他一下，不再做这一篇论文了。

我的文学书能够翻译的意见还是坚持着。我以为文学书如果译得好时，可以与原书有同样的价值；原书的兴趣，也不会走

失。就是中等的忠实的翻译家也能把原书的价值与兴趣搬到译本上来。

作者的灵感与情绪，诚然是刻刻变更的，是一闪而过的；有许多作品，诚然是叫他们自己再写，也不能写得那样有精神；然而译他时，却与重作不同。译者看作者的原文时，作者的灵感与情绪自然会由文字的介绍而重生在译者的心中。如果译者不是一个与作者的灵感与情绪极不相同的人，他的译本，未有不能达出——照样的达出——作者所含于原书的灵感与情绪的，况且作者的灵感与情感是存在原书的文字中的；如果把原书的文字，忠实无讹，不漏不支的翻译过来，原书中所言的灵感与情绪也是可以跟着移植过来的。所以就是一个中等的忠实的翻译家也能办到这一层。

至于讲到地方的色彩这一层，我以为也与灵感与情绪一样，不发生什么问题。克洛林科的《玛加尔之梦》其中所描写的地方色彩在周作人君的译文里，竟能充分的表现出来。如果《水浒》能译成外国文，我想鲁智深与李逵诸人的神气与口吻，也非不能在译本中达出的。非中国的人，也许脑中毫没有李逵或其他诸人的印象在，然而这也不关紧要；他们的印象，深深的刻在《水浒》中呢。看了《水浒》就可以脑中也深深的刻上他们的印象了。况且翻译的人，对于所译的原书的出产地方，总是稍为熟悉的；决不会茫然无知的。——这一层自然非所语于转译者，——译者既然熟悉其地方的人情风俗，地方的色彩的传达，自然更是毫不费力了。

情绪与想象乃至思想表现于文学中的，虽是存在于文学书的文字中，然而决非坚固的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层我在我的《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已讲得很明白：“在‘Element of Style’一书中，Rannie 证明‘大多数的“表白”（Expression）是可以随人

之意的，所以他与思想是分离的。’譬如思想是水，‘表白’是载水之器，无论载水之器的形式如何变换，水的本质与分量总是不会减少的。既然同一的思想能由作者任意表现之于无论何种的‘表白’或‘风格’中，那末我们就不能有理由去疑惑说，思想是不能表现在一种以上的文字中了。”这一段话，虽然说的只是思想，然而情绪与想象与文字的分离也可以用同样的解释。因此我们知道，原书的文字虽然变换，原书的情绪与想象与思想是决不会因文字变形了。而他们也会变形了的。

由此可知：翻译的不可能说，是没有成立的基础了。由此可知：凡从事于文学的统一研究，与凡有世界文学的兴趣的，都可以不疑惑的尽量的自由使用一切文学书的译本了。

至于讲到现在中国乃至其他各国的文学译本太少，不足以供具文学的统一观的人的研究，这倒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我们却决不足因此而疑惑文学统一观的不能成立。正因以前的时候，研究文学的人都不大注意文学的统一观，所以他们不大注意于世界文学书的介绍。如果我们有了文学统一的观念，译本自然也大批的发现出来以应大家的需要。“只有先有需要，然后才有供给；决不会有了供给，才发生需要。”

不过，文学书的需要翻译究竟是一件困恼的不好的情形。因为一本书要费了两三重的心力，才能达到我们的视线，未免太不经济了。这种困恼与不经济我们是要归咎于没有世界的文字的原故。如果有了世界通用的文字，又何必费了许多翻译的劳力呢？可怜的人们呀！不知有多少的兄弟们的心力，因为受你们的划了许多不同颜色的圈子，自相隔离的影响，而牺牲于翻译的事业上呢！

（二）这个问题，是专就文学研究上讲的。文学与哲学，生物学等科学虽然不同，然而“文学的研究”却也与文学的自身不

同；他与哲学等一样，也是一个科学，不是艺术。他的研究的单位虽然与别的科学的单位，略有不同，然而研究的情形究竟是一样的。植物学的单位是各种的植物；人类学的单位，是人，——古代的化石等；“文学研究”的单位是诗，小说，戏曲等。虽然他的单位繁杂，但也不是没有综合的研究的可能的。

“文学研究”有时也需要想象的知识及文学的东西在读者趣味上，在他的艺术的与精神的变动性上所起的反响，然而他究竟是超于“赏鉴的基础”上的。“文学研究”的任务，不仅是指出某部小说有价值，某本诗对于某时代或某地方有非常大的影响，或是说那一本文学书是永久的，普遍的东西，他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如何；这也许是“文学研究”的任务的一个，然而“文学研究”的更重大的任务却不在此，而在综合人类所有的文学作品，以研究他的发生的原因，与进化的痕迹，与他的所包含的人类的思想情绪的进化的痕迹的。

就讲“赏鉴”吧。赏鉴的基础，虽然人各不同，地各不同，时各不同，然而究有其共同之点，决不会是“深藏莫测”的。具有文学的统一观的人都是同样的以世界的文学界为观察点的；观察点同，赏鉴的基础自然不会十分差异了。

所以，就这个问题讲来，文学的统一研究更可以见是并非不可能的！

五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似乎也应该连带的提起，就是：莫尔顿（Moulton）也是极力主张文学的统一观的——他大概是世界中主张这个学说的最初的人，——他的文学统一观如何？与上面所讲的是同呢还是不同呢？

莫尔顿之文学统一观的要求的呼声，同我是一样的，并且我的这种观念也是最初的由他唤起的，我殊觉感谢他；但是他的统一观，却是不彻底的，与我的颇为不同；我却是不能赞成他的。

在他的《世界文学》上，有几段话，把他的主张讲得很明白：

“我们可以承认，‘世界文学’（World Liternture）这个名辞，可以合法的用在一种以上的意义上；我却要完全把他规定在一个固定的，特别的意义上。我要把‘世间文学’（Universal Literature）与世界文学分别开来。‘世间文学’的意义只是所有一切的文学的总合数。世界文学，在我用这个名辞的意义上，却是从一个特定的观察点上所见的‘世间文学’，这种观察点或可以由观察者的国家立足点上发出来的。这两个名辞的区别，可以用地理学与风景画艺术对于同一的地势所用的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他。我们要描状一座一千尺高的山，一个不到四分之一亩大的围绕以树木的池，一个倾斜到一百尺高的草地，一个约有四百尺长的湖。在地理学上，自然要认识这些地形，自然必要把他们一起描状出，照他们真确的面积。但是风景画却要开始固定一个观察点：从这个观察点，所有那些地形的元素都以他们的相互的关系显出。远隔的山峰可以缩小至一个雪点；那方池水也许是显著的中心，每棵树木都分别显出；草场在远处只有一点柔草可见；在反对方面，那个大湖在地水线上只显出一丝银色的条痕。同样的观测，世界文学对于英国人与对于日本人是不同的：莎士比亚对于英国人如此的显出伟大的，对于日本人却只需很少数的状容，而中国的文学，在一种文学的风景图上成为前景的，在别一个地方，也许是并不注意的。世界文学就是对于英国人与法国也是不同的东西；只因这两个民族历史的相同，所以这两个风景图的构成元素很是相同，所不同的只是部分的分配。还有更甚于此的。世界文学对于在同一国度的各个人也是显出不同的：一个人有一

个较大的观察点，因此，取得更多的‘世间文学’；或者学生或有影响及于他的教师的个性，成了一面灵视镜，把全部的复杂的事实聚焦点于他自己的个人的排列上。在这种情形上，‘世界文学’是一个真的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又是所有的文学的统一体的反映。……”

莫尔顿的这种见解实是极不彻底的；他既然承认文学有统一研究的必要，为什么仍然不把人类当做观察的出发点而以一国为观察的出发点呢？以一国为观察的出发点，那末，必如画风景图一样，要把一个极大的山峰，只画成一点，把一个极大的湖水，只画成一线，把一个不及四分之一亩的小池当做研究的中心了。如此，仍然是部分的研究，不是全体的统一的研究了。如此怎么能讲得到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呢？莫尔顿的文学统一观，所以，我以为，虽是较别的只研究一国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种类的文学或一个人的文学的稍为进步些，然而仍然是十分不彻底的。

研究文学，就应当以“文学”——全体的文学——为立场。什么阻隔文学的统一研究的国界及其他一切的阻碍物都应该一律打破!

或有人说：“如你所主张的，文学的研究不至变为‘非统一体’么？莫尔顿以一国为观察的出发点；有关于其国的文学进化的则引入之；关系少的，则引入亦少；没有关系的，则置之不复注意。如此，才可以显出文学的有机的进化，如此，才可以显出文学为一个浑圆的统一体。如你所主张的，则是总会一切毫无历史关系的文学系统于一处，谓之文学的统计则可，谓之文学的统一研究，恐怕有些不对吧?”

这些话的发生是因为不明白文学的统一研究是什么的原故。我们所谓文学的统一研究就是：“综合一切人间的文学，以文学

为主观点，而为统一的研究。”并不必管什么关系于国界的历史的关系。因为我们既然以世间一切的文学为研究的主体，所以，文学界的系统无论是如何的复杂而且众多，都可以视为一个浑一体。譬如地理学，虽然与风景画不同，虽然是综合一切地势，不漏不支而研究之；然而他固是一个科学，一个很完备的科学。谁也不能说地理学不是一个统一的浑一体。地理学如此，文学的研究自然也是如此了。

六

我的意见，在上面差不多已叙一个大概了。本想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因为限于篇幅，只得至此而止。最初的时候，也想附一个“世界文学表”在后面，以表明世界文学界所包含的内容，也因为限于篇幅，只得暂略而不详。因此，这篇文章只可算是一个提议，一个文学统一研究的必要的提议。

人们的觉悟，本来是最迟钝的。历史学的研究，至今已不知经几千百年了，而至现在才有威尔士（Wells）的《史纲》出现，为人类的历史的最初的一部著作。现在文学的人类化的呼声，方始闻于我们的耳中，一本人类的文学史不知哪一年才能出版呢?

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只深深的希望第一本的人类的文学史的出现。

这篇是一年以前的旧文字。因为忙碌之故，现在不能有改削的工夫了。文中有许多议论是从 Moulton 的“World Literature”里得来的，应该十分的感谢他。

（原载 1922 年 8 月《小说月报》13 卷第 8 期）

圣皮韦（Sainte Beuve）的自然主义批评论

近代批评的发端——圣皮韦在近代批评史上的地位——圣皮韦的生平——自然主义的批评——结论

中国人的文学批评，还在因袭的法则的束缚之下，许多年来，儒学的批评论，支配一切，没有人敢违背他的固定的主义的。而所谓批评者，亦无系统之可言。古籍的训诂评释，为其惟一的势力所在。现在虽已把这种传袭的主张打破，而新批评观念，尚未成立。所以我们觉得介绍欧洲近代的文学批评，实有不可一日缓之势。欧洲的近世批评，始于圣皮韦，泰尼继之于法，亚诺尔（Arnold）继之于英。其余如配德（Patey）之快乐批评，法朗士（A France）之印象批评，等等，亦皆导源于圣皮韦。现在先介绍圣皮韦之批评。一则以圣皮韦为近代批评之祖，二则因自然主义的批评，在中国现在似乎有介绍的必要。其余诸派，且俟后来再说。

一 近代批评的发端

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的效能，不仅仅是去评判一个作家的作品，或是寻出他们的缺点，或是赞扬他们的天才。他的更重大的使命，乃在变更创作的倾向，更新创作的思想，使枝叶低垂，将行萎枯之文学的花木，重复鲜艳灿烂，或是用了犁耙，将恶草铲除，翻松土地，播下嘉禾芳草的种子。马太亚诺尔（Matthew Arnold）说，批评家之职务于在酿造第二代创作家之新理想。在文学史上看来，凡是批评力旺盛的时代，也就是创作力旺盛的时代。批评与创作，有平行的发达之势，如希腊文学之亚历山大时代，英国文学之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之十九世纪，一般文学史家都称之为批评时代。而继此批评时代而来者，即为创作时代。由此可证明文学批评之重要。

亚诺尔说："这许多年来，法国与德国的文学乃至欧洲的一般知识其主要之努力乃为批评的努力。"白比德（I Babbitt）在《近代法国批评》一书里，引了亚诺尔的这句话，便接下去说道："所以我们研究圣皮韦（Sainte Beuve）及其他十九世纪法国的大批评家可得十分接近十九世纪知识的中心。"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近世的文学批评，于了解近世的一般知识是极有帮忙的。

近代批评的发端，可以说是与十九世纪初叶的浪漫主义运动同时。在浪漫主义未爆动以前，欧洲的文学界，为古典主义的灰尘所封闭，所谓文学批评者，除了支支节节的从事于古书的训诂注释以外，并无独创的见解。其情形正与中国明末盛行《评点史记》之类的书相似。其持以批评当时的创作的标准，仍为希腊亚里斯多德（Aristoteles）在纪元前三百年所著的《诗学》。法国的

博依留（Boileaaw）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也著了一部《诗学》，其学说之中心，建筑在亚里斯多德的“三一律”上。他灭却批评家的感情与印象，主张诗与戏曲须以固定的法则与公式来批评。英国诗人莎士比亚的戏曲，遂因违背“三一律”之故，而大受他们的非难。当他们的戏曲输入法国时，“粗笨的野蛮作品”，“出于酒醉的野蛮人之想象之作品”，等等的谩骂，喧然四起，直至浪漫主义运动之帜大张，WordsWorth，Colesidge，Hllgo 诸人出而打破古典主义的朽腐的束缚，变更博依留诸人尊重形式的倾向，排斥一切诗学方面的主张。于是文学界的新光明，始破阴霾之天空而射出。批评家创作家皆知重感情而轻形式。

“许多田地现在都要长出花来，
因为他们都已得有种子了。”

最初破土而出，为近代批评的报春的破雪草者，便是法国的批评家，被称为近代批评之祖的圣皮韦（Sainte Beuve）。

二　圣皮韦的地位

圣皮韦在批评史上的地位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便因为他是文学上第一个应用培根（Bacon）的归纳法的人。莫尔顿教授（Professor Moulton）常谓文学研究之不能与哲学、生物学并驾齐驱，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因为没有采用“归纳的观察法”。而他讲到近代文学研究的精神时，亦以“归纳的观察”，为近代重要精神之一。杜顿教授（ProfessorDowden）在他的《文学的新研究》一书上，曾说，法国人过于看重系统与法则。一种法则成立了，便渐渐立有了威权、变成专制，以压迫自由思想为其职志

了。这种中心的威权，在文学批评早已形成。而圣皮韦的批评方法则不然。他想尽力免避掉这种抽象的统一的方法，而代以细密的观察。他一方面打破古代因袭的法则，一方面则自己很小心的免除更形成一种法则。所以“他是爱观念的，但是他却怕一种观念的专制”。他自己说：“那些最与我表同情的人曾说过，我是一个很好的审判官，但却是一个没有模式的审判官。”虽然他后来也造出一个“自然主义的批评的名词”，然而他的精神却是始终倾向于自由，倾向于归纳的研究的。他在法国文学乃至近代欧洲文学上地位的重要，此其原因之一。

圣皮韦的批评论，虽有许多人批评他凌杂，然而却博大得很。近代所有的文学批评，所谓科学的批评，鉴赏的批评，印象的批评，快乐的批评，等等，几无不以圣皮韦为其祖先。配德(Walter Pater)主张快乐的批评，以为人所以看重名画及其他艺术品之故，便是因为他们都各有一种特质，能够给他以一种特殊的愉快的印象。而他的这种主张，在圣皮韦著作中，已发其端。亚诺尔主张鉴赏的批评，以为批评之职能在努力的去学并且去宣传那世界上最好的所知与所想的东西。他的批评，非伦理的，亦非通俗的。而他的这种主张，在圣皮韦的批评里，已也发其端。此外科学的与印象的批评之类，也都受圣皮韦的很大影响与指示，圣皮韦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此亦其原因之一。

三　圣皮韦的生平

圣皮韦（Chasls Angustin Sainte Beuve）生于一千八百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的生地是法国的BoulogneSurMer；死于一千八百 六十九年十月十三日；死时，他住在巴黎。

他的父亲与他的母亲结婚时，年已五十二岁。同年，圣皮韦

就出世。他母亲是有英国人的血统的（她的母亲是一个英国人）。他的父亲则嗜好文学，常常手里拿着笔，在那里读书。圣皮韦受过本地的教育后，便要求他母亲送他到巴黎。这时他才十四岁。在巴黎转学了一回。起初他得到史学的头奖，后来又得到腊丁诗的头奖。在一八二三年时，他开始去学医学。在一八二七年时，他的一位在大学里的教授，创办 Globe 报，要求他帮忙。他弃了医学，做了许多关于历史的与文学 的论文，登在这个报纸上。同时又做了许多诗。他的诗集，共出了三册。最初的一册名“Viepoesies et Pensees dejoseph Delorme”，当时并不用他的真名字发表。后来，他的批评的趣味日增，便弃诗不做。他在“Globe”上做的关于法国十六世纪的诗歌的论文，在一八二八年，汇成一册出版。他的评论始有声于世。同时《巴黎评论》出版，圣皮韦首做了一篇论博依留（Boileau）的文字给他们。一八三一年，《两世界评论》出版 圣皮韦最初便是一个最活动、最重要的做稿子的人，他的声誉渐渐的大起来。一八四四年便做 Mazarin 图书馆的馆长，得了国家的年俸。从此生活无忧，得以专心读书，并读希腊文，于他后来的影响极大。一八四五年他离了图书馆，受聘做比利时 Liege 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在这个大学里，他做了许多评论查脱白林（Chafeaubriaud）及他同时代人的讲演。后来这种讲演稿集成两册出版。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使他复陷于穷困。第二年 Leconstitutiounel 报的主笔，请他于每月曜供给一篇文学的评论。于是圣皮韦有名的《月曜闲话》（Causeiesdu-Lundi）遂以开始。他继续做了三年。在一八五七年，他又改而替 LeMoniteus 报做这同样的工作。在这一年《月曜闲话》开始集成一册出版。到了一八六二年，共成了十五册；中间歇了一时，他又继续做《新月曜闲话》，又一共出了十三册。一八五四年，他在法国大学做腊丁诗的教授，从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一

年，他在 The Fcole Nosmalesuperieure 做法国文学教授。一八五九年，他得了 Legion of Hovour 的名誉勋章。

他的著作除了上述的以外，还有一部小说“Volupte”(1834)，一部论文集①，及七本的②，这些都是曾在《巴黎评论》和《世界评论》上发表过的。

他的一生，自一八二七年替 Glob 做文起，一直至一八六九年他死的时候，都是与笔墨为缘的。他自己曾说道：“我不是一位先生，也不是一个上流人，不过是一个在包工及计时给资的制度底下的一个工人。”

四　自然主义的批评

圣皮韦的批评主张上面已经说过，是要极力跳出法国人所用的抽象的与规则的方法的。他小心免避他自己带有系统的精神。他的心上镌刻着“真理”这一个字。正如亚诺尔所说的，他的批评里所说的话的一切根底，都是发于他的对于真理的纯朴的忠心。他在一八六二年发表的评查脱白林的一篇文字里，把他自己的批评方法解释得详细。他说，他是不要原理的。世间没有“模式的圣皮韦”（Codegantebeuve）。他说，但他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由实验得来的。后来，他于批评 Keshnei 的一本作品时，又承受了自然主义的批评的名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研究一本作品，如果要扫除古代的修辞学上的评判，而欲得到真理同研究自然科学时所能得到的真理一样时，我们必须把这个作家的全部著作都看过，并且还须进而研究作家他自己；而我们要研究一个作家，又必须进而观察作家的家庭，尤其于他的母亲要注意。如

① ②此处原载刊物，不清。

果他有兄弟姊妹，及子孙，也须把他们细细的考察一下。对于他的“最初的环境”，就是他开始投身入文学界，开始做第一篇诗或小说或论文时的环境，尤须注意；他的朋友们及他的同时代人也都须研究一下。还有他所受的世间的影响也须研究，我们须同时从崇拜者与反对者的言论里看出我们的作家。综合这一切研究的结果，于是真理才会发现，我们对于这个作家的特殊的天才，才可下一定义。但是，我们的观察须要正确精当，不可急急的去求结果。

圣皮韦的这个方法，这个归纳的或自然主义的方法，确为求真理最稳当的路径，他极谨慎的一步步研究下去，把详细的事实归纳成几个原则，如此，心中所有的成见，才可扫除净尽。但是法国，即在向来崇仰圣皮韦的人，对于这个批评方法，也不满意，他们叫他的批评为消极的批评，没有一种原则的模式，没有一种原理。但圣皮韦却很坚决的说道：“在文学史及文学批评里应用培根的方法，在我看来，似乎是我们现在所必要的。”他又期望道：“总有一天，批评的科学会成立的，那时，伟大的心灵种类和他们的重要种别就会被我们知道，并且断定了。”这种勇气，真是不可企及!

但他虽然想把文学批评成一科学，想把人类的智慧和性质分成各种各类，然而他还是不许系统的精神占据在他的脑中。他说，这样的一个科学，决不会同植物学或动物学一样的。人类是有“所谓意志的自由”的，综合人的智慧是万分的复杂，万分的困难的。即使在将来很辽远的时代，这科学真能成立，而亦是十分浮动的，完全靠天才家的善于应用，始会显其效果，正如艺术之靠艺术家之技能，医药之靠医生的技能似的。决不似自然科学之有固定的原理，谁都知道，谁都会应用。

圣皮韦真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他竟始终不肯落于系统

的法则的陷阱。

五 结 论

自圣皮韦的自然主义批评出现后，泰尼（Taine）继之进一步而倡私学的批评论。他作《英国文学史》，即以他的科学的批评，应用在里面。对于他们，攻击的人极多。在法国则有蓝辛（Racine）之崇拜者柏鲁涅底（F Bruleetiere），大张理想主义的旗鼓，对于科学的自然的批评，大肆谩骂。在英国则有三大册的《文学批评史》的著者圣次保莱（Sanitsbury），以他们为重视作家外界的境遇，而蔑视他们内部的观察。还有人以为圣皮韦的批评方法，只可施于作家研究，而不能为历史的全部的考察。

这种批难，自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是我们一方面固不能蔑视作者内部的思想，而别一方面，却也不可完全不注意到作者的遗传与环境。圣皮韦以为大作者常常戴了面具，在作品里，不容易见他们的真相。只有在他的同血统的人中，比较得可找出他的纯朴而赤裸的性质来。这也是实在的情形。

圣皮韦的批评，原不适用于历史的研究。泰尼比他更进一步，更进而研究人种与时代地理的环境，他很知道，人种的素质于作者是很有影响的，时代的变化对于作者的情感也是很有关系。至于地域的不同，与文学之关系之重大，我们只要看春秋时，孔子，老子，与其他各作家的差别，以及意大利，北欧文学的不同。便可以知道。不过完全注重于外面的影响，而把作家内在的理想与情感一切抹杀，也不是健全的主张。

但无论如何，圣皮韦能在古典的灰尘中，扫出一片干净土，能于群务空谈之时，独趋向于归纳的观察，为近代批评开其先路，他的功绩是决不可没的。

中国现在的时候，正如圣皮韦时的法国有些相似，欲切实的研究中国文学，似非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批评法不可。

“在文学史及文学批评里应用培根的方法，在我看来，似乎是我们现在所必要的。”

（原载 1922 年 10 月 10 日《文学旬刊》第 52 期）

何谓古典主义?

一、古典主义的时代——二、古典主义的定义——三、古典主义最初的影响——四、古典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冲突——五、形式的与精神的摹拟的冲突——六、古典主义在法国——七、古典主义在英国——八、古典主义在意大利——九、古典主义在德国——十、结论

十八世纪的欧洲是在古典主义（Classicism）的控制底下的。从文艺复兴的末期，到随了法国革命同来的罗曼主义运动的开端，欧洲的文学都是受了古典主义的影响的。

古典主义的影响恰如一阵海潮，从意大利流入法兰西，又从法兰西流入英吉利与德意志，然后其余波复由英吉利而流回意大利。

在英国文学史上，密尔顿（Milton）算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最后的作家，他的死年“一六七四年”，可以算为古典主义时代的开端，而此时代之终点，可以说是在一七七五年勃莱克（Blake）与保尔士（Burns）的革命的作品出现之前。所以自一六七五年至一七七五年这一个世纪，在英国文学史上是古典主义

潮流的起讫时代。这个年代在欧洲大陆的文学史上也可以应用。

“古典主义”这个名词包含什么样的意义呢？他也同别的许多文学上的名词一样所含的意义十分复杂。我们一想到“古典的’（Classicial）这个字，歧异的意思便立刻纷陈到我们的思路里。他的原来的意义是很简单的，便是指一个种类或一个阶级中最好或最高的而言。罗马的国民是“Classici”，他们便是在他们统治底下的一切阶级的首领。后来，（也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又把这个字第一次应用到作家与他们的作品上去；他们指那部著作是“Classicial”，便是说那部著作是同类中的最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指一部新出的书是一部“Classic”（名著）。到现在，美国的人，还时常在口头上应用这个最古的意义。他们说那本书是本“Classic”，便是说他是一本名著，一本完善的著作，有确定的声价的。在这个意义上“古典的”与“罗曼的”并不是对待的称号。

但是在欧洲，“Classics”这个字的通用意义便完全不同。他们所谓“Classics”（名著）是专指希腊与罗马的文学而言的。把这个字应用到个人的身上，便是指那些希腊或罗马的作家，他的作品足以悬范于后世的。因为他们是后来作者的范式，所以便从他们的作品里演绎出许多模式与规则来。亚里斯多德派的批评，也都应用这些作家的模式，当做批评的标准。所以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便以为一部“Classics”就是古代的名著，遵从已规定的法则写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古典的”艺术便与“无规则”的“罗曼的”艺术立在反对的地位。

中世纪的人观察希腊与罗马作品的内容，以为他们的精神是纯洁的，他们的心灵是强健的。古代的人的世界观，较之后人，是比较的简单而且完全，他们的艺术的完备，与他们的文字的清

莹，恰与他们的内部的平衡与秩序相应。我们现在很知道古代的作家并不完全是强健的；我们有的时候还觉得他们的技术与风格是很“罗曼”的，而且有些地方比我们同时代，尤其新近。不过文艺复兴初期的人却都视古代的作品为健全的清洁的及秩序的。到现在我们用起“古典的”Classical这个字来，健全，清洁与秩序这几个意义还很强的存在着。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便可以得到古典主义（Classicism）的最后定义了。

一个古典的作家（A Classic）便是一个希腊或腊丁的作家，他的作品是同类的模范，给以后作家以著作的法则的。他的人生观是伟大而健全的，他的情绪是为理性所平衡的，他的技术又是很完整的。

所谓古典主义便是追慕这些作家的典则，以技术的完整有秩序，情绪的健全与平衡为文学的极则的。

大概古典文学的产生，总在国家暇逸平安而重文的时候。如在似黄金罗马时代的英国的女王安（Queen Anne），法国的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等，都是古典主义最盛的时期。我们可以借圣皮韦（Sainte-Beuve）形容一个作家的话来形容这些时代的文学：当他的旅程与经历已届完成之后，当他的知识已形成熟之时，便有一个时期，再发生一种旧的情绪，正如一个人喜欢继续的去拜访他的老朋友似的。这便是古典主义时代的精神。

虽然一六七五年可算是古典主义时代的起点，而古典作品在欧洲文学上的影响，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初，即已见其端倪。当时，意大利的学者新发见希腊的文艺宝藏；举国皆其影响。过了不久，这种影响且遍及于全部的欧洲的文化地域。意大利古学者对于这种无价之宝的文库所费的无量数的收集保藏的精力与牺牲，收效极大。那些古典作品，不惟成了文艺的模式，且成了教

育的中心。在文艺复兴时代，诵习与写作希腊腊丁文字，是学者的第一要务。

但是古典文学的荣誉，虽照耀于欧洲各地，他的影响虽遍及于有文字的诸国，而因此却到处引起冲突。第一便是与各国国民文学的冲突。

中世纪是一个富于文学产品的时代，当古典的理想灌输到各国的时候，各国都已有许多诗歌与戏剧在他们自己的文库里了。这种作品，尤其是戏剧，与希腊罗马的趣味的标准都是格格不能相合的。因此，这种国民的通俗的文学，与古典的法则之间起了很大的冲突。古学者以熊熊烛天的光焰，来压迫乡土的文学。Du Bellay 以为所有的做民歌等作品的，都是愚蠢的，应该立刻停止；应该把精神改注到 Martial 的短诗，Ovid 的挽歌，Horace 的抒情诗上去，又以为凡是做喜剧与悲剧都应该向希腊罗马的作品里找他们的模式。过了几年之后，Sidney 又发表他的著名的批评，斥责为依利沙白时代（The Elizabethan age）之最大光荣的英国戏曲，而其斥责的主要理由则以他们为违背 Seneca 与 Plautus 的模范。

这种冲突，一直经了一二世纪之后，才见消灭。那时古典的势已根深柢固，各国的作家，都已引用古典主义的理想在他的作品里。中世纪的地方的文学已不多见了。

在这个古典主义与各国国民文学的冲突以外，希腊腊丁文学模式的流行，又引起第二种的冲突。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大部分都是喜欢形式的；他们之摹仿希腊腊丁的文学，差不多都是摹仿他们的外面的形式的。只有最少数的人知道把古典主义的内部的精神，倾注到英或法的文学的土器里。在英国，我们知道 Du Bellay 是排斥民歌而崇尚希腊诗歌的；还有 Gabriel Harvey 也要少 Spencer 及 Philip Sidney 的诗合

于腊丁的法则。后来 Campion 也十分赞颂古典的诗歌。在法国则以 Rousard 为中心的“The Pleiad”派诸诗人，努力从事于古典文学的摹造，以求本国文学的增进。同时，反对这种形式摹拟的风气的批评家，也未尝没有。他们也主张引进古典文学，不过他们极力之注意精神较之形式为尤甚。他们以为古典主义之重要，在于实质而不在形式。因此，他们与注重形式摹拟的批评家便常起冲突。

这两种冲突，绵延的时间很久，英国自革命后，才不见他们的痕迹。在法国，则这种冲突之消灭，较英国为尤后。

自文艺复兴以后，古典主义的势力，在法国最为强盛。法国是一个有很有威权的学院，为他们文字与文学的范式规定之地的国家，又是一个爱理智与规则，其技术的形式最为优越的国家。天然的，这个重威权重规则的古典主义是他们所最欢迎的了。

法国的作家有趋向于艺术的形式方面的习性。他们注重文学的技术与结构。因此，法国的古典主义对于这两层最为看重，而对于其他的古典文学的特质则持排斥的态度。我们要晓得，即使古典主义不在十七、十八世纪时输入法国，法国也会发生这些特质的。

一六三五年，法国政府创立学院。古典主义的特质，在那时已见端倪。学院里共有四十个会员。他们议决滤净法国的文字使他适宜于表现最高的情思。这种计划完全是爱国的动机。他们还进而要去规定字典，修辞学的系统。学院又审定会员的作品，宣传他的文学原则。这种举动便是法人爱规序，爱划一的表现。在古典主义没有输进之前，这个学院是法国一切文学方式的出产地。从这个学院，法国文学成了有规则的，划一的；且继续的产生出许多为这个学院所喜欢的艺术。

在这个学院成立的二年以后，Descartes 刊布了他的“Discours de la Méthode”，这本书也是用法文写的。他的影响及于文学界的很大。我们可以把这本书当做当时法国思想界崇拜理智的代表。他想用机械的法则，去解释宇宙，与文学者想用固定的法则来范围想象的创造是一样的。

Corneille 可以说是受 Descartes 的影响的，至少也可以说他们是同式样的。在 Descartes 的伦理系统里，最注重的是意志。在他的哲学里，他以为感情是受意志的指导而趋于善，而意志又是受理智的约束与教训的。在 Corneille 的悲剧如“Horace”及“Polyeucte”里，所描写的是情感与意志之间的冲突，而以理智来做指导的。所谓时间，地方，及动作的古典的三一律，他也是很严格的遵守着的。

Racine 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里的地位，较 corneille 为尤重要。他是一个完成的希腊学者，沉浸于希腊戏曲的精神里的，他欲再将这种精神重现在本国的剧场上。但是他的成功是很有限的。他愈以为他自己是希腊的结果却愈显出他是法国的。由这个教训里，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或一国的思想是决难能用古代的语式来表明的。

他较 Corneille 尤为严格的守着希腊剧的法则。因为他的诗才极高，所以他虽在这种狭隘的限制底下，还能有活动的余地。不过他仍然是一个牺牲者的例子。他只能选择适宜表现于古代形式里的题材，而这种题材又是很不多的。他观察人生，不是带着好奇心去看出他的真相，而是想去找寻那些适宜于包括在他的形式里的人物与背景。

Racine 又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他的“Les Plaideurs”一剧可以证明这句话的真确。然而就是这个剧本，他也是追踪希腊的作家 Aristophanes 的。

在我们提起 Bacine 时，我们天然的便联想起他的朋友 Boileau，Boileau 是希慕 Horace 的讽刺作家与批评家。讽刺文在古典时代，最为流行；一则因为他们是激动智慧的，二则因为那个崇拜形式，牢守旧俗的时代，最易被讽刺。讽刺的喜剧大作家 Moliere 也是产生于此时。在意大利与英国情形也与此相同。

但是 Boileau 的著名，最初虽是因他的讽刺文，然而他的名字却与形式的批评论尤为结合。他的摹仿 Horace 的“As Poetica”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篇幅的关系，不能在此再举几个十七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的作家；即足为那时的光荣的格言家 La Rochefoucanld 与寓言作家 La Fontaine，也不能讲到。

但是有一个人，在十八世纪，不仅是法国文学，而且欧洲思想的重述者，却不能不讲到。他是集法国古典主义的大成的。他的名字是 Volltaire。他的作品是古典主义的完成之作，其技术，其对于古典的文学法则及形式的服从，其侧重智慧而轻视情绪，在此都足以表现出是纯正的古典主义作家，Racine 的最有力的后继者。他是毫没有罗曼主义的气息的。然而他却代表古典主义的自由的能力。历史告诉我们，Voltaire 是自由的友人，是被压者的伴侣，是大革命运动的种因者。许多人都以为浪漫主义是与革命相伴的，又以为人道精神，在理性主义里是被关闭的，被窒息的，因了一种大力，才脱了古典主义之羁勒，而呼吸着自由的罗曼的空气。我们读了英国文学史，知道这种意见实是不确的；而由 Voltaire 的作品与行事，也可以看出这种意见的不切当。他离了艺术的无限的法则，造成一种真朴天然的风格；离了固执坚定的理智，带来自由的好奇的风气；离了崇拜常识的观念，带来人道的民主的精神。Voltaire 实足以表明古典主义的有价值的成功。

英国的古典主义文学，与英王的复位同时由法国灌输进来，当时反动的英国人，对于法国的典范极为崇拜，而对于依利沙白及约克伯时代的英国文学，则极为反对。Wordsworth 反对 Pope 的不自然的文辞的精神，在古典主义运动的最初，Dryden 等也曾以之反对依利沙白时尚新奇的传袭的文辞的。

在古典主义时代，Dryden 是一个最初的很重要的人。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无论是诗或是散文，都分成许多派别，除了 Milton 以外，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及 Dryden 出，才总揽众流使英国文学复统一而有力。

Dryden 的成功，差不多是受法国批评家的影响的。他从 Corneille 及 Racine，得到不多的赐品；开辟英国以前未有的风格而自成一家。

古典主义的势力因为民族性不同的缘故，在腊丁民族较 Anglo-Saxon 民族为盛。在法国古典主义不过是一种新起的能力加入他们旧有的文学里。在英国则古典主义不过是国外输入的一种观念，是本国作家的一种新的滋养料而已。

我们观察英国文学，知道外来的文学影响几乎无时无之，且对于英国的作家都极有利益；在 Alfred 的时候，在 Chaucer 的时候，在十六世纪，在十八世纪，在十九世纪尤其可以看得出。

从 Dryden 起，十八世纪的外来文学影响，我们都可以很明白的观察出；其初是法国的，后来是腊丁的。Dryden 受法国的影响，又受腊丁的影响。他的著作里，第一次反响着 Vergin, Horace, Lucretius, Martial 及 Juvenal 的气息。Pope 及 Addison 继 Dryden 之后，受 Vergil 等的影响也极深。Addison 在他的 "Spectator" 的报端所引的腊丁诗句，至今犹为很有价值的选集。

Thomas Rymer 对于古典主义的忠诚，较什么人都甚。他对于莎士比亚的 "Othello" 的批评，可以完全看出他的固执的批评

法。他的反对只根据于这篇作品与古不合的地方。Addison 与 Gray 的批评论，则更较 Rymer 为公平；他们虽是古典主义的忠实的信徒，而心胸却并不偏狭。Addison 的对于“Paradise Lost”的评论，是使 Milton 得确定的名望的文字。虽然他称许这篇史诗，以为是与古代的模式相合，然而对于 Milton 的其他不合古典批评的好处却也并不抹煞。Gray 对于初期英国文学的赞许，也是很显出他的公正。

一讲到十八世纪英国的讽刺文学，我们便想到 Swift，但是我们要把他归在古典主义者之列，却很费踌躇；对于 Goldsmith 也有同样的困难。Swift 的著作仍然是理智的，但却缺乏古典主义的重要条件：健全与范则。Goldsmith 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很少古典精神的痕迹，与 Dryden 与 Pope 是很不相同的。

总英国古典主义文学之成的是 Dr. Johnson。他造成文学、文字的规律，编著一部很重要的字书和文学家传记。罗曼主义丝毫没有沾染到他。他一方面又反对法国。在巴黎时，他只说着腊丁文。他是崇拜希腊腊丁的真正的古典作品的。

现在要述古典主义在他的生地意大利的情形了。

我们看古典主义是产生在意大利的，总以为古典主义在这个地方是十分流行的。然而在实际上，古典主义在意大利因了种种不同的原因，竟同德意志一样，毫不发达。政治的专制，锁闭了意大利人的灵感；他们什么活动也没有，所有的只是摹仿。一六九二年时，意大利也成立了一个与法国学院相同的组织。其后各城市也陆续的有这种学院成立。然而一二世纪间，意大利仍然没有伟大的作家出现。直到了古典主义的余波，从英国涌回意大利，他们才得照见古典主义的光耀。

Baretti 是 Johnson 与 Reynslds 的朋友，很受英国文学的影

响。他和 Gaspare Gozzi 都是摹仿 Addison 的“Spectator”的。

Parini 写他的“Giorno”又是从 Thomson 与 Pope 那里，得到他的范本的。

在戏曲方面，Maffei 的“Merope”很受 M. Arnold 的赞美。在 Alfiere 的作品里，则古典的悲剧，已加了许多生气，古典主义的精神却为要求自由的热情所代替了。在这种爱国的理想主义里，已隐约的吐露未来的罗曼主义的新曙光了。

古典主义在德国，开始得很迟晚，而且不大发达。三十年战争的结局时，疲乏的德国，大受外来的影响，尤其是法国的。但是他们的爱国心，制止他们文学及其他的外国化。他们成立了好些文学会，性质很像法意的学院，把外国文字从德文里斥逐出来。后来，Bodner 译了 Mlilton 的“paradise Lost”，介绍了英国文学进来；Gottsched 则称许 Corneille 与 Racine，很受法国的影响。但无论他们怎样称许英国或法国，他们却还没有向希腊腊丁的真正的古典作品注意。他们的文学之所以伟大，也同近代意大利相似，完全由于爱国主义之故，与古典主义无关。

Klopslocks 及 Voss 起来的时候，意大利古典主义的旗帜很明鲜。然而过了不久，Lessing 批评著名的三一律，以为时间与地方的统一是不必要的；只有动作的统一，在剧本里是必要的；古典主义在德国，在实际上，这时是已经死灭了。Goethe 所受的古典的影响，从他的古代艺术的接近与意大利的旅行，尤甚于受本国的影响。

以上把十八世纪古典主义在欧洲各国的情形，大概的都说过了。这个时代是崇尚理智的；以希腊腊丁的作品为文学的极范。这个时代的文学信条极严；注意于外表的技术较之人生的神秘尤

甚；最坏的地方便是容易陷于死的形式与无意义的文句。罗曼主义便是反对他而起的反动。然而我们说罗曼主义完全是古典精神的反动，也有些错误。

大概古典主义与罗曼主义是递相起伏的。Racine 诸人把十八世纪文学纳在古典的范式之中，便有 Wordsworth 诸人的罗曼主义的反动发生。我们现在如造了许多批评的法则，以范围各式的文学，则将来也会有别的罗曼运动发生的。总之古典主义是统一的运动，罗曼主义则是解放的自由的运动。而其实质却并非是完全反对的。

（原载 1923 年 2 月《小说月报》14 卷第 2 期）

丹麦现代批评家勃兰特传

一位评论家之获得世界的名誉，较之一位诗人或小说家，其成就更为伟大。世界的人常是喜欢娱乐而不愿意听教训，所以那些诗人，小说家，其有获得名誉的机会，比之那班批评家——文学的教训者——差不多是多过十倍以上的。故事的喜欢——寓言与小说之喜欢——为小说家所引起的，乃是人类的天然的性情；在小儿的时候，他们这种性情就非常发达了，冬天炉火之旁，或夏天傍晚之时，瓜篷豆架之下，儿童的全副注意力差不多都是为说故事的老妪或农夫所吸引。这种性情之养成实是不需要什么教育的。至于为批评家所引起的整理的能力则不然，他是必需要很高的智慧的发达的，就是我们所谓受教育的人也只有少数注意他。所以一位批评家所能引起注意的人只有少数中之少数；而使他们受影响较之使大多数人受影响尤为困难；因为他们差不多本来都是著作家，有他们自己的思想的理路，不与他们思想相合的，他们就要排斥他了。

如果一位批评家，能够博得世界的名誉，他的伟大似乎是比诗人或小说家更甚些！

批评家是文明的解释者，是一派的思想的代表人；他用光耀

的，鲜明的新光明来照耀一切的旧现象。这种人实是最高贵的，最少数的；以前有蓝辛（Lessing），有马太·亚诺尔（Matthew Arnold），有泰尼（Taine），在现代的时候，有佐治，勃兰特（George Brandes）。勃兰特的伟大的批评家的名称，在现代差不多是普遍的为世界人所知道了。他也是诗人，小说家，但他的诗人，小说家的名称，竟为"伟大的批评家"几个字所掩。

勃兰特是丹麦人，先世是犹太人。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生于丹麦京城库平哈金（Copenhagen）[1]，现在有八十多岁了。在十七岁的时候，他进了库平哈金大学；最初专心研究法理学，后来又从事于哲学与美学的研究。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他做一篇论文，《古代的宿命论》（Fatalism among the Ancients），显出他的高尚华耀的表现与富裕整饰的思想；因此，得了这个大学的金奖牌。不久他就考试毕业，很出人头地的得到了哲学博士的学位。当时老诗人赫希（Hauch）正在这个大学里当美学教授，极为这个少年博士的才能所感动，竟希望他能继承他的位置。

自学业终止后，勃兰特蓄精养锐，暂不露其锋芒。以后五六年的时间，他都用来旅行。他游历遍欧洲大陆；一千八百六十五年的冬天，在史托克霍（Stockholm）消过。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六十七年的冬天，在巴黎消过。在这个时候，他也常常的到德意志的各大都会旅行，住在那里的时候长短不定。他成了一个最完备的语言家；他说法德的语言正同他说他本国语言一样的流利。他是一个最正确的观察者，同时又是一个最忠实的学生；在这几年的旅行中，他所得的实是不少。因此，他渐渐的得到一个地位，——很高的批评家的地位——一切的竞争者都望尘避去。但是在丹麦也同在别的地方一样，一切的偏见总未能免除。一千

---

① 今译哥本哈根。

八百六十六年，他出版了一本《最近哲学里的二元论》(The Dualism in Our Most Recent Philosophy)。在这本书里，勃兰特引起了科学与宗教之关系之危险问题，竟至招致许多保守党与信奉正教的人的反对。但是他却不因之而稍挠屈。

这本有价值的书虽不是纯粹的质朴的积极论，然而总显出孔德那一派的学说所给的影响。而他对于宗教的态度也与斯宾塞(Herbert Spenser）与米勒（Stuart Mill）一样。勃兰特所生产在思想世界里的星系乃是由达尔文，孔德，泰尼，米勒这几颗明星所构成的。这些人深深的印他们的符记在勃兰特的精神上。他们所代表的那种趋势，勃兰特有很久的时候很忠实的守着他。米勒的《女权拥护论》，他在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的时候，把他译成丹麦文，又做一篇论文，很感动的，很同情的论米勒之为人，中间也含有些个人的回忆，把这个庄严的正直的思想家的人格充分的表现出来。

此后，勃兰特又陆续的出了三部书，都是论美学的；第一本是《美学的研究》（Aesthetic Studies）（出版于一千八百六十八年)；第二本是《批评与图像》（Criticism & Portraits）（出版于一千八百七十年)；第三本是《现在的法国美学》（French Aesthetics at Present Day)（出版年月未详，大概是与《批评与图像》同年)。这几本勃兰特的初年的著作，极能显出他修辞的精工秀艳。他们当中都充满着精彩飘逸的字句。读起来非常可爱。博益森(Boyesen）说：“当我读勃兰特这些初年的著作时，《圣经》上的一句话往往到我这里来，‘他快快活活的像一个健壮的人在赛跑一样。’”他运用文字，非常热心而且自由。没有一些阴晦的意义在他所用的字里。所有在丹麦文里很难表现出来的意思，他都能把他表现出来，并不觉得十分费力。无论他的句子是如何的新颖奇怪，却也永远不会显出粗恶，累重。在他初年的著作里，

虽然不仅仅以文字的精彩著，而文字的精彩却确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很显明的特质。到了后来，在他的后来的两本著作，《波兰印象记》和《俄罗斯印象记》里，这种特质就稍减少了。这两本书，虽然较前几部书好得多，并且也含有不少的好句，然而比较他初年的著作，那种飘逸、豪放之辞，已甚少见了。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勃兰特倦游归国，就在库平哈金大学教授近代文学。自始至终，有一贯的精神，且出以研究的谦恭的态度。他的第一个讲演，题目是《德国的浪漫派文学》（The Romantic School in Germany)。同《福禄特尔》(Foltaire）论卢骚一样，他论德国文学，用超绝的智慧，但却缺少同情。第二个讲演是《法国的移民文学》(The Literature of French Emigerg)，第三个讲演是《法国的反动》（The Reaction in France)。在这两个讲演里，他却到处运以同情之心，并不是他特别嘉许那些在革命中亡命的人的心灵倾向，乃是因为他的智慧，对于法国的一切东西都感特别爱好之故。他对于法国的科学，哲学，艺术是受了不少的影响的。他在这两本书里把法国的精神界，用清澈的文笔，活泼的色彩，描写得活泼泼的，使人永久不会忘了。

第一，第二，第三，这三本讲演稿都曾付印过，并曾经史特洛门（Strodtmann）把他们译成德文。

他的第四篇的讲演是《摆伦与他的一派》（Byron and his Group)。思想激进而且有力；与前三篇的讲演同样的活泼泼的动人。虽然博益森（Boyesen）在他的《斯坎的那维亚文学论》上，不很满意他，以为“他在摆伦对于英国公众的情形，确表现得很明白；但是在论到英国对于摆伦的情形时，却是不大公平。他是一个能干的辩护人的辩护，不是大公无私的批评者说话，勃兰特博士如此热心的称赞这个敢于反抗的人，至于对因保护自己而反对摆伦的社会的动机不能有公平的意见。我们故不能不承认反抗

者也许是对的，社会也许是错的；然却不能永远的以此种情形为结论。如果社会不用强烈的自己保留的本能来保护他的遗传的道德以反抗这些攻击者，如摆伦及西勒（Schiller）的话，文明就要受苦了。”然而我却对于勃兰特表同情；博益森未免太保守了。公正的心平气静的批评固然必要，然而批评者却必要有一个锐进的精神，决不能死板板的替社会说话的。勃兰特所以赞许摆伦的反抗的精神，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现代生活的大反抗者。无论什么人，我以为，都应该表同情于反抗者，因为反抗者的不满意总是对的。而且与社会表同情的，庸庸者俯拾皆是。更不必劳批评家去代他讲公道。

这种对于现代制度的破坏者的深刻的同情，勃兰特也是自始至终，在他的讲演中保存着。在他的《近代文学主潮》第六篇，《少年德意志》（Young Germany）中论西勒的地方，其论调的勇敢也不下于论摆伦。条顿人的精神本是极不愿意为限制人的自由的习俗的道德所束缚的。

以上四篇讲演，后来集合而付印，连以后的两篇，合在一块，名之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潮》（The Main Literary Current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这部书虽然只讲十九世纪前半的文学，然而却极详细，极有一贯的精神。内容共分六卷，第一卷是《移民文学》（就是《法国的移民文学》），第二卷是《德国之浪漫派文学》，第三卷是《法国的反动》，第四卷是《英国的自然主义》（就是《摆伦与他的一派》）；这四卷，就是以前所说的讲演稿；第五卷是《法国之浪漫派》，第六卷是《少年德意志》。全书共分订六册，有二千余页。实是近代批评文学中最伟大的著作。自一八七一年着手，至一八九〇年才完全出版。他的包含的丰富，文笔之飘逸有深趣，批评之有力而深湛，近代无论什么著作都比不上他。许多批评文学的书，令人看了就讨厌，他却趣味极浓，能

深深的感动人，吸引人。其体制颇似泰尼（Taine）的《艺术讲演》与《英国文学史》，而其伟大则尤过之。

他在这部书中，所用的批评方法，是科学的比较研究；而其批评的标准则为人生的。对于“艺术的艺术说”与赏鉴的批评则排斥之不遗余力。他于文学作品不大注意于形式的美，只注意于研究作者的人格与人生观，与作者之生活及时代之环境，且极尊重个性。他实不是一部无生气的叙述书，乃是极活跃的一部近代文学乃至近代文明的批评书。

在这个时候，勃兰特的讲演已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却是反对多于同情，使他不能再在丹麦立足。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他遂再离丹麦。住在柏林约七年方再回来。

勃兰特除了这个大著作外，他也常在德国与丹麦的杂志上做许多传记与批评的论文。最著名的是《迭司烈利传》（Banjamin Disraeli），出版于一八七八年；《特格涅传》（Esaias Tegner），出版于一八七八年；《开尔克加尔传》（Soren Kierkegaard），出版于一八七七年；《拉赛尔传》（Ferdinand Lassalle），出版于一八八二年；《郝伯传》（Holberg），出版于一八八四年；《莎士比亚论》，出版于一八九五年至九八年；《易卜生论》，出版于一八九八年；《佛朗士论》（Anatole France），出版于一九〇八年。其中《莎士比亚论》有三卷，与《易卜生论》都是单行的。其余的英国及美国人都有译出来，集在一块印行的。在丹麦文的原本，这些传及其他许多传记大概都集于《新过渡时代的人》（The Men of the New Transition）（出版于一八八四年），《近代欧洲文坛上的文学家与其作品》（Men and Works in Recent European Literature）（一八八三年出版），及《丹麦的诗人》（Danish Poets）（一八七七年出版）这几本书之中。还有一本《自传》也是有极高的名誉（出版于一九零六年）。

勃兰特于做这种的评传，似乎有特别的长处。在他的各种评传中，作家的人格到处都显露着；他研究作品的本身的地方少，而研究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的地方多。因为惟此才足以见作者的人格。所用的文字也极飘逸极精彩，与早年的著作一样。有些批评家尝说，他的《般生评传》（Essay on Bjornstjerne Bjorsou）在近代的批评论文中，可算是一篇最优美的文章；这位作家的内部精神被他表现得详细而且精确。他的“与众人同感觉，为众人而著作”的精神被勃兰特表现得活现在纸上了。不惟这部评传如此，就是其他评传也莫不如此。

对于勃兰特的“反抗精神”的赞扬深致不满的博益森，在这种地方却也免不得极力的歌颂他。博益森说：“在勃兰特博士的《波兰印象记》上，我找到一个观察，可以说明他的异常的表现特性的能力。他说，波兰人民的性质，不是理性的，乃是空想的英雄的。当我回忆许多我所认识的波兰人（我曾认识了许许多多波兰人）的性格时，我不能想到一句彼此更确当的状容的句子了。”

《易卜生论》的艺术也极高，除了易卜生性格之完全表现外，他的成功的过程，也在这本书中讲得很详细。他这本书分三部分。做最初的一部分时，易卜生还未大成功，他的名字还未出他的本国呢。这本书是一本“解析批评”（Analytical Critism）的杰作，能够丰富、扩大读者的思想范围。比之法国批评家圣皮韦（Sainte-Beuve）的最好的著作，其机警，其简练则不相上下，而其深刻的内部的观察则圣皮韦尚有不及。

勃兰特的两部《印象记》——《俄国印象记》与《波兰影响记》在他著作中也是很重要的。他们比起他们先出版的许多由同一作者笔尖下写出的书来，其重量竟重得多——自然《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是例外——他把俄国和波兰的一切秘密都显露出

来；观察真确，而寓以无限的同情。没有一本出版过的讲斯拉夫国家的书有他这两本这样好的。他所表现于纸上的乃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文明的全部。其中也叙好些琐碎的事，却正由这些琐事中，更把他们的真相露出来。

《俄国印象记》的标语是“黑土”（Black Earth）两个字，丹麦文的原本，就把这两个字印在面页后边。这两个字的解释在结论中可以看出：

“黑土，沃壤，新土，麦土……广漠，丰富，温暖的性质……无限的空旷；悲哀，希望，充塞着泥土中……新现实与新神秘主义的发源处……俄罗斯，将来的国家。”

无论是俄国人或是于俄国情形极熟悉的人，一看这一段话，就发生出很深慨的印象来。现在黑土已长出红花来了。然而土之能力，还很深厚呢。他虽然是一个非国家主义的人，并且是一个法国化的人，却能把每一个模范的俄国人的心灵趋向极精确，极有系统的表现出来，并且把他们的背景也极精确，极有系统的表现出来；他的研究力与观察力真是可惊！屠格涅甫有部最后的著作，名为《处女土》（Virgin Soil）。俄国人常常的用他这个名辞以表示他们的无穷的希望。勃兰特这本书便是很同情的把这个以为新土中潜有伟大的可能力的自觉心解释出来。

俄国文学，在世界，在勃兰特做这本书的时候已很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勃兰特做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论《俄国文学的印象》，研究普希金，郭克里，李蒙托夫，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甫，托尔斯泰诸人；其所论比别的专研究俄国文学的人所论的更精到而且伟大；甚至比以他的“Le Raman Russe”一书而博得四十名人的一个座位的孚格（M. de Vogue）所论的亦更精到而且伟大。

勃兰特从事于文学的活动，至今已四十余年。其努力与艰

辛，殊非常人所能为所能忍受。而其奋斗之结果则使顽固之丹麦知识界得受新光明之照耀。在四十年前，丹麦的地平上是围绕着爱国的忌妒心的，无论什么思想，凡是外国的，差不多都是难得冲破这层障碍而进到里面去。在两次的 Sleswick— Holstein 战争以前，丹麦人还与德国交通，也很受这父国的文化的影响。但在第二次战役以后，丹麦受丧师失地之辱，全国人民对于德国顿起仇视，一切德国的东西概摒斥之，排弃之；而知识界的交通，亦因已中绝。德国思想之可畏可恨，不减于德国之枪刺。结果遂成精神界之停滞。一个国家本来也同一个人一样，决不能自绝于世界的大生活场中，而与之不相闻问。因此，丹麦也许可以与英国造成新联络；但丹麦人究为非常顽固，且此种联络的障碍也到处也有，能得冲破。而思想之习惯的极大差异尤为丹麦与此二国不能发生关系之重大原因。这一次战争丹麦所割让的精神界的领土似乎比实际的领土还要多些。世界的潮流的呼声，在他们门前流滚而过，他们绝不想加入其中，也不想稍与接触。在他们的文学上，只有旧浪漫主义的微弱暗淡之光微微的照着；在他们的艺术上，哲学上，政治上，保守主义牢牢的把他们占领着，使他们显出异常寂寞的精神的孤立。在这个时候，一个接续已断的交通的人，一个外国思想的介绍人与翻译人，是决不可少的。勃兰特恰在这个时候奋然而出，担负了这个重大的责任，战胜丹麦的顽固党而使丹麦人改变其保守的思想，而出与世界相周旋。他使他的国人接触十九世纪的新潮流。于法国，英国，德国的文学的与社会的运动的旗帜，他尤为注意介绍。

但是这个自己满足的小国，对于勃兰特殊不感激而反仇视。他们与世界的大知识界相隔太远，不愿意他的知识与别人联络。其兴趣困于国内，绝不感外来的知识的必要。当勃兰特介绍近代的写实主义，积极主义给他们时，他们却谢谢上帝以为他们本国

幸而没有这种主义发生；许多热心维持本国文化的人，且对于勃兰特大肆攻击，以为他用危险的思想，故来扰乱他们的思想的和平。当勃兰特应得大学教授的讲座时，大多数的人反对他，不使他得允；他因而不能出任，这个讲座竟为一个和平的没有激烈思想的人所得。不惟如此，他们且开正式的会来攻击他，不惟攻击他思想，且攻击他自身。结果遂如上述，使他去国至七年之久。他在外国的时候，仍非常热心的继续他的文学的活动。到了一八八二年时，他的思想，他的努力，在他本国放下种子的，已得良好的成绩将开花而结果了。他的朋友遂邀他回国。反对他的人在这个时候都已如寒蝉之噤声。大家且约他每年给一次讲演于库平哈金，而以年俸四千克伦（Crowns）为报酬，定十年之约。自此以后，他的名誉与日俱长，不惟本国，就是世界也都崇仰他的精卓的思想了。他的书译成了许多国的文字。极广漠的传布于一切文明的国家中。

他的思想，愈后愈趋激烈，他是一个极端的人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非国家主义者。对于无政府党，他是极表同情的。他与俄国的克罗把特金成了极好的朋友。他们二人的思想差不多是相同的，不过所从事于运动的方向不同；一个是从文学方面鼓吹，一个是从实际的社会方面下手而已。

因此，他晚年的时候，倒反再引起许多世界的顽固党来不满意他。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确定的伟大批评家的头衔，就是他们却也不能不承认。

因为他极重自由，极尊个性，所以他虽是一个法国式的思想家，受很深的孔德与斯宾塞的影响，对于德国的超人主义者的尼采却也很是称许。

近几年来，勃兰特对于文学界的努力仍是十分勇猛。世界的好些人道主义的文学家近来组织一个光明团，在巴黎发表一篇很

伟大的宣言；勃兰特也是其中的人的一个。

他的反抗精神，是永远不会衰退的。

他在他的《般生评传》上曾有一句话：

“提起他的名字，好像挪威国旗的飞扬一样。”

我现在也可以同样的说一句话：

“提起他的名字，好像丹麦国旗的飞扬一样。”

但是——我这句话也许是错的，因为勃兰特不是丹麦的人，乃是世界的人。

这篇是我的旧稿。大半是根据于 Boyesen 的《勃兰特评传》。现在复读一遍，很觉得不满意。但因没有时间修改，只得一字不改的在此发表了。

大前年第五期的《东方杂志》上有一篇陈嘏君做的《布兰兑司》，也是传勃兰特的。但详细与此篇颇不相同。读者很可以参考一下。

（振铎附注。）

（原载 1923 年 4 月《小说月报》14 卷第 4 期）

《世界文学》

一部研究各国文学史的入门书 Literature of the World. An Introductory Study. by W. L. Richardson and J. M. Owen.

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及关于他们的史料，陆续介绍到中国来的已经不少了，不过这些介绍都是片断的；不是关于一本书的说明，便是关于一个作家的传记。至于关于一国的文学史，从最初叙到现代的，差不多一本也没有；便是她的作品介绍得最多，她的文字为中国人所最接近的英国，也还没有一部较好的较完备的中文的文学史出版，其他各国更是不用说了。我们觉得这种文学史的知识，实是研究一介作家，或是读一部文学作品的人所必须知道的。如果没有系统的文学史上的知识，一个作家的风格与特质及影响，是决不能完全明了的，一部作品的内容与思想更是不容易懂得明白。所以我们在以前的时候，曾有出版文学史小丛书的计划，虽然我们已经预备了几本，但因没有时间去修改及继续工作之故，迄今还不能付印。

现在，为供给这个文学史的迫切需要，我在此特先介绍一部

极简单而较新的书给大家。

这部书的名称是《世界文学》(Literature of the World), 作者是李查孙(W. L. Lichardson)及渥文(J. M. Owen)二君;出版的时期是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地方是美国波士顿(Boston)“Ginnand Gompany”。

他的内容共有十五章。

第一章是叙论,

第二章是东方的文学,

第三章是《圣经》文学,

第四章是希腊文学,

第五章是腊丁文学,

第六章是意大利文学,

第七章是西班牙文学,

第八章是法兰西文学,

第九章是德意志文学,

第十章是俄罗斯文学,

第十一章是斯坎德那维亚文学,

第十二章是英国文学(上),

第十三章是英国文学(下),

第十四章是爱尔兰文学,

第十五章是美国文学。

这部书仅有五百二十六面,而所包含的东西竟有这许多,自然所讲的是十分简单,十分的不完备了。如叙东方文学,讲中国与日本的地方,只占了两面;讲意大利的文学,最近的作家也都略去不提,如段南遮(Dannunzio)不过略提一句而已。但有许多地方,材料又是很新的,如讲西班牙的文学,倍那文德(J. Benavente)的名字,已经在他书里占一个地位了。还有,书中

附有插图很多，如讲到西万提司（Cervantes），便附有西万提司的照片及“DonQuixote”第一版时的里封面的图样。在每一章的最后，又各附有参考书目，关于历史的、文学史的书籍及重要的作品都包括在里面；虽然不很完备，然而凡用英文写的重要而易得的参考书差不多都已有了。这两点，是这部书最有用处的地方。

作者在这部书的序上说，以一本书而讲叙文学的大纲的，这本书还算是第一本。但据我所知道，像这一类的书，实在不止这一本。如A Rotta所编的《世界文学》（Handbook of univesal Literature）便是和这本书的体例一模一样的。不过Rotta的书，材料虽然比这本书多些，而他的初版还在一八八四年，后来，在一九〇二年虽然曾加增订，而比起这本书来，究竟是陈旧得多了。所以我们如要得到较新而较完备的知识，这本书实是比别的同种类的书都好些。

（原载1923年5月12日《文学旬刊》第73期）

杂　感

我好久没有看商务印书馆的《小说世界》了。这种出版物，我不想看它，且也不愿意花了钱去买它。今天偶然在朋友处见到了它，顺手把它翻了一翻，却使我忍不住的要笑出来。原来那一位头脑不清的编辑先生不知怎么想到的，也要去介绍什么西洋文学界消息，竟大书特书的说："今年是但蒂（Dante）死的六百周年纪念，西洋的各杂志都有文章纪念他。"（大意）这真是太可惊骇的消息了！我记得但丁（即但蒂）是一千三百二十一年死的，他的六百年死忌，前年（1921 年）早已有人纪念过了，怎么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里纪念他呢？难道但丁的死年有两个不成？难道《小说世界》的编者另有所本不成？我怎也想不出理由来，只好请那位编辑，一二分钟指教我了。

我很不幸的又去翻一翻那一位朋友所有的《小说世界》，又很不幸的翻出那些不能了解的地方来。

有人写信给小说世界社，说他们的翻译小说都是抄袭的，他们答辩了一顿，又大骂了近来译小说的人一顿，又自夸所译的"清顺忠实"。也许他们的翻译不是抄袭的，也许近来所译的小说实在是坏的多，也许他们的译文都是"清顺忠实"的。我没有功

夫，且不去多管闲事。但看那位编者所列举的几部已译过的小说集名，我却觉得太奇怪了！除了《托尔斯泰二十三故事集》外，其余的我都没有见过。“乞呵夫”及“莫泊桑”、“太戈尔”的短篇小说，英美的译本很多，如乞呵夫的《赌胜及其它》，太戈尔的《饥石及其它》等等都是，却并没有单用什么“乞呵夫短篇小说集”等的名称的！又欧·亨利及爱伦·坡诸人的作品也没有单用“短篇小说”为书名的。我不知道那位论者怎么会“随心所欲”的杜撰出这许多书名来！真是中外古今未有的奇闻！也许是我所见的书太少了吧！但希望那位编者能够把这许多“短篇小说”集的编者及出版公司告诉我们！

（原载1923年6月22日《文学旬刊》第77期）

我们的杂记

发　　端

我们时常听见，或在书上看到，许多很有趣味的记载，及许多值得注意的新闻。只因我们没有想到把这些零碎的片段的东西保留起来，其实也是没有工夫去保留他们，所以只能让他们如风中的败叶，散弃在地下，不久便被扫出于我们记忆之外了。这实是一种损失！我们现在，自本期起，便要于每日抽出些工夫来，把这些飘落在文艺之园里的小花朵，聚集起来，贡献在敬爱的读者之前。这也许是一种较有意味的贡献。读者诸君如愿意把这一类的零段的消息，增益我们的小花囊，我们是十二分的欢迎和感谢的！

一　太戈尔的东来

当一九一四年（?）时，印度诗人太戈尔曾东来一次。但他是到日本去的；不知是他那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中国，或是我们

中国人那时没有注意到他，总之，他竟没有到远东文化之源的中国来。近几年，我们渐渐的知道注意到世界的文学，而太戈尔的名字随着这个趋向而流播在我们的口里。正在这个时候，而太戈尔也有要来中国的表示。前一二个星期，太戈尔的友人Elmhirst君曾到北京晤见瞿世英诸君，代太戈尔表示这个意思。听说讲学社诸君已表示欢迎。大约，在秋天黄菊盛开时，他必可再度东来，到东方的中国来了。我们的文艺界，怎样预备着欢迎他呢?

二 曼殊斐儿[1]（Katherine Mansfield）

女作家曼殊斐儿之死，是英国现代文学界的一个很大的损失。徐志摩君曾在上海的一个旅舍的灰暗灯光底下，把她的死耗告诉我。他说时，他的声音微微的颤咽。最近他又做了一篇很长而且很凄美的文字，纪念曼殊斐儿。其实，她的死不仅为徐志摩与她接谈过的人所悲悼，便是全英国的杂志里，没有见过她的人，也都很惋惜的写下许多纪念的文字。

她于一八八九年生于新西兰。当二十二岁时，她出版她的第一部创作《在德国公寓里》便很引起时人的注意。后来在一九一三年，她与Atheneum的笔主J. N. Murray结婚。她的第二小说集《幸福》（1920）及第三小说集《园会》（1922）的相继出版，使她声誉益广。但她竟犯了不可救药的肺痨。当医生断定她的命运时，Murray便和她到国外去住。Atheneum之与The Nation合并，便是因为这个缘故。最近的时候，死神虽一步步的向她走来，她都不畏不怯的在死神的大阴影里努力工作，一直到了死时。

---

① 现通译作曼斯菲尔德。

她的作品，徐志摩及他的朋友，将有许多篇陆续的译登出来。

三　两个大作家的纪念

我们平常很不容易使群众注意到某个作家；所以举行种种的纪念典礼，是最好的一个使未十分与某个作家接触的人渐渐明白这个作家的伟大与思想的方法。

今年有两个很大的作家，值得我们为他们举行纪念的。一个是俄国的阿史德洛夫斯基。他是俄国的大戏剧家。今年是他的百年生辰纪念（他生于1823年)。俄国的各个文学机关与杂志，都已预备为他举行纪念了。一个是法国的勒南[1]。他是法国的大批评家。今年也是他的百年生辰纪念，各国的文学杂志也都有提起的。

阿史德洛夫斯基的戏剧已译为中文的有《雷雨》、《贫非罪》、《愁与罪》三剧；勒南的作品则尚未人介绍过。

（以上三篇原载1923年5月2日《文学旬刊》第72期）

四　翻译家的王国

暹罗国王是一位很能奋发图治的人。他曾到过英国，对于英国文学深感兴味。最近，他把莎士比亚的最大悲剧《罗美亚与裘丽特》[2]（Romeo and Juliet）译成暹罗文，并加以注释。此书现

① （1823—1892）法国史学家、作家。

② 即《罗米欧与朱丽叶》。

已出版。他的译文，简明而通俗，想要大多数的人民都能看得懂。

五 倍那文德[①] 的戏曲集

自倍那文德（Jacinto Benavente）得到诺贝尔奖金后，他的名字便出了西班牙而扬播到世界里去。他的戏曲，也经许多人介绍到许多国的文字里去。在美国，有思特喜尔译了倍那文德不少的剧本。纽约 Chasles scribners sons 所出的倍那文德戏曲集三册，便都是经他的手译出来的。第一册含有：《他的寡妇的丈夫》、《热情之花》、《伪善者》、《利益之带》等；第二册含有《禁止吸烟》、《倍白公主》、《秋天的玫瑰》、《总督的妻》等；第三册含有《太子的旅行》、《礼拜六夜》、《云间》、《真情》等。在中文里，沈雁冰君曾把倍那文德的《太子的旅行》，译登在《小说月报》十四卷二号里。最近张闻天君又把他的最著名的《热情之花》及《伪善者》译出，大约将在七月号以后的《小说月报》里陆续发表。

（以上二篇原载1923年5月12日《文学旬刊》第73期）

六 两部重要的作品

今年有两部很重要的作品，震动了全欧美的文坛。一部是韦尔士[②]（H. G. Wells）的《天神一般的人》，这部小说是韦尔士

---

① 现译作贝纳文特（1866～1954）。西班牙戏剧家。19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现译作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

发挥他自己的乌托邦的理想的。还有一部书是柏品尼[1]（G. Papini）的《耶苏传》，这是D. C. Fisher新近译成英文的。柏品尼这个传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明，他的事实都是根据于《四福音》的。但是这个意大利的作家竟运用他的热诚的微妙而感人的描写，使这部书成了自勒南（Renan）的《耶苏传》以后最重要的作品。尤其难得的是Fisher的译品也是非常好的，能够使原文的神采不因换了容器而失掉。

（原载1923年6月22日《文学旬刊》第77期）

① 现译作帕彼尼（1881—1956），意大利诗人、作家。

翻译与创作

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最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小泉八云[①] 说：“外国文学的研究（原注：文学的二字，此处用来是当作艺术的意义）的惟一价值乃在于他们的对于你用本国文字发表文学的能力的影响。……从西方的思想与想象与感情里，你们必然的可以得到使日本将来文学丰富而有力的很大的帮助。”确然的！小泉八云的话，对于日本的文学界已经有很大的印验了！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家诗文集，或是一张开眼睛，看见社会的一幕，便急急的捉入纸上所能得到的；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的所努力做去的！

创作者！你们且慢低头在桌上乱写，且慢骂开窗的人惊扰了你，不妨从已开的小窗里，看看外面的好景；他们是至少可以助

---

① 日本明治时代文艺批评家，小说家。

你干涸的文思，给你枯萎的文笔以露水的!

（原载 1923 年 7 月 2 日《文学旬刊》第 78 期）

论《飞鸟集》的译文

——答赵荫棠君

荫棠先生：我很感谢你肯来信指教我。译诗是最困难的一件工作，偶一不留神，便容易把原意误会了。我译《飞鸟集》，所费的时间似乎太少，所以没有仔细复阅的工夫，自知错误是决不能免的。当我把它拿去付印时，还不十分觉得，等到出版后再重看一遍，便检出许多错处来。但是已经不能改正了！我当时本想自己把错处检举出来，因为没有闲工夫，至今还没有动手。这是我对于读者应该致十二分的歉意的。

现在，承你费了不少工夫，替我找出几个错处，使我得减少几分的工作；这不仅是我，也是一般读者所应该向你致谢的。

但有些地方，我还要说几句话；希望你再详细的讨论，指教！

第三二四首，“Spaces”译为“一片空地”确是错了，应改为“几块空地”；译文也拟改为：“他们是几块空地，我的忙碌的日子，从那里得到他们的日光和空气”，似乎较明了。

第二八四首的你的译文与原意不大对，请你仔细读一读原文，便可明白一切了。我的译文很坏，但不大错。（以后当再把

他改译得清楚些）第一九三首的“满是”二字，即是“全是”的意思。

第二二三首的译文，在中文里稍为生硬，但我自信与原意无违背之处。你的译文很好，但似太直率。

第一八一首的译文，我也自信没有错，因为“forgotten”一字如系形容 Petals，则尽可以直置于 PetaIs 之前，不必置于其后。不知你以为如何?

第一四四首，Grave 译为庄严，实不甚妥。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字，或者可改为“端庄”。

第一二六首是译其大意，当然不能单拿出 Sings 一个字来说，我以为原文是省略了一二个如 Let 等字。再明白的说，原文似是“But dance of the water Let the Pebbles Singing into Perfection”的意思。

第五〇首译文，“击”字是“刺”字的错，原文确是“一点一点的刺着走”的意思，决无穿着，或贴着什么地方的意义。

第三六首及第一二首所讨论的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不必提了。

其他如二二〇首，“我”字应改为“你”字之类，则完全是排印上的错误，并不是译文的错。

我的译文还有好几个大错处，你却没有指出来。如第四首，“把她的微笑你存在花里”，应改为“使他的微笑维持盛开着”；第十一首，“人物”二字，应改为“手指”之类，现在不能列举，且等再版时改正。

正当的话说完了，最后且再谈几句不重要的闲话。

你说：“国内有许多人辩起学问，就要谩骂”，这也是我们所十分叹息的！辩论本是很有益的事。如果我错了，受人的教训，我是很愿意而且很感谢的。但教训者如不以友谊而以仇敌的态度

来乱骂，则无论他的话说得如何对，他的批评，下得如何的合理，受之者总未免要起反感，何况教训人者，他自己所教训的话又未必是全对的呢！所以我们做什么批评或辩论的文字，如能避免“谩骂”则其收效一定是比谩骂的文字大到十倍乃至百倍的。但我很奇怪，不知现在有一班人为什么自己不去做事，却专以骂人为天职，好像他是至高无上的裁判官，或是阻挡人家做事的恶魔，一见什么人译了或做了什么东西来出，他便寻疵找错的大骂一顿，务使勇于作事的人伤心而流入于颓唐无为之途。我觉得这种举动实在太无意识了！

“黄蜂以邻蜂储蜜之巢为太小，”
“他的邻人要他去建筑一个更小的。”

我希望他们能以骂人的勇气的时间去做些更正当的工作。

至于正当的友谊的批评，则是作者或译者所最欢迎的，他们如不是拒谏饰非的桀纣，决不会“恩将仇报”，以忠友为敌人的！

且至于此，闲话似乎说得太多了。请你常常指教！

（原载1923年7月12日《文学旬刊》第79期）

再论《飞鸟集》的译文

——答梁实秋君

一　批评的态度

我实在没有闲工夫来做什么无聊的辩论文字，但对于梁实秋君的评我《飞鸟集》的译文，却有几句不得不论的话。

我们批评一件东西，本是为“真理”而批评，而非为对于某人有什么特别好感或恶感，才来批评的。所以批评的文字，无论是赞美或是矫正，都应该心平气和的说话，不必掺杂什么意气，更无所用其面红耳热的辩论，或以什么轻薄的态度说几句讥嘲的话。但近来的人却都不大懂这个批评的本旨。他们往往拿住了人家的一二错处，当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发明，努力用很恶毒的口气来骂那些作者或译者。他们所说的无用的空话、较之正当的批评的话，几多至十倍以上。这实不能算是对于某件事理的批评，只可说是对于某人本身的攻击而已。我虽不敢以小人之心猜度别人，说这种人都是假批评以泄其私愤或别有什么阴谋的，但正当的批评态度似乎不应如此。

这种批评态度，对于被批评者有没有损害，是另外一个问

题，且不去管他，但对于批评者的本身，却实在未见得有什么好处。批评本是一件好事；被批评者对于赞许的批评，固有知己之感，即对于矫弹错误的文字，也应表示感谢。世间最难得闻到的是逆耳的忠言。苟非穷凶极恶、拒谏饰非的人，谁不欲闻忠告的话呢！但以现在的文坛现象看来，却常见有以批评态度的失当而构成不解之仇者。这虽可以说是被批评者之太不达观，但人非木石，无故以恶毒之言相加，其愤恨也是人情。不然，批评态度苟正当，则被批评者方感激之不暇，又何至"恩将仇报"呢？所以"非友谊态度"的批评，对于作者实在也有些不利。我希望从今以后，同是向光明之路走去的人，又没有什么"死仇"，又没有什么权利可争，何必努力拟仿魔鬼似的军阀，以互相争伐为能呢？

梁君的批评《飞鸟集》译文，态度虽没有一般人的不好，但似乎有些"非友谊的"。我最佩服梁君的同学闻一多君的批评态度，他批评郭沫若君译莪默伽亚谟诗的错误，其态度实是一般批评家所应取法的。如叫梁君去代闻君做这篇批评，我知道他一定非把无益的讥弹的话写满全文篇幅的一半以上不可的。我希望梁君以后能放弃这种"非友谊的"的批评态度，做一个真正的好批评家。

但无论如何，我对于梁君却不能不感谢：因为不管他是友是敌，他对我的译文肯费些功夫来指正，——虽然所指正的地方不多——在我一方面至少总应该当他是一个益友，或畏友。

底下对于梁君所言，略加讨论。

二　太戈尔诗集

梁君不赞成我的选译的主张，他说："我们若为介绍而翻译，

尤其是介绍全集而翻译，所谓‘选译主义’是大大的要不得的。”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梁君有些不明白太戈尔诗集的性质。太戈尔的诗集，用彭加利文写的，约在廿种上下。通行的英文本诗集，所谓《园丁》，所谓《飞鸟》，所谓《吉檀迦利》等等，已经是选译本了。且诗集本来比不得什么“长篇小说”；如果把小说选出一段来译，自然可以说是不忠于原文，可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诗集，则正如什么“短篇小说集”一样，每首各自为篇的，选译绝对没有什么关系。（但如尼克拉莎夫（Nekrasov）之《俄人何处有快乐与自由》及卡本德（Ecarpenter）之《向民主主义》等长诗，不能割裂的是例外，譬如我们把歌德或丁尼生的诗，选了许多篇来译，编成一本歌德或丁尼生诗选，能否算是“东割西裂”的东西呢？何况太戈尔的所谓《飞鸟》、《园丁》等诗集，本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更不必怕被人“东割西裂”的选译！摆伦（Byron）的长诗“Don Juan”第三篇中，有一段哀希腊诗，许多人都取出来译，这真可算是“割裂”的东西，但何以没有人说他“割裂”呢？

梁君说，“选译家”——译出来的只是一堆七零八落的东西，不是原著诗集之本来面目。但老实的说一句话，英译的几本太戈尔诗集，原来便是一堆七零八落的东西；虽然如《新月》曾注上“儿歌”，《吉檀迦利》注上是“颂歌”，《园丁》曾注上“爱和生命的歌”，但内容实在是复杂得很，并不能以什么“儿歌”“颂歌”之类的名辞来刻舟求剑的寻他的意义。试举一例，如《新月》中的《海边》，《起源》及《当我给你以彩色的玩具时》等诗，在《吉檀迦利》上也一字不改的登载着（第六十至第六十二首）。他们到底算是颂歌呢还是儿歌呢？且即在同一个诗集里，前后也有重复的地方，如《飞鸟集》第九十八首《我灵魂里的忧郁!》与同集里的第二百六十三首完全相同，由此可见当时编辑

者的不注意；由此更可见一所谓太戈尔的某某诗集实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而选译不能算是“割裂”了。质之梁君以为如何?

但说到这个地方，选译的主张，却还我是不敢宣传。我虽然因为时间与能力所限，不能全译太戈尔的“英译本”诗集，却很希望太戈尔的诗能“多多益善”的介绍过来。这个责任不知梁君或别的人能慨然担负否?如果他们的工作是很好的，那末“日月出而爝火熄”，到那时候，我的这种小工作便可束之高阁，或投之深渊以藏拙了！何幸如之!

三 《飞鸟集》译文

关于《飞鸟集》的译文的讨论，上期本刊上曾登过赵荫棠君和我的两篇文字，现在不再多谈，只就梁君所举的四首略说一说。

当《飞鸟集》出版时，我自己就很后悔，因为当时即已发见了几个错处。我译这本东西，有一大部分是在去年大暑天于二日内译好的，所以有几个地方便很疏忽的误译了。后来想在报纸上自己改正一下，因为事情太忙，竟没有工夫做这个工作。承赵君和梁君继续的提示我以有改正的必要，我很感谢他们，以后当留出些时间，再仔细的改正一下，再求他们及一切读者的批评。

现在，闲话不提。

梁君所举的第四首和第十一首的错误，我自己已在本刊上期论《飞鸟集》译文里提起而且改正过了，所以这里不再说。

关于第一首的译文，“Have no Song”，我本来是译为“没有歌声”，后来因为这句话在中文里不大妥切明了，所以改为“没有什么可唱。”我觉得这里译法并不十分违背原意。如果翻译要一个个字都对准原文，不要说是不可能的事，即可能，也似乎太

病拘束了。

第八首的译文，梁君把“雨滴在夜间”改译为“夜雨”似较我简明。我当依他改一下。但梁君提出我的译文：

“她君热切的脸，搅扰着我的梦魂，如夜滴一在夜间。”

说，“这样一来，乃是把‘她的脸’比做‘雨’，‘搅扰着’比做‘滴’，‘我的梦魂’比做‘夜间’了。”这实是“故入人罪”；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的译文，我想，除了因太欲符合原文，而使译文不大明了之外，似乎还不至“与原诗的诗意大相左”。

因梁君所举仅此，故此外不再谈。

（原载1923年7月22日《文学旬刊》第80期）

得一九二三年诺贝尔奖金者夏芝[①]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已由瑞典文学会正式宣布给于爱尔兰的诗人威廉·夏芝（William Butlenyeats）了。以前曾有许多人希望这次的奖金能够给于英国现代诗人与小说家哈特（T. Hardy），及其他诸人，但结果却终于为夏芝所得。

夏芝是现代爱尔兰的最著名的诗人，戏剧作家及散文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最伟大的代表；有的人简直认为夏芝与爱尔兰的文艺复兴是“同实的异名”。估治慕尔（Georye Moore）也说：“所有爱尔兰的运动均是由夏芝出发，而复归于夏芝。”在英国方面，夏芝也早已赢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地位。在新格（S. M. Synge）未出现之前，他在爱尔兰文坛里可以说是独步一时，无一足与他并肩的作家，但即在新格出现之后，夏芝的重要仍未失却，因为他们二人的作品与态度完全不同，夏芝决不会因了新格之闯入而失了他的势力与威望。

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金，对于他自己的文学的

① 今译叶芝。

地位，自然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增长，但因此，却能够使世界上的一般读者，对于这个久著重望的作家重新再次特殊的注意。而我现在所以特于这个时候在此极简单的介绍他一下者，也完全是这个意思。

夏芝于一八六五年生于爱尔兰的都百林城（Dublin）；在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运动中算是一个最先出现，或最先得名的作家。他在孩童时代中，有六年是在伦敦住着，但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他又回到都百林去，继续的在伊拉斯摩·史密士学校（Enasmus smith school）里读书；在这个学校里他有几个朋友，后来在克尔底的复兴运动（Alltio Revival）里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如著名的诗人惠克（C. Wuks）、爱格灵顿（G. Eglinton）、约翰斯登（C. Johnton）及爱伊（A. E）等。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夏芝发表了他的《奥辛的漫游》，立刻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前驱。他在这个时候以前，早已在爱尔兰各杂志，如《都百林大学评论》，《爱尔兰月刊》，及《爱尔兰的火边》等上面投稿，这部作品就是把登在那些杂志上的文字集在一起的。

自一八八九年之后，直至一八九九年，夏芝大概都住在伦敦。仅偶而的到都百林及巴黎去过几次。他这时期的著作几乎全部都在英国的日报及杂志上发表。这十年的经验与不休不息工作，使他渐渐的在当代的英国文学家里得到了第一等的地位。一八九二年他发表了《伯爵夫人加萨林及其它传说与抒情诗》；一八九三年，又发表了《克尔底的微光》；一八九四年，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剧本《心欲的国土》；一八九七年，他又发表了他的《秘密的玫瑰》，使他在散文上的势力确定了。同时他又是一个编辑者及杂志记者，编了四部的神仙故事集，如《爱尔兰的神仙故事》，《爱尔兰农民的神仙与民间故事》等，及一部很好的选集，

《爱尔兰诗选》，三册的《勃来克（Blake）集》。一八九九年，他的《芦苇中的风》使他的才能又进了一步。

此后，他的作品几乎年年有出现，最重要的一九〇三年所出的《七座森林里》，一九〇八年所出的《黄金韩列德》，一九一〇年所出的《绿的韩列德及其他诗歌》，及一九一三年所出的《责任》。

他的最近的作品有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诗集《柯莱的天鹅》及同年所出的散文著作“Per amica silentia lunoe”。

他的全集在一九〇八年曾出版过一次，共八册。

他的诗集，在一九〇六年时，曾由他自己出版过一次，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五年所作的都包括在内。后来在一九一二年又将这个集子编辑过，出了一个新版。

他的戏曲集，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间曾出了五册，名为《一个爱尔兰剧场的剧本》，其中有一册是新格的作品。到了一九一一年，他又用了这个题目，出了一册他的戏曲集。

以上所叙的真可为简略之至！我尚拟在十二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再作一篇较详细的，较有系统的介绍；读者如欲更明白夏芝，可以再参考那一篇文字；所以现在在这里不多说了。

一九二三、十一、十七、于上海

（原载1923年11月9日《文学》第97期）

法国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①]

法兰西之名

给我们一个名字，能够充满心灵以引导人类的光明的思想，

学问的绚烂，与艺术的愉乐的，——

一个名字，能够叙述出一个光荣的参预，

在人类的长久的苦役与猛烈的战争里，

以期打开一条路，

从黑暗中走到

自由博爱平等的日子的，——

一个如明星似的名字，一个光彩辉耀的名字。

我给你们以法兰西

——Henry Van Dyke 作[②]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4月《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号》，署名郑振铎、沈雁冰。

② Henry Van Dyke 范戴克（1852—1933），英国传教士、教育家、作家。

一 第一期——第十一，第十二及第十三世纪

克尔底（Celtic）[①] 及格拉柯·罗马（Graeco-Roman）[②] 的传说的史诗，经过了法国的媒介而转移成为德国的史诗。骑士的观念，从法国流传出去，在十二世纪德国的恋歌（The Minnesongs）里表白出来。在这些恋歌里，读者可以见到他们所描写的贵族的人生的观念。那个时候的公众生活的基础，即建立于其上。

德国的《洛兰史莱特》（Rolandslied）[③] 差不多是真接模仿法国的《敞逊特洛兰》（Chanson de Roland）[④] 的。然而《敞逊特洛兰》里是充满了爱国的热情与对于甜蜜的法兰西与她的英雄的亲挚的热心的。她自己是一个法国的国家感情生长的美丽的证验。至于《洛兰史莱特》就与她不同了。《洛兰史莱特》所缺乏的是活气与热情。这是一般模仿的作品所具有的通病。

各地的抒情歌（Troubadour song）是恋歌的直接感发者。有了这些美丽的抒情歌，我们才会有那些丰富而音调充实的德国的抒情韵文，如恋歌之类，优美地表现出诗的与骑士的恋爱观。宫廷的史诗，如《尼拔龙勤莱特》（Nibelungen Lied）[⑤] 等，都是由骑士诗歌所产生的，而那些骑士诗歌则也是受法国的抒情歌所感发的。这些从外国传说里来的德国的史诗，其造成完全是由于要娱悦那些贵族里的妇人与男子，他们都是赞颂“勇敢”的。法国

---

① 凯特。

② 希腊·罗马。

③ 即德国的《罗兰之歌》。

④ 即法国的《罗兰之歌》。

⑤ 通译为《尼贝龙根之歌》。

是骑士的家，勇敢的观念与诗的传说都是从她那里流传到德国去。在德国宫廷诗歌里，我们可以见到一种法国宫廷仪节的直接模仿，法国当时的各种流行的游戏也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法国是这些诗歌的首创者。

法国常常以她的知识特出一时。即在七百七十一年，当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做法国的王与西欧的帝时，他已在他的长柏尔宫（Aix-la-Chapelle）里设立了一个学院，他自己也在其中得一个地位，同时并引集了许多最著名的学者到那里来。那时的法国已是飘浮在知识的海上；她已经有了许多的书籍与许多的学者，同时的诸国，没有一个能够与她并肩的。她送了她的知识的水源到世界的各地去。德国的著名人物也到巴黎来讨论教育的问题。

十四世纪的教训的与叙事——禽兽故事——的诗歌也可以在法国寻到他们的泉源。这些诗歌在许多方面表明出他们是从恋歌里产生出来的。但他们却与宫廷的史诗不同；他们并不是写来娱悦宫廷中人的，乃是写来教导一般平民的。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娱悦而带教训的讽刺人的性质与社会的诗歌。他们叙写人的性格，在日常的影响与经验下面发展的。

这些叙事的诗歌，在法国的文学里的，较之别的后起的模仿的作品更有活气，更能感人；这可证明他们原是法国所始创的。在这个地方，法国所给与欧洲的恩惠却不少；因为这些禽兽的叙事诗歌，乃是近代的写实小说的先驱者。在法国的这些叙事诗之一《莱尼克》（Reinike）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地方，表示出社会的习俗的虚空；我们更可以找到许多地方，表白出对于无辜者与卑下者的同情，对于传说的威权的妒恨，且尊敬智慧甚于机警。这些都与近代的小说有同样的写实的倾向。

二　第二期（一二七三年——一四九四年）——文艺复兴

欧洲的文艺复兴，虽始于意大利而实因法国的媒介，才能迅急的传布到西欧去。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独立的宣告。她破坏了朽旧的规律，回归到真的古典的艺术。在艺术一方面，她产生了拉菲尔（Raphael），安格洛（M. Angelo）及文西（Da Vinci）[①]的杰作。在宗教一方面，她引导到宗教改革的路。在哲学一方面，她斥去了学院主义。在政治一方面，她倒翻了封建制度，引起了一种国家的感情与宪法政府的组织。意大利开始发见古典的艺术，而法国则把这个艺术带到德国，英国与西班牙去。她所以能极容易的做这种传播的工作，就因为她无论在商业上或在战争中，都与那些国家有最亲切的接触。德国是受宗教改革的影响最深的一国，然而在广义上，宗教改革实开始于法国。李弗尔（Jacquas Lefevre of Etables）可以称为法国的新教之祖。他在路得（Luther）惊人的反对运动未起的五年之前，已发与他同样的议论。虽然法国的国会及大学反对这种思想自由的新教义，然而法兰昔斯第一（Francis I）却帮助他们，他选了李弗尔做了他孩子们的教师。克尔文（Calvin）和史文黎（Zwingli）是两个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大师。他们的重要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克尔文尤有很高的文学的价值。在哲学方面，法国也是领袖。文艺复兴所引起的批评精神，在法国独为强盛。法兰昔斯第一尤其对于文

---

① 拉菲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安格洛（1475—1564），通译米开朗基罗，意大利雕刻家、画家、诗人；文西（1452—1519），通译达·芬奇，意大利艺术家，文艺理论家。

学与哲学有很深的兴趣。在政治方面，法国又是一个先进者。洛琪（Lodge）说，德国在一二七三至一三一三年，还是一群散漫的小国。至于法国则已把全国结合为一，成了一个强壮的国家的组织。在这些时候，法国全国建立了许多大学和其他学校。

拉柏莱士（Rabelais）是法国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文字大师。他用的字极多，增加了不少的艺术的与科学的专门名词给法国。他所用的语源，自希腊、腊丁以至所有在当时的法国所说的语言都有。他的二部重要著作是“Gargantua”和“Pantagruel”[①]。许多国的人都读他们，在德国尤发生很大的影响。有一个批评家说，我们知道了拉柏莱士就是知道十六世纪的思想。

龙沙（Ronsard）是法国的一个大诗人。他深受了文艺复兴的影响，以为法国的诗歌的完美，仅能由模仿希腊及腊丁的名著而始可得来。龙沙为当时法国七星社的领袖，他们定下了作诗的格律。德国的诗人奥配兹（Opitz）也努力的模拟他们的作风，把他们的影响，带到了德国。

麦尔哈（Malherbe）曾被批评家称为完美的法国诗歌之父。他是当时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的自信力很坚，他喜欢文学的辩论，常常勇敢的断定那是对的，或这是错的。他的诗所以被称为完美者，因为他是第一个诗人，他的诗里有完整的风格。他的用韵极正确，他的诗趣极高逸，他的诗的外形能与他的思想相和谐。这就是法国诗歌的格律，从他才规定下的原因。他写一首诗，每因一句一字而更易至一二十次而不止。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死了妻子，他想写一封信去安慰这位朋友。因为他想把这封信写得更完好些，直至他的朋友已经再娶了一位妻子，他的信尚未写好。

---

① 即《巨人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巨人传》）。

埃拉史摩（Desiderius Erasmus）虽生于和兰而实受教育于法国，在实际上，可以说是法国人。他是一个最有力量的运输文艺复兴到欧洲北部去的人。他长于腊丁及其他文字。他是当时的一个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把南方的文化与北方的力量联合起来。他在英国，尤有很大的影响，且曾到过牛津（Oxford）去讲学。

这时的法国可称为欧洲的知识的中心。法国的文学，其影响被于各地；各处的学者也都跑到法国来。法文是德国和英国的人常说的话。意大利文反远不如她。所以文艺复兴的精神，实可说是经由法国而始能光大的。

三　第三期——十七世纪

十七世纪的法国，其思想与文学影响于欧洲者较前尤为显著。麦尔哈使法国的诗格达到了完善之境，这种形式上的完美正是当时各处所热心寻求的。于是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便都随了法国的后尘努力求文艺的风格上的完整。

经过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始显重要；经过了十七世纪，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也显出头角。唯理主义及人文主义都可以从法国寻求他们的泉源。

狄客尔（Descartes）及福禄特尔（Voltaire）[①] 是这个新运动的主要人物。唯理主义是想用自然科学的工具，竟人文主义用文学去做的未竟的事业。她是外世界与内世界的一种在真理的最高判院之前的完全的实验。他引导人去求一种宇宙的真解。她是福禄特尔及百科全书派的智慧的怀疑主义的原因。这个运动给德国

① 即伏尔泰。

的知识阶级以很大的影响，在十八世纪时，她成了德国大学的流传的思想方式。狄客尔承认一切的真理的威权只要她是从“我思想，所以我如此”的程序里出来的。人自己的心里，先有了分析的评判，于是把全个内与外的世界的组织放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如此，狄客尔把古人的哲学弃去，而引进了一种新的哲学，并且他还给我们一种新的世界的物质的解释与系统的思想。他的哲学，一世纪后才流行在德国。他的许多书都不能在法国出版，有的送到和兰去印，有的送到德国去印。因此，法国的影响更迅速的传布出来，狄客尔的伟大作品也散播得更远。即在瑞典，也深受了狄客尔的唯理主义的影响。

柏克尔（Pascal）[①] 是最伟大的强辛（Jansenest）派的散文作家之一，在十七世纪的文学上，也有极大的影响。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作家；有的人说，十七世纪的生活的各方面几乎没有不与他相接触。他研究数学，有许多发现，又做了许多著名的科学的考察。他的“Pensees”[②] 是法国文学上的名著之一。这部论宗教的大著作曾给莱辛（Lessing）[③] 以很大的影响。

这个时代的德国，受法国文学的影响更深。许多人说法文，同说本国文一样的好。所有的作品都以法国的名著为他们的著作的规范。他们把他们的灵魂与脑筋都沉浸在法国文学里。当时最著名的介绍法国文学的有二，一个是前面已经叙过的奥配兹，一个是哥呼特（Gottsched）。

---

① 通译帕斯卡尔。

② 《冥想录》。

③ 莱辛（1729—1781），德国作家、文艺理论家。

十七世纪后半——黄金世代

到了十七世纪后半，法国的文学已到了她的黄金时代；这时是路易十四的时代，法国的繁盛达了极点。法国的作家对于其他各国都有了极大的影响。伟大的永久的著作，如“Misanthrope”“Le Tartuffe”，“Iphigenie”，“Athalie”，“L’Art Poetique”，“Le Telemaque”[①] 以及拉丰丹（La Fontaine）的寓言，赛文夫人（Mme. Sevigne）的尺牍等等，都产生在此时。德国、英国及西班牙都深受她的感化，人人都学着法语，都要知道法国，都热心的读着法文的名著。

莫利哀（Moliere）在许多作家当中，势力尤大。他的“Le Misanthrope”批评当时的社会，他的“Tartuffe”叙述宗教上的伪善者。他不仅是一个喜剧作家，而且是一个大哲学家。

康南（Corneille）[②] 的著名作品，如“Le Cid”，“Horace”，及“Pompee”[③] 等在这个时代也很重要。“Le Cid”尤为不朽的美丽的作品之一。在这个时代之末，莫利哀，康南及拉喜纳（Racine）[④] 诸人所著的法文戏曲，在德国剧场有绝大的势力，直至莱辛出来后，才把他们扫除了，而建立一个德国式的剧场。

拉丰丹（La Fontaine）的大成功，与莫利哀诸人不同，乃不在于戏曲，而在于寓言。他把什么事物都给与了一种愉快的与美丽的气象。他不仅是一个可赞美的自然与动物世界的绘画者，而

---

① 《愤世嫉俗》、《达尔杜弗》（莫里哀），《依菲热尼在奥地利》，《阿达莉》（拉辛），《诗艺》（布氏洛），《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费纳隆）。

② 即高乃依。

③ 《熙德》、《贺拉斯》及《庞贝之死》。

④ 即拉辛。

且也是一个深沉的明白人的心灵与性格的作家。他的创造者在这些动物的小世界里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人类在日常所说的，所做的。他的文体，简朴而动人；除了莫利哀以外，他可以说是当时最不受古典派影响的人。他的这些寓言，在别国的文学里也曾印上了很大的影响。

法奈龙（Fenelon）的“Telemaque”曾被译为德文，而受全德国的欢迎。他做这部书完全是为了教育的目的。还有一部更重要的著作，名“Traite de l’ education desfi lles”[①]，是关于妇女的。他的意见，以为女子须被教育而去完成她的生命上的使命，——即为一个贤妻与管理家政者。这部书在女子个人与在女学校里读者都极多。

鲍哇洛（Boileau）对于耶稣会徒的严历攻击，使他在英国和德国知名。西班牙人读他的书的也很多，但他们对于他却是毁誉参半。批评家称他的功绩，以为他是把文学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从贵族那里带到平民那里来的。他的锐利的讽刺与绝顶的机警，我们都应该赞美。有的时候，他也被称为近代的何拉士（Horace)。他主张理智比之想象更为重要；他继承了马尔哈的事业，把韵文与散文合为一起。他的“Lutrin”[②] 曾被英国大诗人薄伯（Pope）的赞美，他的风格且被他模拟过。

拉喜纳（Racine）以他的丰富而和谐的韵文，他的戏曲结构的技能，及他的锐敏的感情的分析著名。他的美丽的故事，“Esther”[③] 和“Athalie”曾译成了许多国的文字，直至现在，还是学校里的通行的书，不仅在法国，且在外国的学校里。但他的最

① 《论女子教育》。
② 《关于龙琴的思考》。
③ 《爱丝苔尔》。

著名的作品是一篇悲剧“Andromaque”[1]。

赛文夫人（Madame de Sevigne）是路易十四时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她用了尺牍的形式，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她的尺牍无论在历史上或在文学上，都是极重要的东西；里边充满了情感与高尚的精神及愉快的机警。她和当时的宫廷很接近，所以关于路易十四的事迹与性格，在她的尺牍里可以得到不少材料。这些尺牍，到现在，许多国的学校里，还都取来当做法文范本。

在叙述了以上的几个重要作家之后，我们必须在此提及两个伟大的演说学家，他们对于欧洲的文化都很有贡献；一个是报塞特（Bousset），一个是弗莱超（Flecher）。而报塞特尤为重要。报塞特在二十五岁时即得博士的学位，后来做了宫廷的宣讲者；成一个完善演说学家。他又是一个最大的古典学者。他的对于历史的著作，在法国文学里是一个好的作品，同时又发明一种新的历史，即历史的哲学。他的著作在英德二国影响很大，他的演说集则为后来演说家所取范。

这个黄金时代的法国文学，不仅影响及于北欧，且影响及于南欧的西班牙。西班牙的文学，此时正是衰落的时代。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停涩不进，所以他们天然的便向当时杰作蜂出的法国望着，很热切的去接受法国的出产，以为他们精神上与心灵上的粮食。这个趋势，因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第五与西班牙的宫廷的结为婚姻，而更为显著而且急进。法语成了西班牙宫廷中的言语。法文著作，迅速的流传入西班牙。这种现象，直经过十八及十九两个世纪。自此以后西班牙文学受法国文学的深刻的影响，至少在百年以上。在这些时期之内，西班牙作家所产生的作品几乎无一不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受法国的影响的。

---

① 《安德罗玛克》。

四 第四期——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对于世界的影响，可以分做前后两段来讲。第一段的主要人物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福禄德尔（Voltaire），第二段的主要人物是卢梭（Rousscau）。

孟德斯鸠虽是一个法学家，但他的“气候与环境对于民族性之影响极大”一说，却又在文学界得了新领土。那时德国的文学家如赫尔特尔[①]（Herder）和哥德（Goethe）是最先接收孟德斯鸠这理论，而且把它发挥光大了的。赫尔特尔是文学史家，在一七九七年出版的《德国现代文学》一书中首先应用孟德斯鸠对于民族性的见解，去研究德国文学；他说文学是民族性之表现，并由此说明文学发达的公例。他以为文学艺术之最高形式并非全是创造出来的，他们是聚居于一地的人类（即一民族）所接所感之自然的结果。他相信凡在同一境遇同一环境下之人类，其所思所感，皆为整个民族性之一点一滴。孟德斯鸠分析各民族的政制而研究民族性，赫尔特尔则分析一民族的语言宗教文学而研究民族性；他确是受了孟德斯鸠的暗示的。

大诗人哥德对于文学的见解，也受了孟德斯鸠思想的暗示；他在“Dichtung und Wahrheit”[②] 里说道：“他教我们视作诗为全人类之普遍的天赋，而非几个富有学养的人们的私产。”

和孟德斯鸠同样地——或许更大——有影响于德国文学的，是福禄德尔，他是德国皇帝佛莱特立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好朋友，他把法国的诗学教授大帝；他的著作充满于

① 即赫德。

② 《诗与真》。

大帝的藏书室中。因为有大帝在上极力提倡，所以福禄德尔的唯理主义（Rationalism）在德国大大风行起来。那时的文风，亦舍想象而趋于理智。所谓十八世纪的写实主义——以要别于近代的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亦称曰前期写实主义——可说是完全从福禄德尔的唯理论诱导出来的，那时的德国，不但接收了法国的文艺思潮，并且几乎要把法文作为第二国语。佛莱特立克大帝自己的法文程度就比德文好；宫廷的通行语是法语；一切上流人都以能说法语为得体；富家的保姆都用法人，教小孩子学法语。文学艺术都以法国式为贵，法国的文学作品成为德国文人的模范。那时法文在德国的势力真可注意，以致柏林学院会出题悬赏，征求“法语通行的理由”。

福禄特尔是理性的写实的自由思想的诗人，但是继他而起的，且一样的有大影响于欧洲文学的法国人，却是那全情绪的卢梭（Rousseau，1712—1778）。在卢梭以前，文学作品以抒展情绪为大戒，即使是言情的作品，亦应以理智为归宿。卢梭既出，文风为之一变。他爱自然，憎人为，故对于抑情绪而重理智的文学，很反对的。他的“Nouvelle Heloise”和“Emile”[①] 实在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先声。佛冷克（Francke）著德国文学史说：“没有卢梭的‘Nouvelle Heloise’和‘Emile’德国的暴风雨时代（Sturm und Drang）大约不会起来的吧。暴风雨时代之根源，即在卢梭的注重情绪的文学：这一句话，恐怕是难以否认的。”佛冷克这个断语是不错的，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实例来证明他这句断定。西勒（Schiller）[②] 这位大诗人的作品就是深切地含着卢梭思

① 《新爱洛绮丝》和《爱弥尔》。

② 即席勒。

想的。他的"Wilhelm Tell"[①] 里，有卢梭的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凡卢梭所唱的复归自然，爱自由，尊正义，发展个性（知识的革命），改革与改造等等理想，在西勒的作品里，我们一一可见。

维莱（Wieland）——也是一位大作家——的小说"Agathon"[②] 里也以卢梭思想作为骨干的。书中英雄是一位崇拜自然的人，相信意志是纯洁的贞美的自由的。

哥德的"Hermann und Dorothea"[③] 里的海阔天空的理想，显然也是受了卢梭的影响而发的。他的"Iphigenie"[④] 尤明白地表现着卢梭的自由思想的精神。Iphigenie 的天真烂熳，伊的对于真理的酷爱，以及伊的纯任自然冲动的天性，都使读者深切的感到结晶的卢梭思想。伊对 Thoas 说："不用踌躇；只要任你情感的指示而活动就是了。"伊坦然信仰人类的本性全是善的，以诚对人，亦必得着诚的报答。不但此也，卢梭的情绪奔放的作风，也似乎启发了哥德。在哥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r Jungen Werther），我们始见那热情奔放的灵魂的呼声的文学了。这部小说是属于暴风雨时代的，是梦幻的感情的一派；他对于德国当代文风和当代人心的影响，大到说不出。而这种梦幻的感情的作风，显然是卢梭开了端的。

德国果然是受了卢梭的影响，英国俄国西班牙亦无不受着卢梭的影响——不如说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更包举些，——而变了本国文坛的色彩。英国的爱理斯（Havelock Ellis）曾说：卢

---

① 《威廉退尔》。

② 《阿伽通的故事》。

③ 《赫尔曼与窦绿台》。

④ 《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

梭的势力是无往而不在的，后代文人如托尔斯泰（Tolstoi），爱默生（Emerson），乔治·伊利亚忒（George Eliot）[1] 都可说是卢梭的私淑弟子。欧洲文坛自文艺复兴期以来，作者竞注力要于古典中找求他们的题目；但自卢梭以后，忽然转向，作者竟于自然中找求他们的题材了。从古典的束缚中间挣扎出来，自己解放了自己，而力求以自然为归宿：这是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的革命；卢梭是这革命军的先锋。在卢梭以前，所谓美，就以合于古典文学为标准；但在卢梭以后，大家都以合于自然作为美的标准了。绚烂的夕阳和美丽的小花，同样的启发了卢梭的灵感；卢梭有的是大而热的心，对于一切人都有温和的同情。爱理斯以为卢梭的魔力即在于此。

俄国所受法国文学的影响。是极深的。一七二二年，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游法，极慕法国的文化，归国时邀请了许多法国名人到俄国讲学，于是俄人多学法文；法国文学在俄国极为风行了。自经彼得大帝提倡以后，法国文学在俄国的势力，不亚于上述德国的情形。我们都知道俄国的民族文学到十九世纪初方始成立，算来不过一百多年。以前的俄国文人的著作，都是模仿外国的；这外国就是法国。所以当十八世纪的时候，法国文学在俄国有绝对的势力，是没有什么可怪的。

还有西班牙——他本来自己出产过几个名震世界的文学家的——到了十八世纪后半，也完全被法国文学所征服了。法文流行于西班牙的起点，乃在路易十四的孙子做西班牙国王的时候。自此以后几乎有一百年之久，西班牙文人所写的全是法文。法国文学家的杰作，自然成为西班牙文人的模范；所以那时虽亦有少量的西班牙文学作品，但这些只能算是仿造品或翻译品而已。最著

---

① 今译乔治·艾略特。

名的小说："Gil Blas"，[①] 称为西班牙小说的杰作，其实只是从法国译来的一本译本小说罢了。那时西班牙文人自称为"创作"的小说或戏曲，大半也是从法国文豪的作品节译来的，——至少，也是脱胎于法国。不模仿法国文学的西班牙作家自然也有几个，可是他们都碌碌无名。其中最著名的，如乔失·列洪（Jose Leon），曼息拉（Mansilla），散洛（Maria del Cielo）和陆蒲（Gerado Lobo）等等，在当时也还有点名声，但不久亦就被忘却了。

但是受法国文学影响的西班牙文学家也不是竟没有出色人物的。因为仅仅模仿别国是不行的，而吸取别国文学的精神以滋溉自己，却是可行的；而且由此而成的创作也可以成为杰作。所以十八世纪西班牙文人之以法国文学精神为灵感的源泉的，也有了若干伟大的作家。例如罗让（Ignacio de Luzan）是鲍哇洛（Boileau）派的作家；他得益于鲍哇洛的著作实在不小，然而罗让的著作亦自有其生命，罗让还是罗让。格拉尼莫（Henito Geranimo）在当时极有声名，可惜他尚不脱模仿的束缚，所以他的著作不是独立的。莫腊丁（Nicolas Ferdinandez de Moratin）的戏曲是以拉喜纳（Racine）为规式的，而以其能神化，故亦不失为不朽之作。又如萨曼尼散哥（Samanicego）的寓言大都脱胎于拉丰丹（La Fontaine）。西班牙十八世纪的文坛，幸赖此等作家，方不致十分冷落；而由此亦可见法国文学对于西班牙文坛的厚贶了。

直到十九世纪前半，法国文学还有极大的影响于西班牙文坛；但既非本节范围内事，我们只好略而不详了。

总之：十八世纪时，世界文坛上先起"要求理智"的呼声，

---

① 《吉尔·布拉斯》，法国勒萨日著。

继起了“复归自然”的呼声，二者激荡，乃成洋洋之十八世纪文学；现在我们知道这二种呼声都先从法国喊出，然后波及于全世界。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于是多受了法国文学的影响，跟着而变色彩。就中德俄西班牙三国的文坛完全为法国文学所左右。这是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对于世界影响之大概；下面我们再讲十九世纪。

五　第五期——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界的两大思潮是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二者都发源于法国而及于全世界，使全世界文坛靡然风从。我们现在先讲浪漫主义时代最著名的几个法国文学家。

第一：斯坦尔夫人（Madame de Stael）　出身世家，有文学的遗传和环境；她是卢梭的热烈的崇拜者。一八〇二年，她的小说“Delphine”[①] 出版；这是一部宣传卢梭思想的小说，书中的女英雄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理想人物。同年，她旅行到德国，居于Weimar，[②] 和当时德国的大文豪哥德，西勒等人时相往还。后又至Geneva[③]，在那边，又做了文坛的中心人物。一八〇五年著“Corrine”[④]，这是她的最伟大的作品。

斯坦尔夫人因为反对拿破仑，亡命国外，足迹半天下；她到过维也纳，莫斯科，伦教，常居于德国和意大利。她每到一处，就引起彼处文学界的注意；瞻慕她的丰采，领略她的议论，于是

① 《黛尔菲娜》。

② 魏玛。

③ 日内瓦。

④ 《高丽娜》。

她的影响就扩布开去。她是革命的自由思想的战士，她的作风是热情充溢，气概高亢的；她是浪漫主义的先驱。

第二：夏朵波朗（Chateaubriand） 十九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浪漫派的中坚。他到过美洲，并在英国住过几时。居英的时候，从他研究法国文学的人很多。法国文学思潮由此广布于英国。他个人的作风在英国的势力也不小；拜伦派的诗风，是受了他的影响而引起的。

第三：曼德（Joseph Maitre） 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几部富于风趣的小说。一八〇三年后，他做出使俄国的大使，他的作品就在俄国得到了许多读者。同时，法国其他几个浪漫派文家的作品也由他介绍到俄国，诱起了俄国的浪漫运动。

第四：嚣俄（Victor Hugo）[①] 法国浪漫派文学到了嚣俄已盛到极点。法国的工整的戏剧，至此时犹有余威，然而嚣俄的“Hernani”[②] 上演之后，“工整派”的老根就在台下万人的鼓掌中轻轻拔去了。至于小说方面。则在缪塞的时候，浪漫派已经获得全胜了。嚣俄继之，势焰更张，可说浪漫派文学的优点具备于嚣俄一身，——虽然，浪漫派的弱点亦至嚣俄而更显露。当时各国竞译嚣俄的著作；他的杰作《哀史》[③] 在本国和外国启发了不少新进作家的灵感。

浪漫主义虽然是从法国发源而渐渐影响到全世界的，但是我们亦可说各国浪漫文学之兴起亦并非全然直接受了法国的影响，至少，我们可说是并非完全从法国移植过去的；至于自然主义时代则法国完全是立于首倡者的地位。法国以外各国的自然主义文

---

① 即雨果。

② 《爱尔娜尼》。

③ 即《悲惨世界》。

学完全是直接受了曹拉（Emile Zola），莫泊三（Maupassant）的影响，跟着起来的。各国的自然主义者大都很显明的揭着“曹拉主义”的大旗，在国内号召。这是可以从事实上证明的。

当一八七一年曹拉的《罗康玛喀尔》(Les Rougon Maquarts)[①] 第一卷出版后，曹拉的自然主义的大旗正式在法国文坛上竖了起来。一八九四年后《三都记》陆续发表，本世纪初，《四福音》前二卷出世；于是曹拉主义叫彻于法国文坛，并且唤醒了其他各国的作者。

那时显然以曹拉主义在本国号召的，在意大利有浮尔茄（Giovanni Verga）和女小说家赛拉哇（Matilde Serao）。浮尔茄于一八四〇年生于雪息莱（Sicily)[②] 之喀太尼亚（Catania）；他开始著作时是取法浪漫派的，但在一八七四年到一八八一年之间，他的作风陡然大变，《玛拉伏列亚家族》（I Malavoglia）一书完全是想摹仿曹拉的《罗康玛尔喀》的体裁的。由于他的天才与努力，意大利半岛上文艺的自然主义运动居然成功了，小说与戏曲两方面都新生了大批的自然主义者。女作家塞拉哇是最著名的一个。她也是私淑于曹拉的，但她的作风却近于印象的自然主义的都德（Daudet）。总之，意大利十九世纪末年的新文艺乃曹拉主义到后的结果：这是无可疑议的。

西班牙的文学，一向惟法国马首是瞻。法国自然主义在西班牙的代表是小说家柴玛古司（Eduardo Zamacois）和伊本讷兹（Ibanez）等人。柴玛古司的作品，在思想上极似曹拉——例如《他们的儿子》一篇以遗传为描写的主点，——在艺术方面有些像莫泊三；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伊本纳兹早

---

① 通译《鲁责玛卡家族的命运》。

② 即西西里。

年的作品如《五月花》之类，是属于自然主义的；可是《启示录的四骑士》等作则颇近非战主义（Pacifism）——法国的又一文艺思潮盛行于此次大战后，对于现代世界文坛，也有多少影响的。在戏曲方面，自然主义更是得势。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几个大戏曲家都是属于自然主义的。首先把自然主义应用到舞台上的，是迪生素（Dicenta）；茄尔度斯（Tèrez Galdós）继之，愈益完善。新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倍那文德（Jacinto Benavente）有许多著作也是属于自然派的。西班牙是浪漫主义所剩最后的一块土，然而自从柴玛古司他们扬起曹拉主义的剑后，浪漫派也就瓦解了。

曹拉主义在南欧的影响既如上述，那么，在北欧如何呢？北欧是易卜生的写实主义的发源地。斯脱林褒格（A. Strindberg）、卡尔生（B. Bjornsön）早在曹拉主义征服法国文坛以前，把北欧的浪漫派余迹扫除净尽了；所以后来没有高揭曹拉主义的人。但是后辈的作家如勃尔格司托姆（Hjalmar Bergström）——丹麦戏曲家——包以尔（Bojer）——脑威小说家——的著作，很有几篇明白地显露着自然主义的色彩。瑞典的拉绮尔洛孚（S. Lagerlöf）和荷兰的考泼洛斯（Louis Coperus）的著作虽然大部不是自然主义的，但也有自然主义的著作。所以老实说来，北欧的文学家纵使不曾像南欧的作家那样高揭曹拉主义而呼号，在实际上早已接受了曹拉们的理论了。

在德国提倡自然主义最热烈的是何尔兹（Arno Holz）和霍普德曼（Gernart Hauptmann）；他们所倡导的，是一种新的所谓“彻底自然主义”。可是何尔兹这猛力提倡彻底自然主义者，实在先受到了曹拉主义的感化。他本是一个诗人——现在还以诗人著称，后来研究曹拉的论文，始作小说；他的处女作《黄金时代》就有著浓厚的曹拉主义的气味，不过后来他又以曹拉主义为不彻

底乃参加印象派自然主义之理论，而自创为彻底自然主义。霍普德曼这位戏曲家可说是个纯粹的自然主义派——只就他早年的作品而言。他的《日出之前》宛然是舞台上的曹拉主义；本来曹拉未曾得志于舞台，现在霍普德曼代他了此未竟之志了。

俄国也没有严格的自然主义的作家。但是俄国的作家几无不与自然主义接近。自郭果里（Gogol）、杜尔格涅夫（Turgeneff）以至契诃夫（A. Tchechoff）、阿尔志跋绥夫（Artsbasheff）等，没有一个不和自然主义接近，近代俄国文学正是新觉醒时代，俄国方将其伟大的文学天才贡献在世人眼前，所以多独到的创见，反使世界受其影响；这自然是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杜尔格涅夫等把西欧思想输到俄国使俄国思想界剧变，这也是事实，不能否认的。所以即使因为俄国民族性特异的缘故，使俄国没有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但自然主义对于俄国文学影响之大，终究不能抹杀。

只有英美文坛没有显著的自然派出现，似乎是例外了。但是色彩鲜明的自然派虽然没有，受自然主义的感化而极接近自然主义的作家，也是有的。卡尔斯胡斯（Galsworthy）是最著名的一个。哈提（Thomas Hardy）和梅荚迭词（George Meredith）也可称是近于自然主义的。美国则有被称为“美国的莫泊三”的哈尔忒（Bret Harte）；还有曲列散（Theodore Dreiser）[1] 和亨利·乾姆司（Henry James）都是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的。我们要看自然主义在美国的影响，只这数人，就是代表。

总之，法国文学思潮对于世界文坛的影响，再没有比自然主义那样普遍而且明显了。前此的古典主义及浪漫主义时代，法国虽然曾给世界以极大的影响，但总不能说是只有法国单独的发出那些思潮而使世界各国一一受其影响；独至自然主义时代可说是

---

① 即德莱塞。

法国独力改换了全世界文坛的色彩，所以是尤可注意的事。

在自然主义以后，法国的堕废主义，新浪漫主义，以及大战后的非战文学等等，自然也有影响于各国文坛，但这些最近的文艺思潮，好像松林中雨后的松菌，各处都在怒茁，并非单独的产于法国，所以说到影响，也是交相影响，是双方面的，而非单方面的。因此，本篇也就略而不论了。

此篇根据 Emeline M. Fenseen 博士的“The Influence of French Literature on Europe”作成，振铎作了前半篇后，因事中辍，不能续作，乃由我续完了后半篇。原书只说到十九世纪的浪漫派——嚣俄——为止，未言及自然派；我因为觉得自然主义在各国的影响很大，似乎不能不说一说，所以勉强加上了最后的几段：这是应该申明的。

（雁冰）

诗人拜伦的百年祭

今年的四月十九日是英国诗人乔治·高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百年死忌，（拜伦生于一七八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死于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我们对于这个光荣的诗人，似乎应该为之举行一次伟盛的百年祭——较世界上一切诗人都更伟盛的百年祭。

有许多人常觉得为任何的一个古人，举行什么生祭，死祭，都是很“无聊”的举动；但我们却觉得人类除了自顾的自私的情感以外，在他们的心灵上自有一种高洁的自然的对于古远的伟大天才的一种崇慕的情感，任是什么具着冰冷冷的心的人，任是什么自尊的蔑视一切的人，任是什么嫉妒的狭隘的人，他们的心底总是潜有这种对于他自己所觉得值得崇慕的人的自然的崇慕的情感的，不过这种情感，有的人愿意表露在外面，有的人愿意潜藏在心底而已。

我们现在愿为我们所崇慕的拜伦表白我们的崇慕之感。

伟大的诗人及伟大的历史上的人物，其足以使我们生崇慕之感是一样的。

当我们读伟大的诗人——及至伟大的小说家、戏剧家——的

作品时，常觉得他们的全人格是潜隐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读他们的作品，便似与他们同在，倾听他们在诉说在表白他们的欢乐与悲苦，日常的生活与奇异的经历，温靡的情感与壮烈的热肠，如倾听一个极亲知的友朋，在诉说，在表白；甚至于他们的微微的，如游丝似的飘过心头的一缕恋感，他们的瞬刻间幻化万千光彩的，如斜阳照射于被晚巽清荡着的碧绿的沥沥的湖面似的微思，以及一切为我们的极亲知的友朋所万难以言语表白出而只可以心灵相感应的，他们也都能曲尽的诉说出、表白出，使我们感得一种莫名的感动，使我们的心激动的急跳着，连呼吸都停止了，或使我们怡然的，穆静的感得一种步于仙岛上似的清谧，于是我们便不自禁的对于他们生了一种崇慕之感。

当我们读历史上伟大人物的事迹时，我们又觉得是在读着最感动的诗歌，戏剧与传奇；他们的高洁的人格，他们的伟大的心胸，他们的坦白的行动，他们的如炮火似的热情，如山泉如春雨似的言辞，他们的坚固不拔的意志，他们的勇迈直前不顾一切的精神，他们的一切可动人的真实的经历，似都从文字中跃出，显示于我们之前，使我们感到了一种如夏午的太阳似的热力，一种如春晨的温风所带来的生气，使我们感兴而至于泪盈于目眶，使我们潜在心底的热情要爆跳出来，于是我们便也不自禁的对于他们生了一种崇慕之感。

我们对于拜伦的崇慕，却兼有了这两种的崇慕之感，我们不惟崇慕他的伟大的诗歌，并且崇慕他的伟大的豪爽的事迹。

拜伦的诗歌作品，虽然有时失之于粗豪；但我们如非专在文字音律上挑剔的批评家，则对于他的作品，没有不惊叹其雄伟的，无论在他的《恰罗特·哈罗特的行程》(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他的《海盗》(The Corsair)，他的《曼弗雷特》(Manfred)，他的《该隐》(Cain)，他的《邓裘安》(Don Juan)，或在他的其他的作品

里，无不明白的显出他的“伟大的表现，豪爽的坦白”（批评家M. Arnold的话），他的撒坦的精神，他的对于个人威权个人自由的强固不屈的主张与他的对于虚伪庸俗以礼教的假面具掩饰一切的社会的深绝痛恶。这种“伟大的表现，豪爽的表现”，使他的作品不久便有了极大的影响；在俄国感动了普希金（Pushkin）与李门托夫（Lermoutov），在德国，海涅（Heine）也受到了他的感兴，在波兰，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法国，也有无量数的诗人受到他的感化，他的作品引起了文学界的绝大的海流。哥斯(Edmund Gosse）说，“欧洲各国，有欲反抗专制之政治或虚伪的礼俗者，此国文人皆能于拜伦诗中得其感兴。”是的，有多少的反抗者是读到拜伦的著作而不热血在沸腾，而眼眶为感动之泪所湿的！

至于他的生平，其足以使我们感兴，似较他的作品为尤甚；他之所以较别的诗人更为一般的人所崇慕，他的作品之所以更易使读者感动，其原因即在于他的豪爽的事迹。他是一个热情的人，一个坦白而真实的人；在他的一生无时不表白出他的为正义而战，为自由而战的精神，与对于虚伪庸俗以礼教的假面具掩饰一切的社会的厌恶与反抗。他如晶莹的镜之易受热气的感动一般，常为情感所激动，而至于双眼为泪雾所朦胧；他如“火药一样容易发火”，常为正义，为自由而发火。当他与裘曲丽(Guicioli）夫人恋爱时，有一天，他说道：“我爱你，不能禁止着不爱你。”但当他的双眼如梦的凝注在她的美丽的花园中的一个喷泉的水，当他想到他的爱情会带给她以如何的不幸时，他竟呜咽的哭起来了。又有一天，拜伦与一个友人同读欧文（W. Irving）的《杂记》（Sketch Book）中的《心碎》（Broken Heart）一篇，当他友人读至最沉痛的一节时，拜伦泪盈于目，仰首问他的友人道：“你看我哭了！我以为欧文撰此文时，必且哭且写，

我的读者听者，如何能不哭!”当他少年时，第一次到东方去游历；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几个土耳其兵背着一只装有一个少女的麻袋；因为她与一个基督教徒恋爱，所以他们预备把她抛到海里去。拜伦见了，即一面拔出手枪，一边用金钱，把那女子强迫的买来释放了。当他第二次到东方，参与希腊的独立战争时，有一次，他正在吃饭，忽听见几个工人被崩落的大土块埋压住了，立刻从饭桌跳起，飞快的跑出去救助他们。那些在掘土救人的工人，觉得自己地位的危险，便退缩起来，不肯再掘，说道：“我们相信被埋的人都已被掘出了。”拜伦抢取了一把铲，立刻自己动手去掘土，迫得他们也不得不去掘，结果又救出两个活的工人来。拜伦的这种精神，不惟用在救助个人，且亦用在救助国家与民族。他常说道：“王政时代是要终止了！血将如水似的涌流着，眼泪将如雾似的洒着，但人民终将得最后的胜利，我不能活着看见这个情形，但我已预见着。”于是他便本其所信，躬与王政作战与暴君作战。当他寄居在意大利时，拿破仑已失败，神圣同盟方宰制全欧；意大利的形势亦一变，法国的改革的曙光完全为奥大利的黑云所敝盖，国民呻吟于奥政府的虐政之下而无可如何。于是意大利的爱国者便有“烧炭党”的组织，拜伦也加入这个党，与他们共同计划，在党中占到很高的地位，拜伦的寓所，便是这班党人常常集会的所在。他的住屋内储存了许多军械；在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把它变成了一座炮台以抵抗敌人。当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的春天，拜伦的友人霍甫哈士（Hobhouse）对他谈起希腊的独立战争，并说，如果他要出来做些事，这件事是很值得他个人去帮助的。那时，起于一八二一年的希腊独立军，其声势已渐不振，爱国者起了内讧，军需亦将耗尽，战事亦无大进步。但拜伦不顾这一切，经过略略的踌躇之后，便决意参加于独立军中，给他们以经济的与他个人的帮助。前些时候，他想回到英国去，

行装都已预备好，决定当日要走了，却为裘曲丽夫人之故，终于临时不走；而这时，他竟为希腊之故，为一个古民族的自由之故，竟强制住他与夫人的离情，竟决然的走；竟走到东方，躬自参与于昔所梦想所吊凭的美丽的希腊的人民的独立军中而与土耳其的暴政相战了！他走的时候是一八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他雇了一只英国帆船，名为赫克尔士（Hercules）的，带了两尊炮及其他军械，五匹马，许多的药品，五万元的西班牙钱。（有的是钞票，有的是现金。）他在希腊军不久，便到了美沙龙希（Missolonghi）地方，预备要统军攻击莱潘托（Lepanto）。不料到了一八二四年的四月间，他竟在美莎龙希得病，至四月十九日而病死。他虽然不曾在希腊军中建立了什么勋绩，然而他所给于希腊人的帮助是如何的帮助呀！当军势将败，举世踌躇而不肯扶掖他们一下时，竟有一私人，倾私财而躬自加入他们的军中，与他们共同的为自由，为推倒暴政而战；他们希腊人，所得于拜伦的岂仅为区区物质上的帮助！他死后，希腊炮阵放了三十七响炮声，以纪念他。凡办公处均休息三天，耶稣的复活节也竟因此而移后举行。当他行葬礼时，兵士站列在街上，一队牧师跟在棺后，徐徐的走着，和唱着赞歌，棺上放了一柄剑，一身盔甲，一顶桂冠，这个诗人生前所骑的马，也跟随在后边，悲肃之感，充溢在观者的心上。到了希腊独立后，希腊人又为拜伦在美莎龙希建立了一个铜像，以为永久的纪念。然而一切的形式上的纪念何足以纪念拜伦！拜伦是在希腊人的心上，是在近东各民族的心上，是在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心上！

伟大的诗人拜伦，我们崇慕你！

（原载1924年4月《小说月报》15卷第4期）

狐与玫瑰

骑在骆驼背上，横过非洲的大沙漠，终日终月，所见的不过是漫漫无垠的黄沙与青蓝的天空。“厌倦呀，厌倦呀，”旅客常是这样喊着。然而，突然的遇到了一块绿洲，见了到些青翠的绿树，芊芊可爱的绿草，粼粼起着微波的小池塘，他们便觉得如由火狱上升天堂了，一切都可爱，说不出的可爱。

没有一草一木是都市里中下等阶级住区的特色。青灰色的墙，黑的瓦，一排一排的密接着整齐的列着，如一大队的陆军在广大的操场上似的。那里是龌龊，无秩序，垃圾随地乱倒，泥污满脸的孩子在街上大打。然而却有一个小堆，那些人倾倒垃圾最多的地方，偶然的在春天，于那破罐破瓶，鱼兽骨骸旧纸烂布之中，亭亭的生出一二朵紫红色的野花，点缀着可爱的都市的春天。是多么可爱呀，垃圾堆中的小花！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著名的黑暗的时代，我们也能找出几部很可爱的作品，如我们在沙漠中找出绿洲，在都市的垃圾堆中找出小红花一样。那些作品较之古代与近代的作品，真有些特别可爱的地方。

中世纪的杰作真不算少，《尼拔龙琪歌》，《罗兰歌》，行吟诗

人的小诗，《亚之述死》[1]，《西特》（The Cid），《阿克森与尼柯勒》（Auccassin and Nicolette），最后还有但丁与却赛。但这些大伟作，我们都不说。我们现在且说两部最有趣味的东西，那就是“狐”与“玫瑰”。

不知怎样的，大概终于是少年人的性情吧，我们总是喜爱着热情的故事，婉恋的诗歌，与夫一切冷讽热嘲的有趣的作品的，正如我们之喜爱一切甜蜜蜜的东西，同时又喜爱辛辣及酸醋的有刺激物一样。

所谓“狐”，乃是一部伟大的禽兽史诗，名为《列那狐的历史》（Reynard The Fox）的。这部禽兽史诗，极有趣，内容充满了对于当时无知的君主，横暴的贵族与一切的僧侣的冷隽的讽刺，而把这些人都穿上了禽兽的衣服。书中的主人翁列那，是一头机警绝伦的狡狐。他用他的智力，他的谎话，来逃避了刑罚，玩弄了兽国的王与后与贵族，欺压了无告的兔与羊与鸡，在那时，惟有他那样的人才能得胜，才能生存于当时的社会。作者在这里真是满蕴着他的悲愤的冷讽与热嘲!

有许多讽刺的作品，在当时是很有趣，时间一过去，便成了一点也不能动人的东西。《列那狐的历史》却不是如此，她是永久讽刺作品之一。我们在如今也许还可浓浓的舐到她的讽刺的辣味。同时，她的故事的本身却又是一部最可爱的童话，无论老年，少年，儿童以及有无鉴赏力的人都可为她所描写的逼真的禽兽国的情景与书中主人翁列那的绝世聪明所感动。作者的描写力真不坏! 熊呀，狼呀，母猴呀，猫呀，兔呀，鸡呀，狮呀，以及一般趋炎附势的禽与兽，个个都写得真像活的，天真的小孩子真看不出每个禽或兽的面具之后隐藏着的却是人，是日常出现于我

---

① 疑为《亚述之死》。

们社会里的人！作者很能活用古代的寓言，他把伊索的以及当时流传的寓言，插用了许多在这部大史诗，却都如已成为融化了的原料似的，毫不觉得有缝纫的线痕。

全书的故事是如此。

在一个天气极好的日子，狮王坐朝了。许多禽兽都来，却只有列那狐不到。狼在控告列那，小猎狗也控告他抢去他的布丁，海狸也证实了他的罪状。列那的外甥猪獾却替他辩护，正在他称赞列那之隐士生活时，雄鸡恰好带了两个小鸡抬着一只被列那所杀之小雌鸡的尸首而来。于是狮王差熊去召列那来对案。不料熊却被他所骗，受了重伤而回。狮王大怒，又差猫去召他。不料猫又被欺而受了重伤回来。第三次是猪獾去召列那。列那来了。他欲以巧辩掩盖他的罪，但是无益于事。他终于被判决死刑，但在他立在绞架上时，却编成了一大篇的谎话，说有一个宝库，只有他晓得地方。同时并诬陷了熊与狼。于是狮王赦了他，要他去掘宝。但他又设辞要先去朝陵。其实他是回了家。这时，他又杀了兔，还使山羊死于狮王之手。狮王终于察出了他的狡计，大怒起来。猪獾又奉命去召列那。但他在王座前的一席话，又使他自己脱离了危险。狼对他的恶感极深，立起要求与他决斗，决斗的结果，却又被他用狡计得了胜利。于是他很光荣的回到了家。

关于列那狐的历史，学者间的争论颇不少，第一是她的作者问题，第二是她的产生地的问题。关于她的作者，有的主张是由民间传说发展而成的，有的主张是“僧侣诗人”们的创作。关于她的产地，有的主张是德国，有的主张是法国。但不管那许多纷纭莫决的主张，我们现在却有了一种概念。这部列那狐的历史原是有一个民间传说的来源，这来源是在法国。然在十世纪与十一世纪时，经了“僧侣诗人”与法国“宫廷诗人”的润饰，加上了时代的色彩与讽刺的意味。当时宫廷诗人大约必以此诗与那些古

代史诗，骑士传奇，同样的读诵于听者之前，以娱乐他们。到了第十二世纪时，有一种德文本，又有了拉丁文本。变异的同源作品有数种。后来又有了散文本。到了十八世纪之末，大诗人歌德又著了“Rainecke Fuchs”。在文辞方面，是加上了不少的美漆，然她的原来的朴质可爱的风趣，却丧失了些。

所谓“玫瑰”，乃是一部抒写恋爱的寓言诗，名为《玫瑰的故事》（Romance of the Rose）的。她是法国文学中最早的作品之一。这篇长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四千行，作者为洛里士（Guillaum de Lorris），著作时代约在一千二百三十年；第二部分包含一万九千行，较第一部分增多了五倍，著作者为麦恩(Jian de Menu)，著作时代约后于洛里士四十年。

洛里士的生平，我们已不能考知，只晓得他是法国中部的人。他把关于恋爱的一切抽象的东西都人格化了。他所写的恋爱的经过，也许便是他自己的一种经验，在这诗里他艺术的美丽的表现出行吟诗人的恋爱哲学。在发端里，他告诉我们说，这部“传奇”是包含一切的恋爱的艺术。下面继续着便写“爱者”在梦中游历到一座壮大的花园，园的四周，围了一座墙，墙上画的是憎恨，罪恶，贪婪等等的图像。在园中，他遇见了邱辟特(Cupid)，美丽，财富，礼貌以及其他好物。他选择了一枝在盛开的玫瑰花，但看见它是为一层厚而密的荆棘篱笆所围绕。和爱的欢迎允许他去吻玫瑰[1]。但恶口到处喋喋的谈着这事。于是嫉妒把玫瑰囚禁于一个塔内，用了危险、恐惧及羞耻来护守着。爱者与他的玫瑰离别，沉浸他自己于失望之中。洛里士的“传奇”至此而止，乃是未完之稿，于是麦恩于四十年后再把她续了下去。爱者因了邱辟特，委尼斯（Venus），自然与天才的帮助，

① 原载刊物如此。

终于攻下了嫉妒的塔，得与玫瑰相会。全诗遂于此结束。

洛里士是颂赞妇人与骑士的爱的。麦恩却似乎是讥诮着他们，因为麦恩把爱情减到官能的快乐上，对于中世纪所崇拜的东西一点也不表示尊敬。麦恩的诗才没有洛里士高，然搜集的材料却极丰富。

这部传奇曾引起了一时的热烈欢迎，也有一方面的人在反对。英国诗人却赛（Chaucer）曾把她介绍一部分到英国去，在却赛的作品上也有可以看出所受到的她的不小的影响。

（原载 1926 年 5 月 9 日《文学周报》第 224 期）

《西特》与《皮奥伏尔夫》

中世纪两部极著名的史诗，一部是用西班牙文写的，即《西特》，一部是用古英文写的，即《皮奥伏尔夫》。这两部史诗，在欧洲都有极大的影响。

《西特》（The Cid）是十二世纪流行的一部史诗，叙的是西班牙最有名的英雄西特的事。西特的名字被那些传说与诗歌所隐晦，几乎成了一个非历史上的人物。许多奇迹都累积在他的身上，许多好行为都为西班牙爱他的国民聚合在他的身上。所以有一部分学者便主张说，所谓西特，实在本来没有这样的人。即在西班牙也不乏主张此说者。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西文提司（Cervantes）在他的名著《吉柯德先生》（Don Quixote）里说得最好："有西特那样的一个人的存在是无疑的，所可疑的乃是他究竟有没有成就了如大家所累积于他身上事业。"经了历史家的搜讨，益可证明西文提司之确切不移。原来历史上的西特与传奇中的西特，性质却不大相同。不过在西班牙的影响却是一样。

历史上的西特，虽然碌落了他国人的爱恋者所黏附于他身上的诗的理想，却仍不失为英雄时代的西班牙的最伟大的一人——是基督教与回教在长期战争中产生出的最伟大的战士，是十二世

纪最完全的卡士特力人（The Castilian）的代表。他的真名字是洛特里哥（Rodrigo Diaz），但阿拉伯人给他的尊号西特却是更有名。西特乃是阿拉伯字，意为爵主，或首领。他是卡士特力的贵族，生年约在一〇三〇至一〇四〇年之间。在一〇六四年时，他曾随菲狄南一世到过法国与意大利。一〇六五年，菲狄南死去，割裂国土，分赐他的五个子女。以后，基督教诸小国与回教诸小国时有阋墙的变乱，各向外面求联盟。在这一内乱期内，西特显出他的异常的勇敢与才能。但后来他却为卡士特力王放逐出去。自此以后，他便独立率领一军，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有时帮助基督教徒以抗回教徒，有时又帮助回教徒以抗基督教徒。他的最著名的战役是攻克了那半岛是最富裕的城凡林西亚（Valencia）。攻下时，杀掠甚惨。但以后四年，西特却以力量与公平统治凡林西亚及麦西亚（Murcia）全境。最后阿尔摩拉委人（The Almoravides）集合了雄厚的兵力与西特开战。老年而久战的西特便于一〇九九年死于此役。他的妻子还在凡林西亚拒守了三年，但后来终于退出了，把城让了慕尔人。她把西特的尸体带出，葬在卡地那（Cardena）的一座僧院里。

所以历史上的西特，乃是一个最有力的战士，最真实的西班牙英雄，他的一身包含着所有国民的善德与一大部分的恶德。他以同样的热忱与基督教及回教抗争，以同样的热忱去烧毁礼拜堂及清真寺，他为了生活而杀人盈野，也与那些因爱国的与宗教的目的而战争者之杀伐一样。在他的性格与习气上，是同样具有基督徒与回教徒的性格与习气的。他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便是那个时代西班牙所生的那样的武士的最伟大的代表。

传奇中西特，经过千百战，有无数的传说的西特，在文学上是神化了。他为爱国者所永远崇拜，他是完全的人，他是生在快乐时间的人，他是武士道德的模式，爱国责任的镜，基督教一切

善德的花，与史上反复无常的勇士的西特，真是完全两样的人了。在西班牙的民间文学上，西特所占的地位在别一国是无可与比的，他们都称之为“我的西特”。在近代，他还被认为咏歌的目的；在十二世纪游行歌者所唱的西特，到了十九世纪，还为人所讴歌呢。

约在西特死的百年后，他的名字便已成了一部全系神话的中心了。《西特歌》（The Poem of the Cid）写于十二世纪的后半叶，那里的西特已全与历史的不同，已成了神明化了。《西特歌》是具着三千七百四十四行的一篇残诗，虽然风格与韵律很粗，却燃着诗的真火，充满着真朴的美与史诗的弘丽，反映着那时代的活泼泼的图画。但真实的古作仅为小部分，专门研究者相信其中大部乃为十六世纪时所写的。

《皮奥伏尔夫》（Beowulf）是用古英文写的一部史诗，作者与产生的时代都未知，大约是在七世纪的时候，一个基督教诗人把古时英雄歌唱组编而成的。诗里的景色与性格都完全是斯坎德那维亚的。所以有人主张这诗的材料是安格尔人（Angles）住到英国时所带去的，又有人主张作者游历斯坎德那维亚所得来的。这诗表现出北欧封建时代，英雄时代的图画，其弘伟与完整，都不下于荷马的两部大史诗。这诗叙的是丹麦王的宫殿，夜间为巨怪格林台（Grendel）所扰害，他把贵族们于他们的睡梦中吞下去。皮奥伏尔夫（意为蜂狼，即熊）是瑞典南部格兹族（Geats）王的外甥。他带了十四个从人，过海到丹麦，要去救他们出于这个巨怪的残虐的手中。丹麦国王热烈的欢迎他。到了夜间，他与他的从人们便留在大殿上防守。当他们睡时巨怪格林台来了，吞下一个从人。他的身体极坚固，刀枪是不能伤害，于是皮奥伏尔夫只得把他紧紧的捉住。他挣扎的逃去，失了一只臂膀，逃到一个湖底的洞中而死去。宫中的人真快活呀！乐队唱着古英雄的

歌，国王送了许多宝物给皮奥伏尔夫。但还有一个巨怪却活着，那就是格林台的母亲。她那一夜就到了大殿中，要为她儿子复仇。她吞了国王的一个侍臣。皮奥伏尔夫追她到了湖底。她把他引到洞中。他的刀是无用的，而她的匕首却几乎要杀了他。最后他在洞中寻到了一把神刀，才把她杀死。然后，他又把格林台的头斫下，带到岸上来。现在国王又开宴谢他，欢歌喜舞的闹了好几天，他才回国。经了长久的时间以后，格兹王及他的儿子相继的战死于兵阵，把国家传给了他。他为王公平而正直，做了五十年。于是，有一只火龙出现于国中。皮奥伏尔夫带了十二个从人去杀它。他已受了重伤，因了一个勇敢的从人的帮助，才能把那凶恶的火龙杀死。但他自己也因伤重而死。

皮奥伏尔夫大约也是不真实的人物，但被民间的传说者加上了许多异迹异闻，把他神话化了。

(原载1926年5月23日《文学周报》第226期)

介绍《威廉退尔》

这几天上海大戏院正在演《义士退尔》。那就是席劳有名的《威廉退尔》之被摄成电影的。我虽有目疾，却有一种力逼我不得不去看。我真被感动，当我看后！这是一部德国影片，虽然有的地方与原剧不同，然已不凡了。因为不能写东西，只好节钞《文学大纲》里关于此剧的一段于下，以当介绍。诸君如欲读原剧，有马君武译的一本在中华书局出版。这种动人的戏剧真不能不看。然而当我去看时，却只见寥寥的几个客！

席劳（Friederich Schiller）生于一千七百五十九年。他父亲是一个军医，因此他幼年进过军医学校；后又去学法律，再后又去学医，都因与他的性情不合而弃去。他飘游各处，力与贫苦争斗，为军医，为编辑者，为剧场经理，为历史教授。与歌德相见以后，彼此成了最密切的朋友，席劳的文学工作遂渐渐为世人所认识。席劳的最成功者为他的剧本。他的一切剧本，技术都很精密，情节都极动人，且都蕴蓄着他的热情，他的为自由而争斗的热情，所以舞台上至今还扮演着他的作品，不仅在本国，在别的国也是如此。一千七百八十一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的剧本《强盗》（Rauber）。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他的三部剧《瓦伦斯丁》

(Wallenstein) 出版……在德国一切历史剧中，这是最著名的一部。英国批评家卡莱尔 (Carlyle) 称之为“十八世纪中所可自夸的最大剧本”。此后，席劳又出版了好几部名剧；《马丽·史豆特》(Mary Stuart) 出版于一千八百年 (叙苏格兰女皇马丽被杀事),《奥丽安女郎》(Die Jungfran Von Orlean) 出版于一千八百〇一年 (叙法国的爱国女郎贞德事),《美西娜的新娘》(Dir Bruat Von Messina) 出版于一千八百〇三年，《威廉退尔》(Wilhelm Tell) 出版于一千八百〇五年。其中以《威廉退尔》为他的最有名的巨作。

《威廉退尔》的产生由于他和歌德的谈话；当席劳写完了《马丽·史豆特》及《奥丽安女郎》时，歌德正想写一篇史诗来歌咏那个瑞士革命中的半传说，半真实的英雄威廉退尔。但歌德的计划，终于不成，而席劳因受了歌德许多次谈到这个题材的激动，便决定动手去做一篇剧本，这个剧本一出来，立刻得了大成功，震动了一时的耳目；他的为国家自由而奋斗的精神，激起了不少人的灵感，不仅在全德国，即在别的许多国也都受感动了。威廉退尔的名字与他被迫用箭射他自己的儿子头上的苹果之事，至今是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然在席劳剧中，他却表现更有声色；这个大胆无畏的英雄，为国家的自由奋斗，当他在舞台上出现时，每每不禁的挑动无数人的崇高的为国而献身的灵感。在席劳的剧中，更有许多抒情的美，与伟大无比的背景使读者移神。当瑞士三邦人民在红日将升时，于阿尔卑斯山之顶互抱立誓反抗暴政，或当牧人樵夫歌声悠扬，山雨欲来时，或当威廉退尔在射苹果时，或当他们在黎明的红光中报告胜利的消息时，不知怎样的总使读者感到一种莫可言的感动。

席劳的叙事诗也极著名的；当他与歌德初相会时，他们共同出版了一册叙事诗，他所作的却大部分超过于歌德所作的。歌德

与席劳每年都于元旦互相致贺。一千八百〇五年的元旦，歌德写贺信给席劳时无意中写上了“最后之一年”一句话，他重新写过，这句话仍然出现。他说他：“我觉得我们二人之中，今年总有一个是最后之年。”果然，在那一年席劳死了。他的死耗，使伟大的平静的歌德大改其常态；他双手掩脸，如一个妇人似的啜泣着。几天之内，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起席劳的名字。他有一次，在一封信上写道：“我的一半生命已经离开我而去了。”席劳死时年纪很轻，但他的成功，已是不朽的了。他的剧诗，在德国是无可比肩的；他不仅为他本国人所最爱的诗人，直至于今日，即在世界上，他的剧本也仍占据着极崇高的地位，至今日仍有人演奏着。

（原载1926年7月18日《文学周报》第234期）

皮奥胡尔夫

近代欧洲文学，用现在说的文字写的，当以史诗《皮奥胡尔夫》（Beowulf）为最早的作品了。这件事实，经过种种证明后，已可认为无疑的。这部大史诗，据说是安格鲁萨克森人（Anglo-Saxons）在未侵入英国时所作的。其著作之时代大约是公元后第五世纪；但现今那一部留存的最古稿本却是第九或第十世纪所写的。在不列颠博物馆里，这部东西算是古英文稿本中最可珍贵的东西了。它所用的韵文，是粗率的顶韵，其音韵为英国在诺曼人侵入之前所未之知者。虽然这稿本曾被火烧毁了一部分，然经几个专门学者苦心的研究，已把这诗完全的补足了，其故事大约如下：

丹麦王洛琪（Hrothgan）是北欧神之王亚丁（Odin）的后代，为光荣的史吉尔东（Skioldungs）朝的第三代王。他们所认为荣光的乃是：他们是由亚丁之子史吉夫传下来的。婴孩的史吉夫于某日很奇异的飘浮到他们的海岸边。百姓们充满了好奇心围绕于这个奇怪的婴孩的四周，带着诧奇的眼光望着他。这个婴孩躺在一只船的中央，在熟稻草做的垫上，微笑的躺在那里，身之四周都是无价的武器与珍宝。现在，事情是恰好，正在这时，丹

麦人在寻求一个王。于是他们立刻相信着这个神奇的婴孩一定是亚丁赐给他们的，于是他们便奉这婴孩为王，终身的服从他。时间一年年的过去，最后，史吉夫觉得死是迫近在他眼前了。他焦急的召集了他的贵族们，告诉他们说，现在他要离开他们了。他们听从了他的话，预备了一只船，载上了无数的金与珠宝。这将死的王，已经一切事都已预备好，便自己去躺在船上，四肢伸直着。于是船驶到无垠的大洋中去，如他之神奇的来一样，也神奇的不见了。

洛琪先代的来源既是如此的神奇，这是当然的，他渐渐的成了一个有力的王，且在一生的战争中，取得无数的珠宝了。他决意要把这珍宝的一部分去建筑一所弘丽无比的大宫殿，他把这宫殿定名为赫洛特（Heorot)，在那里，他可以宴会他的来宾及侍臣们，且在冬天的长夜里，听着诗人唱那英雄的歌。有好几个月，那斧凿的声音不绝，水木匠们终日的忙着，把大石一块一块的堆起来。但最后，这弘丽的宫殿是告成了，一切的廷臣和百姓们都来看这大殿的正式落成。当然的，一个极盛大的宴会是在这大殿上举行着。国内所有最高贵的武士都来赴宴。然后，当盛会已毕，宾客们陆续的散去时，国王的卫队便在殿上憩息着。第二天早晨，天色一明，仆人们去打扫大殿。他们一进去，便万分的惊骇起来，因为满地板，满墙头，都印着血迹，那些全身武装的卫士们却一个也不见了！便可惊的是，国王的卫队，乃由武士中最勇敢的三十二人组织成功的，以勇力与善战闻名于各处。然而现在，除了巨大的有血迹的足印以外，他们却一点也没有踪影的不见了。这些巨大的有血的足迹，由大殿门前起，直引到一个深山的湖边为止。

这事发现了之后，全国为之大惊。他们及国王洛琪都知道这个大残害乃是一个凶残异常的巨怪格林台尔（Grendel）所做的，

他在好许多年之前，曾被一个术士驱逐出丹麦国境之外，无疑的，现在是又来肆扰吃人了。洛琪现在是太老了，他不能如从前似的执刀以杀敌了，于是他遂出了重赏，征募勇士去杀这个可怕的巨怪。这个布告一发出，他的武士中，便有十个人出来应募，全身武装的于第二夜驻在大殿中；如果巨怪格林台尔敢于再出现时，他们便去攻击他。

但是不管这些武士是如何的勇敢，如何的有经验，不管他们的武器是如何的锐利，到了结果，他们也为格林台尔所杀、一个行吟诗人。躲身于殿上的暗隅的，乃是一个唯一的人，逃避了格林台尔的残杀的；他在战战栗栗的把他所见的这残杀的事告诉了大家之后，便恐怖的逃到了基特国。他到了那里，在国王海格拉克（Hygelac the Geate）及他的侄儿皮奥胡尔夫（Beownl）猎蜂者（The Bee-Hunter）之前，唱他的诗歌，其描写格林台尔之来到，及勇士之被杀的事，引起了他们的深切的注意。在所有一切人中，皮奥胡尔夫尤为注意的听。后来，诗人唱完了，他又热切的质问那诗人，知道那巨怪格林台尔还在那里肆其凶暴，于是他恳挚的宣言说，他要到洛琪的国去，如果不把这毒龙杀死，至少也要与他打了一仗。

在这个时候，皮奥胡尔夫年纪还很轻，他已经在和瑞典人的战争中得到伟大的名望。他还在与白里加（Breka）、一个他叔叔海格拉克宫廷上之武士的竞比游泳上，显出了他的勇力。他们俩执了刀在手，各各全身武装，一同出发；他们一同跳入水中，一同游泳了五日之后，乃为一阵大风雨所分离。白里加与风浪拚命的挣扎仅得上了岸，但皮奥胡尔夫却为深浪卷到一个险恶的岩石下。他在这里努力的挣扎着，一面抵抗海水的冲击，一面用他的刀去抵抗乘机攻击他的许多海妖。渐渐的，这些被杀的海妖之尸身被冲上了海岸，所有看见他们的人，无不诧异着。他们很快的

跑去告诉海格拉克这件事；然而他也不晓得他们为什么被杀而死。当皮奥胡尔夫突然的复现出来，告诉他这些海妖乃是他所杀死时，他的心是如何的快慰呀！因白里加是第一个先回，所以他得到游泳的奖品；但国王却另外给皮奥胡尔夫以他的宝刀那格林（Nägrling），当众称扬他的勇力。

现在，皮奥胡尔夫因为他曾很成功的在波涛汹涌之中，杀死了那许多巨妖，便表示一种希望，以为他也许亦能抵抗格林台尔。于是他拣选了十四个武士，与他们上船同到丹麦。他一到了海岸边，便为守卫海岸者所阻止，他们还当他是一个仇敌。但当皮奥胡尔夫一把他的来意说明后，他与他的武士们立刻受到极热烈的欢迎。

武士们和皮奥胡尔夫威威武武的到了赫洛特殿，国王洛琪极恳切的招待他们。因王想阻止皮奥胡尔夫，叫他不要做这件冒险的事，然皮奥胡尔夫却立定了心意，必欲一试。然后，当一个盛大的宴会完毕之后，洛琪和他的武士们很忧愁的离开了，把那弘大的赫洛特殿，给这一群勇敢的客人去守卫，他们以为这一夜过去后，永不能再见他们的了。国王一走开，皮奥胡尔夫便吩咐他的同伴躺下去，安安静静的睡，并答应他们，他自己将为他们看守。然而同时，他却把他的刀和盔甲也都脱解下来了；因为他知道与那个巨怪格林台尔相持，刀枪是无用的；如果它真的出现时，他便将赤手去捉住它。

武士们一躺在大殿的椅上睡时，他们因为空气的压迫与饮食的过饱，立刻睡得很熟很熟了。只有皮奥胡尔夫一个人不睡，在那里等候格林台尔的来临。夜益益的深了；皮奥胡尔夫仍旧守望着；仍旧没有怪物出现。但最后，当黑夜一变为鱼白色时便听见有一种偷偷的足步之声。更近了，更近了，后来，它到了大殿了。这就是格林台尔。格林台尔用手一扭，那锁门的铁条与铁锁

便立刻断之。于是，它轻便的到了殿内，立刻捉住了一个熟睡的武士。他把他的牺牲，四肢都裂开了，贪婪的喝着他的血，吃着他的肉，除了留下这不幸武士的头手与足外，别的一点也没有剩。这一顿的吃，尽使巨怪的口胃更加残贪。他仍旧在暗中伸出手来去捉，去吃别一个武士；他仍旧觉得他的手是紧捉着别一个人。但他现在所捉的却不是平常的武士。这乃是皮奥胡尔夫。这位英雄，为愤怒所烧灼，回身向那巨怪，一把手捉住了他，这一把手的紧握，即格林台尔也不能摆脱了它。

然后，在暗中开始了一场可怕的争斗。直到了后来，连那大殿也连基础的震撼着。墙在可怕的互击中摇摇的欲堕。但不管巨怪的弘伟的身体，皮奥胡尔夫却把他的手和臂紧紧的握着，一点也不肯放松。格林台尔挣扎不脱，又急于要逃走，遂努力一挣，把它的整个手臂都落下了！它流着血，受了重伤，急促促的回到它的泥污的洞中去，留下一条长的血踪在它的后面。当它走时，它心里知道，它的运命是很不幸，它的死是近在眼前了。

至于皮奥胡尔夫呢，他虽得了胜利，却也觉得精疲力尽。他立在大殿的中央，他的武士们绕他而立，沉静的诧异的看着那巨大的手和臂以及如铁爪似的手指，比之钢铁还要尖利，所以在此之前，没有人力能够抵御它。到了天明，洛琪和他的武士们又来了。他们踌躇了一会儿，不敢进赫洛特殿去，因为怕看见殿内武士们的死体；当他们一进了殿，看见皮奥胡尔夫他们仍旧在着，那快乐真是无量呀！他们听着皮奥胡尔夫说起经过的事，及他自己怎样的与格林台尔相斗而战胜了它。他们惊奇不置！他们张大了口，眼光凝注着格林台尔的巨大无比的一只手臂；这只手臂如一个纪念碑似的由大殿天花板上挂到地下。国王洛琪全身都充溢了喜气，全心全意的热烈的庆祝这位英雄皮奥胡尔夫，送给他无数的珍宝。然后，他命令打扫赫洛特大殿，很富丽的饰挂起来，

预备了一席最盛大的酒宴，庆贺那位渡海而来，为他们除了大害的武士皮奥胡尔夫。

当人们都在宴会，听着诗人们唱的史歌；喝了不少次大杯的酒后，洛琪的美丽的妻，丹麦的王后，委尔秀夫（Weartheow）出来了。她敬了皮奥胡尔夫一杯酒，她先用自己的唇接触着酒杯，然后奉给皮奥胡尔夫喝干了。然后，她又送给他一个纯金的戒指，一串无价的颈圈。

当大宴告终时，国王洛琪请他的客人们到很舒服的寝室里去睡，叫他自己的人去看守那个大殿，因为他们知道格林台尔将永远不再出现了。武士们现在不怕有什么危险了，他们安安舒舒的睡着。但在可怕的夜里，殿里却又来了别一个凶残的敌人；因为格林台尔的母亲，也是一个与她儿子一样的凶酷无比而力大无穷的巨怪，又偷偷的到了殿上来了。她很快的把现在还挂在天花板上的血淋淋的手臂取了下来，然后又把国王最亲信的朋友阿史克合（Æschere Askler）一同带去，走到黑暗中不见了。阿史克合这一夜恰好也在那大殿上守望着。当国王洛琪在第二天绝早时听到了这个新的损失时，他为悲哀所占据了，他有好几点钟在哀切的哭着。他一看见皮奥胡尔夫，便叫道：“唉！阿史克合，我最爱的人，现在死了，在昨夜被一个巨怪所捉去！那巨怪乃是格林台尔的母亲！”

国王一说完了话，皮奥胡尔夫便立意要到格林台尔母亲的洞中，去攻击她，完成他的全功，并为阿史克合复仇。他很知道这个工作是异常的危险，所以他在出发之前，便把他个人的财产详细的分配一下，预备不再回来时之用。然后丹麦武士与基特武士拥护了他，沿着血迹走去，一直到了一个悬岩之旁，血迹即止于此，湖水即在其下。阿史克合的头颅却高高的挂在岩上，以为示众之用，且警告一切敢再进一步去探险的人。然后，皮奥胡尔夫

望着那深水，他看见那水色亦为巨怪之血所染红，他晓得，他必须跳到水下去寻那个巨妖。在和洛琪告别之后，他又吩咐他带来的人，等候他两天两夜，如果他不回来，他便是永不再回来了。他们愁容满脸的答应了，因为每个人心里都相信，他们将不再看见他们的勇敢领袖的脸了。但皮奥胡尔夫却笑着，叫他们放宽了心，说完了话，他便勇敢的跳入那可怕的湖中深处去了。他潜入水中，向下走去，潜泳了许久，还没有到底。但最后，有一线的如磷火的光告诉他现在他是已经近于他凶残的敌人之藏身之洞了。他很迅快向磷光走去，然而当他走时，他还不得不把他的刀四面挥斫，以保护他自己，去反抗那无数的潜藏的海妖，他们从四方八面向他冲来。

在这个可怕的挣扎中，有一股强大的水流突然的捉住了皮奥胡尔夫，那是格林台尔的母亲，她紧紧握住他不放手。她早已经在等候她的掳获物了。她紧紧的握住他，努力要把他捏死。然后，她把皮奥胡尔夫的刀从手中夺下，她想用她自己的小刀把他刺死。然而，亏得皮奥胡尔夫的盔甲是不怕刀枪的，而他的筋骨又是如此的强硬，在她未把刀刺下之前，他已经从她掌握中挣滑出来了。立刻，他捉住了一把挂在近旁岩上的大刀，对她尽力的斫下，只要这一下，立刻把她的头与她的身体分离开了。血从洞中涌出与外面的水混合在一处，成了那般可怕的红色，竟使洛琪及他的武士们很悲戚的离开了，只让基特的武士们在那里等候皮奥胡尔夫的回家，因为他们十分决定，皮奥胡尔夫是万难生还了。同时皮奥胡尔夫却冲到后洞，看见格林台尔正躺在那里，还没有死，于是他也把他的头斫下了。然后他握住了他的战利品，匆匆的由血水中取路回去；那水为这两个可怕的巨妖的血所灼热，沸腾起来，当他走时，他的刀一路的融化了，后来只剩得一个柄在。

在这个时候，沸水的形状非常的可怕，连基特的武士们也打算不守皮奥胡尔夫的命令，而忧愁的回去了。突然的，他们看见他们亲爱的领袖，平安无恙的由水中出来，且带了巨妖的头。他们的欢乐现在是无限的了！他们连连的呐喊着，近旁的山峰都反响着他们的欢呼之声。然后，他们又回到赫洛特大殿了，皮奥胡尔夫的四周，几乎为感恩的丹麦人所送的礼物所堆满。几天以后皮奥胡尔夫和他的同伴仍坐船回到他的故乡，在那里，他说起冒险的经过并陈列所得的宝物。国王海格拉克的心为荣誉所充满，当他听见他侄儿乃是如此勇敢的一个英雄时；他命令预备了一席最盛大的酒席祝贺皮奥胡尔夫。然后，酒过数巡，歌声已止时，全个大厅中只听见高嚷“皮奥胡尔夫”“皮奥胡尔夫”的名字。皮奥胡尔夫听见了这个呼声，他的眼放出光来；然而在他心中，他已决定，在他死之前，比这个更大的工作，将要归于他的名下的。

几年和平的光阴过去了，后来有一队法里森人（Friesians）侵略基特的海岸，沿路烧掠甚惨，而他们又甚狡，当海格拉克或皮奥胡尔夫一出去攻打他们时，他们便立刻退回船上去了。这个侵略的结果，便是使海格拉克起了一种报复的运动。他也侵入法里士兰（Friesland）。虽然他把法里士兰很胜利的征服了，然当他快要班师回家时，却堕入一个埋伏的计中，很残酷的被杀害了。他的侄儿皮奥胡尔夫也遇到同样的阴谋，却仅以身免，当残留不多的基特军队到了家时，他们第一件事便是把海格拉克的尸体及他的武器一同葬了。同时，王后希特（Hygd）过度的悲哀着她勇敢的丈夫之死，心里又焦急着幼子登位，国内将不免扰乱，于是她召集了全个朝廷会议，要求让她的儿子退开了，请皮奥胡尔夫登极为王。对于这个提议大众很热心的欢呼着；因为百姓们觉得皮奥胡尔夫乃是他们的一个理想的王。但皮奥胡尔夫光

荣的拒绝了这个篡取他同宗的王位的计划，同时，即把海格拉克的幼子海特里特（Hardred）举坐在他的盾上，宣言他将终身保护并敬事这个幼主。百姓们感动了，也同声称言愿立誓拥护这个新王。

海特里特已登极为王，他的统治还算聪明而公允；但他的事业却为北角（North Ca-e）的发见者亚赛尔（Othere）之子所割短。这些少年们，原因反抗他们的父亲而逃到海特里特之朝中来的。但当海特里特劝告他们要与父亲重和时，亚赛尔的长子却忿怒起来！拔出刀来，把他杀死了。于是国王的从者之一委格拉夫（Wiglaf）便把他捉住处死。这事之后，亚赛尔的第二子，恐怕也要被杀，便逃走了。同时，国民聚会，公推皮奥胡尔夫为王。现在，王位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推让了；于是皮奥胡尔夫便只好做了基特王。他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去抵抗亚赛尔的第二子依特格尔士（Eadgiles）。依特格尔士这时已为瑞典王，于是带了一队武士要替他哥哥复仇。但他的这个报仇却终于无功，反丧失了他自己的性命。

经过了四十年比较和平的时代后，皮奥胡尔夫已经是很老的年纪了。他早年的精力已经离开了他，虽然他仍旧充满了勇气，然而他以前的力量却已没有了。正在这时，他的和平的心理又为一个喷烟吐火的巨龙的突然出现的消息所扰乱了。这个巨火龙住于基特近旁的山中，守护着巨量的金宝。这个可怕的火龙的存在乃为一个卑鄙的奴隶所发见。他有一天乘火龙的暂时外出，潜入龙洞中，偷带了一小部分的金宝去。当火龙回来时，发见了这个窃盗，它便大怒的咆吼着，群山为之震动，如地震一样。到了天黑时，它的愤怒还未消灭；它飞过地上，喷放着烟和火，把房子和宫殿都烧燃着了，使百姓们受了极大的损失，他们非常的恐怖着。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火龙的防御完全无效，便不敢去攻击它，

便都到皮奥胡尔夫那里，求他去救他们，如他从前之救丹麦人一样，去杀了这个比格林台尔还可怕的压迫者。这样的请求是不能不注意的，所以不管他自己的年老，皮奥胡尔夫又披戴了盔甲出去。他带了委格拉夫及其他十一个最勇猛的武士，出去寻求那火龙的洞，要求杀死了它。一到了山谷之口，无畏的皮奥胡尔夫便叫他的从者息在那里，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冒险进了火龙的洞。他勇敢的要引它出来，开始喊叫着。隔了一会，龙出来了，山震动着，它喷射着火焰，皮奥胡尔夫身穿着重甲，还觉得它的灼热的呼吸会透进去。

激烈的争斗，跟着开始了，隔了一会，皮奥胡尔夫的刀落下了，力量也没有了。于是火龙把它的长身绕围在老年的英雄身上，要想把他缢死了。这时，忠心的委格拉夫看见他主人的巨大危险，便跳向前去。这个第二次的攻击把火龙的注意分开了。它把皮奥胡尔夫从它的紧握中落下，而专注于它的新的敌人。于是皮奥胡尔夫恢复他自己，拔出他的短刀来，立刻把这龙的生命结果了。但是，唉！即使他的仇龙喷呼它的最后呼吸，那英雄他自己却柔弱的倒在地上了。他觉得自己的末路已近。他热烈的谢着委格拉夫的恰得其时的帮助，并快乐着那巨怪已死。委格拉夫悲戚的握着他的手，静听着，皮奥胡尔夫便命令他的从人把洞中藏宝都搬运出来，放在他的足边，使他的眼光可以饱看那他为他百姓们所取得的灿烂的金宝。最后全部的光彩的藏宝都由黑暗中取出而展放在这老战士的身旁了。那一大堆的金块与珠宝，在太阳的光中照耀着，如千百个星光，眩晕了所有注眼于它的人。一个满意的微笑现于将死的皮奥胡尔夫的唇上，当他见了那灿烂的宝堆时。如果他失掉了他的生命，他至少已经做了一件勇敢的行为，一件不仅使他百姓们有声光，而且还有物质上的富裕的行为了。一声微弱的叹息由他唇间吐出，这表示他是很满意的；那死

已经如他常常所希望的那样的死法一样的来临了。

同时战士们不知所措的站着，竭力要在他们亲爱的首领之前，隐藏其悲哀。皮奥胡尔夫看见他们的忧愁，鼓起最后的力量，以与他们说话。他以微弱而恳挚的语音对他们说，他之爱他们的全体，保存伟大的行为，维持他们种族的光荣，如此，基特人将仍旧为远近的人所知，为他们当作勇敢与忠心的象征。最后他表白了一个愿望，说要葬在一个高山上，可以从海上望得见的，这山将以他的名呼之。这些训言全都为悲感的人民所实行，他们把他的山装点以他所得到的金块，建立了一块纪念碑，以表示他们是如何的敬爱，他们的勇敢的王皮奥胡尔夫，他之死，乃是为了要从龙的毒焰中救出他们。

（原载 1928 年《文学周报》第 4 卷）

居 特 龙

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兰一世（Maximilian I）曾命令把许多古代国家的稿本再钞了几份保存着，这事对于后世很有大功。这些钞本放在维也纳的皇家图书馆里，有好几个世纪放在那里，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后来，乃为几个古代文学的爱好者所发见。虽然时代过去了许久，稿本还很有幸的保存得极好，他们激动了学者们的兴趣，因为他们有历史上的重要及文学上的价值。然而他们之真正价值到了现在方才为大家所公认。在这些稿本中，有一部史诗《居特龙》（Gudrun），是属于公元第十二或十三世纪的。这是很显明的，乃是由于很古的二三个史诗所编成的，这些古史诗现在都已散佚，但与《尼泊龙琪歌》却有些关系。现在唯一存在之稿本乃是德文的，然原诗大约是诺士文（Norse）的，因为这与《依达》（Edda）中的希尔特（Hilde）之被劫的故事是无疑的并行的。在《伊达》里，霍格尼（Högni）的女儿希尔特与她的情人希丁（Hedin）从家里一同逃出，为她愤怒的父亲所追。他在一个岛上把这一对情人追到了，在那里，流血的冲突开始了，在那里，许多的最勇敢的武士们战死了。然而，在每一夜中，一个男巫总要叫死者复生，在第二天重新开始争斗。这篇

诗，《居特龙》，大约是与《尼泊龙琪歌》同样的古旧，也几乎与它有同样的趣味，在古代的德国文学，这是最有价值的古物之一了。这诗共包含三十二个歌，在这三十二个歌中，叙述到海格林（Hegeling）的一个英雄之家的三代的历险。因此，这诗又常被称为“海格林传说”。

这诗开始时，告诉我们说，海根（Hagen）乃是爱尔兰王（这个爱尔兰乃是荷兰的一个地方，并非现在之爱尔兰）西格彭（Sigeband）的儿子。在一次的大宴中，当无数的宾客聚集于他母亲的周围时，这个王子，这时不过七岁，乃为一个大隼所掳捉，很迅急的飞走了。西格彭的武士追了去，一箭一箭的向大隼射去，但俱无用，这大隼只管向前飞去，完全不顾那孩子的哭喊与武士们的箭。它飞过山，飞过海，最后，把它的掳获物放在它的巢中，这巢乃筑在一个荒岛的一块大岩石之巅上的。在这里，有一只大隼的幼子，要把这个美味存着独自享受，便把这孩子衔在口中，飞到一只邻近的树上去。但这小隼所休栖的树枝却柔弱了，经不起两个东西的重载，便拍的一声断了。当这小隼一惊时，海根乃从它的口中落下，落到了一个棘林中。他没有被尖刺所伤，且还逃出了他的仇敌之口中；这真是万幸之事。于是海根很快的逃开了大隼所能得到的地方，而藏身于一个山洞中。他一到了洞里，却吃了一个大惊，原来在这洞中先已有了三个小女郎在着，她们也与海根一样，是由大隼的口中落下来的。

这三个小女郎，一个是希尔特（Hilde），是一个印度的公主；第二个是希尔堡（Hildburg），是葡萄牙国王之公主；第三个是回教的一个皇家之女儿。立刻，海根成了这三个小女郎的保护人了，他们一同在山洞中度过了几年的快乐的生活。只有一件事是使他们常觉苦恼的，就是他们觉得大隼们近来洞旁，为了惧怕他们，这几个孩子连一步也不敢离开洞口。仅只当他们听见了

大翼拍拍之声，知道他们的凶残之仇敌们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巢一会儿之时，海根才敢走出洞外，寻求食物。在这个寻食的时候，他习惯了用一个小弓，这弓是他自己摹仿从前他在父亲的大厅中所见的大弓而造的。年光过去了，海根和三个女郎仍旧还同住在洞中。渐渐的，得救的希望，从他们心中死了。每个人都不对别一个说他是如何的想家，然而他们却都一心一意的在希望再看见别的人类。他们常常愁闷的坐在一处，谈到旧时的事情，现在，时光是过去了许久，他们的这些旧事的记忆已经是很朦胧了。

后来，有一天，有一件希奇的事遇到了，他们的心，全都因突然的热切的希望而急跳着，他们的如此激动，乃因海根发见一个已死武士的尸体，全身都是盔甲包裹着，这个尸身乃是为海浪所冲上岸的。海根为狂喜所颤抖，从尸身上脱下了盔甲。他想望这一身盔甲已经很久很久了。然后，他不等到去拿武器，便穿了盔甲，跑去杀那些使四个孩子惊怕了许久的大隼们。经过了一阵激烈的争斗后，海根继续的把这些可怕的大隼都杀死了，然后他跑到洞中，告诉三位女郎以所发生的事。他们几乎不相信他们的幸福，现在他们是在岛中跑来跑去，从前他们是一步也不敢走的。他们的双眼光耀着，他们的双颊红润着，他们互相的说着，以为现在也许可以遇到一只过往的船，载他们重回故乡。然而他们是如此的常常的失望，竟使他们不敢希望他们在最近会得救。然而，没有多少时候，有一个白帆发见于前面朦胧的水平线上。他们一个个的都扬起声音而叫喊着，至于海根呢，他爬上了一个高岩之上，在那里用全力摇着手，大声的叫喊着。

最后，他们的呼喊浮泛于风中而到了水手们的耳中了。他们立刻把船驶近了。当他们走近时，他们惊怕的凝望着，因为他们看见那三个女郎，身上都裹着皮毛与草，正像女人鱼与林之女神。然而当他们听了他们的故事时，却很高兴的带他们到了船

上。他们四个人太快乐了，举步走进船，也不想一想这些人是朋友或是仇人。如此的，直到了船驶到大海中，小岛已看不见了时，海根才发见他是落在他父亲的仇人伯爵格拉地（Garadie）的手中了。现在，格拉地要想用他的权力把这少年王子当做奴隶看待。但海根是体格甚强的，又经这几年的苦难，益发的使他的力量与勇气都增进不少。这时，他便大怒起来，接连的，把船上的水手，一个一个的掷了三十个于海中；他的自命为主人的格拉地于是大大的恐慌起来，没口的答应把他及三个女郎载回他父亲的宫中。

当海根最后到了家时，他知道他父亲西格彭已经死了，却一个后嗣也没有。百姓们一闻海根到来，便热烈的欢迎他，奉他为王。海根即了王位之后，便娶了他在孤岛山洞中共患难数年的女郎之一，希尔特为妻。他们俩很快活，而海根的为王，又聪明，又勇敢，成了敌人们所惊怕的人，成为自己的百姓们所敬爱的人。即在战争的时候，他也表示出正直和仁厚的美德来，他从不攻击穷人及弱者。

过了几时，海根和希尔特生了一个女儿，这女儿便以她母亲的名字为名。当她长成时，她是如此的美丽，不久就有许多的求婚者到爱尔兰来要求娶她为妻。海根是十分的爱他女儿的，他并不想急急的与她分离，所以，为了要这事延搁了一会，他回答那些求婚的人，她年龄太少，还谈不到婚事；然而，当这句话被人驳回时，他又宣言道，谁要能把她父亲打败了时，希尔特才可嫁给他。现在，海根是那样的高大，那样的强壮，那样的以勇敢著名，于是他们都以为与他打仗是决不会得胜的。于是这些求婚者为这个难题所阻止，都渐渐的引退了。然而他们本也都是很勇敢的人。有几时，没有一个武士敢去向她父亲求娶希尔特的，海根心里异常的快乐。但渐渐的，她的美名却远传到德国的北方，海

格林人的国中，在那里，希德尔是他们的王。当希德尔听见对海的那个女郎如此美貌的故事时，他的心燃着要娶她为妻的热望，于是他心里踌躇着，想着如何可以取得她的方法。他不敢派一个使者，直直爽爽的说出求婚的事，生怕海根一怒便要把使臣杀了。希德尔不欲丧失他的任何武士，于是他决心把这个念头放下了，然而他心里的这个欲望却一天天的强了；到了后来，他的三个最忠心的从者，看出他们的王是如何的要求取得可爱的希尔特为妻，便站起来说，他们能够把她带了来，即使不得不用些诡计。于是他们出发了，这三个人是瓦特（Wat），荷兰特（Horant），法鲁特（Frute）。他们宣言，非把希尔特她自己带了来，他们便不再回来。

然而他们欲进海根的国境非改装不可，于是他们便把他们的船载了商货，把武器藏了，如此的，人家便将以他们为商人了。如此的，他们直把船驶进了海根的口岸。在那里，他们陈列他们带来的货物，邀请百姓们都来买。百姓们为他们的五光十色的货物所吸引着，成群结队的跑来看，不久的时候，一城中的人便都谈着那异乡的商人的事，并赞美着他们的商品了。渐渐的这些新闻传到了王后与公主的耳朵中了，她们便叫了商人们到她们面前，问他们是谁，从哪里来。三个人同声的说，他们乃是由希德尔王宫中被逐出的武士，所以他们不得不以售卖商品营生。为了要证明他们的话是真实的，瓦特便表演他的武技。当他把武技演过后，荷 兰特又说，他将唱一支歌给她们听。王后很高兴的允许了。荷兰特开始一唱，全体的人都无声无息的在静听他的美音。他唱完了一歌，又唱一歌。

这些柔和的歌声竟使少年的希尔特如此的娱悦。她不久又叫人去请那歌者来。荷尔特见她独自在着，便利用了这个机会，告诉她希德尔之恋念与心意。谦和的希尔特听着他说，直至他把这

个故事说完了。但在他没有说完时，她的心已为所胜了；当荷兰特要求她和他及他的同伴偕逃至海格林时，她竟很愿意的答应了。这三个假装的商人们，现在成就了他们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了，立刻匆匆的把他们余存的货物支配完了。他们然后邀请国王及王族到他们船上去参观。在这时，他们很机警的把公主藏了起来。王族回到宫中时，公主的不见却并未为他们所注意，等到国王发见了他的损失而暴怒着时，那船已经在海上走着了，他知道了被骗之后，愤怒竟不能忍。但是刀盾，威吓，与诅咒都已无用：他们，那些假装的商人，已经去得很远很远，不能追捉住了。

那些海格林人载了他们所得的赐品，那位美丽无比的公主，直驶到了荷兰的口岸，热望着的希德尔，已经在海口等待着来迎接他们了。他恳挚的抱着了这个美丽的少年新妇，她的可爱，比他所梦想的还要甚些。他们的匆促的结婚，立刻宣告了；结婚之后，他们打算第二天天色一亮，即开船回家。但当船只还没有上帆开驶时，希德尔惊觉到一大船的迅速如飞的到来。这是海根在追着他的被劫的女儿来了。海格林纷纷乱乱的在预备打仗。他们刚好预备得妥当时，海根便已怒冲冲的上了岸来了。没有一个武士较他更勇敢的。有好一会时候，这场战争很凶恶的进行着，最后海根把希德尔伤了，而他自己亦为瓦特所伤。那满心纷扰的公主希特尔，看见了这个结果，立刻飞奔的横梗在两个战围之中央；因她的哭着，祷求着，而他们遂复和了。海根已经试验了他新的女婿的勇敢，现在却允许他的女儿陪伴她的丈夫同回到海格林了。在那里，他们俩很快乐的生活着，生了个儿子奥特文(Ortwine)，一个女儿居特龙（Gudrun)，她比她母亲还要美丽。奥特文是为那个无畏的武士瓦特所带大的，他教导奥特文以异常精深的武技；而居特龙的教育则为她母亲希尔特她自己所教授。

时候过去了，居特龙从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美丽无比的妇人了，有许多的求婚者来求娶她。在许多求婚者中，有一个是西格弗里特（Siegfried），慕尔的国王，是一个杂种的异教徒；还有一个赫特莫（Hartmut），是诺曼国王鲁特威（Ludwig）的儿子；还有一个是海威格（Herwig），是谢兰（Zealand）的国王。虽然最后的一个求婚者海威格自己以为会得美丽的居特龙的宠顾，但希德尔也与对待别的求婚者一样，回答他说，他的女儿年龄还太少，不能离开父母。但海威格不是那末容易的把那女郎放下了的，他想着用一个计策把她得了来为新妇。他想起希德尔之得到妻子也是与她的父亲比比武力后才如愿的，所以他召集了一个军队，攻击希德尔的国土，与希德尔他自己相攻战，以显自己的武勇。居特龙从王宫的窗中，看见他们之面对面的作战，便高声恳求他们不要再打了，这两个人便都听了她的恳求而停战，因为希德尔自己很满意知道海威格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至于海威格他自己呢，本来是无意于要杀害他未来的岳父的。所以他们以放下他们的武器而和平的离开了来回答居特龙可怜的呼吁。在离别之前，希德尔给海威格以一个允许，须在一年之内，他将把居特龙嫁给了他。于是海威格心里充满了快乐与他的同伴们天天在城中游乐，直到了后来，他听见了慕尔王西格弗里特因妒忌他的求娶居特龙之成功而兴了大兵乘虚侵入他的国境之内，而他的国内这时是没有抵抗力的。

这些消息使勇敢的少年武士海威格不得不匆匆的和居特龙告别，立刻带兵回去了。同时希德尔也答应即刻去帮助他，一同抵御那侵略者，这个侵略者军队人数之多乃是远过于他的女婿的。当海威格为希德尔正如此的合力与西格弗里特的军队攻战，而其他的一个失望的求婚者赫特莫又乘机——当听见了他们二人都出战了之后——的侵入希德尔国境而把居特龙及她的侍女们都掳掠

到挪威去了。他仅在一个名为威尔潘莎（Wülpensand）的岛上小息了一会。王后希尔特看见她的爱女为赫特莫所掠去，心里如刀割似的痛苦着，立刻派一个使者去告诉希德尔及海威格以这个居特龙被掳的消息。这个消息立刻使他们的战事告了终止，西格弗里特也把他的军队加入了，一同去打那挪威人。于是他们拣选了一部军队，坐了几只船，立刻去追挪威人，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要这么快的动身的，希德尔，海威格及西格弗里特竭力的追他们，乃在挪威人未离开之前到了威尔潘莎，立刻来了一阵可怕的战争。在战役中，挪威王鲁特威杀死了那年老的希德尔。这次战事直到了夜色幕盖了一切方才终止，虽然海格林人只有几个生存着，而他们是如此的勇猛，还打算第二天再去战争。但在他们第二天起来时，发见在黑夜里，挪威人已经将他们和他们的掠掳物都上船驶开了回去了！且再也看不见一丝的踪影了！海格林人是如何的忿怒呀！

用这么少数的军队去追捉他们是完全无济于事的；所以海格林人忧愁的回了家，带了希德尔的生气已绝的尸体给那悲苦过度的希尔特。他们不知道第二件事将怎么办。在最后的一次战役中，他们的许多能征惯战的武士都已灭亡了，他们不敢再去打仗。所以他们无法可想，只得等待着他们的孩子们长成时再出去报仇雪恨。

同时，居特龙已经到了挪威，她坚决不肯嫁给赫特莫。在船上时，这个骄贵的公主曾勇敢的数说国王鲁特威曾一次为他父亲的臣仆过。这个话引起了鲁特威的异常的忿怒，他竟把居特龙举起抛到海中去了。但赫特莫立刻跳入海中，追在她后面把她救起了。当她已平安的再在船上时，他便责备他父亲匆躁的举动，以为她乃是他的新妇，他父亲不该如此的对待她，他爱她比一切都甚；他父亲如敢再动她一下，他将不顾一切而复仇了。经过了这

次的宣言后，没有一个人敢再待居特龙不恭敬了。当她登岸时，赫特莫的母亲格林达（Gerlinda）及他的姊妹奥特龙（Ortrun）都来欢迎她。但格林达的友好乃完全是假装的，因为她憎恨那骄傲的女郎，不肯回答她儿子的专心的爱情。于是她不久便劝她儿子把这个柔和的俘虏完全交给她管，说道，她将设法使居特龙答应为他的新妇。赫特莫这时正要出发去打仗，一点也没有疑心到他母亲的恶意，便求她母亲自由处置一切，且将居特龙交给她管。但一到赫特莫到了视线之外时，可怜的居特龙便被看待为一个仆役一样，以很粗暴的手段去对待她，常常真的毒打她。整整的有三个年头，居特龙沉默的忍受这个残酷。然后，赫特莫归来了，她又回复到她以前的地位。然而她仍旧拒绝他的热情的求婚。赫特莫为她的固执所灰心，又把居特龙交给他母亲去看管了。现在公主的工作比从前更艰苦了，她和她的一个喜爱的侍女海尔堡（Hildburg），也是一同掳来的，每天都到海岸上去洗王家的衣服。这是冬天，雪很厚的，铺在地上，居特龙和她的侍女，赤着足，又只穿着很薄的衣衫，受尽了说不出的寒冷之苦。并且，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也快要竭尽了，得救的希望，在过去十二年中天天想望着的，现在差不多完全熄灭了。然而她们的解放之期却已近在目前，而她们却不之知，因为当居特龙在海岸上洗衣服时，一个女人鱼，幻化为一只鹅，温和的泅近了她，对她说，现在要快乐着，因为她的受苦的日子已经快完了。

鹅女郎于是告诉她说，她的兄弟奥特文已经长成了，他不久将与勇敢的老瓦特及热望着的海威格同来救她。第二天，天气格外的冷，然而格林达还是粗暴的命那两个女郎到海岸上去洗衣服，除了一件粗布衣之外，不准她们再有什么别的穿著。居特龙和她的女侍很伤心的开始她们日常的工作，然而当时，却有一只小船驶近了岸，在船上的，他们认识是海威格和奥特文。他们起

初完全认不出她们，两个少年便向她访问居特龙之所在。她自己，要试试他们的感情，回答说，公主已经死了。她不让他们一看她的脸，直等到她看见海威格的感情兴奋到极点时，听见他说，他将直到死还忠心于她时：

> 高贵的海威格说道："一直到了我的终生，
> 我将为她悲苦；那女郎是要为我的妻子。"

于是居特龙才感到一阵异常的快乐，如电之一闪似的，她回转身来，把她自己与她情人相见了。

他们的相见之快乐，直不能想象得到，他们的心都狂跳着，海威格的强健的双臂紧抱着居特龙。同时，奥特文也是一样的快乐，因为他不仅寻见了他的姊姊，且还得到了他所久爱的她的侍女海尔堡，虽然他一向不曾把他的热情说出。然而现在，他把他的恋爱的事倾倒了出来，不久，便得到海尔堡的允许做他的妻。他们重会的过度的快乐过去后，便开始打算眼前要办的事。照海威格的意思，立刻便要把居特龙和海尔堡带走了；但奥特文却骄傲的宣言道，他将到那里，公开的要求她们的归还，把她们从挪威人那里光光荣荣的取了回来，用公主们的仪式，这不胜于偷偷的载走了她们么。于是，在他们答应她们两个女郎，将于第二天早晨再来救出她们之后，这两个少年便向她们告别而去。海尔堡还是照旧的做完了她的工作，但居特龙却把洗 的东西抛到海中去，空手的回到宫中，说道，她将不再做这种辛苦的工作了。格林达听见了她自认将洗的东西抛入海中，便命令仆人将她鞭打。但居特龙却回身对着她，骄傲的说，她将于明天报她的仇，且如王后似的坐在大宴的厅上。格林达听见了这话，还当她是要承认了赫特莫的求婚。于是她飞快的跑到她儿子那里，告诉他这个快

乐的消息。赫特莫在他的快乐中，渴要把居特龙抱着，但她拒绝了，叫他走开，不要理会一个不过洗洗衣服的女仆。赫特莫听了这话，异常的惊奇，便问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他才第一次晓得公主几年来所有的受到的苦楚。立刻他严令她的女侍们立刻要还给她，且所有她的命令都要服从，如她之已经做了王后一样，大家都要十分的尊敬她。这些命令立刻实行了。当赫特莫正忙着预备第二天的婚礼时，居特龙已复穿上了王家的衣饰，侍女如云似的跟着，她自己心里独守着得救的快乐。当第二天早晨刚发亮时，海尔堡从窗中看出，见城堡已完全为海格林的兵队所围困了。她还听见老瓦特高响的吹着他的角。这个意外的角声，使挪威人从快乐的梦中惊醒，他们不能去参预结婚的典礼，而只能出去打仗了。

我们可以预料的，那双方的战事是异常的猛勇而经了许久的。天井中高响着武士们的喊声和盾与盾，刀与刀的相碰声。战喊益益的高了高了，攻打益益的猛烈了。一个一个的勇士倒在地上，僵硬而无生气了。在这些人中，挪威国王鲁特威也是一个，他是被海威格所手杀的。在王宫中，居特龙是双眼睁睁的坐着，心中记念着那凶猛的战事的结果。正在这时，她忽为格林达的凶暴的手所捉，这个残酷的妇人要将她及她的女侍们都处死了，亏得赫特莫这时跑去救了她。海威格见居特龙几乎被杀，便大怒起来，冲过去与赫特莫相战。赫特莫勇敢的迎了上去，但他却不是海威特的对手，他便呻吟的倒在地上了。那时，如果海威格再过去斫了一下，他的敌人的生命便将永绝了，而正在其时，赫特莫的姊妹奥特龙跑过去恳求居特龙，要她赦了她兄弟的性命。她的要求使居特龙感动，她喜欢奥特龙，因为她一向对她很和爱。于是她由座位上站起，向海威格招呼着。海威格听了她的话，便抽回了刀，答应把赫特莫囚起来而不杀他。

现在，海格林人进了城堡开始去劫掠。渐渐的全城都覆没了。老瓦特跑进了王宫，见一人杀一人。妇人们现在惊骇万状，都围绕在居特龙四周，恳求她的保护。在这些妇人之中，奥特龙和格林达都在着。但居特龙却拼命保护着奥特龙，而让瓦特去杀格林达，因为她觉得格林达是值得如此的死法，以报她的所有的残虐。当这场残杀过去后，战胜者举行了一次大宴，以庆祝他们的胜利。在这次大宴里。居特龙真的如她昨日所夸口一样，坐在那里如一个王后。大宴过去后，海格林人又上船回家了。与他们同去的是救回的女郎们，得到的掠夺物，以及他们的俘虏赫特莫与奥特龙兄妹。他们不久便到了本国，上了岸时，王后希尔特的欢迎是如何的热烈呀！她再见她的女儿是如何的高兴呀！两个妇人沉默的互吻着，紧紧的互抱着，好像她们永不再分开一样。

海威格的功业正为百姓们所颂赞，而他们婚礼便举行了。居特龙嫁了她忠心的海威格，奥特文娶了海尔堡，西格弗里特没有得到居特龙，便以娶了美丽的奥特龙为自慰。至于赫特莫呢，他也娶了海威格的妹妹海加尔特（Hergart）为妻；这个结婚，不仅使他恢复了自由，且复得了他的国。在这个绝盛大的宴会中，荷兰特年纪虽老，却还没有失掉他音乐的技能；他奏着结婚歌，奏得那样的好，使女后们都感动了。她们把王冠都奉给了他，但这个诗人却微笑的拒绝了这个赐品，因为他说道，王冠是要毁灭的，但诗人的歌声却是永久的。于是，他拿起了他的提琴，唱道：

“美貌的王后们，我求你们把他们（王冠）戴着，直到了你们的发白了时；这些王冠呀，唉！是要毁去的，但歌声却将永生着。”

百姓们听了他的话，也喝采了很大；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老诗人的话是真实的。真的，诗歌是永生的！

（原载1928年《文学周报》第4卷）

郎歌巴系传说

下面故事里神话英雄大都是有些历史的根据的，然而他们乃为中世纪歌人的幻想所点饰，且常常不顾时代的先后与历史上的事实，于是那事实的中心便很不容易找寻了。这故事的发生，大约是所写的事实还要古远的。他们是记载在《英雄之书》"Heldenbuch," or "Book of Heroes" 中的。这部《英雄之书》乃在十五世纪时为尔安（Kaspar von der Rhon）所编定的；尔安的材料的来源乃为十二世纪时何尔弗兰（Wolfram von Eschenback）及亨利契（Heinrich von Ofterdingen）二人所搜集的结果。而其实际的来源，比此时还古，试举一个例，如"奥特尼特"（Ortnit）一诗便为大家所知，在第九世纪时即已存在的。

据中世纪的诗人们说，琪辟特（Gepidae）人和郎歌巴（Langobaro）人都住在巴诺尼亚（Pannonia 即今之匈牙利及其邻近诸地）；琪辟特人之王是苏里森（Thurisind），郎歌巴人的王是奥杜英（Audoin）。这两个国王的儿子们，某一次因细故而争吵起来，不久，便决斗了一场，结果是郎歌巴的太子，杀了他的对手，取了他的武器，很骄傲的回家。但他虽然得了胜利，却还不能参预于他父亲诸武士之列，他父亲奥杜英严重的告诉他说，一

个少年不能坐在久征惯战的武士之列，除非有什么外国的王，给了他全套的武装以宠异他。太子阿尔波英（Alboin）为他父亲当众人之前教训了他一顿，非常的忿怒，便跑出了他父亲的大殿，决意要到苏里辛的宫中，向他求这一套衣甲武器。当琪辟特王看见杀他儿子的凶手勇敢的进了他的宫殿时，他的第一念便欲把他置之于死地。但因为敬重那待客之道德，不欲立刻复仇，且还依当时风俗，当他第二天动身时送了一副衣甲给他。然而他警告阿尔波英说，他不要再来，不然，他便要送命在武士们之手中了。如此的，阿尔波英上马而去，带了他所要的武器，还有别的宝物而去；这个宝物之被窃，国王却完全没有起疑心的。这乃是小洛莎莫（Rosamund），苏里辛的美丽女儿的景像，他立誓，当她一到了结婚年龄时，他便要娶她为妻。如此，阿尔波英傲慢的再进他父亲的大殿，放下了他所带来的衣甲武器。郎歌巴人很快活的站了起来，承认他是一个有资格的武士。并且，不久之后，他父亲死了，他们便奉他为王。

当阿尔波英即位之后不久，琪辟特人与郎歌巴人之间起了一场争吵，结果是双方宣战。激烈的战争开始了，当战事告终时，苏里辛和他的儿子是被杀了，他们的土地是全为战胜者所占领了。郎 歌巴王真是天生的残忍，他把杀死的琪辟特人之头颅，当做了饮具，每逢有大宴会时便取出宴客。然后，阿尔波英取来了他的新土地和那位眼泪满脸的少女洛莎莫，他强迫她做了他的妻，虽然她见了这位杀她全族及压迫她人民的人而不由得恐怖的退后了。然而她是无力抵抗的，所以只好跟了他回去，藏起了她的眼泪；虽然她永远是不快活着，然而她却百依百顺她丈夫，他意中遂以为她乃是忠心无二的妻。他有一天，从一次大战得了胜利回来，且占据了意大利北部的一省，便要把她父亲的头颅倒满了酒，且要她从这个奇杯中喝第一口的酒。他以为她平常服从他

惯了的，这一次也不注意的如此命令她。

王后踌躇着，但为阿尔波英的有凶光的眼所慑，及见他的要举起打她的有力的手，便颤栗的倒满了那杯酒，举杯到她的唇间。但这一次却不把它谦恭的献给国王，反而愤怒的倒在地上，离开了大殿，说道，虽然她从前服从了他，现在将不再和他住在一处做他的妻子。——这个宣言使武士们都私自高兴着，因为大家本都以为国王待他美丽的后未免太残刻了。

当阿尔波英正在想着设法和她重好而又不丧失自己的威风时，洛莎莫却召了国王的持盾者希尔米琪士（Helmigis）来，见他不肯奉她的命令于睡中暗杀了他主人时，她又把这个暗杀事件交给了巨人辟里特士（Perideus）去办。辟里特士并不踌躇的服从了她的命令，不久，便真的结果了他主人的性命。这个悲剧的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他的人民们本来便很憎恶这个专制之王的。至于洛莎莫她自己呢，她当然的是很高兴的除开了这样可厌的一个王了。她于是设法保全她的王后的地位，召集她的武士，得到了王库的财宝，她便开始临朝听政了。但隔了不久，贵族们却要她选择一个男人，继阿尔波英为王，因为他没有留下一个儿女。于是她宣言她将嫁给希尔米琪士。

郎歌巴的贵族们愤怒的不肯承认一个执盾者为他们的王。于是洛莎莫怕他们要暴动，便带了她的财宝，乘夜逃走了。她逃到东方皇帝的总督郎琪纳（Longinus）那里，求他的庇护。他震于王后的美貌及她的无数的财宝，便设计要她毒死了希尔米琪士而嫁给他。洛莎莫已经厌倦了希尔米琪士，便听了他的话，把盛毒药的杯送给那个忠心的崇拜者喝。但当他喝了一半时，便觉得他是被毒了，于是刀尖逼她也把其余的一半喝了下去，于是他们二人遂同死了。郎琪纳虽没有得到美妻，却以占有了她的财宝自慰。这时，郎歌巴人，经了几个国王之后，最后乃为一个国王洛

曹（Rother）所统辖，他乃是最后的一个有力的王；在公元七百七十四年时，这个国便为查利曼大帝（Charlemagne）所征服了。

洛曹建都于巴里（Bari），是一个大海口。但他的财宝虽然无数，他的国土虽然广漠，而他却不快乐，因为他没有妻也没有儿子。他的朝臣之一巴契曹（Berchther）见他的孤寂无欢，便劝他去寻一个妻。洛曹答道，他不曾听见一个美丽的公主足以匹配他的。巴契曹听见了这话，便取出东方皇帝君士坦丁的女儿奥达（Oda）的图相来。洛曹一见了这个美像，便决心要取她为妻。巴契曹警告他说皇帝脾气很坏，常要杀了他女儿的求婚者；然而洛曹却不为之动。经了再三的劝说，他才允许，自己不去而差了一班十二个使臣去。但当洛曹问他们谁要奉行这个差使时，所有的武士们却都沉默不言。这使洛曹很诧异。到了后来，巴契曹的儿子中，有七个答应去——他有十二个儿子——还有五个贵族也愿意去。

洛曹送了他们到海边，他还作了一首歌，他叫他们记住这歌，又说，当他们听见了这歌时，他们的王一定是在很近的地方了。使臣们一到了君士坦丁，说明他们的任务后，立刻被皇帝囚入了狱中，虽然皇后求情也无用。这里洛曹在不耐烦的等着他们之归来，却不料他们乃在狱中受苦。一年过去了，什么消息都没有，他决定自己改装到君士坦丁去，一面打听使臣们的下落，一面也要得到美丽的公主奥达做他的妻。巴契曹见他执意要去，也立刻要跟了去，还有别的武士们也要求这个任务，因为他们全都爱他们的王洛曹，然而洛曹却怕此行有危险只拣取了几个最强勇的，其中有一个奥史彭（Osborn,）乃是北方的巨人之王，也带了他的最高大的十一个人同去。

洛曹带了一小队的人马直到了阳光满照的都城君士坦丁。当他们的船一路的驶着时，国王坐在甲板上，用琴弹着美调，连女

人鱼也由深海中浮出来跳跃着。照着预定的计划，国王在君士坦丁假作是一个逃人，尽力的诅骂着郎歌巴王，说他把他及他的同伴都逐出了王宫。君士坦丁见了这些客人之到来，心里很高兴，答应给他们事情做，且备宴给他们吃。在宴席中，他不经意的描写他怎么的对待洛曹的使臣，并说，他们现在还囚禁在狱中。这个夸口的谈话，引起了巨人奥史彭的仇怒，他是不会矫藏他的情绪的；当国王驯养的母狮子进了大厅，要在他掌上吃给它的一块肉时，他不意的立了起来，把这狮子捉住了，向墙一掼，立刻把它杀死了。君士坦丁看见他新收的巨仆有那末大的力量，却有些诧异。但他很聪明的并不责备奥史彭的妄杀。当宴会过去，他叫洛曹带了他的同伴，到已经预备好的住房中去。到了第二天一早，郎歌巴王很弘量的分散了许多带来的珍宝给大家，因此在宫廷中得了不少的帮助者。他们尽力的称颂他，最后，连公主奥达也听见了，她十分的要见这个有名的逃人。

她的好奇心竟一天天的扩大了，最后叫她的贴身女仆希尔林(Herlind)秘密到洛曹那里，叫他去见她。这位女仆很聪明的传达了她的命令，却并没有得到她所预料着的回答。因为郎歌巴王假装着十分尊敬，说他不敢去见她的美丽的主人，然而他却托希尔林送了不少的珍宝给她，其中有两只鞋，一只是金的，一只是银的。希尔林把这些赠品奉给了她的主人。奥达急于要穿那鞋子，却发见这两只鞋乃是适于同一只足的。于是她假装着生气，要她的女仆，立刻命她父亲的新仆人进来见她，并带了那一只足的鞋来，不然，他便要触她的怒了。这正是他所等候着。于是洛曹进了公主的房中，说了许多谦恭及道歉的话，然后奉上了一只金鞋，穿在她的纤小的足上。乘这个机会，他屈膝于她之前，说明他的恋爱及他的真相，遂得了奥达的允许，将做他的妻。如此，二人度了好几点钟美满的光阴，互谈着他们的爱情。在洛曹

离开了房间之前，他还请她用她的力量，救他的使臣出狱。于是她便去告诉她的父亲说，她曾做了一个恶梦，天神示警于她，说，非将洛曹的使臣释放出狱，好好的看待他们，她便将遇到恶运。国王立刻答应了释放他们出来，当夜便宴请了他们一顿。当他们正坐在那里时，洛曹进了大厅，藏身于挂毡之后，奏着他们临别时所奏的歌调。这个歌声在大厅中响着，他们心里非常的快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国王已经来了，他们不久便可释放归去了。

几天过去之后，君士坦丁忽然被巴比伦王伊米洛特(Imelot)将与他宣战的消息所惊骇。他心里激动着，计划着怎样去抵御这个人人所怕的强敌。洛曹乘机进言，他将为国王去御敌，并说，如果君士坦丁能释放了郎歌巴的使臣们，他相信一定可以得胜的，因为他们都是有勇力的人。皇帝很高兴的听他的话，立刻释放了使臣们，和他们及洛曹一同出发了。有一夜，二军迫近了，他们相对而驻营，预备天明时开始战争。然而在夜中时，洛曹和他的同伴们却偷进了敌人的中营，杀死了依米洛特的卫兵，而把这个王缚了起来，由奥史彭负了他出营，而洛曹和其他的人们则把巴比伦人所有的主力都蹂躏了。他们于几点钟之后，得了全胜的回到了君士坦丁营中，躺下了休息着。不久，朝阳红红的升在东方了，皇帝进了郎歌巴所住的营中，责备他们的懒惰。但当他的话一说出口时，他的眼立刻见了被掳的伊米洛特，他惊奇着，问他如何会到这里来。他们便告诉他们夜间的工作。他又惊又喜的答应洛曹他们先到君士坦丁宣布这个胜利的消息。至于他和他的军队则前去侵略巴比伦全土并且劫掠了伊米洛特的弘富的宝库回来。

洛曹和他的同伴们匆匆的到了君士坦丁，冲进了王宫。但他们却不说是战胜，却告诉了皇后和奥达，说君士坦丁打败了，伊

米洛特正要带兵来围城，并说皇帝叫他们先来把他的妻和女儿及财宝都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皇后和公主满心的惊怕着，立刻预备着要逃走。不久，他们便到洛曹停船的码头。他立刻命令预备开船。一面他却先令公主上去，而把皇后留在岸上，答应第二次再来带她。然而当她一上去，船却立刻开了。洛曹对皇后说道：他所以骗她，是为了要带了公主回去；她现在是郎歌巴的王后了。

君士坦丁一回家，天然的是十分恼怒于他的被骗；他设法要夺回他所深爱的女儿，然而他想不出一个妥善的方法。后来，有一个魔术者来了，他说，可以把公主取回。皇帝便十分高兴的为他预备了一只船到巴里去。魔术家去后，国王天天在焦急，在切望着。这个术士到了巴里，假装为一个商人，陈列他的货物要人来参观。他的五光十色的奇货，立刻引起了许多买者。他用很巧秘的方法，探听出洛曹不在宫中，只有奥达一个在着，有许多的武士保护着她。他还打听出，这些武士之中，有一个武士有一个跛足的孩子。这个术士便告诉来船买物的人说，他所有的珍宝之中，最可宝贵的乃是一块魔石，这块石放在王后的手中，有医好跛足者的力量。不久，这块魔石的可惊的功效，传到宫中了。这些武士们劝说仁心的后到船上去试验魔石的效力。术士的心跳着，当他见王后走近船时，他叫船上的人预备随时可以开船。真是想不到的，奥达的足一踏上船，那船便飞快的开去了。这船向前走着，不久，便回到了她父亲的宫中。他们是十分的热烈而快乐的欢迎她。至于洛曹呢，当他由战场上回来一听见这个消息时，他的心便充满了灰暗的失望。立刻他预备了一只船，拣了他的巨人及最勇敢的贵族陪他去追王后。他们第二次又到了君士坦丁了。洛曹叫他的兵士们藏在密林中，他自己则假装为一个朝陵者而进了城，在他的长袍之下，藏着一个猎角。当他在危险时，

他便把这角一吹，召集他们来救护。他一进城，便看出百性们的惊骇之状。他问他们所以忧苦之故，他们答道，伊米洛特由狱中逃了回来，又侵入君士坦丁国境，立誓非君士坦丁允许把奥达立刻嫁给他的一个驼背儿子为妻，他决不肯罢兵休战。

这个消息使洛曹进了王宫，因为他是改装的，所以很容易的进了宫门。他乘人不注意的走到他妻子的身旁，他把一个戒指落在她旁边一个杯中，那个戒指是刻有他的名字。奥达立刻认识了这个东西，正设法要把它藏起来，却已为坐在她身旁的驼背的求婚者所看见了。他指出这个闯入者，说他就是洛曹改装的，叫他卫队们捉住了，把他杀了。洛曹见他被发见了，便勇敢的向前说道，他是要回他的妻，且还要与驼背比武的。他的怯懦的对手，却只反复的传说他的命令，并和他的卫队一同押了洛曹到城外去斩首。正当他们要把刀放在洛曹颈上时，他取出藏在长袍之下的角，响亮的吹了一下。

这一声角，效果却很神奇。立刻他的从人们由林莽中跳出，把卫士们都杀死，更杀死了依米洛特和那个驼背，于是遂复把奥达得到了。然后，他们都上了船，胜利的再回到郎歌巴的王宫。在这里，奥达生了一个女儿，名为希尔加（Herka），她长成后，以美貌著名于世，嫁给了匈牙利王依特塞尔（一名 Attila），为妻。

还有一个有名的郎歌巴王名为奥特尼特（Ortnit），他的国土不仅占有了意大利全部，由阿尔卑斯山到海，且还占有了西西利岛。他得到这些国土乃是由于他的惊人的神力。据说，他的力量，有十二个大力的人那么多。然而不管这一切外面的资产如何的多，奥特尼特却是寂寞而不快活的。事情是如此的发生。有一天，当他于夕阳西没之时，到海滨散步时，他看见有一座如云雾似的城堡渐渐由波涛中涌出。在这城堡的最高塔上，他看见一个

美丽的女郎在着，他一看，便深爱了她。正当他入魔似的注目于这个少女的美貌时，城堡与女郎却突然的同时消失了。奥特尼特诧异着，不知这个幻像是什么意思，便去问他的叔叔依里阿士(Elias)，鲁森（Reussen）的国王，求他解释出来。由他叔叔的解释，他知道，那个城堡乃是强固的曼泰堡（Muntabure）的重形，那个女郎乃是叙利亚王的女儿，公主西特拉（Sidrat）的幻像；这一切都是他叔叔由魔神莫加那（Morgana）的好意而看到的。奥特尼特听见这话，立刻宣誓说，他要去求这个女郎为妻，虽然他的叔叔警告他说，马科里尔（Machorell），女郎的父亲，常将所有他女儿的求婚者都斫了头，而用他们的头颅作为他炮台里的装饰品，然而这位少年的王仍是决心要去。

现在，他忙的是探问旅程了，他预备了所有长期海行的设备。同时，他的母亲，怕他此行有什么危险，想尽了方法去阻止她儿子的志向。但无论她怎么劝说，都不能改变了他的决心，她只好随他去了，而她的第二步，却是焦急的怎样可以帮助奥特尼特，使他平安的归来。于是她取出一个戒指，套在他手上，告诉他说，骑马出了城外，向某方面去，在一株菩提树下，下了马，在那里便将有奇事可见，并可得到一副强固的衣甲。

奥特尼特心里充满了好奇心，不知这神奇的事是什么，便遵了她的话，骑了马去寻那菩提树。寻到了这树，他在一个似乎十分熟悉的地方下了马。然后，探问似的四面望着，他看见面前有一个可爱的熟睡的小婴孩。但当他想把这婴孩搂入臂间时，他却被婴孩的小掌一打，立刻伏在地上了。他惊骇这个不意的倾跌，便伸手去捕捉他的小敌人，这一场扭打是最奇异的，一个是高大的战士，一个却似柔弱无力的婴孩。然而这个婴孩却不是容易打胜的；经了许多的战争，奥特尼特用了全身的力，才能把这个小敌人捉住了。这个婴孩见已被他的有力的手所捉，挣扎不脱，便

自认说，他是矮人之王，阿尔葆里契（Alberich）。然后，他说，如果奥特尼特把他释放了，他将送给他一副神奇的盔甲，一把名为洛森（Rosen）的刀，因为都是在龙血中浴洗过的，所以不为刀枪所伤。国王答应了这个条件，把手一松。但他这善意却错了，因为当他放了矮人时，这矮人却把他母亲给他的戒指，由他手上拔了去，且眼见他神秘的突然跑入荫影中不见了。他的声音一时在这里，一时在那里。在矮人把戒指归还他之前，他们商量着条件；但当他一见到他的敌人时，那戒指却已复放在他手上了。

阿尔葆里契于是正言厉色的告诉奥特尼特说，他的身体虽小如婴孩，他的年龄却已很老了，他已活过五百年以上。然后，矮人又告诉他说，那个国王，他所认为父亲的，乃不是他的真父亲，因为他曾秘密的把他的妻离婚了，而将她给与阿尔葆里契结婚，因此矮人乃是奥特尼特的真父。现在，他声明要认了他们父子的关系，且答应随时保护他儿子。奥特尼特很高兴的接受了矮人所许的衣甲及洛森刀，并没有完全领悟矮人所说的话。阿尔葆里契并指点他说，如果他有需要他父亲的帮助时，只要把戒指一转，他便来了，他把话说完，便不见了。奥特尼特回到了城中，心里还是迷惑而扰乱着，他告诉母亲说，他已见到他的父亲。这并不使她惊骇，因为她早已料到事情是要如此发生的。于是他上船告别他母亲而去。船到了梯尔（Tyre）的口岸，奥特尼特化装为商人，陈列他的新奇的货物给百姓们看。同时，矮人阿尔葆里契却应了他儿子的要求，带了一个宣战的信给马科里尔，恐吓他说，他如果不把女儿嫁了奥特尼特，他便要来攻取曼泰葆了。矮人光荣的传达了他的任务，当马科里尔轻蔑的斥退了他时，他匆匆的回到梯尔，叫奥特尼特即刻占据了这座城。奥特尼特听了他的话，果然成了梯尔城之主人，然后，带了兵围困了曼泰葆。他

的魔术戒指，在这次战役中对于他有极伟大的功效，因为他的战士一受伤，他便可用这戒指把他们救活。阿尔葆里契是除了国王奥特尼特外，别人都看不见他的，他却引导着先锋队，执着大旗，那旗仿佛是无人执持而自能飞扬于空中似的。并且，矮人因为人家看不见他便乘机上了敌城，把抛掷石头，弓箭及沸油的机械弄坏了。他的帮助，对于奥特尼特是有大功的；同时，奥特尼特的武力也很惊人，做出了好几件前所未闻的勇武的行为，渐渐的引起了公主西特拉之赞美，她这时正从她的塔上向下望着他。

阿尔葆里契见了她的喜悦之意，便偷到了她的肘下，在她耳边低语说，如果她要见那个英雄，她可于明天早晨到便门去。公主没有给他确切的答复，然而在她眼中的光看来，她似已默应了。所以奥特尼特第二天一早心里便因希望与激动而跳着，匆匆的到了约会之所。渐渐的在晨雾之中，他见可爱的西特拉来了。奥特尼特热烈的说到他的爱念，并劝她同逃，她为他的雄辩所动，答应了，跟他同到郎歌巴。她在这里，成了他的爱后。后来，改奉了基督教，受了洗礼，改名为丽巴格（Liebgart），自此，她遂以此名著于世。

奥特尼特与丽巴格是这样深挚的互爱着，他们的快乐几乎要满溢出来了。只有一件事，使这柔和的公主心里不安，那就是她丈夫与她父亲的敌视。但不久，这个微云似乎也移去了，因为一个巨人和他的妻为国王马科里尔派遣到郎歌巴来，要求与他重和，并答应说，国王将在明年早春来看他的女儿。他们还带了无数的珍宝来，其中有两个巨蛋。据巨人们说，这蛋是无价之宝，从其中可以浮出两只魔蛙来，蛙头上有吸铁石。丽巴格的好奇心天然为这个赐品所引起；并听见巨人夫妻说，他们将担任孵蛋之事，只要有一个适宜的地方。于是，她把他们送到一个山口，在特伦特（Trient）的左近，那里天气是又温又湿，正适合于孵蛋

之用。

时候过去了，女巨人鲁奥兹（Ruotze）从巨蛋孵出的乃不是蛙而是两条小龙。这两条动物长得可惊奇的状。不久，这省的总督便派人对国王说，他们不能再预备充足的食物给巨龙们吃了，这些龙已成了那里的大患。以后，他们还见两个巨人也不得不飞快的逃生去了。当奥特尼特听说平常的武器是不能杀害那龙的，他便知道能除这大害的，只有他一个人。于是他穿了魔甲，执了洛森刀，温柔的对丽巴格告别，并告诉她说，如果他不回来了，她不可嫁给别人，只可嫁给一个戴了他戒指的人。然后，在全个朝廷的悲苦之中，这勇敢之王出去杀那些龙以救百姓们之苦了。

奥特尼特经了长途跋涉之后，到了巨龙们所在的山中了。巨人们妻阻止他的前进，但他一刀把他们的头都斫了下来。他在这时很诧异的又遇到了矮人，阿尔葆里契，矮人警告他说，他将为这些龙而牺牲；他们又生了不少小龙出来，将为全个欧洲的祸患，但这是定数如此。

不管这些警告，奥特尼特宣言，他将为百姓们除害，尽他的力做去；于是把那魔术戒指还了阿尔葆里契之后，他又向前走了。他在森林中一天，都不能寻见巨龙们，后来，他倦睡于一株树下。这一睡，便不能再醒了，虽他的狗狂吠着，也不能惊醒了他。于是那可怕的龙偷偷的向前而来。这巨怪突然的冲向前去，把熟睡的王捉住，向岩上一掼，他全身的骨都粉碎了，只有魔甲还是完全的。以后，巨龙便把尸身运进洞中给小龙们吃。然而这些可怕的动物却吃不到国王的尸肉；那不可毁伤的衣甲能够抵御住一切它们的力量。

同时，丽巴格却焦急的等候她亲爱的丈夫的归来，恐怖的在一天一天的计算着过去的日子。但当她看见他的狗偷进了宫中，她便悲苦的晓得奥特尼特是死了。她终日的悲哭着，叫着“奥特

尼特,”“奥特尼特!”全国的百姓们都和她同悲着。隔了一时,因为奥特尼特无子,贵族们便围绕于王后之侧,求她下嫁给他们中之一人,把他做了郎歌巴王。然而她总是拒绝了他们的求婚。他们恼怒她的反抗,便把她的财宝,她的宫殿,她的国家都取了去,而留下了可怜的丽巴格穷苦的以织布为生。一年一年慢慢的过去了,但她还等候着奥特尼特所说的武士之到来,他将戴了那魔戒指而来,且由了他,她将复为郎歌巴的王后。

(原载1928年《文学周报》第4卷)

尼泊龙琪歌(一)

德国的最大史诗，无疑的，乃是称为《尼泊龙琪歌》（The Nibelungenlied）的一篇古歌。虽然关于这部伟大的弘美的作品，其真正的作家没有人知道是谁，然大家都以为这部史诗的现在形式乃为一个奥大利的行吟诗人古伦堡（Von Kürenberg）或一个德国诗人奥夫脱丁根（Von Ofterdingen）所编定的，大约其编定之时间，乃在公元一二一〇年之前；所谓一二一〇年，乃是现在这部史诗的最古稿本的日子。据研究德国古文学的专门学者的考察，《尼泊龙琪歌》乃系由古代久已存在之许多歌所合编成的，这些歌共分为五个神话的系，但全都有多少关系于尼泊龙的大宝库。在这些神话系中之一个，乃是北欧的《瓦尔松加传说》（Voslunga Saga）在那里，西格尔特（Sigurd），居特龙（Gudrun），公那尔（Gunnar,）霍格尼（Högni）及阿特里（Atli）乃是主要的人物，恰恰与《尼泊龙琪歌》中的西格弗里特（Siegfried），克林希尔特（Kriemhild），公曹（Gunther），海根（Hagen）及依特赛尔（Etzel）诸主要的人物相应。这部史诗的大略故事，如下：

葆根台（Burgundy）的国王邓克拉特（Dankrat）和他的后

乌特（Ute）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是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是公曹、琪诺特（Geront）及乾赛尔合（Giselher），女的是美丽的克林希尔特。当国王死了时，他的长子公曹即了王位。他治国很聪明而公允，他的都城瓦尔摩士（Worms,）在来因河旁，是很发达的。

克林希尔特依照着当时的习惯，住在王宫中，过着和平而幽隔的生活，几乎没有离过她母亲的王宫与保护。但有一夜，她的向来和平安稳的睡眠却为一场恐怖的梦所惊醒了。当她醒时，便匆匆的到她母亲跟前，把她的恐怖告诉了她，因为她知道她母亲乌特是精于魔术与详梦的，她希望她能给她以一个满意的答复，因此，安慰了她的不安。在她的幻梦中，公主仿佛她自己驯养一只少壮的鹰，她用仔细的注意与爱情去养它。后来，有一天，有两只大鹰突然的出现，飞落了下来，把这少壮的鹰带了去，不见了。她母亲听了她的梦，摇摇头，详解道，少壮的鹰一定是一个太子，她将与他结婚的，至于其他两只鹰乃是两个谋杀者，将把她爱人杀死的。这个解释，更使克林希尔特加上了一层忧虑，她决心的说道，她情愿把结婚的快乐都不要了，却不欲悲戚的见一个亲爱少年丈夫之死。

在这个时候，来因河的下流，尼曹兰国（Netherlands）乃为西格莫特（Slegmund）与西格林特（Siegelind）所统治；这一对王和后所最足以骄傲别人的乃是他们的独生子，少年的西格弗里特，他已经到了成人的时代。为了庆祝他的武技的成功，国王举行了一次大宴，国内所有知名的武士都来了，他们比赛武力，其中以王子西格弗里特为最得胜利。这宴会继续了好几天，后来，宾客们告辞了，一个个都满载着王和后给他们的东西而归。因为王和后看见他们儿子如此的成功，喜欢得连把全个王宫的财宝都给了人也是愿意的。当大宴过去之后，西格弗里特便去告诉他父

母说，听见葆公台的公主，克林希尔特是如何如何的美丽，他必须得到她为妻，心里才满足。父母无论如何劝他平静的住在家中，都劝不住；西格弗里特一心只想着到葆公台去。最后，他父母答应了他，带了十一个仆人，穿了最富丽的衣服而去。在第七天他便到了委尔摩士。

这样富丽的一群客人之来到，引起了公曹全体人民之注意，他们跑出去迎接他们，助他们下了马。立刻西格弗里特要求他们引他去见国王；同时，国王便问他的叔叔海根，这些客人的姓名和地位。海根由大厅的窗中看出去，说道，那一个领袖一定是西格弗里特，这个武士曾杀了尼泊龙琪宝库的主者，而把它占为己有；还有一件幻术的云衣，穿了起来，凡眼便不能看见他。他还说道，这个西格弗里特是尼泊龙琪土地的主人，曾杀了一只可怕的龙，他浴在这龙的血里，使他的身体不为刀枪所伤。于是他劝告公曹要很客气的招待他。如此有名的一个勇士之来到，使公曹心里充满了激动之情，出去迎接他，并客客气气问他这次来访的原因。西格弗里特答说，他要来和葆公台人比比武力。公曹知道他的力量，又没有一个武士前去与他比武，便率了他的兄弟们异常谦恭的把西格弗里特的武器取了下来。如此的，西格弗里特在公曹的宫中住了一年，常常展施他的各种武技。

在这一年中，他没有看见美丽的女郎克林希尔特一眼；然而她却从王宫的窗格之后，私自赞美他的力量和秀美。但最后，有一天到了，一个使者匆匆的跑来报告说，萨克森王鲁特格（Ludeger）和丹麦王鲁台加士特（Ludegast）快要联兵来攻略葆公台了。公曹心中十分的忧闷，因为他知道这两国是以武士之多与勇敢著名的。这时，海根便走了出来，提议说，西格弗里特住在王宫中这许久，无疑的他是要帮助他们的。公曹便恳切的向西格弗里特问他愿意帮助他们否。西格弗里特的回答又简短又坚

决。他说，如果公曹给他一千个勇士，他便可以去打退这些敌人了。公曹异常快乐的拣选了一队军士，其中，他的兄弟们，海根及他的兄弟们都在其内。于是西格弗里特便告别而出发了。

然后这一队小小的军士，只有一千个人的，很勇敢的由委尔摩士而到了进了萨克森地域。在那里，他们遇见了敌人，人数不下二百，都是勇猛的战士。战事立刻开始，每一个武士都很勇敢的战着，而没有一个人有西格弗里特那末神奇的，他不仅把两国的国王都捉了来，还击散了他们的军队，带了无数的财宝与俘虏而回到委尔摩士。同时，一个使者先到朝中报信。公主克林希尔特却私自叫了他到她身边来，问他西格弗里特的消息；听到了她的英雄不仅得胜而且没有受伤时，她便异常快慰，赐了不少东西给那个使者。

街上人声喧哗，都说着战胜的消息及武士们之将归来。克林希尔特热切的跑到窗口，她在那里，可以看见她的英雄得胜而归且听见百姓们的欢呼之声。伤者看护起来，囚来的两个国王好好的看待着，不久，便释了他们回去；盛大的酒宴终日陈设着以庆贺这次光荣的胜利。在许多游戏中，有竞技的一项，全个宫中的王后公主及女侍们都来临了。在这里，西格弗里特是第一次看见了克林希尔特，当他一见了她，他的热情更沸得高了，因为她的美丽比他所设想的还甚些，“如月之升似的，使一切星辰都暗然无光。”他的快乐的杯，现在是满溢出来了，当他被命护送公主回宫时，他在他所爱者之前有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后来渐渐的鼓起勇气，竭力要以他的谈锋去娱悦她。克林希尔特的美丽的脸通红着，腼颜的谢他为她兄弟公曹尽了这末大的力。这些话使西格弗里特的心因快乐而狂跳着，他更立誓说，在他的一生他将尽力去帮助他。于是克林希尔特又嗫嚅的道了谢，然后他们分离了。虽然他们这次是初会，却各已觉得他们是互恋着。大宴过后，公

曹送了许多东西给武士们，大家都陆续的回家，西格弗里特也要告辞而去，但公曹却恳挚的劝他留在委尔摩士。西格弗里特很快乐的答应了，因为他现在是深爱着美貌的克林希尔特，他们每天都秘密的见面，原是不忍离别的。

国王公曹之独留西格弗里特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于大宴终止不多时，便宣言道，他要取得依士兰的公主白伦希尔特（Blunhild）为妻；这位公主立誓不和男人结婚，除非他投枪，掷石及跳跃都胜了她。西格弗里特知道白伦希尔特的事，劝他不要想去娶她；公曹立意要去。但同时他又要求西格弗里特也同去，并答应他说，如果他帮助他得到白伦希尔特，他也将以克林希尔特与他结婚。这个条件当然不会为西格弗里特所拒绝的；他立刻答应了，但劝国王只要带了海根和邓克瓦同去，不要多带侍从们。

公曹穿了富丽之衣和三个武士同坐了一只小舟走了。不久，便到了依士兰。当船见岸时，西格弗里特坚嘱他们不要说出他是什么人，只当他是公曹的侍从。船一靠岸，便有许多女人的脸由城堡的窗中向外探望。他们立刻去报告白伦希尔特；她立刻，且快乐的，以为这乃是西格弗里特来向她求婚了。但当她听见他不是如一个国王似的而乃帮助别人上马时，便十分的忿怒着；后来，当武士们进了她的大厅时，如果他不谦和的避开了，说敬礼应先施于他的主人，葆公台国王公曹，他乃是来求娶她的时，她便要先和西格弗里特问话了。她见求婚者不是西格弗里特，便恼怒不已，立刻叫武士们预备比武之器具；同时公曹，海根他们看见四个武士很吃力的抬着白伦希尔特的盾出来。她的枪呢，三个人也抬不动；至于她的石呢，他们更是诧异着，十二个强健的仆人还不能移转它一步。

海根和邓克瓦私为他们的主人担惊，因为比武失败是要失去

性命的。他们进堡时，曾把武器放下了再进来，现在却惧怕有阴谋要发生，唔唔的惋惜着没有带了武器来。白伦希尔特听见了这话，心里很鄙夷他们，便叫仆人们把武器还给了他们。当他们正在预备一切时，西格弗里特却乘空回了船，他穿上了那件魔术的云衣，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他的复回到比武场上来。他在公曹耳旁微语道，"我是西格弗里特，已来了，你不要怕，一切都有我在，你放心和她比武好了，你只要做出姿势来，我会替你掷的。"

公曹服从了他的话，只空做着姿势，依靠着那个人所不见的西格弗里特为他比武掷石。现在，白伦希尔特已经预备好了，她举起大盾向公曹冲来，差一点不把他冲到，亏得西格弗里特立刻握住了她的盾，而反推了过去，使她倒跌在地上了。

她第一次虽失败了，却还不灰心，她举起大石掷得很远很远；但西格弗里特代替公曹掷得却比她更远。于是她诧异的宣告自己是失败了；她心里觉得她乃终于遇到一个胜她的人了，她庆贺那胜者，并叫百姓们都来，以他为他们的新的主人。为了要举行盛大的婚礼，白伦希尔特到处邀请许多武士来预宴。公曹，海根他们见了她的这个举动，生怕有什么奸谋发生，但西格弗里特也不很静定。他私自走开了，答应他们说，不久当即带了一队兵士来。他匆匆的到尼泊龙琪，召集一千个兵士，又到依士兰来帮助公曹了。

这个不意而至的军队，使白伦希尔特吃了一个大惊。她问公曹为什么叫军队到来，他却不经意的答道，这不过是他的从人，来贺他的婚礼而已。她见自己无法抵抗，便预备了婚宴，一同庆祝着，不久，她便带了她的女侍，其数不下于一百六十八人，和公曹及一千个尼泊龙琪的武士同到葆公台去了。他们走了九天之后，公曹要西格弗里特先去报信。这一次他却为公曹的命令口吻所激怒，想拒绝他的话，但国王却说，为了克林希尔特之故，请

他答应，他便立刻服从的走了。

克林希尔特是如何快乐的欢迎西格弗里特之归来呀！他们说了许多的话。她哥哥的结婚，也使她很快乐。她立刻命令朝臣预备盛大的礼仪以迎接新后，她自己也到了河边去欢迎她。

他们到了都城之后，大宴宾客，又继之以大比武。但不耐的西格弗里特却立起来向公曹要求他从前答应将克林希尔特嫁给他之约。虽然白伦希尔特低声的说，这个是不该的，因为她想，国王的独一的姊妹不应该嫁给一个侍臣，但公曹却差人立刻叫了克林希尔特来，她脸色羞红的表白她愿意嫁给西格弗里特。于是这个婚礼便也立刻举行了，两对的新人并排的坐着。但克林希尔特的脸色是耀着快乐的光彩的，而白伦希尔特则是双眉紧锁着的。

大宴过去后，公曹和西格弗里特各自带了新妇回宫。现在，公曹是第一次独自对着他的新妇，他没有勇气去拥抱她，她却把他捉住，不管他如何的挣扎，用长带把他缚着，挂在她房中墙角的一支针上。然后，不管他之如何哀求，她仍把他挂着，直到了侍从们进房之前数分钟方才把他放了下来。当然的，他们见了西格弗里特之神彩飞扬，又见了公曹之低头丧气，是要大大的诧异的。西格弗里特得了一个爱妻，他们俩是异常的恋爱着的。并且，西格弗里特为了表示他对他新妇的坚固不渝的爱情，又把那远近闻名的尼泊龙琪大宝库赠给她为结婚的礼物。第二天全日的时候，公曹都在想乘空把西格弗里特拉到旁边，私自对他说他所受到的他的妻之虐待。西格弗里特一听见他的告诉，立刻又欲把他的云衣穿上，陪了公曹，为人不见的，进了王宫，于暗中帮公曹强迫她承认他为主人，因为她对于西格弗里特是永不能施展其勇力的。

夜色一黑下来，西格弗里特便离了克林希尔特偷进了王后的房中。然后，当她和公曹闭了门时，他把灯吹熄了，扭住白伦希

尔特不放，直等她哀声求饶，不再缚他时方才释了她。因为西格弗里特在互扭中始终是不为她所见的，她还当是她丈夫在制服她。西格弗里特又乘其不见，把她的戒指和腰带取了来，偷偷的走出了房门，让公曹和他的妻留在那里。白伦希尔特真的自此对待她丈夫异常恭顺，且自一次被屈服后，她的全部的大力是完全丧失了，现在是如同别的妇人们一样的柔弱了。隔了十四天的欢宴后，西格弗里特与克林希尔特离了都城，同回他父母那里。王和后见了他儿子果然带了他的美丽的新妇回来，他们是如何的快乐呀！十年在和平的生活中很快的过去了，在这时候，西格弗里特生了一个孩子，把他名为公曹，以纪念他，因为公曹也把他的儿子取名为西格弗里特。同时，当小公曹出世不久之时，他的祖母西格林特死了。于是西格弗里特和克林希尔特带了他们的儿子到了尼泊龙琪，住了两年。这时，白伦希尔特还以为西格弗里特不过是她丈夫的侍从，常私自惊奇着他为什么不到皇廷上来尽臣礼。最后她对公曹说，最好邀请他的妹妹和她丈夫 同到委尔摩士来。公曹却高兴的听从了她的话，立刻叫一个使臣去请他们来。西格弗里特不仅偕他的妻且还邀他老父西格莫特同去。这正是在仲夏的时候。克林希尔特在离家时，很高兴的把她小儿托给尼泊龙琪的武士们看管，永没有想到自此她将再不能见到他。当克林希尔特到了委尔摩士时，白伦希尔特很痛苦的以款待同辈之礼款待她，她私自怨怒着，这个怨怒如火药似的一触即发。

尼泊龙琪歌(二)

如此，有一天，这个火药果然爆发了。那时，两个王后坐在一处闲谈；白伦希尔特不耐听克林希尔特之常常称颂她的丈夫。她的忿气再也不能忍了，直到了后来，克林希尔特无意的说起，西格弗里特乃是世界上无比的英雄，白伦希尔特却冷冷的说道，他不过是公曹的侍臣而已，所以当然是在公曹之下。克林希尔特立刻驳了她。这场辩论引起了怒气，克林希尔特立誓说，她将在进教堂时必先于白伦希尔特而进，以公开的证明她的等级的非低。二后各自狂怒着，分别了，各穿了最弘丽的衣服，带了她们的女从，恰好在教堂门口相遇着。于是白伦希尔特叫克林希尔特让开了，由她先进去，她是比她高一等。这个命令增加了向来和气的尼泊龙琪王后之忿怒；她一点也不让的站着。二后间的吵闹便白热起来，最后，克林希尔特当面讥辱白伦希尔特说，她不是一个忠实的妻。为了证明她的话，她取出了西格弗里特所得到的戒指和腰带。（他把这些东西给了他的妻，并把白伦希尔特与她哥哥结婚之秘密也告诉了她。）白伦希尔特立刻叫了公曹来保护她。公曹满脸怒气的又叫了西格弗里特来。西格弗里特却当众申明，他的妻的话不是真的，公曹之后并没有侮辱她的名誉处。然

后，他还申明说，这场争吵是不荣誉的，他非常抱歉，他的妻子参预其中。因为他怕白伦希尔特如果晓得了公曹用什么方法取得她为妻的，其结果将更不堪设想。于是他粗暴的把克林希尔特领了回家，不很轻的打了她一顿，以酬她的乱说；但公曹虽也想以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他的王后，他却不敢这么办，因为他见了盛怒的妻便要恐栗起来。

同时，白伦希尔特在大众之前受了辱，便恼怒得高声哭泣起来，后来海根听见了，跑进来问她为什么哭。王后便把一切的事都告诉了他，他便热诚的宣言道，他将使她有复仇的机会。于是海根心中充满了复仇之思想，在计划着谋杀西格弗里特之方法。他先去引起公曹，格尔诺特及奥特文的愤怒，要他们去杀害西格弗里特。但乾赛尔合却反对这些鄙下的阴谋，而公然的袒护西格弗里特，然而他却非是深计远谋的海根之敌。海根继续的向公曹说，他的妻之受辱是不光荣的，应该为她复仇，最后。国王公曹竟答应了他的阴谋的暗杀计划。

他们假装的说，以前的仇人鲁特格现在要再来攻击葆公台了，公曹便故意的向西格弗里特献殷勤，求他的帮助。他便慨然的答应下来。立刻全国都预备着战事，好像它真要发生一样。但克林希尔特一听见她丈夫又要去冒险，便十分的扰恼起来。殷忧笼罩在她心上，终日的不乐着。海根却诡诈的要去分她的忧，殷勤的安慰她，得了她的信任，使她把秘密说了出来；原来西格弗里特全身都是不为刀枪所伤的，只有一个地方，即在两肩之中；当时浴于龙血中时，因有一片薄叶贴在那里，所以龙血便没有洗到，这一处是独一的可以致命之处。

海根假装着满脸的同情，——实则他是满脸的说不出的高兴——要克林希尔特在西格弗里特的衣服上用线绣出一个十字在那可以致命之点，俾他以后可以保护他更周到些。等到他得了一切

秘密及她的谢辞后，他便喜冲冲的把这个成功报告了国王。西格弗里特完全没有疑心的穿上了那件绣有十字的衣服，在第二天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中，却诧异的听见他们说，战事已平，现在改去森林中打猎。但他仍没有疑心的答应了他们。他高兴的向克林希尔特告别，她望着他走后心里却很不安逸。但西格弗里特一无所知，高声笑着，东奔西逐的在森林中杀死了几只熊，活捉了一只，然后他快快活活坐下了休息，要喝一杯酒。但他们说，很不幸的，酒却抬错了，抬到别一个森林中去了。这是海根的机会。他立刻指出一个近处的水泉，叫他到那里去解渴。西格弗里特谢了他，提议要跑步到那里去。海根与公曹同意于这个赛跑，他们三个人便出发了。西格弗里特虽穿了重甲在身，他还是第一个先到。当公曹的渴已经解了，第二个便是西格弗里特去饮水了，他脱了盔甲，放了刀枪，低下身去喝水。当他伏在晶莹的水面上时，海根的恶眼却闪闪有光。他偷偷的把西格弗里特的盔甲刀枪都取开了，只留下一个盾。然后，他偷到他的身后举起枪来，恰恰的刺进克林希尔特所绣的十字的地方。因此，西格弗里特受了重伤，但他还想自己报仇，刀枪却已不见了，便举了盾，向海根一掷，把他打倒了。他的力量现在是用尽了，便躺倒在草地上，诅骂着那个他向来视为朋友的奸人。

然而西格弗里特到了死，还没有忘记了他的爱妻。他消平了一切怒气而恳切的把她托给公曹照料，叫他看待她好些。这些话一说完，他便倒地死了。行猎者沉默的围绕于他的尸体之旁，忧愁的看着它，商议着怎样才能把海根的奸谋守着秘密。最后，他们决议把尸高抬到委尔摩士，说道，他们发见他死在森林中，大约是被强盗所杀的。但至于海根呢，他心里却还很安逸，且以此举为乐，在他的心上，还要使克林希尔特更受些痛苦。于是他叫抬尸的人，把尸体放在她门口以便她可以看见。果然，克林希尔

特一开了房门，便看见她丈夫之尸体，立刻晕倒在他上面了。她慢慢的苏醒过来，切齿的说，她丈夫是被人谋害的；她万不能相信他的死是偶然的，她哭着，诉说着必要报仇，一面派了一个人去把这个悲闻通知西格莫特及尼泊龙琪人。他们匆匆的武装起来，立刻即要攻击葆公台人以报此仇，亏得克林希尔特阻止了他们，叫他们等候一个机会再报仇。

不久，伟大的葬礼，便举行了，每个人都要参预，因为西格弗里特是为全个委尔摩士人所敬爱的。每个人都来看尸体而安慰了克林希尔特。但当公曹向前表白他的哀感时，她却拒绝了，要他答应，一同行猎的人，个个都要用手接触西格弗里特的尸身，谁是凶手，一触到尸身，它便会再流出血来的。公曹只得答应了。每个与猎的勇士都来用手与他的尸身接触，每个人都一触了便走了开去，尸身一无异状，只有海根的手一触到，西格弗里特的血便又流出了。这个神迹，把为殷忧所击的克林希尔特疑心决定了，她知道海根无疑的乃是杀她丈夫的凶手。然而她仍阻止了愤怒的尼泊龙琪武士之立刻复仇；她为格尔诺特及乾赛尔合所扶持，勉强终了葬礼，他们是真的同情于她的。但当西格弗里特之葬礼告毕时，她的悲哀却开始了，她终日终夜的哭着。西格莫特，他的父亲，也是如此的悲苦。但不久，他却勉强抑住悲愁的说，他要领了武士们回家。克林希尔特也打算和他同归，但她的亲属却劝她留在葆公台。现在快快活活来赴宴的人，却都载了一心的悲苦回家了。每个武士都穿上了丧衣，悲戚的拥护了西格莫特而归。

依克瓦，那个管事人，却和克林希尔特住在一处；他为他女主人预备了一个邻近教堂的居处，以便她常常去谒他丈夫之墓。克林希尔特在这里独自沉默的悲戚了三年，拒绝去见公曹及凶手海根。同时，这两个人却在心上忙着计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们记

起那巨大的宝库尼泊龙琪现在是归克林希尔特所管辖了。他们奇怪着克林希尔特怎么能把他们运来。这件事常为他们武士们所讨论，后来，公曹用尽了心力，觉得与他姊妹，那个忧苦的王后见一面。他很快活，不久，便劝了她叫十二个人去运了这个大宝库来。果然，这弘丽无比的珍宝到了委尔摩士了，那样的美好而无价的财宝，都是委尔摩士人所从未见过的。

差不多有一百车装载了这些珠宝而来，每一个见到的人，眼光都为耀眩。然而克林希尔特却只要使她丈夫再在她身边一会儿，便把这些珠宝都抛了她也愿意。她很不注重这些宝物，把这些东西都分散给大家，求他们为西格弗里特的灵魂祈祷。她的赏赐，却独没有到海根身上。他生怕都分尽了，他一点也得不到，于是他便去告诉公曹说，克林希尔特分散财宝是要秘密的结合了许多人，预备为她丈夫复仇计。

当公曹正设法要把这宝库取得时，却已先为机警的海根所窃去了。他设法把保存余宝之塔的锁匙取了来，秘密的将所有宝物都移去了；为了免得这些宝物落在他人之手，他把它们都沉入来因河中，只有他自己晓得那个地方。不久，他的盗窃被发见了，大家都起来反对他。公曹、格尔诺特及乾赛尔合都十分的愤怒，便把他逐出了王廷一会儿。这个新的丧失，使克林希尔特益觉葆公台之不可久居；经了许多人的劝说，才迁于她丈夫墓旁住着。如此的经过了一十三年。于是匈牙利王依特赛尔因为他的妻死了，便差了一个武士陆狄格（Rüdiger）到委尔摩士来，要求娶克林希尔特为妻。陆狄格奉了这样的使命，异常的快乐一路的奔驰而到委尔摩士，受到很热诚的优待，而海根为尤甚，因为他们从前本来很熟悉。公曹向他问候匈牙利王和后的好，他便答说后已经死了，他此来乃是为王求婚于克林希尔特的。

公曹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婚事，答应用全力去劝克林希尔

特。他说，将去看她，于三日之内，一定可以有确定的答复。当使臣退出后，公曹便问兄弟们及贵族们以此举之妥当与否？大家都很赞成，只有海根是不高兴，他警告他们说，如果克林希尔特做了匈牙利之后，她便要用她的权力以报仇了。然而这个警告却不为兄弟子侄们所注意；他们一直到了克林希尔特的面前，劝说她的再嫁，但都无用，她只肯见一见那使臣。不久陆狄格便到了她那里，极力为他主人陈说，他还夸称他主人之如何的想得到她为后；又极力的描状匈牙利势力之如何大，如果她肯答应为他们的后，他们将唯她的命令是听。但克林希尔特却全不注意这些，直到了后来，这位武士勇毅的说，如果她肯答应，她尚有什么仇，他们必将为她报复。这句话引起了悲感的克林希尔特的注意。武士乘机又百端陈说，最后，他居然达到了目的。克林希尔特是答应了为匈牙利的后了。

公曹和他的武士们听见克林希尔特肯答应为匈牙利的王后，他们都很满意，当然，他们是不晓得双方面的秘密条件。现在，克林希尔特是匆匆的预备着要出发。她非常焦急，直等不及一切事之完全预备好。最后，那忧愁的后和着依克瓦 ，陆狄格，所有她的女侍以及五百个卫队都起程走了。格尔诺特及乾赛尔合还有许多葆公台的贵族，送了她好远的一程才回来。国王依特赛尔出来迎接她，她见了他，竭力的放下了忧愁，与他吻着，以表示愿意做他的妻。

这个婚姻有了极盛大的仪式，王和后到了维也纳，婚宴继续了十七天。但他们想尽了方法要使克林希尔特娱悦，她却总是双眉紧锁着，因为她不能忘记了她所爱的西格弗里特及他们俩所度过的快乐的年光。他们又由维也纳而到了格兰（Gran），那里是依特赛尔的都城。都城里热烈的欢迎他们的新后，在那里，他们共度着新的生活。在依特赛尔一方面他是很快乐的，尤其高兴的

是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照基督教的仪式，受了洗礼，取名为奥特李甫（Ortlieb）。自克林希尔特离了本国之后，又有十三年过去了；然而她的忧愁还是如前的活泼，她的心上渴想着报仇，要把海根诱到她的国内而报了前怨。

她心里盘算了许久，最后，决定不能再迟延了。于是她向依特赛尔说，她要邀请她的亲戚来这里过夏。他答应了，却没有梦想到她有什么毒计在着。他派了两个行吟诗人韦倍儿（Werbel）与史文米尔（Swemmel）去邀请他们。在使者离别之前，克林希尔特再三的吩咐他们去告诉她的亲属，她现在是很快活，并叫他们不仅把诸王都请了来，且还要请了海根来，因为他少年时曾在依特赛尔的宫中，乃是他们最好的向导。这两个诗人，在委尔摩士很受欢迎，他们的邀请，使大家都高兴的答应了，只有一个海根，他指出克林希尔特是危险的，当他们都在她势力之下时，她便将复仇的。但大家都不理会他的反对，以为不过是他犯罪的警觉而已，诸王于是先叫诗人们回去，报告他们的到来。他们的母亲乌特，是知道克林希尔特的性格的，也竭力恳劝他们不要去。然而公曹却决定必去。海根原不是一个懦夫，见他们决定去了，便也预备跟了同去，同时，他劝他们穿了最坚厚的盔甲去。这一群勇士，由公曹领头，共有一千个人；他吩咐他的妻及子照料着国务，想不到他是将永不回归。同时，匈牙利的诗人们已到了格兰。报告他们客人之将到。克林希尔特的眼中有一会儿耀射着凶光；她迫着问使者，海根是否同来。使者答道。他是来的，但他却不愿意，因为我们听见他咿唔的说：“这次的游行，是到死地去游行。”

尼泊龙琪歌(三)

葆公台人——现在亦称为尼泊龙琪人，因为现在这个大宝库是在他们管辖之下了。——到了多瑙河（Danube）岸，没有船渡过对岸，海根便独自去寻船。他走了不久，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便由密林中看出，看见几个鹅女郎（亦名为聪明妇人的）在近旁泉中沐浴。他乘她们不觉，掳掠了她们的衣服，要她们说出他们此行之凶吉才肯归还。为了要得到衣服，一个妇人说，此行大吉，但等到衣服还了她们时，别一个妇人却说着不吉的话，她说，此行只有一个牧师能生还委尔摩士。海根别了她们，还依她们的教言，取得了一只船而把同伴们都渡过了河。海根为了要鹅女郎的话不应验，故意的把牧师挤落到水中去，以为他一定是要溺死了，不料他却挣扎的上了岸，独自立了一会，便慢慢的回到葆公台去了，这使海根十分的惊骇。现在，他知道鹅女郎的话是真的要应验了！他们到了边界，陆狄格叫依克瓦去劝告他们不要再走了，因为他恐怕有阴谋要发生。但葆公台人却不欲半途而回，留此永久的耻辱。于是他们仍向前走去。

他们又遇到勇敢的王包尔（Dietrich von Bern），他严重的警告他们说，他们这次的拜访是充满了危险的，因为克林希尔特永

不会忘记了杀她前个丈夫西格弗里特的凶手的。

他的警告也没有效力，他忧愁的偕了他们同行。最后遇到了克林希尔特来迎接，她冷冷的招待他们，只和乾塞尔合拥抱着。然后，突然的在众人之前向海根高声问道，他有没有把她的尼泊龙琪宝库带还了给她。海根并不为此言所慑，他勇敢的答道，那些宝物都在来因河的深处放着，他以为他们将藏在那里直到了裁判之日。王后不理他的回答，便转身邀请她的别的客人放下了兵器到大厅上来，因为大家都不能带兵器进厅的。这个，海根反对着，他不让他们解除了武装；他说，他怕有什么阴谋要发生。王后听了这话，假装着很悲苦的样子，质问着谁把这些不公平的怀疑钻进了她亲属的心上。王包尔本来不爱那王后的，便向前说，乃是他，叫他们葆公台人如此的防御着。

这话使克林希尔特心里充满了怒气，但她不敢说什么话，因为王包尔是很为他的同辈所敬伏的。于是她立刻抑止了她的怒气。国王伊特塞尔这次却向前欢迎他的客人了，他尤其欢迎海根，他的老友之子。当许多葆公台人都和国王一同进了大厅时，海根却把一个勇敢的同来者何尔克拖在一旁，二人同坐在克林希尔特的门前的一块石上结了生死的同盟。克林希尔特由窗中看见了他们在那里；她的要杀海根的念突然的涌起。她命令她的从者出去杀他，他们虽有四百个人，却不敢做这个冒险的事。王后见他们之踌躇，以为他们是怀疑着，便独自走了出来，要海根自承其罪。何尔克见了王后来了，要海根起来对她致敬，但他不理会她，如此，二人在那里等她来前。她一走近海根之前，便骂他谋害了西格弗里特。海根勇敢的承认了是他杀了这个英雄。虽然战士们全听见了这话，虽然王后又叫他们去攻击她的仇人，但他们却仍然不向前去。海根和何尔克看穿了前途的危险，二人寸步也不相离。他们走进了大厅，加入他们的同伴之中。

同时，依特塞尔请大家赴宴，宴席是异常的丰盛，宴后，又把他们引到憩息的大厅中去。所有的武士都躺下了休息，只有海根和何尔克是全身武装的在守夜。中夜时，他们见有一队武装的兵队向前来。但当他们与前列的人一接触，他们便纷纷的退后了。天明时，武士们一起身，海根便坚嘱他们要全身武装，且不要分离开。这使克林希尔特的人不敢去攻击他们。虽然形势是如此的严重，依特赛尔却还完全不知道他的妻的阴谋，他想不到她有那末深的怨毒，所以他仍旧尽心的款待他的客人，好朋友，如亲属一样。至于他的妻呢，却忙着在计划着复仇。如果他知道了这事，一定会阻止她之进行的，因为他是一个勇敢而又正直的王。这一天有一场竞技，武士们都加入了，只有两个最勇敢的匈牙利人，陆狄格与王包尔不加入，因为恐怕要引起纷扰。然而结果却因何尔克不意的杀了一个匈牙利人而几乎真的引起了纷扰，亏得国王依特赛尔连忙阻止了他们。这个意外之事变，被克林希尔特听见了，她想因此激动了王包尔或他的武士希尔台白兰（Hildebrand）之怒，去杀她的仇人，然而终于无用。最后，她居然引动了王弟皮洛台林（Blödelin），以给他一个美妻为条件。王弟带了武士们进了葆公台的从人集宴的地方而杀死了他们全体，只逃出了邓克瓦 特，他是在看护他们的。他立刻逃到了大厅。同时，依特赛尔却一心一意的在款待他的客人，把他的小儿子唤出来，放在公曹的膝上，说他不久将使这个孩子到葆公台去受教育。

每个人都恭维这个美秀的孩子，只有海根说，这个孩子看来似乎会夭死而不至长寿的。当他刚说完了话，而国王满心的不高兴时，邓克瓦 特冲进了厅内，报告说，同伴们都被杀死，要海根去帮助。海根一听见这话，立刻跳了起来，拔出刀，叫邓克瓦特去守门，不准一个匈牙利人进来或出去。然后他突然的把孩子

奥特李甫的头斫了下来，放在克林希尔特的膝上，又去斫下诗人韦倍儿的头，继续的在大厅中追逐匈人，他的同伴也是如此。立刻，那所弘伟的大厅中，变成了流血而纷扰的可怕景像。老年的国王依特赛尔眼见这个突然而生的大变，坐在那里，不知所为，而克林希尔特却高声的呼唤王包尔来保护她。王包尔为她的恐怖之神色所感动，立刻吹了他的角，公曹停了下来，不去杀人，问他以前的朋友，所要求的是什么事。王包尔要求他和他的同伴们安全的退出大厅，公曹立刻答应了。王包尔一手牵了国王，一手牵了王后，带了他的所有从者一同出去。这个权利也给了陆狄格和他的五百个从者。但到了这些人都出去之后，这场大残杀又开始了，直到了大厅中每个匈牙利人都死了，每一件东西都为血所污洗时，才告停止。葆公台人愤怒的把尸身都掷于阶下，国王依特赛尔站在那里，不知所为，双手擦着，想不出一个停止战争的方法。同时，克林希尔特却真的在召集武士，悬了重赏，给那些能攻击海根或杀死他之人。有一个勇士向前去了，但却被海根所杀。又有两个也向前为她报仇，却也为海根及何尔克所杀。然后，一个个的向前攻击的武士都为葆公台人所杀了。从前弹唱着琴与歌的大厅，现在是如此的可怕。墙上地板上都是鲜血，连放在桌上的盘子，也都是血。以前笑声不绝的地方现在是只闻可怕的喊声；以前亲热的亲戚和朋友，现在却眼中充满了凶光，大斫杀仍继续的进行。一队一队的武士去攻击葆公台人，都很少生还，而葆公台人却还勇敢的站着。

同时，心胸高尚的依特赛尔却悲哀着死者。倦战的葆公台人，暂时休息了一回，而克林希尔特却在召集新的军队以攻击她的同胞，他们却还强健的生存在大厅中。

葆公台人遣出一个使者 和国王依特赛尔求和，但克林希尔特又劝他告诉他们，把海根送出，然后可以。但公曹对于这个条

件却毅然的拒绝了。于是克林希尔特秘密的下令用火烧了那座大厅。葆公台人为强敌所围，为火烟所盲，为热火所灼，然而仍维持他们的勇气。他们喝着死者之血以解渴，挤到石拱门之下以避火。他们要支持过那可怕之夜再说。但当第二天早晨，王后听见他们还活着时，她便命令陆狄格去攻击他们。其初，他拒绝了，但王后叫他记起他从前在委尔摩士时所立的严誓。然而陆狄格最后还要逃避这个战役；他求王后解免了他的誓言，他把全部财产都给了她。但王后笑着，只坚持的说，“你立誓着。”陆狄格只得答应了。他召集了部下，到了大厅之前。葆公台人非常的信任他，想不到他会含有敌意的。但当他悲戚的告诉他们他不得不战时，他们沉默的允许他及他的从者进了大厅，血战又开始了。双方的武士，继续的倒地死了。陆狄格杀了许多敌人之后，又去和格尔诺特相战，这两个人打得如此的激烈，到了后来，二人都受伤而死。生存的人见了他们之死，打得更激烈了，后来进了大厅的武士便死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很快的传布出来，克林希尔特的悲哀是不可状说的！全个匈牙利都城的人民也悲悼着他们的英雄之死。王包尔听见了这事，便叫希尔台白兰去向他的葆公台的朋友们要回了陆狄格的尸身。

希尔台白兰立刻带了一队武士到那里，如果他的部下不和葆公台人争吵的话，他早已得到他所要求的了，不幸这个争吵，接着便来了一个激烈的战争。在这次战事中，所有葆公台人都死了，只有公曹和海根生存着，至于希尔台白兰一方面呢，他也只剩了他一个且受了重伤，逃到他主人那里。王包尔听见了他的报告，立刻自己武装起来，他叫公曹与海根投降，但是无用，于是他不得不用武力把他们捉住，现在这两个仅存的葆公台人是无力抵抗的人。于是王包尔把他们缚着的引到了克林希尔特那里，恳求她可怜他们而赦了他们的性命。

她虽然引起了这场大残杀，她的心还没有满足。然她这时却不得不答应他们现在生命之安全；她把他们二人分囚在二间狱室。她去找海根，答应他说，如果他肯说出她的宝藏放在何处，他便可以自由了。但海根不相信她，宣言道，只要他的主人还活在那里，他是一句话也不肯泄漏的。克林希尔特的残忍现在是超出于一切范围之外，便离了他去把她哥哥公曹杀了，然后，回到海根那里，带了他的头给他看。但海根现在仍不肯说出秘密来，他讥嘲的说道，“现在只有我和上帝两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了，我将永不再告诉你；这宝藏将与我一同毁灭。”克林希尔特听了这话，大怒起来，立刻取下了挂在他旁边的刀——这刀她认识是西格弗里特的——亲自把他的头斫了下来；依特赛尔连忙想阻止她时，已经来不及了。希尔台白兰见了这事，再也忍不住了，便拔出刀来，跳向前去，把她也杀了，她曾给匈牙利人以说不出的痛苦。因此，克林希尔特的事业遂告终止了；她本是一个最柔顺的女郎，最可爱的妻子，经了一场大刺激之后，却变成了一个残酷无比的恶魔了。在这个地方，《尼泊龙琪歌》本是可以告终止了，但还有一个附录。大约是别一个诗人作的，名为《哀挽》继续的说着这个故事，叙述依特赛尔，王包尔及希尔台白兰怎样的哀敬这些死的英雄，又差几个使者把这噩耗及死者的武器送回委尔摩士，然后，葬仪在委尔摩士举行了；余存的葆公台人以公曹及白伦希尔特所生之子为王。然而这一次到匈牙利去的可怕的拜访的记忆却永不泯灭于百姓们的心上。过了好久，他们辞别了这个世界，而他们的子孙们还辗转着传述着这件闻之于他们父母的可怕的故事；后来，谈起“匈”字，他们都还有些惊栗之意。

（原载 1928 年《文学周报》第 4 卷）

特洛哀的陷落（读书杂记）

荷马（Homer）的大史诗《伊里亚特》（Iliad）开始于特洛哀战争的最后十年的将近结果之时，其间所叙事实，只不过几十天，而其结局则终止于特洛哀大英雄赫克托（Hecter）的举葬。至于特洛哀战争的前因与后果，则《伊里亚特》俱未叙及。另有一群的小诗人，叙述着这次战争的各部分事实，作为几种小史诗(见另一文里)。但这些小史诗至今却没有一种留传下来。赫克托葬事以后至特洛哀的陷落之事，则幸得另有一部史诗留给我们。这部史诗有《伊里亚特》一半长短。这个作者的第一名是坤托斯(Quintus)，约在纪元后四百年住于史米那（Smyrna）地方。他崇拜着荷马，便开始为荷马作续篇。大约当时诸小史诗当仍存在着，而他的著作一出，他们的史诗便如明星见了太阳似的，立即黯然无光。坤托斯的生平，我们更没有地方可以知道详细。我们也不能知道他的材料的来源。他的记载，与亚克底纳(Arctenus)的《米农的参战》(The Aethiopis)及《特洛哀的陷落》(The Iliupessis)和李斯克(Lesches)的《小伊里亚特》(Little Iliad)的记载，其范围正复相同。因此便有人主张说，他的著作不过是这两位小史诗作家的作品的重述。然而这话却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看这些小史

诗流传于今的极少数的断简零行，以及文法学家柏洛克洛斯（Proclus）所叙述的“内容概略”，都可见坤托斯决不是重述他们的。他大约不会有诸小史诗在手边，即使有之，他也是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束缚而独自创作着的。他的史诗是这样的独立与富于原创力。然而有一个问题来了：如果坤托斯不跟从着诸小史诗，那末他的材料究竟从哪里来的呢？德国的批评家毫不迟疑的答道：“从荷马。”全诗中诚然是充满了《伊里亚特》的反响。然而对于《奥特赛》（Odyssey），坤托斯却似乎毫不注意，仿佛他的手头并没有《奥特赛》存在着似的！例如，荷马说，阿克里斯（Achilles）的被杀，是出于爱坡罗与巴里斯（Paris）之手，坤托斯则说系出于爱坡罗之手。荷马描写着海仑（Hellen）在夜间和狄孚白斯（Deiphobus）同站在木马之旁，模拟着每个藏匿在木马腹内的武士妻子口音呼唤着他们。这个惊人的一幕，坤托斯也删去了。后来，他使麦尼洛斯（Menelaus）无抵抗的杀死了狄孚伯斯，因已先醉之以酒。而荷马则说狄孚伯斯极力抵抗，倾亚特修斯及麦尼洛斯的全力，又加之以阿西娜的帮忙，仅乃克之。

因此，他们对于他的取材，简直没有一点满意的解释。也许他是不顾荷马，而独用己见，也许他是跟从着一种原本，今已失传了的。但这也都不过仅是一种推测而已。无论如何，坤托斯的《特洛哀的陷落》却是一部荷马的很好的续篇。

这部史诗的版本，有希腊文与英文对照的 Loeb Library 的一种，英译系出于 Arthur G. Way 之手。

（原载 1929 年 1 月 10 日《小说月报》20 卷第 1 期）

荷马系的小史诗（读书杂记）

以荷马为作者的两大史诗，《伊里亚特》（Iliad）与《奥特赛》（Odyssey）之外，关于特洛哀战争及诸位英雄的归程与结果的，尚有荷马系的史诗作家们所作的好些小史诗。他们追述到特洛哀战争的起因，又在《伊里亚特》与《奥特赛》之间，加入了特洛哀城的陷落前后的事。又继于《奥特赛》之后，而叙及亚特修斯（Odysseus）的结局。这些小史诗，我们名之为“特洛哀系的神话”。这些小史诗的名目及内容，曾在希腊文法家柏洛克洛士（Proclus，140 A. D.）的文学宝库里叙述到。现在将这些小史诗，一一的略述于下：

（一）《克卜里亚歌》（The Cyprian Lays）　此诗所以名为《克卜里亚歌》者，因原作者史太西纳士（Stasinus）为克卜里亚人之故，此诗从希腊人预备攻打特洛哀城起，到特洛哀战争的前九年的事为止。由此便引到了《伊里亚特》。

（二）《亚西奥辟亚歌》（The Lay of Aethiopia）　此诗为米勒托斯（Miletus）的亚克底纳斯（Arctinus）著的。此诗所以名为《亚西奥辟亚歌》者，因亚西奥辟亚的国王米农（Memnon）乃系诗中的英雄之故。它继续于《伊里亚特》之后，叙述：女子

军阿美逊人（Amazons）如何的到了特洛哀，她们的女皇如何的为阿且里斯所杀，以及阿且里斯他自己如何的为巴里斯所杀。

（三）《特洛哀的陷落》（The Sack of Troy） 也是这位亚克底纳斯著的，仍继续著前诗之后，而叙述到特洛哀城陷落的事。

（四）《小伊里亚特》（The Little Iliad） 此诗为米特林（Mitylene）的李斯克（Lesches）著的；他继续于荷马的《伊里亚特》之后，直叙到特洛哀城的陷落为止，特别注重于阿约克斯（Ajax）及菲洛克底特斯（Philoctetes）二人的事。

（五）《归程》（The Homeward Voyages）此诗为特洛辛（Troezen）的阿琪亚斯（Agias）作的；他填充了《伊里亚特》结束之后与《奥特赛》开始之前的十年的时间；他叙的是特洛哀战争结束之后，各位英雄收拾回家时候，在归程中所遇的种种冒险的事。

（六）《特里哥纳斯歌》（The Lay of Telegonus）此歌为克林尼（Cyrene）的作家优格蒙（Eugammon）所著。他是这些史诗作家中最后的一个（约生于纪元前五百六十六年）。他叙述著太阳女儿骚西（Cerce）与亚特修斯所生的儿子特里哥纳斯，被他母亲遣去寻找她的丈夫，却在伊萨加（Ithaca）杀死了他。

这六部史诗，现在都已失传。即有留下一点残片的，也只是几行而已。我们之所以尚能知道他们内容的概略者完全因了文法家柏洛克洛士的记载。但柏洛克洛士的记载，我们还不是直接从他原书中得来的。我们所以知道这些小史诗的内容，还要亏了第九世纪时之孚底斯（Photius）的《图书纪》（Bibliotheca）的转述。

（原载 1929 年 1 月《小说月报》20 卷第 1 期）

蔚蓝的城（读书杂记）

苏俄的文艺界，虽然还没有什么大杰作出现，然而已足以使我们很注意的转眼望着他们了。中国直接从俄文翻译他们的作品，有耿济之君和曹靖华君。耿济之君是一位很早就从事于俄国作品的翻译的人。此外，因了近年来学俄文的增多，或许还有几个，但我不能仔细知道。除了他们之外，大部分介绍苏俄文艺的人，都是由英文译本或德文译本，日文译本，转译的。英文译本，关于苏俄文艺作品的，不很多。前几年有一部“Flying Osip”，苏俄的短篇小说集出版，不久便有了好几种的重译本，虽然不是全译的。今年，美国的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又出版了一本新俄小说集《蔚蓝的城》（Azure Cities）。这个小说集还没有什么人知道，所以译的人不多。大约不久也就将有了一个两个的重译本了。这部小说集，共选入短篇小说十三篇，是十三位作家的作品，这十三个作家是 Romanov，Pilniak，Seifullina，Ivanov，Zoshchenko，Liashko，Shaginian，Shishkov，Tolstoy，Babel，Neverov，Volkov，Lidin，颇足以代表苏俄的今日的创作界。前面的一篇序，Joshua Kunitz 写的，将十年来的苏俄的文坛叙述得很简单扼要。末后又附有关于这十三个作家的短短的评传。对于

许多想知道这个“共产国”的真实情形的人，这部书确是很重要。只有在文艺的作品里，才能将一个社会，一个崭新的社会，真切无伪的表现出来；他们将一切的好处，一切的坏处都写出来了；他们将一般人民的新的生活与心理也都写出来了。读遍了一切的正面或反面的宣传文字，都敌不过一册两册的文艺作品的能够使人彻底了解或明白他们。我们假定读了几册像AZure Cities一类的书便可以知道这话是对的。他们都是一点宣传的意味也没有的。

就艺术上讲来，这部作品，至少有几篇是很值得赞赏的；尤其是V. Shishkov的《鹤》一篇；这一篇将农村间的生活，崭新的恋爱生活，以及在新时代仍然生存着古旧人物都写得异常的活泼可爱。我和几个朋友都说，这是《蔚蓝的城》中最好的一篇，如果仅只有这一篇，这部小说集也很值得看看了。

（原载1929年3月《小说月报》20卷第3期）

英国戏剧家琼斯死了

琼斯（Henry Arthur Jones）为英国现代的老戏剧家之一。他的剧本介绍到中国的仿佛只有一部《玛加尔及其失去的天使》(Michael and his Lost Angel)（《文学研究会丛书》），且似也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据报上所传消息，琼斯已于本年一月七日死了。他生于一八五一年，得寿七十七岁。对于这个老戏剧家的逝去，我们诚要表示十分的悼惜。他是一位很大胆的很勇敢的与现实社会反抗者。他同时的许多作家每在与现实社会奋斗之时而为他们所打败，而他则以他的大无畏的精神，不断的反抗着，而终于战胜了他的环境。

琼斯相信戏曲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他是舞台上的宣传家，正如路斯金（Ruskin）与莫里斯（Morris）之宣传着艺术的社会改造力。他深切的感觉到戏曲家的社会上的义务，他也深切的明白戏曲在社会上的感化力。所以一方面努力于新剧场的运动，一方面便在他的剧本中浓厚的加上了社会改革的意味。

他与政府奋斗；一切关于剧本版权的保护，剧本的检查法律，以及国立剧场等问题，他都努力的在交涉着。他还极力的对公众宣传着；他用尽了种种的宣传方法，告诉大家以戏曲与民众

的关系。他帮助人民组织成了《观剧者俱乐》(1884 年);他写成了《英国戏曲的复兴》(1895 年)及一个《国民戏曲的基础》(1912 年)。在这两本书中,以及在《新评论》,《十九世纪》诸杂志的论文里,他所讨论的是戏曲与群众,教育与舞台等等问题。

他的剧本完全是英国的,在结构上,在性质上,完全是英国的,他并不从风而靡的追随于大陆作家之后。不错,他所表现出的是反抗的精神,然而他究竟是一位英国人,他没有彻底的探索,他只不过表示出表面的病态而已。

他所给与我们的真实的一幅英国中产阶级的图画,他所写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心理是舞台上的最好者。

他将一切东西都附属于为社会学的趣味之下。他虽也留心于技术的完美,然而他的着重点却在于剧本本身之外。他的大部分剧本往往是过于着重在社会的背景,而动作本身反而被忽视了。他的人物也往往是堕入各种"方式"之中。这大约是一切有目的的戏剧家所都不能免的流弊。

琼斯仅受过普通的学校教育。他的第一剧《不过转过了墙角》在一八七九年上演于 Exeter 以后,又写了几本独幕剧。琼斯的初期的喜剧都是和 Herry Herman 或 Wilson Barrett 合作的。他的《银王》(The Silver King, 1882)得到了第一次的成功。在《圣人与罪人》(1884 年)里,他立下了许多后来的作品的情调。而《犹太》(Jndah)一剧,在一八九〇年出版的,则使他挤入了第一流英国戏曲家之中。在一八八九年,琼斯出版了两部剧本《居间人》(The Middleman)与《财富》(Wealth),在这些剧本里,他表现出近代的实业世界,以及他的资本家与他的劳动者。《舞女》出演于一八九一年,也是训说道德的书。一八九六年,他印了《玛加尔及其失去的天使》。这是他很好的作品。但

批评家对之，却有很不相同的意见。有的人以为此剧乃可列于琼斯作品的冠首；有的人则以为此剧乃琼斯一切剧本中的最坏者。《菲列斯丁人的胜利》（1895 年）是批评英国人对于艺术的态度的。前一年出版的《叛逆苏三的案件》（The Case of Rebellions Susan），表现出一个理论，即“妇人既不能公开的报怨，那末，且让她秘密的报怨”——且说着谎。《邓夫人的辩护》（Mrs. Danes, Deference）公演于一九〇〇年，此剧乃琼斯最特别的；在其中，并没有沉重的抽象观念装载着，其动作比之琼斯别的剧本更为经济，其经过时间，只有三星期。此后，一九〇六年出版了《伪善者》（The Hypocrites），一九〇八年出版了《杜莱改良她自己》，一九一三年出版了《神的赐物》，一九一五年出版了《说谎》，此外尚有其他六七种剧本。

二九，一，二一

（原载 1929 年 1 月 27 日《文学周报》第 8 卷第 5 期）

现在的斯堪德那维亚文学

一 开 端

北欧的文学与别的基督教国家的文学不同，她们自有其背景，自有其想象的系统，在薄薄的基督教思想的面幕之后，照耀着的是光荣的希腊，弘伟的罗马，幽深的希伯莱的神秘主义。但在斯堪德那维亚半岛，却又加上了一个重要的元素。当中世纪的时候，英、法、意诸国的学者正在评释经典，为圣者作传记时，这个半岛上却产生了一种异教文学，她不知荷马，不知阿里斯多德，也不知《创世纪》与《先知书》，她产出的是以亚丁（Odin）与助尔（Thor）为中心人物的诗与散文。她的“依达”（Eddas）与“沙格”（Sagas）的弘伟与美丽或不足以与古典文学相拮抗，然而他们却是热情的，有力的，原始的，充分的表现出“北方的强者”的面目来。近代的北欧文学虽是很受了外来的影响，跟随了欧洲大陆的文学潮流而走着，然而她的本色，她的神话，她的风格却仍浓浓的渗透在最近的近代思潮之中，而自呈其奇彩。斯堪德那维亚最伟大的几个作家，如安徒生，如易卜生，如拉绮洛

乎，等等，都还向他们的古代采取他们的题材，将特有的斯堪德那维亚的风格与神话，普遍的介绍到斯堪德那维亚半岛以外去。所以斯堪德那维亚的作家，无论他是浪漫主义者，写实主义者，新理想主义者，还是象征主义者，其表面上的趋势虽与欧洲诸大国同步齐趋，而其骨子里则仍是带着很强烈的他们的本土的奇彩的，这一点是我们研究斯堪德那维亚现代文学所不能不知道的。

斯堪德那维亚文学，自“依达”与“沙格”之后，便中落了，直到了十九世纪才呈现出文艺复兴的情态，而且是立刻的有了极光荣的色彩。我们如研究十九世纪的斯堪德那维亚半岛上的文学，便很忘记不了她的伟大；我们只要想到了易卜生，般生，安徒生……等等，便知道他们是如何的光荣。

这里所谓“斯堪德那维亚”，指的是丹麦、瑞典、挪威三国。这三国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各都有了很伟大的成绩，这几国的文学，有的时候，是休戚相关的，例如乔治·勃兰特，便不仅给他的丹麦，且也给瑞典、挪威以重大的刺激。浪漫主义及写实主义的狂潮，也同样的给这三个国家以同样的影响。但本文为了叙述上的便利计，仍将他们分为三部分来讲。本文所讲的，起于十九世纪的末叶，有时还要更前些，其终结则直至于最近的几年所讲到的作家，多半是还生存着的，有几个虽然是已经过去了的。但因为他们对于现代的他们的本国文学的重大影响，却仍有略略的提起的必要。

二　现代的丹麦文学

丹麦在近代的时候，常是国际的思想新潮，输入斯堪德那维亚半岛的沟渠。她在地理上的接近于欧洲几个文化的中心，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国土的狭小，与都邑文化的独占，也使

她喜于讨论；还有，常有一派的批评家，不仅定下文学的标准，且还灌输新的观念进来。

在丹麦的文学界中，批评家常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几乎有整整的一个世纪，丹麦是在于两位性质大不同，主张也大不同的批评家的统率之下，海葆（Lukvig Heibesg）的统辖时代是从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七一年；他的批评主张是要严峻的注重于文学的形式，而不在于文学的实质，他对于某一种文学作品的赞许或斥责完全根据于那个作者能否忠实的服从戏曲，诗歌等已建立了的方式，他的威权很大，是一个编辑者，又是科平哈金（Copenhagen）的皇家剧场的董事。安徒生（H. C. Andersen）的出现，不幸正当他这个时代，所以便狠狠的被丹麦批评家们所斥责。直到了他是一位老人，且已博得全世界的大荣名了的时候，丹麦的批评界方才正式承认了他的伟大；而那时的批评界却正是海葆刚刚过去，而乔治·勃兰特（G. Brandes）正开始了他的一生大事业之时。勃兰特热烈的赞美安徒生不为传统的批评所惑，而能自守其所信，创出一种自然的风格来。

自从勃兰特出现，丹麦的现代文学便开始了。欧洲的思想自普、德战争以后，突然的起了一个变化；每个人的心都为达尔文（Darwin）的《物种由来》（1859）及他的《人类起源》（1871）所震撼。在自然科学一方面，一个正确考察的新时代露出黎明之光；在文学上，也来了一个相当的写实主义时代。丹麦正需要有个强有力的人，去开启了思想的窗，以引进欧洲的思潮。这位强有力者便是那位少年的急进思想家。乔治·勃兰特（1842）在一八七一年时，开始在科平哈金大学讲演了好几场，这个大学，从前曾赠给以博士，这些讲演，后来集成了一部巨作，《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主潮》（The Main Curren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勃兰特考察欧洲的文学，为的是要促进丹麦少年作者

的向前。他宣言：祖国的文学是死了，或几乎死了，它是太矫作了，太远于人生了。文学必须直接有关于人生，且解释人生的问题。文学必须是熊熊的思想与社会的实际情况的自由无畏的代表。文学必须“表现出一切问题以供辩论”。它可是热情的，技巧的，甚至于想象的；但他必须忠守着当代的科学原则，且基于客观的考察。勃兰特这样大胆的闯入于丹麦批评界之中，如迅雷疾风似的震骇当时作者的心肺。他的关于宗教及其他事件上的急进观念引起一阵的激烈的反动，而他便被大学辞退了——这一位讲座自他去后便一直空着。自一八七七年后，他住在柏林约有六年。但勃兰特和他的理论不过在汹涌而来的实写主义的大潮的前几年，这一阵大潮不久便卷了他，带他在浪尖上，使他成为普遍的崇拜之的，成为他的国人们心上的最大权威者。

勃兰特的批评范围是极广的；他介绍了易卜生给丹麦及德意志；他发见了尼采，发扬他的超人的个人主义的信条于思想界中，他还写了不少的关于德，俄国及波兰的文学与人生的论文，如《俄罗斯印象记》，《波兰印象记》等等，还著了《莎士比亚》，《易卜生》，《近代的精神》，《人与作品》诸大作品。他的风格是深刻有力、热烈、而又观察仔细，但有的时候是琐碎而不平衡。在他的论文中，近代丹麦散文的风格方始成熟了。勃兰特表现出了一位异常的批评家的面目；别的批评家大都是跟随了他所分析的文学之后的，而他则超出于其前。他的批评是预言的，是创造的。他促进了北欧的文学，其影响不仅在丹麦，也在挪威与瑞典。

丹麦的写实主义者们接受了勃兰特的鼓动而纷纷的出现；他们全都着力于表现当代的生活。当勃兰特初次出现于科平哈金时，约柯伯生（J. P. Jacobsen，1847 - 1885），特拉契曼（Drachman，1846 - 1908），享特洛夫（Schandroph，1836 -

1901）年纪还很轻。彭格（Bang，1857－1912）、盖莱鲁波（K. Gjellerup，1857－）及波托辟丹（Pontoppidan，1857－）则后来加入了这个范围中。虽然其中的几个人后来离开了勃兰特，甚且反对他，但他们全都得到勃兰特的一些益处。这个新的运动，勃兰特所领导着的，将脉搏给了每一个人，使他们的天才成形了，各自走到其指定的路上去。他们共同的具有几个好处，也具有几个弱点。他们的好处在于从已定的理论与正则的文学方式中解放出来。他们以崭新的眼光去接近人生，仿佛它从不曾在前被描写过似的，然后以他们自己的话来叙述它；他们的弱点乃在于他们的好处的正面，即在于缺乏任何的积极的信仰。

最可诧异的是，勃兰特主张中的第一个信条乃是：文学必须“表现出问题以供辩论”。在丹麦却比在挪威少有信徒；丹麦人所更为服从的，乃是他的第二个信条，文学应该是“生活的横断面”。这些丹麦作家都是完全依赖着他们的精密的观察的，所以他们全都拭抹去了一切人物与故事的已用过的模式；跟之而来的，便是他们常就近的取用手边的材料。约柯伯生的《马丽·格鲁薄》（Marie Gruble）是一个例外，但此作的背景虽是古代的，而书中女主人翁的发展与行动却仍完全是约柯伯生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的产生。

约柯伯生生于一个中等家庭之中，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的母亲将成为一个诗人的观念输入他的心中；但几乎同等热心的从事于植物学的研究。在大学的时候，他以研究他某一种生于泥泽中的植物的论文，得到了金奖牌。然而不幸，在他四出寻求标本的时候，他常常的为了省俭，吝惜皮鞋之故，赤足的走过泥泽，竟因此种下了可怕的疾病之根，这疾病终生与他争斗着，而他在三十八岁时便因之而死去。约柯伯生的第一篇小说《莫干斯》（Mogeus），以他的勇敢的原创的风格，惊动了当时的读者。

历史小说《马丽·格鲁薄》的风格，更为有特色，约柯伯生用了许多的古字古语进去。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约柯伯生自以为是一部近代小说《尼尔斯·林纳》（Niels Lyhne），这部书是半自叙传的，且反映出他的时代的思潮，在这部书的最后，写着：尼尔斯临死时还忠于他的无神论。这无疑的乃是约柯伯生用以策励他自己，作为他自己将死的预示的；法鲁·方斯（Fru Fanss）写的那封给他儿子们的美丽的信，表示出他希望他们忆住了他，也是显示他自己的心事的。当他的无可挽回的疾病再也不能治疗时，他便回到他母亲那里去，沉寂的，勇敢的死去，如他活着时的沉寂与勇敢一样。约柯伯生的全集仅只有上面举出的两部小说，几篇较短的故事，以及一小册晶莹如珠的诗篇。

约柯伯生的人生观是染着两个颜色的科学家的与诗人的。他爱好自然，却是一位科学家的爱好，他在他的文字中，舍弃了充满于前代文学中的妖仙，林女，海中仙女等等。在他的第一篇故事《莫干斯》里，那位浪漫的少女莎拉（Thora）质问莫干斯，如果他不相信山林湖水之中，住有小小的不可见的仙物，则他怎么能够在自然界找到任何愉快之感呢。莫干斯反对她说，他所喜爱乃是“形式与颜色，花木中所生的汁液，以及使万物生长的雨与太阳。”这正是约柯伯生自己的态度。没有一个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的人会供给丹麦文学以如此丰富的自然描写；如此优美恬静，而又如珠宝似的闪闪有光；但这仍是自然自身随了自然律而表现出来，他从不会允许自然与人类的情绪相感应着，如拉琦洛孚之所做的，或使我们觉得人与自然的脉搏在一同的搏跳着，如哈姆生之所做的。这种精密的科学考察，约柯伯生在描写他的人物时也是如此，特别是他的妇人。他是竭力斥拒“梦境的美妙的罪恶”的；人在梦境中每以为他们是比之真实的他们更好，更伟大的，但他们却“忘记了最甜美的梦境，最深挚的希望，在人类

灵魂的高度上一寸也不能加上去”。他因此更排斥一切的宗教与幻想的超自然的力。他以为，这个地球上的人生，如果值得生活的话，即使没有一位上帝或一个天堂的希望也已足够了。他的散文，其色彩的鲜妍富美，很可使读者眩目。他如法国的弗洛贝尔一样，在文学上也是雕饰得组织得很精细的。他开创了一个时代，他是丹麦的最伟大的一个散文作家。勃兰特说：“在他以前，北方文学中从没有过如他一样的用字语汇成的图画。”他的抒情诗人的天才，也并不以他的写实态度而隐没；他的诗篇虽少，却“一句一行都是珍珠”。

约柯伯生的同时作家特拉契曼，则与他很不相同，特拉契曼不是一个哲学家，除了积于他心中的问题之外，对于别的问题也一无兴趣；他乃是被新运动中的社会理论所吸住的。虽然他自己是上等的有产阶级的儿子，他却成了一个漫游的艺术家，常住在较贫苦的阶级中，且深切的关心于他们的福利。他决心要做一个海洋画家。他因此得以熟知水手们与渔夫们的生活，他们后来成了他小说中的人物。他游历到英国去，英国工人的苦况，更引起了他对于社会正义的主持的热情，且使他加入了丹麦的急进派之中，他信仰社会革命，他坚信，这场革命不久便会来了。特拉契曼所贡献于当时的小说界的乃是一阵微风吹拂的户外的元素，带着他的水手们与渔夫们的故事的。但他又有一个矛盾的性格；他乃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抒情诗人，在许多写实主义者中，他是永不会很适宜的奏着同调的。他并不反对写实主义的束缚，但他的诗人的本能却觉得，文学必须从无古今的价值中，即没有讨论什么思潮与问题，再也不会是近代的，也不会是过去的有价值之物中得到他的灵感。因此，他的性格便成了异常泥杂的。在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互相敌视的丹麦的知识分子的派别中拖来拖去；正像，在性格上，他也是依违于传统的贵族模式与他自己的浪漫不

羁的趣味之间的。在他的巨作的科平哈金小说《签了下去》(Signed Away)，拉特契曼将他自己的两方面的性格，人格化为两位朋友，一位是放浪的诗人，一位是苦作的艺术新闻记者。就小说而论，这部书颇为浑沌，但它却包含了不少段美丽的文字。在他的戏曲《铁匠委兰》（Weyland the Smith）其母题是从《诗的依达》来的，他表现出艺术家的意志与他的权力的不同来。他的可爱的神仙故事剧《从前有一个时候》（Once Upon a Time）在丹麦剧场上是非常流行的。在他著名的海洋作品中可以《海与海岸的故事》为代表。但在实际上，特拉契曼在丹麦文学中占重要的地位的，却因为他的抒情诗。

享特洛夫的文名在他当时是极为卓著的，人每视他为约柯伯生死后的一个最大作家，至今也还因他的和气的诙谐为人所嘉。他在大学里时，专门研究罗曼司的语言学，但他虽然得到高等的特著的文化，他却常常的眷恋着他少年时代的家乡。当他的朋友勃兰特提倡着写实主义时，享特洛夫很满足的知道，他可以用他的简朴的乡村生活的知识做文学材料了。他讽刺着职业阶级，特别的是牧师们，在他的小说《平常人》（Common Folk）里，他表同情于中下等阶级里的苦作的人。享特洛夫擅长于短篇小说，特别是写到了西兰特（Zealand）的农人们，他的笔墨是又真切逼人，又诙谐可喜的。

盖莱鲁泼（Karl Gjellerup）之依附于勃兰特一派大半是因为这一派的对于礼堂的敌视。盖莱鲁泼研究过神学，但他失望了，在没有得到学位之前，便一变而为一位无神论者。但这时他虽热烈的崇敬着勃兰特，到了后来，他却又热烈的反对着他了。他的伦理的意识，憎恶自然主义者的恋爱的观念，而他最后乃采取了自己解脱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很近于佛教的原理。盖莱鲁泼是一位小说家，戏曲家，又是一位抒情诗人。在一九一七年时，他

和波托辟丹合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的文学奖金。他久居于德国，颇为德国的知识阶级的生活所吸引，所以他颇有点远于丹麦发展的进程。盖莱鲁泼的同时人彭格（Herman Bang）和他有一点相同，即憎恶时人的对于恋爱的观念，这个观念一半发生于新的科学知识，一半发生于对于一切固定标准加以破坏的自由思想。但彭格却又有好些地方不像盖莱鲁泼。彭格他自己，无论在性格上，心灵倾向上，以及在文学风格上，都可说是他的时代的产物，他的感觉敏锐而清楚，却没有蔑视一切的勇气。从他自己战抖抖的脑筋中，他感到了别人的痛苦；他又被他的对于全体人类的痛苦的感觉而压迫着，几乎要驱到失望的路上去，他特别的警觉到因性的问题而生的可怜与毁败。在他的风格上，彭格是很要感谢约那士·李（Jonas Lie）的；他的几近女性的本能，他的小事小物的仔细考察，他的应用他们以表现出他的人物的印象的态度，全部像李。他所缺乏的却是这位挪威大作家的热而清朗的Timbre。他的调子是较低的，他的诙谐常是恶虐的，他的怜恤也常杂以憎恶。有时，他也能写出极完美的短作。他的《丁尼》是描写普鲁士人与丹麦人的战争的（1864）；这次战争发生时，他只有七岁，亲自尝过逃难的阅历。这是他的最好小说之一。他的母亲在这部书和较后的一部小说《白屋》里都是一个角色。他初欲做一演剧者，但失败了；又成了一位新闻记者，不久便以他的精健的文学批评惊动读者。他的最早的重要的小说是《无希望的时代》（Hopeless Generations），这是半自叙传。他的最可传的著作乃是他的短篇故事，曾被称为“悲剧的牧歌”，日常生活的恬静而不平凡的故事，例如他的短篇小说《路旁》以及在《羁绊之下》里的几篇短作。他晚年时，曾旅行各处，诵读他自己的作品。当他有一次旅行到美国时，他突然的死在火车上了。

波托辟丹（Henrik Pontnppidan）在他的早年作品里，提示

着社会的改造反抗着统治阶级，比任何同时代的作家都激烈。然而他却永远不相信，人类社会的得救乃在于党人的标语；他也不相信表面上的改革能够影响更好的组织，这更好的社会只能由于内部的缓缓的改良才能实现的。波托辟丹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他欲成为一个工程师，但到了毕业之后，他却成了地理与测量的教师。他在那里，娶了一位地主的女儿。波托辟丹的最早的短篇，收集在《乡村图画》（Village Pictures）与《从茅舍中来》的（From the Cottages），乃是描写农民生活的写实派故事；在他的长部小说《福土》（The Promised Land）里，他写的又是农民，但在这个更为广大的画布上，他却能写出较为复杂的模型。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讥嘲的称之为《有福气的辟尔》（Lucky Per），写的是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科平哈金的急进运动，介绍了许多的著名人物，在其中，乔治·勃兰特便是那桑博士（Dr. Nathan）。书中英雄辟尔·西特尼斯（Per Sidenius）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从家庭中逃了出来，立意要出去征服世界，但发见他的懒惰的血与传统的习惯竟与他的活动的能力并行而不能摆脱。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死人之国》（The Kingdom of the Dead）乃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间的一幅丹麦的悲观的图画，那时，自由主义已得到了他的最后胜利，在波托辟丹看来是十分空虚的。波托辟丹的最近的作品，是一部长篇小说《人的意志》（Man's Will），在这书里，他讽刺着世界大战中的丹麦政策。他在一九一七年，与盖莱鲁泼，共同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波托辟丹的作品可以“消除幻想”来形容他们。他是悲观到核心的。他绘了全黑的图画，画得很工细，他也太知道了人性，他的世界中充满了傻子与滑头。即在他的最高贵的人物中，也是空虚无用的。例如，《福土》中的理想主义者，韩斯特（Hansted），一个牧师，力欲模拟基督的生活，而终于失败于宗教的发狂。他的妇人们也

是性格复杂，失去了与幸福同在着的浑朴。波托辟丹以为，真正有力的性格乃最可在从深处出来，仍有许多泥土附在他们身上的人民。在《死人之国》中的脱职的牧师，以及同书中的自由党领袖，都是如此。自由党的领袖，虽缺乏一切绅士的本能，却具有真正的伟大性格。这些人得到了一点成功，但在这里，作者的悲观主义又告诉我们说，这不过是短时间的。第二代人没有争斗的传袭了政治与宗教的自由，也是不会两样了的。情形要是变更了，人民却仍是同样的。波托辟丹不耐烦听美辞俊辩，无论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他相信争斗与受苦，被迫害乃至妒忌，乃是一个健全的发展所必要的。波托辟丹现在是丹麦小说界中的老宿了，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的纵横于文坛的巨子现在仅剩下他一个人了。终他的一生，他都坚持着写实派早期领导者所定下的最高标准，然如中流砥柱一样，不受十九世纪末的一切变动的影响。

约柯伯生在《尼尔斯·林尼》里，创造了一个英雄模型，命中注定了要发生了许多的模似。尼尔斯·林尼是一个梦想者，自己怀疑者，不能够措置生活的，他的天性却是健全，他的本能，却是美好的。在彭格的描写里，这个型式成了神经衰弱的，到了后一代的作者的手中，这个型式更是堕落了。最流行的主人翁乃是一个颓废派，其与尼尔斯·林尼相同之点仅是不适合生存于有组织的社会中。文学成了咖啡馆，林阴路以及凹室中的东西了。

在同一时代，斯堪德那维亚文学界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动，转向于新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上去。在瑞典，浪漫的九十年代，产生了海滕斯顿（Heidenstam）与拉绮洛孚（Lagerlof），以及别的第一流的作者；在挪威，主要的作者是哈姆生（Hamsun）。丹麦也有同样的运动，但没有产生出任何伟大的小说家来。在这个运动的领袖中，最重要的是一位抒情诗人约格生（J. Jrgensen 1866－）；他的反对前一个时代完全出发于宗教的观点，他的作

品也富于宗教的象征色彩。戏剧家与论文家洛特（H. Rode 1870－）至今仍是一位极坚决的反对勃兰特的影响的人。

在小说的范围之内，对于十九世纪写实主义的反动乃开始于现世纪的初年；这些新作家，所反对的并不是勃兰特他们的写实主义；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勃兰特他们的大同主义，他的智慧的傲倨，以及他们以为丹麦的文化生活是开始于科平哈金，终止于科平哈金的。勃兰特曾竭力的破坏了国民的习惯，强迫丹麦人去接受流行于当代欧洲的观念。他和他的跟随者所缺乏的是想到丹麦的民众生活。新的作家却与他们完全两样；他们不是生长于科平哈金的，他们是从外省来的，他们是从农村中来的，他们以他的来源自傲。阿克约（Jeppe Aakjaer，1866－）的态度便是这一派的代表，他是一个农夫的儿子，自己也还过着农夫的生活；他在抒情诗中表白他邻人的生活，阿克约和这一派中的大多数作家都是约特兰（Jutland）人；约特兰是丹麦的大陆，比之诸岛，少受外来影响的侵略，保存了较多的北欧的特质。他们自称为“约特兰派”（Jutlandess）；在这一派中，最重要的是约生（Johannes V. Jensen 1873－），他没有疑问的乃是丹麦现代文学中的一位主要人物。在同派中，我们还要算上科纳生（Jakob Knudsen，1858－），他是一位较老的人，一个从前的平民学校的教师，一个急进派，常在内心的理智与宗教的冲突中。他的小说多半写于现世纪中。诙谐与成熟的智慧使得他的小说，值得流行于四方。别的约特兰派的作家是白莱刚台尔（Marie Bregendahl），史克约特堡（Johan Skjoldborg），在年轻后起的人中则有洛根（O. Lokken）与苏依堡（Harry Soibery）。阿克约与史克约特堡二人都用小说来做社会改造的工具，绘写着最低级的农业工人的黑暗生活。然而阿克约的作品，最伟大的却是他的诗歌；他的歌声如钟声似的洪亮；而史克约特堡（1861－），则为一个雄健的散文

作家。史克约特堡所写的，不仅是农民们的生活，而且是他们自己的见解。特拉契曼、亨特洛夫以及波托辟丹他们所写的农夫与渔人是出之于或多或少的同情者的观察的，而史克约特堡他们所写的农夫则是深入其中的，作者的本身便是这些受苦者，便是这些受苦者的代表。他的小说《一个战士》（A. Fighter），写的是一个约特兰西部的穷苦农佃的生活；《格尔杜姆》（Gyldholm）出版于一九〇二年，第一次引起人家对于作者的注意的，也是一部写作苦工者的穷况的。这诚是一幅黑暗的图画，但却出之以恬静的，客观的态度，一点也不加批判。洛根所写的有力而原创的小说，其题材也是如此。苏依堡（1880－），和他们也很相近，他所找到的小说背景是农夫与渔人的宗教的骚动。他的作品，如《古舟》（The old Boat），乃将海洋与陆地的趣味合而为一的。他的《西部约特兰的先驱者》写一个农夫在荒地上开垦，希望在其上建立家庭，但他的力量用尽了，他的儿子离开他到美洲的沃土去了，他的成绩终于失败。他的主要作品是三联部的小说《活人之地》（The Land of the Living），以一个少年农夫为主人翁，人物事实都极复杂。他的最近小说是《海王》（The Sea King），一部新的小说丛书的第一本。背景仍是西约特兰，“海王”乃是一个武断乡曲的渔夫头脑。白莱刚台尔所写的则与他们完全不同，她画着可爱的家庭内部，创造出好些农村妇人的型式。

约特兰派所造成的是所谓“海玛斯文学”（Heimath Literature），这文学在挪威也很流行，他们每个人都认定了一方地域去写，研究它的人民，他们的方言，性格以及习惯，研究得极为仔细。他们这样的范围他们的园地，便在其艺术上加以严峻的限制了。他们仅写思想与感情都很狭小简单的平民，便是绝于比较复杂的阶级了。但他们失去了复杂，却得到了原创与坚实。他们产生的是一种为平民的且是属于平民的文学。

约生（J. V. Jensen 1873－）之成为一位“海玛斯”派作家，其原因仅在于他取了他的家庭住了好几代的地方作为他的出发点。这个地方，约生当作古代很光荣的民族（The Cimbri）的老家；他的目的是要将本地的爱国心与种族的更大的生命联合在一处。在他的近代的本地人中，仍可见到原始时代的影子。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凶暴的复仇与坚忍以及他们的村乡的诙谐，似是属于石器时代。在他的小说丛书《长途》（The Long Journey）里，约生将北欧民族自史前以至近世的开端都写了出来；他在诗人的想象之中，将北欧的神话，人类学，地质学，历史等等全都混在一处了。但比起了他的观念的弘伟，与他想象的诗的优美，这些专门的艰苦的研究的结果，诚要大为减色。最不忘记的是，对于北欧进入到“冰时代”时的夜间的描写，当那时，一切的野兽，大的，小的，浑忘了古老的恐惧与敌意，发狂的经过黑暗飞奔着，在冰冷冷的气息，渐进的冰河之前逃走着。人民已经在冰与雨之前逃走了，但只有一个少年，他却将脸朝着北方，要去征服那新的仇敌。他在冰河上找到了一个女郎。北方的民族便是由他和她传下来的。在他回到原始的与英雄的情形的描写时，他和后期十九世纪的写实派断绝了，但他也没有向继于其后的浪漫派借到什么东西。在他的风格上，约生是完全近代的。这风格是有力而迅顺的。约生的祖先，有好许多代是约特兰的农人。他的早期作品，（其中最著的是 Ejnar Elkaer）用的是批判的自己分析的风格，仿着约柯伯生的《尼尔斯·林纳》的型式。他的美洲一趟，这一趟的旅行，使他赏赞着成功与乎物质及技术的进步。在他的哲学的游记《高特的文艺复兴》（The Gothic Renaissance）里，约生第一次发表了种族的理论，表扬着高特族。他的丹麦历史小说《国王的失败》（The Fall of the King）与两部写美国近代生活的《奥拉夫人》（Madam d'Ora）及《车轮》（The Wheel）都是

与高特族的历史有关系的。此后便开始了他的绝大的巨著《长途》；这部小说丛包含着六部独立的长篇小说，《失去的国土》，《冰河》，《运命女神的客》，《辛伯利人的足迹》，《船》，及《克里斯多夫·科伦布》。约生的最近著作是几册的诗集，几部论文集，五册的称为《神话》的精美的自然故事等等。他的诗是富于原创的精神与诗的想象力的。

尼克莎（Martin A. Nexö，1869－）的出现又代表一部分的文坛的转变。他不是一个约特兰派，他不是一个农民作家，他乃是描写城市的无产阶级的。农民的作家写的是人民中最守旧的分子，他们视个人为传统的信仰与习俗的坚固组织一部分。尼克莎则取了没有祖先的历史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别的作家都将他们的主人翁附上家庭的地位，学校的教育，世间的善德，在尼克莎的巨作《胜者辟尔》（Pelle the Coqueror）里，作者却创造了一个主人翁，依照着作者自己说的话，这个人乃是“赤裸裸的从一无凭藉之中跳出而征服了世界”的。在辟尔的女性的相对者，《狄戴：人的女儿》里，尼克莎更进一步的主张个人的神圣。“每一个秒钟总有一个人类出生于世上……那个前之未有的，现在是成了肉与血了。没有一个人是重复从前已过去的人的，或将为后来的人所重述。每一个新的人都如一粒彗星一样，千万代之间，只有一次是与地球的轨道相接触的。”狄戴的故事比之辟尔的格外的黑暗。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仆，为人所凌辱，以至于死。尼克莎他自己是过着极穷苦的生活的，他深知，他们能够，并且常常的，在似乎拒绝一切较好的情感的发生的情形之下，保存着他们的人的价值。他不仅表扬穷人的传统德性和气而且忠心，且还描写着他们的能保守着诙谐的意识快乐的能量以及生活的优美。《辟尔》一作的美妙无伦，使它的作者赢得了世界的荣誉。他所写的不是某一件事，乃是永久的存在于有的与

没有的之间的争斗。尼克莎的家庭极穷，他从少便是要为家庭做事。他如他的辟尔一样，曾为一个鞋匠的学徒，因为不喜欢闷在屋内，又做了泥水匠的助手。因为朋友的帮助，他才能进平民学校读书。他的好书之癖，得以满足了一点。当他开始写东西时，他已经快要三十岁了。他常是渴望着社会的改造的；所以当欧战之后，俄国大革命告成时，他便到了苏俄去考察。他的《向于黎明》的一书，便是旅游于此邦的一部热诚的记载。

此外还有好几个作家，不能不在此提起的：魏特（Gustave Wied，1858－1914）以他的喜剧著名，最能逗人发笑，一个美国的批评家称他为一个“不悲愁的丹麦人”，但其实，他的诙谐是放在表面上的，他们的骨子里却充满了人生的讥嘲的与悲观的见解。他的两部有力而阴郁的小说都是如此的：《家庭》与《吃葡萄的父亲们》。他的喜剧可以举《四部笑剧》及《较弱的性》（即女性）为代表。他的《二二为五》，充满了讽刺的意味，曾征服了德国的剧坛。他的作品显然是杂有矛盾的成分的。在有的地方，他是属自然主义者之中的，但他的喜爱幻想的讽刺，却又成了写实派的敌人。伊士曼（Gustave Esmann，1860－1904）、兰格（Svan Lange 1868－）及倍格斯特隆（H. Bergström 1868－1914）诸人也俱以作剧著名。倍格斯特隆的两部问题剧，《卡连·波尼曼》（Karen Borneman）及《林格特公司》（Lyngaard and Company）尤有影响于时；前一部写的是性的问题；后一部写的是一件跨越了劳资的战线的恋爱故事。更有爱德华·勃兰特（Edward Brands 1847－），那位大批评家的兄弟，也是极有天才的，他是一个编辑，一个政治家，又写了不少的喜剧。彭逊（Otto Benzon 1856－），一个有名的化学家，也常以笑剧贡给科平哈金的人们。

卡尔·兰尔生（Karl Larsen，1860－），为隶属于科平哈金派

的一个作家，且也是一个严肃的写实主义者。他的小说是立在科学调查的结果上的。他不倦不息的收集人类的经验。他特别喜于收集平常的不知名的人的信札。有一次他到了北美合众国一趟，其结果却发表从美国的丹麦移民那里来的许多信件。他除了写些短篇小说之外，还写了好几部心理小说，其中以《依克士博士》(Dr. Ix) 为最有名。他也写些游记，亦以观察的精密著。

妇人作家丹麦没有瑞典那末多，那末重要。但格特夫人(Madame Emma Gad 1852－) 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她写了许多诗，政治论文等等，还写了一部喜剧《金色鸟》。

安克·兰尔生 (Anker Larsen) 的小说《点金石》是欲回答发生于近代人心中的几个问题的，也包含了一个宗教的理论。这部小说虽不能说它的艺术十分成功，然至少是一部表现今日的丹麦文学的纠纷的网中的重要的一个调子的。

更有许多诗人，批评家产生于这个时代，自勃兰特到约生他们之间，但这里都不能一一提及了。只有两个人却不能不一说的：一个是大哲学家霍夫定 (H. Höffding 1843－)，一个是冰岛作家而以丹麦文写他的作品的居那逊 (Gunnar Gunnarsson, 1889－)。

霍夫定为丹麦人所敬爱，也为丹麦以外的人所熟识，我们与其说他要发展一个新的与众不同的哲学系统，不如说他是想要调和已经存在的思想的各派的。在霍夫定看来，哲学乃是关涉于温热的人类的问题的，不仅仅是冷淡的分析的：他建筑在本能与同情之上。在一八九〇年时，他和勃兰特大开笔战，为的是勃兰特主持着尼采的超人的学说。乔治·勃兰特的论文，虽有力，热烈，然而不平均，破碎，无结构；而霍夫定的哲学系统则是清楚的，有条理的，他要从近代的许多信仰中，建筑起一个有益于一般人的合理的哲学。

居那逊是一小群以丹麦文写他们的作品的冰岛人之一，但他们的材料，却仍是从冰岛而来的，因此，增入了丹麦文学中的异邦趣味。他以他的《只眼的来客》（Guest the One eyed）最为人所知。《生命之岸》（The Shore of Life）的中心人物是冰岛的一个牧师；《圣地的一只狼》（A Wolf in the Holy Place）其人物则为都市的一个政治家，这两个人皆因传统的性格的柔弱而失败了。居那逊也写些剧诗，但最著名的还是他的小说。他的观点是悲剧的，他的调子是阴郁的。当一个灵魂的胜利得到了时，常是花了可怕的代价的，但其结果总常是失败。

三　现代的挪威文学

挪威的文学，在沙格（Saga）时代便已是很可观的了；沙格的诸作家都很能运用他们的材料；到了古代文化停顿了时，文学便变其形式为神仙故事而存在于农民之间。这些故事，后来为挪威作家所采集、所收用时，颇显出一种异彩来。十九世纪之初，有魏格兰（H. Wergeland）诸人在开始建设挪威的国民文学；自易卜生（H. Ibsen 1828－1906）出来之后，挪威文学开始为世人所惊奇，而其影响乃成为世界的。在叙述现代的挪威文学上，易卜生的时代是已经过去了的，然而却不能不略略的提起一下。

易卜生不仅为挪威文学的光荣，也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光荣，论者每称之为近百五十年来，欧洲最伟大的一个作家。他早年的生活很贫苦。他在一八五〇年与般生（Björnson）认识，才开始在文坛上活动。他的一生，共写了二十二部剧本。这二十二部的剧本可分成四个时期；全是跟了时代的趋势而变动的。第一个时期有六部罗曼主义的剧本；大都是韵文写的，装载着抒情诗

的美，其题材则取之于古代的北欧传说，恰与当时流行的过去英雄时代的光荣的梦想相合拍。这些剧本是《恋爱的喜剧》等；第二个时期是转变时期，恰是由浪漫的时代变到写实主义时代间的一个中间期；这时代产生了四部剧本，如《辟尔·金特》（Peer Gynp）《少年党》等都是很伟大的；这一时期的易卜生，其作品才不仅为挪威人所知。第三个时期是写实主义的时期，易卜生完全弃去了他的诗歌与传奇，专心一志的去写散文的问题剧，如《社会栋梁》，《傀儡家庭》，《国民公敌》，《雁》，《群鬼》，及《海姐传》等，论者每以这些问题剧为他的代表作，因为这些作品不仅为喜剧的杰作，且还鼓励了社会的问题的讨论，所以他们便称他为“社会学的戏剧家”。其实他却始终是一个诗人。到了他的晚年，第四期的六部作品陆续出现时，大家才恍然的知道，易卜生不仅为最大的写实派剧作家，且也是最大的象征派的戏剧家。这六部作品都是富于想象，富于诗意的，以《海上夫人》，《大匠》，《小爱约夫》（Little Eyolf）及《当我们死人复醒时》为尤著。这些剧本都是极精美的心理剧。《当我们死人复醒时》恰恰出版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易卜生的文学生活终止了，挪威的前期的伟大的国民文学也便终止于此，而后期的另一个大时代便与新世纪一同开始。

易卜生的时代同时还产生了几个大作家，如般生，约那士·李及开兰。般生（B. Björnson 1832－1910）是一个国民作家，从少便鼓励着挪威人民向着不自私的爱国主义走去。他写作了许多挪威人所亲切讽吟着的爱国歌。他的晚年叙写农民的故事，《奥尼》（Arne）、《一个快乐的童子》（A Happy Boy）等，为近代小说开了一条新路。同时，他又写了很多剧，其材料皆取之于挪威的过去。在其中，有伟大的三部剧（诗剧），《西格·史冷甫》（Sigurd Slembe）是最著名的。一八七五年时，般生开始写他的

近代散文剧，第一篇是《破产》（A Bankruptoy），他自此便也投入时代的旋涡中，将文学当作了讨论社会问题的工具。《挑战的手套》（The Gauntlet）是攻击道德的可疑的标准的。在他的小说《科特家》（The Kurt Family），他继续的攻击双性的道德。到了般生的晚年，他又成为一个热切的基督教徒，他的剧本《在人力以外》便是写宗教的信仰是如何的伟大的。天然的像他这样的一个急进派，反对攻击他的人一定很多；但当他在一九〇二年举行七十大庆，连反对派也给他以祝辞，第二年他便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但创造了近代的挪威小说的，并不是般生，却是约那士·李（Jonas Lie，1833－1908）。他的童年在北方的渔夫与海滨居民中度过。他们后来便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他初为律师，遭了失败，始改业为文学家。在三十七岁时，他便发表他的第一部故事《第二眼》（Second Sight）。这是从他的冰天雪地的北部挪威的童年回忆中写下的；题材与叙写都是崭新的。不久，李便被人发见海洋故事乃是他所最爱写的，然而这些海洋故事却不是冒险的故事，却是叙述渔夫们的家庭生活的，例如《水手与其妻》，《路特兰》（Rutland）及《向前去》（Go Ahead）等。然后，由这些渔夫的家庭，又一转而着笔于他自己所属的职业阶级的家庭生活，其代表作为《买办的女儿》，《结婚生活》等。因了他的仔细而同感的观察，他的琐事细情的聪明的活用，他造成了一个可诧人的活泼，一个新的印象的风格。李的写实主义小说，大行于时，但他自己却觉得他们只表现出他性格的一面。神秘的作风，在他第一部作品中曾经一现，后来乃为他的全个写实主义时代所压抑住者，在他的晚年便又写成了两册，总名之为Trolls。李的人物都是将他们自己的生活，现于我们之前，作者一点也不加涂饰批判，他们的说话也是以他们自己的声音说出的。他的风格也是近

代而个人的，以一点一点的琐事产生出了它的效力来，正如一个印象派画家油布上的画点一样。但约那士·李虽为一个写实派作家，他的一生却全然远于严峻的现实生活，他反对着勃兰特的新的呼声！“文学必须拿起问题来讨论。”他并不讨论问题，然而在他描写中，自见出社会的崩坏的现象。

官吏绅士的一个阶级，到了那时为止，乃是挪威的领袖阶级，许多人便将挪威的一切可斥责的腐败东西都归之于他们身上。这种反动的主要开口的人便是开兰特（A. Kielland 1849－1906）。他的攻击，特别的加于牧师事业与教授事业之一，他责备他们使人民迷信而无知。开兰特家世经商，所以他早年也在商界，但后来却放弃了商业而专心于写作。开兰特的观点是大同的，但他描写却常在于他的本镇。他的《工人》，《毒物》，《雪》，《中夏宴》等等，都是对于社会的腐败现状下严峻的攻击。他很注意于技术的完美，所以他的风格是很精巧的。他与约那士·李不同，李不大同情于勃兰特，他则为勃兰特的一个崇拜者，且是爱德华·勃兰特及约柯伯生的密友，很受丹麦的他们那一派的影响。

后期的挪威国民文学，其早年是受着自然主义的支配；赤裸裸的大胆无谓的表现出许多的社会现状来，很像当时的□□□[①]格尔波（Arne Garborg）与史克兰（Amalie Skram），二人便是毫不顾忌的赤裸裸的揭开了两性罪恶的不愉快的事实的。格尔波（1851－1924）的祖先是农民。他的家庭中弥漫着宗教的空气，他自己说，他是“生在十七世纪”的。他受了当时的急进派的影响，成了挪威最有能耐的反对宗教者之一。他的第一部小说是《农家学生》，从他自己的环境中仔细的写出农家孩子的生活。

① 原载刊物字迹不清。

《人》与《倦了的人》（Weary Men）是写纵酒者的侧影以及他的醒时的感觉的。他的《和平》，写的又是他的老家。他的作品纵识着诙谐的才能。他又生来具有抒情诗的天才的，其最美丽的表现是一部抒情诗句《赫杜莎》（Hantussa），颂读的人异常的多。他的唯一剧本《教师》，上演时很得成功。他的大多数的书都是用他的本地方言写出的，这种方言特别的适宜于诗的表现。

史克兰（1847－1905）未嫁时的名字是阿尔夫（Alver），她生得极为秀美，在十七岁时便缔结了一场不幸的婚姻。直到了十三年以后，她才与她丈夫离婚而得到自由。她有一时专心于新闻事业，因此，她得以与当代的主要文人相接触。她嫁了丹麦作家依里克·史克兰（Erik Skram），虽然她后来和他离了婚，却仍住在丹麦，且还用着他的姓。她的第一部重要小说《结婚戒子》(1885)，攻击着男人的不道德，那么坦白的赤裸的写出，从前没有一个挪威的妇人敢于那末写。《弗鲁·依尼兹》(Fru Inez)，《被骗》及《鲁西》（Lucie）全都是不幸婚姻的可怕的画图。然而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却是四大册的小说丛《希莱米人》（The Hellemys Folk）(1887－1898)。这书写的是一家贫苦的家庭，受了一切遗传律与环境的支配，须永住于产生罪过与贫穷的地位上。她的赤裸的自然派的描写法以及她的热心于社会的黑暗面的攻击，完全是属于当代的文派中的，但她却没有她同时代作家的对于将来社会的乐观的信仰。她虽住在丹麦，她的题材却全是取之于挪威的。

坦白的与赤裸裸的表现乃是挪威文学的一个特质。在挪威，以文学为实用的社会问题的工具，其运命并不很长。在九十年代的开端，哈姆生（Knut Hamsun 1859－）便以带来了一个新的浪漫主义与新的代价而来。哈姆生又呼着超越的个人的权力。他不顾什么用以测量好的国民的道德，他所注重的是个人的不能贴标

识，不能分类的性质；这些性质组成了人格的主素，决定“一个人留在你口中的是什么味儿”。这是真的，在哈姆生的后期作品中，他也不由的不成了一个教训人的角色，但他的使命却常是最简单的，最主要的，说着男与女间及人与大地母亲间的关系的，自然是友爱而且有利的；苦扰之来都由于人们的技巧的创造。他的自然而平易的风格，影响于挪威文坛很大，特别是他的《土之生长》（Growth of the Soil），在引导小说作者们到简朴原始的生活为他们的题材，尤有影响。然而就一般看来，近代小说家的趋势是趋向于写实主义而不是趋向于浪漫主义，他们要去描写生活，却不想去解释生活。所以哈姆生的影响最大的还在他的风格而不是他的趋向。哈姆生的幼年，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有系统的教育。他在夏天，便做了一个牧牛儿，还使他做着他的幻梦，熟察出动人的美丽的自然风景，他后来将这些观察引进了许多到他的书中去。他曾到过美国去求职业，但一事无成，便回到挪威来。在奥斯洛（Oslo）有几个月找不到事做，其结果便成了他的杰作《饥饿》（Hunger，1890），这部书使他立刻在斯堪德那维亚诸国成了名。在这部小说中，如在他的其他小说，《神秘》与《盘》，他的恋爱牧歌《委多丽亚》（Victoria）以及他的剧诗《末根·文特》（Munken Vendt）一样，其主人翁乃是一位浪漫的，飘流的，又博大，又自私的，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以外的人物。这个英雄后来重又在他的《浪游者》及《最后的快乐》中出现，但这个人现在已是老了些，与其说他是一个生活的实演者，不如说他是一个生活的考察。《土之生长》（1917）乃是他的成功的极点。他取了一位原始的个人将他放在未被玷污的“朋友”的自然中。此书之作，正当欧洲大战未了之时，所以格外受人欢迎。这使哈姆生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哈姆生的文名全在于他的小说，但他也写几部的剧本，一册的诗集，诗集之名为《荒野合唱队》

(The Wild Chorus)，具有伟大的抒情的美丽。

有天才的挪威作家一大群都是出于农村之中的；格尔波是农夫之子；哈姆生和包以尔（Bojer）也是如此。别的人，如般生及波尔（J. Bull）乃是乡村间牧师的儿子。所以当代挪威小说的常常使用到农人及农村，本是由于作者本身的熟悉；半也是由于近代人对于人种的来源及人种的历迹的感到兴趣。农人们是最守旧的，少与外面世界接触的，他们便贡献了最好的田地给寻求他们自己本族的型式的挪威人了；他们乃是"真正的人民"，唯一的真正的挪威人。我们在挪威小说中，可以看出关于农人生活的故事，其变迁是跟由了别的人对于农人态度及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而变迁的。格尔波是叫着反抗的声音的。在杜安（Olav Duun）的作品里，我们便看见农民他们自己走了出来；他们是静定的，并不如格尔波的骚动。

波尔（Jacob B. Bull，1853－）初研究神学，但他并不成了一个牧师，却成了一个作者及编辑者。他开始了他的文学工作时，便力与当时流行的文学潮流相抗；他的剧本《无责任》(Without Risponsibility）乃是与易卜生《群鬼》里的遗传原理相抗争的。他的最为人所知的著作乃是历史小说，伟大的挪威人的传记及他本土的故事。他写了不少的短篇故事及随笔，后来集为五册，总名为《民间故事》。他还写了好些长篇小说，最近出版的是《萨姆尔先生》（Sir Samuel）及《萨姆尔先生的国家》，他在那里写的是一百年前的一个牧师的生活，在那个时候，乃是全区的父与政府。他的最近的小说《孩子》（Child）乃是一篇反对生育节制的议论，编成了小说的。

包以尔（Johan Bojer，1872－）从他自己的各种的经验中，得到他的对于各种人及人的情形的深切知识。他是自己造成的人。仅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已经要自己去做工生活，当他童年

时，又尝到了冬钓的苦境。他的学问大半由于自修。后来，住在外国好几年，特别是法国，因此，他的眼界更为阔大了，包以尔书中的人物虽全是挪威的，他的根本观念却是全个世界的；这使他，联合上了他的活泼有力的描写，及叙述故事的天才，赢得了他本国以外的名誉。他的读者社会在法国及英、美二国特别的多。而他的名字则连中国、日本、印度也都达到了。包以尔的第一次在他本国得名的著作是一部小说《人的一行列》（A Procession of the People）（1896）；几年之后，他又连续的出版了好几部心理小说，《一个进香的历程》（A Pilyrimaege）、《谎言的力量》（The Power of a Lie）及《爽约的土地》（Treacherous Soil）。其主要的调子是报应的不爽——即忏悔也不能扫去了错误的结果。在他的《归家》一作中，其情调也是如此。在他的所有著作，没有一部小说，有像《大饥饿》（The Great Hunger）那末流行得广的。这部小说在欧洲时写出，乃是一个人的故事，他失去了世界，但却因他自己对于一个敌人给以救济之故而重得到了他的对于上帝的信仰。包以尔的后期作品，《上帝与妇人》，《委金斯的最后》（The Last of Vikings）以及《我们自己的人民》都是挪威平民的真实而同感的故事。包以尔的小说，在本国最流行，最受热烈的欢迎的是《委金斯的最后》。他在国外的名誉，全在于他的“概念的小说”（Novels of Ideas），他取了某一种感情或特质，例如，努力，母亲，精神上的饥饿等等，使他成为书中的主素。所以他的书，其趣味是集中于观念上而不是集中于人物上的。最近的小说的丰富于真切的生活的热烈气味，使他在挪威读者格外的加多。

杜安（Olav Duun，1876－）的作品出之以自然流利的方言；他乃是今日挪威的唯一的方言文学家，赢得了全国的，甚至于全世界的名誉的。他是一个学校教师，他的人物，他永远不许他们

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地域之外，他写的是没有学问的农民，他们是真切而不加以虚饰的。诚然的，杜安在他的叙述由于两派反对而起的问题上可以与易卜生相比，又他的对话的精审，意中有意，也可与易卜生相拮抗。杜安的重要作品是一部六种联成的小说丛，其总名即以第一部之名为名，《求委京斯》（The Juvikings）。这书细述着一家农人的好几代以来的生活与境遇。在第一部中，我们见到那些“老头儿”，粗暴的战士，不怕人，也不怕鬼；在《盲者》中，其主人翁乃是伟大而仍带着原始性的盲者安特士。在《大婚》中，我们看见这一家的中落，但亚丁（Odin），盲者安特士的曾孙的出现，又使这一家中兴起来；亚丁的经历，见于《仙地》，《少年》及《雷雨》这最后三部的小说中。亚丁以他的高尚清洁的理想主义成为教区中的一个领袖。在《雷雨》中，他为了救全他不忠实的朋友而自己情甘去死。这时野蛮的老求委京斯的家庭进化到最后的样子。在《盲者安特士的故事集》中，杜安搜集了一群的故事，假托为盲者安特士在他老年时代，家人在冬夜围坐于火炉前面时所叙述的。这些故事带有很多的民间故事的美丽。

在后期的挪威作品中，农民的种族性格表现出很不同的型式来。般生的农民是一般的型式，是全个挪威的型式。今日的作家，他们每个人却都各到他们自己的山野及教区中去取材料。挪威的山谷与平原是多为高山及广大的高原所隔的，所以人民是如他们的自然环境似的不同。安路特（Aanrud）的本乡，与哈姆生的不同；史格得（Scott）的南方也与波尔的高林山溪之地不同。人民是同样的歧异。伊格（Egge）的硬头僵颈的农民与法尔·克保格（Falkberget）的粗暴的农村矿工因此便也大不相同。

安路特（Hans Aanrud，1863－）在少年的时候，不是看牛，便在他父亲的农场中作工，他得到了他本土的自然与人民的亲切

知识，这在后来给了他的故事以那么忠实的气氛，然而他却不允许常埋没于农田之中的，他的天才被发现了；他被送进了学校，还去考大学。但他的对于文学及剧场的兴味比之学问更甚些。安路特为最好的农民故事作家之一，在挪威是已经确立了的。他的风格很可在如《当霜降落时》的短篇中看出；他描写自然，新鲜美丽，描写农民生活则亲切可喜，题材是挪威文学中很熟悉的：小小的不要紧的事件，几位朋友们永久的隔别了；但安路特的诙谐与他的对于人性的信仰竟将一幕可能的悲剧变而为一首牧歌了。在他的最流行的作品中，还有几册给儿童读的故事集，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回忆收集下来的。安陆特还写了几部通俗的喜剧。

史格得（Gabriel Scott，1874－）是一个以牧歌的作品著名的作家，这在挪威是很少的。但他第一次以全力写出的却不是牧歌，而是一部惊人的悲剧，《火审》（Ordel by Fire），《约委蒲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Vibe），出版于一九一五年。这部作品描写两位年轻女子被了杀人嫌疑，怎样的死在刽子手的故事。继之而出的《安克·鲁平的生平：一个爱国的传说》（The Life of Enck Ruben：A Saga of Patriotism），都是出之于一个纪年的形式的。《他的泉源》，《一封关于渔夫玛考士的信》（The Funtain，A Letter About the Fisherman Marcus）是一个贫苦渔夫的故事，他独自住在他的小茅舍中，无妻无子，欢欢喜喜做着他的苦工，自己灵魂中得着满足。他一点也不模傲，然而这书与哈姆生的《土之生长》却是很同调的，不过在史格得的文中，满足的来源乃是宗教的。同样的精神也表现于史格得的《道路》（The Path），这是一个贫苦残废的牧人的故事，他和他的妻及他的羊住在高原上。《金福音》（The Golden Gospel）乃是成了一本书的一个神仙故事，滑稽的叙述出上帝和圣彼得怎样的游历人间，见到些什么。他是住在南方挪威的，所以人物都是南方的。

伊格（Peter Egge，1869）是一个生产很丰富的作家；他在短篇小说，小说，戏曲的范围之内，都写了好些美好的著作。他初以描写他的家乡的短篇小说得到成功，后来也常回到同一的来源中去。在小说一方面，伊格初以历史小说著名。在他的较近的作品中，其材料已改从近代社会中去取用。在《深的弗约兹》（In the Deep Fjqrds，1920）乃是一个山谷中的坚强，高傲的农民贵族的图画。《约特委与他的上帝》（Jaegtvig and His God）是研究一个贫苦农夫的生活的，他以为他的出生乃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宗教的。《当彼得特·苏尔堡归家时》（When Peder Solberg Came Home）乃是伊格与忠心作工而没有想到报酬的贫民表同情的作品的一个代表。他以恬静的低声小心的写出他的人民的内心生活；他对于这，比之对于他们生活中的外事尤为注意。在几部喜剧中，伊格的诙谐充分的表现出来；他又写着严肃的戏曲，在舞台上也都很得成功。

法尔克包格（Johan Falkberget，1879－）在他所生长的矿工区中得到了一个新的背景与一个丰富的新的材料。他的人民是做农的矿工。在九岁的时候，他便到矿中作工去，所以他异常的熟悉他们这些艰苦的粗野的生活。他熟悉了许多的不同型式的人民：农人，工人，拉卜人，芬兰人，瑞典人，及挪威人。当他开始研究这个在永久之雪的边上的小矿镇时，他发见德国熟练矿工的后裔，丹麦的贵族，瑞典的将军，甚至于一二个国王的后裔。他将这些人全都织入他的小说中，他以不平常的纯粹的说故事的愉快说出。他的材料无论如何粗硬，他却能运以大力，而他的对于自然的感情，也增加了诗的美丽进去。法尔克包格的前期小说，论者多举《从约菲尔来的李斯倍》（Lisbet from Janfjell，1915），这是一个从山中来的妇人，她嫁了一个从谷原中来的男人，无论如何，不能与她的环境相适合。《第四夜的看守》（The

Fourth Night Watch, 1923）是说到一百年前的他本乡的故事，书中主人翁是一个牧师，他的道心为环境所扰染，但最后则由信仰与忏悔里得到了和平。

在包以尔的“观念的小说”里，伦理的趣味是超绝了一切的。在安达西（Sigrid Undser, 1882－）的作品里，这个观念也占了上风，而在她的后来小说中，这个观念还披上了宗教的衣冠。她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理想主义，在几个地方，有点回到旧的标准中去。在绝叫个人权利的一个时代之后，她使她的弘丽的天才改到一种人生理论中去，这理论是讲到义务而不大主张权利的。她维持着家庭的神圣，主张一个结婚的理想，唤起牺牲与忠贞。她的早年作品，写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写之以同情的知识与艺术的完美。第一次使安达西成名的是出版于一九一一年的《约尼》（Jenny），在那里，她以勇敢的坦白，讲到一个少女的问题，这个女子是包含着她的恋爱的理想的。这故事的背景半在意大利，但女 主人翁却纯是她本土的人物。安达西的父亲英瓦尔·安达西（Ingvaed M. Undset）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她从他那里传袭了对于挪威历史的兴趣。她将她的对于中世纪的情形与思想的知识，用来当作她的第三部小说《克利斯丁·拉夫兰斯达》（Kristin Lavransdatter）的基础；这一部巨作，具有史诗的筋力与呼吸，在挪威文学中是无可与比的。这三部小说的分名是：《新娘的花冠》，《海莎培的女主人》（The Mistress of Husaby）及《十字架》。在一个有声有色的十三世纪的背景中，它表示出一个妇人的生活，由女儿，而主妇，而妻子，而母亲，最后乃终止于孤寂的死。安达西的最近著作乃是别一部巨大的传记小说，其时代与《克利斯丁·拉夫兰斯达》相差不远。这部书名是《奥拉夫·奥顿逊》（Olav Audunss n），比起前书来，色彩与动作都淡些，但却更占满着灵魂的寻求。在这两部中世纪小说中，教会在个人

生活上都占着重要的影响。在安达西的早期作品中，便已显出寻求人生的精神的目的，寻求日常生活经验的失望以外 的东西的色彩来。在这些后期作品中，她却寻到了对于她自己的问题的回答。这是在于个人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上的。为的要寻找人民们以宗教为生命的主源的背景之故，她的两部大作，所以不得不回到中世纪去。挪威人努力的要想知道他们自己，他们不仅倾向于最近于土地的人民，且也回到他们自己的历史中去。在小说中而论，安达西乃是这个倾向的重要代表。

此外还有几个作家，也应该在此一提及。

汤麦士·克拉格（Thomas Krag，1868－1913）和伊格一样，也是挪威的南部人。他代表了前世纪九十年代中对于八十年代的社会问题文学的反动。他的浪漫主义很早的在他家庭中与环境中便养成了。老屋旷园的背景中，现出传统中带来的热情的人物，便是他的题材。他爱写旧族的后裔。在神秘与浪漫的空气中，更加之迷人的有色彩的风格，这便是他的成功。克拉格最重要的小说是，《阿达·威尔特》（Ada Wilda），《乌尔夫·兰》（Ulf Ran）及《克尔特》（Gunvor Kjeld）。他的《约根·但》（Jögen Dam）乃是渴望着与美与浪漫，更轻快的生活与更刺激的经验的代表；这种渴望乃常在他的书中表现出。

他的兄弟威廉·克拉格（Vilhelm Krag，1871－）也是一个新浪漫主义的主将，放弃了写实主义的。他是一个抒情诗人，曾做过国家剧场的经理。

奥拉夫·波尔（Olaf Bull，1882－）是上面所述的大作家波尔的儿子；他在挪威近代的诗坛上是很活动的。他的恋歌，以优雅的文句，写出近代的情调，很得人传诵。

金克（Hans E. Kinck，1865－1926）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他的孩童时代都在挪威南部的一个山谷中度过；在这风气闭塞的

山中，人民们不仅传袭了古代的风俗与生活方法，且也传袭了中古世纪的野蛮。他父母后来又迁到另一个乡间去。金克的农民型式都是从这些地方取来的。有的批评家说，没有一个别的同时代的作家有金克那末锐刻的观察到挪威的心理的。他的理论是，要明白现在，必须去追寻它的远根，所以他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学者。他是将他的研究与他的诗的艺术合而为一的。他看见挪威农民的固有文化与由城市侵入的高尚文化的冲突。这个冲突便是他的小说，《一个少年人》，《移民》等作的题材。与金克的写挪威生活的著作平行着的，是他的关于意大利的生活与文化的诗歌，戏曲及批评作品，在其中，最著的是几部剧本：《加年华会》(Carnival)，〔主要人物为马且委里（Machiavelli)〕，《最后的来客》，　《热内亚的结婚礼》，及《李莎巴答的兄弟们》(Lisabetta's Brothers)。

希尔狄契（Jacob Hilditch，1864－）是挪威的一个专长于短篇小说的作家，这种作家，在挪威是很少的。他的题材是取之于他的本乡，挪威的东岸。他写的是下等的无名的人，小农与渔父的生活，很热烈的同情于他们，有的时候竟弹着道德的调子。一种愉快的诙谐弥满于他的书中。希尔狄契在挪威的得名，不仅由于他的小说，也由于他的新闻事业，他编辑了好几年的一种小小的报纸。对于比较严重的大报，他也很尽过些力。

方海斯（Mikkjel Fanhus，1894－）以他的动物故事得到大名。他的背景是近于约丹希曼（Jotunheimen）冰河边上的荒原。他以大力描写着自然，而他的动物与人是原始的。他的几部书在实际上乃是一个某某动物的传记，例如《麋鹿之迹》及《约丹夫尔的雄雨鹿》(The Reindeer Buck of Jotunfjell)。方海斯是一个精锐的观察者，他熟知荒野的法律，这法律乃是：生命的活动，发展，仅能由于吞吃别的生命。所以他的写作一点也没有情操，但

他那种的新鲜与妍丽却很动人的。他的风格是雄健而有力的。在《路特尔舞》（The Raudal Dance）里，方海斯所写的人民生活较为广大。

四　现代的瑞典文学

瑞典的文学，在十九世纪末叶之前便只是诗歌，散文是极不发达的。勃兰特要求文学为讨论问题的工具的呼声激起了瑞典的小说的发达。瑞典的文学，本就是指的诗歌，因为要用文学来表有新的观念与辩论，便不得不用到散文做媒介，五十年来的好些第一流的作家都选 了小说作为他们的主要的发表的工具，假定不是唯一的工具的话。

十九世纪的七十或八十年代，政治思想与物质科学的新观念与发见偕同了文学上写实的文风一同介绍到了斯堪德那维亚半岛，史特林堡（Strindberg）的《红房》，出版于一八七九年，论者称此年为瑞典的写实主义时代的开始。

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乃是瑞典新世纪的一个最大的天才；且是瑞典这个时代的骚动不息的寻求的代表人。他的不幸的童年与少年使他发生了热烈的怨怒，后来，他便使用来攻击在上位的专制者，他的要求社会正义的呼声乃出之于他自己的震动的脑筋与受苦的精神。他自己的挣扎着得在生活上站了一个立足点的苦经验，在他的小说《红房》（Red Room）中直接的表现出；《红房》的第二个题目是《从艺术家与著作家的生活取来的图画》，这部小说描写着那些依靠着钢笔与画笔为生的少年们的不平常的争斗；他们竭力的与防守着进入学院与报馆，剧场与出版公司的大门的诸种势力争斗，在他的攻击一切已建的威权里，史特林堡却也有机会对于种种慈善机关表示敬意。

这部书中的空气是波西米的。这书名是取之于一个史笃克霍姆京城的一家咖啡店的陈设着红色器具的房间。在那间红房之内，少年们常常的聚会在一处，讨论着宇宙的问题乃至于切身的追逼着来的第二顿饭到什么地方去吃得到的问题。型式与人物都是新的。题材是新的，顺利的口谈，亲切的描写的风格也是新的。但史特林堡的主要作品还是戏剧；他是瑞典所产生的唯一的有世界的荣誉与势力的戏剧家。但他的小说里也充满着他的天才。当他仅有二十二岁的时候，史特林堡写了历史剧《奥洛夫·公子》(Master Olof)，已以它的平易，柔顺及自然的风格创造出一个新的技术。《红房》这部著名的小说则出现于他三十岁的时候。过了几年，他又以渔人为中心而写了他的《欣莎的人》（The People at Hemsö)。在他的《瑞典的运命与历险》里，他又击出了一个新的调子，这是一群的短篇小说，在历史小说面目之后，描写着近代的情调的。《结婚集》是他的两册的短篇小说集。在这两册中，史特林堡更进一步的应用了日常生活的问题作为他描叙的对象。这部著作是直接的与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相抗争的；总言之，他是反对着妇人解放的全部运动的。但在《结婚集》中，他的“妇人憎厌”的情绪还没有到达了顶峰呢。他在《结婚集》还只是轻轻的触上了实际的问题。但史特林堡的所以使我们感兴味者还不在于他的理论，而在他的以浪漫的情感巧妙的联上了常足以发生或消灭幸福的实际问题：——例如，房租，吃饭，娱乐；职业上的日常苦作与焦急，以及恋爱与生子间的争斗；夏季移家到乡间去的经济上的不可能等等。没有人描写这种文雅的贫苦的痛楚比之史特林堡所描写的更为活泼真切的。他对于妇人的憎厌，渐渐的更深了，他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与平民之友而成了尼采的超人主义的信徒，这个憎恶也许是很与有力的。他看待妇人为生理学上的低等者。这个观念，充满在他的自然派剧本：

《父亲》，《裘利亚小姐》（Miss Julia）《债主》及“The link”中。不管作者的心理描写如何的尖刻，技术如何的纯熟，这些作品总觉得是太带了作者的激烈的偏心在内的。史特林堡的作品，多少都反映着他自己的经历，而在此外，他更留给我们以一群的赤裸裸的自叙传的著作，《女婢之子》，《一个愚人的忏悔》，《地狱》及《传说》。在他的生活的后期，史特林堡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宗教的情形中去，而这一个时代所写的剧本有：《到大马斯克去》（To Damascus），《复活节》及《梦的剧》。他的崇拜者在京城史笃克霍姆建筑了一所小而亲切的剧场，只能容得下一百五十人的，专门演奏他的戏剧。

也许是因《结婚集》所发生的影响吧，瑞典的女文学家总赶不上挪威。无论如何，文学中之占满了结婚的与家庭的问题，天然的却会激起了女作家的。同时，当日的文风，注重于第一手的观察及日常生活的细写，也都是女作家所擅长的。所以写实主义时代的两个聪明的作家都是妇人的事，并不足怪的。这两个女子，一是安尼·查绿谛·李弗洛（Anne Charlotte Liffler，1849－1892），一是委克托丽亚·彭尼狄克逊（Victoria Benedictsson，1850－1888）。特别是彭尼狄克逊得到了批评家的赞美与公众的喜爱。她的假名是亚尔格莲（Ernst Ahlgren）。李弗洛出身于上流社会，她描写的是在一个有天才的妇人的生活中，在学问的趣味与家庭的责任间的冲突。彭尼狄克逊也写着描写结婚生活的故事，但她所写的最好的图画乃是史康（Skane）平民生活的描写。她的真朴的叙述加之以诙谐的串插，无论什么人物，她都忠实的写着，在这里，她乃是最莹洁的水中的一个写实作家。彭尼狄克逊自己的生活是很悲剧的。她逃出了她家庭中的压迫情况，嫁了彭尼狄克逊，这人比她年老得多；她虽然忠心尽力的为他管理家务及看顾她的继子，她的个人快乐是失尽了。在妇人解放的新观

念的影响之下，她想要脱离了去，但不久，便又失望了。她为不幸的恋爱，天天瘦弱下去的身体，以及对于她著作的恶评所灰心，便自己收拾了她的生命。她初欲跟随了前代的浪漫主义的倾向走去，但成功很少；当史特林堡开辟了写实主义的小说的大路时，她便也开始走了这条路上来，以她自己的作风来写这一派的小说。她的最好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她也写些讨论正流行于斯堪德那维亚半岛文学中的问题的小说。《金钱》描写一个少女嫁了一个人，却一点不明白结婚的观念是什么，在《玛丽尼》（Fru Mauianne）里，写的是一个懒惰的妇人与一个富于感觉的好男人结婚后，便变了一个样子。这部书出版时，她正住在科平哈金，便为当时的急进派所讥评。这使她十分的痛心，以至于死。她的传记是出于爱伦开（Ellen Key）的手笔。

琪约斯丹（Gustaf of Geijerstam，1858－1909）所描写的农民生活的图画，很是黑暗，他乃是史特林堡所引导的男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个。他努力的要研究与他接近的人民，且竟欲自身过着农民的生活。他宣言以几个俄国的大作家为他的范的。有人批评他，他所见的瑞典的农民乃是由俄国眼镜中看见的。无论如何，他似是到了那个结论，即最穷苦者的生活，乃是减低饥饿与性欲的最原始的两项要求，生存竞争，他所见的，乃是那么可怕，竟杀尽了一切的比较柔和的感情，连儿子们对于年老无助的父母的原始爱感也在内，以此，天然的便到了赤裸裸的野蛮的描写。琪约斯丹有一时曾勇敢的联合了一群作家，组织了“少年瑞典会”。他在两部短篇小说集《穷人》与《知官的故事》里，所叙写的都是赤裸裸的罪恶的本能，找不出一点的灵魂的神密的反省。在一八九五年的时候，琪约斯丹出版了《美杜莎的头》（Medusa’s Head），这使他开始了比较有知识的人民的家庭生活的描写。在《关于小弟弟的书》，《妇人权力》，《危险的势力》以及《卡连·勃

兰特的梦》（Karin Brandt's Dream）也都是如此，但他对于以前的罪恶本能的描写，也还不肯舍弃。在农民小说《杜委生与他的母亲》（Nils Tufreson and his Mother）里，他描写一个妇人怎样的爱上了她的儿子，而谋杀了儿子的妻；他将这材料写得大胆的赤裸裸的。

琪约斯丹的这一方面的出品，表现出时代的特质者，其生命却很短。他自己既已回转笔锋去写他自己阶级中的家庭小说，别的作家更转变得利害。自然派的原理在瑞典文学中却主霸了短短的一个年代，这个年代便是这一派所由得名的：八十年代的文派。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代，在瑞典出现了一群新的少年的天才作家；这些人在瑞典的前代是很少见到的。海滕斯顿（Heidenstam），拉绮洛孚（S. Lagerlöf），海尔斯特隆（Hallström），莱夫丁（Levertin），莫林（Pelle Molin）以及诗人法洛定（G. Froding），卡而弗而特（Karlfeldt），都是涌出于这一个年代之中的。他们在别的方面是各奔一途的，但在反抗写实主义的束缚，寻求诗情的更广大自由的出路上，却全是同趋一致的。他们所成的一派，论者称之为新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派；但在瑞典则许多人更简单的称之为九十年代派。

海滕斯顿（Verner von Heidenstam 1859－）是第一个发出这个呼声的；他那时刚以诗人有声于时，在一八八九年之顷，他又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为《文艺复兴》。如果史特林堡的意见是被他早年的艰苦所形成的话，则海滕斯顿的对于人生的态度也是为他的幸福的环境所决定的了。海滕斯顿父母都是瑞典的贵族。他的生地充满了历史上的传说，风景也极清秀。十六岁时，他和一位教师同到外国去，因此在养成喜爱东方及拉丁诸国的心理，这在他的早期作品上可以看得出的。他初欲成为画家，在巴黎跟

着格隆（Gérome）研究着，但不久便发见文学乃是最适宜于他的表现的东西。回到瑞典以后便出版了一册《进香与旅游的岁月》，以富有色彩的勇敢的幻想的韵文，写出从东方得到的印象。他的第一部小说，《安特美恩》（Endy Mion）也是具着东方的背景的。但在他的第二部小说，《韩斯·亚里纳斯》（Hans Alionus）一部散文中杂以诗句的想象的比喻，他则将他的英雄放在他本国的历史中了；他才最后发见他自己本国的及在自己本族的人民中的生活意味。从那时以后，海滕斯顿便专心去解释他祖国的过去。《查里斯的人们》（The Charles Men）是许多以查利士第十二为中心人物的许多故事集；《圣皮格答的进香》（St. Birgitta's Pilgrimage）则叙述着瑞典中世纪的最大的宗教人物。《孚而刚树》（The Folkung Tree）是两部小说的总名，第一部回到瑞典历史的黎明期，第二部则描写瑞典的结合而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最后，海滕斯顿聚集了他的成熟的历史知识的结果，写下了《瑞典人和他们的首领们》（The Swedes and Their Chieftains）一部巨作，从石器时代直写到了十九世纪。海滕斯顿的散文是高尚的清朗的，他的诗歌更为崇莹；瑞典的批评家称他的诗为他的天才的最娇美的花朵。他是瑞典学会的一个会员，在一九一六年，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他之反对写实主义，其原因也是很简纯的。当他初从国外归来时，意大利及东方的美丽，为诗人的眼所见，诗人的心所感知者仍热热的在他的眼前。他正适于做着诗人所应尽的份儿，创造美与快活。当时流行于文学中的“鞋匠的写实主义”，及“地窖的空气”，他不由得不起了反感。他便对于实用主义的哲学痛下攻击。海滕斯顿不写丑恶与痛苦，他却赞颂着人的快乐。他在人物上，选了查利士第十二为他的英雄，这位国王，在实用主义的标准上批评起来，他是贻瑞典以无穷之害的，但他实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的财产给他的人民。在写作想象的历史故

事上，史特林堡却是海滕斯顿的前驱者。我们如将他们俩的这些故事比较一下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史特林堡在他的《瑞典人的运命与历险》里，弃去了占据于古旧传奇中的贵族与贵妇人，而去写那些被牺牲者的运命。海滕斯顿的《查利士的人们》却也写的是贫苦下级的人；然而他却将他们都包含入以国王为首领的大争斗之中了。照耀于查利士四周的光明，也照耀在他们的路上。史特林堡的较深挚的人类的怜恤，海滕斯顿的是较高尚的理想。

当海滕斯顿复现他祖国的过去时，拉绮洛孚（Selma Lagerlöf，1858－）则在她的身边环境的平民生活得到了她的感兴。她自己告诉过人家，怎样的她感到了要写一册书去叙写那些古风的人物，他们常聚于她父亲的家中，谈起临近所流行的传说；怎样的她为当时的写实主义的标准所拥塞而无法反抗；怎样的海滕斯顿的大声疾呼，给她以写作她的材料为成书的勇气。其结果，乃成了《歌史泰·巴林的传说》（The Saga of Gösta Berlings）。这部书出版于一八九一年，它的形式是这样的未之前见，竟使批评家们为之迷惑不知所措了。亏得乔治·勃兰特认识它的重要，而庆贺这位新兴的少年天才，它才不久便受到读者社会的欢迎。拉绮洛孚开辟了一个传奇与传说，神秘与超自然的世界。迷信乃是她的故事的经纬。这是真的，她并不将这些迷信显曝在日光之中，读者的眼前；这些奇异的信仰常只是伏在表面之下，生活在古风人民的心中。不可见的势力在人类的争斗中参与着，帮助好人，攻击坏人。有时，她也表现出自然界的恐怖来，如在《耶路撒冷》中的雷雨；我们不知道，这仅是一阵可怕的雷雨呢，还是地狱中的三头狗真的逃放了出来；我们今感觉到那种的恐怖；即人民住在她的无所不能的大力之下的自然界所能打击人类的心的恐怖。在她看来，自然不仅是如写实主义者所见的为科学的法则所统治的，它是有活力的，且充满了神仙与鬼怪的。

每一个自然界的东西都是有人格的；树木与岩石离开了原位；他们谈话，动作，参预于人类的戏剧中。拉绮洛孚虽然自由的取用古代的传说，她的浪漫主义却在依赖于时间与地域的辽远的。她能将泥范的农民的身上染饰以骑士的奇诡的历险，因为这乃是心灵上的一个倾向。她一方面既熟悉于身边的人物，一方面又勇于疾驰的想象力，二者联合起来，遂给她的著作以不可及的可爱。她还有一部风格极奇特的作品：《尼尔士的奇游》（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s）。她在这部著作中，写出一个儿童骑在天鹅背上，游历着瑞典的各处。这部书初意本为学童而作的，不料却风行一时，连美国的读者也于此得到对于瑞典的浓挚的兴味。《葡萄牙的皇帝》（The Emperor of Portugallia）是描写她乡土的农民的故事的。论者都以为它是她的最完美的作品。她是第一个瑞典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也是瑞典学会中唯一的女会员。

别的新浪漫主义时代的著名作家是莱夫丁，海尔斯特隆，莫林及诗人法洛定，与卡尔弗尔特。

莱夫丁与海尔斯特隆二人一开头都是写实派的作家；但他们受了海滕斯顿的影响，疾变了他们的作风，而成为新浪漫主义的健将。莱夫丁（Oscar Levertin，1862－1906）初为一个批评家，至今还算作他的时代中的第一流的批评家。他为史笃克霍姆大学的文学教授，又为各杂志的聘定投稿者，在瑞典文学上，他是鼓动了不少的作者的。莱夫丁也写着诗歌和小说，也都是很高尚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地方乃是他的文学的与历史的研究的结果，所以不是平常的读者所能领悟。他受海滕斯顿的影响之后，成了新浪漫主义的最有力的主持者。他的《传说与诗》及《苏罗门王与莫洛尔夫》（King Solomon and Moroef）都是为中世纪的基督教的犹太人的母题所感兴的。他的《洛科科故事》（Rococo Sto-

ries）乃是一部以十八世纪为背景的优雅的杂记。他的小说《奥斯特拉的牧师们》（Aster’ d of Osteras）的背景则放在一个想象的天主教的镇上，从它的古代来源以至于现代。莱夫丁将这个古镇写得那末可爱；竟使读者的同情不自禁会被拉到旧的一边而反对着那些革命者们。

海尔斯特隆（Por Hallström，1866－）的材料，取于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时间；他仅取他们为想象的寄托而已。他所感兴趣的只是精神所支宰着一种地位；他以为人物最好的表现是在忧郁与解脱之中；而生命的最深挚的表白乃是将死的顷刻。他所特别著名的是他的短篇小说。他初为一个科学家，在他少年时，曾有过几年，住在美国，当化学师。这个时期的经验，便供给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飞鸟》的取材。九十年代的新浪漫主义一起，他便受其感应，变了他的作风。他的第二小说集《紫》（Purple）便表示出这个趋向来。他的长篇小说《一个老故事》显示出瑞典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的生活。在《莎那托斯》（Thanatos）里，海尔斯特隆从各地各时搜集了一群的故事，其题材全都是关于死的。在这种不同型式的临绝的恐怖中，海尔斯特隆表现出他的绝可惊人的描写来。海尔斯特隆视短篇小说为一个戏剧的缩小。他也写些剧本，有的在舞台上很得成功。在欧洲大战开始的几年，他很少写小说及剧本，只是专心的做着文学批评并翻译莎士比亚。他是瑞典学会的会员之一，又是学会中的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主席。

莫林（Pelle Molin，1864－1896）死得很早。他的文名建立在一册的短篇小说与杂记上，这部集子是琪约斯丹在他死后，代他搜集印行的，琪约斯丹为它定名为《阿达林的传奇》（The Romance of Adalen），还做了一篇很动人的序文。莫林的作品虽少，却在批评家及读者心中占了一个永久的位置。他是瑞典极北地方

的一个农夫之子。他到史笃克霍姆来研究艺术，但他觉得自己不适宜于都市生活，便回到本地去，又和他的家庭决裂了，有四年之久，独自住在一个小屋中。他以表现向没有人写过的地域的原始生活，怡悦他的同时代人，而又以诙谐与诗的感情，柔化了那些荒粗野蛮之感。

诗人法洛定（Gustaf Fröding，1860－1911）并不写别的东西，他只是写他的诗歌；他的韵文是可以与海滕斯顿相匹敌的。他的灵感是得之于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的诸大诗人的。他写的是文兰（Vermland）地方的浪漫的人民，他的歌中充满了他们的喜与怒，哀与乐，勇敢行为与家庭生活。

如法洛定之歌咏文兰一样，卡尔费尔特（Errk Karlfeldt，1684－）是歌咏他的达里卡里亚（Dalecarlia）的。他的诗中包含着很多的诙谐的趣味。

这个九十年代，也产生了一个同感的解释者葆格（Ruben Geson Berg）与一个和他争斗的批评家蒲克（Fredrik Böök）。这个文学运动乃是和平为国家主义的一般运动的一部分。这与瑞典人的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传说，及种族特质相谐合。海滕斯顿和拉绮洛孚全都创造了被视为国民性的精粹的定型。歌史泰·巴林代表了它的喜爱浪漫与快乐的魔力，“查力士的人”则代表了它的爱国心与不自利的忠实。天然的，这种型式，为两位大艺术家所创造的，其所做的不仅仅是反映出国民的性格而已。他们还形成它。

史特林堡所创的写实派时代是很短命的；然而这样巨大的一个潮流，遍于全世界的一个反动——却决不能在仅仅一个年代（即十年）之中便消竭无遗了的，如果我们看看今日的瑞典作家，我们便可发见，回到史特林堡一条路上去的人比之走到海滕斯顿及九十年代的诗人那里去的人实在是更多。与前世纪的八十年代

相联络的人，最主要的是苏特堡（Hjalmar Söderberg 1869－），他至今仍是一群的现代文人的中心人物。他是史笃克霍姆的人。他少年时，曾在一个小城中做新闻事业，不久又厌倦的回到京城中来。他的自叙传的小说《玛丁·皮克的早年》（Martin Birck’s Early Days），叙述一个少年人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地位的，乃是约柯伯生的尼尔斯·林纳的同类。此书的第一部分，表现玛丁的童年时代与他的家庭，具有一种恬静的美，与永久的价值；但在后一部分，描写一个少年在没有开始争斗时便放了下来，却有点太趋向于同时代的作风了。在发行《玛丁·皮克的早年》之前，苏特堡在一八九八年已经发表了一部很短的短篇小说集，即名为《短的短篇小说》（Storiettes）；这乃是他专长的文学形式，非常的完美可爱，往往如小真珠似的圆莹，这些最短的小说，常出之以第一身的口气，而其材料则取之于就在于手边的琐碎的小事。在这个形式中，他是无人可及的。在他的长篇小说《格拉斯博士》（Dr. Glas）里，苏特堡讨论到杀人是否可允许的问题。这部书的目的乃在表示出：与人类种族同生同长的伦理观念，并不需要什么最后的一着的 。他的剧本《格特鲁》（Gertrud）在舞台上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他在这剧里表示出：所谓自由恋爱也正是结婚中的恋爱一样，同受着变迁律的支配。他的长篇小说《严重的剧》（The Serious Play）也以恋爱为题材。欧洲大战则反映于剧本《运命的时间》（The Hour of Fate）中，这剧出版于一九二二年。他所提出的问题，如在《玛丁·皮克的早年》中的，大都是大想去解决他们，不过他要问——向着浪漫主义者严问着——当乎一切的旧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世界也如前的倦乏的向前进时，为什么这个乐生之趣会突然的发生。苏特堡是阿那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徒弟，也崇拜着丹麦人约柯伯生与彭格；他在失望与悲观上，很像彭格。

与苏特堡同类而精神上比他较不消极的是巴格曼（Bo Bergman, 1869—）。巴格曼原是一位第一流的抒情诗人，但也写着很好的短篇小说。他与苏特堡同是史笃克霍姆人，又是同时代，又是从少便做了朋友，在他的散文中，巴格曼又写着与苏特堡同风格的作品；虽然一点也不模拟，他的故事实与苏特堡同派而且同精神的。在他的人生哲学里，他又与他的朋友表现着同样的悲观与失望；不过比较得轻淡些。他的第一部诗集，《玛丽安尼特》（Marionettes）表示的是，我们在运命的手中，全都是不由自主的玩物。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梦与其他故事》也弥漫着同一的情调。他偶然的也离开了城市，去写农夫。在他的后期作品中，他赞颂工作为人类的救星。这个调子在他的最近散文集《我的朋友男爵与其他故事》及他的最近的诗集《生命之眼》里都同样的表现出。优雅乃是巴格曼的诗的特色，在他国人中极为流行。他也是“瑞典学会”的会员。

十九世纪的写实派对于要求社会正义的热情在今日的写实派中却不大注重。那时所呼号的应行改造之点，有许多都已实现了，其余未曾解决的问题，也有了别的攻击的方法。所以文学中渐渐的少了这种“问题作品”。然而旧的“愤怒文学”的精神，却仍有点与我们同在，特别是在女作家的著作之中。依尔斯特隆(Anna Lenah Elgström 1882－）热烈的同情于弱者与受苦者。依莲·魏格纳（Elin Wägner）的叙写商店女郎与有职业的妇人的聪明的故事，显然的在鼓吹着女权论。史特约史德（Marika Stjernstedt），一个颇有能力的小说家，则讨论着不结婚的妇人及离婚的问题。在这些女作家之中，依尔斯特隆是比较重要的。她是一个写实派，同时又是一个浪漫派。她的人道主义与同情，表现于她的短篇小说集《母亲》中。他的近来出版的小说，《蚁山》，这是出于世界大战中的，它描叙着一个妇人的故事，怎样

的她英雄的挣扎着家庭的合一,[1] 怎样的曾为诱惑的牺牲，怎样的后来又恢复过来。他赞颂着工人军队的伟大的今日的历险，他们每天早晨从城中街上走过去赴工场。依尔斯特隆的著作的别一方面乃是他的浪漫的愿望，要将真挚活泼的感情举在有色的衣中的愿望的结果。[2] 她写着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及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短篇小说。在后者，她的女英雄们都是贵族的女儿，她们以精神的力量反抗着一个暴力的世界。

近代生活的复杂的潮流，所映在西瓦兹（Sigfria Siwertz 1882－）的作品中；他的最近作品是写着欧洲大战以后的道德的瓦解的。他特别擅长于短篇小说，论者比之于赫尔史特隆；他与赫尔史特隆相同的地方，是能够取来一件小事，将它当作了一面窗，在那窗口，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但在风格上，他们却相差得很远。海尔斯特隆是古典的与浪漫的，西瓦兹则是近代的与写实的。西瓦兹与苏特堡及巴格曼一样，也是史笃克霍姆人，也如他们一样写的是这座京城中的大道与小街以及水道；因为他常以码头及岩礁做他的背景。他的第一部书是一部诗集，名为《街道的梦》，即已表示出他的世界乃是城市的世界。但他的主要作品却是小说。他的最初两部短篇小说集《玛格特及其他故事》（Margot）与《圆形》（Circles）全都是些幻想的悲观。在他的后期作品里，他的题材虽常是阴郁的，然而他却信仰人能够战胜运命。他的长篇小说:《火的反映》，及《从巴比伦归来》叙的都是世界大战的事 。他的《下流》（Downstream）被视为他所写的一部最强的小说。他的技术是很纯熟的，在短篇小说中，尤其技巧之精美。

---

① 原载刊物如此。

② 原载刊物如此。

同时的好些别的作家，也都各在写着他们的本乡。巴格尔（Henning Berger）最善于写城市生活；巴史特隆（Bergström）则将巴史拉根（Bergslageu）全省都写在他的小说中。诺特史特隆（Ludvig Nordsrtöm，1882－）则写着瑞典北部的乡人与渔夫。在其中，诺特史特隆尤为著名。他与莫林同样的写北方海滨的生活，然而莫林是从浪漫主义的光中看出的，诺特史特隆则是太忠实的一个写实主义者。诺特史特隆他自己曾从事于渔钓，厕身于渔父之中，所以观察得非常精密。他的短篇小说集《渔父们》，写的是冒险的出死入生的及原原的快乐的一种生活。[①] 近年来诺特史特隆正经营着一部大著作，要将瑞典的经济史，以小说的形式写出之；这一群的小说，总名为《彼得·史文斯克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etter Svnesk），已经出版了好几册了，尚未写毕。

在上述的许多重要作家之外，还有几位也是非提及不可的。爱伦开女士（Ellen Key，1849－1926）是瑞典近代极重要的女思想家，她的影响已遍及于全个世界。当史特林堡正在憎恶女性，攻击女性，蔑视女性的时候，爱伦开却正在写作着，演讲着关于妇人解放的主张。到了一八九五年，她却退出了妇人解放的潮流，而竭力主张母性的高尚及对于母性的功能的精神解释。她的代表作是《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及《爱情与结婚》；在其中都可以看出她的主张来。

英斯特隆（Albert Engström，1869－）是一个诙谐作家，是一个瑞典公认的轻妙的诙谐作家。他是瑞典学会的会员，在这个著名学会的十八个会员中，除了他之外，别的人的著作，如拉绮洛孚，海滕斯顿，海尔斯特隆等等，其作品都是比较严重的。他

① 原载刊物如此。

取材很广，自瑞典海滨的水手渔夫的生活，以至大学生的故事都有。他喜好原始的生活，所以他常在拉卜兰（Mappland）取到不少题材。他曾游历过冰岛，最近，又到过苏俄。

西莲（Märta of Sillén，1899－）是一位新近有名的女作家：她出版过一册的诗集《当愚人起来时》（When the Sap Rises）及一些短篇小说。她嫁给了李平（Erik Ribbing）君，一个圣皮琪答的直系子孙。

这篇简单的叙述，很得力于美国的 The American Scandinavian Foundation 所出版的诸种出版物；它的《斯堪德那维亚评论》（Scandinavian Review）供给了好些新的材料，而他的三十几册的《斯堪得那维亚名著丛书》更给本文以主要的帮助。此外《文学大纲》及 Leach 的《斯堪德那维亚人的斯堪德那维亚》（Scandinavia of the Scandinavians）也间有所取材。我对于斯堪德那维亚诸国的文字一点也不懂，所以不得不取材于英文的书籍，错误之外，恐怕是不会免得的。很希望懂得斯堪德那维亚文字的诸君能够加以指正！

（原载1929年9月《小说月报》20卷第8期）

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

在今年所纪念的许多文学家中，我们须以更热烈，更感动心肠来纪念伟大的陀思妥以夫斯基。

我们纪念克慈，纪念但丁，纪念勒封登，纪念随多莱尔，是纪念他们的已往的成绩与其精美丰富的作品。但是我们纪念陀思妥以夫斯基，应该超出乎这些可纪念的事实以外。

陀思妥以夫斯基的成绩，诚然也是极伟大的。他的作品更是很慎重的加入于俄国的乃至世界的最高的文库里。我们对于他的这一层自然也应该十分恭敬的看重他。但是他的伟大究竟还超乎“受恭敬”以上。他是使我们爱，使我们哭的传道者。在俄国，当时，已经赚得多少青年男女的爱与哭了。一八八〇年，俄京普希金的铜像行开幕礼，有好些俄国的当时大作家被邀请来演说。陀思妥以夫斯基也是被邀请中的一人。许多人的演说，都只以鼓掌终之。但是陀思妥以夫斯基却讲到俄国的文学，讲到俄国人民的将来。听者的心灵受感动到颤动了，热炽了，至于哭了。

一八八一年正月，陀思妥以夫斯基因病长眠不起。举行葬礼时，送葬者达万余人。他们受感动至于哭。不惟在俄国这种盛大

的平民的葬礼，永远没有发现过，就是全世界也恐怕没有发现过。

到了现在，我们还是爱他，还是受他感动至于哭。

没有一个文学家比他更足以感动人了！

他的穷困颠沛的生涯，感动我们至于哭。他生于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即俄历十月三十日），死于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俄历正月二十八日。）数十年中，不知道遭了多少忧患。一次受死刑宣告，已被缚至法场，减等放逐于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作好多年的苦工。至遇赦归来，又受贫困之包围。他自己曾很悲惨的说，他的作品都是在匆匆迫促之时间中草成的，都是受饥驱而下笔去做的，并且须定期交稿的。所以不能做得和屠格涅夫一样好。这话真是沉痛之至！

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都是卑下的，病狂的人类，向塞尔沙说：

“英国人迭更斯对于穷人可算得很具怜悯的心肠和明了的观察了，然而他的描写总未免有些隔膜，并且有些形容失实处。他把他们的穷苦，指示给其余的人看，说：‘你们看人类中那些穷苦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啊！’俄国的作家描写穷人，如其真相，并且是站在他们里边，把自己也当做一个穷人，不管这种叙述对于富人有什么效力，也不拘于特殊的道德与罪恶。他描写穷人恰如其分，如我们其余的人类一样。他在反映平民的精神，呼吸着广阔的人道思想，真实的同胞主义，自然的博爱精神，这并不是从‘明辨一切是宽恕一切’的知识信念发生的，乃是出于一种本来的情感，以为没有人能裁判他人，只能观察而记录。”

这些话如果拿来批评陀思妥以夫斯基的著作，实在更为确切。在俄国的作家中，最富平民精神，博爱思想，人道主义的，就是陀思妥以夫斯基，他的爱人类的心肠，实在广漠无边的。克罗巴特金说：“陀思妥以夫斯基爱酒徒，爱乞丐，爱小贼等等，

这些人我们是常常是连用可怜的眼光去注视一下也是不屑的。他用力发见人类是什么，发见最下层的沉溺的人是伟大的；他引起我们博爱最无味的人类，最懦弱下流而且无用的人类的情感！在这一点，陀思妥以夫斯基于近代俄国作家中得到了无双的地位。读他的书，不必管他艺术的完备与否，只读他的表见于中的仁善思想，他的大邑贫民窟生活的重要，与他的无边的同情而已。”

他的伟大就在于此啊！

他有一次在给一个友人的信上说：“人称我做心理的剖解者，其实是很不真确的。我不过是一个较高的写实主义者，换一句话，可以说我是一个所有人类灵魂深处的描写者。”

实在的，他描写人类的灵魂的自忏是如何的深刻沉挚啊！许多人对于恶徒只有深恶痛绝，但是他却只深深的同情与真挚的爱心。因为他发现无论是怎样凶恶的人，他的灵魂的光明总是没有泯灭的。“永久的善”的发见，实是他最大的功劳。

如此的他认定了人的绝对平等，在他作品中，到处叫着“人啊相爱！”的叫声。

如此的他宣传他的爱的福音：唤起大家对于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同情。

耶稣啊！

伟大的传道者啊！

我们现在随他的百年生辰的时候，怎么不应该热烈的，大大的纪念他呢？

(1933 年 1 月上海新中国书局初版《文探》)

茂娜凡娜

我读了好些古代、近代的剧本，但是没有像梅特林克（M. Materlinck）的《茂娜凡娜》（Monna Vanna）之使我感动的；我读了好些梅特林克的剧本，但没有像他的《茂娜凡娜》之使我感动的。我好像在对着伟大的神，在听他慈祥的与一个凶残的以一切人为牺牲的所谓英雄在辩论，我好像在读着柏拉图论爱的对话，好像活现着一个伟大的贞德（Joan of Are），又好像眼前活现着一位狂热的爱神。

梅特林克之作《茂娜凡娜》，在一九〇二年。这一年即在巴黎的新舞台开演，这是他的在舞台上成绩的最好的剧本之一。立刻传遍了欧洲大陆，各处都在谈论着这剧，都在扮演着这剧。只有君子的英国因检查官始终不准《茂娜凡娜》之开演，故英国人只有读读这剧本的福分。直到了一九一五年方始取消了这个禁令。伪君子的英国对于一切真诚的东西，赤裸裸的表白出世间的实相的东西，本来是要加以抑制阻止的。他们的摆伦，他们的雪莱，他们的王尔德，一个个都不能容在灰雾的英伦，对于《茂娜凡娜》之禁止出现于舞台，自亦无可诧怪。

现在，且让我们来略述这剧的内容。

此剧事迹的发生地在靴形半岛的意大利的比莎（Pisa）城中及城外，时代是十五世纪的末叶。

第一幕的幕布揭上时，我们看见比莎防守司令基独·郭六那与他们的两个将官在谈话。他们的城为弗洛林斯（Florence）的军队所围困，他们的火药已用尽，子弹和弓箭也都没有了，城内妇孺已饿得快死了，除了降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他们不得不派人去和弗洛林斯的军长白林齐瓦（Primzivalle）去商量降状的条件。派去的使者是基独的父亲马尔各。马尔各带了一个异常的使人不可信的条件回来。白林齐瓦将以三百车的军械粮食送给比莎，只要基独肯将他的妻子茂娜凡娜，什么也不穿，只披一件外衣，到他营中去住一夜。当然的，英雄的基独是绝对的拒绝这个条件。他爱凡娜。他尊重他的荣誉，什么都可牺牲。然而这里是将陷落的比莎，这里是万千的饿殍，这里是一城的生命。基独将走哪一条路呢？马尔各道："专一的爱情固然是幸福而且可赞美的。……但是那爱情能扩大起来，那尤其可贵了。……谨严的，纯洁的贞操和忠诚固是美德，但是这种美德有时看来是极小的，当我们见了别的最伟大的……"基独固执着传统的美德在他心上生了根。他要将他父亲囚禁起来，不准他宣布这个消息。但马尔各在对基独说之前，已将这个条件布告于大众及凡娜了。马尔各道："你如果以为英雄的最高贵的事业除了死难以外没有别的可做，那是差了。最英雄的行为就是最痛苦的行为；然而那死亡的痛苦却时常比生命的痛苦轻微得多……"这时凡娜出场了。她认识真正的英雄事业，她选取了更伟大的要做的行为。她告别了所爱的基独，为了比莎，为了比莎的市民，她毫不踌躇的披了一件外衣到白林齐瓦的营中去。在这里，我们是遇见另一位伟大的贞德了。在第二幕我们见白林齐瓦在他的军营里。他是一个雇兵，升到了现在的地位。弗

洛林斯人对待他们的雇兵，常是残酷的，他很明白，比莎城攻下的日子，就是他灭亡的日子，因为弗洛林斯已用不到他了，可以借端放逐或杀死他了。且这已有行政委员德利维尔齐的两封信证明了。于是白林齐瓦在他的末运，将放下了一切，而去接受一种奖赏了，这便是爱情，便是茂娜凡娜在这时进来了，白林齐瓦的脸部为德利维尔齐的剑所刺伤，用布包着，所以凡娜不知他是谁。(这时军械与食粮已运入比莎，它已成了一座不可克胜的城了。）他向凡娜揭开了他的久伏的爱情。当她八岁，他十二岁时，他们是在一处过了许多快活日子的，后来他父亲搬到非洲，他们只得离别了。他做了许多年的奴隶，回了家，才知道凡娜已嫁了比莎的司令基独。他于是把他的剑出租了。打了几次的仗后，他便升到了现在的地位。这时，他欲忘了一切，只求得和凡娜的一夜的晤对。凡娜取开了他头上的包布，也认识他了。于是他们有了一场关于爱的谈话。他是尊重她的，敬爱她的，如凡人之崇慕委纳斯似的。他并不敢污辱她。突然的，军营外起了骚动，弗洛林斯兵要来捉他。凡娜便邀他同到比莎避难。她这时是深信基独能相信她，能款待他的。

第三幕，我们见凡娜偕了白林齐瓦在万民欢呼中回家。但基独却悲苦的在想着他自己的牺牲。凡娜进来了，马尔各起来欢迎她，然基独却推开了她的爱恋的手，爱恋的身体，甚至于爱恋的心。凡娜向他说，她没有破坏她的贞节，他是尊重她的人格的。但基独不信。他见了白林齐瓦，问道："他是谁?"凡娜道："白林齐瓦。"基独激昂的喘着气，说道："这个掉落下来竟像天上诸天所掉落的甘露一般！呀！凡娜，我的凡娜……你是伟大，我爱你，我终究懂了……"他不让凡娜发言，极力称赞凡娜能引了白林齐瓦来报仇。但凡娜说出了真情，说他并没有接触着她。基独不信，立刻要将他处刑。这逼了凡娜重新鼓起勇气来说谎。她

道："他污辱了我，他是属于我的，我来缚住他，我来弄死他……"于是她去缚住他的手，同时低声向他道："他将我们俩联合为一了。……我属于你的了，我爱你。……我会放了你的。……我们俩会一块儿逃走的。……"

于是白林齐瓦被卫队带去下狱了。凡娜道："男子都是痴愚的！该受人家的欺骗……他们崇拜诳语。……当人家将生命给他们看时，他们以为是'死亡'。当人家将'死亡'给他们看时，他们倒以为是生命……"这些话正是对着基独发的呀！没有什么人懂得她的话，除了马尔各。最后，凡娜道："这是一个恶梦！美梦就要开始了！……美梦就要开始了！"

剧场的幕布便是在"美梦就要开始"时落下了。

凡娜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她是无往而不伟大的。无论在黑夜往敌军时，在对着敬爱她的白林齐瓦时，在努力编说着她的谎话时。她的伟大，她的情感，罩住了一切人，使我们觉得自己的渺小。

我们如将凡娜的最后，与娜拉的最后对照了一下，便觉得这真是一个有趣味的对照。易卜生写娜拉，他对于自私的男子下了战书，梅特林克写凡娜，刺伤了一切旧式的以人的血肉为餐物的英雄们了。娜拉觉悟了自己的牺牲，便抛弃了小鸟似的囚笼的生活而向光明走去，凡娜却在牺牲中求得了幸福，由恶梦中生出了一个美梦。在《青鸟》中我们的作家梅特林克也在宣传着这个福音。

这是一个伟大的福音，是一个道路的光明，然而自命为英雄们的，自命为君子们的，却永远不能懂得。

（1933年1月上海新中国书局初版《文探》）

史　诗

史诗（Epic Poetry）是叙事诗（Narrative Poetry）的一种。叙事诗中，除了史诗以外，还有英雄传说（Hero Sagl），冒险记（Gest），寓言（Fable），短歌（Idyl），牧歌（pastoral），歌谣（Ballad）等，而史诗独为其中的最重要者；如英雄传说，冒险记，禽兽寓言及民歌歌谣等，差不多都是史诗的原料。史诗的最初的骨子，如牧歌，短歌等，则在文学上的地位殊不重要；如寓言，则近来所作，已都为散文，且已另成一类。所以有许多人直捷的称叙事为史诗。

史诗在希腊文的原义是"故事"（story）之意；他们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有一种有韵的可背诵的故事。一般的批评家对于史诗上定义往往偏重于古代的而忽视了近代的事实。他们都以为史诗是描写一个得胜的英雄的历险或记述他征服别的民族或神异之物的事迹的。独有盖莱（C. M. Gayley）在他的诗歌的原理上所论述的史诗定义，能包括并表现出它全部意义。现在略举其大意如下：

一般的史诗无论是古代的或近代的，都可以算是一种非

热情的背诵，用高尚的韵文的叙述，描写出在绝对的定命论的控制之下的一种大事件，或大活动的，这种事件或活动里所有的是英雄的人物与超自然的事实。

史诗之构，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民族的史诗，是史诗的最古的形式，而他的构成，大概都是以一个大事件，或大人物为主要的线索，而集合了许多民间流传的神话，英雄传说，禽兽寓言，民间歌谣等等而融凝在一块的。当我们初发现史诗时，六脚韵诗（Hexameter Verse）已被择为它的工具。这个时候的史诗，不全是关于战事与个人的故事，而且是带有教训的目的，或宗教的礼仪的色彩的。可惜那许多口述的原始的史诗，现在都已不见，不能拿来证明现在所传下的史诗的原始形态了。

史诗以它自然的区分，可别之为下列的二类：

一　民族的史诗。

二　个人的史诗。

民族的史诗，是古代的即各民族由古代流传下来的伟大的韵文的故事，他们所叙述的大概，都是一个或几个民族间的战事；或一个英雄的冒险的经历或他的各种雄伟的勋绩。

这种民族的史诗，除了中国及其他不重要的几个国家外，差不多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如希腊有她的《依利亚特》（Iliad）与《亚特赛》（Odyssy），印度有她的《玛哈巴拉搭》（Mahabharata）与《拉摩耶那》（Ramayana），法国有她的《洛蒲特》（Chansonde Rabard），德国有她的《尼拔龙勤莱》（Nibelungenlied），英国有她的《悖孚尔福》（Beowulf），西班牙有她的《西特》（The Cid），俄国有她的《依鄂太子远征记》（Story of Prince Igorés Raid），他们的事迹在历史上大概都是有些根据的。如《依利亚特》所述的托洛哀（Troy）战事，现在已证明希腊是有托洛哀城

破毁的遗迹；又如俄国的依鄂太子征战的事，在最古的史书上也曾有过记载，且事实也几乎完全相合。

民族的史诗，其特质约有数点：

第一，他们的著作者都是不知姓名的，也许可以说都是“非个人的”。希腊的《依利亚特》和《亚特赛》虽以前都公认为是一个大诗人名荷马（Homer）的所作，而经了许多次的辩论，终于决定荷马是一个悬拟的人物。至于其他各史诗，则作者更不能指名了。大概古代的时候，到处都有许多游行的歌者，以背诵故事为职业。不知经了多少人的合作与增润，一篇完全的史诗才得流传下来，他们构成的时间，也不知要经历多少时候。

第二，他们所叙的事实，大概都是关于一个或几个民族的战事，或其他与战事有关的大举动的，他们大概相信定命论。十八世纪的批评家以史诗为“好战的冒险之韵文的叙述”，这个形容词用在民族的史诗上是极为恰当的。

第三，他们所叙的事实大概都是超自然的，天神与魔鬼都常在史诗里出现。自然界中的动物与植物及其他，在他们里面也常得占一个地位。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原始的民族史诗，实曾融合神话与寓言在里面的；个人的史诗是近代的，即由一个作家创造出来的伟大的韵文的故事。

个人的史诗与民族的史诗，有不相同之点二：第一，他们的著作者是可以指出的，如我们读《神曲》（Dinine Comedy），即知其作者为但丁（Dante），读《仙后》（Fairy Queen）即知其作者为斯宾塞（Spencer）。

第二，他们是带有作者的个性的，是带有作家的理想的。如乎琪尔（Vergil）的地下世界，但丁与米尔顿（Milton）的天堂与地狱，都是作者自己创造的。至于民族史诗中的神怪的分子，则个人的史诗仍然不能弃掉。

个人的史诗，作者并不甚多；由罗马孚琪尔的《阿尼特》(Aenied) 起至英国米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 上著名的史诗作者，几乎寥寥可数。这大概是因为史诗的工作过于伟大，非有极大的天才不能胜任之故。

在中国则伟大的个人的史诗作者，也同民族的史诗一样，完全不曾出现过。中国所有的叙事诗，仅有一篇《孔雀东南飞》，算是古今第一长诗，而以字计之，尚不足一千八百字。其他如白居易杜甫诸人所作的，则更为短促了。所以中国可以说没有史诗——如果照严格的史诗定义说起来，所有的仅零星的叙事诗而已。

史诗的叙述法，无论是民族的或个人的，大概都是并用直叙与对话的。他们当中，都带有很多抒情分子；这就是使他们成为优美的诗篇的重要元素。

史诗到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没有作者。这个缘故，一则是因为民族的史诗已经不再出现，古代的史诗的游行背诵者既已不见，中世纪的民间传说与神话英雄故事，又已另换了一个"传奇' (Romance) 与"神仙故事"的散文的工具，来装载他们，因此，所谓民族的史诗便自然而消歇了。二则因为近世以来。小说渐渐发达，作者多喜欢换用这个比史诗更好的器皿，来盛他们的理想与情感；因此，个人的史诗便也自然而然的消歇了。

不过史诗的歌声，在现代虽然是消歇，而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却仍是光芒万丈，不能蔑视的，他们虽然可算是已过的，而他们的过去，却曾给了不少的花和蜜与近代的文学界。

(1933 年 1 月上海新中国书局初版《文探》)

世界文库发刊缘起

文学名著为人类文化的最高的成就。古语有云："历史是一部相斫书。"但文学史在一般历史里却是最没有血腥气的。伟大的文人们对于人群的贡献，是不能以言语形容之的。他们不以掠夺侵凌的手腕，金戈铁马的暴行，来建筑他们自己的纪念碑。他们是像兄弟似的，师友似的，站在我们的前面，以热切的同情，悲悯的心怀，将他们自己的遭遇，将他们自己所见的社会和人生，乃至将他们自己的叹息、的微笑、的悲哀、的愤怒、的欢悦，告诉给我们，一点也不隐匿，一点也不做作。他们并不在说教，在教训，他们只是在倾吐他们的情怀。但其深邃的思想，婉曲动人的情绪，弘丽隽妙的谈吐，却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亚历山大帝过去了，查理曼大帝过去了，拿破仑过去了，秦皇、汉武过去了，唐太宗、明太祖过去了；他们以同类的血肉和骷髅，悲愤和眼泪，成就了所谓英雄的事业，所留下的却只是芜城荒丘，涂抹着血红似的夕阳残照，而给我们的可怕的流血的纪念耳。那些狰狞的杀人不眨眼的面貌，那些残忍暴虐的攻城略地的行动，只模糊的现在历史里，而成为人类的历史上的几场恶梦。

但文学上的英雄们和伟人们却永远的不会过去；他们将永远的像兄弟似的，师友似的出现于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的前面。我们读着他们的书，便亲切的像和他们“同年生，并肩立，”连他们的一颦一笑，一轻喟，一微愁都会为我们所熟悉。荷马、阿斯克洛士、柏拉图、莎士比亚、李白、杜甫、关汉卿诸大家，即使其生平事迹未必全为我们所知，他们的心灵和情思却是最为我们所明白的。他们的著作，终古的“光芒万丈长”，永为后人心灵上和艺术上的修养的无穷尽之汲取的泉源。

在文学名著里，我们明白：许多伟大的作家们是怎样的运用文字这神奇的东西，写作出怎样的伟大不朽之想象的创作。这些想象的创作乃是人类生活的最真实、最活泼的记载。在那里，我们知道：人类是怎样的由原始的野蛮生活，经过了怎样的困苦的挣扎和奋斗，而达到了文明的情形。在那里，埋葬着人类在苦难和挣扎里所感发的崇高和深邃的情思，足够作为后人的教训和感受之资。在那里，有比现实的人生更真实的生活的现状；在那里，有比哲学更精深的人生的哲理。他们增大我们的同情的心胸；深邃我们对于人类的爱。他们使我们明白：人的生存是为了同类的幸福和人道的光荣的。尝有一首短诗，足够令我们终身受用的；也尝有一部小说，会使我们改造过我们的整个的人生观念的。

在文学名著里，我们读到了整个人类的最真实，最动人的历史；那许多动人的记载，都是一般所谓“相斫书”的历史所不会有的。那是不隐匿的人间的活动，那是赤裸裸的社会的诸相的暴露。历史是常被改造，被涂饰而失其真的，但文学名著却给我们以永永不会变色的人类活动的真相。——人类是怎样的由层层的自然界的束缚里脱出，怎样的由不平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组织里，努力改造自己，而终于向最大多数的自由与幸福之鹄的而前

进；那些事实，在文学名著里是那样真挚感人的被记录下来。

所以世界文学名著的介绍和诵读，乃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人的最大的任务（或权利）和愉快。

但在中国，我们虽常谈到“名著”，而真实的在读“名著”的人却不多。“名著”的介绍，成了今日的很迫切的需要。不仅欧美的名著的介绍，百未得其一二，就是中国本土的著作，我们要得到完善而方便的本子，也就不是容易的事。——大学文科的教员们如欲同时得到二三十册以上的杜甫、关汉卿的著作供给学生们的应用，立刻便会成了一个极困难的问题。有几部文学史常谈到的名著，往往至今也还是秘册珍本，为公私图书室的所宝藏，轻易不得一读。

编者个人曾遇到过不止一次的这样的批评或质询：“那些诗句或文章，在你的文学史里为什么不载着全文呢？断片或零句，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且那些诗文却都不大容易得到的呢。”当然，编者是不能够使他们满意。因为一部文学史，无论其容量庞大到什么程度，要装载“名著”的全文于其间，却是绝对的不可能的事。然而读者们却是如何迫切的在需要着“名著”！

许多批评家们每执持着极偏窄的批评见解。是古者便非今，崇拜莎士比亚的便蔑视关汉卿。抱定了所知的数册书，便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缘所知太窄，所见遂不免于偏窄。林琴南先生译《茶花女》、《十字军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后，乃知盲左腐迁外，记事能手，复有大小仲马、史格得、迭更司诸人，且更能于左迁外别出心手，以数十万言，写十数日间事。彼终身执持着《左传》、《史》、《汉》以为古文最高之典范的，盖因不会看到史格得、迭更司、大小仲马之所作耳。故欲去其所蔽，必先广其见闻。

如果不以广大的心胸去接受先民的伟大的成就，便是自绝于

阳光灿烂，花木缤纷的文学园地。

就在艺术的修养立场上来讲，浅窄的专嗜的结果，也往往容易流于模拟求肖，失去了自己的真实。我们在那广大的文学园地里，也许不免会有所偏嗜，却绝对的不宜专嗜。广博的诵读，将会给我们以更阔大的成就和见解。

我们的工作，便是有计划的介绍和整理，将以最便利的方法，呈献世界的文学名著于一般读者之前。

我们将从埃及、希伯莱、印度和中国的古代名著开《吠陀》、《死书》、《新旧约》、《摩诃巴拉他》、《拉马耶那》和《诗经》，一切古代的经典和史诗、民歌，都将给以同等的注意。

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尤将特别的加以重视。荷马、魏琪尔的史诗，阿斯克洛士、沙福克里士、优里辟特士的悲剧，阿里斯多芬士的喜剧，Hesiod，Sappho，Pindar，Simonides，Horace，Ovid，Catullus，Lucrettius 的诗歌，Plato，Aristotle，Demostheus，Caesar，Cicero，Lucian 的著作，乃至 Plutarch 的传记，无不想加以系统的介绍。这样，将形成一个比较像样子的古典文库。

在黑暗的中世纪里，从 St. Augustine 到 Dante，Boccaccio，Chaucer，Villion 伟大的名字也不少。各民族的史诗，像北欧的新、老二 Edda[①]，德国的 Nibelungen Lied，以至流行于僧侣间的故事集，（像 Gesta Romanorum）行吟诗人之作品，都想择其重要的译出。

中世纪的东方，是最光明灿烂的一个大时代。从中国的诗歌、散文、小说、变文、戏曲的成就到波斯的诗，印度、阿拉伯

---

① Edda 今译“埃达”，古代冰岛两部文学名著《新埃达》《老埃达》的总称。也称作“新、老二埃达”。

的戏曲、小说，乃至日本的《万叶集》、《源氏物语》都是不容忽略的。印度的戏曲，像 Bhavabhuti，Kalidasa，中国的杂剧，像关汉卿、王实甫之所作，都是不朽的优美之作品。如有可能，《一千零一夜》将谋全译。汉魏至唐的诗，唐宋的词，元的散曲，都将成为全集的式样。宋元话本将有最大的结集。《三国》、《水浒》、《平妖传》则将力求恢复古本之面目。

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学里，伟大的名字实在太多了！Cervantes，Shakespeare，Montaigne，Milton，Moliere，都是必须介绍的；而 Bandells，Conneillo，Racine，La Fontaine 以至 Perrault，Bacon，Marlowe，Aristo 诸人也必当在收罗之列。

十八、十九世纪到现代的欧美，诗歌和散文的选译是比较困难的工作。但 Goethe，Heine，Byron，Kests，Shelley，Baudelaire，Gautier，Verlaine，Mallarme，Whitman，C. Lamb 诸人的作品是必须译出的。小说乃是这两世纪的文学的中心。从 Swift，Defoe，Fielding，到 Scott，Austen，Dickens，Thackaray，Eliot，Stevenson，Mrs. Stowe，Allan Poe，Hugo，Balzac，Dumas，Stendhal，George，Sand，Flaubert，Zola，Maupassant，Gogol，Turgenev，Dostoevsky，Tolstoi，Tchekhov，Gorky，Mark Twain，O. Henry，Barbusse，Romain Rolland 诸人都将有其代表作在这文库里。

近代戏曲的发展也是很有可惊的；从 Schiller，Beaumorcbais，以下像 Ibsen，Bjornson，Brieux，Hauptmann，Suderman，Oscar Wilde，Synge，Galsworthy，Maeterlinck，Tchekhov 都是要介绍的，至少得包括三十个以上的伟大的名字。

近代的东方是一个堕落的时期。但中国仍显出很进步的情形。《金瓶梅》和《红楼梦》是最可骄傲的两部大著作。戏曲作家们尤多到难以全数收入。但尽有许多伟大的东西还在等待着我

们去掘发。诗歌和散文是比较得落后。但我们将不受流行观念的影响，而努力于表扬真实的名著。

这样浩瀚的工程，决不是一二年或三五人之时、力所能成就的。我们竭诚的欢迎学人们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在五六年之间，将这工作的“第一集”告一个结束。

为了发刊者和读者们的便利，我们采用了定期刊物的式样，规定每月发刊一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长篇的著作将不使连载到一年以上。这样，每一年便也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结束。

我们站在这弘伟的工作计划的高塔之下，很觉得有点栗栗危惧。但我们有着热烈而清白的心；我们盼望能够因此而引起学人们的注意与合作。虽然这工作显得是很勇敢。但我们相信，我们的态度是慎重的。杜甫云“不薄今人爱古人。”Colerigde 说：“今日真正的大学教育便是书籍。”发刊之旨，便在于此。幸读者有以教之！

（1935 年 5 月上海生活书店《世界文库》）

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

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死于今天的二百年前；但他的作品在二百年后的今天，还是人类要求和平与幸福的意志的有力表现。他是属于人类历代所有的伟大的文学作家们之列的；他的作品是属于人类所有的珍贵可传的许多最好的文学遗产之一部分。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爱好和平的人在今天纪念他的逝世二百年的决定，是完全值得我们拥护依然为我们所喜爱的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亨利·菲尔丁。

二百年来，菲尔丁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最优秀的人物的推崇和赞颂。诗人拜伦称他的小说为“以散文描写人性的荷马”。戏剧家萧伯纳说，“除了莎士比亚，菲尔丁是英国从是世纪到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歌德、司汤达、别林斯基、高尔基都热烈地推崇他，马克斯也把他的作品列为生平最喜爱的读物之一。他的作品一直拥有广大的读者，并且不断地被译成各种的文字出版。在中国，也已有了他的三部作品的译本。（伍光建译的《约瑟·安特路传》，又同人译的《伟人威立特传》，金佛徒译述的

《灵魂游历记》)。

菲尔丁生活的时代，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英国的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已经和古老的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巩固地共同合作地成为一个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对外扩充殖民地，对内则横征暴敛。就在伦敦，贫富的悬殊，处处鲜明对照地表现出来。人民是贫困异常，受到了可怕的压迫与剥削；统治阶级则穷奢极欲地追求着个人的享受，过着荒淫无耻的卑鄙的生活。在这样的不平的时代里，产生出了尖利的讽刺作家史维夫特（Swift, 1667—1745），产生出了画家荷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同时，也产生了伟大的作家菲尔丁。他们都是生气勃勃的现实主义无情地攻击着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他们对于善良的人民都是充满了同情的。他们都是优秀的“为着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战士们”。他们温暖着，而且鼓舞着人类的善良的心灵和崇高的意志。

菲尔丁生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军官，属于丹比伯爵家族的旁支。他的母亲是一个法官的女儿。他是他们第十二个子女中间最大的一个。在他的早年，他家庭的生活想来还不坏，所以，他能够在贵族学校伊顿受完中等教育。后来，还到荷兰在雷顿大学念书。但菲尔丁在上了不到两年大学之后，因为家境突然贫困下来，他不得不放弃完成学业的打算而回到英国。在那时候，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面临着“当雇佣的马车夫还是当雇佣的文人”的选择。他选择了“当雇佣的文人”的一条路。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紧张而勤劳的文学事业。

他的最早的作品是戏剧。一七二八年，在他还没有去雷顿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部名为《戴着各种面具的爱情》（Love in Several Masques）的喜剧，并且还曾上演过。他回到英国之后，从一七三〇年起，接连不断地为舞台写各式各样的剧本，其

中有笑剧、滑稽剧、喜剧、政治讽刺剧等。他一共写了二十五部戏剧作品。他的戏剧活动是很成功的。在那些剧本里，他不断地勇敢地讽刺着统治阶级的虚夸荒唐的生活，攻击着政界上的贪污、贿选等卑鄙龌龊的把戏。《吉诃德先生在英国》和《巴斯昆》，尤其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政客贿选的黑幕。在《一七三六年历史日历》里，更狠狠地抨击了统治者们的无良心与无耻。

这些政治讽刺剧真正在刺痛了当时的统治者们。一七三七年，当政的瓦尔蒲尔内阁颁布了戏剧检查法，在实际上剥夺了菲尔丁和其他政治讽刺剧作家们的剧本上演的权利。他的剧作家的生活就此中断了。这一年，他是三十岁。他进了伦敦法学院学法律。这个正规的学习，使他后来能够成为律师和法官。

一七四〇年，他在法学院毕业了，被许可做律师。但他的对于从事文学事业的热忱，丝毫没有减退。他摸索着、尝试着写作各式各样的流行的文体。他还编辑《战士》、《真正爱国者》等杂志。一七四二年初，他的《约瑟·安德烈和他的朋友亚勃拉罕·亚丹姆斯先生冒险记》(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 and his Friend Mr. Adraham Adams) 出版了。这部小说立刻得到成功，使他走上伟大的“散文的史诗”作家的道路。这部小说原来打算写来嘲弄季查士（Richardson，1689—1761）的《帕米拉》(Pamela) 的，寻是当时极为流行的动人感伤的作品。但其结果却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企图，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事实和生活的尖锐而深刻的现实主义的表现。他自称这部小说是摹仿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传》而写的。的确，正直而热心的亚丹姆斯先生，比吉诃德先生还要机智而有力地保护着善良的人，打击着一切邪恶的人物和现象。他遭到很多的折磨与不幸，受尽了冷遇与嘲笑，但始终如一地为正义而斗争，不屈不挠，无畏无怯。他是一个产生于人民中间的巨人，是一个理想的好人，是当时的乐

观主义的化身。约瑟·安德烈被作为是“帕米拉”的弟弟，他成为当时被压迫、受侮辱的善良的人民的象征。他也是坚持着善良的信念，具有坚强的斗争的意志，和他的保护人亚丹姆斯先生站在一起，为维护他自己的生存、生活和爱情而斗争到底。它不是伤感的，它乃是无情地暴露当时统治阶级的无耻与罪恶的。这部《冒险记》便成为政治讽刺的“散文的滑稽史诗”了。

更露骨、更尖刻的攻击，出现在一七四三年出版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The Life of Mr. Jonathan Wild the Great）。这部比较长的中篇小说，极尽其嬉笑怒骂的能事。菲尔丁原是热心于政治活动的。他曾是“反对党”里的健将。他曾为“反对党”发挥过他的讽刺的天才。但他的良心，逐渐地发现当时的所谓“政党”，原来不过是“一丘之貉”，彼此都在搞那些卑鄙下流的玩意儿。在这里，他便将统治阶级狠狠地毒骂了一顿，借着一个“坐地分赃”的强盗头儿的嘴，恣意地嘲弄着当时的统治者以及人剥削人的现象：

> 首先应该把人类分成两大类来看待。一类是那些使用自己的手的，另一类是那些使用别人的手的；前者是伧夫俗子，后者是上等人，于是世界上干商业这一行的人就很聪明地讲起“雇用人手”这个名词来，理所当然地以雇用“人手”的多少来相互夸耀；因此一个商人可以说他自己比另一个人来的伟大，因为他雇用的“人手”多。（卷一，第十四节）

这个无恶不作的坏蛋接着又直截了当地说道：“说我们这群人类的上等分子生来就是为了吞食世界上的果实，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同样地，说那些下层人生来就只是为了替我们生产那些果

实，也一点没说错。你瞧……高楼大厦哪一座不是木匠和瓦匠辛辛苦苦盖起来的？然而利润却归擘划的建筑师去得，而享受这些现成房子的则是连一块砖也不会砌的住客。”他大胆揭发了那些统治者藏在心里，没说出口来的话。这样的讽刺，是入木三分的。菲尔丁又借着这个“大伟人”魏尔德的嘴说道：

> 众位，你们都是要建大功，立大业，垂名史册的人。大众同是要作路劫的大事，为什么这样愚蠢，内里自己先闹个不和呢？……你们在稠人广众中，不知要点巧着，只管彼此争论，叫他们留神听你们争论些什么，不提防你们别的，你们就可以趁势掏摸他们的口袋，多少偷点东西。你们若是私下里彼此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争论吵闹，那就是未免太傻了。你们自己都晓得自己是贼。那末戴宽边帽子，或是戴窄边帽子有什么分别呢？戴这样帽子的是个贼，戴那样帽子的也是个贼，总而言之都是贼。若是我们窝里以外的人也是傻子，听见你们分党，他们也跟着你们分党，有些喜欢这一党，有些喜欢那一党，那就更妙了。你们尽管乘机偷摸他们，暗中还要笑全心全意，自己却不可学他们的样子，当真分起党来。(卷二，第六节)

那样爽快的话，把菲尔丁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政治斗争的内幕全部揭露出来；也直把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党”争的最里层的秘密揭露出来了。

菲尔丁的另一部比较短的小说《从现世到来世旅行记》(A Journey from this World to the Next，中译本名《灵魂游历记》)也同样地弹出对伟大的人物们的讥嘲甚至怒骂的调子来。大名鼎鼎的迈诺斯法官站在极乐世界的大门口，盘问那些申请入天堂的

幽灵。其中有一段是这样：

> 这时一大群鬼魂走上前来，嚷着说他们大伙有一个共同的要求，要他们的队长替他们传达上去。队长对法官说，他们都是在为祖国效劳的时候被人杀死的。迈诺斯本来想把他们放进门来，但是忽然起了好奇心，就问队长，谁是侵略他们的敌人。……队长回答说，他们自己就是那些侵略者；他们踏上敌人的国土，就在好几个城市里纵火，掳掠了一番。迈诺斯问道："那末，为的是什么原因呢?"队长回答道："是那个雇用我们的人命令我们这样做的。这就是一个士兵的理性：不论命令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该照着去做；否则就是替军队丢脸，也是对不起我们领的这份人饷。"迈诺斯道："你们确实是些勇敢的汉子，但是现在请你们向后转，听我下这末一次命令，回到另外那个世界里去吧！因为，在一个没有城市可以纵火，没有人民可以残杀的地方，像诸位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呢？我要向你们进一句忠告：将来你们应该对真理多下点功夫去认识认识，不要把专事毁灭别的国家的人口说成在为你们的祖国效劳。"（第七章）

这是如何大胆地对于开疆辟土的殖民主义者的残暴行为的攻击啊！在那时候，英国统治者正是从事于火热的掠夺殖民地的战争，而这一棒正打中了那条赤练蛇的"七寸"。这样鲜明的反对侵略战争，正是英国启蒙现实主义的最光辉的代表者菲尔丁的正义的信念之一，也是这位人道主义者的伟大的说教的主旨之一。就这一点，便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对于二百年前的这位热烈地反对侵略战争的伟大作家，发生敬意和怀念了。

菲尔丁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Joens， Foundling）出版于一七四九年。这是他最成熟的作品。法国作家司汤达称他为“小说中的依里亚德”；一般批评家也都认为它是菲尔丁的代表作。《汤姆·琼斯》乃是他的“滑稽史诗”《约瑟·安德烈冒险记》的发展。和安德烈相同，汤姆·琼斯这位少年，也是受压迫、被侮辱的善良的人。故事的骨干是弃儿汤姆·琼斯和他的情人，一个乡绅的女儿，苏菲亚·威斯登的恋爱。故事的发展是很曲折的，有好些惊险的场面，也有不少令人发笑的滑稽场面。那些所谓上流人物是那么卑鄙龌龊，存心不良，使尽了千方百计，老在计算着财产，想叫汤姆·琼斯永远地被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但汤姆·琼斯却是一位愉快、健康、生气勃勃的年轻淘气鬼。他满腔的热情，一身的傻劲，有坚强的意志，有旺健的斗争的心情。他机智地保卫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情，以及属于自己的一切。他和他的情人苏菲亚·威斯登在历尽艰苦之后，终于有情人成为眷属。和《约瑟·安德烈冒险记》相同，善良的人是终于得到了胜利，也就是说，正义终于战胜了罪恶的势力。

对于罪恶现象的暴露与揭发，乃是菲尔丁笔下最淋漓痛快的许多场面的内容。不是消极的，乃是乐观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汤姆·琼斯积极地为维护自己的爱情和自由而展开的斗争，也就是真实的社会斗争的一部分。那样的顽强的斗争意志与维护自己的决心，“与卢梭、法国大革命和群众性民主运动的掀起是一脉相通的。”（《保卫和平》总第三十九期，第四十二页）

《汤姆·琼斯》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出版的第一年里，就印行了四次，还有好些个“盗窃的”的翻版。

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亚米丽亚》（Amelia）（一七五一年）在出版的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了。但《亚米丽亚》的题材，却和菲尔丁的以前的作品不同；减少了令人发笑的滑稽，减少了嬉笑

怒骂，减少了对罪恶和卑鄙的无情的暴露，不过它还同样使人感动。他的观察更加细腻深入了，有着高度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它所描写的小资产阶级是活泼泼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菲尔丁想在这部小说里，开始一个新的尝试；他企图比以前更进一步地深入到他的人物的心灵和意识里面去。他在这里所揭露的乃是人类的心灵。在《亚米丽亚》里的心理变化的现实主义和分析的加强乃是其特点。有些读者觉得菲尔丁在《亚米丽亚》里，有向感伤主义低头的倾向，它所赢得的乃是读者的感情的热泪。但他的斗争的意志，却并未衰退。他在晚年做了法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改革者。他是严肃地对待他的工作的，他始终如一地攻击“罪恶”到底。

菲尔丁在文学上的勤劳的工作，却没救了他的贫穷。就是《汤姆·琼斯》的空前成功，也没能使他经济独立。他的身体逐渐衰弱下去。一七五四年病危的时候，医生劝他到里斯本去疗养。他就在那一年的十月八日，到了那里不久的时候，逝世了。他的遗作《里斯本海程日记》（Journal of Voyage to Lisbon）在第二年（1755年）出版，在那里，他还是热情地观察着，描写着，且依然是好恶分明。

叶利斯特拉托娃评论菲尔丁道：“整个说来，足以充分表现菲尔丁的创作特征的，是他的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并不纯粹是乐观气质的结果或无牵无挂的生活态度的产物，像资产阶级批评家（例如把《善良的水牛》的品性硬加到《汤姆·琼斯》的作者身上的泰恩）所往往竭力描写的那样。菲尔丁‘滑稽史诗’使人感受的快乐，是与作为它们的创作者的启蒙派的、人道主义的智慧分不开的。真正同情人民，敬爱‘天赋的’人格，厌恶政治生活和私生活中的一切庸俗、虚伪和欺诈行为，——这就是菲尔丁创作的乐观的热情的基础。他的幽默比表面上看起来要严肃得

多；菲尔丁是拿幽默当作对虚伪和谎言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手段，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装模作样是真正可笑的东西的唯一源泉。’”（《译文》一九五四年九月号，第一〇五——〇六页）

这个评论，正确地说明了菲尔丁创作的特质。菲尔丁在他逝世二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拥有大量的读者；他的“滑稽史诗”依然使人感受到快乐。他的启蒙的现实主义作品，有力地表现了人类要求和平与幸福的意志，同时，他自己也便是属于优秀的“为着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战士们”之一，永远不会为寻求着人类的进步与光明的和正在建设自己的幸福的社会的人们所忘记。

我们中国的一位讽刺作家吴敬梓（1701—1754）也是死在与菲尔丁逝世的同一年的。今年我们也在纪念吴敬梓的二百年逝世的日子。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同样的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作者的理想的伟大作品。他所攻击的，正是当时封建社会里弥漫着的虚伪与欺诈的空气以及统治阶级的卑鄙与无耻的生活。他的强烈的不满和尖利的讽刺，发扬了正气，打击了卑鄙、下流、虚伪、欺诈的生活与现象。对于寻求人类的进步与光明的人们，对于正在建设自己的幸福的社会的人们，他们是同样的有用的与有益的。

在这里我们纪念着菲尔丁便觉得更有一种熟悉和亲切的感情在流露着。

我们将永远怀念着这样的有力地表现人类要求和平与幸福的意志的作家!

（原载 1954 年 10 月《文艺报》第 20 期）

印度大诗人迦梨陀娑传

江南的三月，漫山遍野，全是绿色，深绿、浅绿、浓绿、翠绿，一层层地重叠着，却又分别得很清楚。万绿丛中，时时露出一点点或一片片的红色来。深红、妃红的杜鹃花，成簇地映得半个山头火般的红。时阴时晴，天色润湿得像要泛滴出水来。春云是那样的轻盈，又是那样幻变多端地东飘西荡，说不定就会轻轻地洒下一阵细雨或重重地落下一滴滴的大雨点来。清涟的水到处在流着，流到池塘，流到沟洫，流到稻田，汩汩地在作细响。我就在这个时候，走到天台道上，走进国清寺，要访求《云使》和《沙恭达罗》的作者——印度大诗人迦梨陀娑（Kalidasa）在十一、二世纪时输入中国、留在这个佛寺里的梵文遗作。据说，那是古梵文写本的《沙恭达罗》①。假如这传说是真实的，那么中、印两个民族之间的这段“文学因缘”，在公元十一、二世纪时代，就有很重要的和很亲切的开始了。爱雨季、爱云的这位印度诗人的作品，会输进到中国多云多雨的浙东沿海的山区古庙里来，而留存在那里八、九百年，直到如今，那一段故事的本身就有诗

① 见我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第四十章七四五页。

意，就是传奇（印度人民每年都在雨季开始时纪念他）。中国最古的戏文《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负桂英》都产生在离天台山不远的地方，这样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剧情，和《沙恭达罗》的故事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的移植，乃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大问题[①]。我怀着且喜且惧的心情会见了国清寺的方丈，问到这寺里有没有梵文的经卷，他答道：“没有。”这个否定的回答使我的心一沉。“的确是没有么?”“知道不知道战前是曾经有过的么?”“请细细地想一想，查一查吧。”他最后说，他知道附近的高明寺藏有梵文经卷，不知内容如何。连夜地派人走山路到高明寺把这个梵夹本的古经卷找来，它已经破碎不堪触手，上面有汉字题道：“七种灌顶拾”，那显然不会是《沙恭达罗》的古写本了。这个访求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结束。很可能那个古梵文写本的《沙恭达罗》尚在人间，尚在天台山附近，尚会被我们发现。

很幸运地，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却早已有藏文译本，在七百年前就收入《丹珠》部（在第一百一十七帙）里了[②]。这可以证明：在中、印古代文化交流里，印度诗人迦梨陀娑就早已成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一个诗人了。在今天，中、印两个民族之间的新的友谊，在古老的友谊的基础上发出更光亮的光芒来，对于这个印度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介绍与研究，是更有必要的。

印度的古典文学，绝大多数是用梵文写的。古代梵文的杰

① 参考同上书第三册第四十章和许地山的《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见1927年版《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

② 见1956年5月号《译文》里金克木作《印度的伟大诗人迦梨陀娑》一文的末段。

作，开始于《梨俱吠陀》（Rg Veda），那是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作品。之后，是两部大史诗：《摩呵波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Ramayana）。佛教诗人马鸣（Asvaghosa）也是很重要的梵文作者，他的有名的诗篇《佛所行赞经》（Buddhakarita Kavya）曾在北凉代里（403－433）由昙无忏译成汉文，收入《佛藏》中。[①]

大诗人迦梨陀娑的出现，给古代梵文学以更为光辉的成就。他的好些作品，在梵文学里达到了最高的、最完美的境界。关于他的生平，有好些传说。关于他的正确的生卒年代，在专门研究迦梨陀娑的梵文学者们中间，也难以求得一致的意见。有的人说，他生在公元前一世纪。有的人说，他生在马鸣之前。但就这两位诗人有些相类似的诗句而论，马鸣写的比较粗朴，迦梨陀娑写的就很圆润秀美，可以肯定是“后来居上”。比较多的人把迦梨陀娑的年代放在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那是笈多王朝的旃陀罗笈多二世（Candra Gupta Ⅱ）的统治时代，是印度奴隶社会的一个繁华时代。

关于迦梨陀娑的生平，有一个传说。他是一个婆罗门，少年很穷苦，为一个牧人所养大。当时，有一位公主十分美貌，且有才智。她择婿甚酷，只肯嫁给在辩论中占上风的人。许多贵胄子弟们都失败了，就想报复。他们找出这位美貌的少年迦梨陀娑来，带他到公主面前。他是一无所知的蠢汉，却在默默无言里，占了胜着，娶了公主。后来，真相明白了，他被公主所逐出，愤而祷于女神迦梨的座前。女神迦梨乃赐他以无比的诗才。自此他便成为一位大诗人，并取名为迦梨陀娑，那就是“女神迦梨的奴

① 《佛所行赞经》五卷收入《大藏经·印度诜述杂部》（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均收之）。

隶”之意。还有一个传说，他浪游印度各地，后来到了锡兰岛，被一个女人害死。这些传说都是“望文生义”，不可靠的。从迦梨陀娑的作品看来，他乃是一位有诗的天才的人物，热爱大自然，热爱人间，具有极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他生平浪游的地方很多。很可能，曾经到过喜马拉雅山，并在那里住过一个时期。在他的诗篇里描写过那美丽的山国风光。同时他也是一位有锐敏观察力的诗人。他熟悉人民的生活，也熟悉王宫的奢华。他对于女性的美丽与温柔的描写，乃是印度诗人里最为杰出的。在这方面，德国诗人席勒认为是希腊诗人们所远远地比不上的①。他不仅是印度古典文学里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世界古典文学里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美丽的诗篇乃是人类文化遗产里的最优秀的杰作的一部分。在介绍与中国有悠久的文化艺术的交流历史的印度古典文学时，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介绍是首先要提出的。

迦梨陀娑留下的作品共有七部，四部是诗篇，三部是剧本。最为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剧本《沙恭达罗》。这是一部七幕剧，描写国王豆扇陀到森林里打猎，因追逐所射的鹿，和女郎沙恭达罗相遇而发生恋爱的故事。后来国王离开森林回到王宫里去，留下一个戒指作为记认物。女郎日夜思念，弄得神魂颠倒，致得罪了一个隐士，被他的咒语所伤害。当诗人描写沙恭达罗为了要去找丈夫和森林里的一切人物相别时，是凄美到能够撼动任何一个人的心肠的。沙恭达罗在途中，因沐浴失去了戒指。她到了京城，国王因受那隐士的咒语所禁，竟然认不出她来，拒绝她到王宫里去。她伤心万分。后来，戒指找到，咒语破

---

① 席勒给宏保特（W·V·Humboldt）的信里说道：“在古代希腊竟没有一部诗能够在美妙的女性的温柔方面，或者在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比于万一。”

了，国王豆扇陀方才如梦初醒，和她恋好如初。沙恭达罗做了王后，生的儿子就是婆罗多，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始祖，是大史诗《摩呵婆罗多》所歌咏的一部分。我们的诗人是从这部大史诗里得到他的这个题材的，但他却使这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更为动人，更为美丽，更为现实，更能触动男男女女们的善感多愁的心了。《沙恭达罗》在我国有好几个译本。王维克译的一本，是从法译本重译的。最近季羡林教授译的一本，则是中国译本里第一次从一个梵文本译出来的全译本。

《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是五幕剧，是从《梨俱吠陀》里取材的，写的是一个国王和一个仙女的恋爱故事，充满了抒情的诗的情调。仙女妩儿娃希在到天上的途中，为一个恶魔所困，一个人间的国王拯救了她，彼此发生了恋爱，妩儿娃希不再以天堂为乐园。她被罚到人间去，三番五次地受到磨难，但终于和国王重圆。但公认为他的最早的一个剧本《摩罗毗伽和阿只尔密多罗》（Malavikagnimitra）却具有更强的戏剧性。这个剧本也是五幕，写国王阿只尔密多罗和女郎摩罗毗伽的恋爱故事。

在他的四部诗里，最流行的是《云使》（Meghaduta），这是一部长篇的抒情诗，分为上下两篇，写的是一个药叉在财神卑罗那里服役，因做差了事，被神放逐到罗摩山去。他和他热爱着的妻子相别，彼此想念着。当雨季来临时那个药叉看见了一片云，就嘱托那片云带给她以他的无恙的消息和爱她的热忱。他向“云使”描写着所经过的路程的景色，从他住的中印度的罗摩山到北印度的喜马拉雅山。我们的诗人以难于形容的美丽的诗句，充溢着温柔的感情的韵调，描写着云使所经过的每一河流和山谷，城市和村镇。一个批评家称这篇诗为最能表现最深刻而又最温柔的感情，那热情在那里是被纯化了，被升华了。在描写药叉妻子的相思的时候，也有很漂亮的诗句。那些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好的

情歌的一部分。这部诗的汉文译本新近已经印出。

叙事诗《鸠摩罗出世》（Kumarasambhava）叙的是大神湿婆和喜马拉雅山的女儿乌玛的恋爱和结婚的事。天神为了要降魔，想叫湿婆结婚生子。爱神来到了，带来了一片烂漫的春光。但爱神失败了，他被湿婆眼里的神火所烧死。爱神的妻子的哭悼，成为一章凄楚动人的有名的挽歌。后来，少女乌玛以苦行打动了湿婆，二人终于结婚。第九章以下，写的是湿婆和乌玛生了一子鸠摩罗，即战神，为天神降魔的故事。专家们认为这第八章以后乃是后人所续，并非迦梨陀娑的原作。

《罗怙世系》（Raghuvamsa）也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以写罗摩（Rama）的事迹占最多的篇幅。因之，很像是大史诗《罗摩衍》的简本。不过，我们的诗人迦梨陀娑却避免了干燥无味帝王世谱的叙述，而以清芬四溢的美丽的诗句，借着帝王一家的谱系，生动地表现出古代印度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对于自然景色的高超的描绘，也给这部诗以新鲜的情趣。

《时令之环》（Rtusamhara）即《六季杂咏》，被认为是诗人青年时代的创作。它以六组抒情诗，分咏印度一年中的六个季节。作品具有清新的诗意，描写着六季里自然景色的变化和人对景物迁移时所引起的不同的感情，使后代的读者们爱好地讽吟不已。

印度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这些不朽的诗篇和剧本，构成了古梵文文学的精英，成为反映印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的金光四射的最为光彩的创作。他和我们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诗人，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等等剧作家，同是人类所能产生的最优秀的儿子。他的创作将永远地为人类所传诵、讽吟。

（原载1956年10月《文艺报》第10期）

伊朗诗人萨迪的《蔷薇园》

——纪念《蔷薇园》出版七百周年

伊朗诗人萨迪在离开今天的七百年前，即在一二五八年的春天，正从长期的倦游归来后不久，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西拉子城，隐居在一所风光优美，花木茂盛的别墅里。他想享受着过去半生中所不曾享受过的安闲生活。他刚写完他的《果园》，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有一天，他的一个老朋友，一个曾经和他一同在旅途中奔波过的商人，来访问他。他们很高兴地闲谈着，一同到城郊散步。“那时正是春天，严寒的威力已经平息了，是百花开始统治的时期。”他们一同在一个朋友的花园里度过那一夜。第二天太阳光出来的时候，那个商人在衣服的前襟上插满了蔷薇花，向他告别，准备上路了。诗人萨迪对他说道：

“你难道不知道花园里的蔷薇花是不能永远地开放着的么？蔷薇花丛也不会永远地有着芬芳的花朵的。圣人说过：易变的东西不值得去留恋。”

那商人感叹地说道：“那我怎么办才好呢？”

诗人萨迪就说道：“为了娱悦读者，并为安慰一切爱好蔷薇的人，我将写出一本《蔷薇园》的书来——这个蔷薇花园里的花

瓣，将不会被秋风的严酷的气息吹落，时间的循环也不会将快乐的春天转变为凄凉的秋天。”

他说完话，那个朋友立刻把蔷薇花朵从他自己的前襟上取了下来，系到萨迪的衣襟上说道：

“你这心胸广阔的人啊，完成你的诺言吧。”

诗人萨迪，就在那一天，写出了他的《蔷薇园》的第一章。

当那花园里的许多蔷薇花已被秋风吹落，只剩下寥落可怜的不多几株在迎风飘摇的时候，他的《蔷薇园》便已经写好了。

这部《蔷薇园》给诗人萨迪带来了不朽的名誉；这部《蔷薇园》不仅成为波斯文学的珍奇，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凡是世界上的大作家们都很喜爱这部不朽的著作。哥德和普希金都对萨迪有很高的赞评。普希金有名句道：“有些人已经不存在了，还有一些人也远去了——正像萨迪有一次说的。”

所有世界上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有世界上珍重并喜爱人类遥远的时代里所产生的文化宝藏的人民，在听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今年纪念伊朗诗人萨迪的《蔷薇园》写作七百年的号召时，将会怎样喜悦地来响应着啊。

萨迪的《蔷薇园》是像蔷薇花本身那么芬芳、鲜艳的一部卓越的作品。它一共有八章：一、论帝王的生活，二、论托钵僧的习性，三、论知足的优点，四、论沉默的优点，五、论爱与青春，六、论年老与衰弱，七、论教育的影响，八、论正当的交际。他是用最动人的形象化的许多故事帮助他来说明他的哲学和教训。每一章都以若干则故事组成。是用散文写成的，但这种散文是有韵律的，还以哲理的或格言式的短诗作为结束。看起来，仿佛全篇故事只是来说明那短诗的，其实，那短诗恰恰像画龙点睛似的，阐明了作者叙写那些故事的用意。故事都非常生动活泼，故事里的人物都栩栩如生。题材是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

逸趣横生，有的很富于幻想，有的十分现实地表现着当代的社会生活，有的是奇谈和怪异的故事，有的则是日常生活的琐谈，有的很幽默，有的则是讽刺着、甚至攻击着当权者。其中充满着那么多的机智可喜的名言佳句啊。这便是《蔷薇园》一书所以为读者们所永远地喜爱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萨迪在《蔷薇园》里所表现出的思想感情，乃是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热爱，对于残暴的侵略者和封建帝王及官僚们的憎恨与斥责。他乃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传布者。他深刻而现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即十三世纪的波斯和东方穆斯林世界的人民生活与时代精神。

《蔷薇园》里的故事所以能够感动人，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就因为它是诗人萨迪的长久地生活于广大人民之间，并且，自封建帝王以至最低层的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他都很熟悉。他周游的地方很多。各阶层，各民族，各种职业的人物，他全都有深刻的观察。他从实际生活里，获得了他的哲理和题材。他还从广大人民的口头里，记录下来许多可惊可喜的奇谈怪说，以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民歌、民谣、民间箴言、格言与成语。古代流传下来的若干故事与传说以及箴言、俗语等等，也成为他吸取养料的来源之一。他把这一切材料，包括他自己的亲身体验的社会生活与经验在内，以他自己的天才的大熔炉，把他们冶铸成为他自己的辉煌照人的不朽的创作了。

所以，《蔷薇园》虽只写了几个月就完成了，其实乃是他长期的生活经验与创作纪录的累积，在那时，才成为最后写定的本子而已。我们可以说，它的创作的历程是漫长而艰苦的。

诗人萨迪出生于波斯的苦难时代。那时代，正是蒙古军队大举侵入，烧掠一切，破坏一切的时代。有的人说，他生于十二世纪的末叶，但根据可靠的资料，他的诞生时期，当在一二〇三年

到一二〇八年之间。他的诞生地是当时波斯的文化、政治、商业中心的西拉子城。他的父亲是一个穷苦的小传道士。在他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就死了。他自此成为孤儿，和他的兄弟们一同过着很困苦的生活。但不久，萨迪得到了有力者的帮助，来到了波斯的最著名的古城巴格达。他进入了尼札米亚学院，成为一名公费生。那个学院乃是穆斯林东方的最高学府，用阿拉伯文授课。他因此学会了熟练地掌握阿拉伯文的写作能力。他曾经用阿拉伯文字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那个学院并不曾给他很大的影响。他并不热中学习那时的基本“科学”。他在那时，已经开始写诗了，所写的全是青年人的欢乐的和热爱生活的诗歌。他并不曾在尼札米亚学院毕业，就离开巴格达了。他在那个时候，曾经到过麦加朝圣。

以后，他开始他的长时期的流浪漂泊的行脚僧的生活。这段主要的“周游列国”的生活，大约开始于十三世纪的三十年代。直到五十年代，他才安居下来，从事写作他的主要作品。

他的旅行是很艰难的。他常常徒步跋涉于各处。他到过亚、非各国的广大地区。他到过大马士革，到过的黎波里，到过巴里别克，到过阿列波以及其他城市。他的游踪，西边到过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东边到过阿富汗、印度和中国的喀什噶尔城。他不止一次地朝拜过麦加，朝拜过“天房”的黑石。他不再是一个无忧无虑，尽情地寻欢求乐的青年学生了，他乃是一个以乞求布施为主的行脚僧。他必须在街头或清真寺的广场上进行宣教布道。他要以他的辩才无碍的口舌，吸引着大量的听众。他讲述宗教先知者们的生平事迹，还广泛地宣讲着其他的道德与品行问题，善与恶问题以及有关社会风俗和实际生活问题。但这种布道，是不能使他长期地留居在一个城市里的。他必须时时流动，才能得到他的新的听众。他有时也感到难于吸引听众的苦恼。他曾在一篇故

事里写道："我看到，我的灵感吸引不住他们——潮湿的木柴中吹不起火焰来。"

他从大马士革出走之后，就在耶路撒冷的荒漠上，为十字军所俘获。他们命他在的黎波里挖壍壕。但不久，一个商人把他从俘虏里救了出来，带他到阿列波，并把他的女儿嫁给了萨迪。但那个家庭生活是不愉快的。萨迪后来又从家庭里逃跑了出来，仍旧过着流浪漂泊的生活。

他曾经访问过阿塞拜疆的城市贝拉康和塔布里士，在那里，他遇见了蒙古的阿巴喀汗，并向之进行劝告。最后，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西拉子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专心写作。

他在一三五七年完成他的大著作《果园》，那是以十章组成的，每一章里也都包括了若干故事和诗人的短小精悍的哲学插话。他在写《果园》之前，曾经写过许多抒情诗，写过不少颂歌，但注意他的作品的人并不多。他在《果园》的序里，曾经很有牢骚地说道："在法尔斯不尊重他的诗，跟在赫坦不重视麝香一样。"但他的《果园》一出来，立刻便大大地受到重视。法尔斯的当权者阿塔白克、阿布别克立刻邀请萨迪加入他的高庭诗人之列。但萨迪傲慢地拒绝了他的邀请。他继续地在西拉子城写他的《蔷薇园》。他在《蔷薇园》里写道："人们像吃糖般地咀嚼着他故事中的甜美柿子。"

在萨迪的时代里，波斯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地发达。萨迪对于他们有充分的同情。这成为他著作里的一个特色。他是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毫不退缩地向当时的权威者们作斗争。他曾经自己说道：

"萨迪，你的言词无畏惧，
"既然你把剑举起，就向胜利走去。

“暴露出全部真理，揭露出你知道的一切。
“丢开自私的言词及其虚伪的把戏。”

他是那样勇敢地宣扬着正义和真理。后代的读者们之所以喜爱他，我们现在之所以在纪念着他的《蔷薇园》写成的七百年，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原载1958年9月《文艺报》第18期）

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孚

今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是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孚的一百年诞生纪念。不仅瑞典的广播电台，电影制片厂和剧团在忙碌地筹备纪念她的演出与广播的节目，而且全世界的爱好和平的人民，也都在举行着隆重的纪念。中国人民也在九月里，响应着世界和大的号召，举行一次纪念大会。苏联的国家电影制片厂，已经把她的一部为儿童写的《尼尔斯奇遇记》拍成电影了。这部《尼尔斯奇遇记》原来是瑞典全国教育会请拉格洛孚编的一部地理书。她却把地理、自然史和神仙故事结合在一起了。尼尔斯是一个残忍自私的孩子。为了惩罚他的一次闯祸，仙人把他变成了一个小人。他骑在一只鹅背上，随着野鸭群飞过了挪威全境。这个孩子看到了农田、王庄、堡垒、城市、木屋与矿山。他遇到大熊，遇到鸷鹰，遇到两鹿群，而有了种种的惊险的故事。他从他的朋友们，即禽和兽类那里，学习着对同类的仁爱和互助。这个神仙故事乃是作者多年来仔细观察鸟兽生活的结果。这部"童话"立刻得到了广大的成功，孩子们都热烈的欢迎它。在一九〇七年，即这部书出版的第二年，她又写了《尼尔斯奇遇续记》。全世界的儿童们也都像欢迎《阿里斯漫游异境记》似的欢迎这两

本书。许多儿童从各个国家来拜访她。在她书房的墙上就悬挂着一幅瑞典地图，上面飞着的是尼尔斯骑着的金鹅。

一九〇九年，拉格洛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五年以后，她自己也被选入瑞典学会为委员。她乃是第一个妇女，获得这两个荣誉的。她在这时候，已不仅是瑞典的一个作家，而且是世界读者们所欢迎的一个作家了。她的作品不仅是属于瑞典文学宝库，而且是属于世界文学的珍宝的一部分了。

塞尔玛·拉格洛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她在写作方面是经过艰苦的摸索过程的。她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诞生于瑞典西部伐姆兰地方的马巴斯加庄。她父亲是一个军官。她幼年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当她三岁的时候，她得到小儿麻痹症，使她终身都受到这个病的影响。她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女子师范学院念书。毕业之后就从事于教育事业（1885 年到 1895 年）。在一八九五年之后，她才放弃了教书生涯而拿起笔来，从事写作。

伐姆兰是一个多湖和多森林的地方，又是一个工业城市，出产铁，又有水力发电站，同时却也是产生丰富的神话与传说的故乡，曾经有几个前辈作家们写过若干成功的作品。拉格洛孚幼年时，曾从她父亲那里，听到过不少的古代英雄的传说。她自己后来又从人民口头上收集到不少的民间故事与传说。那些民歌和民间音乐，都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她开始写《古斯泰·贝林的故事》。其初是想写长篇的史诗，但失败了。后来，她又想把这传说里若干故事，写成剧本，但也没有成功。她还想用十八世纪的写实主义的小说形式来表现它，但也尝试得未有结果。最后她乃采取了写下了现在样子的小说，想象奔放，富于灵感与浪漫气息，因之，便具有浓厚的史诗的特色和她自己的风格。她勇敢地脱出了风靡一代的写实主义的小说的牢笼与影响，而创造了她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她之所以非写作不

可，那是由于一八八八年，她父亲死后不久，她被逼着出卖马巴斯加的老家。一八九〇年，她把《古斯泰·贝林的故事》里的一部分，投稿到《伊顿》杂志，而获得了奖金。这，大大地鼓舞了她，全书便于一八九一年完成了。《古斯泰·贝林的故事》是拉格洛孚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著作。她在这部大作里，写的是十九世纪初期，在她的故乡伐姆兰所发生的故事。古斯泰·贝林是一个美貌而活跃的少年。他出现的时候，是一个伐姆兰地区的牧师。他的雄辩而有吸引力的讲道，使他得到大众的欢迎。但当这个故事开始时，他却因酗酒之故而被免职。他以一番雄辩，令他的教民们收回了那个主张，而来剥夺他的牧师职务的那个主教反而赞许他而离开了。他不久却深感到灰心失望与自谴。他登上一块雪堆要想自杀，但被一个伊克培市长的妻子所救。她是一个当地有力的人和矿山主。她使他复燃了他失去的荣誉心。他跟她一同到伊克培。古斯泰·贝林的热情和吸引力使他连续不断地闹了好些恋爱的故事。女人们都崇爱他，而凡是和他接近的人他似乎总带了不幸给她们。最后，他遇到年轻的公爵夫人伊丽莎白。他对她像天上的天使似的崇拜着。他被不公平地责备他向她求爱。她被她婆婆和丈夫驱逐出家庭。他们二人经过了许多苦难，终于结合了，过着新的生活。作者的优美、动人的诗意的描写，和稍稍带着些讽刺的笔调儿，立刻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每个故事都是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或一篇短篇小说。她的这种善于说故事的天才，也常用于她的后来著作上，这使它们具有丰富的而且艺术性很强的表现。

一八九四年，她发表了《奥辛里加·兰卞尔》，一部传说性质的短篇故事集，在这部集子里，其中有一篇《杜奴琴》，曾在一九一四年改编为剧本。她在这里是很好地结合着斯坎地那维亚古代的和现代的情感和题材的。

在一八九五年的冬天到一八九六年，她在意大利旅行，并住在那里一个时期，写出了一些作品。她的《古斯泰·贝林的传说》，曾被改编成一部意大利的歌剧。

在一八九九年，她又从古老的斯坎地那维亚的神话与传说里，写出一部短篇小说集：《杜洛特宁加与孔加哈拉》。同一年，她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个贵族家庭的传说》，这是一个现代的题材，叙写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的爱情，从狂疯里救了出来，颇像那古代的传说，一个女人把变成了兽类的情人救了出来的传说似的。

她在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〇年之间，到巴勒斯坦旅行，后来写出了两册的小说《耶路撒冷》（1901—1902 年出版），这部小说，明显地表现她的善说故事的光辉的天才。同样的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车夫》（1912 年）和《葡萄牙的皇帝》（1914 年）也表现出她的洞悉世故人情和怎样地以清朗而丰富多采的艺术手腕来描写她的故事的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拉格洛孚感到悲哀与失望。在她的小说《流亡者》里（1918 年），说出了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怎样地为层出不穷的许多恐怖事件感到震惊与害怕。

她在一九二二年写了她的童 年的回忆录《马巴斯加》。从这个童年的回忆里。她得到了新的力量。她集中了她的力量来创作一部新的《三部曲》，那是很弘伟的一个力作。第一部名为《列文斯科利吉的指环》，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叙述的是十八世纪，在国王卡尔十二世的统治下的故事。第二部名为《夏绿蒂·罗文士柯尔特》（也在 1925 年出版），其背景和《古斯泰·贝林的故事》相同，也是叙写十九世纪初期的在伐姆兰一个老家的环境里产生出来的故事。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这部小说是她在二十世纪所写的一部最好的作品。紧接于《夏绿蒂·罗文士柯尔特》之后的

是第三部《安娜·施活特》（1928 年），这部弘伟大著作使她于《古斯泰·贝林的传说》之外，更辉煌地发展她的天才。她的最后大著是关于《马巴斯加》的回忆的第二部和第三部。

她是瑞典现代文学里的最大的作家。她的作品，从题材到技巧，都是从瑞典的古典传统里得到的。民间的故事和传说乃是她创作的依据与来源。她是紧紧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她的人物们是怎样地产生于瑞典人民之中，而深深地为他们所喜爱的啊。她把这个北国风光的人情世态介绍到整个世界来。过去的死的人物们复活在我们之前。善与恶是怎样地分明。她的善良的心，她的丰富的想象力，她的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与她的动人的说故事的雄辩，使得古老的年代和现代很巧妙地结合起来，也使得幻想与真实，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她的女性的温柔而同情的笔触，感动了无数的读者们。

她写的是北国的过去的人物故事，是带着四海漫游的幻想的童话，是热诚的道德观念，是和平主义的对于战争的诅咒，是一个温和的女人对世情物态的有节制的讽刺，这一切使她不仅成为她祖国瑞典的人民所喜爱的作家，而且使她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与美好的文学的人民所喜爱。

她所写的许多故事，为成人们，也为儿童们所爱读。她从她自己活着的时代，也从过去的许多不同的时代里寻找合适于她所描写的故事和人物。在她的许多故事里，传说里，长篇小说里，或短篇小说里，她的人物总是栩栩如生的，即在幻想的故事里，那些人物也不是僵硬的塑造，而是富有人情味和人性的。她是那样温柔而喜悦地在描状着他们，使他们的形象紧紧地把我们捉住，正如一个批评家所说的，使我们感到，好像一位母亲微笑地把她的美丽可爱的孩子们送到我们面前来似的。这是拉格洛孚她自己所独有的风格，这也使她的作品能够被世界的读者所广泛的

接受。

她具有女作家所特有的才能、性格和笔调，她从一个女教师成为一个女作家；她的好心肠和诚恳的态度，她的对于“善”的信仰和“恶”的憎恨，她的自由、柔和、活泼生动而质朴的风格，使出于她的敏感而细致的笔下的作品，能够真切地表现出瑞典人民里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如何地感动世界的读者们，而使他们在这些幻想的代表们的身上，尽管他们有缺点，显得如何地喜爱着瑞典的人民。他们不常常是典型的人物，但从他们的生活里，反映出他们祖国的内在的现实。

她死于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全世界的爱好她的作品的人都哀悼着她的逝去。她在马巴斯加的住宅，在一九四二年开放，去参观致敬的人们至今络绎不绝。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写

（原载1958年10月《文学研究》第3期）

《贫非罪》序

阿史特洛夫斯基的这本《贫非罪》，在俄国剧场上继续的占了五十多年的势力。它描写当时商人阶级的情形极深刻，没有一个批评家不赞美它。当时虽有许多国粹派——斯拉夫派——的批评家，因为它描写的人物带有反抗西欧化的色彩，非常与它表同情，然而这种误会，后来的人却没有重蹈覆辙。急进派的批评者杜勃罗留布夫也能去了这层肤浅的解释，更深的把它的原意阐发出来。克鲁泡特金以为这本戏的影响，遍于全俄。同格利鲍耶陀夫的喜剧，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及其他许多俄国文学里的好作品一样，这本戏也是纯正俄国的出品。但是同时它又带有广大的人道的色彩。我读了它以后，觉得克鲁泡特金的话很对。它所描写的虽是当时社会的情形，但是这种情形现在还是普遍于人间社会——尤其于中国社会——里呢!

在这一方面，这本剧本实有可以介绍的价值。

在艺术一方面，阿史特洛夫斯基的这本戏也许更可以给未来的作家一点帮助，贡献现在的演剧家一点材料。

我译了这本戏以后，曾经我的朋友许地山君的校阅，他这种

有力的帮助我是很难忘记了的。

1921，9，21，郑振铎。

（《贫非罪》1922 年 3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父与子》[1] 序言

屠格涅夫的著作没有比《父与子》一书更引起人的注意与辩论的。自这部书出后，他在欧洲的名誉，隆重了、伟大了许多；但在他的本国却十个有九个人对于这本书起反感的。就是平常很崇拜他的精美的艺术的，到这个时候，也附和而攻击他。新派攻击他，因为他们以为屠格涅夫做这本书是讥嘲他们的。旧派攻击他，因为他们以为屠格涅夫做这本书是反对旧的而赞美新的。其实屠格涅夫却于此都无容心。他只知描写当时的实况。

这部书出版的时候是一八六二年。那时正是新旧派竞争很热烈的时候。新派的虚无主义者突起于知识阶级中，日以破坏一切旧的道德，旧的信仰，旧的艺术，旧的法律等等相号召。旧派的感情主义者，美术主义者，则极力与之抗，以保存他们所信奉的因袭的东西。

屠格涅夫在这部书中，以彼得洛委慈代表旧派的父代，以巴札洛夫代表新派的子代。父子两代的冲突——思想的冲突——就以彼得洛委慈与巴札洛夫之冲突代表之。巴札洛夫是一个少年医

---

① 《父与子》俄屠格涅夫作，耿济之译，192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生，“一个不屈膝于任何崇敬的威权面前，不承受任何没有证明的理想的人。”对于当代的制度，他一切取反对态度；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习俗与小节，他更弃之若遗。他因为要回家省亲，顺道同一位朋友——他的信徒——到他（他的朋友）家里暂住。他的朋友家里有一位父亲，一位叔叔，叔叔就是泊威·彼得洛委慈，父代的代表。他与泊威常常冲突。终了，至于决斗。

这都是实在的情形。巴札洛夫这个人据说也是实有其人。勃兰特司（Brandes）说：“在一八六〇年，屠格涅夫在德国旅行，在一条铁路的车上，遇见一个少年的俄国医生。这个医生同屠格涅夫简单的谈了一会话。他的个人的奇特的意见使得屠格涅夫惊骇。他给这个诗人以巴札洛夫的观念。因为要他自己与这人个性相熟，屠格涅夫开始做‘巴札洛夫日记’，就是当他读一本新书，或遇见一个引起他兴趣或表显些政治或社会性质的特点的人，他就在这本日记上批评他，照着‘巴札洛夫式的思想’。虽然许多人骂他，说他是空想，当时的子代决不如巴札洛夫，父代也决不与泊威·彼得洛委慈一样；然而他却的的确确是写实。”俄国批评家文格洛夫（S. Vengueroff）以为这部小说与实际互相影响，实为至当之言。

在艺术上讲来，他的成绩也是极高。急进派的批评家虽然大骂他，以为从艺术方面看来，这本小说是完全不满人意的。没有一条线索，没有一个动作，把这本小说的各部联而为一的。他是教训主义的，每个书中人都不过是某种意见或趋向的表现或代表而已。因此，书中没有一个有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有生气的灵魂，只不过是种种的抽象观念，种种的运动，人格化了而呼以相当的名字而已。然而这种话却靠不住，因为这是攻击他的急进派所言的。极少数的公平的俄国人和别的地方的人都不约而同的称此作为屠格涅夫特异天才的成熟的能力的结晶。思想之明了，艺

术之宏伟，情节之简明，全部小说之平稳而贯串，戏剧力之丰腴，随处给屠格涅夫以更高的艺术的威权。正如美国批评家菲尔甫（F. Phelps）所说的："《父与子》是表现出六十年代的俄国政治家的图画，而留遗后世以一个不朽的艺术作品。"

屠格涅夫自己对于"父与子"也有一段话：

> "巴札洛夫把我小说中的其余的人都盖在影子里。他是忠实，直前而纯粹的民主主义者，而他们却不能在他身上找出好处！与泊威·彼得洛委慈决斗的事只显出这个文雅、高贵的武士的知识的空虚，实在说来，我还把他铺张扬厉，使他可笑呢。我对于巴札洛夫是要到处把彼高高的超越于泊威·彼得洛委慈之上的。然而当他自己称为虚无主义者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把他念做革命主义者。一方面描写一个贪赃的官吏；一方面描写一个理想的青年——这种的画图让别人去描写吧。我的目的比此更高些。我结束在一点：如果读者不为巴札洛夫所胜，不管他的粗暴、无心、无怜惜的暴躁与爽直，那末这个过失是我的——我失去我的目的了；但用糖汁把他弄得更甜美些（用巴札洛夫自己的话），我却不愿意做，虽然由此也许可以立刻把俄罗斯的青年拉到我这一方面来。"

由这一段话，他的意见很可以看出了。对于巴札洛夫他实在非常热心的。到了后来，他又说道："我是完全分有巴札洛夫的思想的。所有一切，只除了他对于艺术的否认。"但在实际上，他虽爱巴札洛夫，他却确不是巴札洛夫式的人。他只是一个宁静的悲观主义者。对于巴札洛夫的强烈与粗暴与能力，他只有赞扬，却不能仿效。他所以自以为是完全分有巴札洛夫思想的人，

有许多批评家说，这是因为他不能自知之故。许多文学家都是“自知则昧”的人。

在这个地方，有一句话却不可不说。这本书虽然第一次用虚无主义这个字，它的意义却与后来一八七九——一八八一年间所发生的不同。《父与子》中的虚无主义者巴札洛夫的反抗思想是从科学思想发生出来的，他因为当时俄国的道德、宗教、国家等等一切皆建筑在虚伪谬误的基础上，所以一切都要反对否认。后来的虚无党却不然。他们的人生观在路卜洵（Ropshin）的《灰色马》中很可以看出来。他们不仅否认国家、宗教等等，并且也否认科学，乃至否认人类，否认生死。世人称之为恐怖主义者，确是很对。他们杀人正如杀死兽类，在打猎的时候一样，一点也不起悲悯，一点也不动情感。与巴札洛夫殊不相同。所以读者决不可把这本书中的虚无主义者误为后来的恐怖主义的虚无党。

中国现在也正在新旧派竞争很强烈的时候，也有虚无主义发生。但中国的巴札洛夫的思想却是从玄学发端的，不是从科学发端的。他也否认一切，与巴札洛夫一样，但却比巴札洛夫更进一层。正与俄国后来的恐怖主义者一样，连人类也一切否认，连生死也一切否认，并且也主张革命，但只是玄想的革命，不若恐怖党之以流血为事。中国的泊威·彼得洛委慈更是不行。他决没有决斗的勇气，并且连辩论的思想也不存在头脑中。遇到教训欲发生的时候，就教训了子代的人一顿，但却不辩论。他的无抵抗与缄默把与反对的人冲突的事，轻轻的避免了。父子两代的思想竟无从接触。我看了这本《父与子》，我很有很深的叹息。懦弱与缄默与玄想的人呀！思想之花怎么不开放？我默默的祈祷，求他们的思想的接触，求他们的思想的灿烂的火花之终得闪照于黑云满蔽之天空！

我读了《父与子》引起无限的感伤了。

1922年3月12日

郑振铎于上海。

（原载1922年3月18日《时事新报·学灯》）

《阿那托尔》序言

《阿那托尔》是七幕可以独立的剧本联结成一部独幕的连环剧（Oneact oycle）的。以剧中主人翁阿那托尔为中心，为线索，而联结全篇为一片。第一幕是叙阿那托尔与一个女士卡鸾的事。第二幕是叙阿那托尔与一个已嫁女子葛勃丽的事。第三幕是叙阿那托尔与一个女子璧莹迦的事。其余四幕也都是如此，男主人翁总是阿那托尔，女主人翁则各各不同。

这部剧本的著者是现代奥大利戏剧作家亚述·显尼志劳(Arthur Schnilyler)。

显尼志劳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生于奥京维也纳。现尚健在。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喉科医生。他自己也是学医的，自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他就去做医生，继续做了十年之久。一方面又时时的做了许多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而剧本尤为有名。

奥大利的戏剧与德意志的戏剧虽然是用同一的文字写的，但是精神上却大有不同之处。普通人却常常把他们弄混乱了。其实一个是表现柏林的精神，一个是表现维也纳的精神。

显尼志劳便是一个特殊的维也纳派的代表。他的剧本的精神与苏特曼（Sudermaunl）及霍甫特曼（Hauptmun）是绝不相同

的。他也同许多近代的维也纳戏剧作家一样，所描写的不过是人生剧场上的一二幕戏，而就这些很少数的事实中常常简单反复地表现出来，但却决不嫌重复与厌倦；好像一个弹琴的高手，琴弦虽只有几条，而经过他的拨弹，则琴音高低抑扬，变化无穷，时如迅雷疾雨，时如清溪平流，时如深夜沉寂中，闻寡妇之哀哭，时如微风过松间，悠然清远。他的艺术的手段，可谓高绝了。我们且试拿他的几篇剧本来观察一下。在《阿那托尔》中的七幕的事实差不多都是相同，就是叙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的关系，但是他却叙得各各不同，活泼而且自然，绝不会使人生重复之感。在与《阿那托尔》相同的循环戏（Reigen）中，也是同样的表现出显尼志劳可惊的艺术来。“Reigen”共有十幕，每一幕也是叙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的关系。但不是用一个主人翁来贯串全剧的。他所用的贯串的方法，是连环的方法。第一幕叙的是一个妓女与一个兵士的关系；第二幕则叙那个兵士与一个女堂倌的关系。以后各幕，则逐次叙那个女堂倌与一个少年人的关系；那个少年人与一个年轻女人的关系；那个年轻女人与她丈夫的关系；她丈夫与一个女子的关系；那个女子与一个诗人的关系；那个诗人与一个女优的关系；那个女优与一个贵族的关系。到了第十幕则叙那个贵族与第一幕内所叙的那个妓女的关系。所叙的不过是男女关系的一条简单弦线，但是他所表现的是变换、精巧，而且有趣。

不惟在这两部剧本中，他所叙的事实是十分简单而且同样，就是所有他的剧本，也都是如此。他的题材总是一个情人与一个或两个女人。他著名的一剧名为“Liebeler”（《卖弄风情》）。Ashley Dukes 说：“在实际上，从《阿那托尔》至《美麝伯爵夫人》（□□□□□□□□□□）[①]，他们都是‘卖弄风情’呢！”在

① 此处原载刊物字迹不清。

这样简单的琴弦上能够拨弹出这许多好音来，我们确应该十分赞颂显尼志劳的才能。

显尼志劳的才能，一方面还在能创造一种空气——一种好像秋天傍晚的朦胧的微光的空气，一种非常可爱的幽秀的空气。他所造的梦想世界，其变幻离奇如一个象征主义者所描写者一样而其事实又非象征的。

在显尼志劳的作品中，悲剧也有好几篇，如“Liebeler”便是一例。在“Liebeler”中，他的主人翁是一个女子，而非男子，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做了他的妻子，一天天在他自己的梦想生活中过去。她的丈夫，却为了别个妇人之故，与人决斗而死。结果很悲惨。但在大体上，显尼志劳的著作还是以喜剧为多。

有许多道德家以显尼志劳只是描写爱情的变幻，只是描写“卖弄风情”的事迹，觉得很不合道法。我们现在介绍《阿那托尔》，恐怕也有许多人要以道德家的眼光来责备的。其实显尼志劳只是一个艺术家。他不管什么道德，他只是忠实地写出实在的现象。且他的工作也决没有丑恶的表现。他以他的秀丽的艺术的手腕，避免了一切秽浊的肉欲的描写。这确是很难得的。但他究竟是大胆无畏的。凡是能够说得出的话，他都完完全全的赤裸裸说出，决不晦匿。与其他作者所不敢道破的地方，他尤其勇敢，尤能无顾忌地道出。这就是他最不可及的地方。

所以我们介绍《阿那托尔》，一方面固是介绍奥大利的一部代表的著作，介绍显尼志劳的一部代表的著作（Dukes以为《阿那托尔》是最能清楚地传出显尼志劳的空气的作品），一方面是介绍显尼志劳的精神与艺术，把一个向未经艺术者走过的人生场地，显露给大家看。

据我们所知道的，《阿那托尔》共有两个英译本：一本是《近代丛书》（Modern Library）中的一本《阿那托尔》及其他剧

本——这是 Colbron 译的，出版于一九一七年；一本是伦敦□ □□ □ □ □ □ □ □ □ □ □ □ □ □[1] 公司出版的单行本——这是 G. Barker 意译的，专为英国剧场上用的，也是出版于一九一七年。现在郭绍虞兄所译的，是完全根据于《近代丛书》的译本转译的。

这本译文是我任校对的，中间略略有些更改。但因是在复校时才修改的原故，不免有些不精细；且也有些地方，不能够十分更动。这是应该声明的。

（此书已印好，由商务印书馆发行）

（原载 1922 年 8 月 1 日《文学旬刊》第 45 期）

① 此处原载刊物字迹不清。

人之一生[①]

——序耿济之译的安特列夫的《人之一生》

“人生有什么意义呢?”这句话是中国现代青年常常怅惘的自问着，而终于没有得到答案的。

但我们如果读了安得列夫（LeonidAndeyen）（1871—1919）的这篇《人之一生》，便可得到一个很可怕的答案——这个可怕的答案，我们虽极不愿意得到，却终于如只身徘徊于朦胧的月下所生的影子似的，息息跟随在我们的身边。

屠格涅夫（Twgeenev）在安特列夫此剧出版的三十年前，已经诏示过我们。他说，他独自在旷野里行走，一个老妪紧紧的跟在他后面；后来他察出，这个老妪不仅是跟着他，而且还指示着他，她向左向右，他也不得不听从她，他仍旧继续着行走，前面却有个黑暗的大坑，——坟墓！他急忙转回来，老妪又站在他的前面。他现在知道，这个老妪便是他的命运，不肯一刻离开他的命运。他又向另一方面走去，走了不久，前面又是一个黑暗的大坑。他便又转到旁的方向，前面也有个可惧的黑点，他想站住

① 《人之一生》，耿济之译，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走，转瞬间便坐在地下。他觉得老妪还是息息不离的站在他身旁。远处的黑点，却浮动了，向他爬来。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谁能离开了他的运命，而不受他的支配呢？谁能与运命抵抗，离开了她而走在前面没有黑暗的大坑的路上呢？谁又能逃避这可怕的黑暗的大坑，而不被其吞没去呢？他们虽立住了或坐下了不走，黑暗的大坑，却依旧浮动了向他爬来！

在这个地方，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很可怕的答案了：

"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的前途就是坟墓。"

但这种答案还不是安特列夫的答案：安特列夫的答案却较此更是可怕。他以为人的一生虽然是以坟墓为最后的归宿，而他的所走的路，却丝毫没有自主的权。谁都是同样的走一条路，谁都不能另择一条他自己愿意走的向左向右的路。即连想坐下或转向左或右的自动力也没有。运命已经规定了他所应走的路，他是不能反抗，而且不会想到反抗的。

我们试读这本《人的一生》。人生的剧场，是什么地方都是灰色的。有一个灰色的人，在那里说着人的一生。他的声音镇定而冷淡。他说："那个人的全生要在你们面前次第的经过，从黑暗的'开始'直到黑暗的'终了'——现在快要很神秘的闯破'无在'之门，哭喊着通告自己短促的一生的开始了。在'无在'的夜间，一只无知识的手点着的蜡烛快要焰起了，——这就是人的生命。"当他说时，人就很艰难的从他母亲腹里生出来，同时灰色的人手里的蜡烛燃烧起来。人的一生开始了。隔了许久，灰色的人手里的蜡烛已经烧去三分之一，人正在恋爱与贫穷中生活着。又隔了一会，人家里的幸运已达到最高峰，他们在大开着跳舞会。跟随着幸运来的是逆运。人的家财尽了，他的儿子也死了。人在诅咒着上帝，魔鬼，运命或生命。灰色的人冷淡的倾听

着诅咒，蜡烛的火焰摇曳着，仿佛为风所吹一般。人和灰色的人就这样的对立着。又隔了一会，人的妻死了，人也死了，同时，蜡烛发亮了一下，便熄灭下去。灰色的人在黑暗中说道："静着，人死了！"

人的一生就是如此。

"他生下来就具有人类的样式和名字，无论一切都和已经生在世上的人们相像。他们那种残酷的命运，要成为他的命运，他的残酷的命运，也要成为他们的命运，他受了时间抵抗不住的牵引，将要呆呆板板的经历尽一切人生的阶级，从低到高，从高到低。他为视点所限制，也终不会看见他那只软腿已经举起着要跨上去的那段阶级；为知识所限制，更不会知道未来的一小时——一分钟，将要给他送些什么来，他又因为自己的盲目的无识，受豫觉的压迫，希望和恐怕的惊扰，要很顺从的画着铁制的预定的圈儿。"

这就是安特列夫的答案，一个很可怕的答案。无论是谁，恐怕都要被这个可怕的答案，息息跟随在身边。

中国的青年们！这个答案将使你们生了什么样的感觉呢？

外面是无边的黑暗与空虚，我们且藏在任一个有美丽的画的幕里。

我想，这实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

这篇剧本的原文，出版于一九〇六年，是俄国文学上第一部象征主义的剧本。

济之的译文，不失原文的精神；我敢断定读者不会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十二，九，六。

（原载1923年9月17日《文学》第88期）

俄国文学史略

序

我们没有一部叙述世界文学，自最初叙到现代的书，也没有一部叙述英国或法国，俄国的文学，自最初叙到现代的书。我们所有的只是散见在各种杂志或报纸上的零碎记载；这些记载大概都是关于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或一个短时间的事实及评论的。这实是现在介绍世界文学的一个很大的缺憾！在日本，他们已有了许多所谓《支那文学史》，《英国文学史》，《独逸文学讲话》之类的书。在英国或美国，他们也已出了不少种的世界文学史丛书；如伦敦 F. Fisher Unwin 公司所出的《文学史丛书》（The Library of Literary History）出版的已有印度，爱尔兰，美国，波斯，苏格兰，法兰西，亚拉伯，俄罗斯等国的文学史；Edmude Gosse 所编辑的《世界文学史略丛书》（Short Historie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s）也已出版了中国，日本，亚拉伯，俄罗斯，西班牙，法兰西，意大利等十余国的文学史。其他关于希腊，罗马及波兰，犹太等国的文学史一类的书零星出版的，尚有不少。

如果要供给中国读者社会以较完备的文学知识，这一类文学史的书籍的出版，实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一年以前，曾有出版文学小丛书的计划，我们也曾想在

这个小丛书里面，把关于文学史的材料多包括些进去。后来虽曾陆续的收集了几部这一类的稿子，但因须加修改与继续工作之故，现在只能先把我的《俄国文学史略》发表。

每种文学史略，大概都附有大事年表及参考书目。我们觉得这两种东西，对于读者是很有用处的。参考书目里所举的书籍，大概以英文的著作为主。

关于这一类的文学史略的一切提议与错误的指正，我们是十二分的欢迎领受的。

郑振铎　　十二，十，三十一。

第一章　绪言

俄国的文学，和先进的英国，德国及法国及其他各国的文学比较起来，确是一个很年轻的后进；然而她的精神却是非常老成，她的内容却是非常丰实。她的全部的繁盛的历史至今仅有一世纪，而其光芒却在天空绚耀着，几欲掩蔽一切同时代的文学之星，而使之暗然无光。

半世纪以前，俄国的文学，绝未引起世人的注意；但隔了不久，她的一切文艺作品，已如东流的急湍，以排山倒海之势，被介绍到英法德及至其他先进国的文字里去了。她的崇拜者白鲁乃狄（ Ferdinand Brunetiere）曾说，有一个时期，如果看见一个法国人手里拿了一本常常遇见的黄色封面的书，便可以很确实的决定这是一本俄国一个大小说家所著的小说。在英美二国，其盛况虽没有到这样地步，而托尔斯泰，高尔基，柴霍甫诸人的著作，也到处都有人崇拜。在日本，则“俄国文学热”到现在还没有退。在最近的中国，她的作品之引人注意，也比任何国的文学都甚些。

俄国文学所以有这种急骤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事。她的真挚的与人道的精神，使她垦发了许多永未经前人蹈到过的文学园

地，这便是她博人同情的最大原因。

在下面，先把俄国的地势，人种，言语及历史的大略说一下，然后再进一步而叙述她的文学的发达史。

地　　势

我们一看欧洲的地图，便可以完全明白俄国的地势。她占有欧洲东部的一块大平原；东至乌拉山，南至高加索，全境几全为低耗或平原。她的北方是泽地，泽地以南是大森林，再南是一块极大的农业的平原，最南是草原。她近海的地方极少，但国内河流极多，伏尔加（Volga）河是欧洲最长的一条河。她的城市，在文学及历史最著名的有基辅（Kiev），诺夫格洛（Novgorod），莫斯科（Moscow）及彼特格拉（Petrogrd）等地。她的人民，以农夫占最大多数。

人　　种

俄国的人种原是斯拉夫（Slav）族，后来又与斯坎德那维亚人（Scandinavians）及芥兰族（Finnish）混合。因为俄国的地位在欧洲东部，正当欧洲与亚洲之卫，所以她同时受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的很强烈影响。十三世纪时，鞑靼族以疾风骤雨之势侵入俄国，占领她的最肥沃的土地至数世纪之久。自然，这个事实，对于俄国的习俗与文字，不免留有多少影响；但在民族性上，其影响却极少。到今日俄国人还纯粹是斯拉夫人，保持一切斯拉夫民族的特性。

俄国人因受特殊的气候，土地的状况，以及数千百年的生活状况的支配其性情自有一种特别的所在。俄国人之服从与忠实，

是久著称于世的。他们的思想敏锐而有急智，极喜欢辩难讨论。他们的天性是宗教的，而且大部分是相信定命论的。他们很会忍耐，能受长期的痛苦而不为屈。他们同情心极盛，爱同类，且爱一切生物。他们又是很坦白，很坚定的。不过他们也有许多坏处；他们很富惰性，易趋于极端，沉思于空想而不易见于实行，且缺乏独立的气概。龚察洛夫所描写的阿薄罗莫夫（Oblomov）与屠格涅夫所描写的路丁（Rudin）便是大多数俄人的代表。在其他各作家的文字里，俄国人也极真切的被表现出来，我们读她的文学，便可以明了她的灵魂了。

语　言

斯拉夫族在最初的时候是同说一种方言的。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比亚人及巴尔干人的语言，在根本上都是同样的。后来因为外国语的加入与文法组织的完密，他们的言语便渐渐变异起来。单讲俄国语已有三种大别：一，小俄语，说此语者约有三百万人，都在南部及西南部乌克兰一带。二，白俄语，说此语者约有八百万人，都在西北部一带。三，大俄语，此为俄国最通行的正统语言，一切文字及文学上所用的，大概皆为此种语言；说此语者共有八千万人。不过这几种语言的根源都还是相同的。其相异的程度正如西班牙文之与葡萄牙文，或挪威，丹麦文之与瑞典文。

斯拉夫各民族，都各有他们的文学，便是小俄与白俄也自有他们的文学与民歌。我们现在所讲的则限于用大俄文写的一切文学，不涉及小俄及白俄。因为俄国的重要文学作品差不多都是用大俄文写的。

俄国的文字是发表一切思想与情感的最好利器。屠格涅夫在

他病榻所说的最后的话之一，便是劝俄国作家，努力保存他们的“宝贵的遗产——俄 国文字”的纯洁。罗门诺沙夫（Lomonosov）则以为俄国的文字极为伟大，“其活泼如法文，其刚健如德文，其秀逸如意文，其丰富雄壮如希腊拉丁文。”作《俄国文学的理想与实质》一书的克格巴特金（Kropotkin）也极力称许俄国文字，他以为用俄国文字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最能保有原文的特点。

在别一方面，俄国文字是极通俗的，普希金，歌郭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诸人的文学作品几乎为最大多数的人民所领悟。俄文的名著，都是几千百万部的流传在乡村之间。当一八八七年《普希金全集》十大册出版时，其销数在十万以上，其零册的诗集及小说集的销数尚不算在内。其他如歌郭里，屠格涅夫，龚察洛夫等的十二册的全集也从书贩的手里，流传到极僻远之乡地，每年各销至二十万部以上 。从这个例子里，用以看出俄文的通俗程度，同时，并可看出俄国人民是怎样的嗜好文学。

第二章　启源

民间传说与史诗

俄国文学在启源时代的最初，也同别的许多国一样，包含有不少的口头传述的民众作品。这种作品，一代一代传下来，最后才写在纸上，搜集起来付印。他们的种类很多，有的是歌谣，有的是英雄故事，有的是史诗；他们的来源也很久，有一部分的诗歌与民间的故事，在阿利安时代便已传述歌唱着。还有一部分是从蒙古与土耳其及其他东方诸国传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名为《依鄂太子远征记》的史诗。这个史诗的产生约在十二世纪末或十三世纪初。它的结构融成一片，内容充满着诗的美感，显然是出于一个作家之手。它所叙的是发生于一一八五年的实事。基辅的太子依鄂（Igor）带了兵去征伐占据俄国东南部的波洛夫溪（Polovtsi）族。他在路上，遇到种种的恶兆，太阳黑暗了，把影子照在俄国的军队上面，许多的动物也给他各种的警告。但是依鄂不顾，他叫道："兄弟们与朋友们！我们与其做波洛夫溪的囚徒毋宁死！"于是他们与波洛夫溪族接触，大战了一次。战时，

一切自然界如鹰与狼与狐等等都参与在场中，结果，则俄军大败，依鄂被敌人擒去。后来，他又从敌人那里脱逃回去，一路上溪流发言，山鸟示涂，得到自然界的帮助不少。

像这一类的史诗，在那些诗歌流传的还有不少，惜能够传到现在的，只剩有这一篇了。

史　记

史诗以外，俄国的史记，也是很可宝贵的古代文学。如基辅，如诺夫格洛（Novgorod），如柏加夫（Pskov）及其他各地，在十至十二世纪时都有他的很好的史记。这些史记不仅仅是记载干枯无味的史事：叙述的里面还带有不少的理想的与诗的美；尤其是《基辅史记》（Nestor’s Annals）至今还是一部很好的名作。诺夫格洛的史记稍感干枯，但当叙述战事的地方，作者笔端也蕴有很丰富的热情。柏加夫的史记，则满含有民治的精神与活泼的描写。作这些史记的人，实都是很好的历史家，很受希腊的范式的感化的。

黑暗时代

一二二三年蒙古族的西侵，把俄国的少年文化完全破坏了。那时，繁盛 的为知识中心的都市，如基辅之属，都已荒芜不堪，被逐出于俄国史书以外者至二世纪之久。继蒙古族之后，又有土耳其族侵入俄国南部巴尔干半岛。一切俄国人的生活，都起了很深沉的变化。

教会的权力，渐渐的涨大起来，莫斯科渐渐代替基辅诸地，成了宗教与文化的中心。帝王的权力，奴隶的制度都起于此时。

一切地方的独立精神完全崩坏。教会的影响极大，教士们宣言莫斯科为君士坦丁堡之后，继为“第三罗马”。他们为保持势力之故，极力阻止腊丁教会的权力，以及西欧文化的传入。

这种情形，与俄国以后的人民生活及文学的发展有极深的影响。蒙古族的压制，虽不久即移去，而继其后的帝王与教会之专横，却也不下于异族。自此俄国的社会便罩上了一层灰色的惨云，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之时，才被扫荡开去。

青年的活泼的史诗精神，已不复见。忧愁悲惨的情调遂成为此后俄国文学及民间传说的特质了。

改革的曙光

第一本俄文的《圣经》于一五八〇年时在波兰出版。几年以后，莫斯科便也有了一个印刷局。

这时，基辅已由长久的沉睡里，复苏生而为文艺的中心，并设立了一个大学。后来，莫斯科因为修订圣书之故，大招致基辅的文人，基辅的文化，又移于莫斯科。当时最著名的文人有波洛慈基（Simon Polotsky）。他作宗教剧与宗教史，又作好些诗歌。批评家称之为俄国第一诗人。他的《浪子》也是俄国的第一剧本。

自此至十七世纪末，都无大作家产生。直到彼得第一大改革时，俄国文学才渐渐的有生气起来。

在彼得改革以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作家产生；一个是高托欣（Kotoshikhin，1630—1667），他是一个历史家，从莫斯科跑到瑞典，做了一部俄国史，痛 言俄国有改革的必要。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直到十九世纪他的书才被人发现。一个是克利森（Kryzhanitch），他是南俄人，一六五九年被招至莫斯科修订《圣

经》，做了一部很重要的书，指陈俄国有彻底改造的必要。二年后，他被流放到西比利亚，后来死在那里。

彼得的努力，则与他们不同，在实行而不在批评。彼得承认文学的重要；他觉得那时俄国所写的文字与人民所用的口语已大有不同，于是他便创造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字母，使言文合而为一。这种字母便是现在所用的。但是他对于文学，完全以实用的眼光看待它，所以当他的时代，真正的文学运动还不能发生。

罗门诺索夫

在实际上，为俄国文学的彼得第一，给后来以极大的影响者，则为罗门诺索夫（Lomonosov，1711—1755）。罗门诺索夫生于白海边一个小村里，他的家庭以渔为生。他离了家庭，步行到莫斯科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后来又步行到基辅。当时，圣彼得堡科学院要莫斯科神学院选出十二个生徒，资送到外国去留学。罗门诺索夫被选为十二人中的一个。他到德国学自然科学。一七四一年回国，被任为科学院的院员。依利沙白女皇时，他极力主张莫斯科大学有成立的必要。此大学遂于一七五五年落成。后来因为政治的关系，被加德邻二世（Catherine Ⅱ）所嫉视。

普希金（Pushkin）说：“罗门诺索夫他自己是一个大学校。”这句话是实在的。罗门诺索夫除了是诗人以外，还是一位很好的哲学家，化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经济学家以及算学家等等；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功绩尤为伟大。他扫去一切外国文字的糟粕，发挥俄国文字的本色。他改订国语，以莫斯科方言为文言的标准，并作“俄国文法”以示其准的。

与罗门诺索夫同时代的作家，还有几个要举出来的。甘底麦（Kantemir，1709—1744）是俄国的贵族，曾做过驻英的大使；

他的讽刺诗很著名。脱里狄加夫斯基（Tretiakovsky，1703—1769）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从家庭里逃出来，步行到各处游学。他对于诗韵的订正，极有功绩。泰狄契夫（Tatischev，1686—1750）是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家；他第一次发见古代史记的价值。修麦洛加夫（Sumarokov，1717—1777）以善作戏曲及讽刺诗著名，批评家称之为俄国的蓝森（Racine）。

加德邻二世

加德邻二世的时代（1762—1796）是俄国文学由黑土中长出绿芽的时代；打破了以前的沉闷空气，引进法国文艺的曙光。虽然当时作家摹仿法国伪拟古主义（Pseudoclassical）太过而一部分已开始从俄国的实际生活里挹取文艺的材料了，加德邻自己，与法国的哲学家极接近。福禄特尔及卢骚的学说，流传于多数人的口中。她自己也作了喜剧数种，并创刊一种月报。当时的文坛，颇极兴盛之概。文学院也成立起来，派台科瓦公主（Vorontsova Dashkova，1743—1819）做院长。台科瓦公主极热心的帮助这个文学院，助他们编成了一部俄国字典。当时著名的作家极多。白格达诺契（Bogdanovitch，1743—1803）的寓意诗，轻妙幽秀，方委真（Fonwijin，1745—1792）的戏曲真挚感人。他的《旅团长》、《未成年者》二剧，树纯俄国式的喜剧的标本。诗人梅加夫（Maikov）以写国民性格见长，引文学与日常生活接近。第一哲学家诺威加夫（Novikov，1742—1818）的作品，富有平等博爱的精神，陶泽文与拉特契夫尤为诸文人中的杰出者。陶泽文（Derzhavin，1743—1816）是伪拟古主义的最大的作家。他的著作，虽中伪拟古主义的毒，而诗的真美，仍不时流露。他的《神》一诗，批评家誉之为“前无古人”。拉特契夫（Radischev，

1749—1802）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牺牲者。早年被派到德国去留学。一七九四年，他回到俄国，出版了一部《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在这部书里，他叙述他的感想，民间生活，与道德及哲学上的各种讨论，尤其注重的是奴制的残忍，法庭的不法与政府的恶劣。加德邻二世此时，震于法国的大革命，已觉到自由思想的危险，遂力反以前的放任主张，立刻命将这部书毁板，并把拉特契夫流逐到西比利亚的最东部。一八〇一年，拉特契夫被赦回国；但他见俄国政治无改革的希望，赦回后即自杀而死。

十九世纪的初年

十九世纪是俄国文学史上的最绚烂的时期。这种文学的光明乃是以前的数百年所蕴蓄而未能照射出来的。为十九世纪新文学开端最大的作家，是普希金（Pushkin）。在普希金以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作家必须举出，这二人便是历史家卡伦辛（ Karamzin）及诗人助加夫斯基（Zhukovsky）。

卡伦辛（Karamzin，1766—1826）的《俄国史》，于当时及后来的影响都极大。这部书共有八大册，出版后二十五日，初版三千部即已售尽。但他不仅是大历史家，且是一个很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国外通信》（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 Abroad）的势力，几乎较他的史书为尤大。他在这部书里，想把欧洲的思想，哲学与政治生活的情形传布于民众。卡伦辛的小说，都是感伤的浪漫主义（Sentimental romanticism）的作品。这种作品正是当时所需要的，因为这是伪拟古派的有力的反动。在卡伦辛的许多小说里，最感动人的是《可怜的丽莎》（Poor Liza，1792）一书。他叙一个不幸的农家女郎，受一贵族的诱惑，后此贵族又

弃之不顾。女郎遂悲愤自沉于池。这部书的描写，并不甚真实，女郎所说的话极文雅，不像一农女。但当这书出版时，竟引起时人的狂热。书中所指的女郎自沉之池，竟有许多富于感情的莫斯科少年跑到那里去凭吊她。对于弱者与农人的同情，为后来俄国文艺的重要特质之一，而在卡伦辛之时已见其端了。

助加夫斯基（Zhukovsky，1783—1852）是一个纯正的浪漫派诗人。他自己的作品不多。他的大功绩乃在引进英德及其他各地的诗歌到俄国的文坛，打破以前的寡陋的法国崇拜的风尚。他译了席劳（Schiller），乌兰（Uhland），亨特（Herder），摆伦（Byron），慕尔（Thomas Moore）及其他诗人的作品，又译荷马的《亚特赛》（Odyssey），印度的诗歌，及西方斯拉夫的民歌。他的译文极美丽，但不是直译的，译文里渗透了不少的助加夫斯基的分子进去。他自己的诗也很好，但他只向好处写去，缺乏反抗的自由精神。最富于这种反抗精神的是“十二月党”的诗人李列夫（Ryleev）。

十二月党

十二月党的举事（The Decembrists）是十九世纪初俄国的一件于政治与文学都很有影响事。拿破仑战争时，俄国有许多官吏军人逃到西欧去。他们饱吸着西欧的自由空气；等到回国时看见本国政治的黑暗，与当局者的压制，便忍不住要起一种改革的运动。这个运动，酝酿得很久，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亚历山大一世死时，他们便在圣彼得堡里竖了革命的旗帜；但因平民附和者极少，这种运动立刻被军队压平。一百多个最优秀的青年，被流逐到西比利亚，还有五个人被判决死刑。诗人李列夫便是这五人中之人。李列夫（Ryleev，1795—1826）比普希金大几岁，他曾到

法国去过两次。他虽然不欲以 诗人自命，但他的诗歌，却有远大的成就的希望。他的夭亡，实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损失。到现在我们读他的诗，还深深的感到他的爱自由与反抗压迫的精神。

第三章 普希金与李门托夫

普 希 金

自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出来以后，俄国才有引起世界注意的伟大诗人。

普希金的诗才极高，格律极美备，叙述极自然。他是俄国的第一个国民文学家：用纯粹的本国的文字，美丽的写下许多伟大的名著。他的家庭是莫斯科的一家贵族。他的父亲是当时贵族的一个模式，喜欢法国的文学，喜欢闲琐的谈话。他买了许多文学书放在家里。但普希金受他的影响并不深。普希金少时最好的伴侣乃是他的祖母与一位老乳母，他从她们那里，开始学习俄文，又从乳母那里得到许多民间传说，为他的诗文的资料。他后来到圣彼得堡入学。在他毕业以前，他已有很惊人的诗名。陶泽文与助加夫斯基都极口的赞许他。助加夫斯基送普希金一个相片，上面写道："给一个学生，从他失败的先生。"他同一班从事于政治运动的十二月党，都是很好的朋友。他深受他们的影响，写了一篇《自由歌》，又写了许多含有革命思想及讽刺当局的诗歌。因

此，在一八二〇年，当他仅有二十岁的时候，便被政府放逐到一个乡僻的小镇去。不久，又允许他到克里米与高加索去旅行，在这个旅行里，他写了不少极优美的抒情诗。一八二四年，政府命令他到中俄去。当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起事时，普希金还在那个地方，所以没有加入。不然他也要同一班青年并被逐到西比利亚去了。不久尼古拉第一允许他回圣彼得堡，并命他供职于宫廷。他同一个妇人结了婚。一八三七年，他因为妻子的缘故，和俄皇很信任的一个法国人决斗，被杀，年三十七。

普希金的著作极多。他很受摆伦（Pyron）的影响，但他的艺术似乎较摆伦更为精进。他最初的著作，《路丝兰与陆美娣》(Ruslan and Ludmila)，本是一篇民间流传的神话，他把它放进他的美丽的诗里去。当此长诗出现时，影响于俄国文坛极大。伪拟古主义从此永被驱出文坛之外，每个人想读这首诗，每个人都能把这首诗的词句记在心头。这首诗的故事，是普希金从他的老乳母的口里听来的。陆美娣和路丝兰行结婚礼后，天忽变黑，雷雨交作。雨后，陆美娣忽不见。不幸的丈夫遂同三个别的少年同去救她。经过许多危险，路丝兰才把陆美娣救出来！情节与一切流行的神话差不多，而此诗之所以能这样动人，其原因完全在普希金 诗才的超绝与词句的警奇艳美。

普希金还做了许多剧本，以历史剧“Boris Godunov”为最著。但最重要的要算是他的用韵文写的长小说《亚尼征》(Evgheniy Onyeghin)。在这部小说里，他的天才几乎表露无遗。亚尼征是书中的主人翁。他受过高等教育。有一个夏天，他住在别墅里，与邻居的一个少年诗人成了极亲切的朋友。他们又认识了一家邻居。这邻居有一个母亲，两个女儿。她们的名字是泰台娜（Tatiana ）和亚尔格（Olga)，姊妹二人情性全不相同。亚尔格没有什么思想，泰台娜则聪明而有天才。少年诗人恋爱亚尔

格，他们快要结婚了。泰台娜则恋爱亚尼征，她写了许多极恳挚的信，坦白的告诉他她的恋情。但他不大理会她，却与亚尔格有了恋爱。因此，亚尼征与少年诗人决斗。他把少年诗人杀了，被迫离开这个地方。泰台娜对于亚尼征还很真挚的爱着。后来她到了莫斯科和一个老将军结了婚。他们到圣彼得堡去；她时出现于宫廷宴会上。有一次，亚尼征遇见了她，不知她就是以前的泰台娜；他这时却恋爱着她，写了许多信去。但她不复他的信。有一次，他到她家里，正遇着她在读他的信，眼里充满着泪。他向她热烈的求爱，但被她拒绝了。她拒绝他的话，是全书最美丽最动人的一段；曾有无数的俄国妇人，把这一段诗，读着诵着，为之流涕叹息!

普希金晚年时，又从事于散文的的著作。历史小说《甲必丹之女》（The Captain’s Daughter）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还有许多短篇作品也都很有影响。他在巴尔扎克（Balzac）之前，把写实派的精神，引进到俄国文坛里。克洛巴特金（Kropotkin）说，李门托夫，赫尔岑（Herzen），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的小说，所受的普希金的影响似乎较歌郭里更直接些。

李门托夫

李门托夫（Lermontov，1814—1841）全部分的文学生活仅有八年，但他的成功，却并不下于普希金。他的母亲是一个爱好诗歌的人；惜当他三岁时，她便死了。他在外祖母手下抚养成人。十四岁时即提笔为诗，初用法文写，后用俄文写。在外国诗人里，他最喜摆伦与雪莱（Shelly）。十六岁，进莫斯科大学。后因与教员冲突出校，改入圣彼得堡的陆军学校。十八岁，被任为骑兵官。二十二岁，因作诗吊普希金之死，忽得大名。在那首挽

诗里，他表现出伟大的爱与自由的精神。数日之内，圣彼得堡及全国的读书的人都能默诵得它；手钞的稿本数千册在流传着。但政府因他有攻击当局的话，立刻便把他放逐到高加索去。他极喜欢高加索。一切高加索的自然的美，都在他诗里反映着。他是一个恶压迫，反抗现代道德的人。在他的著名的作品《魔鬼》（The Demon）与《密希里》（Mtsyri）里，这个反抗的精神表现得最真切。《魔鬼》是描写一个魔鬼，从天堂里放逐出来，恋爱一个佐治亚（Georgia）的女子。她避到尼庵里去，死在那里。《密希里》是描写一个求自由的孩子的事。一个孩子，名密希里，早年从家里被带到一个小修道院里。牧师们以为他的尘念俗情已经净除。但实则他仍时时梦想到他旧时的家乡，梦想到环着他的摇篮向他唱歌的姊妹们，梦想到把他的灼热的胸部躺在亲人的身上。有一夜，风雨大作，牧师们正在祈祷着，他却乘机逃出修道院，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他在他的一生里，只有这几刻享到自由之乐。但他不能走出这个大森林。几天后，有人发现他在离院不远的地方躺着，因同一只豹争斗，受了重伤。临死时，他向牧师道："你问我自由时做了什么么？——我是生活着，老人！"李门托夫的魔鬼主义或悲欢主义，并不是失望的悲观。他的悲观正如一个刚强的人看见环绕着他的都是些懦弱卑鄙的人而觉得很懊恼一样。他还有一部散文的小说，名《当代英雄》（The Hero of Our Own Time）。这部小说很重要。书中的事实是如此：柏雀林（Petchorin）是绝顶聪明而且很勇敢的少年，他看各种事都不大重要。他恋爱一个女子，带了她到自己住的地方。他常去打猎。有一次，这个女子的同乡因爱她，想带了她逃走。他看见没有脱逃的可能，便把她杀了。柏雀林对于这事，却淡然置之。几年以后，柏雀林在一个高加索的村镇里，遇见了梅丽公主和她的少年。柏雀林并不喜欢梅丽，但因梅丽不喜那个少年，便千方百计

的使梅丽恋他。到了成功之后，他对于梅丽又失了一切兴趣了。他给那个少年一个当上，少年和他决斗，他便被杀死了。这就是当代的英雄！许多人以为他描写的人似有所指，但他说柏雀林不过是那浪漫主义时代一部分人的代表。是“那时代的众恶的影像”。他的这种描写法，实是后来诸作家所最流行的。他很爱俄国，但他并不像普希金的鼓吹爱国，他不爱政府，不爱俄国的兵力，他所爱的是俄国的乡村生活，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平原。他反对战争。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是他比普希金更伟大的地方。他死时只有二十七岁；同普希金一样，也是死于决斗。有些批评家说，他如果不夭死，他的成就必定更要伟大！

几个小诗人

与普希金，李门托夫同时代的诗人很多，但大概都是受普希金的影响而起。他们虽不能算为世界的作家，但在俄国的文学史上却很有关系。高洛夫（Kozlov，1779—1840）的诗，表现出他自己的悲惨生活。他四十岁时，双足不能走，不久，又失明。他的诗都是他女儿替他默写的。台尔威（Delwig，1798—1831）是普希金的挚友。他的抒情诗至今尚有诵者。白勒丁斯基（Baratynsky，1800—1844）也是普希金的朋友；他的诗充满着爱自然的热情，和谐的音调与人生的疑问。耶志加夫（Yazykov，1803—1846）也是普希金的挚友，普希金很称许他的诗。范尼委丁诺夫（Venevitinov，1805—1827）死的时候虽早，但他很有成大诗人的希望。他的诗美丽而多哲理。亚度委斯基（Prince A. Odoevsky，1803—1839）和波里享夫（Polezhayev，1806—1838）也都是很年轻的时候便死了。亚度委斯基是十二月党的朋友，他被逐放于西比利亚。十二年后，又被移到高加索，在那里，和李

门托夫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的诗虽未成熟，却是真的诗。波里亨夫的运命更是悲惨。当他二十岁时，做了一首自叙诗，因此被政府送去当兵役，而兵役的期限是二十五年。他悲愤无聊，不久即死。他的诗，都是反抗专制的呼号，而以血和泪写出的，惜他的许多好诗都被政府湮没了。薛夫卿加（Shevtchenko，1414—1861）是小俄的诗人，也因为做诗的原故，被政府罚兵役。他的诗都是用小俄文写，诗极优美，而文句与内容又极通俗。此外还有好些小说家，因俱不甚重要，所以这里不写出。

克鲁洛夫

克鲁洛夫（Krylov，1768—1844）也是和普希金他们同时代的一个诗人。但他的伟大却远出于追步普希金的诸诗人以上。他是并不受普希金派的影响的。在一八〇七年以前，他做了好些喜剧，但俱系摹仿法国的。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的所长，专力去做寓言。他的寓言有一部分是从依索和法国的勒封登（Lafontaine）的寓言译出来的，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做的。到现在，他的寓言差不多没有一国的儿童没有读过。他的文体简单而美丽，所含的哲理极深沉，却表现得极活泼，极自然，极有趣。他的作品虽不很多，但已在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上占一个很稳固的地位。

第四章　歌郭里

歌郭里的早年

俄国文学的新时代，与歌郭里（N. Gogol，1809—1852）的出现而同时开始。批评家称十九世纪后半的文学为“歌郭里时代”。歌郭里是小俄罗斯人。他的家庭是乌克兰的贵族。他的父亲很有文学天才，曾用小俄文做过好几篇喜剧，可惜死得很早。因此歌郭里幼年便离开家乡。十九岁，他在圣彼得堡；他这时的希望在成一个演剧家。但大剧场的主任不肯收受他，经了几时的穷困生活，他到一个部里去办事，这种事情与他天性也不合宜；他不久便弃去；专努力于文学，当时的各种杂志上都有他的文字。一八二九年时，他出版了两部描写小俄乡村生活的小说集，一集名《狄甘加农场之夜》（Night on a Farm near Dikanka），一名《美格洛特》（Mirgorod）。这两部小说集的出现，使他立刻在当时文坛上得到很稳固的地位。助加夫斯基与普希金都赞 许他的天才，张开两臂欢迎他。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有几篇是很重要的。《伊凡·伊凡诺威契和伊凡·尼吉复纳契的争端》（How Ivan

Ivanovitch quarrelled With Ivan Nikiforytch）是一篇很滑稽的故事。伊凡诺威契是一个性子很和平的人，尼吉复纳契是一个性子很粗暴的人。他们是邻居；有一次，因细故失和，竟结了不解的仇。他们的朋友想了许多法子都不能使他们复和。歌郭里描述他们的性格与争论，很能令人发笑。《塔拉史·蒲巴》（Taras Bulba）是一篇小俄的历史小说，叙十五世纪的一件事。哥萨克人是勇敢而爱自由。他们与波兰开战。老英雄塔拉史有两个儿子。他的少子因恋爱一个波兰贵族，竟投入敌军。后来他被哥萨克人所俘。他的父亲塔拉史亲自把他杀了。不久，塔拉史的长子，被波兰人俘去，死于华沙。老人又召集兵士，攻入波兰，结果也死在敌人手里。歌郭里描写哥萨克人的刚强性格极为动人，叙事也极活泼而真切。但浪漫主义的气息，还未全除。塔拉史的少子，完全不是一个世上所有的人，波兰的贵妇，也描写得不真实。然除了这几个缺点外；其余的叙述却都是极写实的。《狂人日记》描写狂人心理极为细腻动人，开辟后来心理分析的小说的先路。《外套》（The Cloak）一篇，影响于后来尤大。屠格涅夫常说：“我们都是从外套传下来的。”这是很确实的话。他的描写虽是带着笑容，却是含着不可见的泪珠的惨笑。他叙一个穷苦的小官吏，外套破了也没有钱去买新的。后来储积了许久，才得另做一件新外套。他很高兴的第一天穿了赴 宴会。不料回来时竟被强盗剥了去。他去报告一个警务的长官，又被他威吓了一顿。这个小官员又急又怕，不上几天便死了。同时在他被盗的地方，出现了这个小官员的鬼魂，专夺过往者的外套，直到那个警务长官经过这个地方，也被他剥去了外套，这个鬼魂才不再出现。这种对于弱者的同情与复仇的主张，都是后来许多作家所具有的特质。克洛巴特金说，“从歌郭里以后，每个小说作家都可以说是在重写着《外套》。”

巡 按

歌郭里的散文喜剧《巡按使》(The Inspector General) 也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他把当时官场的黑暗描写得十分真切。这篇的故事是普希金告诉他的。有一个少年因赌把钱用完，住在一个小县城里不能动身。县官接得京城友人一信，说有巡按使要到他那里去。他和城里的绅士，疑心那个少年就是巡按使，招待他非常周到，送了他许多钱。到他走后，真的巡按使才来。歌郭里的叙述非常滑稽，几乎没有一个人读了或看了这出戏不发笑的。但滑稽中却含着隐痛；使读者于笑时即起了厌弃那些黑暗的心。这篇戏曲，讥嘲官吏太甚，检查官自然不准他开演。后来因俄皇偶然的得到他的稿本，读了大笑，才得到在舞台上出演的特许。歌郭里除了这篇著名的喜剧外，还著了些剧本。《结婚》也是一篇喜剧，描写一个老鳏夫在结婚前的踌躇与恐怖。《佛拉地米勋章》(The Uladimis Oross) 则是继《巡按使》之后而描写圣彼得堡官场的一篇喜剧。但因《巡按使》出演时，批评家讥责的话极多，所以他始终没有兴趣把这篇同性质的剧本写完。

去 国

一八三六年，他离开俄国到西欧去旅行；去国的原因也是因为受批评家对于《巡按使》的讥弹及对于俄国的厌倦。最初到巴黎。第二年，到罗马；他很爱这个地方，便决定久居于此。

死　　灵

从这时候到他回国前的最重要著作是《死灵》(Dead Souls)。《死灵》是一部长篇小说，他在俄国时已动手写了一部分。据歌郭里自己说，普希金当歌郭里读他的著作给他听时，往往会发笑；但当他把《死灵》的第一章写好后，读给他听时，普希金脸色却渐渐的罩上了一层阴云。等他读完。普希金不禁叫道："唉！俄国是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国家呀！"

《死灵》的故事，也是普希金告诉他的。在那个时候，俄国的农奴制度正十分流行；一个地主，至少总有一二百个奴隶，这些奴隶，他们称之为"灵魂"(Soul)，他们的身体，可以如货物一样的互相买卖。国家每十年调查田主的农奴数目一次，凡在这十年内死亡的农奴，田主应付一个奴税给政府。一个穷苦的少年契契加夫(Tchitchikov)，知道了这个情形，便想出一个极聪明的方法来。他带了少数的金钱，到各地方去收买已死的"灵魂"。田主因为把"死灵"卖掉可以免付赋税，所以多欢迎他。他这样的买了二三百农奴，便又去买一区贱价的地。他把这些凭证押在银行里，于是便可以得到很多的钱了。歌郭里叙述契契加夫旅行的情形非常活泼生动。他所遇见的人，无论什么样的品格与情性都有，而歌郭里都能很逼真的把他们表现出来。当《死灵》出版时，读者都起了极大的感动。

晚　　年

一八四〇年，歌郭里在罗马患了两次大病，同时经济方面又十分困难；他的思想便改变了许多；早年时所蕴蓄的神秘的宗教

的思想，现在占领了他心灵的全部。他深悔从前的工作，觉得从前的作品都是很卑鄙的。因此，他把许多手写的稿件都投在火炉里烧了。《死灵》第二部分也遭了这个厄运。所以到现在《死灵》的第二部是未完工之作。他这时的思想都集中在《通信集》（Correspondence with Friends）一书上。他以为这部书是很重要的。当一八四七年这个《通信集》出版时，结果却大反他的期望。当时的批评家，因为他的守旧的言论，纷纷的责难他。白林斯基（Berlinsky）且写了一封激烈的信给他。

他在一八四八年回国，常住在莫斯科；一八五二年二月死在这个地方。他晚年的言论，虽被许多人所不满，但他的伟大的成绩，却如日中天，没有一个人不赞叹崇拜他！

第五章　屠格涅夫与龚察洛夫

屠格涅夫

普希金，李门托夫及歌郭里诸人的努力，使俄国文学呈空前的光华，但在当时，西欧诸国，尚未知道他们，英德诸国的文人，对于俄国文学都十分忽视。到了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出来后，西欧与俄国文学间的隔膜，才开始除去。

屠格涅夫（1818—1883）的家庭是贵族人家。他的家庭教师都是外国人。他对于俄国文学的兴趣，是由家里的一个老仆人那里得来的。一八三四年，他进了莫斯科大学。第二年（1835）又转学到圣彼得堡大学。后来，又到德国去了一次。他最喜欢读歌德（Goethe）的东西；有人说，他能够默诵“Faust”第一篇的全部。一八五二年，他做了篇哀悼歌郭里的文字，竟因此受祸，几被凶暴的政府遣戍到西比利亚去；因为朋友的救助，政府把他禁锢于他自己的家里。二年后复得自由。但他这时已厌弃了祖国。此后的生活，大概都在西欧各都会里过的。巴黎尤其是他最常住的地方。他在这些地方，有了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俄国文学

因他的宣传与介绍才第一次，被引到西欧各国去，这是他一件很大的功绩。但同时他自己因为久在国外的缘故，许多作品却被批评家视为不大明白俄国的当代生活。一八八三年，屠格涅夫死于巴黎，年六十五；他的遗骸移葬于圣彼得堡。

讲起屠格涅夫的小说，其艺术的结构与文词的精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实无一能够得到他的，便是托尔斯泰与杜思退益夫斯基（Dostoyesky）也远不如他。他的作品，不仅包含诗的美，而且具有很充实的智的内容。自从他在一八四五年初次做小说起，他在文学界里的活动时候，有三十年以上之久。在这三十年里，俄国的社会与青年的思想变动得最为急骤；而这种急骤变动的痕迹，都一一反映在屠格涅夫的作品里，如照在镜中之影，如留在海岸沙上的潮痕。

屠格涅夫最初出版的作品是一部叙写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这是反映着当时农奴的悲惨生活的。因为要避免出版检查官的注意，这个小说集便取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名字《猎人日记》。在这个小说集里，屠格涅夫并不大声疾呼的鼓吹奴制的废除，也不把农民叙写得如何好；只是活活泼泼的写出朴质的可爱的压在奴制底下的农人的情景，以及浮薄卑鄙的田主的生活，使人自会看出奴制的毒害。此书一出版，影响即遍于全国。俄国奴制之终得废除，此书的力量极大。

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五年之间，屠格涅夫又写了不少的短小说；都能表现出他的天才。

他的《初恋》与《春潮》是他表现他自己的两部小说。屠格涅夫的重要的作品都是客观的，精刻的描写人性与思想潮流的，惟这两本书是自叙的文字。他们都充满着诗意，描写恋爱的情境也极动人。

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他自己以为最重要而应该联续的读下

的，是下面的六种：一，《路丁》（Dmitri Rudin），二，《贵族之家》，［或名《丽萨》（Liza）］。三，《前夜》（On the Eve ）（或名《海仑》），四，《父与子》，五，《烟》（Smoke），六，《荒土》（Virgin Soil）。我们读了这六部小说，一方面可以看出屠格涅夫诗的才能的全部，同时并可观察出俄国自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七六年间的知识阶级生活的各方面。

《路丁》（1855 年出版）是表现俄国十九世纪中叶能说而不能行的青年的范式。屠格涅夫并不谴责他们，仅把他们的好处与坏处并列在一处，而以宽厚的态度对待之。此书中的主人翁是四十年代的一个青年路丁。路丁沉浸于黑智儿（Hegel）的哲学思想中。当时政治极为黑暗，有思想的人不用想去做事。路丁的初次出现，是在一个爱自由的贵族夫人家里。他在客室里，众宾客之中，高谈阔论，不多一会，便成了谈话的中心，以他的辞令，以他的见解，博得女主人的赞美与青年时代的人的同情。青年时代的人可以女主人的女儿娜太莎（Natasha）及一个青年的家庭教师为代表。他们都被路丁所征服。当路丁讲到他学生生活，讲到思想与自由，讲到西欧诸国争自由的历史，他的话句句含着火气，含着热诚，含着诗意，使这两个青年几乎拜倒在他足下。结果则娜太莎恋爱了他。他比她年龄大得多。他说，爱情之于他是已经过去的了。“看这株橡树，去秋的叶子都挂在枝头，要等新叶出来才能落下呢。”娜太莎以为路丁的意思是说有新爱发生才能使旧爱忘记；于是她便把爱给了路丁。她不顾一切，与路丁约，早晨在一个湖边会面。她已决心跟了路丁同逃。但路丁却什么表示也没有，只劝她说，这个婚姻恐怕不能得她母亲的同意，不如回去。于是娜太莎和他绝交。后来路丁又过了许久流荡的生活，在一八四八年法国六月革命时，死在巴黎的巷战中。

说，说，说，但是不能做去，这是四十年代俄国社会的特

质，在《路丁》里，屠格涅夫把这种情形表现得恰到好处。但是俄国的青年，不久便觉悟了。新人已紧接着路丁而出现。《贵族之家》便是描写这个新的趋向。

《贵族之家》的主人翁是拉莱契基（Lavretsky）和丽萨(Liza)。拉莱契基是不满意于路丁式的行为的，他想去做，想去实行他的理想，但他仍旧不能在新的潮流里找出一路来。他的力量太薄弱了。他不幸和一个悍暴的妇人结婚，受了不少痛苦。他们离开了。他又遇见一个好女子丽萨，互相恋爱着。他们都相信他的前妻已死，但是不久，她又出现了。丽萨到尼庵里去。拉莱契基失败了。

屠格涅夫由这部小说，得到很大的成功。有人说，这部书和《初恋》在屠格涅夫的一切小说中算是技术最高的。但实则这部小说之成功，第一还在读者之众多。《父与子》受人责罚，《路丁》也不能广传，只有这部《贵族之家》因为所描写的人物，都是普通社会里所常遇到的，所以他能意外的得到极多数的读者同情。

在实际上，讲到艺术的精美与思想的深沉，《前夜》似乎较《贵族之家》为尤成功。《前夜》的女主人翁是海仑。在《路丁》里，屠格涅夫描写娜太莎，已带有热烈的情感与敢做事的精神。在这部《前夜》里，他所描写的海仑则为此种妇人之更进一步者。海仑不满她自己家族的沉闷琐碎的生活，她渴望着更大范围的活动。她在日记上写道，“成好的人是不够的；一定要去做好的事。——是的，那是人生的大事。”但她所见得到的人都是些懦弱而无进取之志的人，或赞美自己的蝴蝶。最后殷沙洛夫(lnsaroff) 出现，而海仑的全副心灵遂萦回在这个人的身上。殷沙洛夫是一个巴尔干爱国的志士。他只有一个志愿：恢复祖国。他扫除一切哲学的幻梦，一直向前走去。当他突然发觉自己心里

对于海仑有了恋念时，立刻便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并且离开俄国。他到海仑那里告诉她要走。海仑要他第二天早晨再到她这里来。他不答应。第二天，海仑等到下午不见他来，便自己去找他去。路上雷雨大作，海仑趋入路旁一个小教堂里避雨。恰好殷沙洛夫也在这里，她表白自己的心。殷沙洛夫为她的热诚所感，便决定与她结婚。

海仑是俄国妇人，几年以后加入俄国一切自由运动的妇人的代表。她们贡献了心和灵魂给平民，给自由。她们为被压迫的阶级而奋斗，她们不怕西伯利亚的雪，她们不怕断头台。屠格涅夫描写海仑，读之几乎如现在目前，艺术的美也达到极高点；惟殷沙洛夫写来似乎不十分像一个有生命的人。

继《前夜》而出现的是《父与子》(1859)。父与子是描写俄国当时的新旧思想的冲突的。新的人又出现了。他们不是能说不能行的路丁，也不是想做事而无实力的拉莱契基，他们是有强固的主张，是有破坏一切的勇气的。这新的人的代表是巴札洛夫(Bazarov)。他这个人不屈于一切权力，不信一切没有证明的理论。所以他对于当时的风俗，习惯，一切都取否认的态度。有一次，他到他朋友的家里住几时。这位朋友的父亲与伯父是旧时代——父代——的代表。就在这个地方，子代——巴札洛夫——与父代起了一个大冲突。这种冲突，在俄国当时是处处都有发生的。巴札洛夫朋友的父亲尼古拉是一个热心的梦想者。他过着地主的懒惰生活。他想告诉少年人，他也是逐着时代走。他想读他的儿子与巴札洛夫所读的物质主义者的书。但他少年的教育阻碍了他。他的哥哥柏韦尔（Pavel）则与之完全相反。他是一个绝对崇信传袭的礼法的人。他以为大家都应坚守社会的习惯，忠敬教会与国家。他每每与巴札洛夫辩论，他妒恨这个“虚无主义者”(Nihilist)。这父子两代的冲突的结果，遂走到了悲剧的一方

面去。

这部小说出版后，发生了很大的印象。屠格涅夫受各方面的攻击。父代的人以为作者自己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子代方面则以他所描写的巴札洛夫为故意讥嘲他们。但在西欧方面，则以为《父与子》这部书是极伟大的作品，能充分的表现出俄国当时的思想潮流。

《烟》（1867年出版）是屠格涅夫在灰心失意中的作品。大改革运动已经失败，深沉的失望之音，充满在这部书里。《足矣；从一个已死艺术家的回忆》（Enough; from the Memoirs of a Dead Artist）（1865年出版）及《群鬼》（Ghosts）（1867年出版）也是含有同样的失望的。他的这种失望之心，一直到了俄国青年在七十年代之初发生了“到民间去”的新运动时才渐渐的消失。

这个“到民间去”的新运动，也在他的《荒土》（1876年出版）里表现出来。他对于这个运动非常同情。但他虽然能捉住这个运动的几个特性，而这个运动的正确意思，他似乎不大能写得出。因为他久在国外，没有同这些运动者十分接触；凭着直觉去写，自然不免缺乏真实了。

除了这几部重要的小说外，屠格涅夫还有几部很重要的著作。他的《韩米勒特与唐·魁索》（Hamlet and Don Quixote）（1860年出版）是很好的一篇论文。他的《散文诗》（或名 Senilia）（1882年出版）所含的意思尤为深远，文词也极委宛幽雅之至。他们虽是用散文写的，实则都是最好的诗歌。如《老妇》、《乞丐》、《自然》、《狗》等谁读了都是要十分的受感动的。

龚察洛夫

龚察洛夫（Ivan Gontcharov，1812—1891）与屠格涅夫同

时，他的作品虽远不如屠格涅夫之多，但他在文坛上的势力却很大。当时的批评家往往举以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相比称。他的家庭是商人，与屠格涅夫之出于华门贵族者不同。

他的文学生涯，占有四十五年的时间，较屠格涅夫为尤久，但他除了几篇杂记和一部名为“The Frigate Pallas”的游记外，全部的小说著作只有三种：一、《日常的故事》（A Common Story），二、《阿蒲洛摩夫》（Oblomov），三、《悬崖》（The Precipice）。

《日常的故事》出版于一八四七年，叙少年安迪夫（Aduev）的事，叙他从本乡到圣彼得堡，脑中满贮着诗思，爱情，与友谊。他在这个都市里，得了一位职位，做了许多文字，又结了婚。虽然所叙的是日常的故事，却叙得非常真切动人。许多人说，龚察洛夫是一个纯客观的作家，实则一个好的作家，固然决不把他自己的一切情感，借书中人尽量写出，而在另一方面，也决无纯客观的作家。无论什么作品，至少总带有作家的同情与憎厌在里面的。龚察洛夫的三部作品，有大部分且是自叙传，不过因为他善于隐藏，所以读者不觉得而已。

《阿蒲洛摩夫》完成于一八五八年，这是龚察洛夫最重要的著作。批评家常以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及他的这部《阿蒲洛摩夫》为十九世纪后半俄国文坛最伟大的产品。《阿蒲洛摩夫》是一部完全俄国的作品，所以俄国人能完全的赏鉴它；同时又是普遍的诉于全人类的，所以别国的人也能读之而感动。

书中的情节是如此：阿蒲洛摩夫是一个有六七百农奴的贵族。他生长在使奴唤婢的家庭，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好，连袜子也没有自己动手穿过。后来进了大学，但他的仆人仍旧追随在他身旁。他的懒惰昏睡的态度始终不改。大学的热烈的讲演，青年

友人的如火一般的激刺的谈话，有时也能激动他的心胸。但他幼年的环境，他的恬静懒惰，被保护的生活，总把青年的热情压沉下去。到了他毕业以后，还是如此生活下去。太阳已经射进窗中，他还在床上，他几次想起来，想了一会，又懒懒的躺下睡了。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的环境很好，他的评判力也很好；他永远不做不忠实的事，他不会做；他且也具有同时代青年的热感与理想，他也羞着做一个管理许多农奴的地主。但他的懒习深入骨髓，竟使他懒得离开沙发一步。他有一个朋友史托兹（Stolz），是一个强毅，活泼的人，很替他忧愁，想尽种种方法，都不能引动他向活动的路上走去。后来阿蒲洛摩夫遇见一个女子亚尔加（Olga）。她也是史托兹介绍的。其初阿蒲洛摩夫很被她感动，想努力从沙发上挣扎起来，向活动的地域走去。他们互相爱恋着。但阿蒲洛摩夫的惰习终于不能除去。亚尔加心力俱尽，不得已离开了他，和史托兹结婚。

这部小说的出版，震动了俄国全部的知识阶级。什么人都拿着一本《阿蒲洛摩夫》读，都讨论着新发见的“阿蒲洛摩夫气质”（Oblomovism）这个名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血管里含有些阿蒲洛摩夫的分子。每个人都忧愁着，都努力的想从懒惰的海里挣扎起来。这一贴兴奋剂实是俄国当时最对症的良药。所以龚察洛夫此书的功绩是非常伟大的。

《悬崖》出于一八六八年。这部书他在一八四九年已着手著作，因为要急于完成《阿蒲洛摩夫》，所以中断，直至一八六八年才完全做好。因此而书中的事实，与当时急进的社会很不相似。这是他失败的地方。但心理的精审的解剖及写景的微妙细腻仍使此书得有永久的生命。

第六章　杜思退益夫斯基与托尔斯泰

杜思退益夫斯基

杜思退益夫斯基（Feodor Dostoevsky，1821—1881）与托尔斯泰是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的双柱。任什么作家，都没有他们那样的感动人，那样的深挚的被民众所爱的。杜思退益夫斯基在普希金铜像开幕时的演说，竟使群众感泣，托尔斯泰的葬礼，则农民执拂哀送的，几乎有好几千人。

杜思退益夫斯基第一次出现于文学界，差不多与屠格涅夫同时。但他的活动被凶暴的政府阻碍了许多年。当一八四五年，他初到圣彼得堡，还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青年；他那时刚舍去别的事，专心从事于文学。他的第一部小说《苦人》（Poor People）完成时，他只有二十四岁。他的同伴把这部《苦人》送给诗人尼古拉莎夫（Nekrasov）看。他很怀疑，不知这部小说能否得到这个大诗人的阅读。第二天早晨四点钟时，尼克拉莎夫竟亲自跑到他的寒苦的住所，从睡梦中把他叫醒，抱他的头，诚挚的庆祝他的成功。杜思退益夫斯基自此立刻成了一个知名的人。

四年以后，（1849 年）他因加入彼特拉夫斯基（Petrashevsky）的团体，往往聚会在一起读 Fourier 的书，讨论俄国有社会运动的必要，与组织一个秘密印刷所等事，竟被政府所捕，与几个同志，并被判决死刑。在十二月冰雪满地之时，杜思退益夫斯基等被牵至刑场待刑。正在这个时候，尼古拉一世下了赦令，改为遣戍西比利亚。三天以后，杜思退益夫斯基便被押至西比利亚的亚木斯克（Omsk）做工。他在那里住了四年，改服兵役于军队里。一直到了一八五九年，他才得自由，被允许复回俄国。但他虽已自由，自此以后的生活，却都在穷苦的情境里过着。他被迫着，不得不以卖文为活。他的文笔本来很快，在未到西比利亚以前，已经作有十种小说，自从回来后，更不得不迅速的著作着，以谋衣食的供给。所以他的小说差不多都是一脱稿便上印刷机的；在艺术方面看起来，他的作品未免粗率而凌乱，远不如屠格涅夫，龚察洛夫及托尔斯泰诸人的精美。有人说，读他的小说，只能读一遍，第二遍便不能再读下去了。但他们的伟大的地方却并不在艺术方面，所以艺术的好坏，对于杜思退益夫斯的伟大，并无什么关系。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伟大，乃在于他的博大的人道精神，乃在于他的为被不齿的被侮辱的上帝之子说话。他有一个极大的发现，他开辟一片极肥沃的文学田园。他爱酒徒，爱乞丐，爱小贼，爱一切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他发现：他们的行动虽极龌龊，他们的灵魂里仍旧有烁闪的光明存在着。他遂以无限的同情，悲悯的心胸，把这些我们极轻视而不屑一顾的人类写下来，使我们觉得人的气息在这些人当中是更多的存在着。且他的小说，结构虽然都很无秩序，事实的连续也不大自然，但他的文字里面却深深的潜着一种真实的精神与隐在的感动力，足以把他的缺点蔽盖着。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小说，到现在俄国读的人还极多。当这些小说初次介绍到法英德等国的文字里，批评家都惊异以为是一种新的发现。杜思退益夫斯基立被称当代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且被称为“最能表现神秘的斯拉夫族灵魂”的作家。屠格涅夫的名字几被他蔽盖着，托尔斯泰也被人忘了一时。现在欢迎杜思退益夫斯基虽不如当时那样的狂热，但他的与屠格涅夫及托尔斯泰并肩而立的地位，却谁也不能否认。

在杜思退益夫斯基被赦回国到他死时的长期间里他的重要作品，出产了不少，最初的大作品是《被压迫者与被侮辱者》，《死屋的回忆》继之而出。其后则《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白痴》（The Idiot），《少年》（The Youth），《魔鬼》（The Devils）及《客拉摩助夫兄弟》（The Brothers Kramazove）等作品连接的出版，都得到极大的成功。

《被压迫者与被侮辱者》叙一少年恋爱一贫家的女子，但这个女子却恋爱一个亲王。女子和少年亲王的心理，在这书里叙写得非常好，尤其好的是写那个少年怎样贡献他的全生命做那个女子的仆从，及他怎样违背自己的意志把这女子送进亲王的手里去。

《死屋的回忆》是杜思退益夫斯基所有作品里艺术最好的一部小说，叙写西比利亚的苦役及罪犯的情性，一切都是从他自己的经验里写出的。

《罪与罚》是流行最广的一部，小说全欧洲以至美洲日本都曾有过译本。书中所叙的是：少年学生拉斯加尼加夫（Raskolnikov）为家境及不平的心所迫，杀了一个无心肠的放债为生的老妇人及她的一个姊姊。他本想取她的钱，但被血所震，竟一无取的跑出来。他心里痛苦极了！一切信仰都失掉了，时时的受血的惊骇，心灵上永远如负了一个重担。最后，到他的女友莎妮亚

(Sonya) 那里去。莎妮亚劝他自首。他去自首，被遣戍到西比利亚。莎妮亚跟他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死屋”里去，终于从陷溺的海里，把他救了起来。杜思退益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描写拉斯加尼加夫的心理变幻非常的动人。

《白痴》、《少年》与《恶魔》都是一半叙病的心理，一半论社会问题的。

《客拉摩助夫兄弟》则为他最后的最大的著作，也是他最成熟的作品。他的见解，他的对于弱者的同情，他的微妙的心理解剖，都在此书里更有力的更集中的表示出来。

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Leo Tolstoi，1828—1910）的作品，在艺术方面看来，高出杜思退益夫斯基远甚，在内容方面看来，其感人之深，含意之远，与人道的，爱的精神之真挚则与杜思退益夫斯基差不多。

托尔斯泰的家庭与屠格涅夫一样，是传统的贵族之家。他的母亲死得很早，他的父亲在他九岁时也死了。他和他的兄姊都是由一个远亲抚养成人的。他在大学里很不规则的读了几年书，便离了学堂，跑进社会的旋涡里去。他的哥哥尼古拉叫他加入高加索军队里。他的生活进了一个新时期。

在这个山水明秀的地方，他开始他的著作。最初做的是《幼年》一书，后来又写了《童年与少年》，这二书都是他的自叙传。一八五三年，离了高加索，参预克里米（Crimea）的战争。《莎巴斯托堡故事》（Tales of Sebastopol）是他此行的收获，在这个小说里，他的反对战争的见解已经萌芽。一八六二年，他结了婚。他的家庭很快乐；在这个时候，他写了两部最大的小说；

《战争与和平》及《婀娜小史》（Anna Karenina）。七十年代之末，托尔斯泰的精神上忽起了很大的变动。他不满意他的生活，不满意他以前的著作，由一个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变成一个道德家的托尔斯泰。但这个变迁，对于他的作品的价值却并没有损失；他的精深的技术，使他讨论或宣传他的理想及教义的作品仍不失其为第一等好的著作。

他宣传他的教义，并修订四福音，希腊教会的人大起反对，一九四一年宣布逐他出会，但他并不介意。他实行他的泛劳动主义。到了一九一〇年，他突然离开家庭，想寻求更好的更安心的生活，走到中途，患肺炎死。

在托尔斯泰的早年著作《幼年》及《童年与少年》二书里，我们已可看出他的性质的两方面，兽的生活的爱恋，与更高的道德标准的寻求。这两种矛盾的性格，终他的一生，都在那里冲突。他的第一期的作品，则兽的本能的生活占优势。

在他的短篇小说《二骠骑》、《三死》、《一个地主的早晨》等外，托尔斯泰描写塞巴斯托堡战时的生活，极可赞美，一个兵士的心理描写，在他看来，较之全部的战争为尤重要。他以为战争不是一种光荣的动作，乃是痛苦与死亡的事件。在《战争与和平》里，他所持的意见也是如此。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最大的一部著作，叙的是一八〇五年到一八一二年俄国在拿破仑战役里的情形。人物这样的多，背景这样的复杂，他却一层一层的写来，以活泼动人的文词，把各个人都写得极有个性，把每件事都写得极有精彩，而全部的结构，又毫不凌乱。这实是他天才独到的地方。《战争与和平》的主人翁，并不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如拿破仑或科托莎夫（Kutuzov）之流，乃是一个朴讷的农人白拉顿（Platon）。托尔斯泰把白拉顿当做一个具有他理想中基督教徒的一切条件的人；以无限

的爱，爱全世界，以绝对博爱的无抵抗主义，对待一切恶。柏勒（Pierre）遇见他后，深受他的高尚精神的感化，终其生不违背这些基督教义。由柏勒生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自身的变化。

《战争与和平》之描写伟人，与一切历史及小说大不相同。托尔斯泰绝不夸张的写拿破仑或亚历山大一世等英雄；他以平常的人看待他们。他以为一切历史的事变都是不可知的群众运动所造成的，每个人都分有创造的力量，同时却每个人都为一种不可抵抗的潮流所驱迫。这种见解是托尔斯泰所独具的。

《战争与和平》的道德观念，在他的第二部大著作《婀娜小史》里更扩大的宣达出来。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里，叙述圣彼得堡的两个高等社会的家庭。婀娜当少年时嫁给一个老官吏。她因此得到社会上的好地位，并且有了许多钱。但过了几年，她觉得她的生活是苦痛的。她爱了一个少年，离开这个家庭，但她始终没有勇气与这个家庭断绝关系。经过了许多痛苦，她便投身在铁路上死了。与婀娜的悲惨历史相对的是一个快乐的家庭。李文（Levin）像《战争与和平》里的柏勒一样，经过一番道德的改革，最后得到一条结论：在自己家庭里，常常做工，且在健全的环境里生活着，是一个人所应该求的生活。

自经过宗教的观念的侵占（1879 年）后，托尔斯泰的作品的色彩便截然与以前不同。悲观的黑云开始在他的一切作品里占领着。以前的健全的生的快乐已经完全不见了。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所谓文明，就是贼人性的东西，只有自己牺牲及博爱人类，我们才能完成我们人生的目的。这是托尔斯泰所要宣传的教义。在《艺术论》里，他明白的宣言这个意思，而反抗以空幻的美为骨子及为个人娱乐而设的一切文艺及音乐。在其他小说里，这种教义也极鲜明的存在着。

《伊凡·依利契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是写一个平常人知道他将死的悲剧。他孤独的生存在世界上;他的生活什么特点也没有,谁也没有给他以同情的。但正当他的死时,一线希望的光明,穿透了黑云,他便成一个快乐的人,相信将来的生活而死去。

《黑暗的势力》是他的一个剧本,写农民生活的一幕悲剧。一个少年仆人犯了许多罪恶,最后因良心的打击而忏悔一切。除了这个剧本外,托尔斯泰所著的剧本还很多,如《教育之果》是讥刺教育界的。如《活尸》,如《黑暗之光》则都是宣传他的教义的。

《克利志·莎娜太》(Kreutzer Sonata)是一篇讨论妇女问题与性的生活的小说。他对于家庭及恋爱,这时的见解与以前已不同。《塞祺士父亲》(Father Sergius)所含的意思也与《克利志·莎娜太》差不多。

他的最后的大著作是《复活》(Resurrection)。在这部书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念,更充满的鲜明的刻着,同时,他的伟大的艺术,也更纯炼的微妙的表现出来。书中的事实是如此:一个富有财产的贵族尼希留道夫(Nekhlyudov),少年时与一个女郎相爱,后来又舍弃了她。她因此堕落。后来她受了杀人的嫌疑,被捕到法庭上去。那时,尼希留道夫刚好做陪审官。他忏悔以前的行为,竭力的救护她。到了她被判决流放西比利亚,他便牺牲一切,随跟了她到配所里去。他想同她结婚,补救以前的过失。但她坚执的拒绝他,另外嫁给一个人。同时,尼希留道夫已进入新的生活中;他从爱与怜与自忏中得救了。

托尔斯泰的著作,除了上面所举的外,还有不少。他也做了不少的论教育,道德,宗教及艺术的论文。

从宗教的立足点看来,他可以称为一个纯正的基督教徒;虽

然他反抗卑鄙龌龊的教会及一切不好的教义，教会也反对他，不认他为教徒，然而他的博爱，他的行动都是可以直进天堂之门而不受诘问的。

从政治的立足点看来，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政府，反对法律。

从文艺的立足点看来，许多人都以为他是艺术的破坏者。他主张以文艺为宣传主义的工具，反对一切无用的伪美的作品。

虽然有人以他的艺术的主张为不对的，虽然也曾有人以他的和平的意见为不对的；但他的人格，他的数十年的收获，却如橡树之拔地而立，江河之永古常流，什么人都不能不对之表示崇敬。

第七章　尼克拉莎夫与其同时代作家

尼克拉莎夫

尼克拉莎夫（N. Nekrasov）（1821年生，1878年死）是与屠格涅夫，龚察洛夫等散文作家同时代的一个大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个穷苦的军官，他的母亲是一个波兰人，尼克拉莎夫的诗里常常的提到她。但她死得很早，共遗下十三个儿女。尼克拉莎夫十六岁时，离开本乡，进圣彼得堡大学哲学门。俄国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穷苦的，或是做工，或是做家庭教师，所入虽微，衣食却总可以维持。但尼克拉莎夫却与他们不同，他的境遇非常黑暗，他自己后来曾说道："整整的三个年头，我没有一天不是挨饿的。在大饭店里，常常有人进去看报，并不叫什么东西来吃；我也常常如此；当我看报时，我便把面包盘拿过来，把面包取来吃了，这就是我唯一的粮食了。"有一次，他生了病；屋主人在十一月的寒冷的夜里，拒绝他进屋。他几乎要在露天底下过夜。幸得遇见个乞丐走过，他可怜尼克拉莎夫，便带了他到一所小屋里去。尼克拉莎夫的少年就是这样的过去。但他这样穷苦的境遇，对于

他也未始无益。他因此得有机会认识圣彼得堡最穷苦最下等的人，而把他们写进他的诗里。最后，他从事于文字生涯，他的物质状况才渐渐好起来。他成了当时一个最大杂志《现代》的固定投稿者。一八四六年，他竟成了这个杂志的编辑之一。在六十年代他因《现代》的介绍，认识了两个很重要的批评家，周尼闪夫斯基（Tchernyshevsky）与杜蒲罗留拔夫（Dobrolubov），他的诗也以此时所做的为最好。一八七五年，他生了一场大病，此后二年内，他都被苦痛跟随着。一八七七年十二月，遂病卒。当他下葬时，送葬者有好几千人，以大学生为最多。

即在他的墓上，“尼克拉莎夫是否与普希金及李门托夫同样的伟大”的问题，开始热烈的辩论着，这问题直到后来，还没有论定。但尼克拉莎夫之为一伟大的诗人，则为无人能否认之事实。尼克拉莎夫称他的诗神为“复仇与忧愁的诗神。”这句话是很确实。尼克拉莎夫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悲观却与别人不同；他所写的虽是俄国群众的悲惨境况，但他所给与读者的印象却不是失望而是愤慨。他在悲苦的现实之前并不低头匍匐，却进而与之奋斗，而得到胜利。所以读尼克拉莎夫的诗，在不满足现实的感想里，同时且种下恢复或奋斗的种子。他的诗大概都是关于农民及他的痛苦的。他对于民众的爱成了一线红丝，串着他的全部作品，有时他偶然也弹着失望的歌，但这种歌声，在他的作品里实不常见。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是《赤鼻霜》（Rednosed Frost）及《农家的儿童》（The Peasant Children）。许多批评家对于他的音节，都以为不很谐和。但他实是俄国民众最崇拜的诗人。他的诗歌的一部分已成了全俄国的财产。读他诗的人，不仅是知识阶级，而且是最贫苦的农民。读普希金他们的诗，非有些文学的修养，不能领略它的好处；至于读尼克拉莎夫的诗，则只要认识几个字，知道看看书的人都能懂它的意思，受它的感动。

尼克拉莎夫实是一个最成功的民众诗人。

同时代的散文作家

在上面几章里，已经叙过几个重要的散文作家，如屠格涅夫，龚察洛夫，杜思退益夫斯基及托尔斯泰诸人，现在再略述几个与他们同时代的散文作家。

塞海·阿克莎加夫（Serghei Timofeevitch Aksakov）（1791年生，1859年死）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大作家，且是两个大作家君士坦丁及伊文·阿克莎加夫（Konstantin and Ioan Aksakov）的父亲。他在实际上是普希金及李门托夫的同时代者，但他的第一期的作品，受伪古典主义的毒太深，没有什么好的，直到歌郭里出来后，他才受了他的影响，作风为之大变，他的文才开始发展，做了许多不朽的工作，自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五年，他继续的出版了他的《安格林的回忆录》（Memories of Anglin），《一个猎人的回忆录》（Memories of a Hunter with His Fowling Piece in the Government of Orenburg）及《一个猎人的故事与回忆》（Stories and Remembrances of a Sportsman），这三部著作已足以使他成一个第一流的作家了。一八五六年，他又出版了一部大著作《家史》（A Family Chronicle and Remembrances），隔了一年，（1858年），他的第二部大著作《巴格洛夫的幼年》（The Early Years of Bagrov-the-Grandchild）又继之而出。这时，他的文名已经确定了。当时的一般斯拉夫党且尊之为俄国的莎士比亚或荷马。他的成功，不仅在反映全时代在他的回忆录里，且进而创造出那时代的人的真范。以后的作家在此处受他的感化不少。他的描写风景及动物生活也极可赞美，无人能够及之。

台尔（V. Dal）（1801年生，1872年死）的作品虽然不多，

但却不能略去不提。他生于俄国的东南部，他的父亲是丹麦人，他的母亲是法德人。他在杜尔柏大学毕业，是一个自然学家，他的职业是医生，但他最喜欢研究的却是人种学及语言学；他对俄国文字及习语很有功绩。他曾用一个假名字刘甘斯基（Kozan Lugansky）做了许多描写民间生活的杂记。(曾集百则，成一册，名《俄民生活的影片》，1861 年出版。) 屠格涅夫及倍林斯基（Bylinsky）都极赞美他。他做了军医，随着他所属的军队，四处迁徙，所以他有许多机会，搜集各地的语言，习语，谜语等等。他的主要著作《俄国辞典》（An Explanatory Dictionary of the Russian Language）共有四册，是一部不朽的大工作，还有一部，《俄人的成语》（Proverbs of Russian People）也有很大的价值。

柏那夫（Ioan Panæv）（1812 年生，1862 年死）是一个对于俄国文学界很有功绩的人，但在当时却不很著名。他与尼克拉莎夫共同编辑《现代》杂志，与当时的文人都是很好的朋友。他做了不少的小说。他的小说所创造的妇女的范式，曾被批评家称为“屠格涅夫的女英雄的精神上的母亲”。

孚馨司卡耶（N. D. Hvoschinskaya）（1825 年生，1889 年死）是一个很可注意的女作家。她嫁后改名为谢安加斯卡耶（Zaionchkovskyaya），平常作文字，则都用她的男性的假名克利司托夫斯基（V. Krestovsky）。她的文学工作，开始得很早，(在 1847 年）她的作品为大众所称许，读者极多。但在她的早年，她的价值尚未为批评家所认识，直至七十年代之末，才有人完全发现她的才能，置之于依丽亚（George Eliot）等女流作家之列。她在尼古拉一世时代所作的小说，与屠格涅夫一样，带着浓厚的悲观色彩。那时，她还是一个处女，她的母亲是很专制的，她的父亲则为一个孤独的自私的人，环绕她的男朋友，也没有一个好的人，她的作品遂在表现出一个忧郁失望的少女来。到

了六十年代的初期，俄国的情形较好，她的作品也变了色彩。《大熊》（The Great Bear）是这时期最重要的作品。那时正是“到民间去”大运动开始时，《大熊》是男女青年最喜读的小说之一。到了七十年代末之后，她的作品，又换一个样子。《照相簿》（The Album：Groups & Portsaits）是这时期最好的作品。她在这部书里，把对于时代的愤慨，与自己身世的悲感，曲曲的描写出来，可说是俄国文学中“主观的写实主义”（Subjective realism）的最好作品之一。

同时代的几个诗人

自普希金，李门托夫死后，俄国诗坛，久绝嗣音，直至十九世纪后，尼克拉莎夫诸人出，才重复现出活气来。现在在此处略述与尼克拉莎夫同时的几个诗人。

加尔莎夫（Koltsov）（1808年生，1842年死）是一个平民诗人，他所歌的都是悲伤之调。他写南俄的无尽的草原，写草原上的穷苦生活，写农妇的悲惨境遇，写感受一切痛苦的爱情，写平民快乐之短促而涕与忧愁之永在，使得每个人都为之怆然感动。他的诗的风格，内容及形式，以及一切，都是独创的；即其韵律也不同平常的诗歌，却音调和谐如民歌。他的第二期的诗尤为纯美，每一行，每一感想，都打到读者的心里，充满他以对于自然与人的诗的爱。他同许多俄国的好的诗人一样，死得很早；正在他天才成熟，思想更为深邃之时，他的诗弦，却拍的一声断了。

尼吉丁（Nikitin）（1824年生，1861年死）生于南俄一个穷苦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沉醉于酒。他的生活因此非常悲惨。他也死得很早，但他所留下的诗却有许多至可贵宝的东西。他描写民

间的生活，而染以他自己所感受的不幸生活的深忧的色彩。他的风格朴质而真挚，与后来的民众作家很相似。

白里谢也夫（A. Pleshcheev）（1825 年生，1893 年死）与杜思退益夫斯基同被政府所捕。他的罪名较轻，仅被罚充兵役。到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时，被赦回莫斯科。他的诗最初不为人知，到了他最后的三十年间，才成为民众所爱的诗人之一。他与他的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不同，他的诗并不受时代的黑暗的影响。无论在什么时候，他的歌声总是活泼，新鲜，而快乐。只有最后的二三年，因为疾病频侵的缘故，才开始带有悲观的音调。他除了自己做的诗以外，还译有不少的英，德，法及意大利等国诗人的作品，都译得很好。

除了以上三个描写实际生活的诗人外，同时还有一群“纯美”或“为艺术之艺术”派的诗人。

邱采夫（T. H. Tyuttchev）（1803 年生，1873 年死）是“纯美派”诗人的很好的代表。屠格涅夫非常称赞他。他的诗中受普希金时代的影响，却到处都显出独创的精神。他的诗的遗产虽少，却都是很宝贵的奇珍。他的诗一部分描写自然，一部分是哲理的。有时他也写关于政治的诗，但大家却以为是反动的，不表同情于求自由的时代的。

梅依加夫（Apollon Maykov）（1821 年生，1897 年死）常被人视为纯粹“艺术派”的诗人，但在实际上，他的诗是划分三个时期的。在他的少年时期，他是追慕古希腊罗马的人；他的主要作品《三死》（Three Deaths）是表现古代的异教思想与基督教思想间的冲突的。但他的许多好诗却都是异教思想的表现。在六十时代，他被俄国及西欧的争自由运动所感化，诗里充满了这种与时代相呼应的争自由的精神。他的诗在这个时候算是最好。同时还译了好些海涅（Heine）的作品。到了最后一个时期，俄国的

自由运动已入终止之境，他便变了意见，开始在反对方面写文章，渐渐的失了他自己的天才与一般读者的同情。除了这个最后时期的少数作品外，梅依加夫的诗大概都是很音乐的，有力的，而且富于诗趣。有的诗实已达于“真美”之境。

萧皮那（N. Scherbina）（1821 年生，1869 年死）也是一个追慕古希腊的诗人，关于这一类的诗，他有时且超越过梅依加夫。

波龙斯基（Polonsky）（1820 年生，1898 年死）是屠格涅夫的一个亲密的朋友。他的天才很高。他的诗音节和谐，想象丰富，风格又自然而朴质，所取的题材，也都是独创的。他缺乏伟大的气魄，没有浓挚的情感与深切的思想，不能成一伟大的诗人。

善辛（A. Shenshin）（1820 年生，1892 年死）是这一群诗人中色彩最浓的人。许多人只知道他的假名字孚特（A. Fet）。他自始至终，都保持他的“纯美派”或“艺术派”的精神。他做了许多关于经济的及社会的问题的文字，但却都是用散文发表的。至于在他的诗里，则除了崇拜为美的美之外，什么东西都不渗杂过去。他的这个趋向很得到成功。他的短诗都非常美丽。他的回忆录共有二册，是一部很有趣味的书。他是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很好的朋友，这部回忆录对于研究这两个大作家的人很有许多帮助。

阿利克塞·托尔斯泰（Alexei K. Tolstoi）也是这一群诗人之一。他的诗都是很音乐的。他的感情虽不甚深挚，而他的诗的形式及音节却极可爱；其风格也是独创的。没有人比阿利克塞·托尔斯泰把俄国民歌的风格运用得更好的。他在理论上是主张“为艺术的艺术”的，但他也并不坚持这个目标。他的剧本是很著名的。在下一章《俄国的戏曲》里，当再述他一下。

翻译诗人

以上所举的几个诗人，差不多都译过不少的作品。底下所述的则是几个专以翻译诗歌著名的诗人。

格倍尔（N. Gerbel）（1827年生，1883年死）以整理《依鄂太子远征记》著名，后又译了许多西欧诗人的作品。他的《席劳诗选》（Schiller, translated by Russian Poets）（1859年出版）及关于莎士比亚，摆伦，歌德诸人的同样诗集，很给当时以重要的影响。

美坚洛夫（M. Mikhailov）（1826年生，1865年死）是《现代》杂志里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一八六一年，被政府遣戍于西比利亚，作了四年苦工，病死。他译了海涅（Heine），郎佛罗（Longfellow），丁尼生（Tennyson）及其他诸诗人的作品，很著名。

文葆（P. Weinberg）（1830年生）以译莎士比亚，摆伦，雪莱（Shelley），西里唐（Sheridan），考贝（Coppe），海涅诸人的诗著名。他还出版了歌德与海涅的诗选。

梅依（L. Mey）（1822年生，1862年死）著了不少描写民众生活的诗，及几篇剧本。他的诗很美丽，剧本则以写古代生活者为最好。他所译的东西极多，除了近代的西欧诗歌外，他还从希腊，腊丁，及古希伯莱译出许多好作品。

美那依夫（D'Minayev）（1835年生，1889年死，）做了许多讽刺诗，又译了许多摆伦，保尔痕（Burns），康威尔（Cornwall），穆尔（Morre），歌德，海涅，但丁诸人的诗。

梭可夫斯基（A. A. Sokolovsky）（1837年生）译了许多歌德及摆伦的诗歌与散文，但他的不朽的工作及在译莎士比亚的全

集；此集附注释，出版于一八九八年，他因此得到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

最后还有两个同时代的散文翻译家，也应在此附说一下。魏邓斯基（Vevdensky）（1822 年生，1855 年死）译了许多狄根司（Dickéns）的重要小说，很能得到狄根司的精神。萧尔根诺夫夫人（Madame L. P. Shelgunov）译了史必海琴（Spielhagen），阿巴契（Auerbach）及席洛骚（Schlosser）诸人的著作，其辛勤也是不可埋没的。

第八章 戏剧文学

启 源

俄国戏剧文学的启源，无从查考；最初所演的大概是宗教剧和民间流行的喜剧。到了十七世纪的末叶，彼得大帝改革一切之前，西欧的习惯，已渐渐的输入，彼得之父阿里克塞帝，招致几个外国人演德国剧。及波洛兹基（Simeon Polotsky）出，作《浪子》一剧，俄国才有自己的剧本。一七〇二年，彼得第一建筑一个剧场在莫斯科，所演的除了德国剧之外，莫利哀的戏曲也曾在那里表演过。至十八世纪中叶，俄国的剧场遂有了坚固的基础。当时颇有几个专门的戏剧作家。

修麦洛加夫（Sumarokov）（1718 年生，1777 年死）曾写了许多诗歌与寓言，但他的剧本尤为重要。他的悲剧是模拟莱辛（Racine）与福尔特尔（Voltaire）的，且坚守他们的“三一律”。但他的天才不及法国诸先进作家，所以没有大成功，他的喜剧描写当时社会很真切，他的讽刺的性质，很影响于后来者。

克涅宁（Knyaghnin）（1742 年生，1791 年死）是与修麦洛

加夫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他译法国的悲剧。他自己写的剧本也是模拟法国作家的，大半取材于俄国历史。有一篇剧本，在他死后才出版，因为有要求自由的趋向，竟被政府立刻勒令毁版。

奥赛洛夫（Ozerov）（1742 年生，1791 年死）继续克涅宁的工作，但在他的伪拟古主义的悲剧里已引进了浪漫的感伤的气息，于剧场的发展上很有影响。

同时，喜剧也很发达。虽然大多数的喜剧还都是模拟法国，但已有以俄国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倾向。加德邻二世所写的几篇讽刺的喜剧，其题材都取之于她的环境，有一篇歌剧，且为描写俄国民众生活者。她可以说是第一个把俄国农民表现在舞台上的。同时，阿皮里西摩夫（Ablesimov）的《磨工》，克涅宁的《小贩》及其他平民的喜剧，都继续的出现于剧场，且甚为观众所欢迎。方·威真（Von Wizin）及寓言作家克鲁洛夫所作之喜剧，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十九世纪初叶

十九世纪的前三十年间，俄国剧场发达得很快。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出了许多有天才的演员，戏剧作家也如春笋一般的跑出来。当拿破仑战役时，爱国的悲剧流行一时。但伪拟古主义的悲剧，势力还是很强盛。后来因卡伦辛及助加夫斯基诸人的努力浪漫主义才代替伪拟古主义而占领俄国的剧场。萧霍夫斯基亲王（Prince Shahovsky）作了百余种的剧本，在当时很有势力。莫利哀（Moliere）的作品也有很好的译本。但伟大的作品，直至后来格利薄哀杜夫，歌郭里，阿史特洛夫斯基诸人起，才有产生。

格利薄哀杜夫

格利薄哀杜夫（Griboedov）（1795 年生，1829 年死）死得很早，且传下来的只有一篇喜剧《聪明误》(Gore ot Uma）及几段不完全的悲剧，但即此已足以使他不朽。格利薄哀杜夫对于俄国戏剧文学的功绩，正与普希金之于俄国的诗歌。格利薄哀杜夫生于莫斯科，十五岁进大学。他在大学里得到许多关于世界文学的知识，并且已着手写这篇著名的喜剧。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入俄国，他投入军中。四年内皆在陆军里为马队军官。这时的军队很受自由空气的感化。一八一六年，他离开军队，服从母命改入圣彼得堡外交部办事。在这个地方，他和“十二月党”李列夫诸人做朋友。后来因为决斗之故，移居到抵海兰（Teharan）去。他在波斯境内游历；以他的活泼及才能，在外交力量上非常活动。但还时时写他的喜剧。一八二四年，他暂到中俄去，《聪明误》即于此时完成。这剧的稿本，偶然为几个朋友看见，他们都大大的受感动，在数月内到处传钞，立刻引起很大影响；老年的人恨他，少年的人热烈的崇拜他。许多人竭力想把这篇戏出现在舞台上，但检查官坚执不许。格利薄哀杜夫遂不及见此剧之排演而回到高加索去了。当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起事时，他被捕送入圣彼得堡狱中，与他的几个好友同居。他在狱中，还不失其活泼快乐的态度。他常常讲滑稽的故事给他的不幸的朋友们听，使得他们在囚床上打滚的大笑，如小孩子一样。一八二六年，他得了自由，又回到特弗里（Tifles）去。但当他的朋友们如李列夫诸人或死或被流散之后，他的光明的心乃永为愁云所笼罩。一八二七年—二八年，俄国与波斯宣战，他加入当外交之任。战事结束时，著名的“图克曼且（Turkmanchay）和约”即为他所订

者。在这个和约上，俄国得了不少的权利。政府即任命他为驻波斯的公使。他在特弗里和一个佐治亚的公主结婚。但当他离开高加索到波斯去时，他自己知道生还的机会很少，因为波斯人都十分的仇恨他。果然他到抵海兰没有几个月，波斯的群众即起暴动，把他杀死。格利薄哀杜夫在最后的几年，对于文学并没有什么努力，只有一篇悲剧《佐治亚的一夜》（A Georgian Night）的零稿留下来，全稿则已散佚了。

《聪明误》是强有力的一篇讽刺剧，直接攻击一八二〇—三〇年间的莫斯科贵族社会。格利薄哀杜夫与这个社会是十分熟悉的，所以剧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而非由于他的创造。剧中的英雄是察兹基（Tchatsky）；他新从国外回来，立刻匆匆忙忙的跑到一个老贵族家里，他的女儿莎菲和察兹基少时是亲密的游伴，现在他很恋爱她。但他所受的待遇却非常冷淡，因为莎菲怕他尖刻的议论与讽刺的语调，而她的父亲也已为她选了一个很走运的军官做丈夫。察兹基却毫不觉得，他除了莎菲一人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又在他们面前，谈论莎菲所喜欢的一个书记，又激昂的评论莫斯科的事，骂老地主的残酷，使她父亲十分不高兴。最后，在一个宴会中，察兹基又高谈阔论的讽刺莫斯科妇人之事事模仿法国。这时，莎菲因他讥刺过那个书记，心里很恨他，即造了谣言，说他疯了，座中的众客立刻站起来，如野火似的纷纷散去。此剧的最好地方，曾为检查官删去了不少，但原文的精神，并未失去。他所用的语言，是纯正的莫斯科语。在俄国，直至现在，剧场上还重复的演奏这个剧本，且还是同样能感动人。

莫斯科剧场

在十九世纪的第四十年间，欧洲各处，对于剧场都非常尊

敬，于俄国尤甚。每一剧本出演，都能招致了一切的知识阶级与各种阶级的少年，舞台被尊称为艺术的宫苑，伟大的教育影响的中心。在莫斯科，这种剧场与社会的知识交接尤为显著。这时所演者多为歌郭里的《巡按》与《结婚》，格利薄哀杜夫的《聪明误》及莎士比亚的剧本。剧场与戏剧作家这时也很能合作。有好些作家都为剧场作了许多剧本。及阿史特洛夫斯基（Ostrovsky）出，以戏剧作家而经理剧场，俄国的戏剧遂大为进步。阿史特洛夫斯基在俄国戏剧文学上的地位，正如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小说上，孤松高耸于丛林之中，实无与他并肩而立者。

阿史特洛夫斯基

阿史特洛夫基（1823 年生，1886 年死）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平常的家庭里，他父亲是一个为商人作辩护的律师。他与当时一般好少年一样，自十七岁起，即为莫斯科剧场的一个热心的顾客；他和他朋友谈话，总是关于戏剧的事。他进了大学，二年后，因为和一个教授争论，又退学出来，做一个商人公庭的书记；因此他得到机会和莫斯科商人社会相习。他的初期的最好的戏剧的人物都是关于商人社会的，就因受了这个影响之故。直到了后半期，他的作品，方才放大他的观察范围，在别的阶级里取得戏剧的材料。他的第一篇喜剧《家庭幸福》（Pictures of Family Happiness）作于一八四七年。三年后，又作他的著名的剧本《破产》（The Bankrupt），立刻被大家公认为一个大作家。此剧最初刊在一个杂志上，全个俄国都被其感动。但检查官不准它在舞台上出演。莫斯科商人向尼古拉一世诉请讯办此剧的作者。阿史特洛夫斯基遂被免职，且受警察的监视。直到许多年以后，（1860 年）此剧才被允许在莫斯科出演。但即在此时，检查官且

坚执的要阿史特洛夫斯基把剧中的恶人受裁判的一段加上。因此，全剧的精神，竟失去了不少。在一八五三年至五四年，阿史特洛夫斯基又连续的出了两个很重要的剧本。第一篇是《他人之车不可坐》(Dont Take a Seat in Other People's Sledges)，第二篇是《贫非罪》(Poverty no Vice)。第一篇的题材不是很新鲜的；叙一个商人的女儿，跟了一个贵人跑了；后来那贵族知道她不能得他父亲的钱，便虐待她弃了她。但阿史特洛夫斯基却用很新鲜很活泼的文笔渲染她，使之成一好作品——无论在文学上或舞台上。第二篇《贫非罪》，内容更好，几乎全俄罗斯都得到很大的印象。剧中叙一个专制的富商，事事模仿西欧。他的女儿和他的书记米底亚互相恋爱。但他不知道，竟又替他女儿找到一个丈夫。全家的人都反对这件事；只有他强逼的要他女儿答应。正在全家忧愁的时候，她的叔父回来了。他揭发他侄女未婚夫的以前的罪恶。他逃走了。米底亚遂复得与她结婚。当时的《现代》杂志，关于这篇剧本，曾登过好些批评。那时著名的批评家杜蒲罗留薄夫且用《黑暗之王国》的题目，做了两篇长文，解析阿史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引起许多少年的热感。

《雷雨》继《贫非罪》之后而出，其价值似更在《贫非罪》之上。杜蒲罗留薄夫称之为“黑暗之国里的日光”。剧中叙一个女子受她的婆婆的压制，同时，又有一个小商人也受他的主人的虐待，他们处同一境遇之内，自然而然生出同情来。他们很懦弱避去与压制者间的一切冲突。但结果仍免不了牺牲。女子为其夫所弃，投到船头上而死。这篇剧本在文学上，在舞台上都是大成功的作品。每一幕都使人感动，而全剧又是一步步的紧凑，自始至终，毫不显疲倦。自此以后，阿史特洛夫斯基所描写的范围益大。如《苦新妇》，如《森林》等等，其取材都已不限于商人阶级。他又作历史剧好几篇，但没有什么大成绩。

他生平所作，约有五十篇剧本，每一篇都是适宜于舞台上演奏的。有一个批评家说，阿史特洛夫斯基的戏，一幕一幕看去，都是平庸的日常的琐事，但在这些事当中，却蕴着无限的悲苦与感想。大家看来，觉得所看的不是戏，而是人生它自己在眼前走过去，正如作者只开了一面墙，大自然的会看出屋内的一切。在他剧本里，所表现的人物，形形色色都有，但他永不蹈传统的把人类分为“善”“恶”两型的习惯。在实际生活里，“善”与“恶”是混在一起，决不能截然分开的。阿史特洛夫斯基的人物，最足以表现出这个真理。

历　史　剧

阿史特洛夫斯基晚年曾从事于历史剧，但不大成功。同时以做这种剧本著名而较他成功的，有阿里克塞·托尔斯泰（Count Alxei K. Tolstoi）（1817 年生，1875 年死。）阿里克塞·托尔斯泰是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在本书上一章里曾提到他。他的历史小说《色利不里安王》（Prince Serebryanyi），也非常著名。但他的主要的著作却是一部三连剧，《恐怖依凡之死》（The Death of Ivan the Terrible）《依凡诺威契帝》（The Tsar Theodor Ivanovitch）及《波里士·各特诺夫》（Boris Godunov）。

阿利克塞·托尔斯泰是亚历山大二世幼年的伴侣，也是后来很亲密的朋友；但他不受亚历山大的一切荣赐。他生平好猎，因此即求为皇家猎队的队长；他生长于小俄罗斯，饱受山色湖光的陶冶，后来又游历意大利，益热心于美的艺术。对于歌德及普希金尤为崇拜。

他的三连悲剧，其感动读者之处乃在于描写的深切与叙述的动人。但因受历史上的事实的拘束，有些地方，不能把主人翁的

性格完全表现出来。他的剧本，是写实的戏曲，但还略略可以感到浪漫的气息，于恐怖伊凡的性格的结构上尤可觉得到；独于描写依凡诺威契帝的地方，则完全是一个生的人，而不是意造的，可以说是例外。这因为依凡诺威契的性格与亚历山大二世极相似，同是一个好心胸而无主见的人，而阿里克塞·托尔新泰与亚历山大二世十分亲近，所以能写得那样活泼动人。

同时的戏剧家

与阿史特洛夫斯基诸人同时代的戏剧家，现在略述几个。

柯皮林（Suknovo-Kobylin）著一部三连喜剧，在当时很著名，其中《克里兴斯基之结婚》一剧，在剧场上最得人称许。

丕塞姆斯基（A. Pisemsky）（1810 年生，1881 年死）是一个小说家；他除了几部小说，几篇喜剧外，最著名的是一部戏曲《悲惨运命》；这是描述农民生活的；即以托尔斯泰著名的农民剧本《黑暗之势力》与之相较，也不能超过他。

巴特金（A. A. Postyekhin）（1829 年生，1902 年死）也是一个小说家，同时做了许多剧本。他的喜剧《丁塞尔》（Tinsel），《割去的一片》（A Slice Cut-off），《悬缺》（A Vacant situation）及《混水》（In Muddy Water）都极难通过检察官的手中，第三剧则始终没有排演过。但已排演的，却都很得成功，且甚引起批评家的注意。《丁塞尔》一剧，尤可表现巴特金的才情。他还有一个兄弟尼古拉斯，也是一个戏剧家。

柏尔姆（A. I. Palm）（1823 年生，1885 年死）是一个老戏剧家。在一八四九年，因为与杜思退益夫斯基诸人一党的关系，被捕。此后，他的生活遂非常穷苦，直到五十岁后，才再从事于文学的活动。他的喜剧《老贵族》（The Old Nobleman）及

《我们的朋友尼克留至夫》（Our Friend Nekluzhev）是剧场里永久欢迎的作品。

蔡尼肖夫（I. E. Tchernyshov）是一个伶人，曾编过几篇剧本，很得时人的称许。梭罗委夫（N. Soloviov）是追步阿史特洛夫斯基的作家，但没有多大成就。此外还有察夫（Chaev），克利洛夫（Y. A. Krylov〔Alexandroa〕）诸人，因不大重要，不能详述于此。

阿史特洛夫斯基以后

自阿史特洛夫斯基死后，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剧场渐渐衰落下去。其衰落的原因颇多，一是检查官的无理干涉，二是剧场办事者常常无意识的把演剧时间缩短，三是剧场主任与演剧者经济的及道德的堕落，四是外国优伶与本国优伶的竞争。直至“海鸥剧场”成立，这种现象才有转机。“海鸥剧场”规模极大，以演柴霍甫（Tchekhov）的《海鸥》一剧得名。

柴霍甫与高尔基（Gorky）的戏剧，为这时所最欢迎者。稍后则安特列夫（Andereev）的象征剧，亦盛行一时。但这三人的文学工作，不仅限于戏曲，故于下几章里另述之，这里不提了。

第九章　民众小说家

民众小说

俄国文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派别，就是民众小说家（Folk-Novelists）。所谓“民众小说家”并不是“为”民众而著作的作家，乃是叙述民众生活的作家。他们所写的是俄国的农民，矿工，工厂工人，穷苦的流荡人，以及农村，小镇的景色。在西欧各国，这种文字不多见；西欧的作家，虽然也有描写到这些被压迫者，但多半是书中的陪角，而不是主人翁。俄国则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此种作家极多，且都是专门描写这些民众的。他们的著作，也甚为读者社会所欢迎，他们是真确的写实主义者；他们表现出人生的真相，一举一动都赤裸裸的描写出来，毫不加以理想化。

初期的作家

初期的民众小说家最重要的是格里各罗威契（Grigorovitch）

(1822年生，1899年死)；他有伟大的天才，批评家有时以之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龚察洛夫，阿史特洛夫斯基诸人并称。他的母亲是法国人，所受的教育也是法国的。他并不是专从事于文学的，同时并努力于绘画，在他最后的三十年间，且什么小说也不写，只把他的全力给了俄国画学会。但他的文学成绩却很大，在四十年代之初，他以著《擦机械者》一篇小说有名。这时，俄国的社会正受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知识阶级都趋向于社会运动。格里各罗威契也为这个新涨的热潮所卷。他很热诚的对于穷苦的被压迫者表同情。他到乡村里住过两年，在一八四六年遂发表他的第一部描写乡间生活的小说《乡村》(The Village)，以真挚写实的笔，写出乡间生活的黑暗与奴隶制度的恐怖。此书出时，当时的批评家倍林斯基(Bylinsky)立刻承认他是一个蕴有伟大力量的新作家。他的第二部小说《不幸的安东》(Anton the Unfortunate)也是描写乡村生活的，其效果之大，直等于美国史陀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当时的知识阶级的男女，没有一个人读了这本书不替不幸的安东流涕的，且对于农奴，没有一个人不很感动的换了一副好心肠的。在后八年间(1847年—1855年,)他又著了同样性质的几部书，如《渔夫》，《移民》，《农夫》，《流荡人》及《乡间之路》(The. Country Roads)等。至此，他突然的搁下笔来。以后的许多年间只写了两部小说及一本回忆录。许多批评家对于格里各罗威契的见解很不相同；有的以为他的作品是非常可赞美的，有的则以为他所写的农夫并不是真实的。屠格涅夫也以为他的描写似乎太冷淡。但无论如何，格里各罗威契的成绩总是很伟大的；他所写的农夫也很好，不过略有些理想化了。这实是初期民众小说家与以后民众作家不同的地方。

与格里各罗威契同派，且对于农奴解放运动也很尽力的民众

作家是麦可威契夫人——（Mme Marie Markovitch）；她著作时常用她的假名 Marko Vovtchok 。她是大俄人，但因嫁给小俄的作家麦可威契，所以她的第一部描写农民的小说集是用小俄文写的。(后来屠格涅夫把他们译成大俄文）但不久，她的著作又都直接用大俄文写。在现在看来，她的小说，似乎是太感伤了。然在当时则读者都带着热诚欢迎她，为她的所写的农妇流下同情之泪。且她的感动主义也不是十九世纪初叶的没有真情的感伤主义。她的著作里满含着同情，且富于诗的与民歌的趣味。她的人物，大概都是意造的，这是初期诸民众小说家的通病。但她的描写小俄乡间的背景与地方生活的色彩则极为真切。

这时，还有一个作家但尼里夫斯基（Danilevsky）（1829 年生，1890 年死)，也不能不提到。他是以历史小说的作者著名。他的三部长小说，《诺孚罗西耶的逃奴》，《归来的逃奴》，及《新的居民》，读的人极多。这三部小说都是描写那些新辟地的住民的生活；这些居民，大半是逃奴，没有得政府的允可而去耕种西南方的新得的自由土地。他的叙述都活泼而具同情。

中期的作家

格里各罗威契诸作家，虽然努力的从事于民众生活的描写，但他们的著作似乎是太理想化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描写穷苦阶级的生活应该用新的形式。到了后来才渐渐的有新的描写方法和新的风格成立。但这是一步步的发展起来，从格里各罗威契到“极端的写实主义者”勒谢尼加夫（Ryeschetnikov)，又到“写实的理想主义者”高尔基（Gorky)，民众小说的方式才臻完善之境。介于其间的几个中期的作家，其努力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柯可里夫（I. T. Kokorev）(1826 年生，1853 年死)，死得

很早，他做过几篇故事，叙写小工匠的生活，表面上还离不了感伤主义的色彩，但在实际上，则因他是生长在这个小工匠的群中之故，他的人物是活的人物，生活是内部的真实的生活。

丕塞姆斯基（A. Th. Pisemsky）（1820 年生，1881 年死）与巴托金（A. A. Potyekhin）（生于 1829 年）的民众小说，较之以上诸人，已显出很大的进步。他们也是戏曲家，在本书上一章里曾提到过。现在再略说一下。

丕塞姆斯基与屠格涅夫同时；有一个时期，批评家曾列之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诸人之林。他的文字有力而真切，他的小说《千人》（A Thousand Souls）在农奴解放运动时出版（1858 年），曾给读者以很深的印象。第二年即译为德文。当大反动及虚无党运动的时代，丕塞姆斯基却很悲观的写了一部《汹险的海》（The Unruly Sea），反抗少年一代的人。他在早年的时候，曾做过几篇描写农民生活的故事，又做了一篇写乡间生活的剧本，名《悲惨运命》。他的农民是真实的，已脱尽了格里各罗威契诸人的理想化的痕迹。

巴托金的主要著作是喜剧；本书上章已述过，但同时并著了几篇描写农民生活的剧本及民间情况的故事与小说。在这些作品里，最足以看出民众小说的变迁痕迹。巴托金初期的这些作品，还受流行的把农民理想化了的习气。到了第二期，因受六十年代写实主义的感化，态度竟完全变更。这时出现于他的作品里的农民是真实的农民。但他尚只能捉住农民生活的外部，至于农民的内部的灵魂的描写，则尚有待于后来者。

民俗的采访

自一八六一年农奴实行解放后，一切控诉农奴痛苦及主张人

民平等的作品已非需要。于是知识阶级进一步而采访民俗的运动，收集民歌，调查民间信仰与风俗。孔士坦丁大公爵（Constantine）为这个运动的主动者。此外还有许多人自动的步行全国，收拾一切材料。于是有许多报告出版。在这些报告里，富有文学趣味的也不少。如马开西摩夫（Maximov）之《北方之一年》，《西比利亚与苦工》，阿发那西夫（Afanasiev）的《俄国民间的传说》，谢里兹诺夫（Zheleznov）的《乌莱尔的歌萨克》，麦尼加夫（Melnikov）的《在森林中》，《山上》等等，都极受读者的欢迎。

在这个时候，理想化的民众小说，已成过去之物，新的民众小说家遂继之而起，以勒谢尼加夫为其最重要的代表。

勒谢尼加夫

勒谢尼加夫（Ryeshetnikov）（1841年生，1871年死）为“极端的写实主义者”（The ulta-realist）。他家境极穷，父亲是一个邮差。他的叔父把他带到一个城里。他极受他的虐待。十岁时，他把他送入一个教会学校，其受苦较在他叔父家时更甚。他逃走了，又被他们捉住，受了一顿毒打，因此住在医院二月。后来又第二次逃走，加入流丐团体。不久又被捉。他的叔父也是邮差。勒谢尼加夫常偷邮局里的报纸来读。后来因为他毁了一件公文，被捕到法庭里去，判决禁在僧院里二月。出僧院后，他通过地方学校的考试，成了一个书记。一个巡按到这个地方，很爱他，带他到圣彼得堡去。他在本乡已开始著作，这时继续的做许多东西投到各杂志里去，因此认识了尼克拉莎夫，把他的小说《波里宝夫塞》（Podlipovtsy）刊在《现代》杂志上。

勒谢尼加夫的著作，与一切人都不同，他有他自己的特质。

他的著作只有赤裸裸的“真实”；如一种的日记，毫不加以增饰。他的第二部小说《格鲁摩夫》（The Glumoffs）叙铁匠的生活，一点惊奇变动的事实都没有，只是平淡的无饰的表现出他们的阴惨的生活；读者竟渐渐的受感动，被一种失望捉住。他的《在众人中》叙他幼时的苦况，还有一部长小说，《何处是较好的地方》叙一个穷苦阶级的妇人求工作的困苦。

他的著作虽然缺乏形式，但在艺术上自有相当的价值。

列维托夫

列维托夫（Levitov）（1835 年，或 1842 年生，1877 年死），是勒谢尼加夫同时的很著名的民众小说作家。他所描写的是中俄南部的地域。他的生平很悲惨。他父亲是一个穷牧师。他十六岁时步行到莫斯科入大学。一八五八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政府流放于北方。后来被赦回莫斯科。他在都市的穷苦生活中，却时时想到幼时绿草无垠的家乡。他的《草原杂记》即描他家乡的生活。他以后还著几部描写城市生活的杂记，但都不如《草原杂记》之精美而富于诗趣。

乌斯潘司基

乌斯潘司基（Gleb Uspensky）（1840 年生，1902 年死）的著作，与上面所举的几个作家都不相同。他自成一派。他的作品可以说不是小说，但除了描写民众心理的地方以外，又具备一切小说的元素。他的最初的小说《毁灭》（Ruin）已有这种倾向。到了后来，竟完全侧重于民族描写。他的著作，开始时为一小说，后来则讨论一切问题，有如政论。这种政治言论与艺术的混

合物，虽然极不易动人，但在乌斯潘司基描来，则使大家读之，如读一部好小说，不肯半途释手。他的著名作品《土地之力》(The Power of the Soil) 即其代表。

同时代的作家

波美耶洛夫斯基（Pornyalovsky）（1835年生，1863年死）以描写当时教会学校的生活著名。他所写的，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实。他的作品以《菲力斯丁之幸福》，《摩洛托夫》（Molotov）及未完工的小说《兄妹》为最著，都含有博大的人道精神。可惜他死得太早（未满三十岁）。不能使他的天才成熟。

史拉托夫拉斯基（Zlatovrasky）（1845年生）自童年即熟知中俄农民的生活。他的作品以《村间的日常生活》及《基础》等为最著。

恼摩夫（Naumov）（1838年生）住在西比利亚西部很久。著了许多描写这个地方的乡间及矿中生活。当“到民间去”运动发生时，他的这些作品常被印为小册子分送各处。

柴沙定斯塞（Zasodimsky）（1843年生）的著作《草原的神秘》描写乡间略有知识的农民很成功。

彼得洛柏洛夫斯基（Petropavlovsky）（1857年生，1892年死）常以喀洛宁（Karonin）的假名写了不少东西。他的作品以《我的世界》为最著名。他又是一个诗人。

麦尔辛（L. Melshin）（1860年生）也是一个诗人，曾在西比利亚做过十二年的苦工。他的作品《放逐者的世界》，可与杜思退益夫斯基《死人之家的回忆》并肩。

尼弗杜夫（Nefedov）（1847年生，1902年死）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曾写过很多的关于工厂与乡村生活的杂记。

以上的诸作家，虽然没有什么大成绩，但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贡献却都很重要。有的且对于“理想的写实主义”很有影响。这个主义到了高尔基才得到伟大的成功。

高尔基

高尔基（Maxin Gorky）（1868年生）是许多民众小说家中的最伟大者。他的作品是民众小说中最完善的出产。他成功得极快。当他初次在一个高加索僻城的小报上登他的小说时，（1892年左右）文学界里还完全不知道他，但当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刊在科洛林科（Kololenko）主撰的一个杂志上时，竟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许多人都求知这个新作家的名字。原来高尔基是他的假名，他的真名是彼西科夫（A. Pyeshkov）。他的家境极穷。九岁时即失去父母，被养育在亲戚家里。甚受虐待。一天，他便逃走，到一个商船上做事。这时他才有十二岁。在这个船上，他第一次得读歌郭里的著作。后来他又做过烘面包者，侍役，卖苹果者，最后才在一个律师处当书记。一九〇〇年，他的小说集出版，初版在数日内即卖尽。他的文名挤于当时大作家科洛林科与柴霍甫之列，有的人且以之为托尔斯泰的后继者。西欧与美国也立刻便认识了这个作家，把他的作品译了许多过去。

高尔基之所以能得如此迅速、如此伟大的成功，我们只要一读他的小说便可以知道其原因。他的短篇如《二十六男与一女》如《我的伴侣》等等，使我们一读，情绪便立刻紧张起来，且立刻觉得惊奇不置，因为他已使我们见了从未见过的奇境与奇剧，如使我们久住城市的人登喜马拉耶最高峰，看云海与反映于雪峰之初阳；自然谁都会为之赞叹不已了！他所描写的男人与女人都不是英雄，而是流荡者与草屋的住民，与一切所谓下等的人。实

在的，在一切世界的文学上，像高尔基把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境地上，描写得如此新鲜如此特创，如此活泼有趣，把人类感情的变幻与竞斗，分析得如此动人，如此好法，恐怕没有第二个人。他实是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诗人。勒谢尼加夫的“极端写实主义”有许多地方是行不去的。艺术的作品本是个人的；无论如何，一个作家的同情，总会渗入他的作品里。高尔基虽为一个写实主义者，其描写的忠实不下于勒谢尼加夫，同时却知道把主要的人物理想化了；这是使他得伟大的成功主因。

他所爱的人物是“反抗者”，一个反抗社会而具有能力而坚强的意志的人。他的作品的呼声是反抗的呼声。俄国的作家，多带宗教的气息；他则把这个气息一扫而空，使我们直接与一切事物的真相打个照面。他自己置于强的方面；他绝叫生活的权利。这是他新辟的境地。当二十世纪最初，俄罗斯革命的乌云弥漫于天空时，高尔基的著作，实是夏雨之前的雷声。

他与柴霍甫及科洛林科相同，短篇的作品虽然大成功，长篇的小说却不能使人满意。他的这些作品，如《三人》等，结束时总太嫌气力薄弱。这是他才力短弱处，不能以瑜掩瑕的。

他的戏曲也很著名，《沉渊》（At the Bottom）尤足以使他成一个不朽的戏剧作家。

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高尔基也有参与。革命失败后，他逃到意大利去。自此以后，他的作品也与当时的颓唐的空气一样，不复见新鲜与强健的色彩。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告成，他回国后，其作品《童年》才又蕴着初期著作的热情与希望。

列宁诸人组织苏维埃劳农俄国，高尔基也很恳挚的与他们合作。现在正从事于《世界文学丛书》的刊行。

第十章　政论作家与讽刺作家

俄国的政论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是最黑暗最不自由的国家；人民几乎没有一切政治上的自由，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严厉的检查，政府可以随时禁止书籍及报章的印刷与发卖。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情况底下，俄国自然没有什么“政论”要言了。但是“压力愈大，反动愈烈，”这句话已成了一个公例。俄国的政府虽然竭尽他们的智能，以阻止人民的讨论政治，而当时的知识阶级却能避免了他们的干涉，寻出了许多新的沟渠，以流通他们的政治思想。当杂志上或报纸上要讨论一件禁止讨论的事，或发表一种必要被检查员反对的言论时，他们一定引用了特别的表面上似乎与所论的事实无关的成语，以传达他们的意旨，如屠格涅夫小说里的路丁或巴札洛甫所说的几句话，往往传达了不少的意思。但除了这种以隐语为表示的方法以外，他们流通政治思想的直接方法，也还有不少；第一是成立了许多文学会与哲学会，第二是在艺术评论与讽刺文里论政治思想，第三是在国外，尤其是在英国

与瑞士，组织关于政治的杂志。因此，虽然在那样黑暗，那样没有政治自治的俄国，政论作家却仍能继续不断的放射他们的光明。

西欧派与斯拉夫派

当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俄国的思想界，起了很激烈的互斗；各种的党派纷纷的树立起来。那时，报纸上关于政论与政治思想是决不能传播的。二三家半官式的报纸，虽然被允许发表这些言论，而其所发表的却都是绝无价值的。惟一的发表政谈的机会，是在私人交际的时候。于是这些“党派”的会集时，便是一般知识阶级的交换意见的时候。有许多人，如史担克慈契（Stankevitch）（1817 年生，1840 年死）等，虽然什么东西也没有写，而他们的人格的感化，对于同派的人却极有影响。

当时的思想分为两大派；代表两个哲学的和社会思想的主要潮流；一派是“西欧派”，一派是“斯拉夫派”。西欧派是赞颂西欧文化的；他们主张俄国在欧洲各国的大族中，并不是化外的国家。她必要经过如欧洲各国所已经过的发展程序，第一步是放奴，第二步改革现在的政治组织。俄国的固有好处，经此改革，不仅保存，且能向上发展。斯拉夫派的主张则与此不同。他们说，俄国有她自己的使命，有她自己的特性。她没有与西欧各国相同的历史与社会组织，所以不能跟了他们走。俄国的生活有三个基本的原素：一是希腊教会，二是皇帝的绝对权，三是人民。到了六十年代，大部分的“西欧派”都主张在西欧进化上所应受的痛苦，如资本主义之类，在俄国亦必要重现；他们是相信进化律的。同时，“西欧派”里少数的思想较高的人，如赫尔岑（Herzen），如周尼雪夫斯基（Tchernysheosky）等，他们的思想，

又与此不同。他们以为西欧近来工人与农夫所受的田主与资本家的痛苦，以及其他一切，都不是“历史上的必要”的。俄国可以不必重蹈他们的覆辙，且看了先进各国的榜样，知道取其利而避其害；可以发达工业，而不至丧失了善良的村间的土地公有制与农人的自治组织。斯拉夫派在这时候，思想的变化也与西欧派相同。他们最好的代表是阿克莎加夫兄弟（The two brothers Aksakov），克利亦夫斯基兄弟（Kireyevsky），及霍耶加夫（Homyakov）等。他们对于俄国的历史研究很有功绩；他们把俄国国家的历史法律与俄国人民的历史法律分别出来。他们打破以前卡伦辛的俄皇是古代传袭下来的意见，而以封建制度的学说代之。到了放奴以后，“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竟携手一堂，有一致的主张。最急进的社会主义的“西欧派”，如周尼雪夫斯基之流，赞成“斯拉夫派”保持俄国农民组织的主张，而最前进的“斯拉夫派”，对于“西欧派”宣传的“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也完全表示同情。此后，这两派遂不复起争端。至于后起的大斯拉夫主义者，则正做着帝国主义的迷梦。俄国思想界的冲突，已不是“西欧派”与“斯拉夫派”（国粹派），而是皇权与自由，资本主义与劳动主义，政权集中与乡村自治的思想的争斗了。

国外的政论作家赫尔岑

俄人在本国里既不能得政治的自由，遂有许多优秀的分子，被逼而离开俄国，他们不是到瑞士，便是到英国。至于德奥以及法国是不能容留他们的。他们居留于国外的，常组织言论机关，论本国政治，秘密或公开的输入俄国。但这种在国外出版的政论，在俄国有真正的影响的时期，仅有数年，这就是当赫尔岑出

版《钟》(The Bell) 的时候。

赫尔岑 (Herzen) (1812 年生, 1870 年死) 的家庭是莫斯科很有钱的人家。他父亲藏书极富, 都为十八世纪德法二国的哲学书。法国的百科字典家的思想, 给他的印象最深, 所以后来他虽为时代潮流所驱, 也去研究德国的玄学, 而法国的思想迄未弃去。他进了莫斯科大学研究物理学及数学。一八三〇年的法国革命如一道电光, 惊起了全欧的知识阶级。赫尔岑和他的一班少年友人如诗人奥格僚夫 (Ogaryav), 民歌的收集者柏莎克 (Dassek) 诸人常常通夜不睡的在那里讨论政治与社会的事件, 他们尤其喜欢的是法国的圣西门主义 (Saint Simonism)。他们当中的一个, 曾做了一首诗, 对于皇帝尼古拉一世, 有不敬的意思。这事被警务局听到了。他们便连夜的搜检青年的寓所, 把他们都捕了去。有的被放逐到西比利亚, 有的被罚充军役, 赫尔岑则被送到乌拉尔 (Uliods) 的一个小城, 羁留在那里六年。一八四〇年, 他被允许复回莫斯科。这时的莫斯科的青年是沉醉在黑智儿 (Hegel) 的玄学思想里, 如史坦克威慈 (Stankevitch) (1813 年生, 1840 年死), 如巴枯宁 (M. Balkunin) (1814 年生, 1876 年死) 都是这派青年的首领。赫尔岑也加入了这个研究, 但他并不变他对于法国百科字典家的崇信与对于法国革命原则的赞颂。一八四〇年的年底, 赫尔岑又被放逐到诺孚各洛 (Novgorod) 去。一八四二年被赦回莫斯科, 一八四七年遂离了俄罗斯, 永不回来。巴枯宁与奥格僚夫这时已在外国。赫尔岑游意大利后, 即到巴黎, 加入他的友人群中。这时正当一八四八年大革命之时; 他眼见全欧青年的热烈运动, 也眼见六月的巴黎恐怖日子。他的《六月》(June Days) 即描写当时的惊人的印象, 为俄国文学上的一篇很好的作品。

深刻的失望, 占据了赫尔岑的心上, 一切被革命所引起的热

情，及希望几乎蒸散净尽。可怕的反动蔓延于全欧，奥大利再行统治意大利与匈牙利，拿破仑三世进入巴黎，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被扫除得毫无踪影。赫尔岑于是对于西欧文明也失了望。他表示他的这个意思在他的《从海外》（From the Other Shore）一书里，这是一个失望的呼声，从诗人口中喊出的政治家的呼声。

隔了不久，赫尔岑与普鲁东（Proudhon）在巴黎办了一个报，名《人民之声》；这个报纸几乎一张都不能输入俄国。报纸的运命告终，赫尔岑也离了巴黎。他在瑞士享受自然的美赐。及他的母亲和他的儿子都死于破船之中，他便很悲伤的移居到伦敦去。他先办一个杂志，名《北极星》，立刻还在俄国引起很大的影响。除了政论以外，他在《北极星》上登过一部很好的回忆录：《过去的事件与过去的思想》，可算是一部诗的文学；屠格涅夫以它为极美丽，“是用泪，与血写下来的。”

《钟》不久继《北极星》而出版；赫尔岑的言论在俄国成了极大的权威。这时的俄国，政治稍见光明，每个人都谈论着时事。赫尔岑的文字，尤为时人所爱读，他们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内部的热情，与美丽的形式，差不多在政论里很不容易找到这种好文章。《钟》的销路，在俄国极为广大，即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他自己也是《钟》的一个定阅者。到了一八六三年，俄国的政局突然一变；波兰的独立，终止于血与绞架，而俄国的自由运动，也同时完全被阻。反动一起，赫尔岑的势力一落千丈，《钟》在俄国，读者也减至极少。赫尔岑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思想上的子与女，已穿了新的民主的与写实的衣服代他而起。一八七〇年，他死于巴黎，死时情况很孤寂。

赫尔岑在海外没有办报之时，常用依史康特（lskander）这个假名字在俄国杂志做文字。他还著了一部小说：《谁之罪》，这是在俄国思想发达史上必须举到的一部重要作品。《谁之罪》所

叙的是：一个穷苦的大学生，在一个将军家里当教员，与他的庶出女儿相恋爱，因娶了她，迁居到外边去。不久，他的一个同学忽然到那个地方来。这个同学与他的夫人，一天一天的亲热起来。他晓得了这个事实以后，心里感得异常的痛苦，因狂饮以消其愁。他的同学觉到这个悲剧的结果，心里大悔，遂离开他们，永不复至。但他与他夫人的爱情竟不能复炽。后来，他遂以酒终其生。这篇小说的英雄是李门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柏雀林的余裔，占柏雀林与屠格涅夫小说中诸英雄的中间地位。

其他国外的政论作家

诗人奥格僚夫（Ogaryov）（1813年生，1877年死）是赫尔岑的亲切的朋友，他的著作并不多。他是以他自身的人格来感化一切的。他的生平非常不幸，但他的朋友们受他的影响却极大。他是一个极端的爱自由者；在他离国以前，他把他的一万多个农奴都解放了，把所有的土地都赠给他们，他的一生，都在国外过着，且永保持着他少年时的平等与自由的理想。他的诗也是慈和而少激烈的反抗之音。

巴枯宁也是赫尔岑的挚友，他的一生都尽力在国际工人协会，在俄国文学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可言。但他私人的影响给与当代的大作家者却极大，连倍林斯基也受他的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模范的革命家，近代无治主义的创始者，可以说是全身都燃着熊熊的革命之火的。

拉洛夫（Peter Lavrov）（1823年生，1901年死）是一个哲学家与数学家。一八七四年，出版一个社会主义的杂志，《前进》。他的《近代思想史》与《历史的尺牍》（Historical Letters）使他得很大的声誉，后书对于当时青年尤有深切的影响。

尼古拉斯·屠格涅夫（Nicholas Turguenev）（1789 年生，1871 年死）是著名的政论作家。一八一八年，他在俄国发表了《赋税的原理》一书。对于放奴运动，他很努力，又是十二月党的一个重要党员。一八二五年，他到国外去，因此得免与他的朋友们同受刑难。他遂永留居于国外，大概都是住在巴黎。一八四七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一部大著作，名《俄罗斯人之俄罗斯》，很注意于放奴运动，同时又在《钟》上，做讨论这事的文字。

史达普涅克（Stepniek）（1852 年生，1897 年死）的著作都是用英文做的，后来又译成了俄文。他的小说《一个虚无党的事业》和他的一篇杂记《地下的俄罗斯》表现出他的丰富的天才和敏锐的思想。

周尼雪夫斯基与《现代》杂志

在俄国本地的最著名的政论作家是周尼雪夫斯基（Tchernyshevsky）（1828 年生，1889 年死），他的名字是和《现代》杂志分不开的。《现代》在放奴运动时代的威权与国外的赫尔岑主办的《钟》是不相上下的。

周尼雪夫斯基生于俄国东南部；一八四六年，进圣彼得堡大学的哲学部。他最初做哲学与文艺批评的论文；做了三部很重要的书，《艺术与现实在美学上的关系》，《歌郭里时代的杂记》，《莱辛（Lessing）与他的时代》。但他的主要工作乃在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二年那四年间在《现代》上做专论政治与经济的文字。他又译了米尔（Mill）的《经济学》，且以社会主义者的见解为它作注。一八六三年，周尼雪夫斯基被政府所捕；他在监狱中，做了一部极著名的小说：《怎样办呢?》在艺术方面，这部小说未免有些缺点，但他给于当时青年的影响却极为重大。他在

《怎样办呢?》里，指示出未来社会的组织方法。弗娅（Vera）洛甫霍夫（Lopukhov）私订婚约，背父母逃去。不久，他们的爱情冷淡了。弗娅又倾心于洛甫霍夫的朋友克莎诺夫（Kirsanov）。洛甫霍夫因假装自杀，离家到新大陆去。弗娅与克莎诺夫遂结了婚。过了几年，洛甫霍夫在美国又娶了一个夫人，和她一同回国。他与弗娅及克莎诺夫仍维持朋友的关系，共度他们的理想生活。周尼雪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把伪道德及家庭罪恶，一切打得粉碎，而另谋解决的方法，并显示出真正的“虚无主义者”是什么样子。无论是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的小说永没有像这部小说那样的被青年的热忱的欢迎的，它成了少年俄国的标语，它的思想到处宣传着。

一八六四年，周尼雪夫斯基被流放到西比利亚作苦工。一八八三年被释归来。但他的身体已经毁坏了。他还努力在译韦勃（Weber）的《世界史》，共译成了十二册。一八八九年，病死。

讽刺作家莎尔条加夫

因为俄国出版检查之严，讽刺文成了一种很好的流通政治思想的沟渠。如果我们要追溯十八世纪的讽刺文学，似乎太琐屑，现在，只举了一个近代讽刺作家的代表，莎尔条加夫（Saltykov）（1826 年生，1889 年死）。

莎尔条加夫常以他的假名谢特林（Schedrin）做文字。他的影响在俄国是很大的，不仅及到有新的思想者，而且及到一般的读者。他是俄国的最通俗的作家之一。他开始他的文学事业很早。一八四八年，他写了一部小说《复杂的事》（A Complicated Affair），叙一个穷苦的小官吏的梦想里，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那时二月革命正爆发不久，俄国的政府正在注意扑灭自由的萌

芽。莎尔条加夫因此遂被流放到东俄的一个小镇里，他在那里做了官吏，七年之后，他和一切官吏都已十分熟悉。一八五七年，俄国的政治稍见光明，他复回俄都；以他这许多年的经验，做了一部著名的作品，《吏治杂记》。这些杂记所给与读者的印象很深，全俄国都谈论着它。莎尔条加夫的天才在此完全的显露出来；它的体裁在俄国文学上开了一个新时代；模拟者纷纷而起。

一八六八年，他离了官职，去做一个月刊的主笔；在《现代》杂志停版以后，这个月刊是急进的民治思想的代表。一八八四年这个月刊停版，莎尔条加夫的身体也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一八八九年，遂病死。

除了《吏治杂记》以外，莎尔条加夫还有许多著作。《无辜的故事》（Innocent Tales）叙奴制的许多最悲惨的事实。奴制解放以后，农民又苦于租税，莎尔条加夫对此写了不少讽刺的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圣彼得堡的日记》等等，都是归于这一类的。最后，在八十年代的初叶，亚历山大三世的压迫如重厚的黑云弥漫于清空的碧天，莎尔条加夫的讽刺，遂变为失望的哀呼。他的《给我姨母的信》是这时最好的代表作品。

第十一章　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的地位

文艺评论是俄国运输政治思想的一条河流，在上章里已经提过。文艺评论在俄国的地位的重要是无论何国都不能与之并肩的。每一种月刊，或其他报章，他的真灵魂就是艺术批评家。他的文字比同册里所刊的名家小说重要得多。一个领袖杂志社中的批评家，就是一大部分青年的知识的领袖。现在在下面举出几个重要的批评家；他们对于当时的青年运动和知识生活都曾有过极大乃至极深极广的影响的。

倍林斯基以前

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俄国的文艺批评才开幕；他们对于西欧的一切旧说陈义，毫不模仿。当时伪古典主义已被打破，普希金的《路丝兰与陆美娣》方才出现，于是诗人范尼委丁诺夫(Venevitinov)(1805 年生，1827 年死)，及那台兹定(Nadezhdin)

(1804 年生，1856 年死)，柏烈怀(Poielvoy)(1796 年生，1846 年死)，便乘机出而建设新的文艺评论的基础。他们主张，文艺评论不仅须分析一个艺术品的美学的价值，且须超乎一切，分析它的主要思想——它的“哲学的”——它的社会意义。范尼委丁诺夫他自己的诗，印着很高深的哲思；他勇敢的攻击俄国浪漫作家的缺乏高尚思想，他说，“无论何国的真诗人，必为到达文化的极巅的哲学家。”

那台兹定跟了范尼委丁诺夫同路走去，他勇敢的攻击普希金没有高尚的灵感，只能产生以“酒与妇人”为唯一动机的一种诗歌。柏烈怀也责备普希金与歌郭里的作品没有超绝的思想，不能引人趋向于高尚的思路与动作，决不能与莎士比亚，歌德诸人的不朽的创作相并立。然这两位攻击普希金与歌郭里的批评家，这样注全神去责备这些创始的国民文学家，却忘了他们曾引进了写实主义与其他赐品给俄国文学的伟大功绩。到了倍林斯基起来后，才补全他们的主张，指示出批评的真正标准。

倍林斯基

倍林斯基（Bylinsky）（1810 年生，1848 年死）不仅是一个文艺批评家，而且是俄国的青年的导师，当时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教训者。

他的父亲是一个穷苦的军医，他期望他儿子很切，所以努力把倍林斯基送到圣彼得堡大学肄业。一八三二年，倍林斯基因为仿佼西劳（Schiller）的《盗》的风格，做了一篇悲剧，激烈的攻击奴隶制度，竟被大学当事者斥退。他立刻便加入赫尔岑诸人的团体中。

自从一八三一年，他即开始执笔作许多短的文学评论，但他

言论之引起社会注意，却在一八三四年发表的一篇批评文学的文字时。从那时起，直到他的死，他的全副精神都注射在为各杂志做批评论文及传记。他的过度的工作使他在三十八岁时便患肺病死了，但他的死并不嫌过早。那时西欧的革命已经爆发，俄国政府息息监视着倍林斯基。当他在死榻上时，警察还不时的来惊扰他。如果他那时不死，他的运命也是非受监囚即被放逐。

倍林斯基的见解，变迁得很利害。当他初次动笔做批评文字时，他所受的是德国理想派哲学的影响。他主张艺术是高尚纯洁的东西，不能用来讨论当时的问题的。艺术所论的是全宇宙的大问题，决不是论什么穷苦人与他们的琐事的。这时所抱的是唯美的观念。他有许多篇论普希金的文字，都是抱这种见解。

到了后来，他又受了赫尔岑的影响，思想为之大变。他冲出德国玄学的迷雾，开始他的新活动。歌郭里最好的写实主义的作品恰巧在这时出现。倍林斯基因此更得了一个新的印象。他便主张：真的诗就是现实。同时，他又受了法国那时政治运动的影响，于政治观念上也印上了急进派的气象。

他的文字蕴蓄着美与热情，读者都深深的受他的感动。他以他的同情，他的诚恳的精神，与一切不忠实的，骄傲的，奴隶主义的文学作品与政治思想宣战；一方面成了最有影响的文艺批评家，一方面成了一个最好的政论作家。以后俄国的为人生的艺术的思潮的磅礴，他也可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鼓动者。

他最后做一篇《一八四七年文学批评》更显得美丽而且深切。可惜他的生命太短了，不能更有所述作。

与倍林斯基同时的文艺批评者还有不少，现在只举较为重要者数人，述之如下：

梅　加　夫

梅加夫（Valerian Maykov）（1823年生，1847年死）的批评主张与倍林斯基是在一条线上的。他的批评天才很伟大，不幸死得太早了，不能继倍林斯基的事业。其真能发挥光大倍林斯基未竟之工作者乃是周尼雪夫斯基与杜薄洛留薄夫二人。

周尼雪夫斯基

周尼雪夫斯基（Tchernyshevsky）的艺术主要观念，就是说，艺术自己不是目的；人生是超于艺术的；艺术的目的就在解释人生，批评人生，对于人生表白一种意见。他把他的这些意见在他著名的《艺术与现实在美学上的关系》一书里讨论得很痛切。他辟开一切流行的美学原理，而确定下他的写实主义的“美”的定义。他说，“美”所引起的感觉是一种快乐的感情，如同我们在一个亲爱者之前所引起的一样。所以“美”的里面，必含有与我们很亲切的东西，而这种亲切的东西就是人生。他的结论就是：艺术的美决不是超于人生的美的，不过是艺术家从人生美中借来的一种美的概念而已。所以艺术的目的，与科学是一样的——虽然它的活动的工具不同。艺术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我们记起人生中有趣味的事，教导我们人是怎样生活着，及他们应该怎样生活着。周尼雪夫斯基的这种见解，到了杜薄洛留薄夫，讨论得更为完密。

杜薄洛留薄夫

杜薄洛留薄夫（Dobrolubov）（1836年生，1861年死）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的最初教育是在教会学校里受的。一八五三年，他进了圣彼得堡的师范学校。第二年，他的父母相继而死，他不得不负养育弟妹的责任。因此他遂于校课之外，兼做教书与翻译的工作。这种三重的过度苦作，使他的康健很早的就衰颓下去。一八五五年时，他认识了周尼雪夫斯基。一八五七年，他从学校里毕业出来，即在《现代》杂志社里做批评的工作。这时，他仍是十分热忱的做事。四年以后，即在一八六一年的十一月，他竟因工作过度而死，年仅二十五岁。他的批评论文共有四册；其中如《黑暗之国》，《一线之光》，《何谓阿蒲洛摩夫气质?》，《真正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来?》等篇，尤给当时青年以深刻的影响与灵感。

杜薄洛留薄夫的伟大，不在他的批评主张，而在于他的纯洁坚定的伟大的人格。他是屠格涅夫在五十年代之末所见的“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新人的最好的代表。所有他的文字，都使人感到一种道德的观念；他的人格强烈的与读者的心接触着。他批评一切的事物都先问“他们对于劳动阶级有什么用处呢?”或是“他们将怎样帮助造成那种目光注着这条路上的人呢?”他对于职业的美学很看不起，但对于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却很喜欢。他并不责备普希金与歌郭里；他并不劝人以预定的目的去做诗或小说；他知道作者如果不彻底知道他所描写的人生，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从最深挚的理想中出来，他的作品一定是不会好的。所以他对于一件艺术作品，只问它是不是正确的反映着人生。如果不是，他便不去讨论它，如果是真正的表现出人生，那么，他便做

文字讨论这种人生；而他的论文乃是关于道德政治或经济的艺术的作品不过供给一种事实做他讨论的材料罢了。

皮莎里夫

皮莎里夫（Pisarev）（1841 年生，1868 年死）是继杜薄洛留薄夫而起的一个批评家。他的境遇与杜薄洛留薄夫却完全不同。他生在富家里，他不知穷苦为何物。但他不久便觉悟这种生活的不对；当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时，不去住在他叔父的壮丽的屋里，却去和穷苦的同学或许多人偕住；在他们的喧哗的讨论与歌声中写他的文章。他也和杜薄洛留薄夫一样，非常刻苦用工。一八六三年时，反动方开始；他允许他同伴在秘密印刷所里，把他一篇论反动政治的小册子印刷出来。他因此被政府捕去，监禁了四年。在狱中，他做了许多著名的文章。出狱时，他的康健已经毁坏了。一八六八年夏天，因在海边沐浴，溺死在海里。

皮莎里夫对于俄国青年的影响，并不下于倍林斯基，周尼雪夫斯基及杜薄洛留薄夫诸人。他的批评主张可以略述于下。他的理想是“有思想的写实主义者”——即屠格涅夫所写的巴札洛甫一类人。他赞成巴札洛甫的艺术的意见，同时又主张俄国的艺术，至少要达到歌德，海涅诸人所达到的程度。如果常常谈到艺术的人，却不能产生什么达到艺术的作品，那么，他们还不如用他们的力量去从事别的能达到的地方去吧。对于伦理的观念他完全和虚无主义者巴札洛甫一致，除了他自己的理性以外决不屈伏于其他一切威权之前。他想目前最重要的事，就在造成那彻底的受科学教育的写实主义者，他是能够打破一切古代的习俗与错误，而以一个写实主义者坚固的常识来观察人生，来著作的。皮莎里夫自己对于自然科学也有些供献；在他的《动植物世界的进

步》一书里把达尔文主义阐发得很详尽。

其　他

美海洛夫斯基（Mihailovsky）（1842年生，1904年死）是七十年代的领袖批评家。他是以哲学的思想，来做文学批评的标准的。这个时候，英国斯宾赛（Spencer）的思想，在俄国发生很大的影响，美海洛夫斯基从人种学的立足点上，把他的学说分析一下，显出他的弱点，做了一部《进步的原理》；这部书在西欧是很著名的。他的重要论文，如《个人主义英雄与群众》，《快乐论》也有同样的价值。在他的《托尔斯泰的左手与右手》的几节里，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他的主张来。但他的文学批评在当时的影响，却远不如倍林斯基。

此外还有几个批评家，应在此举出他们的名字。

斯卡皮柴夫斯基（Skabitchevsky）（1838年生）曾做了一部很优美很有用的近代俄国文学史。文格洛夫（Vengurov）也曾做了关于俄国近代文学的几部著作。阿森尼夫（Arseniev）（1837年生）曾做了一部《批评的研究》（1888年出版），其中讲到不大著名的诗人及新进作家的地方是很有趣味的。历史小说家柏烈怀（P. Polevoy）（1839年生，1903年死）曾做了一部通俗而很有价值的《俄国文学史》。格里各里夫（A. Grigoriv）（1822年生，1864年死），是斯拉夫派中的著名而有天才的批评家，他主张“唯美”的艺术观，反对艺术的应用主义，但没有大成功。

特鲁士宁（Druzhinin）（1824年生，1864年死）及阿加南夫（P. V. Annenkov）（1812年生，1887年死）二人的批评著作也很有价值，但此地不能详述。

托尔斯泰的《艺术论》是俄国为人生的艺术观的集大成的著

作；他以宗教为艺术的骨子，以宣传他的教旨，为艺术的目的。这似乎已与倍林斯基他们的言论有些不同。因为他的艺术观，我们知道的很多，且他主要的《艺术论》已有中文的译本，故这里不多说什么。

第十二章　柴霍甫与安特列夫

自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龚察洛夫及杜恩托益夫斯基以后，俄国继续的产生了不少的小说家与戏剧家，而其中以高尔基，柴霍甫（Tchekhov）及安特列夫（Andreev）为最伟大。高尔基在本书第九章里已经叙述过，本章只说柴霍甫及安特列夫二人。他们二人都是笼罩在近代的人生的灰色雾中的。

柴　霍　甫

柴霍甫（A. P. Tchekhov）（1860 年生，1904 年死）是一个戏剧家，一个短篇小说家；他的戏曲，在俄国可算是阿史特洛夫斯基以后的最伟大的，他的短篇小说，尤为感动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曾有译本；人称他为俄国的莫泊桑（Guy de Maupossant）。

柴霍甫生于一八六〇年，他的生地是南俄；他的父亲原是一个奴隶，后来自赎出来。他自己没有受什么教育，但他对于柴霍甫的教育却非常关心；起初送他到本地的一个学校；后来送他到莫斯科大学。柴霍甫在大学所研究的是医学。为什么要选读这一科的原因，他后来已经不记得，但医学对于他却未尝无帮助。在

他许多著作里，医生大概都占有一个地位。他的对于人生的观察，也几乎和医生之观察病人一样细密而且详尽。他后来并不做医生，但他在莫斯科附近一个小镇的医院里做了一年事，以及后来与此相类的生活，竟使他与广漠的人海有了很亲近的接触；无论男子妇人，无论哪一种的人，无论哪一种性格的人，他都很注意的观察过。这是与他后来的文学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的。

柴霍甫的文学工作，开始得很早。在一八七九年时，他刚进大学第一年，即已用一个假名执笔为几个周刊作短篇的滑稽小说。他的天才发展得极快。他的第一短篇小说集付印时，即已得许多人的赞许；因此鼓励起这个少年小说家更努力的工作的兴趣。他所叙述的人生问题几乎一年年的更为深刻，更为复杂；他的风格，他的文字，也渐渐的达到艺术的完整之境。柴霍甫死得很早，死时仅有四十四岁，而他的天才则已完全成熟。他的最后所作的戏曲，尤充满了诗的美；如果他不早死，他的创作，又是要开一新页的。

柴霍甫叙写人类天性在我们现代文明里的失败，尤其是叙写知识阶级在日常生活面前的失败与破产，其所得之成绩，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这种知识阶级的失败，他用异常的力量与深刻的描写表现出来。他的天才的特质即在于此。

我们如果以纪年的方法来读柴霍甫的短篇小说，便可以看出他思想与人生观的变异之痕迹。最初，我们看他初期的作品，它们都是充满了活泼的与青年的滑稽的。这些小说，都是极短的，有的仅有三四页。而它们却都能使读者发笑到腰酸，后来，渐渐的，在同样的笑颜之中，却无心的加入悲郁的病魔，我们可以读出作者的心的悲泣来。再后来，渐渐的，这种悲观的情调，更常更常的表现出来，更常更常的为人所注意；它已不是偶然的无心的黏附在里面，而竟成了一种血液，几乎每篇小说，每篇戏曲都

流注到，而为他们的惟一的生命了。

柴霍甫所写的英雄并不是没有听到高尚言语，感觉到高尚理想的人，乃是听到过这种话，而且他们的心房，也曾为这些话的语声所激动过的。但平常的每日生活吸去一切这种灵感，它们只剩了在无希望的卑鄙中的一线偶然的生存。这种卑鄙，在柴霍甫笔下所表现的，最初是失了自信力，后来渐渐的失了一切光明的希望与幻想，然后，一步步的，毁断了人生的每条丝弦，一切希望，一切心，一切力。

讲到柴霍甫的文字，托尔斯泰曾有一句很深刻的话，他说，柴霍甫是那些最少数的作家之一，他们的小说是使人愿意再读几次的。这是实在的。柴霍甫的任一篇小说，任一篇戏曲，都使读者生出不易拭灭的印象；我们重读的时候，且更生出一种新的愉快。他实是一个极伟大的艺术家，一切人出现于他小说中的，虽然是范围十分的广大，类别十分的复杂，而个个人却都是真实的，个个人的心理且分析到微妙而无可赞一辞。且他的个性与特性，在每篇小说都印下极深的痕迹，使读者一看，即知作者是谁。

柴霍甫和高尔基一样，不长于做长篇小说。他永不曾做过什么长的小说。他的著作范围是戏曲与短篇小说。他所叙述不是人的一生、不是从生写到入墓地，而是从生活里取出一个短时间，取出一小幕的人生的戏来写。而在此极短的时间，极短的一小幕戏里，却表现出极复杂的心理的剧情——一个相互关系的世界来。

柴霍甫曾写了几篇描写农民的小说；但农民与乡间生活并不是他最适宜的描写对象。他的真确地域乃在“知识阶级”的世界。他知道他们的一切事情。这些知识阶级，很清楚的看出俄国生活的黑暗方面，但却没有力量加入少年之群里去反抗专制与压

迫。他们意志的薄弱与能力的不充足，在在都足以看出。即柴霍甫自己，恐亦染有此病。——这实是时代病，柴霍甫时代的知识阶级的病症。柴霍甫之作品不过是这些时代病的反映而已。但虽然如此，柴霍甫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他的笑诚然是含泪的微笑，而他同时却相信着将来的光明，将来的更好的日子。在他的戏剧，《依文诺夫》，《万尼亚舅夫》，及《樱桃园》里曾完全表现出他的这种热忱的想望。古旧的樱桃树，被铁斧丁丁的斫伐着，旧的人凄惨而至于悲泣，而新的人却喜悦着，他们相信着新的园林，新的环境，新的希望与新的幸福。

他还有许多剧本，如《海鸥三姊妹》等，都是很伟大的作品，无论在舞台上表演出来，或拿在手里读，都是能同样的感动人的。

柴霍甫的影响，不仅在俄国，且在全世界。他使短篇小说重要，他是文学形式的一个改革者。在俄国已有一大群模仿他的人；但是他们有和他同样的丰富的诗意，同样的可爱的描述，同样的在泪中微笑的美么？——这些特质是与柴霍甫的人格不能分离的。

无论在哪里，他的作品的读者总是非常多。在英国，他的短篇小说和戏剧，差不多都已陆续译出；在德国，在意大利，热烈欢迎他的人尤多。

安特列夫

安特列夫（Leonid Andreev）（1871 年生，1919 年死）少时极为贫苦。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衣食常常不足。大学毕业后，专心于绘画，想做一个著名的画师；但结果却是失败。后来又改做律师，也以性质之不相宜，不能有什么成功。直到一八九七年的

时候，他才舍弃别的企图，开始写他的文学作品。他的第一篇制作，名《白拉格摩与格兰斯加》（Bragamot and Garaska），发表后，立刻得高尔基热烈的称许。这时的高尔基正是最受一般人崇拜的时候，所以他的这个称许，却给安特列夫以极大的帮忙，使他的名字立即播于广大的读者社会里。自此以后，安特列夫才从灰色的水里走到光明的岸上来。过了不久，他又做了第二篇小说，在《生命》杂志上发表；当时的著名批评家美列兹加夫斯基立刻跑到这个杂志的编辑者处，问这篇东西到底是柴霍甫或是高尔基做的。

安特列夫自己说，他是很受托尔斯泰的影响的。对于尼采（Nietzsche）的著作，他也很热心；尼采的《柴拉曹斯特拉如此说》，他曾把它译为俄文。他对于阿伦·坡（Allan Poe）也很注意。而为他最大的教师的乃是《圣经》。

他的名字，很快的便喧传于国际间。自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为俄国少年文坛的中心的，已不是革命作家高尔基，而是这新起的带着灰色的失望之心的安特列夫。同时，他的灰色的作品也热烈的为英国，德国，法国等读者社会所欢迎。

安特列夫所写的一个英雄，曾在一个地方说道："我经过许多城市，许多土地，没有地方曾看见过一个自由人。我所见的只是奴隶。我曾见过他们住的笼子，曾见过他们生在上面，死在上面的床；曾看见他们的憎与爱，他们的罪恶与善行……而我所见的，总之都是盖着愚呆与疯狂的印子的……在一片美丽之地的花群中，耸立着一所疯人院。"

这些话可以当做安特列夫许多著作的标语。安特列夫质问着我们人生的根本问题；而所得到的，或所看到的答案，总隐隐的写着"疯狂与恐怖"几个字。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动作，哪一件是有价值的？安特列夫寻问的结果，使他自己凄然的低泣

了。高尔基的强烈的生的呼声已不见，柴霍甫的含泪的微笑也泯迹了，所存的只是无望的低泣声。虽然于失望的低泣的灰烬中，未尝没有一星的希望的火焰，然而这种微弱的火星，是决不能蔓延而成熊熊的火炬的。

安特列夫自己说："几千的生命现在我们灵魂里……每个生命说它自己的话。"实在的，我们看着他的作品，正如听着每个生命在诉说。

他的《红笑》，《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忏悔》，及《比利时的悲哀》都是叙写战争的罪恶的。他经过日俄战争，经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欧洲大战；他的灵魂里便现着几千万战场的壮者，居家的妇女，与战争时代的一般受害的人；他们各在他的作品里向人类诉说着。

战争是最可怕最痛苦的人类行动。几千万的壮年，离了和平美丽的家庭，被迫去战争，去杀和他同样的人。他们肉体上的苦，如受饿，中伤及死亡，还是次一等的痛苦；最可怕的却是他们精神上的悲苦。许多人因此自杀，许多人因此发疯。我们只要一读《红笑》，它的主人翁所受的何等悲惨的痛苦呀！

在家庭的妇孺与其他的人，所受的战争的苦，也不下于在战场上的人——也许比在战场上的人还甚些。他们的流离迁徙，他们的思念征人，他们的恐怖幻想，一切心灵上的苦楚，都比之肉体上受苦者难忍受至几倍以上。我们看《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忏悔》（小说）和《比利时的悲哀》（戏曲），看他们所诉说的是怎样的苦呀！

他的《到星中》和《人的一生》两篇剧本，都是叩问人生的意义的；而叩问的结果却是失望与悲哀。《到星中》对于人生的意义，根本否认；就宇宙中讲，每一秒中有一星球要毁灭，人生又算得什么呢？《人的一生》对于人生的意义，根本悲观；人生

是一支蜡烛，生时蜡烛便亮着，膏油用尽后，蜡烛便熄灭了。从无物到无物的一条过路，中间经过一个光亮的舞台罢了，恋爱是空幻的，事业是空幻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蓝沙勒司》一篇是叙述人对于“死”的恐怖，《七个绞死者》一篇是叙述各个生命对于在“死”之面前的态度。他们各诉说出他们的思想和对于人生的情感。

《海洋》（小说），《爱那西姆》（剧本）及其最后的著作《魔鬼的日记》，则都是叩问人类本性的善恶的。

其他如《墙》，如《思想》，如《黑面具》，如《深渊》，如《雾中》之类，也都是近代人的忧闷与生活的。

他的作品如一面无限大的具有魔力的镜，把一切人类——不仅是俄国人——的心底的纠纷与烦闷，和他们的生活的暗澹与苦痛都清晰的反映出来；又如一具无限大的留声机，什么人的诉说，它都能明白正确的复述出来，即他们的声音和语调，也丝毫没有变异。他的描写的艺术诚然是惊人的伟大和精妙。

他虽然自己说是受托尔斯泰诸人的影响，而他的思想和著作的情调却完全是新的，是创造的。他的后来的许多作品大概都是象征主义的产儿，而同时却没有失了俄国的写实主义的精神。他的“心理解剖”极为精密，而又是新的，创造的，不蹈入杜思退益夫斯基的范围的。

他的悲观和失望，使他的作品带了极浓厚的灰色，同时却又蕴蓄着博大的人道精神。

他是从残酷的人生悲剧里见到人道之光的，是从反对消极一方面写出人道之声的，所以见得最为真切，写得最为沉痛，且能感人深远。

第十三章　迦尔洵与其他

近代的俄国文学，可算是已达绚烂光华之巅，作家之众多，与他们成绩之伟大，差不多没有哪一国可以与之比肩的。高尔基，柴霍甫与安特列夫在上面已经提起，现在且略举二十几个与他们同时代的最重要的作家，在下面作一简括的叙述。如果要详细的讲他们，恐怕即以本书全部的篇幅也不能容载得下。

迦　尔　洵

迦尔洵（V.L.Garshin）（1855 年生，1888 年死）的生地在俄国的南部。少的时候即有狂疾。他的文学著作是因战争而始着笔的。当一八七六年的时候，俄国和土耳其开战。他天天看见报纸上载着死伤的人数，心里非常悲悼，便投身到军队里去，想分受他们的痛苦。他的《懦夫》一篇即描写他当时的心理的。他在战场中伤了腿部，因此回家。他的神经益失常度。他的《四天》即他这时回想炮火中的恐怖而写的。这是一篇极伟大的非战的小说；安特列夫的著名的《红笑》，显然是受他的感化而作的。他的《目兵伊文诺夫日记》也是描写战争的可怕的。一八七八年，

他因为有一个友人受死刑，自己不能营救，狂病因之大发，住在狂人院中很久。一八八七年；他乘着护人的不备，从楼上跳下，受了重伤，第二年，死在医院，年仅三十三岁。《红花》是他最后的著作，描写狂人心理极真切，可以供心理学家的研究，文字上也具有惊恐的美。他的作品不多：只有二十多篇短篇小说，但他的伟大却并不在作品的多少。

科洛林科

科洛林科（Korolenko）（1853 年生，1920 年死）的生年略前于迦尔洵，他的生地在西俄。一八七二年，他在莫斯科的农业学校里读书，因为参预学生运动，被学校斥退。后来，他又以“政治犯”被捕，被流放于西比利亚。至一八八六年，他才被赦回来。西比利亚使他的文学天才孕蓄至于成熟；他的《马加尔的梦》发表后，立刻引起许多人的称许，立刻被承认为屠格涅夫的一个真的后继者。他的这篇文章，在描写上，在结构上，在在都表现出完善的艺术的美来。此后，继续发表的《林语》，《恶伴侣》，《森林》，《盲乐师》也都是伟大而且精美的作品。

波塔宾加

波塔宾加（Potapenko）（1856 年生）是科洛林科的同乡。科洛林科的作品很少，波塔宾加则是一个文艺圈里的多产者。他最初入一个宗教大学，想做一个教士。后又改进普通大学。最后，又厌弃大学的教育，而进一个音乐学校。他所作的文学，都带些滑稽的语调。当时的人曾称许他，以为他必能嗣歌郭里之风，复振小俄的诙谐而带悲感的文学，但他因天才所资，终不能副他们

的愿望。他的《神圣的艺术》,《将军之女》,《君的书记》及《实际的职务》等数篇，在他的许多作品里算是最好的。

波波里金

波波里金（Boborykin）（1836年生，1921年死）是描写三十年来的俄国知识阶级生活的小说家。他的艺术常是精粹的；他的观察常是正确的。他的小说常可以当做某时代的俄国知识阶级的思潮的真切而好的图画。在俄国思想史上，他们是极有价值的。他的作品最著的有《经纪人》,《山顶》等。

奥特尔

奥特尔（Oertel）（1855年生，1908年死）生在俄国草原的边境，后来进了圣彼得堡大学。因为参预于学生运动，被学校斥退。他动手做文学作品时，所做的是短篇杂记；后来集为两册，名《一个草原人的杂记》，体载与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相同。他的小说。《两对》(Two Couples)，描写两对恋爱者的事，显然受有托尔斯泰的影响。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变动的护卫》(Changing Guard)。

美列兹加夫斯基

美列兹加夫斯基（Dmitriy Merezhkovsky）（1866年生）是一个多方面的作家，他是诗人，小说家，批评家。我们离开他的诗不说，只看他的小说及批评论文，便知美列兹加夫斯基对于俄国前代作家和批评家所执持的为社会的更高理想，为人类的更好

生活而著作的主张，已渐渐的生了疑问，最后，且至明白的攻击他们了。美列兹加夫斯基是拥护个人的权利的，是信奉尼采之说的。同时，他对于“美”，对于“美的崇拜”且益益的热心起来。

美列兹加夫斯基的主要著作，说起来很有趣味。他开始做了一部三连的小说，想表现古代异教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的冲突：一方面是希腊的爱恋与诗的宇宙观，肉的康健的生活的崇拜；一方面是崇灵屈肉的基督教义，反对诗与艺术与快乐与自然与康健的生活。这三连小说的第一部名《背教者求连》（Julin the Apostate），第二部名《文西》（Leonardo de Vinci），他们都是仔细研究古代希腊与文艺复兴的生活的结果；虽然未免有些缺乏真挚之情的地方，而美的真切的地方却极多，而他的根本思想尤足以使读者生深刻的印象。

美列兹加夫斯基的古代“自然主义”的赞美，可惜不能坚持到底。当他的三连小说的第三部，《彼得与阿里克赛斯》还未下手写时，近代的象征主义与神秘主义已开始侵袭到他作品的内部了。

美列兹加夫斯基的批评论文，好的极多，尤其著名的是《托尔斯泰与杜思托益夫斯基》一书。

系 比 丝

系比丝（Zinaida Nicolayevna Hippius）（1867年生）是美列兹加夫斯基的夫人，也是他有力的助手。系比丝是她未嫁时的名字。九十年代时，她才开始做文学著作。她的作品，重要的有《绿圈》（剧本），《新人民》（小说）及《恶魔的傀儡》等。

系比丝与巴尔芒（Balmont）相同，都是新起的颓废派作家。她爱美，爱一切忧悒的空幻的事物。她说，“我是我的奇异而神

秘的词句的奴隶。”

一九〇三年，她主持文学哲学的月刊《新路》，介绍法国英国的唯美派文学，宣传西欧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很有影响。惜这个杂志寿命不长，第二年便夭亡了。

巴　尔　芒

巴尔芒（K.D.Balmont）（1867年生）初入文坛的时候，也是一个近代的颓废派；到了后来，他的作风又渐渐的改了，成为俄国近代的最伟大的诗人，抒情诗之王。他的诗集有四册，《让我们像太阳》，《火烧着的房屋》，《在北方天空之下》及《只有爱》。

他也曾作短篇小说及儿歌；又通各国语言，曾译雪莱（Shelley）全集及惠特曼《草叶集》之大部分，易卜生的几种剧本，以及印度的传说，波兰诗人斯洛圭奇的诗等。他也曾做政治诗，但做得不大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败后，他便出国，住在巴黎等处。

梭 洛 古 勃

梭洛古勃（F.Sologub）（1863年生）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小说家。他是崇拜“美”的，而他的伟大，却在一切同时同派的作家以上。他是一个梦想者，而他的梦却较真际生活为更坏。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他的悲观较一切人为更彻底。他幻想，他幻想“无生”之乐；同时，他诅咒生，甚且诅咒及做着更好的生的梦者。对于一切事，他愤慨，他叹息，而他的愤慨与叹息是绝望的。

他的重要作品很多，以《小鬼》，《创造的故事》，《比毒药更甜美》等为最著。他的短篇小说和抒情诗也是极秀美而带着隐微的悲哀的。

卜留沙夫

卜留沙夫（V.Bryusov）（1873年生）是诗人，小说家与批评家。在十九年代时，他以极端的颓废派的诗著名，不久，他的热情冷了，他的作风又一变。他从一个热烈的颓废者变成一个无热情的观察者；他变成石了。大概他的后期的作品都是把近代人的感情捉进古典的纯洁与古典的完美的文句中的。他是第一个人，把近代城市的生活用诗的叙述写在纸上。他的诗集共有七册。

科布林

科布林（Kuprin）（1870年生），他是在许多近代的作家中，对于人生最肯定的一个人。他满蓄着希望，满蓄着乐观。他最初在陆军里服役，退职后，专致力于文学，以短篇小说作家著名。

他的短篇小说，最著的有《马盗》，《泥沼》，《生命之河》，《贺筵》，《皇帝之公园》等。《贺筵》与《皇帝之公园》都是空想的作品；《马盗》则带强烈的写实色彩。《生命之河》与《泥沼》则于写实主义里含着新理想主义。

他也曾做一部长篇小说，名《决斗》，是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时作的，叙一个在前敌的军官的生活，极为活泼动人。

他是相信将来的，相信“乌托邦”之能实现的。他赞美人生，祝福人生。在《贺筵》里，他曾幻想人类在二九〇六年时，

开一个盛大的宴会，有一个起立说道：“我们祝此永久少壮，圆满，美好的人生，祝这世上独一的‘神的人类’！赞美人生的一切欢乐！”这些话，正是他所要向读者说的。

蒲　宁

蒲宁（I.Bunin）（1870年生）的家庭是衰落的古贵族。他擅长于短篇小说，诗及杂记。他的诗多描写自然景物，他的小说多描写旧日的繁华与现代的寂寞与悲苦。这是因他环境的关系。他又曾到东方游历过；经埃及，土耳其，小亚细亚各地；他的诗集《太阳之宫》即系抒唱他的惓怀古代的情绪的。他也做叙写农民生活的小说；但他的这种小说的情调，和其他作家完全不同。他不是一个受过农民身受之苦的人，也不是一个为农民呼吁的作家，只不过是一个游历者，观察者；他所写的只不过把游历所见的及观察的印象写下来而已。他又是一个著名的英国文学研究者，曾译了不少的摆伦，丁尼孙（Tennyson）及郎佛罗（Longfellow）的诗。

阿志巴绥夫

美列兹加夫斯基反抗弥漫俄国的人道主义与无抵抗主义，而主张个人权利的神圣，同时即有许多人与他作呼应；这种呼应之声，是时代的自然呼声，是那时青年对于革命失望后的一种反响，并不是一二人所造成的。而在许多个人主义的作家中，阿志巴绥夫（M.Artzybashev）（1878年生）与路卜洵（Ropshin）二人尤趋于极端。

阿志巴绥夫生于南俄，最初进一个绘画学校，生活极苦，以

画漫画和做小说论文为维持。后来到圣彼得堡，因做了几篇小说得为一个杂志社的编辑之一。至一九〇四年时，他的名誉渐渐高起来。一九四五年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做他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革命小说，如《朝影》和《血痕》二篇即其中最好的。因此得祸，被政府捕去，判决死刑，后来，又被他们释放出来。不久，他的主要著作《沙宁》（Sanin）出版。这部书是代表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向，同时并可代表阿志巴绥夫的思想。他所受的影响，非尼采而为史谛纳（Max Stirner）。

路　卜　洵

路卜洵（V.Ropshin）（1880 年生）与阿志巴绥夫同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的原名是萨文加夫（B.Savinkov）。他的生活是暗杀的生活。他是社会革命党的一个重要党员，著名的恐怖党。最后，又脱离了社会革命党，住在英国很久。他的杀人，几乎如猎人之枪杀野兔；他虽为社会党的暗杀执行者，而他对于社会主义却已根本怀疑。他的小说《灰色马》和《乌有的故事》叙写他这种心理极为详细。他的文学天才很好；他的著作除了内容以外，在艺术上也是极有价值的。

赛格耶夫·泰斯基

赛格耶夫·泰斯基（O.G.Sergeyev-Tzensky）（1876 年生）的作品，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的作品，是对于人生厌恶的，他以为人生是残酷的，是无意味的；第二时期的作品则已于生的黑暗中看出一线光明来，对于将来的希望也在他胸中跃动。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巴巴耶夫》（Babayev），《田野的悲

哀》，《运动》及《不正的海仑那》（The Oblique Helena）等。

契利加夫

契利加夫（E.Chirikov）（1864 年生）的著作以平易古朴动人，他在平淡的事中，含有深的思想，具俄国作家特有的“含泪的微笑”之作风。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有《学生来了》，《外国人》，《犹太人》，《泰却诺夫的一生》（Tarchanov's Life）及在欧洲大战时所作的杂记《战争的反响》等。

莱美沙夫

莱美沙夫（Alexey Remizov）（1877 年生）是莫斯科商人的儿子。初入文学界时，受了许多次的失败，但他并不因此灰心，直至一九一〇年《教中的姊妹》一篇发表后，才有人渐渐的认识他。他又做了许多儿童故事。后来集为两册出版。此外尚有《第五次灾祸》及《短篇小说集》等。他的作风，有些像梭洛古勃，对于人生是悲观的，但他对宗教还有些信仰，这是与梭洛古勃之以“死”为美的思想不同之处。

茅赛尔

茅塞尔（V.V.Mujzhel）（1880 年生）生在南俄一个小村里，他的生活是极平淡的生活，而他的作品却于平淡之中带着浓厚的阴郁之气色。他重要的著作有《一个农人的死》，《一个农妇的生活》，《一年》，《在生命的边境》及《罪》等。

犹克威慈

犹克威慈（Semyon Yushkevitch）（1868年生）是新写实主义的小说家与戏剧家；他的戏剧，如《饿》与《城中》在俄国剧场上都很著名。他的作品多描写犹太人的生活。《犹太人》一书，使他得很大的声誉。此外还有《伊太亨利纳》，《街上》，《我们的姊妹》等也都是描写犹太人的生活的。

格奢夫·亚伦勃斯基

格奢夫·亚伦勃斯基（S. I. Gusev-Orenburgsky）（1867年生）与犹克威慈同为新写实派的重要作家。他早年做过许多时候的乡间牧师的朋友，所以他所描写的都是乡间牧师的生活。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祖国》，《草场之外》，及《黑暗》等。

谢志夫

谢志夫（Boris Zaitzev）（1881年生）是一个静穆而柔弱的作家；他的作品如一个静默的祷告，如渐渐消失于远处的微声；在一切俄国作家中，他的呼声算是最低微的。他的作品于写实之中常飘荡着抒情的调子。他的成绩有《远地》及《短篇小说集》七册。他又曾译过法国佛罗贝（Flaubert）的几种小说。

佛林斯基

佛林斯基（A. Volensky）（1863年生）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与批评家；在九十年代新旧批评家热烈的战争时，他曾立在最强烈的火线上。他反对以文学为讨论社会与政治问题。他以为艺术家的目的是在寻求人生的玄学的根柢。他的哲学是纯粹的理想的。他的作品有《为理想主义而战》（论文集）及《杜思托益夫斯基》等。

布洛克

布洛克（A.Block）（1880 年生）是现代俄国的一个重要诗人。他著了许多抒情诗集，也著了许多剧本。他的诗赞美的人极多。有一个批评家说，布洛克的耳，特别敏锐，他能听见绿草的生长，他能听见“安琪儿”在以太空中鼓翼；同时且能听到毒龙在海底翻身。布洛克主要的著作有《美人之歌》（诗集），《俄罗斯之诗》（诗集）等。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他曾作过一首长诗《十二个》，极博得读者的同情。

伊文诺夫

伊文诺夫（V.Ivanov）（1866 年生）的诗名，较布洛克为前辈。他的学问非常广博，对于历史，神话学，文学以及古代希腊及罗马都有彻底的研究。他把这种广漠的知识，倾注到他优美的诗篇里。有人称他为一个“苍老的卫士而带有婴儿的灵魂的”。他对于美列兹加夫斯基非常赞仰。他的抒情诗。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已集为一个诗集。

皮　　莱

皮莱（Andrey Byely）（1880年生）是诗人，小说家与批评家，近代象征主义的重要的宣传者。他的原名是蒲格耶夫（N.B.Bugayev）。他不仅从理智方面求人生的意义，且进而在热情，快乐及痛苦中搜求，他是想把宇宙的神秘之幕拉开了的。他的诗非常秀丽，即巴尔芒与皮留沙夫亦难有他那样优美的诗的表白。同时，他又是常在热忱的高潮之上的。在大部分的近代俄国作家中，他的个性最重；他所写的，差不多没有人可以模仿。读者也往往不解他的意义；他常劝他们忍耐的把他的书多读过几遍。虽然因此之故，有一部读者不大喜欢他，而在实际上，则即最严刻的作家，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活跃的天才与特别丰富的情绪。

他的主要作品有《银鸽》（小说），《彼得堡》（小说），《象征主义》及《诗集》等。

在以上简略的叙述里，最重要的近代俄国作家，大概都已包括在内。至于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新起的作家，则在下章述之。

第十四章　劳农俄国的新作家

“昨天是大欺罔的日子，——那是他的威权的最后一天。”俄罗斯劳农革命已经彻底的推翻这个“昨天”。我们在那“大欺罔时代”尚且看见艺术里放些光明，——俄国大文学家诚挚隐痛的心灵之巨烛。难怪到了那世界史中斡天旋地的一天。——一九一七年十月，“劳动贫民的作家”高尔基要大声疾呼的说出这句隐痛久忍后的快心话来。他接着说道：

> “今天——可怕的日子，是报复那昨天的‘欺罔’的日子。
>
> “平民久忍之后的爆发力毁灭了那腐败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再也不能恢复他的旧形式了。一切旧东西都已杀尽了么？还没有！那么，明天总是要杀尽的。”（高尔基之《昨天和今天》，1919 年。）

一切旧的都已经过去，样样发露新的气象。文学艺术界亦是如此。固然在那新旧交替青黄不接的时候难免要经受着那“可怕的”日子：自从柴霍甫以后，自从一九〇五年的高尔基以后，俄

国文学的纤妙空灵，如象征派等类的作家，固然还有；然而他的“伟大”似乎已经损失了——也许就只科洛林科的“广爱”，足以略比前辈而已；新文学，在战时战后枉然力竭声嘶的呼号“改革”，其实往往只拘泥于形式方面。虽然，新的精神实在已经隐隐潜伏，乘着咆哮怒涌的社会生活的瀑流而俱进；——我们可以看见那时的怪僻的“填补字典的”诗人，那时的极端个性主义的“未来主义”（Futurism）后来竟能助成新写实派的缜密泼活亲切的文体，助成歌颂创造力的社会的超人。

俄国劳农时代的作家之中，足以继那光荣的俄国文学，辟这光荣的俄国时代，——且将创造非俄国的，而为世界的新“伟大”的，有如马霞夸夫斯基（Mayakovsky），如谢美诺夫（S.A.Semenov），如劳工派（Proletarian Writers）。

马霞夸夫斯基

马霞夸夫斯基是革命后五年中未来主义的健将，许多诗人之中只有他能完全迎受“革命”；他以革命为生活，呼吸革命，寝馈革命，——然而他的作品并不充满着革命的口头禅。他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露头角于俄国诗坛，革命以后，他的作品方才成就他的大才。未来主义创造新的韵格，破毁一切旧时的格律，制作新的字法。能充分的自由运用活的言语——，然而这不是马霞夸夫斯基所独有的，如珀斯台尔纳克（Posdemak）于此亦有很大的功绩。这仅是文学之技术的方面。马霞夸夫斯基的才却在于他的神机，——他有簇新的人生观。“蔑视物质是不足以自豪的。只因自己没有理智的能力，没有驾御特质的能力，那才故意闭着眼睛从‘心灵’上想出一个‘超人’来，自己骗骗自己。然而‘人’——有几万年的进化，几千年的‘集合创造’，以至于现代

的文明，——而已决不能纯粹为物质所支配；正唯能知此物质（自然界及社会的现象），方能支配此物质，正唯能集合而生创造力，方能使个性得其相当的充分的发展。”马霞夸夫斯基是超人，——是集合主义的超人，而不是尼采式的个性主义的超人。马霞夸夫斯基是唯物派，——是积极的唯物派，而不是消极的定命主义的唯物派。他的著作，诗多而散文绝少。最足以表显这种人生观的：如《国际》（又题作《第四国际》，最初见1922年9月俄国《真实报》——“Pravda”），如诗集《人》（1920年）。诗集《人》之中有《归天返地》一篇，歌颂自由的“人”俯视一切，嘲笑一切。他的诗才，真足以在俄国革命后的文学史中占一很重要的地位。

谢美诺夫

谢美诺夫在文学界中还是很新进的后辈。他的集合派的写实主义纯粹是十月革命的产儿。近时最有名的杂志如《赤新》（Krasnaya Novj）如《我们的时代》（Nashy Dni）等，常常有这派文学非常之好的作品。谢美诺夫所由而得名的一部小说就是《饿》，描写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俄国的苦况，——托名一十八九岁的小女郎所做的日记，写得非常之缜密活泼，文学上也是用极简单明白的俗语，真真读之闻如其声，——比之于未来派或劳工派用字之僻奥杜撰大不相同，——所以非常之通俗；然而文句宛如口语而又谨饬短峭，充满了“平淡中的真艺术”之神味。（他这部小说已经译成德文。）他同派的人已经很多，其中还一著名的作家，斯德朴诺衣（Stepnoj），曾著一小说《家》，亦有同样的好处。此种集合派的写实主义，不但“写实”而已，不但善于描写群众而已，他们的作品里客观的能表示人类共同劳作的乐生

主义，有“艺术即人生人生即艺术”的精神：

> “我们走到街上。天气很晴朗，太阳旺旺的。工人和红军打着旗帜走，唱着《国际歌》。似乎因为他们唱，蓝天都格外清朗些；太阳也更温暖些。他们的面色这样的愉快强壮。连我父亲都挺起他那干瘪的胸膛。他沿着路旁的行人道走，鼻子里也哼起《国际歌》来了。忽然我觉着，我自己也在唱着呢。好像我们这些人里面，谁也不曾挨饿。
>
> “吃完了饭之后，（译者注：平时都领很少的面包，饿得不得了；到这一天五一节，他们父女二人方到公共食堂吃饭的。）父亲很亲爱的问我道：
>
> “——唔，怎么样——饱了？
>
> “——啊，爸爸，饱极了。
>
> “他的眼睛微笑看，还尽着哼哼的唱《国际歌》呢。……”（《饿》五月一日的日记）

劳　工　派

“诗人是预言家”，这句老话确实不错的。欧战以前的诗文界里，早已觉着文学的旧形式旧内容不适宜了。那时安德娄·皮莱（Andrey Byely）就说是“文字之穷”（Crisis of word）——文字已不够表显现代生活的内容。实在说起来，不是“文字之穷”，不是诗的内容穷乏；诗的内容本是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的；要看得出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穷，必须重新变革他的形式，——不但形式，——还要变更他的内容，他的重心。譬如形式方面，未来派也曾非常注意，然而他对于内容上的有价值的供献，仍旧很少。再则，向来文学的对象，往往为两性问题及恋爱问题占据大

半；何以几百万人，几百万劳工农民的生活意义——“劳动”，竟没有丝毫“诗意”？“明月，回廊；才女，情郎，”——滥调的滥调！这是因为与“劳动”接近的人，向来受“文明社会”之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的压迫愚弄，所以不期然而然离着文学的创造和享受很远很远。等到革命后，劳工派的文学方得开始发展。皮莱曾经对一劳工派诗人，波列塔叶夫（N.Poletaev）说道：

——“你的诗，嘉晴，（Kazin）格腊西莫夫，（Gerasimov）亚历山大洛夫斯基（Alexandrovsky）的诗里，确有些新意义。一切都是新的，韵律格调……”

劳工派的文学尚在幼稚时代，——诗多，而散文小说还没有巨大的著作；虽然如此。

“我们总是要得胜的；我们这里——
各地的无产阶级。——精力已跃跃欲试；
几世纪来的潜伏力已经沸动，
火焰熠熠的飞涌，像火山似的。”（格腊西莫夫）

劳工派的机关杂志是《铁炉》（Kuznitsa 译音：《库兹尼错》）；他们的发展为时不久。除上述几人外还有萨笃费叶夫（Tlia Sadofiev），迦斯铁夫（Gastev）等。劳工派诗文的成就，还不能算邃远。譬如他们于形式上，间或采用“自由诗”的体裁，也有仍用普希金式的“律诗”的，也有简直无韵的；他们的散文小说只有短篇，非常谨饬严紧，然而也往往因篇幅过短内容太复而显得晦涩。然而他们的动机，文调，和内容，确与俄国的世界的文坛以极大的希望。他们每每可以一个字也不谈到“工作”“劳动”，而其韵脚声调之间，都有强固健全的“劳动诗意”

在内。

“文字之穷”已经过去，文字复活了，而“劳动文化”的清晨亦已来了。

除上述三派以外，派别还非常之多，（关于诗的，可以参看《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号耿济之君译的布利乌莎夫之《俄国诗坛之昨今和明日》。）此外则革命的文学评论家郭冈（Kogan）和歌谣家狄美央倍德纳衣（Demiyan Bednyj）在现时亦负有盛名，然而他们在俄皇时代之革命的报章杂志里，早已占有特殊的位置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日。

附录一　俄国文学年表

一一一三年　《基辅史记》(The Chronicle of Nestor) 编成。

一六九二年　俄罗斯的第一出戏曲在莫斯科附近排演。(波洛慈基《浪子》一剧始行排演)

一七〇三年　俄罗斯的第一新闻纸《俄罗斯新闻》出现。

一七二五年　彼得大帝死。科学院 (The Academy of Science) 成立。

一七四四年　甘底麦 (Kantemir) 死。

一七五〇年　泰狄契夫 (Tatishchev) 死。

一七五五年　莫斯科大学成立。

一七六二年　加德邻二世即位。

一七六五年　罗门诺索夫 (Lomonsov) 死。

一七九〇年　拉特契夫 (Radishchev) 的《墨斯科纪行》出版。

一七九六年　加德邻二世死。

一八〇〇年　《依鄂太子远征记》出版。

一八〇二年　助加夫斯基译格雷的《墓地》之诗。拉特契夫死。

一八〇六年　克鲁洛夫的第一篇寓言出版。

一八一六年　陶泽文死。卞伦辛的《俄罗斯史》出版。

一八一九年　圣彼得堡大学成立。

一八二〇年　普希金的《路丝兰与陆美娅》出版。

一八二三年　格利薄哀杜夫的《聪明误》出现。普希金的《亚尼征》(Eugene Onegin) 第一卷出版。

一八二五年　“十二月党”起事失败。

一八二六年　李列夫绞死。卞伦辛死。

一八二七年　普希金的《乞丐》出版。

一八二九年　格利薄哀杜夫死。普希金的《波尔塔哇》(Poltava) 出版。

一八三一年　普希金的《蒲里史·格德诺夫》(Boris Godunov) 出版。《亚尼征》全部告成。

一八三二年　歌郭里的《狄甘加农场之夜》出版。

一八三四年　歌郭里的《麦格罗特》出版。

一八三五年　歌郭里的喜剧《巡按》第一次排演。

一八三六年　察达夫 (Chaadaev) 的《尺牍》出版。

一八三七年　普希金死。

一八四一年　李门托夫死。

一八四二年　加尔莎夫 (Koltsov) 死。歌郭里的《死灵》出版。

一八四四年　克鲁洛夫死。

一八四一年　歌郭里的《尺牍》出版。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出版。倍林斯基死。

一八四九年　彼得拉夫斯基 (Petrashevsky) 党人被捕。杜思退益夫斯基被放于西比利亚。

一八五六一七年　莎尔条加夫 (Saltykov) 的《吏治杂记》

(Government Sketches)出版。

一八五九年　阿史特洛夫斯基的《雷雨》出版。龚察洛夫的《阿蒲洛摩夫》(Oblomov)出版。

一八六〇年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出版。

一八六一年　《农奴解放》令下。

一八六二年　丕塞姆斯基的《汹险的海》出版。

一八六三年　周尼雪夫斯基的《怎样办呢?》出版。

一八六五年　李斯加夫的《无路可出》出版。

一八六五——一八七二年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出现。

一八六六年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罪与罚》出版。

一八六八年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白痴》出版。

一八七五年　阿里克塞·托尔斯泰死。

一八七五—六年　托尔斯泰的《婀娜·克利尼娜》出版。

一八七七年　尼克拉沙夫死。

一八八一年　杜思退益夫斯基死。

一八八三年　屠格涅夫死。

一八八六年　阿史特洛夫斯基死。

一八八七年　那特生死。

一八八九年　莎尔条加夫死。

一八九九年　托尔斯泰的《复活》出版。

一九〇〇年　梭罗委夫(Soloviev)死。柴霍甫的《海鸥》出现于剧场。

一九〇四年　柴霍甫的《樱桃园》第一次排演。柴霍甫死。

一九一〇年　托尔斯泰死。

一九一七年　苏俄劳农政府成立。

一九一九年　安特列夫死。

一九二〇年　科洛林科死。

上表从 M.Baring 的《俄罗斯文学要略》(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里录下来，中间略有增益之处。

附录二　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俄国文学的研究，半世纪来，在世界各处才开始努力。他们之研究俄国文学，正如新辟一扇向海之窗，由那窗里，可以看出向来没有梦见的美丽的朝晖，蔚蓝的海天，壮阔澎湃的波涛，于是不期然而然的大众都拥挤到这个窗口，来看这第一次发现的奇景。美国与日本也都次第的加入这个群众之中，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因素来与外界很隔膜之故，在最近的三四年间才得到这个发现的消息，才很激动的也加入去赞赏这个风光。但因加入得太晚之故，这个美景，却未能使我们一般人都得去观览。现在我在此且介绍几十本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书，聊且当做这美景的一种模糊的影片，至于要完全领略那海上的晨曦暮霭与风涛变幻的奇观，则非躬亲跑到海边去不可，决不是这几十本的书所能帮助他的。

在这几十本书里，最大多数是用英文写的。德文与法文的，因我不懂，不能举出。日文的书籍也只举数种。

第一类　一般的研究

(一) 俄国文学要略　　巴林著

M. Baring—Out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

此书是《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之一,叙述很简明;初次研究俄国文学的人,这本书是必须看的。他的出版公司是伦敦的伦敦与诺威契印刷公司(The London and Norwish Press)。

(二) 俄国文学论　　巴林著

M. Baring —Landmarks in Russian Literature

此书研究俄国十九世纪的几个重要作家,如歌郭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杜思退益夫斯基及柴霍甫等数人。第一二章论俄国人的特性及俄国的写实主义,尤足以使我们读之明白俄国文学的特质所在。他的出版公司是伦敦的麦辛公司(Methuen and Co, Ltd),第一版出现于一九一〇年三月。

(三) 俄国的人民　　巴林著

M. Baring— Russian People

此书虽非专论俄国文学,但对于研究俄国文学者却很有用处。出版处也是麦辛公司。(?)

（四）俄罗斯印像记　　勃兰特著

G. Brandes—Impressions of Russia

勃兰特是丹麦现代最大的批评家。此书前半泛论俄国的一般情形，后半专论俄国的文学。他的评论深入而允当，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原书出版于一八八八年。英译本出版于一八八九年。英译本的出版公司是伦敦的史各得书局（Walter Scott）。

（五）俄国文学史　　白鲁克纳著

A. Bruckner—A Library History of Russia

此书为伦敦奥文公司（T. Fisher Unwin）所出的《文学史丛书》之一。原著者白鲁克纳是柏林大学的斯拉夫文学教授。英译本出版于一九〇八年。全书共分十九章，自古代一直叙到安得列夫诸作家，是一部很详细的很好的俄国文学史。

（六）俄罗斯　　芬宁编

C. E. Fanning - Russia

此书出版于一九一八年，系搜集当时各杂志中论俄国的政治，宗教，及文学等论文而编成者。有几篇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他的出版处是纽约的韦尔逊公司（The H. W. Wilson Co.）。

（七）托尔斯泰　　皮陆加夫著

Birukoff - Leo Tolstoi

此书是研究托尔斯泰的一部很好的书；出版处是史克里纳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

（八）俄国文学的理想与实质 克洛巴特金著

P. Kropotkin – Russian Literature: Ideals and Realities

克洛巴特金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关于亚洲地理的发现，在科学史上是一件不朽的工作，他的这部《俄国文学的理想与实质》，在俄国文学上也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全书共有八章。从古代民间文学到最近的作家，都有明晰而同情的叙述。初版在一九四五年出现，到了一九一六年，他自己又加以修改及增订。出版处是伦敦的突克华司公司（Duckworth and Co.）。

（九）托尔斯泰传 穆特著

Maude-Life of Tolstoi

此书为许多托尔斯泰传中的最著名者，共有二册，铎特公司（Dodd，Mead and Co.）出版。

（十）俄罗斯的精神 马沙里克著

T. G. Masaryk – The Spirit of Russia

此书为捷克斯拉夫第一任总统马沙里克所著，是研究俄国的历史，文学与哲学的。全书共有二大册，原著为德文，英译本出版于一九一九年，出版处为伦敦，佐治爱伦与奥文公司（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十一）托尔斯泰及杜思退益夫斯基 米列加夫斯基著

Merejkousky - Tolstoi as Man and Artist

米列加夫斯基为俄国现代很著名的批评家，此书论托尔斯泰，其后并附论杜思退益夫斯基的一文。许多人论到托尔斯泰及杜思退益夫斯基时常称引他的话。英译本出版于一九〇二年，出版处为伦敦的君士特泼尔（Constable）公司。

（十二）俄国的诗歌与进步 纽马契著

Rosa Newmarch - Poetry and Progress in Russia

此书专论俄国的诗人，自普希金以前的几个诗人起，很详细的论到普希金，李门托夫，民众诗人的加尔莎夫，尼克拉莎夫，尼吉丁至堕废派诗人那特生等为止。并附载他们的诗歌几篇。一九〇七年出版，出版处是伦敦的约翰兰（John Iane）公司。

（十三）俄国文学的研究 居利著

A. L. Guthrie - Russian Literature: A Study Outline

此书出版于一九一七年，出版处是韦尔逊公司（H. W. Wilson）。

（十四）俄国文学考略 赫甫郭特著

I. F. Hapgood - Survey of Russian Literature

此书出版于一九〇二年，出版处为 Chantauqua Press。书中

并载许多名家诗文的选篇。

(十五) 杜思退益夫斯基研究 穆雷著

J. M. Murry - Fyodor Dostoievsky: A Critical Study.

此书研究杜思退益夫斯基的重要作品及他的生平与思想。初版一九一六年发行，伦敦麦丁·谢甲公司（Martin Secker）出版。

(十六) 俄国文学指要 奥尔琴著

M. J. Olgin - A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

此书很重要，一八二〇年至一九一七年间的重要作家，都已被其包括在内。每个作家都有一篇评传，并附以俄国批评家的话。他们的重要著作也都加以述评。第一版出现于一九二〇年，出版处是纽约的哈考特公司（Harcoust, Brace and Howe, Inc.）。

(十七) 现代的俄国小说家 朴斯基著

Serge Persky - Contemporary Russian Novelists

此书出版于一九一三年，出版处是Luce公司。

(十八) 俄国小说家评传 菲尔甫著

W. L. Phelps - Essays on Russian Novelists

此书的评论很有独到之处。最初论俄国国民性，其次论歌郭里，屠格涅夫，杜思退益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柴霍甫，

阿志巴绥夫，安得列夫及科卜林等作家。第一版出现于一九一一年，出版处是纽约的麦美伦公司（The Macmillan Company）。

（十九）俄国文学史略 萧诺夫斯基著

Shakhnovsky – 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此书原著为俄文，简略而不漏，英译本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又加上一章，叙托尔斯泰至现代的文学。（为托姆开夫 S. Tomkeyev 所作）出版处是伦敦的克甘·保罗公司（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二十）柴霍甫及其他 谢司托夫著

Leon Shestov – Anton Tchekhov and other Essays

此书非专论俄国文学者；共有论文四篇，第一篇论柴霍甫，第二篇论杜思退益夫斯基，议论都很精湛。英译本出版于一九一六年，由杜不林（Dublin）的孟萧尔公司（Maunsel and Co.）出版。

（二十一）杜思退益夫斯基评传 梭罗委夫著

Evgenu Soloviev – Dostoievsky: His Life and Literary Activity

此书为重要的研究杜思退益夫斯基的性格及作品之书，批评正确而深入，矫正前人的错误的评论不少。英译本出版于一九一六年，出版处为伦敦的佐治爱兰与奥文公司（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二十二) 俄国的小说 孚格著

Vogüe – The Russian Novel

此书出版于一九一六年，出版处为克诺特（Knoft）公司，论俄国小说的特质及发达。

(二十三) 俄国文学史 瓦里谢斯基著

K. Waliszewsky – Russian Literature

此书为哥司（E. Gosse）编辑的《世界文学史丛书》之一，据著者自言，系专供英国向未与俄国文学接触的人之用，所以内容很简明。但略有错误之处，不如上举之巴林的《俄国文学史略》之瞻实。第一版出现于一九〇〇年。出版处为伦敦的海尼门公司（William Heinemann）。

(二十四) 俄国的神奇故事 魏劳编

Wheeler – Russian Wonder Tales

此书为伦敦 A. and C. Black 公司出版。

(二十五) 俄国人的解释 委纳著

Leo Wiener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

委纳为美国著名的斯拉夫文学研究者。他的《俄国文学选》(见下）已博得不少人的称许。他前为哈佛大学斯拉夫文学的助教，现则为此科的教授。此书虽非专论俄国文学，而对于俄国国

民性解释得极为详尽，是研究俄国文学者所不能不看的书。一九一五年初版，出版处为纽约的“McBridge，Nast and Company”。

（二十六）俄罗斯人的俄罗斯 威廉著

H. W. William - Russia of Russians

此书为著名的《国家与人民丛书》（Countries and Peoples Series）之一，对于俄国的历史，宗教，政治，实业以及剧场，绘画，音乐等都有简括的叙述。其中第六章是论文学的；自八十年代说起，讲到现代的几个作家止。一九一四年初版，由伦敦的依萨克·僻得曼公司（Sir Isaac Pitman and Sons，Ltd.）出版。

（二十七）露国现代之思潮及文学 升曙梦著

升曙梦为日本现代最著名的俄国文学研究者。日本现代文学，极受俄国文学的影响，升曙梦于此是有很伟大的功绩的。此书由东京新潮社出版。大正四年初版发行。全书分二编，前编叙柴霍甫，高尔基至最近诸新进作家，后编叙美列兹加夫斯基及其他诗人与诸批评家，诸女流作家，实为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二十八）露国近代文艺思想史 升曙梦著

此书大正七年出版，由东京大仓书店出版，是一部研究俄国近代文艺思潮的极重要的书。这一类的书，在英文里几乎绝无仅有，所以升曙梦此书对于我们是极有用处的。内容共分十二章，自《序说》至《最近之文艺思想问题》，处处都足以供我们的研究。

(二十九) 俄国文学研究 沈雁冰编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部系统的研究俄国文学的专书，此书可算是这一类书中的第一部。内容除译丛，附录之外，共有论文二十篇，读之略可窥见俄国文学的一斑。初版一九二一年发行，为《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的号外。(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二类 英译的俄国重要作品

(一) 俄国文学选 委纳编

Leo Wiener - Anthology of Russian Literature

此书共二大册，第一册选十世纪到十八世纪末的诗文，第二册选十九世纪的诗文，为很重要的一部关于俄国文学的书，克洛巴特金也非常称许他。初版一九〇二年发行，由纽约扑特南公司(G. P. Putnam's Sons) 出版。

(二) 俄国的诗人与诗 杰令助夫编

N. Jarintzov - Russian Poets and Poems

此书一九一七年出版，出版处为郎漫公司(Longmans)。

(三) 近代俄国诗选 特契等编

Deutsch and Yarmolinsky - Moden Russian Poets: An An-

thology

此书为赫考特公司（Harcoust，Brace and Company）出版。

（四）英译俄文选 皮和弗编

Bechhofer – A Russian Anthology in English

此书篇幅不多，而包罗甚广，重要的小说家及诗人差不多都已被收集在内。初版一九一七年发行，伦敦克甘·保罗公司（Kegan Paul，Trench，Trubner and Co.）出版。

（五）近代斯拉夫文选 席尔孚编

P. Selver – Anthology of Modern Slavonic Literature

此书也是篇幅少而所包甚广的，共分二部分，第一部分选散文，第二部分选诗歌。所选的不仅限于俄国，且及于乌克兰，波兰及捷克等国。初版一九一九年发行，也是伦敦的克甘·保罗公司出版。

（六）近代俄诗选 席尔孚编

P. Selver – Modern Russian Poetry

此书也是伦敦克甘·保罗公司出版的，第一版一九一七年发行。全书都是英俄文对照。

（七）俄国小说集 拉哥辛编

Z. D. Ragozin Little Russian Masterpiess

此书共有四册，选普希金至克洛林科诸人的短篇小说，初版一九二〇年发行，纽约扑特曼公司（G. D. Putman's Sons）出版。

（八）俄国最好的短篇小说 谢尔兹编

T. Seltzer – Best Russian Short Stories

此书为《近代丛书》之一，自普希金，歌郭里至科卜林都有作品在内。初版一九一七年发行，纽约波尼公司（Boni and Liveright, Inc.）出版。

（九）屠格涅夫著作集 格尼特译

The Works of Turgenev,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Garnett

此书共有十五册，一九〇六年出版，出版处为伦敦，海尼门公司（Heinemann）。

（十）托尔斯泰全集 委纳译

The Complete Works of Count Tolstoi,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eo Wiener

此集共有二十四册，一九〇四——五年出版，出版处为伦敦但特（Dent）公司。

（十一）杜思退益夫斯基作品集

The Works of Dostoevsky

杜思退益夫斯基的作品近来译出来的很多，自《苦人》，《死人之屋的回忆》至《卡拉麦助夫兄弟》都已出版，出版处是纽约的麦美伦公司（The Macmillan Company）。翻译的人即为译《屠格涅夫著作集》的格尼特（Constance Garnette）。

（十二）柴霍甫小说集

The Tales of Anton Tchekhov

此集亦为格尼特（Garnette）所译，已出版者有《亲爱者及其他》，《决斗及其他》，《太太与狗及其他》，《妻子及其他》，《歌女及其他》等八本，其余尚在译印中。出版处是伦敦的卡图与文突司（Chatto and Windus）公司。

（十三）现代丛书中的俄国文学作品

A few Russian Books in the Modern Library

《现代丛书》为纽约波尼公司（Boni and Liveright，Inc.）所刊行，现已有八十余种出版，其中俄国小说很多。如杜思退益夫斯基的《苦人》，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烟》，安得列夫的《七个绞死者》与《红笑》，托尔斯泰的《依文依利契之死》以及俄国最好的短篇小说等等都是。

（十四）万人丛书中的俄国文学名著

A Number of Russian Novels in Everyman's Library

《万人丛书》为现代英文的丛书中规模最大者，已出版的历史，科学，小说，戏曲，诗歌，哲学，论文集，游记等等，自希

腊，希伯莱以至最近的作品，差不多有好几百种以上。其中关于俄国的文学名著，已陆续出版得不少，如歌郭里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婀娜小传》，屠格涅夫的《荒土》，高尔基的小说集，杜思退益夫斯基的《苦人》及其他，《死人之家》等等都是。出版处在英国为伦敦的但特公司（J. M. Dent and Sons)，在美国为纽约的杜顿公司（E. P. Dutton and Co.）。

（十五）海尼门万国丛书中的俄国文学作品

A Few Russian Novels in Heinemann's International Library

《海尼门万国丛书》为伦敦海尼门（W. Heinemann）公司所出版，由哥司（E. Gosse）任编辑之责。已刊行者有二十余种，多为北欧，西班牙，波兰，法，德，意大利，保加里亚诸国著名作家的著作；其中关于俄国者，有龚察洛夫的《日常的故事》及托尔斯泰的作品等数种。

（十六）世界文学丛书中的俄国文学作品

A Few Russian Books in the World'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丛书》为伦敦奥斯福大学出版部（Oxford University）所刊行，已出版者有二百余种，以英国作家的著作为最多。其中关于俄国的，有尼克拉莎夫的《在俄国有谁能快乐自由呢?》（诗）及托尔斯泰的《复活》，《婀娜小传》，《哥萨克人》，《二十三故事集》，《论说与尽牍》等数种。

(十七) 突克华士公司出版的俄国文学著作

Russian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Duckworth and Co.

伦敦突克华士公司陆续的出版了不少的俄国文学名著，如柴霍甫的《黑衣僧及其他》(小说),《接吻及其他》(小说),《戏曲集》，高尔基的《奸细》,《二十一男与一女》，迦尔洵的《旗语及其他》(小说)。安得列夫的《戏曲集》,《压碎之花及其他》,《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忏悔》等都是。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列在这个公司出版的《读者丛书》(The Reader's Library) 里的。

(十八) 麦丁谢甲公司出版的俄国小说

Russian Novels, Published by Martin Seckes

伦敦麦丁谢甲公司所刊的俄国小说，都是关于梭罗古勃及阿志巴绥夫二人的，梭罗古勃的小说已译出的有《老屋》,《小魔鬼》,《创造的传说》等数种，阿志巴绥夫的小说，已译出的有《沙宁》,《破点》,《革命的故事》,《富翁》等数种。

(十九) 孟萧尔公司出版的近代俄国文学丛书

Modern Russian Library, Published by Mannselo and Co.

孟萧尔公司在爱尔兰首都杜白林 (Dublin)。其所刊行的近代俄国文学丛书，所收的都是很著名的作品，如科卜林的《生命之河及其他》，路卜洵的《灰色马》等，都是别的丛书里所未见的。

（二十）其他各出版公司所刊的俄国名著

除了上面所举的以外，尚有许多美英出版公司，曾刊行俄国文学著作的，如高尔基的著作大概都是世纪公司（The Cetury Co.）所出版，李门托夫，歌郭里，高尔基及安特列夫诸人的作品，也有不少种由克诺特公司（Alfred A. Knopf）译印，伦敦的佐治·爱伦与奥文公司（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也出版了龚察洛夫的《阿蒲洛摩夫》，安特列夫的《人的一生》，等等，这里因为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列举了。

第三类　中译的俄国文学名著

中国在最近二三年前，才动手翻译俄国的名著；虽以前也曾零星的译了几种进来，但绝未引人注意。所以这里所举的，以最近所译的为主。

（一）普希金的著作

《安必丹之女》，安寿颐译，《俄国文学丛书》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歌郭里的著作

《巡按》，贺启明译，《俄国文学丛书》本。

(三) 阿史特洛夫斯基的著作

1.《雷雨》，耿济之译，《俄国文学丛书》本。
2.《贫非罪》，郑振铎译，《俄国文学丛书》本。
3.《愁与罪》，柯一岑译，《共学社丛书》本。

(四) 屠格涅夫的著作

1.《前夜》，沈颖译，《俄国文学丛书》本。
2.《父与子》，耿济之译，同上。
3.《村中之月》，耿济之译，同上。
4.《猎人日记》，耿济之译，《小说月报》十二卷至十五卷，未译完。

(五) 托尔斯泰的著作

1.《艺术论》，耿济之泽，《俄国文学丛书》本。
2.《复活》，三册，耿济之等译，同上。
3.《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瞿秋白，耿济之等译，同上。
4.《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同上。
5.《教育之果》，沈颖译，同上。
6.《活尸》，文范村译，《共学杜丛书》本。
7.《黑暗之光》，邓演存译，同上。
8.《婀娜小史》，四册，陈家麟等译，中华书局出版。
9.《假利券》，杨明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六）柴霍甫的著作

1.《海鸥》，郑振铎译，《俄国文学丛书》本。
2.《樱桃园》，耿式之译，同上。
3.《万尼亚叔父》，耿式之译，同上。
4.《伊凡诺夫》，耿式之译，同上。
5.《柴霍甫短篇小说集》，耿济之译，同上。

（七）安特列夫的著作

1.《小人物的忏悔》，耿式之译，《文学研究会丛书》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2.《人的一生》，耿济之译，《文学研究会丛书》本。
3.《狗的跳舞》，张闻天译，《文学研究会丛书》本。

（八）阿志巴绥夫的著作

《工人绥惠略夫》，鲁迅译，《文学研究会丛书》本。

（九）路卜洵的著作

《灰色马》，郑振铎译，《文学研究会丛书》本。

跋

本书的第十四章，为瞿秋白君所作，全书写成后，又曾经他的校阅。这是应该向他道谢的。

本书似乎太简单，又是匆匆的写成，一切的疏误之处，俱待以后再补正。瞿秋白君近亦编好了一部《俄罗斯文学》，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为《百科小丛书》之一），其编制与本书不同，读者很可以拿来参看。

本书的许多插图，都是为了本书而特制的，有许多是外间向来没有见过的。

郑振铎　　十三，一，八二。

太 戈 尔 传

序

这册《太戈尔传》原登载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及十月号《小说月报》上。单行本，本想在太戈尔到中国时出版。不料搁置于印刷的地方直到了现在。因为近来很忙，不能再细读一过，所以除了一二小错误曾改正了之外，其余文字一概都照旧。

虽然太戈尔在去年四月已到过中国了，已在中国讲演了好几次了，然而能充分了解他的人究竟有多少呢？这篇传对于想知道他的生平与思想的人，也许不无小小的帮助。

我在附录里转载了我的朋友瞿世英君及张闻天君的几篇文字，应在此向他们道谢！

太戈尔在中国的讲演，俱由我的朋友徐志摩君为之记录，他现在正在整理这个讲演集，大约不久即可出现。因此，这个小册子里对于太戈尔在中国的行踪与讲演，便不再述了。

郑振铎　　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绪 言

拉宾特拉那斯·太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是现代印度的一个最伟大的诗人，也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最伟大的诗人。

他的作品，加入彭加尔文学内，如注生命汁给垂死的人似的，立刻使彭加尔（Bengal）的文学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他的清新流丽的译文，加入于英国的文学里，也如在万紫千红的园林中突现了一株翠绿的热带的长青树似的，立刻树立了一种特异的新颖的文体。

现代诗人的情思，对于我们似乎都太熟悉了；我们听熟了他们的歌声，我们读熟了他们的情语，我们知道他们一切所要说的话，我们知道他们一切所要叙述的方法，他们的声音，已不能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太戈尔之加入世界的文坛，正在这个旧的一切，已为我们厌倦的时候。他的特异的祈祷，他的创造的新声，他的甜蜜的恋歌，一切都如清晨的曙光，照耀于我们久居于黑暗的长夜之中的人的眼前。这就是他所以能这样的使我们注意，这样的使我们欢迎的最大的原因。

他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也如他的诗歌和其他作品一样，能跳出近代的一切争辩与陈腐的空气，而自

创一个新的局面。

他在举世膜拜西方的物质文明的时候，独振荡他的银铃似的歌声，歌颂东方的森林的文化。他的勇气实是不能企及。

我们对于现代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似乎至少应该有些了解。

他现在是快要到中国来了，我且乘这个机会，在此叙述他的生平的大略，以为大家了解他的一个小帮助。

他的传记的本身也是一篇美丽的叙事诗。印度人都赞羡着他完美的生活。自他的童年以至现在，他几乎无一天不在诗化的国土里生活着。我们读他的传记正如读一篇好诗，没有不深深的受它的感动的。我所以要介绍他的传记，这也是一个小原因。

去年二月的《小说月报》上，我曾做了一篇他的传，但未免太简略了。所以现在再在此做一篇较详细的。

我的这篇传里的材料，大部分都取之于太戈尔的《我的回忆》与柯麦尔·洛依（B. Koomar Roy）的《太戈尔与其诗》二书。此外还参考了几本别的书，他们的名字，恕不能在此一一举出。

第一章 家世

拉宾特拉那斯·太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生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五月七日。他的生地是印度的彭加尔[①]地方。印度是一个“诗的国”。诗就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生的儿童到了这个世界上所受的第一次的祝福，就是用韵文唱的。孩子大了，如做了不好的事，他母亲必定背诵一首小诗告诉他这种行为的不对。在初等学校里，教了字母之后，学生所受的第一课书就是一首诗。许多青年的心里所受的最初的教训就是：“两个伟大的祝福，能消除这个艰苦的世界的恐怖的，就是尝诗的甘露与交好的朋友。”许多印度人做的书也都是用诗的形式来写的；文法的条规，数学的法则，乃至博物学，医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都是如此。结婚的时候，唱的是欢愉之诗；死尸火葬的时候，他们对于死人的最后的说话，也是引用印度的诗篇。在这个“诗之国”里，产生了这个伟大的诗人太戈尔自然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的家庭是印度的著名的望族。近百年来，这家摇篮里继续产生了不少的伟大的人物，为彭加尔（Bengal）地方的文艺复

---

① 即孟加拉。

兴的先驱者。无论在社会与宗教的改革，在艺术与音乐的复兴，在政治与实业的组织上，他们都立有很大的功绩。所以印度的人民，尤其是彭加尔的人民，一讲起这个家族都带着十二分的敬意。在这样的家庭产生了他，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个家族当中，最著名的人有柯麦尔·太戈尔（Prosonno Koomar Tagore)，他是一个地主，一个享大名的律师，一个编辑者，他生平做了不少的关于法律与教育的文字，又创办了英印协会，为它的会长；有莫汗·太戈尔（Raja Sir Sourindra Mohun Tagore)，他是印度的一个最著名的音乐家，他创办了彭加尔音乐学校，及彭加尔音乐院，还著了不少的论印度音乐和乐器的书；有阿白宁特拉那斯·太戈尔（Abanindranath Tagore)，他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印度艺术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领袖；有拉马那斯·太戈尔王，（Maharaja Ramanath Tagore）他是我们现在所叙的这个大诗人的祖父的兄弟，一个政治上的领袖，并且也是一个著作家；有特瓦拉甘那斯·太戈尔王子（Prince Dwarakanath Tagore)，他是这个大诗人的祖父，一个大地主，创办了地主协会，又是一个社会改造者，著名的慈善家，最初反对印度妇人殉夫的风俗。

在许多名人中，尤其著名的是这个大诗人自己的父亲特平特拉那斯·太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他不是一个国王，他不愿意得到这种的地位。但印度的人民却荣他更可贵的尊号，称他为“大哲”。他是印度近代的一个最伟大的社会的和宗教的改革者，他的牺牲的精神和坚定的主义，近代的印度没有一个人足以与之并肩。他是一个王子的儿子，然因要尽道德上的义务，竟把所有的地产，两手捧给他父亲的债主，使他自己安于一个穷人的地位。这些债务，本来都是没有法律上或文件上所规定的必要偿还的责任的。债主们为他的这个义侠的举动所感，竟留下一部分

的财产还给他。他共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大诗人拉宾特拉那斯是他们当中最少的一个。在他们几个兄弟当中，著名的人也不少，有一个名特威琴特拉那斯（Dwijendranath）的，是现代的一个大哲学家。“松鼠从树枝上跃到他的膝上，鸟儿们栖息在他的手上。”

第二章 童年时代

大诗人的太戈尔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度过他的童年。

他和别的两个孩子在一起读书，他们都比他大两岁；那时所读的东西，他早已忘怀；他所记得最真切的只有："雨溅叶颤"及"雨淅沥的落下，潮水泛溢到河上来"二句。这是他与文学第一次的接触；他说，当时的印象，到现在还没有消灭。

他在家中，不常见到他父亲；那个"大哲"是常在外面旅行的。他幼年的保护者是几个男仆人，他们都是很粗心很自私的。他们常常为免除他们的看护的麻烦起见，把小孩子们关在一间屋里，不准他们自由行动。有一个仆人，常叫太戈尔坐在一个指定的地点，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把他包围起来，并且惊吓他说，如果他离开这个圆圈一步，就会有危险。他便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因为他读过《拉摩耶那》（Ramayana），知道有一个人因为擅自离开别人所画的圈子，后来竟遇到许多危险。幸而他所坐的地方，常近于窗口；他从窗中能够看见花园，看见一个池，许多行树，还看着往来的人与鸟儿等；鸭子在池中游泳，树影在水面映动。有一株榕树，尤使他注意，他在后来曾有一首诗写到它：

“呵，古老的榕树，你的绞绕的树根从枝上挂下来，
你日夜站着不动，如一个修道者之在忏悔，
你还记得那个孩子，他的幻想曾随了你的阴影而游戏的
吗?”

天然的景色，使他忘了囚禁之苦。

他在家中，几乎一步也不曾踏到大门以外。即家中的许多房屋，他也不能走遍。他父亲的房子在三层楼上，因为他常不在家，所以门终日都是关着。幼年的太戈尔常偷偷的推门进内，坐在沙发上。

有一天，他正在可以看见大路的楼廊上游戏，他的外甥萨底亚（Satya）突然的“巡警！巡警！”的叫着，想去吓他。他那时候，还不明白巡警的职务是什么，仅知道他们是可怕的，犯罪的人一被他捕去，便如被鳄鱼吞入口内一样，永不会再出来。所以他一听见这个叫声，幼稚的心，大为恐怖，立刻逃进屋内，不敢再出去，静静的坐在他母亲的房门口，拿了一本《拉摩耶那》在读。这本书是属于他的祖姑母的。他的心渐渐的沉浸到书中去，看到一个悲惨的地方，竟哭泣起来。他的祖姑跑了来，把他的书取去。这件事，也使他许久不曾忘记。

他一天一天的长大，一天一天的更渴望到家宅以外去看看。

有一天，他看见他的一个哥哥和他的外甥萨底亚同到学校里去上学。因为他还少，他们不让他同去。当萨底亚回家时，向他夸说路上的经历。他竟哭起来，要求也到学校里去。他的家庭教师跑来，重重的打他几下，对他警告道：“你现在哭着要进学校，将来恐怕你更要哭着想出校呢。”他忘了这个教师的姓名，面貌及性质，但他的沉重的手掌和他的这个沉重的警告，则使他永不

能忘。他说在他生平，不曾听见比这个更确的预告。

他的哭声，使他立刻达到他的愿望。他进了东方学院。在那里学的什么，他早已忘了，但他们的一种刑罚，则还留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在他脑中。凡是不能背诵功课的儿童，都被罚立在木凳上，两臂伸开，手掌向上，在手掌上堆了好几片石板。

他很不喜欢这个学校。离了家庭的拘束，又进了学校的囚笼，他自然很不高兴。他的家庭教师的预言至此不幸而中；他不久竟离了这个东方学院，改进一个师范学校。但这个师范学校与他的性情也不相宜。同学对他不好，教师也使他讨厌，他自己曾说，有一个教师，常用粗暴的话问他，他以此为耻辱，因此对于他所发的问题，概置不答。全年之中，他都坐在一班的末座，不开口说一句话，只是自己在沉思着，在想解决许多人生的大问题。他说，“我还记着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武器，将怎样去打败一个敌人。解决的方法就是如果我驯养了狮子，老虎和狗去开始战争，那么便容易得到胜利了。”

如此的一年过去了。到了年终考试时，他竟获到班中最高的分数。他的教师觉得很惊奇，以为一定有别的原因，便请学校当局复试。但复试的结果，他仍然保持他的原有的分数。

他既不喜欢这个师范学校，于是他的家人又把他送进彭加尔学院，一个英印的学校。虽然这个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对他没有特别的恶感，但他仍然觉得它是一所监狱，一座病院。

他同时在家庭中研究生物学，生理学，物理学，几何学，历史学，音乐及英国文学等。他所最不喜欢的就是英文。他的家庭教师，常常很热忱的使他明白英国文学的好处，但他常是置之不见不闻。教师从著名的英国诗人的作品里，引几段名句背诵给他听，他却笑了起来，使他的教师弄得脸红耳热，只好停止背诵。

但他在实际上决不是不喜学问的，他所不喜欢的是强迫的和

规定的课程。他心中充满了诗的冲动。当他极少的时候，即已醉心于诗歌。以后，则对于诗的兴味，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

他最初学做诗，是由比他年纪大的一个侄子约底白鲁克僖(Jotiprokash)的鼓励。当太戈尔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正午，约底白鲁克僖突然的掖了他的手臂，引他进他的书房。对他说道：

“你有做诗没有?”

“我怎么会做？我还不知道怎样做。”

“我会教你的，我读过莎士比亚的《韩梅雷特》(Hamlet)，虽然我不是一个诗人，但我觉得你的心情，如果好好的加以训练，必可以成一个大诗人。”

于是约底白鲁克僖便取了纸与笔，告诉他做十四缀音诗的方法。这就是太戈尔第一次所受的做诗的方法。

当他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一个教师，和他很好，知道他是喜欢诗歌的，便常常的教给他做诗的方法。他或者代太戈尔出一个题目，或者自己先写了一二行，然后再叫这十岁左右的学生接下去写。

虽然他自己曾说，他家里的人对于他都不大留意，他的嫂子尤阻碍他做诗的天才的发展，然而他的诗童的声誉，竟一天天高起来，他的诗才竟一天天发展起来，如趋下的清溪一样，路中的圆石是不能阻止它的东流的。

他的童年时代，便是如此。

他在一封信上曾说道：“我的幼童年代，已经不大记得。但我却很记得，常常的，在清晨的时候，我心上总不知不觉的泛溢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全个世界对于我似乎充满了神秘。每一天，我总拿了一根小竹棒，在那里掘 土，想着我也许可以发现那些神秘的一个。这个世界的一切美丽与甜蜜与芬芳，一切人民的走动，街上的唱声，鸢的鸣声，以及 家园里的可哥树，池边

的榕树，水上的树影，清晨的花的香气——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得有一个朦胧的认得的人物，幻化了这许多形态，以与我为伴。”

他又在一个别的地方说道：“当我回顾我童年的时候，这个总站在我记忆的前面，就是：人生与世界似乎是充满了神秘。我每天感到，并且想到，无论什么地方总有些不可臆测的东西，我之遇见他在什么时候也不能决定。似乎自然常紧握了她的手掌，向我问道：‘告诉我，我手里有什么东西?’我永远不敢回答，因为无论什么东西，在那里都是有的。”

他的爱自然，爱自然的上帝的心，在这个童年时代已经具有了。

第三章　喜马拉耶山

太戈尔的父亲特平特拉那斯有一次到喜马拉耶山（Himalayas）去旅行，那时，大家忽惊传着俄国侵略的消息；许多人都 以为喜马拉耶山的地方很危险。他母亲因为他父亲正在那里，心里十分的惊慌。但是他家里的许多人，却都不肯分担她的忧虑。她最后跑到这幼年的诗人那里，要他的帮助。她问道，"你会写信到你父亲那里，告诉他俄国人的消息么?"他便动笔写这封信，这是他写给他父亲的第一封信。他不知信是应该怎样起首，怎样结束的，跑去问了一个人，才把它写成功。他父亲回了一封信给他。他叫他不要害怕；如果俄国人真个来了，他自己会把他们赶跑的。这些话并不能减少他母亲的忧虑，但在他心里，则以为父亲已经是没有危险了。自此以后，他便每天都想写信给他父亲。

隔了不久，他父亲从喜马拉耶山回家。全家换了一个样子。母亲自己到灶头上帮厨子的忙，他父亲久闭的房门口，也立了一个仆人，叫孩子们当他午睡时不要在房子外面吵闹。他们都轻轻的走着路，低声的耳语着，连向这房里一张望也不敢。

他这时候的功课，还是照旧，但他仍然是对于这 些规定的

功课不感兴味。他常常自动的读许多他所读不大懂的东西，但读时虽不大懂，却能深深的使他感动。有一次，他大哥看见黑云突然的密集，口里背吟着几句卡利达（Kalitas）的《云的使命》。他这时候，连一句桑斯克里底（Sanscrit）文也不懂，但他的大哥的歌声，却使他十分感动。还有一次，他得到一本有插图的《古玩铺》一书，这时，他的英文程度还很浅，他把这书全读完了，其中的文句，至少有十分之九是他所不懂的，但他却有一个朦胧的具体观念，读时十分感得兴趣。又有一次，他陪他父亲，坐了家艇到恒河上去。他父亲所带的书中，有一部约耶地瓦（Jayadeva）的《吉塔哥文达》（Gita Govinda）。它的诗句不是分行写的，全书都如散文一样，接连的写下去。当他读到：

“黑夜走过寂寞的林屋”

一句时，他心里感着一种隐约的美。他把那些诗句照音韵分开，把全书重钞了一过，给他自己读。这种工作使他得很大的快乐。然而他这时对于约耶地瓦所说的意义，实未完全明白。

依据他自己的这几个经验，他后来便发表一段对于教育的意见：

“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释意义，而在于敲打那心的门。如果我们问一个儿童，叫他叙说出在这样的敲门时，他心里所惊觉的是什么，他也许要说出些非常愚笨的话来。因为内部所发生的感觉是比他所能用言语表白的更为巨大的。”

有一天，他父亲叫他上楼，问他道，“你愿意陪了我同到喜马拉耶山去么?”离开彭加尔学院而到喜马拉耶山去！当这个幼年诗人听见这句话时，他真是惊喜欲狂！他连忙应了一声“愿去!”于是他们不久便动身走了。

他们先到鲍尔甫（Bolpur），住在他父亲为静修而建的“和平之院”（Shanti Niketan）里。他的外甥萨底亚曾到过这个地方，回来时告诉过他许多事情，并对他说，乘坐火车是个最危险的事，一不小心，滑下去就是死，又说，一个人一定要用全力坚坐在椅上，不然，车一开，大震动便会把人弹到外面出的。所以当他到加尔加答车站乘车时，心里非常害怕。到后来。他很容易的上了车，车开时又不见得有大震动，他心里反到觉得有些失望。火车迅驰的前进。广漠的田畴，清碧的溪流，翠绿的树林，苍老的村居，都在他眼前飞奔而过。黄昏时，他们到了鲍尔甫。他在轿中，闭目想把途中的美景一一存留在心上。

在鲍尔甫的时候，他行动非常自由，他父亲并不禁止他的游散。沙地上有许多美丽的圆石，小溪在他们中间流过。他常在这个地方，收集了许多奇形的圆石，把衣袋都放满了，他把这许多收获，都取出给他父亲看；他父亲很热心的说道：

“真是有趣！你在什么地方得到这许多东西?”

“还有许多许多，几千几万呢！”他说道，“我每天去收集了许多来。”

他父亲说道，“很好！为什么不用这些石子装饰我的小山?”

所谓小山，乃是一个土堆，他父亲常坐在顶上做早祷的。

当他离开鲍尔甫时，他因为不能把那些圆石带走，心里还很觉得烦恼。

他在鲍尔甫所最喜欢读的书，乃是《拉摩耶那》。他常常坐在露天底下，带着沉挚的情感，在读着这本书，有时，他读到书中悲哀的地方竟哭起来，有时遇到可笑的地方，他又笑起来，读到冒险的地方，他又为书里的英雄着急。这时，他又得到了一本日记；他常在这本日记上写他的童年的诗歌。他拿了这本日记在手里，便觉得自己是个诗人；他常坐在绿草上，在一株小的可可

树底下，两只赤足伸直着，在那里写他的诗。

他父亲要使他练习注意，便放少数钱在他身边，叫他负保管及记帐的责任，又叫他开他的金表。但其结果总是常常错。有一天帐目上的款却比给他的钱还多。他父亲说道，“我真要叫你做我的会计，钱在你手里，似乎会变多起来！”至于表呢，不到几天便被送钟表铺里去修理去了。

他们离了鲍尔甫到安里闸尔（Amritsar）去。在路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火车停在一个大站，查票员跑来验票。他很惊奇的看着这幼年的诗人，好像有些疑心。他走开了，又同了一个人来，看了一看又走了。最后站长自己跑来。他看了太戈尔所执的半价票问道：

“这个孩子已经过十二岁么?”

他父亲回答道：“没有。”

那时他实在只有十一岁。但他的身体，也与他的诗才一样，都是早熟的；在别人看来，他的相貌实比年龄大。

站长说道，“你必须代他买一张全票。”

他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从皮箧里取出一张数目很大的钞票交给那个站长。当他们把余钱找还他时，他随手把这些钱都掷到窗外去，说道，“我从没有一句谎话，尤其是对于钱。”站长立在那里，感得他自己的卑鄙。

安里闸尔的金色的寺院如在梦中似的，跑到他的眼前。有好几个早晨，他伴了他父亲到湖中的一个寺院去，杂在众人中祈祷。黄昏的时候，他父亲面对着花园坐着，月光从树叶中穿过来，映照在地上；他便为他父亲唱着祷歌。他父亲低着头，握着手，专诚的静听着。这种景像，他到现在还不曾消融掉。

他父亲带了好几部书来教他读。最初选择出一本《法兰克林传》来（Tne Life of Bemjanin Franklin），但不久他父亲便觉得不

好。法兰克林是一个太职业化的人，他的狭隘的计算的道德，使教者引起厌倦的心。同时，他父亲又教他桑士克里底读本第二册和《通俗天文学》。他有时察看他父亲带去给他自己读的书；这些书中，使他最注意的是一部有十册或十二册之多的琪彭（Gibbon）的《罗马史》。他觉得它是干燥无味的东西。他想道，“我是一个小孩子，没有帮助的，读了许多书，是因为必须要读的。但是，一个大人，他本来可以随意的读书或不读书，为什么也是如此呢?”

他们在安里闸尔约住一月；到了四月的中旬，他们便动身到喜马拉耶山上去。在安里闸尔的最后几天里，太戈尔心中已感觉到喜马拉耶的强大的呼唤之声了。

他们走上山坡。春花在路边崖隙中盛放着，瀑布在森林中挂下。太戈尔的双眼几乎没有停视，他只恐怕把美景忽视了。他的心涨满了新的愉快。最后，他们住到一个山顶上。虽然气候已近五月，那里依然觉得寒冷：山峰的阴面，冬雪还不曾消融。在他们的房屋下面，有一座森林，这幼年的诗人，常常一个人跑到那里去。

他睡的房子在那所屋的尽端。他卧在床上，从窗中可以看见远处戴雪的高峰，在星光下面朦胧的耀着。有时，他在半睡半醒时，能够看见他父亲披了红的披肩，手里提着灯，轻轻的走过去，坐在游廊里入定。他又睡着一会。他父亲便到他床边，推他起来，那时夜的黑色还未过去。这时是他记诵桑士克里底文的时间。太阳升了，吃了早餐，等他父亲做完祈祷，他们便出去散步。但他怎能和他父亲同走呢！许多大人且追他父亲不上。隔了一会，他便从山上的一道便道里回家了。等他父回来，他又读了一点钟英文。下午又要读书。但他早晨起身得太早了；到这时候“睡眠”便来复仇。他父亲看他要睡，即停了不教。而那时“睡

眠”却又飞走了。他取了棒子，个山上去乱跑。他父亲并不阻止他。这位大哲向来是不干预他儿子们的自由的。

太戈尔常常由这个山峰跑到那个山峰，自然对于他显出千万的神秘。青碧无垠的天空覆盖在头上，银练似的瀑布从千丈的悬崖上倒挂下来，水声潺潺的响着，大树如祈祷者，静悄悄的立在那里，他这时便与岩石以及这一切大树瀑布为伴侣。他的心胸扩涨着，如河流之泛溢。

他这时并未忘了家。他常常对他父亲谈到家里的事。当家里的人一有信来，他便立刻拿给他父亲看。

他如此的伴他父亲在喜马拉耶的山峰上住了几个月，后来，他父亲叫一个仆人送他回家。他在这时期所受的他父亲的人格的感 化与所得的自然的美景的赏赐，使他 终生都印着痕迹。

第四章 加尔加答与英国

自从太戈尔由喜马拉耶山回到加尔加答，他在家庭里的地位较前变一个样子。他这次的归来，不仅是从旅行回家，而且是从他仆人的专制底下，回到他家的内室里去。当许多家人聚在他母亲室内时，他在他们当中已能占一好地位。黄昏时，家人都集在露台上，他是一个重要的发言者。以前，他在师范学校时，第一次在读本中知道太阳比地球大千百倍的事实，回家时，便惊喜的跑去告诉他母亲；现在他在这个黄昏的聚会中，又把他在喜马拉耶所学的天文学的知识，一一的都搬运出来。但使他母亲喜欢的乃是他说到他已能背诵《拉摩耶那》的桑士克里底的原本，她说道，“快把《拉摩耶那》的原文背诵几节给我听！”但是他所读的原文的《拉摩耶那》实在只有在读本中的几节，且已记忆得不大清楚。但他 这时在这种的热心于她儿子的天才的母亲前面，却又没有勇气说“我已经忘记了”。于是只好就所能记得的参以自己的话读出来。她的喜悦之心，一时按压不住，便叫了他的大哥哥来，说道，“你听拉宾（Rabi）读原文的《拉摩耶那》，他读得真好!”太戈尔便在他面前读了几句，但他大哥那时正忙于自己的著作，并不热心听著他，仅说了声“很好”，便转身走开了。

他自游了喜马拉耶山，及得到入内室的权利以后，对于学校的生活，更觉得不欲再继续下去。他想了种种方法，逃避入学。他的家人不得已，只得把他换了一个学校，从彭加尔学院转到圣史卡佛（St. Xavier' s），但结果也不见得好。他的兄弟们，这时对他都已失望，他的大姊有一天说道，“我们都希望拉宾 有成就；但我们的希望的幼芽，现在已遭摧折了。”这时，他家里还有一个家庭教师。他见太戈尔对于规定的课程不感趣味，便为他解释《战神之生》及莎士比亚的《麦克伯》（Macbeth）。他初用彭加尔话解释《麦克伯》给太戈尔听，然后叫他把她译出来。他同时还自动的读了许多彭加尔的书和杂志，常在日记簿涂抹了许多诗句。他很想成一个诗人。他的诗才渐渐的发展，他的教师及几个家里的人，渐渐承认他的天才；他在家中便得了诗人的称号。这时有一个杂志新出版，他的诗歌第一次被刊登在上面；他的散文第一次出现时也是载在这个杂志里。他著作的心很热切，有许多夜，他不睡眠，一个人在房里的微光下读书，远寺的钟声铿然而鸣。夏夜月明如昼的时候，他便如幽灵似的，在花园中的树荫下或月光中走着。

当他十六岁时，他的一个兄弟创办了一种杂志，名《巴拉特》（Bharati），他大哥做了编辑，他也参预编辑部的事；在第一号里，他做了一篇评论及一首名《诗人的故事》的长诗。

《巴拉特》出版后的第二年，他的二哥想把他送到英国去留学。他父亲答应了他。于是太戈尔便随了他二哥到阿默达拔（Ahmedabad）；他的二嫂和侄子们这时在英国，所以他二哥在阿默达拔的房子是空着。太戈尔觉得他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好，便常取了一本英文书依赖字典的帮助，逐渐的读下去。自他幼时，他读书已有不求甚解的习惯。这个习惯所收获的果实有好有坏；他到了现在还受着它的这种影响。

在阿默达拔住了六个月，太戈尔便动身到英国去。他以一个十七岁的向未与外界交际的儿童，投身入英国社会的大海中，心里自有些惶恐。幸而他的二嫂和侄子在白里顿（Brighton），给他以不少的照应。

冬天到了。他们正坐有火炉旁边，孩子们忽然很激动的跑进来说道，“下雪了，下雪了！”他们立刻跑出去。外面是异常的冷，地上满铺着白雪。这种自然是与他故乡的不同的。灰色的天空，洁白的雪，对于他都如一个梦境。

他的日子在快乐中过去。他二嫂待他很周到，他的两个侄子终日与他在一处游戏。这是他给他的心与小孩子的第一次。他心里充满了愉快与新鲜的感觉，他自己重与小童的天真的国土相接触。

这种境遇，不久便不能继续，因为他到英国来，目的在于学法律，成一个律师。他先进白里顿的一个公共学校，后来又移到伦敦，住在一个宿舍里。每天有教师来教他腊丁文。他的窗外，除了赤裸裸的脱叶的树以外，什么景色也没有。这种沉闷的生活，在太戈尔是万难忍受的。

他的二嫂又叫他到台房萧（Devonshire）去。那里有山有水，有汪洋的大海，有满缀小花的草地，有青翠的松林，还有二个可爱的活泼的小伴侣。他眼中所见的都是美，心里所有的都是快乐。他常常带了伞，坐在海滨的岩上；绿波无际，海涛澎湃，晴日在微笑，松林的影子静谧的立着，他在写他的诗。

义务又来召唤他，使他不得不离了这里而回到伦敦去。这一次，他住在史格得博士（Dr. Scott）家里。史格得夫人看待他如自己的儿子。

他在敦伦住了几个月，他有一个兄弟要回家，他的父亲叫他一同回去。他得到这个召命，心里十分高兴；故乡的光明，故乡

的天空似乎都在静默的呼唤他。当他向史格得夫人告别时，她握了他的手，哭着说道，“你既然要走得这样快，为什么先前要来我们这里呢?”

第五章　浪漫的少年时代

太戈尔现在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他饮着青春的酒，他的热情，他的感触，奔驰而外放，他所见的仅是爱情与浪漫。同样的自然，同样的人民，同样的生活；然而现在对于他似乎都变了一个样子。他要知道，这是他自己变了呢，还是世界变了呢？不久，他便发现，他自己是先变，然后与他接触的世界也变了。他童年时代的神秘主义已经还给了森林与花与山与星。他现在已不是一个神秘者而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了，有一个时期，他竟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穿着最好的时式的丝裳，吃着美食，做着叙爱情的抒情诗及其他文艺作品。

他和他家里的人，这时似乎都很隔膜。他在五十岁时，自己曾说道，“我自十六岁至二十三岁的一个时期的生活是一个极端的放浪与不守规则的生活。”但他这时所做的抒情诗，却都是极好的诗。

“我跑着，如香麝之在林影中跑，闻着他自己的芳香而发狂。

夜是五月的夜，风是南来的风。

我迷了路，我浪游着，我寻求我所不能得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不寻求的东西。

我自己欲望的印象从我心里跑出来，在跳着舞。

熠耀的幻象闪过去。

我想把它紧紧的握住，它避开我，引我到迷路。

我寻求我所不能得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不寻求的东西。”

太戈尔在这时候，正是“闻着他自己的芳香而发狂”的时候。他在《快乐的悲哀》里又写道：

“快乐睁开他的倦眼，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在这样的一个明月满地的夜里，仅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于是所有他的思想，都放在歌声中——‘我是怕孤寂的，我不见一个人来访问我——我是孤独的，我是孤独的。’

“我走近他，轻轻的问道：

“‘你所希望的来安慰你的人是谁呀，快乐?’

“快乐开始哭了，他说道：

“‘爱情，爱情，爱情，我的朋友。’

“快乐又接下去说道：‘我愿意我死了，把我自己重生而为忧愁。’

“‘你为什么这样的绝望，快乐?’我问道。

“‘为什么，我是孤独的，孤独的，不见一个人来访问我。’

“我问道：‘你喜欢看见的是谁呢，你心里所爱慕的是谁呢，快乐?’

“他的眼睛中又闪耀着泪点，他说：

"'爱情，爱情，我的朋友，仅是爱情。'"

快乐所要寻求的，正是他这时所要寻求的。

他是一个大哲学家，印度的精神的与爱国的领袖，一个歌者，一个戏剧家，一个编辑者，一个教育家，而超乎这一切，他却是一个爱的诗人（The Poet of Love）。爱情从他的心里灵魂里泛溢出来，幻化了种种的式样；母的爱，子的爱，妻的爱，夫的爱，情人的爱，爱国者的爱，自然的爱，上帝的爱，一切都在他的优美的诗歌里，曼声而恳挚的唱出来。他的歌声漾荡在天空之下，轻轻的触着人的心弦，深入的飞住在他们的心灵上，使他们快乐的笑着，脉搏几乎停止，眼里闪耀着泪珠。

他表白爱情，极为自然，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一切爱情与生活的阶级。他经过爱的颤动，热情的奔流，失望的凄楚，默修的静谧。而在这少年时代所唱的恋歌，尤足以激动一切沉醉在青春的梦里的少年的心灵。

他的这些恋歌，曾引起印度的许多道德家的反对，他们联合而攻击这个少年的作家，他们怕太戈尔的这些诗歌，要破坏印度的旧道德。即青年的人见他的甜蜜的恋歌也有不少引起反感。有一次，当太戈尔的歌声，已经换了他的调子，许多人都忘了他少年的浪漫，而敬仰他若大圣时，有一个人在一个学校的宿舍里，唱着太戈尔的一首情诗：

"这里，我爱，这里来！走过我的这个乐园里，看我的花木在什么地方是美丽的开着。西风柔和的吹拂着，风中带着花的芬香。月光照着，一条银色的河，潺缓的流下林路。"

一个少年叫道，"你为什么唱这个淫词？"他告诉他说，"这

是太戈尔的诗;”他更觉得惊奇，直到把原文拿出来给他看时，他才默然无语。

像这种的误解，是常常要发生的；这些举动仅足见妄施讥弹者的无识，至于伟大的作者，则固如日月之中天，他们的光明决不是微风所能吹得熄的。

太戈尔这时候是最自由的；他脱尽了他家庭的传袭的主见。他随意的写诗，随意的毁了它；因他这时的诗大概都不是在纸上而是在石板上写的；他不是为了博朋友的悦乐而写诗，乃是如闲云之舒卷，流水之淙淙，完全为他自己的快乐而写的。他在《我的回忆》里曾说，“石板似乎对我说道，‘不要怕，写你自己所喜欢写的，擦一下，就可以都拭去了。’我如此的写了一二首诗，毫不拘束，我觉得极愉快。我心里在说道，‘我所写的东西，终于成了我自己的了!’”在别一个地方他又有一段话提到这时的情况:

“在我做诗人的历史中，这个时期最使我留恋。从艺术方面看起来，《桑底亚·桑吉特》（Sandhya Sangit）也许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因为这一集里的诗都是未成熟的。它的文字与思想及韵律，都不能表白得确当。它的最好的功绩乃在能表现我的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所以虽然在批评家看来毫没有价值，而在我看来，那快乐的价值却是无限量的。”

在诗的内容以外，太戈尔这些情诗的韵律与风格也受了当时批评家的不少的攻击。他们以为太戈尔的诗，把彭加尔固有的格律破坏了。但这种论调，现在也已销声匿影了。太戈尔对于彭加尔文字之所以有大功，即在于他之引用了许多新的优美的韵律与新的活泼的形式。现在的许多彭加尔的少年诗人，差不多都是受了他的感动，而努力去模仿他的作风的。

太戈尔很早的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戏剧家。他家里的文艺空气

很浓厚。他论著完了一本剧本，即可在家里聚了几个同嗜好的人把它实演起来。他自己也参与在他所著的剧中，当其中的人物之一。他最初在十四岁时，即已著了一部歌剧，名《巴尔米基·柏拉底瓦》（Palmiki Prativa）。此后继续做了许多这一类的剧本。他们自己著作，他们自己歌唱，他们自己演做。在这种的快乐空气中，他度过了他的二十岁。有些戏剧批评家说，如果太戈尔愿意到舞台上去，他一定可以成一个彭加尔的最伟大的伶人。

他从英国被他父亲叫回来后，许多人都以为他不能在英国学法律，是很可惜的事，都叫他父亲再送他到英国去。这个第二度的远行，果然不久便实现了。与他同行的是他家里的一个亲戚。但他们走到中途，又因事折回了。法律的神似乎阻止他入门。

当他受批评家的种种攻击时，他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使他鼓励起精神，不顾一切，迈步向前走去，在诗国中成就了许多伟大的高尚的功绩。这个人就是彭加尔最伟大的小说家却脱柏西亚（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s）。他们第一次的遇见，在一个政治家，历史家与小说家杜特（Romesh Chandra Dutt）家里的结婚宴会里。杜特为要向彭加尔最伟大的作家致他的敬意，特以一个花圈套在却脱柏西亚的颈上。却脱柏西亚立刻把这花圈从自己颈上脱下，把它放在太戈尔的颈上，说道，“这个花圈应该给他——你没有读过他的《桑底亚·桑吉特》么?”杜特道，“没有读过。”于是却脱柏西亚便举出这诗集里的许多好诗，极端的赞颂它们。这样的出于意外的荣遇，使太戈尔眼中满含着快乐的感激的泪。他忘了所有从平庸的批评家那里受到的苦痛，认识了他自己的天才与地位。却脱柏西亚的这个荣典，对于太戈尔实比诺贝尔奖金（Nobel Prize）更光耀万倍。

太戈尔的少年期，虽曾如上所述，沉浸于肉感之中，高歌着恋情的调子，但他的精神的灵的感觉，究未完全在他心上拭去；

他的心还时时的受这两个潮流的冲击。即在他受肉的感官的诱惑最甚的时候，灵的光明仍然还熠熠的在他心头里照耀着。

这两个肉的与灵的潮流的冲突的经过，在他的长诗《爱人在夜与在早晨时》里能够充分的表现出来。

第六章　变迁时代

太戈尔的浪漫的少年生活，到了二十三岁时告了终止。他这时候正与一个女子结了婚。灵的感觉，渐渐的在心里与了优势。他渐渐的舍弃了他的清新的恋歌的调子，而从事于神的赞颂。可爱的神，已把她的面纱卸下了。

> “清晨的时候，我在自由学校街上看日出。一层纱幕放开了，我所见一切的东西都清明起来。全部的景色是一部完美的音乐，一部神奇的韵律。街上的屋宇，儿童的游戏，一切都似是一个明澈的全体的一部分——不能表达的绚丽。这个幻景继续了七八天。每个人，即那些吵扰我的人，也都似失掉他们人格的外层墙界；我是充满了快乐，充满了爱，对于每一个人及每一最微小的东西……在自由学校街上的那天清晨是第一次给我以内在的幻景的事物之一，我想把它表白在我的诗里。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鹄的：表白出人生的充实，在它的美丽里。证明其为完整的。”

这就是他看见放下面纱后的神或自然的经过。

在这一天，他做了一首诗，名《泉的觉醒》，这首诗在艺术上虽不能算是极高，却足以极表显出太戈尔的那时的内在的情绪与他的个性。

“我不知我的生命经历了这许多年以后，到今天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一种觉醒。我也不知道，在清晨的时候，太阳的真光怎么会射进我的心，或那晨鸟的音乐怎么会钻入我心房的黑暗的最深处。

“现在，我的全心身是觉醒了。我不能制御我心的愿望。看呀！全个世界连基础都颤震着，峰与山纷乱的卓列着；带着水沫的波浪在愤怒的汹涌着，似乎要撕裂这个地球的心，以报禁制它自由的仇怨。大海受了朝阳之光的接触，表现着喧哗的狂乐，意欲吞没世界以求它自己的充满。

“呵，残酷的上帝！为什么你把大海也禁制住了？

“我——自由的我——将洒布温润于我的四周。我手里握着松散的发和鲜花，带着使日光为之朦胧的光采，将附了虹霓的羽膀，从这个山游行到那个山，从这个星球游行到那个星球；或者我将变形为河流，然后从这一国流行到那一国，唱着我的使命，我的歌。

“不可解的事发生了，我的全心身为一种觉醒所苦，我听见大海在远处的呼声。是的，它的呼声！它的呼声！大海的呼声。然而，然而——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所有的墙都围绕了我！我的心仍旧听见那呼声在说着：

“‘谁愿意来？谁愿意来？那些愿意来的，在冲破石墙的范围以后，在以爱情温润了坚刻的世界以后，在冲刷森林使之成新绿以后，在使花朵盛放以后；在以你的生命的最后的呼吸安慰世界的碎心以后——如果那时谁愿意进到我的生命

里，那么，来吧来吧。'”

“我来，我来——他在什么地方，他的国土在什么地方？我不管，我将倾注我生命的最后的一滴水在这个世界上，我将唱着温柔的歌；而我的为热望所击的心也将以它的生命与远处大海的生命相合。于是我的歌声将终止了。

“但是又是堤障，堤障围绕在我的四周！这是怎样的一个可怕的监狱！让一下一下的击着，击破这监狱；因为今天晨鸟在唱着奇异的歌，太阳的真光也已射进我的心中。”

他的这个歌，虽然写完了，他的这个内在的幻景，却永不曾在他心上拭去。这种新的觉醒使他的情绪更为深挚，思想更为深刻，成了一个伟大的世界的诗人。

当这个新的觉醒的热情已冷了些时，太戈尔又做了一首诗，记述他在这个时期里的生活的经过；这首诗名《复合》（The Reunion）：

“自然母亲！在我孩童的时候，我常在你亲热的膝上游戏，且很快乐。后来，事情发生了，我飘游到外面去，飘游得离你更远更远了，我进了我少年之心的无垠荒野，而且迷了路。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球，什么星都没有。包围在西麦林的（Cimmerian）黑暗中，那地方的秩序纷乱着；我是唯一的一个夜间的旅客。

“我弃了你在后，亲爱的自然！走进那荒野，消磨了许多许多不安舒无休息的时日。

“但是现在，一只小鸟已指示我出那荒野而到那无尽际的幸福之海的岸的道路了。

“花开着，鸟又在飞着，天空又和着四周的乐声而歌。

生命的波浪四处起伏着，日光似在他们上面跳舞。

“和风吹拂着，光在四处微笑，无垠的天空在他们上面望着。我又看看我的四周，看望自然的神奇的表现。

“有的走近了我，有的称我为‘友’，有的要和我游戏。有的微笑，有的唱歌；有的来，有的去，呵，是怎样的一个不可表白的快乐的全景呀！

“自然母亲，我很明白，你在这许久以后，又寻着我，你的失去的孩子了。那就是你把我在亲爱的抱在怀里，开始唱你的森严的富于和谐的音乐的原因；那就是和风向我吹来，再三的拥抱着我的原因；那就是天空异常的快乐，把他的清晨照在我的头上的原因；那就是从天平线的东门来的云片这样注意的凝视着我的脸的原因；那就是全宇宙再四的招呼我，把我的头埋藏在她的胸前，仅在她的胸前的原因。”

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十分明了太戈尔对于自然母亲的情感是如何的亲切并可见他对于他自己少年时代的浪漫行径是如何的悔恨。

但他对于自然的爱，虽如此的热烈，而对于人间的爱却并不因此减少。他并非遁世厌世的人，乃是入世爱世的人。在这里，他便与印度的古代的圣人绝对不同。乔答摩（Priwe Gautama）听见了自然的呼声，他即刻离了世界，弃了他一切所有的，成了遁世者，成了释迦；茶旦耶·狄孚（Chaitanya Dev）听见了这个呼声，他也离了他的爱母，离了他的妻与子而去修行。但太戈尔听见了这个呼声，却使他对于世界更为接近；他的对于自然的爱，成熟而为对于千百万的被压迫的与被损害的人的爱。看他的下面的一首诗，便可以明白他的对于人间的爱恋与对于修行遁世者的反抗态度：

“中夜的时候，一个要做修行者说道：

‘现在是我弃了我的家而去，寻求上帝的时候了。唉，谁蛊惑了我，使我留住在这里这许久呢?’

上帝微语道，‘我，’但那个人的耳朵是被塞住了。他的妻子，躺在床的一边，和平的睡着；一个婴儿睡在她的胸前。

那个人说道，‘什么人愚弄我这许久呢?’

那个声音又说道，‘就是上帝，’但他并不曾听见。

婴儿在梦中哭起来，更紧的靠近于他的母亲。上帝命令道，‘停止，愚人，不要离开你的家庭，’但他仍旧没有听见。

上帝叹了一口气，诉说道，‘为什么我的仆役要飘游的去找我，去寻求我呢?’”

他的父亲大哲人台平特拉那斯·太戈尔忙着解决第二世界的问题，但是他，诗人太戈尔，却努力爱这地球，爱这地球上的人类，想合天与地而为一。

他之爱世界如一个守财虏之爱他的金钱。他甚且疑惑到天的给幸福于地上的生命的能力。他说：“呵，我是怎样的爱这个世界呀！它静静的躺着。我觉得似乎拥抱了她和她的一切的绿树与鲜花，河流与平原，清晨与黄昏。我常常在诧异，天空它自己是否能给我们以所有的幸福，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天空怎么能给我们以所有的东西，如这种正在长成的人类的宝藏，这样充满着温柔，怯懦与爱情的么？……她似乎在我耳边微语道：‘我是神的女儿，但我没有他的能力；我爱，但我不能保护；我能够开始，但我不能完成；我给人以生，但不能救之于死的手中。’

这个无帮助，这个怯懦，这个不完全，与这个不能与爱，分离的消损的焦切之心，使我嫉妒天空，而我之爱世界因此更甚。”

在这个时候，太戈尔已有三十岁左右了。他的人世间的经历愈深，他饮了人类的欢乐与哀悲的酒愈多，则他的对于上帝与自然与世界的情绪愈为沉挚深刻，他这时候所做的与以后所做的诗歌，所发的乐音虽然复杂，而他的琴弦却仅有一条，即上帝的爱。天上的日月与星辰，地上的绿树与花朵，都对着上帝述说他们的爱。有许多崇信上帝者读了他的歌，泪真在眼中溢出，还有许多祈祷者，在他们早祷，晚祷，午祷的时候，以他的诗歌当做赞美诗唱。

他的诗集《白拉摩·桑格特》（Brabmo Sangits）是这时所做的宗教诗的集子。这个集子出版时，他已成为影加尔人崇敬的中心。批评家的箭头，已永不会再向他放射了。

他的英文的诗集《吉檀迦利》（Gitanjali），即系包含他所做的宗教诗的一部分的集子；当这诗集在英国出版时，不仅感动了以热忱介绍这诗集的诗人夏芝（Yeats），且感动了全英国的人，全欧洲的人。北方的瑞典立刻将“世界诗人”的名誉供献给这个彭加尔的伟大的作家。这些宗教诗，不仅是达到太戈尔的抒情的与灵的天才的最高峰，且实为世界文库中一种最希贵的诗的及神秘的作品。

许多年以前，他的父亲曾读了他的一首儿童时所做的宗教诗而笑起来。这件事，太戈尔到这时还不曾忘掉。但在这个时候，这个印度的大哲人似乎也受他的儿子的这些歌声所感动了。他忽然叫他的儿子到他住的地方来，要听他唱他所做的歌。于是他便唱道：

“我的眼不能见你，然你却常常在我眼前。我的心不能

感到你，然在沉默中，你却使我觉到你永远都在那里。……

“没有朋友的人与被弃的人都能常常觉得你，觉到你的爱。即那无家的飘泊者也可以在你为我们全体而建的一所屋里住着而得到安慰。”

他的父亲听完了这首诗，便带颤动的声音感动的说道：“歌是超绝的，我已认识了你的天才。”于是这老人便给了他儿子一束纸。诗人太戈尔解开这些纸，得到一张五百卢比的钞票。这就是他因他的诗歌得到的第一次的诺贝尔奖金。

第七章　旅居西莱达时代

诗人太戈尔的长兄特威琴特拉那斯，是一个大哲学家，前面已经提过。他对于实际的事务方面，毫不注意。他父亲叫他去管理他的乡间的产业。他到了那个地方不久，立刻便觉察出农民的穷苦。许多农民都跑来诉说他们的苦处。这位哲学家受了很深的感动，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他父亲，叫他寄钱来帮助穷苦的农民。他父亲以为一个良好的管理员，必须使地主与农民各能满足。所以他把特威琴特拉那斯叫回来，换了他最少的孩子，诗人太戈尔去管理这些产业。

这位少年诗人，管理这些产业的时间很久。他常常住在一只家艇里，泛泊在柏特玛（Padma）河，及它的支流上面，与自然密切的接触着。他对于自然的各方面，都观察，研究，恋念，爱惜。下面的两封信是他从西莱达写的，叙述他那时的在家艇里的生活及他对于柏特玛河的爱恋极详：

“我现住在我的家艇里。这里我做了我自己及我时间的超绝的主人。那家艇如我的旧大衫一样，——异常的舒服。我在这里，喜欢怎样想便怎样想，且随着我自己的心意去幻

想：要读多少书，做多少文字也随我的喜欢做去。我坐椅上，足放在桌上，我的心灵，沉泛在这天色斑丽，光明晕照的暇日里了……实在的，我非常亲爱这个柏特玛河，它是怎样的荒芜，怎样的旷远无垠。我觉得如骑在它的背上，爱恋的在拍着它的头颈。……我不再愿意在众群舞台的足灯之前做一个脚色。我倒愿意在我们住在这里时的所有的明亮的时日里，于沉默孤寂中，尽我的责任。这里的人并不特可注意，但自然却伟大而庄严。……当我在乡路间走着时，我把人也当做自然之一物了。河水流经许多奇异的地域，人道的水流也是如此，它从它的各支流里流着，经过浓密的森林，寂寞的草地，繁华的城市，常伴以它的神乐。让河流唱道，'人时来，人时去，但我则永远流着，'是不对的，——因为人也是永远循着他的千百支流永远的走着的，他的一端连在生之根里，而其别一端则入死之海里——而全部则被包围在神秘的黑暗中：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躺着生命，劳动与爱情。"

"我在没有旅游柏特玛河之前，很怕因为常常相伴之故，我对于她不能觉得有趣味。但当我一浮泛在河上时，我的一切疑虑都消失了。水波汩汩，船身微荡，天空光洁，柔绿的水灏莽，河岸上树林的枝叶新鲜，——颜色，音乐，跳舞，及美丽集合而使自然的高超的和谐，照耀着光彩。所有这一切在我心里惊醒了一种敏锐的趣味与沉挚的愉快。"

这个恒河之女，及它的两岸的广漠平原的影响，都反映在太戈尔所有的以后的著作里。他在这里，使他的"黄色彭加尔"穿上了理想的衣衫，且给他以在生命的真实里的无限之前的一种深沉的意义。他在一封信里，曾说起他对于彭加尔的恋爱：

“每天晚浴之后，我必沿河走了许多路。然后我便在我的舢板上设了一个床，我的背平躺在床上，在黄昏的沉静的黑暗中，我自问道：‘我来生还能够生在这样的多星之天的底下么？我来生还能够这样的躺在一只舢板上，在我们的黄金彭加尔的哥拉河上么？’我常常怕我也许永远不能再有机会在这样的一个黄昏里愉乐着。我也许会生在别一种环境里，心灵的感觉，与现在完全不同。我也许能遇到这样的一个黄昏，但这个黄昏也许已不会这样亲热的躺在我的胸前，以她的松散的黑发蔽盖着我了。我最怕我将来会生到欧洲去。因为在那个地方，我将不能这样的躺着，以我的全身体全灵魂都向上望着。在那个地方，我也许要在工厂，银行或国会里作苦工。因欧洲城市里的街道都是用坚石，砖头及水门汀铺设，便于商业及运输，所以人的心变了坚硬，而最适于商业。在他们的坚石所筑的心里，决无丝毫的空地以植柔美的藤蔓，或一叶的无实用的绿草。”

他如此爱恋彭加尔，如此的亲切的抚摩着彭加尔的绿河与青山与多星的天，闲暇而自由的生活，使他唱出一首超绝的《黄金彭加尔》的歌：

“我爱你，我的黄金彭加尔，因为你的天空和你的空气常拨动我心的弦。

“春天的时候，你的檬果树呼吸出花朵的狂香，秋天的时候，你的已收获的田野，在享用的祝福里微笑着。亲爱的母亲！呵，你的爱，以如此华丽的装饰，衣被了河的两岸，树的荫影，你的爱真是不可表白的温柔呀。母亲，你的唇的

呼吸接触着，没有什么东西在我耳朵里比之它更为甜蜜。当我注意到你脸上最少的至情的痕迹时，我的眼睛里即浮泛着泪水。我童年的时候，曾在你的游戏室里娱乐过，现在，当我一接触到你的尘土的微粒时，我便觉得幸福。

“黄昏的时候灯火在室内亮着，我放下我的工作与游戏，跑到你的亲爱的膝上来。在乡村中，家牛和善的凝视着到渡口的沿路的田野，鸟儿快乐的在枝头歌唱着。——树枝投射它们的荫影，以慰安日中的灼热，天井里照耀着割来的谷稻的堆束，我度过我生命的日子，觉得和你的牧童及农民是兄弟。

“母亲，我虔敬的低下我的头，沉在你的足的尘土中，我见到他们比见到金刚石及翡翠的尘土还要宝贵；我预备供献我所有的一切，在你足下。”

当印度的新的国民运动开始之后，太戈尔的这首诗曾时时的被他们带着新的热忱歌唱着。

当这个时候，太戈尔见到真可算是沉醉在自然的慰爱中的了，但同时他又开始尝到人世的悲苦，这便是他与农民接触的时候。他在农村中，见到了许多的专诚朴质的农民，深受他们的纯朴的精神与虔心的理想主义的感动，常常给他们以物质上的帮忙；正直而慈悯的管理他们。他自己又研究起家庭药学，帮助他们有病的人，无论日夜，一闻有人病了，他便带了药具，自己去看望他们，给他们以药。因此，他与农民的接触愈为密切。然而他们的疾苦与无助更使他在睡梦中都觉得不安。在下面他的一封信里，足以表白他的对于农民的同情。

“当我对印度农民观察时，我心里觉到忧愁。他们是如

此的无助，好像是地球母亲的婴儿们。她如果不用自己的手去喂养他们，他们便要挨饿了。当她的胸干燥时，他们便号哭着；如果他们得到一点东西吃，他们便又立刻忘了一切的过去的苦恼了。我不十分知道社会主义者要求财产的分配究竟是否可能。但是，它如果是绝对不可实现的，那么，上帝的法律真是残酷，人类真是无助的不幸的了。如果忧愁要住在这个世界上，让它住着吧，但必须有几线可能的光明，使人的更高尚的天性，可以奋斗，可以希望，而将这样的情形改进。有些人述说一种极残虐的理想，以为在人类之中，要求生活需要分配的可能，实是一种梦想，又说，有些人是命运注定了要饿死而无可救药的。这至少也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理想。”

他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从他们家艇中写了一封信，这信也足以看出他的对于农人世界的苦闷的感觉：“这里有大水。农民割了未熟的稻，用船载回家去。我听见他们的叹息与忧愁的诉说。当这次水灾来时，稻田都快要成熟了。不幸的农民所希望的不过是能有几粒好谷在谷堆里而已。

“在宇宙的工作里，慈悲必定有在什么地方，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它呢？但去寻它的寄托的地点却极不容易。几千万无辜的不幸的男女的怨郁，没有高级法庭可以告诉。雨随着它的喜欢落下，江河随他的愿意而流去，没有人能够从自然那里恳求及得到挽回。我们安慰我们的心说，这问题是在意想以外的。——然而我们却同样的体验到在造物的难测的法律上还有些慈悲和公平。”

他如此的与农民亲切的同住着，又把财产征收的方法改革过，成绩较他的大哥大有进步。农民爱戴他，恋念他，收税的人

也受了他的道德的感化，贿赂已成了过去的东西。几年以前，太戈尔手下的一个收税人，私自受了一个卢比的贿赂，他立刻觉得十分的不安，向太戈尔忏悔自己的行为；太戈尔也并不追究他。

太戈尔对于农民的恩惠与同情，及他的想改善农民生活的企图，在农民方面固然十分的感激他，使他的名字深深的占领在他们的心里，然而这个地方的英国官吏却也深深的生了妒嫉及猜疑之心，时常以种种的方法阻碍防止他，正如前几年他因为为他的学校聘请了一个爱国诗人做教师而大受印度总督的猜忌一样。

在西莱达的许多年里，太戈尔的文学的收获很富丰。他的大部分的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地方写的，他的诗歌在这时也出产了不少。

第八章　太戈尔的妇人论

太戈尔帮助了他父亲做了许多关于社会，宗教及政治的改革的工作。他对于用教育来提高印度妇人的地位的事业，尤为注意。他绝对不相信妇人的劣等说。他表同情于孔德（Comte）的话："无论男或女性，都有其他一性所无的东西，每一性补足其他一性，也受其他一性的补足；他们没有相同之处，两性的幸福与完美即在于此性要求或领受彼性所仅能给与的东西。"

在近代女权运动未发生之前，他已有一种公平的主张。他虽然不大相信妇女参政；但他却以为：如果男子在政治上能尽他们的责任，女子即完全没有选举权也不要紧。但是当男子不能实行他们的义务，不能正当的统治时，则女子出来要求选举权实是公平的举动。在二十几年以前，他有一封信，讲述他的妇人论甚详：

"我想了一会之后，得到一个结论：在男子的生活里没有那为妇人生活的特质的充实。妇人的言语，衣服，态度，与责任，都是一种统一的继续。这个主要的原因，乃在于许多年代以来的自然，已经决定她们的活动的范围。这些时候

内，在文明的理想上，并没有什么变迁，革命，或转移，足以引导妇人离开她们的继续的路的。她们所有的事是工作，恋爱，安慰，再没有别的事了。这些功用的技能与美丽，愉妙的混在她们的形体，她们的言语及她们的举止上。她们的活动的范围，和她们的天性已互相合在一起，如花朵及它的芬香一样。所以充溢于她们之中的只有和谐。

“男子的生活便有许多不安定的地方了。他们经历各种的变迁与工作的过程的记号，是很显著的印在他们的形体与天性上的。前额的异常突起，鼻部的丑异的耸出，颔骨的不美的发达，在男子是很普通的，在妇人则不然。如果男子这许多年代以来，都沿了一条路走去，如果他被训练去做同一的工作，那么，男子便会有一个范式发生了，他的天性与工作，也会包笼在和谐之中了。在那种情形里，他们便不会去这样辛苦的思想着，奋斗着以完成他们的责任了。各种事件都会非常平顺而美丽的做去了。于是他们便发达了一种天性，他们的心灵也不会以最少可能的激怒，而即飘游开责任的路了。

“自然母亲铸造妇人于一个范式里。男人则没有这种原始的束缚，所以他不向一个中心观念而发展他的充实。他的歧异的不驯的热欲与情绪，站在他的和谐的发展的路上。韵律的束缚是诗歌的美的原因，同样的，定律的音韵的束缚也是妇人的所有的充实与美丽的原因。男子像不联络的怪异的散文一样，毫不和谐，毫不美丽。那便是诗人常以歌声，诗，花与河水来比妇人的原因；他们永不会想到以这些东西来比男子。妇人如自然界里的最美丽的东西一样，是联合的，是平均发展的……是受美好的束缚的。没有怀疑，没有相违的思想，没有专门的辩难，能够破坏一个妇人的有韵律

的生活。妇人是完善的。”

东方与西方的妇人的地位的高低，是常引起辩论的一个题目。基督教里的人不明白印度社会组织的精神，他们以为印度妇人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印度的守旧者，则毫不明了印度以外的世界的情形，以为印度妇人的生活是极幸福的。但是太戈尔则不然，他对于两种社会的情形都很热悉，他看出两方的妇人都有好处与坏处。惟有施以适当的教育，才能矫正那些坏处而发展那些好处。他以为欧洲文明的进步，适足陷妇人于日益不幸的地位。男子受生活的压迫，都不愿意有家庭的负担，孩子一长成，便也立刻离开他母亲不一反顾。所以西方的妇人，不得不违反他们的天性，到社会里去求工作，求生存。太戈尔以为这个社会和谐的破裂即欧洲妇人所以要求男女平权的主因。妇人既不欲在家庭，于是欧洲的家庭便渐渐的消灭，而旅馆则日见其增加。男子以马，以狗，以枪，以烟管，以游荡为娱乐，所有他们工作的钱，都耗在自己身上，而妇人的和谐生活，渐渐的被其破坏，她们对于这种生活环境的变迁，显然的还未十分习惯。其结果则为不安与艰苦。至于印度妇人则不然。她们使印度的家庭微笑着温柔，甜蜜与爱情。男子和治家的女子，住在一起觉得快乐，女子们也永不曾诉过苦。英国人在理想中，以为印度妇人是极苦的。太戈尔以为这种思想正如水中的鱼类，以人类在陆地上的生活为不好，而欲发慈悲之心，引人类到海的深处去。英国人看见印度人的朴质生活，看见他们的小屋，他们的粗木的器具，油的土灯，绳结的床，棕叶的扇子，总悲悯他们的生活，总以为印度的妇人是男子的奴隶。然而在实际上，印度的男子与妇人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虽没有沙发，没有美丽的舒适的家具，但他们却相信着。他们喜欢爱情与家庭生活较甚于一切物质上的享乐。至于

西欧的人，则喜欢生活的快乐与家具，似乎较家庭与爱情为尤重。

他的关于女性的哲学，在他的诗剧《齐德拉》（Chitra）里，发挥得很详细。

第九章　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

太戈尔父亲的一个彭加尔的朋友，偶然写了一封英文的信给他，这位大哲人把原信退了回去，并不回答他，为什么一个彭加尔人写信给彭加尔人，要用英文写呢？这就是国家主义。太戈尔自幼即受了这种爱印度与印度文化的教育。在少年的时代，他和几个爱国的朋友，常常秘密的集会在一处，闭了门，低声的谈着，讨论印度的实业与政治的改革方法。他因为要养成勇敢的精神，常出去打猎，故意去做劳苦的事。他写了许多崇颂爱国的与自己牺牲的诗。当他的兄弟约特林特拉那斯（Gyotridranath）组织了一个轮船公司，与英国的一个公司竞争时，太戈尔曾极热忱的帮忙过他。他出去讲演组织的重要，宣传国家主义的福音。当他相信着："一国的诗歌，绘画及音乐灭亡时便是这个国家的灭亡"的话时，他便专心去做一个诗人以重兴印度。

太戈尔诚然是一个印度的国家主义的诗人。如果突然的有了一场天灾，把太戈尔所有的哲理深邃的论文，所有的专门的历史的解释，所有的游动心灵的短篇小说，所有的有力的比譬的戏曲，所有的布局谨严的长篇小说，所有美丽动人的抒情歌谣，一切都毁灭了，而住在印度的人，仍然会记起这个大诗人的，因为

他的国歌使印度人的口永远不会忘记了他们，他的国歌，具有印度生活的不朽的印记，印度的名称，存在一天，他们即有一天的影响。

欧洲的史诗与抒情诗是不常深住于群众的心中的，印度则不然，他们的诗歌，大概多以口相传的。所以太戈尔的爱国诗歌，几乎没有一处不在唱着。清晨的时候，朝阳耀着他的金色光采，便有许多人在路上唱着这些歌，唤人醒来，加入对于神与祖国的祈祷。午潮满涨的时候，牧童在榕树的四布绿影底下游戏，他们也对着他们自己，对着枝上的鸟，田野中的牛唱着这些诗歌。当印度的景色浴在落日的淡光中时，船夫向下游驶去，农夫肩锄回家，——他们又都在唱着太戈尔的这些国歌。他们在国家的国会与会议里唱着，在王子的宫中，乞丐的口中唱着，在结婚时与祈祷时唱着。

有些批评家以为太戈尔的国歌未免太软弱了，似仅适宜于印度的现在的应用。这是实在的，他没有火焰一般的热力，没有瀑布一般的涌涛；这也是实在的，他的国歌所能引起的仅是较柔和的情绪。没有刚锐强毅的反抗精神。然而印度的精神原是退让的。当他们唱道："你的祖国在竞斗着，在受苦着，唉！她在饥饿着，仅有肯尽责任的儿子才能解母亲的忧呀！"其影响实较唱："醒来，快起来，战胜，而且把压迫者的暴力冲到地下去"为更大。太戈尔的国歌即是具有前者的精神的。他把祖国理想化了，他用许多种的方法来说明她，在读者的心中起了许多种的热情。他叙她的金浪起伏的稻田，她的微笑而芬芳的花朵，歌唱着的鸟，潺湲着的溪流，以及尖耸的山峰，甜蜜的家庭，而笼罩以热情的爱感。他唱道：

"我的祖国，我对你供献了我的身体，我为你牺牲了我

的生命；我为你而哭泣；我的音乐也将唱歌着为你而祈祷。

“虽然我的臂腕无助而且无力，而他们仍将为你，仅仅为你的原故，而去做事；虽然我的刀不庄严的污锈了，而他也仍将斩断束缚你的链子的，我的甜蜜的母亲。”

有几任的英国的印度总督，想摧残彭加尔的爱国运动的精神，采用了俄国式的告密及审判制度，太戈尔的歌鼓动起爱国者的精神。他的歌感发青年人的灵感，使他们为祖国而受苦，而牺牲，而微笑的走上断头台。有一个印度的爱国者，当他受死刑时，他口中还唱太戈尔的下面的歌：

“兄弟，不要灰心，因为上帝并不曾在睡。
绳结愈紧，你的受束缚的时期也将愈短。
咆哮之声愈高，你也得愈快的从你的酣睡中醒来。
压迫的打击愈厉，他们的旗帜也将愈快的与地接吻。
不要灰心，兄弟，因为上帝并不曾在睡。”

当印度的青年爱国者为了爱国之故，受尽了各方面——他们的朋友，亲戚，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的压迫与嫉视时，他们又在太戈尔的《跟随着光明》的那首歌里，得到了鼓励，与感发的甘泉：

“如果没有人响应你的呼声，那么独自的，独自的走去吧；如果大家都害怕着，没有人愿意和你说话，那么，你这不幸者呀！且对你自己去诉说你自己的忧愁吧；如果你在荒野中旅行着，大家都蹂躏你，反对你，不要去理会他们，你尽管踏在荆棘上，以你自己的血来浴你的足，自己走着去。

如果在风雨之夜，你仍旧不能找到一个人为你执灯，而他们仍旧全都闭了门不容你，请不要在心，颠沛艰苦的爱国者呀，你且从你的胸旁取出一根肋骨，用电的火把它点亮了，然后，跟随着那光明，跟随着那光明。”

还有两首为祖国而祈祷的诗，也引起许多人的热情：

“其使我国的土地与江川，空气与果实成为甜蜜的，我的神。

其使我国的家庭与市场，森林与田野都充实着，我的神。

其使我国的允诺与希望，行动与谈话成为真实的，我的神。

其使我国的男女的生命与心灵成为一个，我的神。”

“彼处心是不恐惧的，头是高抬着的；

彼处知识是自由的；

彼处世界是不被狭窄的局部的墙，隔成片片的；

彼处言语是由真理的深处说出来的；

彼处不倦不疲的努力，延长手臂以达于‘完全’；

彼处真理的清澈的川流是不会失路而流入‘死的习惯’的寂寞的沙漠上的；

彼处心灵是被你导引而 向于‘永久广大’的思想与行动的——

我的天父，其使我国警醒起来，入于那个自由的天国里。”

太戈尔之所以宣传着，呼喊着，要求大家努力以取得的即是那个自由的天国。“朋友们，现在已不是睡梦的时候了，合力工作的时间已到”；“如果你希望生活，且在这个世界上命令尊敬，第一先要预备为你的祖国牺牲你的生命。”

他的爱国的诗歌，所孕蓄着的是爱恋，是鼓励，是牺牲的精神，但却丝毫没有愤怒，嫉妒，或厌憎世界上任何人的暗示。这是他与一切标榜“铁与血”的急进的爱国者不同之处。因此许多人多反对他的主张，更激烈些的，则常常的骂他。有一个在美国的印度留学生曾说道，“我不高兴见太戈尔的脸，我不欲走过街与他相见。即一个贩卖印度货的不识字的商人，为了要虚价而入狱者，也比这个大诗人高等些——他实是一个道德的懦怯者，食了自己的话，然后去休息。”然而深知他的人，却很原谅他，知道对于上帝的爱与祖国的爱，是他的生命里的两个主要的特色。上帝是他永久的伴侣，祖国则是他常常想到的目的物。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浅窄的印度的国家主义者，而是一个世界的国家主义者——一个世界的人道主义者罢了。他的世界主义是已达了“完善”之巅的。他是一个二十世纪的理想者，相信人类的一体，因其分而益显其繁富。他以为人类是超乎一切国家之上的。国家的，种族的各种分子，以及他们在人类社会里的合作是宇宙和谐的发展的要素；正如人体的各类机关，他们的区分与合作，为人的康健的发展的要素一样。他想，玫瑰花的使命在于开放花瓣以互相分别，同样的，人类的玫瑰的美丽也因不同的国家与种族之达到他们的最完全的特质之点，同时又以爱情的带附着于人类的干上而达到完全之境。那就是东与西的生活所以不同，东与西的使命所以不同，而他们的最后目的又是相同的原故。他有一次在英国人与爱尔兰人联合欢迎他的宴席上说道：“虽然我们的言语不同，我们的习惯不同，而在根底上，我们的心是一个。……东

是东，西是西，但这二子必相遇于友爱，和平与互相了解之中，他们的遇合且将因他们的不同而更为有效果，它必会导引这二子在人类的公共祭坛之前行神圣的结婚礼。”

第十章　和平之院

太戈尔在一九〇七年时，即与实际的政治与政治运动断绝关系，还在这个时候以前，他的内心里，感到一种变迁的光，这个变迁要求因印度的再造而为更完满的牺牲。他不注意于政治，经济及其他，而欲用教育的改造为印度改造的基础。充满了自由与爱的教育不仅能发展智力与道德，而且能造成一个精神的人。他最反对强迫的注入式的教育；他以为教育的全步程，应该愈简易愈自然愈好，务使儿童受最少的痛苦。为要实现他的主张，他便在鲍尔甫（Bolpur）办了一个学校，校址即为以前他的父亲用来静修的“和平之院”（Shantineketan）。经济与社会的批评，常为他的计划的阻碍。但他的父亲却很帮助他。他的精神也极坚定，决不因外界的影响而自馁。一九二四年，这个学校便开始成立。最初仅有三四个学生。太戈尔自己的儿子是第一个入学的人。他自己有关于这个学校的一段话：

“我为了要复现我们古代教育制度的精神，决定创办一个学校，学生在那里能够在生命里感觉到一个比现实的满足更高尚更光荣的东西——熟悉生命它自己。我想把小孩子们

的奢侈除去，使他们复返于朴质。所以因此之故，我们的学校里，没有班次，也没有凳子。我们的小孩子们，在树下铺了席子，在那里读书；他们的生活，力求其简单。这个学校建立在大平原里的大原因之一，即在于要远远的离开了城市生活，但在这一层以外，我更要看孩子们与树木一同生长；因此两者的生长之中有了一种和谐。在城市里看不见什么树。他们是为城墙所限禁的。城墙不会生长。石块与砖头的死重压抑了儿童天性里的自然的快乐。

“我在学校里，并不曾得到最好一类的孩子。社会看这个学校为一个刑罚的住所。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因父亲不能管束，才把他们送到这里来。”

然而因太戈而与他的合作者的爱感与看护，这个学校的学生学业的与性格的成绩却都很好。英国与印度人办的学校，须八年才能预备好的课程，在“和平之院”只要六年就可以够了。

这个学校的日程与别的学校完全不同。学生们和教员们在清晨四点三十分时即须起床。

他们自己把床整理好，全体跑出来，唱着歌，祈祷万有之主。栖息在树枝上头的鸟儿们，被惊醒了，也加入他们的歌队里而合唱着。沐浴以后，他们穿了白丝袍，坐下去，自己静修着，祈祷着。然后吃早餐，吃的是牛乳，米粥或其他轻淡的食物。课程的开始是七点三十分。学生们铺了自己的席子在树下，坐在上面，书本是没有的，无论授文学，历史或地理都是如此。仅在教授实验科学时，他们才有物理或化学的试验室。功课都用口授，太阳暖暖的晒着，微风送来花的芬香，绿叶合了教者的音乐而簌簌的响着。每一个教员，一班至多不能教过于十个的学生，有的时候，一班只有一个学生，所谓班次也并不固定。如果有一个英

文程度高的学生，他上英文课时可以随了别的高级生同上，他的算学及其他功课，则仍在自己班里上。十点三十分时，功课已上了三点钟，学生们随意唱歌。隔了一会，学生们与教员们又去沐浴。有的到溪流里去，或在那里游泳，有的跑到井边，大的学生代小的学生汲水，穿衣服，如一个母亲一样。沐浴后，又唱赞美诗祈祷上帝。午饭的时间是十一点三十分。所吃的是米饭，青菜，牛油及牛乳。饭后，小孩子们便在图书馆里看书，看杂志，或研究自己的功课，或做其他自己所喜欢做的事。二点钟时，各班又在树下开始授课。教员们授课时不能用木棒或其他的身体的刑罚。四点钟时，功课已毕。他们便都在运动场上踢足球，打网球及做其他游戏。他们的体育，也和他的学业一样，胜过其他一切学校。他们的足球队曾打败了加尔加答的许多别的球队，他们的兵操也能与陆军学校里的最好的学生相比肩。又使他们能忍耐寒热；热天叫他们在太阳下面跑了好几里路，冷天也在屋外，除了疾病的时候以外，都不穿鞋袜。有的时候，他们一次能走到二十几个英哩的路。这种斯巴达（Spartan）式的练习，使“和平之院”里的儿童，身体都非常康健。

许多“和平之院”里的较大的儿童，受了太戈尔的影响，常常跑到邻村去，救济穷苦的居民。他们假装要演戏法，召集了许多人在空地上。后来他们停止了戏法，开始以兄弟的精神向他们讲演。所得的影响极为伟大。他们为村中的小孩子们创设了日校与夜校。当村人疾病的时候，他们看护他们如一个亲人。他们专心一意的为村人谋幸福；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如苦力似的，为村人建筑住屋。这种精神，是太戈尔所希望养成的。他希望他的学生，能在生活里合印度的精神的趋向与西欧的 社会服务的精神而为一。

游戏毕，学生们又沐浴过，穿上他们的白丝袍，约有三十分

钟，在那里祈祷及静修。然后去吃晚餐。在“和平之院”里，大家都是严格的持素食主义的。太戈尔的父亲绝对不欲在鲍尔甫住的人，饮酒，食肉，或其他扰乱“和平之院”的神圣的和谐的举动。晚餐后，学生与教师们联合做各种智慧上的娱乐。

太戈尔与印度的习惯相反，他的学校里很注重音乐。他爱音乐，相信它的高尚的影响。音乐班在晚上召集起来。他们唱着，以各种乐器和着。所以这个学校里很产生了几个第一等的歌者与音乐家。他们又有一个戏剧团；有时便演太戈尔作的剧本；他自己教导那些孩子们，有时且自己加入演剧者之列。

他们在夜间又编辑他们的报纸，全校中共有四种的报纸，全都是用手来写，用手来作图的。他们所作的，有的是诗歌，有的是文学评论。

一天的工作完了，在九点至十点之间，他们便去睡觉。

太戈尔他自己住在一间屋里。晨钟一响，他便起来，有时且在钟声未动之前起来，早浴后，坐下静修了好几点钟。他在这个屋内，常常自己做饭；所吃的极为简单。他有时出去散步，且很喜欢园艺的事。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思想，这两句话可以写尽他在鲍尔甫生活的情形。他在一个星期总有两次对学生及教师们讲演。他极爱那些小孩子。有的时候，有一二个孩子偷偷的跑进他的屋里，看他微笑着，摇着头，在写一首诗。有一次，这样偷进去看的一个孩子突然叫道：“简直像一个疯子。”太戈尔答道：“是的，我的孩子，诗人是比疯子更坏的。你什么时候跑进这屋里呢?”

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坐在太戈尔的膝上，弄着他的胡子。这孩子说道，“你做了那么多的诗，为什么不教我做诗呢?”太戈尔答道，“我的孩子，诗歌的负担是异常之重的，我不欲使你有这种负担。”那孩子说道：“是的，我自己会去学做。他们似乎都很

喜欢你的诗，虽然你是担负重一点。”现在这个孩子有十余岁，已能够用彭加尔文做很美丽的诗了。

自他定居于鲍尔甫后，他做了许多好诗与好的戏曲，《吉檀迦利》里的诗及《暗室之王》，都是在这时做的。他平时不大与外界交通。但有时则到各处去讲演，如前几年曾到美国及欧洲去过。至于他的“和平之院”则到了现在，已经是很发达了；经费已很充足，最近又改为“国际大学”。

第十一章　太戈尔的哲学的使命

太戈尔在他的诗歌与散文著作里所表现的精神主义的理想，都是印度哲学的真理。印度是具有哲学的心灵的。她经过许多年代的对于生与死的最深沉的问题的默思，发展了一种玄想哲学的系统，使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贤哲都为之赞颂，为之倾心。以前慕劳尔（Max Müller）教授，曾在一个讲演里，极端称颂印度及其思想："如果我看遍了全个世界，要去找出一个国家，最丰富的具有自然所能给与的一切财富，权力，与美丽——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一个地上的乐国——的，我必向印度指着。如果有人问我在什么天空底下，人的心灵曾最完全发展出它的几件最好的赠品，曾最深沉的浸入生命的最大问题，曾解决了好些这种问题，很值得使研究过柏拉图与康德 的人的注意的，——我必向印度指着。如果我问我自己，我们在欧洲的人，我们天然的完全受了希腊与罗马及赛米底的一族犹太的思想的影响的人，从什么文学里，我们可以得到那最需要的正确，以使我们的内部的生活成为更完全，更有意识，更为普遍的，即是，更为真正的人的，一个生命，且不仅仅为了这一生，而更为是一转世的永久的生命，——

我仍旧是向印度指着。”

印度思想的最高点在于《优盘尼塞》（Upanishad）的吠陀（Uasonta）哲学。法国哲学史家考辛（U－Consin）说道：“我们不得不屈膝于东方哲学的前面，在这个人类的摇篮里看见最高哲学的出产地。”叔本华（schopenhauer）也说道：“在全个世界中，没有一种学问是比之《优盘尼塞》更为有用，更为高尚的。它是我们的生时的慰安，也将是我们的死后的慰安。”慕劳尔说道，“如果叔本华的这些话要再加以说明，我愿意因我自己经过长久的专门研究许多哲学与许多宗教的结果而为它说明一下。如果哲学的意义是为一个快乐的死的预备，那么，在我所知道的哲学中，没有比吠陀哲学是更好的预备了。”

太戈尔在他的哲理的诗里所唱的，在他的《生之实现》的论文里所说的，就是这个《优盘尼塞》的哲学。它述说宇宙的一体——在现象世界的分歧里的根本上的一体。华滋华士（Wordsworth）是一个奇异的自然诗人。他对于自然精神是亲切的，但有时是含混的。他的歌声优雅清越，但所唱的却为世界是忧愁所造的，“我们的生不过是一个睡眠与遗忘”，“狱室的阴影开始紧罩在长成的孩子的身上”一类的哀歌。太戈尔的哲学则与他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世界是充满了快乐与爱的，幸福在全宇宙中跳舞着。这个世界诚然是有忧愁，但他们却如印度秋天的浮云一样，反能增明月的光华。在底下的一首诗里，我们可以更明白的看出他的生与爱与动作的哲学：

> “啊，我的最感恋的地球母亲，我是怎样常的恋念的看着你，又是怎样常的从我的心里，不可禁的快活的唱出来呀！我身心的要质融化入你自己的里面之后，你便不绝的在永久的中间，旋绕在远星转动。而你的嫩绿的草叶，长在我

身上，花儿繁锦似的开着，树林如阵雨似的把他们的花果落在我身上。是的，落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一个人坐在柏特玛河边时，我能够容易的感觉到，是的，我是感觉到，绿草的种子是怎样的向上长芽；生命的酒精是怎样的永久的灌注在你的心上；花朵是怎样的从美丽的枝干上开出；大树与蔓草是怎样的因接触着太阳的幼光而快乐的颤抖着，竟如婴孩在他们母亲胸前吃乳倦了时的快乐一样。

“那就是为什么当秋月的清光照在金色的收获的田上，当椰子树的绿叶快乐的跳舞着时，我会感得很深的快乐，而想到我的心灵浸渗在水，在地，在林中之叶，天空的碧色中时的原因。全个宇宙似乎静静的呼喊我一千次到它的胸前去。从世界的奇异的游戏室里，我也听见那微弱而熟悉的我的旧时游侣的快乐的声音。

“啊，地球母亲，请把我带回你的心中——生命在这个心的千种不同的路流出，歌声在那里以千种不同的调子唱着，跳舞在那里以千种不同的式样跳着，心灵在那里永远是思索的，而你是自己辉煌的有益的站立着。”

太戈尔是相信勃莱克（William Blake）“人的身体与他的灵魂没有区别”的话的，但他更一步，不相信他父亲所信的二神论而相信吠陀的一神论，即世界不惟是为神所造，而且是由神自身造出的教义。

有一次，有一个印度的哲学家对他的学生说道：“世界不仅是为神所造，且是由神自身造出。”

“那怎么能够呢?”学生问道。

先生回答道：“看那蜘蛛吧，它从它自己的身体里，引出了丝线，以造成一个奇异的蛛网。”

东与西之间并不曾有一道鸿沟。哲学与科学一样，是世界的。它不知什么东与西。它冲破了一切物质的界限。在这一方面，太戈尔的《生之实现》，实给了世界的人类以不少的利益。它的幽雅的文体，高尚的思想，是全个世界都应赞颂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永久的快乐中生出来的。”太戈尔在《生之实现》说道，“这个快乐，它的别名就是爱。……我们不爱，因为我们没有感觉，或者可以说，我们没有感觉就因为我们没有爱。因为爱是一切围绕我们的东西的极端的意义。它不仅是感想的；它是真实的；它是快乐，是在一切创造之根上的快乐。”

在《优盘尼塞》中有几句话：“世界是从爱中生的，世界是被爱所维系的，世界是向爱而转动的，又是进入于爱之中的。”这个真理，太戈尔在《动作的实现》里更完备的发挥出来。他在那里鼓吹着爱与正当的动作。这个爱与动作的使命在欧洲各国互相摧毁的时候，尤有特别可注意的地方。欧洲虽经了长久的战争，而他们国际间的仇视，仍未丝毫消泯。基督的同胞的和平的理想，已在狂逆的西风中吹散。嫉妒，猜疑，欺诈，是他们的戴皇冠的魔鬼。在这个时候，印度的哲学，太戈尔的爱的哲学，对于欧洲乃至全个世界，实是具有很大的使命的。太沉溺于静修与玄想的习俗，使印度的光荣灰暗了，印度的尊严被侮辱了；而同时太崇奉物质主义的结果，却使西方诸国也如被巨伤的大兽，在吼叫，在受苦。这两个极端的思想的和谐，能够带来一种理想的事实；太戈尔的使命就在于此；人类的永久和平与自由与发展即存在于这个和谐之中了。

第十二章　得诺贝尔奖金与其后

一千九百十三年的冬天，瑞典的文学会，以诺贝尔奖金（Nobel Prize）奉给太戈尔。这是东方人第一次在欧洲得到的荣誉。在这个时候以前，太戈尔的《吉檀迦利》（Gitanjali）的出版，虽然使欧洲读它的人为之惊异不置，然而对于太戈尔并未十分了解。但从这个把一九一三年的诺贝尔奖金给与他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名字才常常在许多平常人的口中说着，他的作品才常常有人去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才常常有人要想知道。他的文学上的地位，从这时起才在世界文坛上确定了；他的名誉，也从这时起才变为世界的了。——不仅欧洲人美洲人，知道他，连东方的中国与日本向来与世界文学，尤其是自己东方的近代文学，不相接近的，也立刻认识了他。

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金之给与太戈尔，除了关于太戈尔的自身外，许多人都以为是世界上一个很大的消息。欧洲的文坛，本来不大与东方的文坛接近，对于近代东方文学尤有蔑视之意。从这时以后，这种意见才渐渐的泯灭。一个美国的著作家这样说道："这个奖金将勉励西方的人类去访求东方的人类所已说的话，

或将要说的话。这件事将把以前永未解释过的东方，为西方解释一下。所以这件事成了一件历史上的事实，一个那半球明白这半球的转点。”不仅如此，这件事且表白出东与西的友谊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东与西的文学，艺术与理想的互相了解，互相赞赏，如一阵大风似的，能够把国际间或人种间的敌视的与歧异的见解的黑云吹散到天外去。这个期望，我们在这时说出，也许觉得是过早，但我们看太戈尔近来在欧洲的影响与他近来的努力的成绩，却使我们决不能相信这是一种不可能的期望。

他的作品，从这个时候以后，译为英文的一天多似一天。有的是他自己译的，有的是他朋友译的；后来又有人把他们译为德文，法文及其他各国的文字。

他以前曾到过英国，曾到过美国，但他的来与去，都不为一般社会所知。从得诺贝尔奖金的前后，他的生活却不能如此的自由了。他走一处，这一处的人便带着热忱欢迎他，要求他的思想上的赠品。如他到了英国，英国人便要他讲演；他的《生之实现》一部论文集，便是一九一三年夏天前后在英国讲的演说稿。英国人及爱尔兰人之欢迎他，较之本国内的任何文人都甚些。有的人甚至于伏在地上，吻他的足。以后他又到美国去，美国人欢迎他的盛况，也不下于英国人及爱尔兰人。他的《人格论》，即为那时在美国讲演的稿子。以后，他又到过日本，日本人敬奉他如神明，称他为“圣的太戈尔”。日文的太戈尔著作的译本与论太戈尔生平的与思想的书，立刻出版了不少。他的《国家主义》的论文集，即为那时在日本的讲演集。

自一九一七年欧洲大战告终以后，世界上到处都弥漫着和平的新觉悟。太戈尔的思想与精神益受各处求和平者的欢迎。他往来欧洲各地，为印度民族向英国政府求自由，又与世界的知识阶级的代表，如巴比塞（Barbusse），罗素（Russel），勃兰特

(Brandes)诸人组织“光明团”发表宣言。后来又回到印度，定居在鲍尔甫（Bolpur）的和平之院里，又计划着把和平之院改组为国际大学。他在他的国际大学宣言里说道：

“在现代，人类的地理上的区分，差不多已经消灭了。不但各种不同的部落，便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也都在生死的关头，不是创造新的生活，便不免沦于灭亡。在我们的前面，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全地球的统一的国家的创造。把各民族都发展开来，便各成为全世界的大结合的一分子，也像把各个人发展开，成为民族 的一分子一样，这在现在，不已是可能么？

“所谓世界的大结合，是说把人类都团结起来，比现在一切的联盟团体，更为深切，更为坚固。这种结合应该以人的神性的出发点为基础。我们应该建筑一所世界的大殿，以供奉个人类公共的神道。这种理想实现的第一步是在于使民族都表示他们的精神的主宰，但在猜忌和斗争支配一切的时候，这样的理想是不会达到的。所以我们应当创立人类相互交通的机关，以消灭各民族间的敌忾心。只有国际的大学，才配作为这一种交通的机关。因为在大学里，我们可以一块儿寻求真理；利用了几千百年来的人类遗产，一块儿研究学术；全世界的艺术家可以共同创作艺术品；科学家共同开发自然的秘密；哲学家共同解放人类的思想，圣人贤者共同实现人生的理想，他们干这些，不但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为了全人类。

“气象学家曾经发明过一个真理，他们证明地面上的大气都是属于同一气层的，虽然各处的气候各不相同。我们可以同样的证明人类在精神生活上是全相一致的，虽然体质可

以各不相同。我们应该知道：所谓人类大结合，并不是把一切的民族都变成齐一，乃是说叫各种不同的民族互相协调的意思。在现时，似乎大家都已负着这重要的责任了。为了这个责任，我特在印度创立国际大学，我的意见，以为这是促进东西人类相互协调的最善方法。我打算邀请西方各国学者到这里来，住在印度生活中来研究印度的哲学，艺术，音乐，由印度学的专家指导他们。”

国际大学发起的原因是如此。和平之院本是由太戈尔独力担任，丝毫不受英国政府的津贴。现在这个国际大学的经费也是如此。他把诺贝尔奖金捐给这座学校；他所有的著作上的报酬，也大都送给了它。

一九二一年，他又作欧洲之游。这时，他已被他们称为传道的大师。为战争所疲劳的德国人民，对于他所称道的东方生活与东方思想，尤为颂赞鼓吹。他在柏林及其他地方讲演了好几次，听的人都十分的拥挤。入场券所售得的款，都捐入他的国际大学。他讲演的台上，布了一个森林的景致。当他到郊外森林中游散时，已有数万人预先在那里等候他。他一到，欢呼之声大作，有许多人唱歌，还有许多小孩子手执鲜花到他面前跳舞。他在其他各地，所得到的待遇也是如此。最近出版的《创造的统一》(Creative Unity）一书，即是他在这时前后所做的论文集。

他到欧洲去，原抱有很大的志愿，他在一封信上说道：

“向来和平之泉都是源于东方,所以今日欧洲便不期而然的回面向着东方来了。欧洲好像一个在游戏中受伤的孩子,现在他正离去众人,在找他的母亲呢。这样说来,东方怕不就是精神的人道主义的母亲——能舍她自己的生命与人的么?

我们印度人还盲然不知欧洲人已在我们门前求救——还不知乘他们需要的时候，以人道主义与之；这真是一件可叹的事!”

但印度人虽不知道救欧洲人，而太戈尔他自己则已开始到欧洲去做这种事业了。当他将倦游归来时，当他在盼望归期时，心里还忧愁着，踌躇着，想在欧洲至少再住上一年，以尽他的责任。

不过他究竟是一个诗人，——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对于传道的事业，他似乎不大适宜。他自己说道：“当我向来在柏特玛大河的河心住居的时候，我不过是个抒情诗人，但自从移居和平之院后，我逐渐成了一个教师的模样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的真实的先知的资格，从此就要断送了。现在已是谁都向我请求教训，生怕有一天我不免要使他们失望呢。”所以他虽然很想尽他的在欧洲传布他的和平的福音的责任，而故乡的精灵，黄金彭加尔的景色，却时时在他心灵呼唤他回去；他虽然在欧洲受到一种极热忱的欢迎，极崇敬的待遇，而在他自己的心里，却反觉得彷徨与不安。下面的几封信，可以把他那时的情况充分的表白出：

“我在欧洲到处都受热切的欢迎，料想你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我非常感谢欧洲人待我的好意，这是无疑的，可是，在我的心里，总像有些惶惑，——而且也几乎要暗暗地叫苦。

“凡是群众的感情的表示，其中总有一大部分是不真实的。群众的表示，往往不免过度夸张，这只是由于群众心理中感情累积的结果。就像在一座广厅中所发的声音，因为有室内各处的回声混合其中，所以所听得的已全不是原来的声音了。群众的感情，大部分是相率附和而成。——这是非理性的，群众里边的各分子，都有根据自己的想象造成他自己

的意见的自由。他们理想中的我，决不是真的我。我为了这个担忧，也为了我自己担忧。这使我对于我从前的隐居生活，不禁起无穷的恋念。被迫在别人的幻想所构成的世界里生活着，这委实是最烦厌的事了。我曾见许多人迫住了我，扯住我的衣裾，毕恭毕敬的向我衣裙亲吻——于是忧郁罩住了我的心了。我怎样才能使这些人相信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并不是超出他们之上的，在他们中间也就有许多是值得我的尊敬的，我却又怎能使他们相信呢？

“可是我也知道在他们当中像我那样的诗人，是一个也没有。但用了这种的敬礼，来敬礼诗人，委实是不对的。诗人是在人生的筵席中司仪的；他所得的报酬就只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儿。假如诗人是成功了，他便被任为人类的永远的伴侣，——只是伴侣，却不是指导者呀。但要是我被盛名的恶戏所捉弄，被他们扛到神坛上去了，于是在人生的筵席里就没有我的座位了。”

“那种盛誉，实非我所能当；实不能不谓之无相当的时间而施与过骤呢。这就是我感着惊异，厌倦，——甚至忧闷的缘故。我自思正如一个家畜的羔羊，只能居在屋角庭隅，以媚爱亲交友朋，倘若一旦厕身大庭广众之场，我便要觉得卑微，对群星告不敏了。”

“凡我所到的地方，不论德国或斯坎德那维亚半岛，都有一种热烈的爱恋，随着我，包围着我，这事，我想你一定想不到。我所欲的就是欲回到自己的人民里去——回到咒诅不绝的环境里去。我生长在那边，我工作在那边，我在那边给我的爱，所以我生命的收获在那边。即使得不到完全的偿

报也不要紧，仅收获自己的成熟，已给我以莫大的偿报了。所以那边的田野似乎有一种呼声到我这里来，那边的日光是等候着我，那边的四季更递的季节是在问着我的归期。他们知道我的一生都在把我的梦的种子撒在那边。但是暮色已深沉的照在我的路上，我是倦了。我不欲得国人的赞美与责备。我只愿休息在星光的下面。”

他从欧洲回来之后，即休息于彭加尔鲍尔甫的和平之院的里边。他现在年龄已高，不大高兴出去，但远游之念却还未绝。明年三月间，林花烂发，山鸟奏歌之时，他大约会在我们中国的春光秀媚的地方出现。

他在晚年，很想逃避名誉，虽然名誉的石碑，已重重的压在他的身上。他自己说道：“总有一天，我要从我自己的名誉中突围而出；因为虽然有这庞大而且日益增长的障壁，阻隔着，但是柏特玛河却仍旧在向我招呼呢。他仿佛向我说：“诗人，你在哪里?” 于是我的心，我的灵魂都想去找寻那诗人。但是那诗人已经是不容易找到了。因为一大群的人把荣誉堆满在他的身上，他被荣誉压在底下，已不能脱逃了。”

这是很可诧怪的，少年的作者总是努力向着名誉的山巅爬上去，他们虽不全以名誉为他们的太阳，为他们的活动力的源泉，而享受名誉的愉乐却至少是他们的成功的骄傲之一；至于已享盛名的作者，在饱餍了名誉的食品之后，却反渐渐的有些厌恶它了。名誉反成了压迫他们的重负，使他们不得不逃避。太戈尔如此，托尔斯泰（leo Tolstoi）也是如此。

诗人的成功，即是诗人的寂寞；诗人的名誉，则如黑雾似的，使他不能找到他的自己。这即是太戈尔所以眷恋柏特玛河上的自由生活而欲逃避出现在的名誉之墙的原因。

然而名誉究竟能逃避么？名誉如好花的清香，发麝鹿的芬芳，如秋晨的晴空，如春池的绿波，——不然，还比譬得不对，他们虽然如名誉一般，一附上去，便非待花枯了，鹿死了，白日终止，池水干竭之时不能消灭，但名誉的寿命，却较他们为更长更久。诗人的歌声虽有止歇之时，而诗人的歌，却终将永久的，永久的，在新的活泼的必再唱出来；诗人的形骸虽有时而长眠于青松绿萝之间，而诗人的名誉，却终将永久的，永久的，挂在千百代后的千万人的口中。

“你是谁，读者呀，在百年之后读我的诗者呀？

“我在这样的春天的繁富里，不能送给一朵花，不能送给前面云端的一缕金色。

“请开了你的门，向外望着。

“从你的百卉盛放的园中，收集百年以前的已灭之花的芬香的回忆。

“在你心的愉乐里，也许你会觉得在一个春天的清晨歌唱着而送它的快活的声音度过百年的时间的那种活泼泼的愉乐。”

——《园丁集》第八十五首。

诗人的不朽，不朽的诗人。谁能逃避了这名誉的不朽的墙呢？灿烂的春光，年年是繁花似锦，绿柳如丝；静谧的秋空，年年是片云高挂，山色清幽；伟大的诗人太戈尔的名誉也将如这样的春光与秋空，历千万年而不朽，而更新。人间的屋基不完全毁灭，他的名誉的墙是永远不能倒的，——虽然他自己是想逃避出这座墙。

附录　太戈尔的艺术观

我们问了许多人，什么是艺术？在最古的书上，他们的议论已经是纷纭莫定了；到了现在，仍然是如此。百人中总有九十几个人的回答是不相同的。关于艺术的功能，尤为争论最烈；有的主张艺术须要切合于人生的要求的，有的以为艺术只是应艺术的冲动而发生，不受什么功利主义的支配的。

太戈尔却是超乎这一切争论以外，转而“搜求艺术存在之理由，想找出艺术到底是因某种社会的目的而发生，或是应我们的美术之快乐的需要，或是因什么表现的冲动而发生的。”（《人格》，页一六）

太戈尔以为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世界的关系是非常繁复的。饥而食，渴而饮，我们则因一切物质上的需要，而与大地相接触。知一切事实，则求而纳之于简单的法则以内；见了某种已然的事变，必欲发见其所以然的缘故，我们又因一切智慧上的要求而与大地生关系。但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种精神上的要求，一种人格的人（Personal man）的要求。人格的人与物质的人恰立在相反的地位；他也有他的喜欢与不喜欢，他也想寻找些东西以满足他的爱的要求。这个人格的人惟有在我们脱出一切需要——

身体的与知识的——的时候，才找得出来。

科学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力的抽象世界。我们能够藉着智慧的帮助来利用他，却不能藉着我们人格的帮助去实现他。艺术的世界则不然，我们能够看见他，感觉得到他；我们能以我们所有的情绪来对付他。这个艺术的世界就是人格的世界。

这个艺术的世界——人格的世界——于我们有什么必要的关系呢？艺术的发生的原因何在呢？艺术何以有存在的理由呢？

太戈尔对于这些问题回答得很详细。他以为人与禽兽所以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禽兽是束缚于需要的范围以内的，他们的活动不是为了自己保存的需要，就是为了种族保存的需要。换一句话，就是他们的一切能力都消磨于生存竞争的战场中。但是人类则不然，他在生命的商界中，好像一个大商人。他所得的钱比他所消费的钱多。所以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过剩的富财，供他自由挥霍。禽兽也有知识，也能用他们的知识来保存养护他们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止于此了。他们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以求住求食，并且知道四时寒暖。人类对于这些事情，也必须知道，因为人类也是必须生活的。但是人类的知识，除了用在这种地方以外，还有许多余剩。这个余剩的知识，他可以自由享用，可以为知识而求知识；因此而他的科学与哲学得以形成。

同样的，艺术发生的根源，也是如此。人类与各种动物，都要把他们的快乐或是不快乐，恐怖，愤怒，或是爱情的感觉表现出来。在动物的世界里，这种情绪的表现到了“应用”的范围，即停止不进。但是，人类则不然。虽然他的情绪的表现仍旧有“应用”的原意在内，而他的情绪的枝叶却长成发达，四布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换一句话，就是：人类的情绪的力量，除了应用在自己保存的目的以外，尚有许多余剩着。这个余剩的情绪，遂

发泄而成为艺术的创作作品。

当我们心里起了一种感觉，除了对付引起我们感觉的对象外，尚有余绪不能全为对象所吸收，因遂回到我们心上；用他的回波，使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我们穷的时候，所有我们的注意力全注在身外的衣食住。如果我们是一个富人，那么财富的光线，一定会反射到我们心上，使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富人。这就是在一切生物中，只有人能自省，能知道他自己的原因了。换言之，就是他所以比别的生物更密切的感觉得他自己的人格的原因，就因为他的感情的力量除给他对象所消耗的而外，尚多出许多。所以在艺术中，人类所表现的是他自己，并不是他的对象。——他的对象完全表现在科学中。

总之，人类是一个有余剩知识的动物，他的余剩的知识所表现的是他所见的对象，所搜集的报告的本身，并不是他自己；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有余剩感情的动物，他的余剩的感情所表现的方是他自己，而不是与自己无干的外物。凡在艺术中表现出的对象，都是经过人的感情的洗礼，已与他的人格融成一片的了。

本来这个世界同我们是不相干的，——除了求衣食，求知识以外——有了我们的感情，无论是爱，是憎，是喜是悲，或是惧怕与惊奇，继续的对他起了感觉，这个世界才成了我们人格的一部分。我们生长，他同我们一起生成，我们变迁，他同我们一起变迁。我们的情绪正像溶液一样，把这个外象的世界，溶化成一个亲切的有知觉的世界。

所以赤裸裸的事实的报告不是文学，因为事实是独立于我们情绪以外的。我们说，日是圆的，水是流的，火是热的，谁会引起了什么感觉？但是朝阳初升的美景的描写却是有永久的趣味与美感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因为所描写的不是朝阳的本身，乃是我们自己心中眼中所感觉到的朝阳的景色；换一句话，就是我们

自己的人格的表现。

艺术的主要目的是人格的表现，我们都已坚确的相信。但是还有许多人却以为艺术的目的是“美的产生”（The production of beauty）的。在太戈尔看来，艺术的美不过是工具而不是艺术的完全的最著的特征。他不过用来为更有力的表现我们的人格的工具而已。

艺术的描写，不必详细而当得其精神。不是一个艺术家而去描写一棵树，他必定要详详细细的把这棵树的一切特征都写出来，但这却不是艺术的描写。真实艺术家的描写是忽视不重要的详细的部分，而注重于主要的特性的。他把所描写的对象的全部的个性精神，从宇宙之心中表现出来，经过作者的人格化，而使之和谐，使之有情感。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含哲学的抽象思想的——印度文学中此例最多——也有报告历史上的事实的，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文学的丝布中，总是织上了作者的如火的情绪与活泼的人格的丝线在内的。凡是艺术，如有不经过作者的人格化——感情化——的，就不能称为艺术；因艺术就是发生于人类剩余的感情的；并且就是人类的人格的表现。

以上是把太戈尔对于“艺术者何?”这个问题的答案，略略的叙述一下，但是太戈尔却始终不肯把“艺术”二字，下一个定义。他以为定义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使人制限他自己所见的范围并且使他自己看不清楚所见的东西而已。

以下再略说他对于艺术的功用的意见。

他以为在我们生命里，我们有“有限”的方面，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我们自己，譬如我们喜欢吃饭，吃完了饭，我们这个欲望立刻消失了；又有“无限”的方面，就是我们的灵感，我们的快乐，我们的牺牲，这是无限的。人类的这个无限的方面，

必须表现他自己在某种含不朽的元素的象征的里面。他用了超越世俗的材料，建筑了一所乐园给他自己住。“因为人类是光明的儿子。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如完完全全实现他们自己，他们必感觉得他们的不朽。当他们感觉到这一层，他们立刻伸展他们不朽的范围到人间生活的任何部分建筑他的这个真实世界——真与美的生存世界——就是艺术的功用。”惟有在艺术方面，人类才显出不朽。所以“艺术是称我们为‘不朽世界之子’的，就是宣告我们有居住在天国的权利的。”

所以在表面上看来，艺术似乎是无用，其实他却是人类高尚的精神与情绪方面，不朽方面的主宰。“如果你把所有的诗人和所有他们的诗，摈出世界以外，只要一会儿，你就立刻可以发见——因他们的不在——活动的人的能力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实在供给生命汁给他们的收获地的究竟是谁了。”

太戈尔说：“作事的人常把他们的事务弄得出了音韵和谐的地步，这就是我们诗人所急要把他弄和谐的了。”

现在世界作事的人，哪一个不“把他们的事务弄得出了音韵和谐的地步”？这正是艺术家所急要出来“把他们弄和谐的了”。

十，十二，二十。

郑振铎全集

第十五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津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 18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382.375 印张　9508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 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